

增訂本

中國共產黨史稿

王健民著

第一篇
上海時期

中國共產黨史稿

王健民著

中文圖書供應社一九七四年九月

作者近照



作者題詩

為教三戶受亡秦止罪文章不罪身
執簡誰稱齊太史無言我念息夫人
敢將得史陳前席愧把興亡責後生
刪定殘編五老矣十年一吐此酸辛

修訂史稿竟事

王健民時年七十

修訂「中國共產黨史稿」序

王健民

拙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以下稱「初版」)，在出版之初，自己並無信心，所以我在「自序」中說：「我不敢稱此書為『中國共產黨史』，而稱之曰『稿』，因為自知缺點甚多……一方面期望讀者指正，另一方面留予自己以修改的機會。」

近數年來，時時與有關中共史料接觸，發覺初版錯誤與遺漏之要正復不少。

期待讀者指正，這使我很失望。在國外，用英文、法文、日文及中文為此書作書評的，我知道的有七起。雖然他們有所指正和批評，但不能使我滿意，因為沒有搔着癢

受。中共史還是一門新學問，許多讀者和我一樣，缺少藝術和真相的知識，所以此書的缺點，他們並沒有發覺。這些書評都是在國外，在國內的竟一篇也沒有。國內向來缺少寫書評的風氣，有，也是褒而不能。評者不敢「開罪」作者，作者亦往往缺少接受批評的雅量，所以大家不敢多事。加以此書未繼續發行，自然以不提為是。只有梁啟鐸先生一再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並譽之為中共史的權威，使我受之有愧。

初版發行之後，有閩中共史的著作及資料，陸續有所發現：郭華論的「中共史論」，張國燾的「我的回憶」，是其最著者。郭教授自始即為中共史專家，不像我半路出家；張先生為中共發起人之一，且曾為重要領袖，其回憶

雖未必完全正確，然總比我這個局外人知道得多。

有了新的資料和著作，自然應該採集起來以補正本書的闕失，但這未能付諸實行，使我對讀書非常不安，今幸在香港有再版的機會，把初版的錯誤加以修正，遺漏加以補充，這對於我和讀者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茲按照初版的編次及頁數的順序，列舉並說明主要修正之點如下：

第一編 上海時期

3
初版第九〇頁所載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第四次大會開會情形，甚為簡略。按張國燾回憶，有當選中委名單，工

作分配及人事情况。四大当选中委，陈初版提及陈独秀为
 总書記及瞿秋白当选中委外，国焘尚提及李大钊、張國焘
 等八人，但未能指出谁是中委，谁是候補。毛澤東未出席
 大会，亦未当選。当選者尚有王荷波其人，很少为外间所
 知，日人波多野乾一的「中國共產黨史」曾经提及，按國
 焘说，他是浦口鐵路工会领袖。

大会在吴庭康 (Volinsky) 指導之下舉行，吴是指導一大
 的人，國焘说，吴在一九二七清黨以前一直代表第三國際
 指導中共，人很谨慎，不似馬林和鮑羅庭之顯指氣使，目
 中無人。

大会後中共中央的分工：討論政策性问题者为陳、張、
 瞿、蔡和森，由吳指導；討論事務问题者为負責宣传之彭

述之，少共書記任弼時，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職工運動委員劉少奇、李立三，及婦運委員向警予。

照國憲的說法，政策討論會里似尔後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工作分配，有秘書處，交事務之責，由總書記指導；組織部長由獨秀並；蔡、瞿編「嚮導」；張主工運，劉、李在他指導下工作；軍事由國憲兼，直到北伐軍到武漢之後，才由周恩來負責，並歷時甚久。

5

初版第九二頁所載一九二一年第三國際所召開的東方民族會議，張國燾曾往參加。他回憶說，他行先到伊爾庫茨克報到，該地國際設有遠東局，指導中、蒙、日、韓等地共黨。翌年一月始到莫斯科開會。季諾維夫主席，張也

是主席團之一。中國代表有張秋白、鄧培等，尚有甫入東方大學之中國留學生若干人。大家不懂俄語，有如聾啞。國憲、秋白、鄧培見過列寧，按國憲印像，列寧人很和氣，不做作，有為一位教書先生。他向西張，國共可否合作，澤肯定答復，他很滿意。

初版第一八五頁所載學生運動，其起源不詳，後查其他資料，仍溯源於五四運動。五四的翌日，北京學生在北大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並通電全國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於上海。其時各地學聯紛、成立，五月十六日，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到各地十九個單位，代表有段錫朋、張其昀等三十餘人，來賓有蔣夢麟、黃炎

培等，到会者共二百餘人。一九二三年全國學聯遷至廣州。每年一屆，至一九二六年是第八屆。

初版第一、二七頁所載中國農村土地分配情形，都採用中共資料，全係估計，並故意誇大分配不均（大陸論跡之初中共屬新土政時亦復以此），殊不足信。另授「剿匪戰史」載：皖西大地主有擁有土地十萬畝以上，對佃農甚為苛刻，但所指地主為一族姓，未說明其人口多少，亦欠正確。中國政府有若干調查，其正確性亦堪懷疑。後閱金陵大學教授巴凱所著「中國土地之利用」(J. Cassing Buch: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一書，根據一九二九——三三金大農業經濟研究所之詐調查，包括二二省，一五四縣，一六八受

之一六，七八六農戶，自其成分言，地主佔七六·一%，半地主佔二一·八%，佃農佔二·一%。地主如此之多，佃農如此之少，則土地之分配不啻太不平均，則中共於土地時，至農村中從事血腥的階級鬥爭，殊無意義。此等資料自應引用，以與中共所捏造的数字比較研究。

初版第三〇四頁所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物價工會發生槍戰，閻軍將獲方繳械，亦即「四·一二」清黨的高潮。此一事件，最近出版的「杜月笙傳」有內幕報導。據稱：當時領導「工人糾察隊」暴動者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份子江壽華，顧順章為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周恩來為黨代表。反共方面，上海青幫首領黃金榮、杜月笙

及張嘯林，聯合紅幫，組織秘密的「共進會」及公開的「工界聯合會」，發動幫會羣眾數千，自備武器，臂纏白布，上書「工」字為記，於十一日夜半後，分別向南市、南北各工人糾察隊進攻。翌日，槍戰不已，白崇禧將軍遂令國軍將獲者繳械。

前二日，九日晚，杜月笙招宴江壽華於其家。至，則有四壯士揆之上汽車，疾馳楓林橋郊外，扼之垂斃，遂埋之於叢林中。

大陸淪陷後，杜月笙之子某，一度被誘自香港返上海，適逢中共開會追悼江壽華，展示血衣，大駭，迅即出走。

查，國憲回憶則有詳細而重要的記載，除哈爾濱執行部未曾提及外，其餘四個執行部是：北京執行部書記趙世炎，受加拉罕指揮，廣州陳延年，受鮑羅庭指揮，兩區均有獨立的傾向。上海執行部書記羅亦農，受中央直接領導。漢口執行部書記彭澤湘，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武漢為北伐軍克復後，由張國燾接任。國燾於武漢區中共人事及活動有較詳的記載。以上四個執行部在一九二七年破壞無遺。北京於四月六日張作霖搜查俄使館時，趙世炎與李大釗同被捕殺。廣州、上海於四月十二日清共時破獲，陳延年、羅亦農亦均被捕至死。漢口區則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分共時被破壞。接着中共則有南昌、兩湖及廣州暴動的失敗。所以一九二七年中共所受的打擊是很大的。

初版第三六二頁所載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五大開會情形，對於當時中共中央組織及當選中委未加記載，僅於「証二」列舉波多野乾一的「中國共產黨史」中的名單。實則此項名單，以參閱本書四八三頁「蔡和森：機會主義史」雖不完全，也可知其大概。七月初，武漢分共前，陳獨秀即不視事。「八一」南昌暴動，國燾、恩來都參加了，黨權遂落入瞿秋白之手。按其他資料，五大毛澤東僅當選候補中委及候補政治局委，蔡和森，毛的同鄉同學，亟欲提高毛的地位，未能如願。迨九月毛所主持的西湖秋收暴動失敗後，其候補政治局委也被開除了。從此毛不能參加中共中央黨的決策達七年之久，所以毛對陳、瞿，滿懷怨望。

初版第五〇三頁所載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之地點為武漢，「紅色舞台」及他書均有此記載。也有記載說在廬山。按「檢會主義史」，謂蔡和森與彭公達會談「乘船返湘」，可以推知在九江。因從九江返湘必須乘船，而從武漢返湘通常是乘火車。至於出席之人，缺乏正確完全的記載。張國燾參加了南昌暴動，故未出席會議，他的回憶所舉名單亦僅可供參考而已。

第二編 江西時期

初版第五六頁所載立三路線與國際之關係，謂：「對於立三路線，國際之態度如何？有人謂立三係服從國際指

示，有人謂係違抗國際指示。此兩種看法，各有是處，亦各有錯處。上書中最後指出是服從國際指示。現在我要更肯定的說：立三路線是服從國際的指示，說違抗國際指示是錯誤的。有國國際指示的原件，本書已引用，足証立三是遵命行事。又按國憲回憶，早在中共與國際六大時，莫斯科有一種「革命認識論」，謂其時共產革命進入第三時期。第一時期為一個高潮，俄國完成了革命；第二時期為低潮，現在進入第二個高潮，為第三時期，將促使帝國主義崩潰與共產革命的發展。在此認識，史達林指示了布哈林的「右傾」，同時也鼓勵了並指示了立三路線。所以一直到立三路線失敗之後，瞿秋白、周恩來等歸國召開三中全會時，尚謂立三並未違反國際指示，這是真的。但是國

際要把失敗的責任推在三的身上，所以硬說三違抗國際指示。在莫斯科審訊庭上，不僅張口一聲，咬定此點，迫使三承認，並說三如何如何說，如何如何幹，目無國際，照共產黨一貫「苦說成棍」的作法，現在我判定都是或多是我証之詞。在國內，則有在圍奪權的陳紹禹等，大談其「兩條路線」，一直到四中全會，鐵案如山，連瞿秋白等也翻過臉來，無人不認為三路線是反國際路線的。這，我們應該認清：是一個冤獄。

初版第一〇一頁所載國際法當權時的人事，未提及一九三一年陳紹禹去莫斯科，周恩來去中央蘇區後，中共中央人事變動情形。國民黨調查科出版之「分崩離析之共產

黨上有所記載：總書記兼常委秦邦憲，常委張聞天、趙容（康生）、王雲程、廖成雲（陳雲），張聞天並兼宣傳部長。此一名單中，以沒有的人去蘇區，有的人留守上海中央局，有的人赴莫斯科，還有的人被政府破獲自首。爾後區秦邦憲掌權，張聞天等澤志，即源於此。

初版第一八九頁所載鄂豫皖蘇區情形，及第五六一頁所載紅四方面軍肅反報告，均與張國燾有關。張於一九三一年其進入此區，設一中央分局，張任書記兼軍分會主席，集權力於一身，所以他的回憶極具參考價值。張的回憶與初版所載大致不差。回憶之特點，為張所經歷的內部的政治、社會及生活情況，當與初版所不遠。其尤突出的是

中共的武力在數量上遠較初版所載為少。回憶固未必正確，初版亦非很可靠。因初稿之根據中共資料者，他所舉例自誇，其根據國軍之對共報告者，亦未免將敵人估計過高。至於肅反工作，為張國燾、陳昌浩對曾鐘聖、許世慎的奪權鬧事。授陳昌浩報告，肅反中整了兩個師長、六個團長，五個團政委，十個團政治主任……逮捕了一個團政委組派A B團第三黨上份子，並硬說許世慎等陰謀投降國軍。而國燾回憶不再提投降之說，僅稱發現一可疑之電報，至肅反之廣，亦頗予隱諱。

初稿第三六七頁所載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中央蘇區查田運動，錄有三個文件，而未加深入分析，此為初版最草率之

變。當時處理土地問題，國際派與毛澤東發生不斷爭執，毛被整得抬不起來。其有關文件有六：

一、蘇區中央局查田運動的決議：其作用在糾正毛的土地法，指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為富農路線。

二、仿「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乃毛以偽主席名義根據上項決議而公佈者，是以表示毛的屈服。

三、「毛：查田運動初步總結」，乃毛於屈服之後，表示自己並非「富農路線」，乃大搜括，大打殺，把中農當富農，把富農當地主，而予以圍剿。毛大，向左轉。

以上三個文件初版已採用，以下三個文件則被遺漏。

四、「中央關於查田運動第二次決議」，乃責毛查田運動的過火。

五、關於中央政府關於土地開墾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乃毛承認運動過火，改劃農村成分，把已搜括的土地財產設法歸還。毛又大，向右轉。

六、關於中央政府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乃國際派不滿毛的太右轉，索性把毛的「蘇維埃政府主席」免官，而以國際派張聞天繼任，張乃發表此文件，以糾正毛的第二次右傾。

由以上文件可以看出國際派與毛在土地問題上開墾的全貌，又可以看出毛忽左忽右，並無自己的主張，只是玩弄其左右投机的技倆。同時也顯示了土地問題是毛被整最大原因之一。

初版第五二八至五四〇頁所載一九三〇年富田事變，乃毛澤東為清除異己，以A B團虛偽罪名，在蘇區大肆屠殺的一大暴行。本書此項記載尚屬正確，其最大的缺點是把中共中央把此事變加以糾正，進而予毛以打擊的部份給漏掉了。

A B團事變發生後約一個月，即一九三一年一月，蘇區中央局才設立，項英對此未採取糾正行動，遠在上海的中央，因未明真象，自亦無所作為，所以毛得為所欲為。直到一九三一年底周恩來自上海到了蘇區，從項英手中接掌了中央局書記，瞭解了毛藉題屠殺，太不成話，乃於一九三二年一月通過「關於肅反工作決議案」，未指名的嚴厲指責肅反工作「以殺人為兜底」，「以瘋狂心理去乾打虎

殺₁，「造成党内恐慌₁」，「肃反組織形成了超過黨、超過政權的獨裁機關₁」，並提出糾正辦法。經過此項決議並予以執行，反A B團事件始告一段落，毛在蘇區山大王的威風也遭受了第一次打擊。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翻身的重要會議，為毛家史官所歌頌，亦為稍涉中共問題者所周知。但資料缺乏，初版雖一再提及，而多具體內容，自然是一大缺點。郭華倫的「中共史論」第三冊記載遵義會議，有出席人，有討論與爭執的問題，有決議案的內容，有中共中央改組的人事，可以說甚為充實。其資料來源為當時與聞其事的人陳然所提供。陳然有豐富的中共歷史知識，近年漸為中外

研究中共史的學人所知，但事歷三十餘年，其所回憶，總難免使人有所存疑。但郭文發表之後，哥倫比亞大學發現所藏早期「毛澤東選集」油印本有附錄「遵義會議決議案」，與郭文比較，其基本內容多甚差異，因而使存疑者為之釋然。然物共有差異之點當難免，此不僅因記憶非原文，也因「毛選」所發表者，按陳然指稱，也曾加修改，並非原件。但無論如何，遵義會議的基本情況已經明瞭了。

遵義會議使毛擁上了政治局常委，七年的泥淖，浮出水面，鑽入黨的最高核心；又握有軍權——中央軍委主席，槍桿子可以出政權；他確是翻身了。洋、自得，無怪其然。

初版第六四八頁所載一九三五年夏毛而蓋之內訌，即張國燾與毛澤東兩股紅軍於懋功會師後所發生的權力鬥爭。本書所載當時衝突情形，係錄自大公報通訊，殊多失實。張國燾若著書向曾有所辨正。中共史官胡華的¹參考資料¹雖提出有兩次會議，內容亦不詳。王國燾回憶與郭著史論出，始趨明朗。兩河口會議舉行於六月，為一中央分駐會議。其時國燾擁有兵力七萬人，為毛之三倍，但中央握有毛與國際派手中。張派遂以遵義是否合宜為題，企圖改組中央，結果增選張派中委八人及以張為總政委，勉強妥協。毛而蓋會議舉行於八月，討論軍事逃竄路線問題。張主張西入西康，毛主張北上陝北，最後雙方同意北上。但右路之毛股在松潘遭受國軍之重大打擊，左路之張股行至阿堪

草地，沮洳難行，遂又主張南返。但毛摸林彪、彭德懷掉頭北寧，張遂與朱德等再返西康，並另立中央，遂臨於分裂。初版只載毛而蓋會議而未述兩河口會議，而後其實為前共尊大線，不宜遺漏。

第三編 延安時期

初版第八四頁所載一九三六年張學良與中共之接觸，此事在各方早有所聞，「蘇俄在中國」及其他方面均有提及，惟無直接資料，故內容不詳。近閱香港「明報」月刊五五期所轉載當事人的回憶，其事遂大白於世。先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學良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負實際責任。適毛澤東率共軍殘部竄至陝北，與當地共軍合流，學良所

部東北軍進剿失利，遂對劉共失去信心，而欲藉抗日以自解。十一月，學良出席國民黨五次大會於南京，旋赴滬，通過劉鼎其人与中共一代表接觸，無結果。返西安，中共將所俘若干東北軍官釋歸，以究軍心。一九三六年六月，通過前線將領王以哲之轉達，學良卒與周恩來會於延安，約定收編共軍，與國軍同等待遇等款。學良允報告委員長，終不果。十一月，學良與秦邦憲議定局部停戰，共軍向三邊移動，學良則贈以鉅款為共軍製冬裝。交往頻繁，至西安事變時，學良與中共接觸已有一年以上。

初版第八九頁所載西安事變傳至陝北時中共之反應，近因國憲回憶與陳然提供之資料而更為明朗。因張、陳其

時均在陝北，身歷其境。授環稱：事變日傍午，學良電告中共，中共興奮若狂，由毛就草覆電，對學良大加推崇，並主張公審。並即報告史達林，翌日並派周恩來等三人去西安，企圖危害 領袖生命。詎周等甫行而史覆電已到，嚴斥事變為日存間諜陰謀，勢將造成內戰，抵消抗日力量，並責成中共設法營救。毛等雖大失望，然仍不得不電周等遵命。

另按陳然稱：事變後，毛召開一浩劫份子會議，報告時張肱奮興，於醜詆 領袖後，並主張公審，但此後即寫下文。

初版第七二八頁載張國燾談話提到洛川會議，而書中

正文未載，亦是一大遺漏。此會議於一九三七年八月舉行，其時抗戰已爆發，中共投誠及共軍改編等問題早已解決，中共召開此會，目的在確立其對抗戰的基本態度。按張國燾及陳然所提供的資料，會中毛澤東及張聞天主張一面反日，一面反政府，促其在戰爭中同歸失敗；中共則游擊放後，擴張武力，建立根據地，以求發展。但張國燾、周恩來及朱德則主張接受政府命令，努力抗戰。因而派意見對立，乃休會三日，最後作成「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這個決定雖承認政府已決心抗戰，並要求中共亦努力抗戰，但同時標「國民黨不敢妄發動人民參加抗戰，不組織國防政府，使抗戰有失敗的可能」，這種態度，說不上團結抗戰。

洛川會議所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為公開宣傳文件，初版則已予以引載。

初版第一〇三頁所載「第三節：六中全會與陳毛鬧事」，支離錯誤：

一、毛所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報告，事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而六全則在翌年十一月，相去一年，而夾敘在一起，造成糾纏。

二、六中全會中，陳紹禹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論點尚支配着中共中央，毛不僅不敢反對，反支持得過火。初版謂西人鬧事，毛獲得勝利，有悖史實。由於著者當時未搜得六中文件，遂被「毛選」及其詮釋朦朧蔽性的記載，

及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歪曲的敘述引入歧途。事後
 發覺，甚為遺憾！

其實際的史實是作以下的發展：

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及太原失陷後，毛在延安
 積極份子會議席上所作「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任務」報告，
 提出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問題，並未獲得黨內多數支持。

二、時陳紹禹自俄歸國，高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因係傳達國際意旨，故甚佔優勢。

三、同年十二月，在陳紹禹傳達聖旨氣氛之下，召開
 中央政治局會議，陳提出「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
 一切為着抗日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主張服從
 政府，反對分裂，贏得一致支持，毛不敢獨異。

四、十三日，會議最後一天，南京失守，中共發表宣言，仍宣稱「鞏固國共兩黨精神團結，抗戰到底」。

五、直至翌年十一月六日中全會時，陳紹禹一直在武漢與政府聯系，從事其統戰工作，甚為活躍，所以六中全會仍在「一切經過統戰」時期，陳、毛並未發生公開的鬧事，亦無所謂毛獲得勝利。

六、中全會通過了決議案、召開七大案、各級黨委組織案及上蔣委員長電。毛並未重彈「各階級領導」的老調，而提出「論新階段」報告，強調中共內部一致，強調統一戰線，強調國民黨的領導地位，歌頌孫中山先生，擁護蔣委員長，主張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共同抗戰，共同建國。六中全會六才的字的決議案，正是根據毛的「論新階段」

而作成的。

閉會期間，武漢、廣州相繼失守，蔣委員長重申抗戰到底的決心，全會亦致電推案。毛並不等會開完，備函命周恩來呈委委員長，表示大家「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反攻之目的。」並囑周向委員長長面陳中共願加入國民黨，但未被接受。

毛及毛家史官於尔後清算陳紹禹及國際派時，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上是向國民黨投降，則投降真正是毛自己。」

初版第一六六頁載有七大中委名單，而尔後之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部委、各中央局書記名單缺如，修訂本參考有關資料，加以補入。中共的七大召開於一九四五年

四月，而八大則至一九五六年九月，相距十一年之久；在此十一年中完全為毛澤東個人迷信時期，至八大而發生變化；又，在此時期中共由叛變而竊據大陸，中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所以中共中央人事多數於演重要角色，故對於此項名單的補列，有其價值。

此外，關於處理所謂「磨擦問題」，蔣委員長對周恩來與葉劍英有所指示，為爾後何應欽將軍與周等談判的張本；關於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經國先生曾參與其事，有關於他和史達林談話的報導；關於史迪威事件，梁敏鐸教授所著「史迪威事件」一書，根據中美原始資料，揭露史實的架勢不馴獲得馬歇爾的支持，更揭露馬歇爾的

調整之作對政府不利，尤其當他出任國務卿之後，坐視中國之沈溺而不加援手，其由來已久。固於日本投降後蘇俄在東北支撥中共叛亂情形，近來俄方已自行供認。凡此，均為初版所未能引用者，均一一補入。

初版之經修正者數十處，增加約六萬字，刪去者亦萬餘字。尚有若干章節予以調整。至於校勘之錯誤，亦加改正，使其減至最低限度。

孔子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於今假我六年以修訂「中國共產黨史稿」不知可以無大過否？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除夕於國立政治大學

自序

一

「中國共產黨史稿」，是經過六個工作年完成的。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無人能免於和中共發生深刻的關係。大陸淪陷以後，關在鐵幕後面的中國人民是不用說了，就是在大陸淪陷以前，生活在大陸上的人，也不能例外，智識份子感受尤深。以我本人來說：民國十四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後，我以一個中學生在武漢參加學生羣衆中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運動，其時國民黨正執行容共政策，當然有中共份子參與策動，雖然我當時並不清楚此種背景。十六年上半年，武漢一片赤色恐怖，我也身歷其境。十九年以後，我的鄂東家鄉「跑共產黨」，舉家遷至武昌，後來我才知道當地即是張國燾所領導的「鄂豫皖蘇區」。抗戰軍興，武漢淪陷前夕，我西行入川，我家又遷回鄂東。不久，中共李先念在大悟山組織武裝，把家鄉一切抗日游擊隊幾乎都吃掉了。抗戰勝利之後，我家也接受清算鬥爭的命運。當三十年一月新四軍事件時，我在重慶，開始研究中共問題，並常常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我在紐約，任華僑報紙「美洲日報」總編輯，與當地中共的「華僑日報」不斷發生筆戰。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我在上海受中共統治達一年又四個月之久，對中共的專政作風有更深的體認。三十九年秋，我逃出大陸，旋來台灣，撰「大陸匪情觀察報告書」，送呈 總統及當時任行政院長的陳辭修先生，承蒙 總統召見慰勉，並派至革命實踐研究院任講座，辭修先生復將「報告」付印，發交關係方面參考，並親以兩冊見贈。四十四年，我在國立政治大學任中國近代史教授，使我注意中共的歷史的發展。四十七年起，我接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開始編纂中國共產黨史。

二

序

三

中共的歷史到今年已經有四十四年。在我編纂的過程中，發現一些矛盾的困難；一方面感覺材料太多，另一方面又感覺材料太少。

關於材料太多方面：我搜集資料以中共原始文件為主，包括牠的檔案、秘密的和公開的書籍、雜誌和報紙，同時也參閱非共的國內外的記載。專以中共原始文件論，中共是一個擅長宣傳的黨，所出宣傳品及其他文件甚多，在台灣所藏的，種類以數千計，份數以數萬計。這些文件不一定都有歷史的價值，但不能不儘量閱讀與搜集。縱令我十分努力，恐難免仍有重要的史料被遺漏了。我沒有助手，個人的精力無論如何是有限的。

關於材料太少方面：中共的許多歷史資料是秘密的，政府方面所破獲和搜集的當然不能完備。中共在上海時期（一九一九—一九二七）及延安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的歷史資料，中國調查機關（現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所搜集者甚為豐富，他們允許我前往抄錄。中共在江西時期（一九二八—一九三六）的資料，陳辭修先生所搜集的不少，藏於北投石叟資料室，我也獲得抄錄。這些材料，不僅當時的搜集不能十分完備，尤其中國戰亂頻仍，已搜集者也不斷遭受損失。調查局材料，聞在中日戰爭時運到貴陽，遭受日機轟炸，損失了一部份，從大陸來台時，據說又有損失。辭修先生的資料，他告訴我，從瑞金運出時，在贛江翻了一船。所有這些損失，恐怕再也無法彌補了。另外，尚有在日本，在美國，在大陸，在世界上其他各國的中共史料，為台灣所無者，這，我一時也無法搜集。

因此，我所搜集的中共史料，其範圍以台灣所有的和我所能搜到的為限，這自然不能不感覺不足。

雖然如此，我這兩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黨史也有可取的地方。直到現在為止，世界上似乎還沒有比我的這本書更完備的中共史。在日本，有波多野乾一（Hatanō）的「中國共產黨史」，從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三七年止，共七冊，所搜材料甚為豐富，可惜一九三七年以後就沒有了，而其所搜材料，多為報紙和日方情報，中共的原始材料，則頗有遺漏。波多野曾來台謁參閱蔣廬和石叟室的資料，使他驚歎不已。尚有學人石川忠雄（Ishikawa）、德田受之（Tokuda）繼續研究中共史，也不得不來台搜集資料。在美國，研究中共問題的學人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施華茲（Benjamin Schwartz）、羅爾茲（Robert C. North）、尤鼎（Exenia Eudir）、布蘭特（Conrad Brandt）、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等，所著有關於中共史書籍，各有其成就，但在台灣有關中共的許多珍貴資料，他們似未獲見或僅略有採錄。這幾年中，美國青年學生，為滿足此項要求，常常有人來台灣搜集。在我搜集資料過程中，所遇到的外國人較多，中國人反而較少。

至於中共自己方面，如胡喬木、何幹之、胡華、黃河等所編中共史或史料，多屬宣傳性質，尤其對於毛澤東不利的資料概行刪略或歪曲，其學術價值不高。大陸來台的前中共中級幹部李君告我：中共編有中共黨史文件數巨冊（未完成），李君曾經「學習」過，但絕對秘密，想必有許多重要史料為外間所無。但中共自己的材料也並不完全。在中日戰爭、中共投誠期間，周恩來會參觀調查局和辭修先生的資料室，他說：有許多資料中共喪失殆盡。辭修先生所編「赤匪反動文件彙編」被他討去了二十套（每套六冊）。

我所寫的「中國共產黨史稿」，除儘量利用這些原始材料外，並且廣泛搜集我黨政軍方面及外國的資料。有幾部新資料使我如獲至寶。第一，中共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中共自承已全部喪失，第二次大會的文件也不完全，而竟在哥倫比亞大學發現。陳公博於民國十年參加一大，十一年赴美入哥大讀碩士，他的論文就是「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這篇論文由哥大韋慕庭教授加上序文，精密考訂，打字印行。論文還附有「一大」及「二大」有關文件。韋教授於前四年來台，與我相遇於舊廬，告知此事，其後我又向蕭作樑教授借得此書，擇要翻譯，採入本書，使中共遺失了的文件得再與世人見面。雖然經過重譯，難免走樣，然總遠勝於無了。

第二，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民國十六年五月開會於漢口，其時中共處境困難：在俄國，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為中國革命問題鬧意見，在中國的指導人員，鮑羅庭與羅易鬧意見，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之間鬧意見，中共內部各派系之間鬧意見，所以五大開得一塌糊塗，毛家史官認「實際上沒有任何成就」。其文件，中共偶有透露，均屬斷章取義，台灣方面，亦付缺如，而「羅易使華記」(Roy's Mission to China) 居然在美國加里佛里亞大學圖書館及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發現了，所載文件三十七篇，五大文獻燦然大備。這才使本書關於五大方面不至繳白卷。

我相信：關於一大、二大及五大文件，中共自己可能大部遺失，即有所存，毛家史官亦諱言之，因為一大至五大都

是陳獨秀所領導的，而獨秀目無毛澤東；一大的代表如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等，他們的地位都在毛之上，爲毛所不喜；二大，毛根本沒有出席；而五大，毛被獨秀斥退，僅獲一名候補中委，這都是毛澤東所忌諱的。然而這些文件居然在自由世界發現了。我們不管毛澤東喜歡不喜歡，牠們是史實，就足以充實中共史的內容。

第三，關於五次圍剿及戡亂的軍事行動，我原來所憑藉的只有「毛澤東選集」及共方有關記載，缺乏原始文件。我兩度到台中國史館，以數人之力抄錄當時報紙有關記載，然支離浮盪，很多不足採信，也難成一系統。正束手無策之際，忽發現我國防部史政局出版了「剿匪戰史」十二冊，「戡亂簡史」四冊，對於兩次軍事行動有詳細而頗爲正確的記載。我一方面取來與共方記載加以比較研究，一方面儘可能訪問我方及共方（投奔自由的義士）曾參與此等戰爭人員，而完成了我的這些方面的記載。

我的這部中共史，在我自己已頗盡其能事了。

然而我不敢稱此書爲「中國共產黨史」，而稱之曰「稿」，正因爲我自知缺點甚多。第一，如前所述，我在台灣所能搜集的材料，勢不能沒有遺漏；其在國外，如美國、日本、香港，我知道有許多收藏中共資料的機關，我沒有機會前往閱讀；在大陸上的資料更不用說。第二，在台灣會直接與中共從事軍事及政治鬥爭者大有其人，我限於人力財力，不能周諮博訪。第三，最重要的，現有資料多是些表面文章，其事件的醞釀、商談、會議及決策經過，概付缺如。其原因爲私人記載與公家檔案多未公開，無從引用。記得陳辭修先生告訴我：坊間有關現代史這類書籍，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舉民國二十五年春，他自己奉派前往山西，及在山西與閻百川先生會商指揮國軍擊退入晉共軍的經過，即非外間所知。他的談話，我當時沒有記錄，且未獲其認可，不能引用。這些有關歷史內幕資料，本書極爲貧乏，這自然是一大缺陷。第四，顯而易見的缺點，就是有些重要的遺露。例如江西的五次圍剿，其第五次，所紮北路軍及東路軍戰况較多，而所紮西路軍及南路軍較少，這不是我有何偏見，而是我缺乏西路軍和南路軍的資料。又如延安時期中共的黨務活動，所載不多，其特務與文化活動竟成空白。特務活動，我幾一無所知。文化活動，喧嚷一時，而缺乏有系統資料。因此，我也只好因陋就簡了。第五，就我所已搜到的材料，也因卷帙浩繁，當編纂成書時，難免有前後刺謬，駁雜不純之

處。如書中所用紀元，中曆與西曆並存，原則上中專用中曆，外專用西曆，但爲行文便利，有時亦有出入。又如外人譯名，我們與中共時有差異，引用時並未強求統一。本書稱之曰「稿」，一方面期望讀者指正，另一方面，留予自己以修改的機會。

要研究中共同題或中共史，最好由中、美、日交換資料，由三方面的學人合作進行，這在目前還有困難，但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三

我編纂中共史的動機，是要將四十餘年中共史實重現其本來面目。

所有世界上的共產黨，幾乎都是善於毀滅和歪曲歷史的。他們以爲攫奪了政權，也就攫奪了歷史。他們以爲改造歷史，同他們改造社會、改造人性一樣，可以使其合於自己專政的要求。

英國小說家奧威爾寫了一本著名的小說：「一九八四年」，描寫那時一個共產專政的國家，其政權中設了一個「真理部」，裡面成千的官員，一天到晚，用自動機器毀滅檔案和偽造檔案。牠要把昔日的人民領袖而爲今日的人民敵人的「蒸發」掉，使其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這雖是小說家言，而今日世界上的共產黨正是這樣做。

例如俄國：十月革命的英雄托洛斯基，被史達林整肅、驅逐之後予以刺殺，在俄共中，「托派」成爲「罪犯」的代名詞，中共甚至稱之爲「托匪」。時至今日，除了俄共與中共對罵時偶稱對方爲「托派」外，托洛斯基快被「蒸發」到無影無蹤了。繼承列寧爲世界共黨「老大哥」的史達林，自被赫魯雪夫鞭屍後，在俄國，報紙上已經很少提到他，他的棺木從紅場失蹤，他也快要被「蒸發」了，只是毛澤東之流還抱着他的靈牌流涕。而赫魯雪夫自己，自被整下台之後，除偶然被西方記者發現外，在俄國也似乎沒有這個人。所苦的是俄共史官們，天天在那裡修改「聯共黨史」：「史氏聯共黨史」完成了，奉命要毀滅掉，編纂「赫氏聯共黨史」，牠還未編成，又要改編「布（里茲涅夫）氏聯共黨史」……他們的歷史著作將永無完成之日。

再說到中共，他們對於改造歷史也很感興趣。首先，他們把中國以歷代帝王爲正統的歷史推翻，代之以以歷代流寇爲正統的歷史，翳伯贊的中國通史就是這樣寫的。對於中國近代史，也正由其「中國史學會」在大規模搜集材料之中，作爲徹底改竄的依據。五四以後，他們硬把五四運動當作俄國革命的支流，或者受了俄國的影響；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當作共產黨「領導」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把在江西及各地的「山頭主義」當作「革命政權」；把被圍剿後的落荒而走當作「長征」；把向國民政府投降當作「統戰」工作；把八年的軍民艱苦抗戰硬說是共產黨「領導」的，而且戰績只有所謂「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把利用抗戰機會襲擊國軍，割據地盤說成「反對投降」，「建立敵後民主根據地」；把中國抗戰八年，美國投擲原子彈而獲得的勝利歸功於史達林投機出師東北；把國共和談期間，馬歇爾實際幫了中共的大忙的調處，說成「美帝」幫助國民政府製造內戰；甚至大陸淪陷之後，中共造成的一切「天災」，也歸罪於所謂「國民黨反動派」。

其次，關於中共自身的歷史，雖然毛澤東聲稱中共不自修黨史，但中共史官們出了好幾種。他們把所有俄共製造與撫育中共的事實與人物完全「蒸發」掉了。他們根據六屆七中全會的「歷史決議」，把陳獨秀說成右傾機會主義；把瞿秋白說成盲動主義，第一次的左傾；把李立三說成暴動主義，第二次的左傾；把陳紹禹、秦邦憲的國際派說成教條主義，第三次的左傾，說他們都是錯誤的。只有「毛澤東思想」自古以來是正確的。中共史官這時所寫的「毛氏中共黨史」很像過去的「史氏聯共黨史」，我們有理由相信，牠總有一天會陷於「史氏聯共黨史」同樣的命運。

中共前代的「革命領袖」，還有些人被中共「蒸發」了。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陳公博和周佛海已不見於中共史書，就是一度爲中共總書記而且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成分的向忠發，他於被政府俘獲後跪地乞命，現在三十歲以下的中共黨員，恐怕都不知道他是六中全會後紅極一時的史達林的寵兒。

這樣的毀滅歷史，歪曲歷史，是每一個歷史學者所不能容忍的。我之所以寫兩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黨史稿」，是要根據鐵的事實，不爭的文獻，把中共的歷史，呈現於中華民國的自由地區，呈現於僑胞，呈現於世界上非共地區人士，呈現於將來光復後的大陸同胞，呈現於將來解放後的鐵幕內的人民。我們要向全世界作交待，要向未來的歷史作交待。

這一本中共史的編纂，態度上雖然力求冷靜與客觀，然而我並不否認我的心情是沉重的。當我開始執筆時，我的大陸已經淪陷了十年，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變成了赤色。在六年工作過程中，我每天接觸到我的六億同胞慘遭中共奴役的報導。他們的生命沒有保障，財產全被掠奪，自由完全喪失。他們在中共幹部指揮之下，勞動、勞動，無休止的勞動，替中共政權生產財富，而自己不得一飽；他們在一個口令之下，鬥爭、鬥爭，無休止的鬥爭，一面作爲鬥爭自己的同胞的英雄好漢，一面作爲赤化世界的爪牙。他們的命運是悲慘的，黑暗的，絕望的，無告的。對此，我無論如何不能無動於衷。我的沉重的心情往往於不知不覺之中從筆鋒上流露出來。

我經常努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冷靜的把大陸淪陷的原因加以考察與分析。從牠的歷史上發現中共的竊踞大陸，得力於中共自身的努力者較少，而得力於非共及反共方面的——中國的與外國的——助力者較多。換言之，自由世界的若干大事件，是造成了中共猖獗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大事件是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提到這個問題不能不從國父孫中山先生說起。今年是他的誕生百年紀念，在他的生平革命事業中，無疑的，聯俄容共是重要決策之一。中山先生此項決策，在本書中有詳細的記載。從這些記載上我獲得一些認識。第一，中山先生是在革命事業十分艱難之下才決定聯俄容共。當民國十年十二月，他駐節桂林時，第三國際代表馬林(Maring)以中俄合作之策向中山先生游說，遭到堅決的拒絕。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事件發生，八月，先生走上海，處境拂逆，達於極點。其時，他分別派人向美、加、英、德等國呼籲支援，而各國短視的政治家們一律抱隔岸觀火的態度。此時馬林再度來華，以合作之說進，仍被拒絕。最後在不在中國試行共產主義與蘇維埃制度，及中共只能以個人的而非組織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紀律條件之下，始將聯俄容共政策決定下來。我相信，中山先生這一決定是經過苦心衡慮的。第二，中山先生是要用共產黨而不爲共產黨所用。當時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以新奇的姿態出現，少數智識份子已經受其某種程度的麻醉。中山先生抱一種從井救人的胸懷，要把他們從共產主

義的陷阱中拯救出來，登之於三民主義衽席之上。自是國民黨與共產黨雖然同樣喊出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但中山先生革命目的是統一中國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無意於俄式世界革命。第三，在執行聯俄容共政策的過程中，他對共產黨的防範甚為周至，不僅在政綱上、組織上、行動上防範共產黨，更在理論上批評馬克思主義。他要以聯俄者防俄，以容共者弭共。這在世人看起來是一種矛盾，而中山先生正是要在矛盾中打出一條出路。我們不要忘記一鐵的事實，就是在中山先生有生之日，中共未敢造反，相反的，正力求有所表現。

中共企圖分化及顛覆國民黨，進而奪取革命的領導權，是在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其時國民黨的領袖們意見紛歧，步驟凌亂，不能當機立斷，予中共以制裁，直到民國十五年三月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後，聯俄容共政策尚繼續執行年餘之久，始有十六年四月南京的清黨，及七月武漢的分共，而此時中共已坐大了，大錯已鑄成了。這個大事件的責任，我們不應歸之於中山先生，而應歸之於其後人。

第二個大事件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發生其咎固然在張學良，而牠的善後却是錯上加錯。首先，中央即不應接受中共投降的要求——即令接受，也應對其武裝與地盤作澈底的解決，以消滅其再叛變的憑藉。但是當時既准許其兵力募足三個師，又給以充分的給養，而對於其人事與編制，經理與調遣，教育與訓練，概未加以掌握。復允許就其所盤踞之陝北地盤劃為「招募區」，對其一黨的軍權與政權事實上任其存在。此不僅養癰遺患，實無異為虎添翼。政府的初意未嘗不期待其實踐諾言，激發天良，努力抗日，然而此種期待正是錯誤的根源，因為中共是只要政權，不要抗戰的。

第三個大事件是日本軍閥的侵略中國。他們的武裝侵略，始終與中共的武裝叛亂相呼應。國軍自民國十九年底開始對「紅軍」作第一次圍剿，至二十五年二萬五千里追剿之際，正是日本軍閥在東北、在上海、在長城各口、在華北五省積極從事侵略之時，「支那膺懲」與「武裝保衛蘇聯」齊鳴，太陽旗與紅旗一色，使中國政府陷於內外夾攻的局面。假使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可以斷定，不需五次圍剿，即可將共軍掃蕩，更不會有西安事變。縱令共軍擅於「長征」，其促處陝北一隅的幾千殘兵敗卒，也不難一鼓而殲滅之。在此期間，中國正向統一、民主、繁榮之途邁進，各方面呈現一番欣欣向榮的氣象，今日五十歲以上的人類能言之，這也使中共無死灰復燃的餘地。然而，由於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國

全民族投入八年抗戰之中，予中共以趁火打劫的機會。戰爭結果，戰敗的日本敗了，戰勝的中國也敗了。我們承認，日本人民、尤其日本軍人，一般的都是反共的，但是日本軍閥的侵略行動，正是替中共的發展鋪路。

第四個大事件是雅爾他協定。一九四五年二月，美總統羅斯福爲取得俄國於擊敗納粹德國後出兵共同對日作戰，未得中國的同意，擅允將中國東北及外蒙的權益出讓給史達林，事後迫使中國政府同意，並使中國與俄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就造成了日本於八月接洽投降，並遭受第一顆原子彈投擲廣島後，俄軍投機出兵東北之局。自是中國形勢複雜化：史達林於是乎接收日本關東軍全部武裝，違約不按期自東北撤退，澈底搶劫與毀壞東北工礦設備，迎接共軍出關，予以裝備，使其竄擾並控制東北，進而成爲竄擾華北、華中、華南的最大一股武力。事實證明：雅爾他協定完全是精力疲憊的羅斯福受了史達林的愚弄，將中美併肩作戰所獲得的勝利果實拱手讓予俄國。

第五個大事件是馬歇爾的調處。抗戰勝利之後，中共違背其投誠的諾言，全面叛變。對於此等武裝叛變，政府有予以軍事制裁的責任和力量。但美國杜魯門總統堅持中國政府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在美國調處活動中，杜魯門的特使馬歇爾扮演一最重要角色。在民國三十五年全年調處工作中，馬歇爾一手提着五億美元的錢袋，一手拿着聯合政府的圖案，向政府與中共說：有聯合政府即有美援，無聯合政府即無美援。政府爲了戰後救濟，國家復原，所期望於美援者甚殷，於是不得不委曲求全，促成聯合政府的實現；而中共爲了奪取政權，不得不破壞聯合政府，即所以破壞美援。結果，聯合政府不成，美援亦不至。迨政府發現其期望破滅，而中共勢力坐大時，再從事戡亂，而時機已逝矣。自然，政府過度期望美援，未乘有利時機解除中共武裝，而三下停戰令，自縛手足，增長赤燄，不能不負部份責任，而其主要錯誤還是杜魯門的對華政策。

美國政府慳吝五億美元，失掉中國大陸，其後果是：十餘年來，爲圍堵中共，在臺灣、在韓國、在越南、乃至在印度，所支出美元，據我約略估計，當不下二百億。於今美軍參加越戰，僅此一項，每年至少還要投下十億美元以上。善於打算盤的美國政治家，不知對此作何感想。最屈辱的是南京失守時，司徒雷登大使還企圖以四十億美元向毛澤東行賄，所得的答復是迫令出境。

中、日、美的五大事件造成三大惡果：第一，中國大陸的淪陷，第二，日本遭受左翼勢力的威脅，第三，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領袖地位遭受嚴重的挑戰。

這個教訓太大了！值得自由世界的政府與人民深刻的檢討、反省與糾正。

這一部中國共產黨史，我願意提供出來，作為大家檢討、反省和糾正的參考。

五

中共史的分期，在非共方面，過去似乎沒有標準。中共自己，在其建立偽政權之後，把牠的歷史分爲四個時期：即(1)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其重點在參加北伐戰爭。(2)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其重點在「反五次圍剿戰爭」及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3)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其重點在藉抗戰以圖發展。(4)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其重點在全面叛亂。

本書則簡單的分爲三個時期，即上海時期，江西時期與延安時期。

第一，上海時期（一九一九——一九二七）——這與中共所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約略相當。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經常在上海，只有一九二七年約半年的時間在武漢。其領導人是陳獨秀，直至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分共後，才由瞿秋白取而代之。秋白從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起，至翌年六月六中全會止，領導中共爲時不及一年。在陳獨秀領導期間，包括共產主義自俄國輸入，中共之產生，孫中山先生之聯俄與容共，北伐，中共對國民黨之分化，國民黨之清共。在瞿秋白領導期間，包括成立蘇維埃的決定，南昌、兩湖與廣州暴動，暴動的失敗與瞿的垮台。

第二，江西時期（一九二八——一九三六）——這與中共所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約略相當。這個時期中，中共中央雖仍留在上海約三年，但其重心實已移至江西偽中央蘇區之瑞金，中共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亦於一九三一年底陸續遷入江西去了。這個時期爲李立三的暴動路線，陳紹禹、秦邦憲等的國際路線。在他們領導之下是各地蘇區與紅軍的興起，偽中央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及其黨政軍的活動，派系鬥爭，國軍的五次圍剿及二萬五千里追剿，在追剿途中，毛

澤東奪取了黨權。最後紅軍竄抵陝北。

第三，延安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這與中共所謂「抗日戰爭時期」及「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約略相當。這個時期包括共產國際所發動的統一戰線運動，西安事變與中共的投誠，紅軍的改編及陝甘寧邊區的割據，抗戰，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在抗日戰爭中中共所扮的角色，磨擦與和談，美國的調處，共軍的全面叛變，戡亂戰爭，及大陸的淪陷。

本書以地名分期，其本身沒有政治意義，但與中共各時期的活動頗相吻合。而且每一時期約為十年左右。本書將每一時期裝為一冊，其份量亦尚均衡。

我還有一個打算，打算將中共史繼續寫下去，名之曰「北平時期」。

六

我的這部書能與讀者見面，得力於多方面的鼓勵和幫助。第一，是中央研究院院長王雪艇先生，在他所主持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六年來對我研究費的補助，奠定了我安心工作的生活條件。雪艇先生不斷的指導與鼓勵，使我能鼓起勇氣，不因遭受困難而中輟。第二，是故副總統陳辭修先生，他的石叻資料室所藏江西時期的原始資料准許我閱覽抄錄，他贈給我「赤匪反動文件彙編」一部。去年（民五三）六月三十日，約我長談，那時他已告病在家。他諄諄告我，如有問題，可隨時提出。他並應我的請求為本書題簽。當我將最後完成的稿本送往時，他已臥病不能見客，且於今春患肝癌去世，使我懷念不已。第三，是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劉季洪先生，他始終對於我的此項工作表示高度興趣，而力促其成。本書的出版，得力於他的鼓勵與提示尤多。第四，是中國國民黨中央第六組，允許我經常與其所藏的中共資料接觸，並借出使用。第五，是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其所藏中共原始資料，在世界上殆首屈一指。我在數年之間幾乎不斷的前往搜集，局中資料管理人員，不但熱心服務，不厭其煩，且對所需資料，輒能有重點，有系統的供應，不必我自己檢閱書目，暗中摸索，予以極大的便利。第六，是國史館及黨史編纂委員會，因得到負責人羅志希先生的關照，當我往

台中書庫搜集資料時，爲了我的便利，他們將所需書報用汽車從書庫運到台中市來，並協助我抄錄。第七，是王覺源先生，他是留俄學生，特爲我撰「東大與孫大」一文，充實國際派的內容。他又將他的手稿「國共之間」一文見贈，將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之資料搜集頗富，均予我以不少幫助。最後，我要感謝內子徐靜之。在我六年編纂本書過程中，家事瑣瑣，一身任之，同時担任大部份抄繕整理的工作，此書之成，半出其手。我們決定自費出版，她張羅挹注，戮力以赴。假使沒有她的堅決支持，此書能否完成，能否出版，都成問題。

王岫老替本書作序，令人有蓬萊生輝之感。

此外尚有許多友好，或提供資料，或指正錯誤，或提示意見，無一不予我以幫助，不勝列舉，併此誌謝。

王健民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八日於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共產黨史稿（增訂本）

第一編 上海時期目錄

修訂版序

自序

第一章 共產主義之移植

第一節 移植之土壤

壹 共產主義與中國之傳統意識

貳 共產主義在中國成長之原因

第二節 移植之設計

壹 移植之藍圖與手段

貳 移植之實施

第三節 移植之先導

壹 國民黨

貳 中國社會黨

參 無政府主義派

.....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七
 八
 九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七

肆 俄式共產主義嚮往者……………二八

第四節 臨時中央成立……………二九

壹 吳廷康組織中共臨時中央……………二九

貳 臨時中央之活動……………三一

第二章 從第一次大會到第四次大會……………三六

第一節 第一次大會……………三六

壹 開會經過……………三六

貳 黨綱（黨章）……………三八

參 工作目標……………四一

肆 經費之來源與黨務之推動……………四三

附錄 陳公博：「我與共產黨」（節略）……………四四

第二節 第二次大會……………四九

壹 當時政治情勢……………四九

貳 黨章……………五一

參 決議案……………五五

肆 宣言……………六七

伍 對時局主張……………七七

第三節 第三次大會……………七九

壹	開會情況及決議案	七九
貳	黨的任務	八〇
參	宣言	八二
肆	對時局主張	八四
第四節 第四次大會		八五
壹	三大至四大間中共之活動	八五
貳	開會情況	八六
參	宣言	八七
第三章 國民黨的容共與改組		九一
第一節 初步的接觸		九一
壹	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大會與東方民族會議	九一
貳	馬林與吳廷康之奔走	九二
參	馬林謁見中山先生	九二
第二節 容共的實現		九五
壹	中共中央杭州會議	九五
貳	孫越宣言	九六
參	容共政策之背景及中山先生之見解	九八
肆	李大釗之聲明	一〇〇
第三節 國民黨的改組		一〇二

壹 改組以前之國民黨	一〇二
貳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〇三
叁 聯俄	一〇五

第四章 容共的紛擾

第一節 國民黨的憂慮與共產黨的陰謀

壹 中山先生與其左右之態度	一〇八
貳 跨黨與黨團作用	一〇九
叁 對國民黨中央之把持	一一一
肆 湧入軍中政治工作	一一五

第二節 初期的反共活動

壹 廣東支部彈劾案	一一八
貳 監察委員彈劾案	一二〇
叁 監委與鮑羅庭談話	一二五
第三節 中山先生之逝世與國民黨之分裂	一二八
壹 北京護黨運動	一二九
貳 西山會議	一三一

第四節 中共對國民黨之分化

壹 嚮導論左右派	一三三
----------	-----

貳 爲「左派」定四個標準……………一三五
參 指戴季陶爲「新右派」……………一三七

第五節 自國民黨二次大會至整理黨務案……………一四三

壹 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一四三
貳 中山艦事件……………一五三
參 整理黨務案……………一五四
肆 鮑羅庭之態度……………一五六

第五章 民衆運動……………一五八

第一節 工人運動(一)……………一五八

壹 中共非無產階級……………一五八
貳 香港海員大罷工事件……………一六〇
參 第一次勞動大會……………一六一
肆 「二七」慘案……………一六二
伍 第二次勞動大會……………一六三

第二節 工人運動(二)……………一六八

壹 「五卅」慘案……………一六八
貳 省港罷工……………一七四
參 第三次勞動大會……………一七六

第三節 青年團與學生運動.....一七九

壹 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七九

貳 學生運動.....一八五

第四節 農民運動.....一八七

壹 中國農村一般情況.....一八七

貳 廣東農民運動.....一九〇

第六章 北伐與反蔣.....二〇四

第一節 北伐.....二〇四

壹 北伐之決策.....二〇四

貳 中共對北伐之態度.....二〇八

第二節 武漢聯席會議.....二四六

第三節 武漢三中全会.....二五三

壹 會議情況.....二五三

貳 各項決議案.....二五四

參 監委之指摘.....二六三

肆 汪兆銘歸國繼續親共.....二六六

第七章 寧漢分裂.....二七〇

第一節 各地黨務糾紛……………二七〇

壹 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之改選……………二七〇

貳 重慶「三·三一」事件……………二七三

參 南昌「四·二」事件……………二七三

肆 南京「四·九」事件……………二七五

第二節 上海工人暴動……………二七六

壹 二月罷工事件……………二七六

貳 三月暴動事件……………二七九

參 俄人的導演……………二八三

第三節 漢案與寧案……………二八四

壹 國、共兩方反帝的觀點……………二八四

貳 漢案……………二八七

參 寧案……………二九二

第四節 南京清黨……………二九八

壹 監委會通過清黨案……………二九八

貳 蔣總司令解散總政治部……………三〇三

參 各地清黨……………三〇四

第八章 俄人之幕後策劃……………三一〇

第一節	北京搜查俄使館	三一〇
第二節	鮑羅庭之跋扈	三一五
第三節	第三國際之指示	三二四
第四節	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對中國問題之爭論	三四二
第九章 中共之傀儡活動三五五		
第一節	在武漢期間中共黨務	三五五
壹	中共處境之狼狽	三五五
貳	推進黨務計劃	三五七
第二節	第五次全國大會	三五九
壹	大會之紛擾	三五九
貳	羅易與鮑羅庭之矛盾	三六二
參	決議案與宣言	三六六
肆	毛澤東所扮之角色如何	三八六
第三節	青年運動	三八八
壹	調整青年團與黨的關係	三八八
貳	共產青年國際之指導	三九一
參	團的四次大會	三九八
第四節	工人運動	四〇〇

壹	武漢工會概況	四〇〇
貳	一件審判「工賊」案	四〇五
參	汎太平洋勞動大會	四一一
肆	第四次全國勞工大會	四一四
第五節	農民運動	四二〇
壹	湖南農民運動	四二一
貳	湖北農民運動	四二三
參	江西農民運動	四二九
肆	全國農民大會未能召集	四三一
第十章	武漢分共	四三八
第一節	赤色恐怖之回憶	四三八
第二節	兩湖軍人之發難及其影響	四四二
壹	夏斗寅進攻武漢	四四二
貳	馬日事變	四四四
參	江西「歡送共產黨」	四四九
肆	武漢當局之周章	四五〇
第三節	從鄭州會議到徐州會議	四五四
壹	馮玉祥之重振	四五四

貳 徐州會議.....四五五

參 何鍵之反共宣言.....四五七

第四節 容共史劇收場.....四五九

壹 左派與中共處境之狼狽.....四五九

貳 史達林之下策.....四六〇

參 武漢國民黨宣佈分共.....四六八

附錄.....四七三

(一) 汪兆銘：武漢分共之經過.....四七三

(二) 國民政府通緝共產黨首要令.....四八一

(三) 蔡和森：機會主義史（節略）.....四八三

第十一章 瞿秋白之盲動主義.....五〇二

第一節 八七會議.....五〇三

壹 清算陳獨秀之機會主義.....五〇三

貳 政治任務與策略.....五二四

參 關於農民運動.....五二五

肆 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五二八

第二節 南昌暴動.....五三四

壹 暴動之經過.....五三四

貳 政策的紛擾	五四二
參 中共中央之檢討	五四四
第三節 兩湖暴動	五五二
壹 中共中央之計劃	五五三
貳 毛澤東之逃亡與「馬同志」之怒罵	五五五
參 紀律處分	五五九
第四節 廣州暴動	五六〇
壹 張發奎在廣州之軍事行動	五六一
貳 中共暴動經過	五六二
參 劫後廣州	五六五
肆 中共中央與國際之喝采	五六七
伍 廣州之暴動與海陸豐暴動	五七三
上海時期中共大事記（民八至民十六）	五七七

中國共產黨史稿

第一編 上海時期

第一章 共產主義之移植

第一節 移植之土壤

共產主義並非中國之原始生物，其在中國土壤上產生、成長及蔓延，乃自國外移植而來。

壹 共產主義與中國之傳統意識

首先，吾人試將共產主義之特質與中國之傳統意識作一比較，觀其有無相同之處。

共產主義之第一特質爲其哲學思想——唯物論。馬克斯、恩格斯均具有唯物思想，而列寧則特別加以闡揚，因之，一切共產主義者均爲唯物主義者。彼等認爲：社會之結構，隨物的轉變而轉變，具體言之：生產工具如有轉變，則生產力隨之而轉變，生產關係亦隨之而轉變。社會之基層結構——經濟如有轉變，則其上層結構——政治、宗教、藝術等等亦隨之而轉變。以唯物觀點看人類歷史，則歷史之轉變正是各時期物的——生產工具的轉變的結果。唯物哲學，乃武裝共產黨人思想之重要工具。茲姑不論此種哲學是否站得住，所欲討論者，中國之傳統思想與唯物論是否有共同之處。

中國之哲學思想，先秦諸子百家，去今太遠，不論。漢代以後兩千餘年間，支配中國思想者不外儒、釋、道三家。此三家基本思想與唯物論無一相似之處。其尤特出者爲此三家均爲有神論者：儒家之敬天法祖，釋家之生天成佛，道家之多神主義，均與唯物論處於絕對相反地位。

共產主義之第二特質爲否認私有財產。雖目前所有共產國家無一完全廢止私有財產，然廢止私有財產爲其革命之最終目的，而且，在其革命過程中，對於私有財產之破壞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人對於財產態度乃頗嚮往於均產主義。孔子之「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之贊揚井田制度，咸爲均產主義之表示。中國政治思想受儒家學說影響至爲深遠，是以均產主義成爲指導歷代經濟政策之最高準則。鼂錯之貴粟論，漢武帝之抑制商賈，不准置田，王莽之王田制及其六筦令，晉之均田制，北魏之授田制，隋唐之均田制，王安石之新法，以至太平天國之天朝田畝制度，無不富有均產主義色彩。在社會上，中國財產之繼承，一般的不採一子獨繼法，而採衆子均分法；武俠思想，自戰國以來，即爲社會上一種風氣，亦以抑富濟貧爲其宗旨。

但均產主義只是反對貧富不均，而並非根本否認財產私有。共產主義者否認私有財產，乃中國人所夢想不及者。

共產主義之第三個特質爲專政主義。自馬克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以來，一直成爲一切共產政權的唯一形式。共產專政之特點有二：第一、以無產階級（一般的稱「人民」）專政爲口實而實行黨的專政，更以黨的專政爲驅壳而實行個人獨裁。所謂以階級消滅階級，而終於無國家、無政府，固爲難以兌現之遠期支票，即所謂「集體領導」亦屬欺人之談。第二、共產黨之專政手段達到最高的藝術境界。所有古代暴政的殘忍，宗教的麻醉，以及羣衆暴力的恐怖統治等方法，彼等無不加以提煉運用，更加近代科學之生理的控制與心理的改造，使其統治下的人民失去人的意義，失去動物的、生物物的意義，而成爲一種生產的戰鬥的機械。自唯物論者觀之，人與機械本無二致。

誠然，數千年來，中國一向爲專政體制。但專政體制不等於暴政，中國人所責望於專政體制者實爲「仁政」。儒家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修、齊、治、平」之道，成爲中國政治哲學。政治上之嚴刑峻罰，軍事上之窮兵黷武，財政上之括克聚斂，凡此與仁政理想相抵觸者，均爲輿論所不取。在中國歷史上多爲仁君與昏君，而暴君不多，此乃政治風氣使然。兩千年以前之「暴秦」，此一短命政權，雖亦頗有其「優越性」，然至今猶遭受國人唾罵。因此，共產主義之極端專政，絕不爲中國人民所歡迎。

共產主義之第四個特質爲階級鬥爭。馬克斯之階級鬥爭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專指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

而言。彼以爲資本家自由競爭結果，大資本家將兼併小資本家，後者遂轉入無產階級。產業發展結果，資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少，無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多，更由於資產階級的無鑿剝削，致工人生活日益痛苦，使兩個階級無法調和，必然發生階級鬥爭。少數資產階級，更由於其本身矛盾，在階級鬥爭中，必然被打倒。

此一理論，從邏輯上言似屬通順，但由於社會結構之複雜及其互相牽制與修正，階級之發展及其鬥爭之尖銳，並不如馬克斯所預期。馬克斯預料共產革命必然首先發生在資本主義發達之國家，共產黨人在十九世紀即在資本主義發達之西歐推動革命，但終歸失敗。而共產革命，在二十世紀之一十年代，居然在資本主義落後之俄國首先成功，此實不得不歸功於列寧之策略的運用。列寧主張無產階級應與農民羣衆相結合，共產主義應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其對馬克斯主義的修正，亦即所謂「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當然並不否定階級鬥爭，但其階級團結面之擴大，使其鬥爭面亦隨之而擴大；不僅要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而是將官吏、智識份子、工商業者、農民、手工業者皆分成若干階級，使其「又團結，又鬥爭」。在中國，毛澤東更令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無往而不鬥爭。共產主義社會竟是一片鬥爭的社會。

以鬥爭處理社會關係，乃中國人聞所未聞者。中國人對社會態度求其諧和；家庭方面，主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社會方面，主張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敬宗睦族，親仁善鄰；財產方面，主張勤儉持家，安分守己，樂善好施，分多潤寡。吾人並不否認在此種思想與制度之下含有或多或少黑暗與衝突，然社會之諧和勢力大大超過鬥爭勢力。總之：唯物觀念，否認私有財產，專政制度與階級鬥爭，此一套理論，乃違反人性的，亦非中國的，與中國的傳統意識幾無一相同之處。

貳 共產主義在中國成長之原因

然而，共產主義居然在中國土壤上產生、成長與蔓延，其故安在？茲試就其主觀的與客觀的條件加以分析。

客觀的條件，要不外下述兩端：

第一、思想的轉變：中國傳統意識，既如上述，然社會思想，由於歐風東漸，在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一九年六十年間，發生數度大轉變。

第一次大轉變為洋務運動。中國一向重道輕技，「作奇技淫巧」成爲商討罪名之一；孔子多能鄙事，自謂「非君子」，樊遲請學稼，學圃，被孔子斥之爲「小人」；指南鍼、印刷及火藥，中國古代之三大發明，概不加以研究與發展；民間偶有特殊技能，輒視爲「不傳之秘」，人死而技亦絕，且被視爲「雕蟲小技」，不屑一顧。因此，此一中華文明古國，在科學方面，遠落西方之後。迨一八四〇至四二年鴉片戰爭失敗，中國始有「師夷人之長技以制夷」（林則徐）之呼聲，但並未付諸行動。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方使敏銳的智識份子覺醒，而有會國藩、李鴻章等之洋務運動，努力學習西洋輪船與大炮，欲藉以作爲「制夷」之工具。洋務運動修正「輕技」思想，使中國開始走入近代。

第二次大轉變爲維新運動。三十餘年洋務運動，終經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甲午戰爭」而敗於後起之秀東鄰日本之手，智識份子因而覺悟：僅作技術的努力，而不作政治的改良，終不能致國家於富強，於是起而作君主立憲運動，欲以政治的改良爲發動力，以從事於文化思想與科學技術的改進。維新運動之意義在欲藉憲法限制君權，發揚民主，對兩千年來君權神授的思想作某種限度之修正。

第三次大轉變爲辛亥革命。維新運動歷時僅百日而告失敗，加以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庚子之亂」及「辛丑條約」，中國人民對滿清君權完全失望，於是羣起而作反滿清、反君權運動，而促成辛亥革命之成功。辛亥革命雖爲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然其三民主義中社會主義性的民生主義並未爲中國人民乃至革命黨人所普遍接受。辛亥革命之意義爲推翻兩千餘年君主政體，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

第四次大轉變爲五四運動。上述三次大轉變，雖對中國傳統思想作某種修正，但其共同意義爲對中國傳統的意識作基本的保持，而五四運動則主張科學與民主，主張對中國文化再估價，更有主張「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到毛圈裏去」，和「全盤西化」者。此等激烈口號，雖並不能使中國人民之深厚的傳統意識消滅於一旦，然在智份子中，因對中國固有文化發生懷疑，而造成一種新形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智識份子各思以國外新奇學說試驗於中國。其時，三

民主義、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各種各色思想應運而生。當然，共產主義亦不例外。

由於俄國革命成功，以同情貧苦人民及弱小民族號召於世界，立即引起中國智識份子的嚮往。在民國九、十年間，各地集會演講，組織團體，報紙開副刊，雜誌出專號，書店編叢書，無不以介紹研討社會主義為務，泛濫而為一種思想高潮，幾以為救國之道，舍此莫由。

以上四度思想的轉變，為造成中國共產化客觀條件之一。

第二、民生之痛苦：自鴉片戰爭至八國聯軍以來，各國在華通商口岸從沿海及於腹地，外國貨品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國家長期處於入超狀態；甲午戰爭以後，外人在華可以設立工廠，內河航行，直接從事經濟的掠奪，在一八九八與九九年間，俄租旅大，德租膠州灣，法租廣州灣，英租九龍，各港口成為經濟的獨占狀態，以從事於修路、採礦、收稅等活動；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各役之賠款，數達八億元以上，民國以來之各種借款，僅袁世凱之善後大借款，段祺瑞的西原借款，其數亦不下十億元之鉅，兩者若連利息計算，且數倍於此，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使一向自給的農村經濟遭受鉅大的破壞。太平天國之役、辛亥之役、討袁之役、孫中先生的護法運動及軍閥混戰，兵荒馬亂，廬舍為墟，失業衆多，盜賊橫行，人民經濟生活陷於極度困難之境。尤其軍閥割據，荼毒人民，莫不有帝國主義者為其背景，於是帝國主義與軍閥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幾無一不增加人民的痛苦與反感。

中國的歷史，每當民不聊生時，農民即起而暴動。漢之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李自成與張獻忠、清之太平天國與捻衆，均其顯例。農民暴動，其本身尚乏政治的覺悟，但一經野心者起而領導，不問其所抱的「主義」為何，輒雲聚而響應。民初，中國人口已逾四億，版圖雖廣，但耕地僅及其面積一〇·七%，平時已虞糧食不足，一遇天災人禍，即面臨農民暴動危機。共產主義者，本於其組織農民群眾奪取政權之俄國經驗，即趁此時機施其技於中國。

民生之痛苦，乃造成中國共產化客觀條件之二。

主觀條件亦可從兩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洋法的移植。共產主義，如前所述，本來非中國的，乃被俄人移植而來。關於俄人移植情形，將於下節作較

詳的敘述，此處僅作概括說明。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列甯與德國妥協，退出歐戰，使當時戰爭形勢爲之一變，其所成立第一個共產政權，使世界爲之震動。馬克斯所謂共產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國家發生之預言，由於列甯等在西歐各國試驗無效，反而在比較落後之俄國獲得成功，於是所謂「列甯主義」，即以在工業落後國家中聯合農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鼓動民族主義，從事反帝運動的策略運用，成爲馬克斯主義被修正後之新經典，根據此項策略，列甯之注意力從西方轉移到東方來。

一九二〇年東方民族會議所發表「巴庫宣言」，係列甯起草，其警句云：

「只有八億亞洲人民堅固的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革命之火……到歐洲之路是經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Only When the 800,000,000 People of Asia stand fast with us; only when the people of Africa join hands with us; only when the millions of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ready for communism, can the fire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be started……The way to Europe is through Asia—China and India—and Peking is the gate to Paris.）

此即列甯世界革命之總路線，其下手處正是中國。

國人對於俄國素無好感，尤其甲午戰爭以後，李鴻章欲借俄國之力對付日本，而有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利用此密約，俄國在東北由修築鐵路而租借旅、大，復乘義和團事件以武力佔據我東北。直至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始退出南滿，轉而覬覦我外蒙，於一九一一年煽動外蒙脫離母國而「獨立」。在國際帝國主義侵略行動中，以俄國爲最兇猛，則中國之反帝意識，自然以反俄爲第一位。

在此情況下，列甯欲赤化中國，不得不將其策略加以巧妙運用，緊接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七月，彼命加拉罕（Karahan）以代理外交人民委員長名義發表對華宣言，首先將俄國對華侵略行動歸咎於沙皇，加以痛斥，然後向中國表示願意放棄中東鐵路，讓外蒙回到祖國懷抱，放棄庚子賠款，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此一宣言，其後俄國雖食言而肥，

然在當時確使中國人耳目爲之一新。列寧既將我國人之心理障礙打開，於是輕輕將共產主義向中國移植過來。

共產主義，如前所述，有其特質，爲中國傳統意識所不能接受，欲使中共出生後不致夭折，於是列寧有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之舉。中共寄生於國民黨內，改頭換面，居然成長。

第二、土法的製造：經過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國民黨容共，中共在成長過程中，其特質逐漸顯露於國人之前，不爲國人所容，於是有十六年國民黨清共。俄人移植之功幾毀於一旦，共產黨人乃不得不乞靈於土法——農民武裝暴動。

當民十六南昌、兩湖及廣東暴動之際，略懂中國歷史並熟讀三國演義及水滸傳之毛澤東，於參加湖南暴動後，率殘兵敗卒數百人，竄江西，登井岡山，結合當地土匪，又得朱德合股，開始從事流寇生涯。其後，國家對內對外戰亂頻仍：十七年有繼續北伐之役，十八年有桂系武漢之役，十九年有閻馮中原之役，二十年有「九一八」之變，二十一年有「一二八」之役，二十二年有熱河之役及閩變，二十三年有冀東及察綏之役。內憂外患，兵連禍結，農村生活，日益困難，中國歷代引起農民暴動之社會背景重演於此時，因之中共以江西爲中心所建立「蘇區」及「紅軍」遂猖獗一時。

武裝暴動，被中共黨徒稱之爲「偉大的發明」，而譽之爲「毛澤東思想」，以之作爲落後國家革命示範，幾乎與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及史達林主義同被奉爲經典。其實，此完全爲中國土法，早經張角、黃巢、宋江、楊么、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張宗儒等「發明」於先，何待毛澤東！

經過二十三年第五次圍剿，「紅軍」終被擊潰，「蘇區」克告收復，長途西竄，中共之不絕者如縷。而西安事變發生，中共再度改頭換面，掩藏其特質，卒能在國家八年抗戰中，蹈瑕抵隙，死灰復燃。迨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國民精疲力竭，社會百孔千瘡之際，於是「土洋並舉」，中國在史達林、毛澤東夾攻之下，卒致大陸變色。

共產主義蔓延的形勢既經此種主觀及客觀條件所造成，中國人民雖不願接受，而非強加於其身上不可。

第二節 移植之設計

如上節所述，共產主義是非中國的。中國之有共產主義是移植而來的，移植人就是列寧——中共之父。

壹 移植之藍圖與手段

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發表「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一文。列寧於七月十五日在「涅瓦明星」報第十七期予以轉載，同時，以「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為題予以評註。彼盛讚中山先生之文為「偉大中國民主主義底政綱」，又稱孫先生之土地國有化是「使土地的增值成為人民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但又稱為「實行純粹資本主義的，最大限度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綱」。對於中山先生之文既有此「辯證的」看法，所以列寧在他自己文章結尾說：

「最後，因為（像）上海（一樣的城市）底數目在中國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也將增長起來。它一定會成立這樣或那樣的中國民主社會黨（著者按：即共產黨），批判孫逸仙底小資產階級空想和反動觀點，而細心選擇、保護和發展他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

列寧顯然提供一幅藍圖，欲以國民黨（國民黨的名稱屢有變更，為便於讀者閱覽，本書概稱為國民黨）為母體，將共產黨移植進去，然後以共產主義修正孫中山主義。

同年十一月，列寧在「更新的中國」一文中稱：「國民黨底主要支柱是廣大的農民羣衆」，又謂：「中國的自由是由農民民主派（著者按：指擬組織的共產黨）與自由資產階級（著者按：指國民黨）底聯盟所爭取的。未被無產階級政黨所領導的農民，能否保持自己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來反對乘機就會向右轉的自由黨人——不遠的將來，就會分曉。」此即爾後從所謂「國共合作」到「爭取革命領導權」之預謀。（註一）

如何才能移植？——利用中國民族主義。

列寧在其一九一四年所著「論民族自決權」（註二），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所著「革命的無產階級與民族自決權」（註三），一九一六年四月所發表「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提綱」（註四），均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應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聯合，支援民族自決權，以打倒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各文中且均提及中國。列寧深深瞭解，馬克斯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非中國人民所需要，中國所需要者為反對侵略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所以他提出「民族自決權」以迎合中國人民心理，然後用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聯合為手段，將共產主義向中國移植。

貳 移植之實施

列寧的移植藍圖與手段既已成竹在胸，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後，即逐步付諸實施。

當十月革命成功之初，列寧注意力尚比較注重西方，尤其注重德國之赤化。但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暴動失敗，慕尼黑蘇維埃政府亦被消滅，一九二〇年，匈牙利革命亦告失敗，俄軍進攻華沙又大敗。英、法、義等國共黨勢力雖頗活躍，然不足以推翻各該國政權。馬克斯之「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實現」預言落空，列寧之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聯合，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聯合之主張，隨之抬頭。在此期間，列寧從事下列一系列措施：

第一、設置政權機構。在蘇維埃政權中設置民族事務機構，其名稱為「民族人民委員會」，主持之者即史達林——中共之母。中共自經列寧移植後，列寧死，史達林實盡其最大劬勞撫育之責。史達林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其機關刊物「民族生活」中發表一篇著名文章：「不要忘記東方。」（註五）謂東方是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東方不僅有帝國主義所必需的富源，並有恭順的人才和低廉的人手，可以運用之去反對本國革命工人。彼主張共產主義者之任務為使帝國主義者失去其富源和後方，並爭取東方作為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以爭取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

茲將史達林此文錄後。

史達林：不要忘記東方

在歐洲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的時機，舊的王座和王冠在坍塌着，讓位給工人和士兵革命委員會，而被佔領的地區則從自己的地域內趕走帝國主義底走狗，——這時候大家的視線自然是朝向西方了。在那裏，在西方，首先應當打碎歐洲所鍛鍊的而把全世界扼制住的帝國主義枷鎖。在那裡，在西方，首先應當像噴水般地傾瀉着新的社會主義生活。在這樣的時機，遠東及其幾萬萬被帝國主義奴役的人口，從視野中「自行」消失了，被忘記了。

可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底「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

帝國主義者們總是把東方看作自己幸福底基礎。東方各國底不可計量的天然富源（棉花、石油、黃金、石炭、鐵礦），難道對於世

界各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糾紛底蘋果」嗎？老實說，這就可以說明：帝國主義者在歐洲打仗和胡聊着西方時，從未停止想到中國、印度、波斯、埃及、摩洛哥，因為實在說來，問題始終是在東方。這主要地可以說明：他們爲什麼那樣熱心地支持東方各國的「秩序和立法」：不這樣作，帝國主義深遠的後方就會沒有保證。

但是，帝國主義者所必需的不僅東方底富源而已。它們所必需的是東方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所富有的「恭順的」「人材」。它們所必需的是東方各民族底「順從的」和底廉的「人手」。此外，他們所需要的是東方各國底「恭順的」「年輕娃娃」，它們從這些「年輕娃娃」中徵募所謂「有色」軍隊，立即運用它們去反對「自己本國的」革命工人，這就是爲什麼它們把東方各國叫作自己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共產主義底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底工人和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從而使世界帝國主義失去「最可靠的」後方，它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不這樣作，就休想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
俄國革命第一次掀起了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去與帝國主義作鬥爭。波斯、印度、中國的代表會議是東方工人和農民成百年的沉睡成爲過去的直捷標誌。

西方革命無疑地會給予東方革命運動一個新的推動，給它灌注英勇的精幹和勝利的信心。

帝國主義者自己及其新的吞併給予東方革命化事業不小的援助，這種吞併把新的國家捲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擴大世界革命底基礎。

共產主義者底任務，就是參與東方日益增長的自發運動，向前發展這一運動，使之成爲自覺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在這個意思上，不久以前舉行的回民共產黨員代表會議關於加強東方各國——波斯、印度、中國——宣傳工作的決議，無疑地有着深刻的革命意義。

我們希望：我們的回民同志能執行自己高度重要的決定。

因爲必須從此一下領會這個真理：誰願社會主義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

第二、設立第三國際。列寧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設立第三國際，亦稱共產國際於莫斯科，作爲指導世界革命的

司令部。並組織各國共產黨成爲其分部（亦稱支部），以策動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共產革命運動。共產國際實際操於俄人之手，而各國爲其僕從。中共之移植者及其行動指導者均爲俄人，但形式上亦通過第三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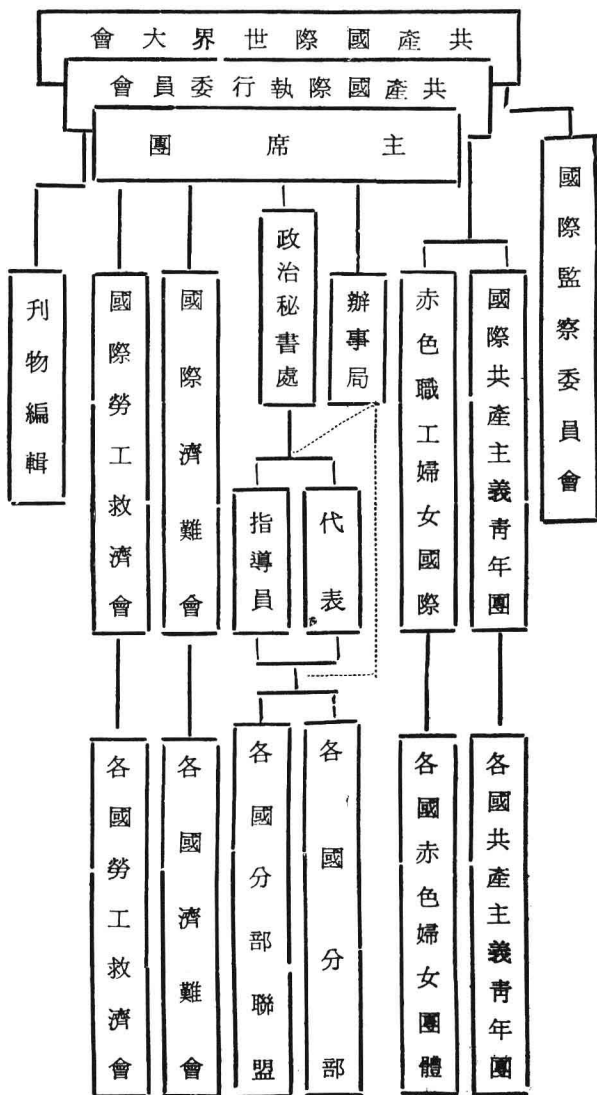
共產國際成立時之章程一時未能搜得，根據一九二八年章程，其中規定：各國共產黨爲國際分部，各國共產黨員亦即國際黨員。國際組織採民主集中制：由各國共產黨選舉出席代表參加共產國際世界大會，由大會產生國際執委會，再由執委會指揮各國分部。在大會中，各國代表有發言權、表決權、當選執委及擔任職務的權利，此即所謂民主。其集中方面：國際執委對各國分部有如下權力：

- ① 要求各國分部絕對執行國際決議。
- ② 修改或取消，批准或駁斥各國分部全國大會之決議。
- ③ 開除各國整個分部，或一部份，或個別黨員。
- ④ 要求各國分部必須公佈國際決議。
- ⑤ 接受或拒絕各國分部加入國際組織。
- ⑥ 設辦事局，派代表、指導員，指導各國分部。
- ⑦ 要求各國分部提出工作報告。

必須指示：此等民主是形式的，而集中是實質的。其民主方面：各國代表雖有若干權利，然基本上須信仰俄式馬列主義，在俄人列寧、史達林控制與支配之下，從事世界赤化運動。此種運動，理論上爲在各國以無產階級革命爲手段，夢想實現共產主義，而事實上爲保衛俄國——所謂無產階級的祖國，打倒俄國的敵人——所謂國際帝國主義。至於其中方面，則由俄人所控制的國際執委，通過鐵的紀律，絕對掌握、指揮各國共黨，爲俄國利益服務。此不過一種奴役世界各國家、各民族的新型帝國主義，而披上一層有理論的美麗外衣而已。列寧所設計之國際組織，其爲帝國主義性質，業經數十年歷史事實所證明。

關於共產國際組織如下表：

共產國際組織系統表



附錄 共產國際章程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共產國際——國際工人聯合會——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是統一的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運動的領袖和組織者，是共產主義的原則和目的之負擔者，共產國際實行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鬥爭，爭取無產農民的廣大階層的鬥爭，爭取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爭取全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創造，力爭階級的完全消滅和社會主義的實現——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實現。

第二條 凡是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稱爲：某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分部）。每國只能有一個共產黨，是加入共產國際而爲其分部的。

第三條 凡是承認某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黨綱和章程，爲某黨部下層基礎組織之一員，積極參加其工作而服從該黨及共產國際之一切決議，並按時交納黨費者，皆得爲共產黨員及共產國際的黨員。

第四條 共產黨的基礎組織爲企業中之支部（工廠、作坊、礦坑、商舖、農場等），每一支部聯合在該企業工作之一切黨員。

第五條 共產國際及其各國分部的建設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一）黨的一切指導機關都由選舉產生，低級和高級的指導機關都是如此（黨員全體大會、黨部會議、全國代表大會），（二）黨部機關對於自己的選舉人定期報告，（三）高級黨部機關的決定對於低級機關是必定要遵守的，嚴格的黨的紀律，絕不推委的執行共產國際及其機關，以及黨的中央機關的決議。

黨的問題，未在相當黨部機關通過該問題的決議以前，可由黨員及黨部討論。至於共產國際世界大會，與各國分部的全國大會，或者共產國際的及其各國分部的指導機關，已經通過決議之後，則即使一部份黨員或地方黨部對於該決議不能同意，此等決議亦當無條件的執行。

第六條 如果黨在不能公開的狀況之中，則可以由高級黨部機關委派低級機關，並可適用指定職員辦法，隨後再由黨的更高機關追認。黨外羣衆的工人，農民組織及其機關中（工會、合作社、體育會、參戰人聯合會、此等團體的全國大會或會議上）以及地方

自治機關，或蘇維埃、國會等等之中，即使只有兩個黨員，亦當組織共產黨黨團，以鞏固黨的影響，而在此等團體之中實行黨的政策爲目的。

第七條 共產黨團服從相當的黨部機關。

(註一)國際性質的團體裏的共產黨黨團(赤色職工國際、國際濟難會、國際勞工救濟會等)服從國際執行委員會。

(註二)共產黨團組織的結構及其工作的指導方式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各國分部的中央委員會，另以特別指令規定之。

第二章 共產國際世界大會

第八條 共產國際的最高機關，是各國共產黨(各國分部)及一切加入共產國際的團體代表之世界大會。

世界大會討論並決定黨綱上策略上組織上與共產國際及其各國分部有關的問題。改變共產國際黨綱及章程之權，完全屬於世界大會。

世界大會每兩年開會一次，世界大會召集的時間及各國分部代表的人數，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之。

每一分部在世界大會上表決權之數目，由世界大會按照該國共產黨人數及該國政治上的意義，以特別決議規定之。附有命令的代表證書，是不能被承認的，而且是認爲是作廢的。

第九條 共產國際緊急的世界大會，如有照前次世界大會上表決權之過半數的幾國共產黨的要求，得召集之。

第十條 共產國際世界大會選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

第十一條 執行委員會的所在地，由世界大會決定之。

第三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機關

第十二條 共產國際兩次世界大會之間的指導機關是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給共產國際各國支(著者按：應爲「分」)部以指令並監督的行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出版共產國際中央機關報，至少須用四種語言出版。

第十三條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執委)的決議，對於一切分部都必須遵守而要立刻執行的。各國分部有對於世界(大會)提出審

查國際執委決議之權，但在世界大會未取消決議之前，各國分部不得拋棄執行之責任。

第十四條

共產國際各國分部之中央委員會，對於各該本國黨的全國大會及國際執委負責。國際執委有取消及修改各國分部全國大會決議、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之權，並有決議而令各國分部全體大會及中央委員必須遵守執行之權（參看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權閉除整個分部一部份黨員或各個黨員有破壞黨綱、章程或世界大會及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者。被閉除者有權要求世界大會審查。

第十六條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批准各國分部的黨綱。如果國際執委對於分部的黨綱不加批准，則該分部有權要求世界大會審查。

第十七條

共產國際各分部之指導機關必須公布國際執委之決議及正式文件，此等決議應盡可能登載在各國分部之其他機關報。

第十八條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權接受同情於共產主義之團體及其政黨，用以有發言權的資格加入共產國際。

第十九條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選主席團，為國際執委閉會之間經常執行其工作的機關，對於國際執委負報告之責任。

第二十條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有權設立經常的辦事局（西歐局、南美局、東方局等）以建立與各國分部更密切的關係並實行更好的指導為目的。

第二十一條

（註）此等國際執委經常辦事局的行動範圍，由國際執委或其主席團規定之。此等國際執委經常辦事局的權限當通知該辦事局行動範圍所及之共產國際分部。

第二十二條

共產國際的分部必須遵守並執行國際執委經常辦事局的指示和指令。相當的分部可以要求國際執委或其主席團審查此等辦事局之指示和指令。但在國際執委或其主席團未取消該決議以前，各國分部不得拋棄執行之責任。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有權派遣全權代表到共產國際之各國分部，此等國際執委代表，受國際執委或其主席團之訓令。其行動須對國際執委及其主席團負責。國際執委代表有權參加各國分部中央及地方黨部之一切會議，國際執委代表與該代表所派往的分部中央委員會發生密切關係而執行自己的任務，但代表在該分部之全國大會、會議、討論會的發言，亦可以在各個場合反對該分部的中央委員會的——如果中央委員會的路線和國際執委會的指令不同。國際執委代表特別負責審查各該分部對於世界大會及國際執委的決議的執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有權派遣指導員到共產國際各國的分部。指導員的權限和責任由國際執委規定之，指導員的工作對於國際執委負責。

第二三條 國際執委會的會議，至少六個月開會一次，每次開會，至少須有過半數執行委員出席，方為合法。

第二四條 國際執委主席團至少兩星期開會一次，主席團會議，至少須有過半數主席團委員出席，方為合法。

第二五條 主席團選舉政治秘書處，為決定經常工作的機關，準備國際執委及其主席團開會時的問題，並為國際執委及主席團之執行機關。

第二六條 國際執委主席團委派定期出版物及共產國際其他出版物的編輯。

第二七條 主席團設立勞動婦女工作部，設立指導一定區域的共產國際各國分部工作的經常委員會（地方秘書處），及其他必須的工作部門。

第四章 國際監察委員會

第二八條 國際監察委員會審查對於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分部的統一和團結有關係的問題，並且估量各分部的黨員——各個共產主義者的行為。

國際監察委員會在此種方向之下：

(1) 審查各國共產黨員因為政治上的不同意見，受着紀律上的處分而不服者對於該黨中央委員會行為的上訴。

(2) 審查各國共產黨中央機關的委員和上述的同樣事件，以及各國共產黨自己認為需要國際監察委員會審查的關於各個黨員之事件，或者由國際執委主要機關交由國際監察委員會審查之事件。

(3) 審查共產國際的財政。國際監察委員會不干涉各國共產黨政治上的不同意見及組織行政上的衝突，國際監察委員會的所在地，由國際監察委員會與國際執委協商而確定之。

第五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共產國際各國分部之相互關係

第二九條 凡是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分部以及同情團體的中央委員會及中央機關，必須有系統的將自己的會議的紀錄及所做的工作的報告，寄送國際執委。

第三十條 共產國際各國分部的各個中央委員或者一部份中央委員之拋棄自己的任務，當認為是搗亂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黨的每一個指導地位並不屬於負有該職務的個人，而是屬於共產國際全體，各國分部推選的中央指導機關委員，在推選之前，必須得着

國際執委的同意，方能脫離自己的職務。各國分部中央委員會不得國際執委同意而批准的辭職，作爲無效。

第三一條

凡是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分部，尤其是宗主國共產黨與其殖民地共產黨，以及鄰近國家的共產黨，應當相互之間有組織上消息上的密切關係，互相派遣代表出席於黨的會議及全國大會，並可得國際執委會的同意而交換指導人才。

第三二條

共產國際兩個以上的分部（如巴爾幹各國的共產黨、斯干蒂納文半島的共產黨），政治上互相有共同的鬥爭條件的關係，得由國際執委的同意，以配合自己行動爲目的，而結合幾黨的聯盟，在國際執委指導及監督之下進行工作。

第三三條

共產國際的分部應當經常交黨費給國際執委，黨費的數量由國際執委規定之。

第三四條

共產國際各國分部的經常大會或緊急大會，必須得國際執委的同意而召集之。

某國共產黨在世界大會之前不召集全國大會，則該共產黨選舉代表出席世界大會之前，應當召集黨的全國會議或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以準備世界大會上的問題。

第三五條

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青年共產國際）亦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全權的分部，服從國際執委。

第三六條

各國共產黨應當準備轉變到秘密狀態。國際執委必須幫助相當的準備轉到秘密狀態。

第三七條

共產國際各國分部的黨員，從甲國轉到乙國，必須得該黨員所屬分部之中央委員會的允許。

凡是遷移的共產黨員，必須加入該黨員所到國家的共產國際分部，凡是不得自己分部中央委員會的允許而離開所在國家的共產黨員，不能加入共產國際的其他分部。

——完——

（錄自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中國出版社「共產黨黨章」，原件鉛印，藏石叻資料室。）

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八月，列寧召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其時，列寧正自西方失敗轉而集中注意力於東方，在大會上，首先提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註六），指出：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不可避免地一方面要把一切國家先進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要把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底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而這些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根據痛苦的經驗，深信除了蘇維埃政權戰勝全世界帝國主義以外，他們是沒有其他的路的。」

接着，列寧主張蘇俄與民族運動聯盟，謂：

「目前不能只限於僅僅承認或宣布使各民族勞動者接近起來，而必須進行把一切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與蘇俄最密切的聯盟加以實現的政策，並且依照各國無產階級中間的共產主義運動或落後國家、民族中間工人和農民底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之發展程度，來決定這種聯盟的形式。」

此項「提綱」，列寧交馬林(Maring)與羅易(Roy)——兩人均為爾後中共的指導者——修訂補充，作成「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註七)，提經大會通過，成為指導東方——尤其是中國革命的最高準則。此項準則，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經過馬林與羅易二人代表國際在中國執行。

在補充提綱中，要「精確規定共產國際與政治上被壓迫而且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內革命運動的相互關係。」由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運動和獨立，往往控制農工的解放運動，所以共產國際要促進其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於推翻外國資本主義之後，要建立工、農的共產主義組織與蘇維埃共和國，而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簡言之：要將民族主義運動轉變為共產主義運動，爾後事實證明，共產國際所導演的中國容共史劇，即沿此路線進行。

茲將「補充提綱」照錄於下：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一)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就是精確規定共產國際與政治上被壓迫而且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內的革命運動之間的相互關係。世界革命歷史正經歷着這樣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正確理解這個互相關係乃是必要的。歐洲大戰及其後果明顯地表明了：非洲被壓迫各國底人民羣衆與歐洲無產階級運動，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底集中化，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了；例如，殖民地軍隊與大批工人隊伍在大戰期間之派至前線，即其表現。

(二) 歐洲資本主義主要不是從工業的歐洲各國，而是從自己的殖民地吸取自己的力量。爲着它的存在，必須控制廣大的殖民地市場和必須有廣闊的剝削場所。英國——帝國主義的堡壘——一百年來遭受着生產過剩的痛苦。倘若沒有在銷售商品與同時供給原料上十分

必需的廣大殖民地，英國的資本主義也許早已垮台了。英國帝國主義使亞洲和非洲幾萬萬居民處於奴隸地位，同時又使本國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統治。

(二)從殖民地所取得的額外利潤，是現代資本主義財力底最主要源泉。歐洲工人階級只有在這種源泉完全枯竭時，才能够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國家企圖（應該說不是毫無結果地）恢復自己業已動搖的地位，其辦法就是對殖民地的人的勞動與天然財富加以廣泛和緊張的剝削。由於對殖民地居民的剝削，歐洲帝國主義才能够給與歐洲工人貴族以好些賞禮。歐洲帝國主義一方面企圖將殖民地各國工人低廉勞動所產生的商品輸入到大陸以減低無產階級僅够維持生活的工資，同時資產階級甘願犧牲本國內所得的額外利潤，只要是能保存從剝削殖民地所得的額外利潤。

(三)殖民地底分離和本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推翻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共產國際應當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共產國際應當與目前政治上和經濟上被壓迫各國參加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觸。爲了世界革命底完全成功，這兩種力量底共同行動是必要的。

(四)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無產階級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組織全世界工人階級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傳播共產主義。共產國際是一個戰鬥的單位，它應當把全世界各國底革命力量團結起來。

激頭激尾爲資產階級文化所滲透而由一撮政客所領導的第二國際，不會估計到殖民地問題底全部重要性。對於第二國際，歐洲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歐洲革命運動與其他各洲各國革命運動互相呼應的必要，對於第二國際是不明瞭的。不給殖民地革命運動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幫助，第二國際成員們自己已成了帝國主義者。

(五)強制地向東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國帝國主義，無條件地阻止了他們的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剝奪了他們達到歐美已經達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因爲帝國主義的政策力求阻止殖民地工業底發展；本來意義下的土著無產階級，只是不久以前才存在的。

地方的，零散的家庭手工業，已讓位於帝國主義國家底集中化的工業，因此極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從事農業並把原料輸出到國外去。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土地很快地日益集中於少數大地主——資本家和公家手中，這大大促進了無土地的農民數目底增加。這些殖民地底極大多數居民都處於被壓迫的狀態中。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人民羣衆中的處於潛伏狀態的反抗精神，只是通過爲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中等階級表現出來。外國的壓迫始終妨礙着社會生活底自由發展，因此，革命底第一步應當是推翻外國的壓迫。這樣，幫助推翻外

國統治的鬥爭，並不是贊成土著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的趨向，而只是給殖民地無產階級開闢一條達到其解放的道路。

(d) 我們可以指出相距日遠的兩種運動底存在。其中之一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運動，其綱領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實現政治的獨立；另一個是貧窮和無知農民和工人羣衆爭取自己從一切剝削下解放出來的鬥爭。第一種運動企圖控制第二種運動，並且往往得到成功，但是共產國際應當反對這一類的控制，促進殖民地工人羣衆階級意識底發展。因此，殖民地革命底第一步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但是主要和必要的任務則是建立農民和工人底共產主義組織，以便能夠領導他們走向革命和創立蘇維埃共和國。這樣，在落後的國家內，人民羣衆之加入共產主義，將不是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由於先進國家覺悟的無產階級領導下階級的自意識之發展。

(e) 殖民地解放運動底實在力量、基礎，並未封鎖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者狹小範圍以內。在大部份殖民地中已經存在着有組織的革命政黨，這些政黨在與工人羣衆的密切接觸中工作着。共產黨應當通過這些政黨或團體與殖民地裡的革命運動發生接觸，因為他們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目前它們人數不多，但他們是羣衆意志的表現，領導羣衆走向革命。

帝國主義各國的共產黨，應當與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工作中有密切的接觸，通過它們給予一般革命運動以物質的和精神的幫助。

(f) 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時期不會是共產主義革命，然而要是它從頭起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所領導，那麼革命羣衆，由於漸次地獲得革命經驗，將走上達到所抱目的的正確道路。倘若力圖用純粹共產主義的原則來解決土地問題，那會是完全錯誤的，在其發展的第一階段，殖民地革命應當按照帶有純粹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各點的綱領去進行，如何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殖民地革命的領導應當放在資產階級民族派手中。相反地，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並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創立工農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將與進步的資本主義各國底蘇維埃共和國平等地工作，以便完全推翻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

第三、發表對華宣言，緊接五四運動之後，蘇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加拉罕於民國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聲稱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及與他國所訂一切侵害中國之條約，即放棄俄人在華之領事裁判權與庚子賠款，租界與租借地，中東鐵路與外蒙，以及一切特權等等。蘇俄此次宣言之所以如此慷慨，連中東鐵路亦願交還中國者，實因當時白俄盤踞中東路，以其收入爲反蘇之經費，且其時蘇俄內亂頻仍，外交棘手，故寧願中國火中取栗，以解除其東顧之憂。宣言如下：

蘇聯第一次對華宣言

中國國民，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

那反對革命的專制魔王柯爾恰克 (Koltchak)，以前倚恃武力和外資而鞏固他的地位，現在已經為勞農政府的軍隊所打滅。勞農政府底軍隊，已經一直到西伯利亞，和西伯利亞底革命國民攜手了。現在勞農政府人民委員會拿親愛的話對中國國民說：勞農政府的俄國和紅旗軍經兩年底戰爭，耗無量精力，越過烏拉嶺進至遠東，以表現其勝利的精神。在西伯利亞的人民，都曉得我們的真意所在。我們的真意，是在拯救人民，脫離武力主義和外國金錢的束縛，得着自由，使其不因受外國金錢壓迫，流為外人的奴隸。在東方人民的當中，中國人民，實在是佔一個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們不單是援助俄國工人，並且要援助中國的人民。我們自從一千九百十七年十月革命之後，所繼續不斷以通告中國人民的，常常被歐、美、日本等國的人，隱秘起來，不給中國人民曉得，所以現在希望中國人民，格外注意我們的說話！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後，勞農政府就取得大權，用俄國人民的名義通告各國，表示願訂永久和平底意思，並且說這種和平底基礎，應由各國彼此歸還從前所侵略底土地和賠款，不問國的大小，以及說各國對內，應該自主；各國對工人農人，不得以勢力來壓制，使他們不能上進，並且聲明凡從前與日本、中國及協約國所訂的密約，一律取消，因為這種密約，僅僅供給從前俄皇和協約國政府壓制剝削其人民，尤其壓制剝削中國的人民，僅僅是他們資本家和俄國軍閥的私人利益底緣故。

勞農政府，曾經向中國提議磋商廢止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約，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約（即辛丑條約），以及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和日本所訂的協約，把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所取於中國的，以及取於中國又轉讓與日本及協約國的，一概送還中國。我們所磋商的一直等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協約國就脅迫中國政府，和重贖中國的官吏和報紙，使中國政府和勞農政府斷絕往來，而日本和協約國當這個時會，非特不將俄國底滿洲鐵路交還中國，反因利乘便，據為自有，並且強迫中國軍隊，援助他們強盜的行爲。因此，中國的工人農人對於歐、美、日各國底軍隊攻入西伯利亞及滿洲，不但不知道他們所依據的理由，並且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我們到了現在，特地將這個通告，送給中國人民，使大家可以放開眼睛看看，免得再受他們的蒙蔽。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成那樣的國，採那種的政權，一任人民底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 (Kerensky) 政府、土匪霍爾瓦特 (Havrath)、謝米諾夫 (Semenoff)，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還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我們對於這一層，所以不惜再三提議的，因為聽說這一項賠款，我們已經聲言放棄，而中國政府反拿來供養從前俄羅斯帝國駐在北京底公

使，和駐在中國各地方底俄羅斯領事。現在任命這種公使和領事底政府，早就消滅，而從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領事，居然得日本和協約國的援助，反安居在中國，天天在那裏欺蒙中國人民；中國人民，應該明白這件事，驅逐這班欺詐的人出境。

凡俄國從前所獲取底各國特權，以及俄國商人在中國內地所設的工廠，與夫俄國官員、或牧師、或委員等，所有不受中國法庭底審判等的特權，都一律放棄。除勞農政府的全權大使，與中國人民往來，因而發生底特別情形外，以後在中國地方一切法律和權力，純粹為中國人民的法律和權力，絕對沒有第二者底法律和權力混雜在這裏面。

凡其他各種問題，向來日本、俄羅斯帝國政府，對於中國所施底暴亂而且不合正義的行爲，都應該從此盡行剷除。

勞農政府現在曉得日本與協約國，以我們的軍隊天天向西伯利亞前進，援救西伯利亞的農民工人脫離土匪柯爾恰克及柯氏底黨徒和日本底壓制，他們深恐中國人民，聽到這種消息，所以他們百計設法，務必使我們的話，傳不到中國人民的耳朵裏。如果中國人民，因為我們的提議，願意做一種自由人民而免除巴黎和約所陷中國於朝鮮、印度第二的惡運，深望中國人民和俄國農民、工人及紅旗軍相提攜，為自由而戰！

現在勞農政府向中國國民提議，正式恢復兩國人民的友誼，並且請就派代表到俄國軍隊來！

署名者勞農政府外交委員喀拉罕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項宣言發表後，由於當時北京政府正追隨協約國之後從事反俄，並未引起國人的廣泛注意。但北京政府於翌年（民九）派一非正式代表團，由張斯摩率領赴俄，與蘇俄接觸。加拉罕乃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此時遠東白俄勢力已逐漸消滅，是以對中東路表示不願放棄，但對其他不平等條約仍允予廢除，當即引起久受不平等條約壓迫的國人甚大的歡動，各民衆團體紛紛電俄表示歡迎與鼓舞。第二次宣言如下：

蘇聯第二次對華宣言

查去年（即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會，曾向中國國民及南北政府發表宣言，

表示將前俄皇政府與中國所訂協約概行廢棄，並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強行掠奪所得者，盡行文還中國國民，請中國政府與蘇俄進行正式會議，冀得建設關係。

現吾人已悉此項宣言業經中國政府接到，中國國民各階級各團體皆表示熱忱，認中國應立與吾人開始磋商，以謀建設中俄間友誼關係。

中國政府已命張中將斯騰，率領外交代表團來莫斯科，吾人對中國代表團之抵莫斯科，深為歡迎。並希望藉與代表直接磋商，得建設中俄共同利益之互相了解。中俄兩國為共同之利益，並無若何不能解決之問題存在。吾人對此，至為滿意。吾人已悟中俄國民之仇敵，方從事阻礙中俄之接近與建設友誼關係，蓋彼知我兩大民族友好之互相援助，將使中國強盛，外國不能再若今日羈束及掠奪中國國民也。

不幸中俄遠謀建設友誼關係之前途中，尚有障礙在焉。中國代表團能確信蘇俄對於中國之篤誠與友誼態度，但該代表團至今仍未接有適當訓令，使其有進行解決兩民族正式友誼關係之全權。

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因深惜兩國接近之延擱，雙方政治上及商務上之重要利益不能實現，故極願贊助及促成兩民族之友好，特行聲明蘇俄必遵守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宣言所定之各項原則，且將根據之以締結中俄友誼條約。

茲為中俄兩國幸福計，本外交人民委員會認為應將下列條約之要點，向中國外交部提出，以引伸前次宣言內之原則。

(1)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宣言，所有俄國如前政府與中國所締約皆屬無效，放棄侵略所得之中國領土與中國境內之俄國租界，並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的永久歸還中國。

(2) 兩共和國政府立行採取種種必須之辦法，建設有秩序的貿易及經濟關係，隨即根據使兩締約國得為最惠國之原則締結專約。

(3) 中國政府表示實踐下列各項：(A) 不予俄國反革命的個人或團體以贊助，不容其在中國境內有所活動；(B) 當簽訂此約時，須將留在中國境內之反抗蘇俄軍隊之團體，解除武裝，特別拘留，並引渡於蘇俄，且將其武器、供給品、財產交付於蘇俄政府；(C) 蘇俄政府對於背叛及反抗中國之個人及團體，亦負同等之責任。

(4) 凡居住中國之俄國居民，皆服從中國境內現行之各種法律及條例，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權；居住俄國之中國居民，皆服從蘇俄境內現行之各種法律及條例。

(5) 中國政府表示實踐下列措置：本約簽訂後，中國政府立行與彼未經蘇俄政府委任而自命為俄國外交領事代表者，斷絕關係，

並驅逐出境；將中國境內屬俄國之公使領事房產及案卷等，移交於蘇俄政府。

(6) 中國因「蘇匪」亂事交付之任何賠償，若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不因前俄領事或任何他人以及俄國各種團體提出之非法要求，由此款項下撥交彼輩，則蘇俄政府願放棄之。

(7) 本約簽訂後，中俄兩國應立行互相恢復外交及領事代表。

(8) 中俄兩國政府，對於經營中東鐵路辦法中，關於蘇俄對於該路之需用，允訂專約，將來訂此專約時，除中俄外，遠東共和國亦得加入。

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將上列協商之各點作為主要條款，將來可與中國代表本此以友誼之態度進行磋商，如中國政府為共同利益計，對此有須修改之點，亦可加入改正。

中俄兩大民族間之關係，非上列之協約所能盡述，兩國代表此後尚須解決商務、國境、鐵路、關稅及其他等問題，並另訂專約。蘇俄方面將多方盡力，以建設兩國之親密友誼，並希望中國政府亦具有同一誠篤迅速建議，俾能早日進行締結友好之條約。

蘇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加拉罕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第四、成立遠東分支機構。俄共勢力向東方發展，經過中亞細亞而伸入西伯利亞。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社會黨人在伊爾庫茨克暴動，成立「政治中心」。一九二〇年，向蘇俄靠攏，在列寧支持下，四月，成立「遠東共和國」。該「國」以非共的緩衝國姿態出現，藉以討好美國，緩和與日本干涉，並藉其力以肅清謝米諾夫之反共武力，同時作為策動東方革命的俄國之分支機構。當時遠東共和國由楊森 (Lakov Davidovich Larson) 任外交人民委員會代表，三月，彼將加拉罕對華宣言通知中國，北京政府未予理會。該國總司令為布魯徹 (Blucher) 將軍，即後來到廣州充國民革命軍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八月，該國又派代表優林 (M. I. Yurin) 及派克斯 (A. K. Paikes) 來到北京，欲與北京政府訂立新約，其時協約各國均未承認蘇聯，更未承認遠東共和國，而北京政府與協約國採一致步驟，是以優林與派克斯留京二年，徒勞無功。此外，列寧又通過第三國際派吳廷康 (Grigori Nannovich Volinsky) 中國各書所載之威士斯克，魏金斯基、胡定康、胡定斯基及維金斯基均是此人。據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稱：吳廷康是他的中文名字，為代表來到中國，

於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移植工作，逐漸展開。

〔註一〕以上兩文見一九五〇年中共解放社譯本「列寧、史達林論中國。」

〔註二〕中共「列寧選集」七卷第四篇。

〔註三〕「列寧選集」九卷第三篇。

〔註四〕「列寧選集」九卷第三篇。

〔註五〕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史達林全集」第四卷一五二頁。

〔註六〕〔註七〕均見「列寧選集」，可參閱「列寧、史達林論中國」，四六至，四九頁，五二頁及五六至九五頁。

第三節 移植之先導

吳廷康爲移植共產主義至中國土壤上之墾荒者，而在其來華以前，尙有若干鋪路者。

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如不限於馬、列、史、毛式，則遠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即有此種思想的萌芽或活動，至吳廷康來華時，已有相當基礎。其時大家觀念模糊，大別之有下列各派：

壹 國民黨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自稱爲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此點，頗使現代青年夾纏不清。因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在幾乎成爲共產集團之專利品，是以一涉及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即意味着俄式的專政與集產，滲透與顛覆，聯合與鬥爭，鐵幕與赤化……實則早期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派別紛歧，屈指難數。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即是其中之一。一八九六至九七年，中山先生寓居倫敦，每日至倫敦圖書館讀書，在其自傳中稱：「暫留歐洲，考察其政治風俗，交結其朝野賢豪，兩年之間，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登斯民於極樂之鄉，是以仍有社會運動。」中山先生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主義同時解決。民生主義之綱領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與發展國家資本，亦即社會主義的內容，藉以「共將來之產」。中山先生在英國，稍後在日本，均與俄國革命黨人有所接觸。

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思潮傳至日本，中國留日學生受其影響，革命黨人對之尤感興趣。一九〇二至〇三年，中國即自日文譯「社會主義」書二部。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前後，革命黨人之在日本者，如黃興、宋教仁等，不僅研究社會主義，且與俄國革命黨人有往還。一九一一年八月，民立報刊載教仁「社會主義商榷」一文，列舉社會主義派別有①無政府主義，②共產主義，③社會民主主義，及④社會國家主義。共產主義一詞之見於中文者殆始此。（參閱吳湘相：「宋教仁」七九至八四頁）。

稍後，國民黨內若干富於理想份子，如廖仲凱、戴傳賢、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諸人，亦對於社會主義特感興趣。傳賢為中共發起人之一（未參加成立大會即行退出），仲凱為爾後中山先生容共政策之有力贊助者與執行者，稚暉、石曾則為最前進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黨。蔡元培為一自由主義者，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所延聘教授，不論任何思想黨派，兼容並包。左傾教授，如陳獨秀，李大釗等即在元培掩護之下，從事活動。北大俄文系之設立，以教務長顧孟餘兼任系主任，聘有俄使館漢文秘書伊鳳閣（Ivanov），詩人鐵捷克（Tretjakov），作家伊文（Ivan）及布魯威等任教授。所以北大不啻為中國共產主義之搖籃。

貳 中國社會黨（註一）

中國社會黨，本倣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組織，稱「社會民主黨」，為贛人江亢虎所首創。初組「社會主義同志會」，於宣統三年（即民國元年）六月十五日成立於上海之張園。民國成立，改組為「中國社會黨。」未幾，同盟會員張繼自法返國，被推為領袖，共同擁戴孫中山先生。據亢虎誇稱：當時黨支部凡四百餘處，黨員五十萬人。

其政綱八條如下：

- 一、贊助共和。
- 二、融合種界。
- 三、改良法律，尊重個人。
- 四、破除世襲財產制度。
- 五、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
- 六、振興直接生產事業，獎勵勞工。
- 七、專課地賦，他稅概行豁免。

八、限制軍備，注重軍備以外之競爭。

民國二年，該黨舉行第二次聯合大會時，多數黨員不滿亢虎，脫黨，另組一純粹社會黨，奉沙淦爲領袖，其主張介乎共產黨與無政府黨之間。其後與中國社會黨同被袁世凱解散。

十一年八月一日，亢虎發表「新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一文，主張督軍、議員與工商農等階級共圖國是。至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亢虎又發表宣言，恢復「中國社會黨」，十四年一月復改組爲「中國新社會民主黨」，自任黨魁，設本部於北京，設支部於上海，登報徵收黨員。並在上海設「南方大學」，自任校長。但黨務校務並不發達，不久即歸消沈。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之主張集產獨裁大異其趣，惟此爲社會主義之一種，早於中共之信仰俄式社會主義十年。且江亢虎即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更早於毛澤東二十餘年。

叁 無政府主義派

辛亥革命以前，中國有一革命團體「巴黎世紀派」，由一羣留學法國學生張繼，李石曾與吳稚暉等發行新世紀雜誌（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介紹克魯泡特金之無政府主義。此刊物在國內發生影響，而有無政府主義運動。劉思復（即師復）夫婦於一九〇九年在廣東創辦無政府團體「晦鳴學舍」（一稱心社），介紹蒲魯東、克魯泡特金學說，編爲「晦鳴叢書」。民國二年，他發行機關雜誌「民聲」週刊，從介紹無政府主義到鼓吹暗殺，篇幅四分之一用世界語寫作，並將 Communism 一詞譯爲「共產主義」。同年，晦鳴學舍被龍濟光封閉，思復將其移至上海。民國四年思復病逝，長眠西湖之濱。民聲週刊自是時作時輟。

九年春，上海晦鳴學舍留守人鄭佩剛，接獲自天津寄來用世界語所書一信，署名布魯威，自稱爲布爾什維克黨人，久居華北，因閱讀民聲世界語版，得知辛亥革命後有一羣自由主義在華南努力工作，其思想體系深入人心，實爲五四運動的原動力，彼希望此等自由主義者與蘇俄携手。

鄭佩剛即將此信轉往北京大學黃超海，使其就近接洽，超海即將布魯威轉介於北京大學的李大釗、陳獨秀，結果，

產生「社會主義者同盟」。北大及其他大學學生參加者頗多。

自是，陳獨秀等在上海，李大釗、黃超海、華林、王竟林等在北京，梁冰弦，區聲白、李少陵、黎昌仁等在廣州，從事社會主義者同盟工作，組織學生及工人，並發行宣傳刊物。

是年五月，第三國際派斯脫洛米基偕一華人翻譯（著者按：當即吳廷康與楊明齋）來上海，晤陳獨秀。一晚，獨秀在其法租界華龍路漁陽里二號寓所召集會議，到會者有沈定一、李漢俊、尉克水、袁震瀛、俞秀松、鄭佩剛及朝鮮獨立黨領袖金九等人，介紹與斯脫洛米基會晤。會議決定：設一小型印刷所，由鄭佩剛負責辦理，借用晦鳴學舍器材，并由斯氏交出二千元為開辦費，以後營業自給。乃設一「又新」印刷所於法租界辣斐德路成裕里十二號，公開營業。各黨派宣傳刊物，概予承印。陳望道所譯馬克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即由此印刷所印行，而成爲爾後中共經典。「新青年」雜誌，陳獨秀亦自另一印刷所收回，交又新承印。

此即無政府主義爲共產主義移植中國所作鋪路工作之經過。

十一月七日起，陳獨秀自辦「共產黨」月刊，與繼承民聲，由景梅九主編之「自由」對峙，於是馬克斯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分道揚鑣。（註二）

肆 俄式共產主義嚮往者（註三）

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革命成功，建立「勞農」政權，實爲當時世界爲之震驚的一件大事。其時，中國若干高級智識份子，外苦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憤於軍閥的亂政，在煩悶徬徨，覓尋出路之際，對此更爲嚮往。蔡元培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以主張自由教學，治新舊思想於一爐，其時，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辦有「新青年」及「每週評論」，介紹共產主義。五四運動後，大釗集合若干該校師生，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註四）。（其後又成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或稱「馬客士主義研究會」和「俄羅斯研究會」，而以馬克斯主義研究會較爲出名，似與社會主義研究會同物而異名。）參加者有陳獨秀、瞿秋白、鄧中夏、張國燾、易家鉞（君左）、陳願遠、范體仁、

易克巖、郭夢良、徐六幾、朱謙之、費覺天等。毛澤東時爲北大圖書館書記，月薪十八元，亦參加其中，被等並非全爲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如陳願遠提倡工團主義，郭夢良會組織「男子解放協會」，徐六幾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朱謙之爲無政府主義者，易家鉞爲一純粹的文人。社會主義研究會只是一學術性團體，或走向新政黨過渡性的團體。（註五）

五四運動乃當時各種新思想運動混合物，受巴黎和會之刺激而爆發，其足以促成共產主義，勿庸諱言。

民國八年七月加拉罕對華宣言達到中國之後，更使一般智識份子對俄式共產主義刮目相看，各種團體往往開會研討，表示歡迎。整個鋪路工作頗爲順利，復有冒充第三國際代表來華作一番打前站工作，亦即上述之布魯威。

布魯威實際上是北京大學俄文系教授，自命爲研究「詩經」專家，來到中國鍛鍊普通語文。十月革命後，獲充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對於民國十年前後秘密從華北入蘇之中國青年，如俞頌華、李仲武、凌鉞等多人，均經其發給入境證。由於濫報花賬，侵蝕公款，被其上司發覺，將調其回國整肅，遂脫離蘇籍，至日軍侵入北平後復設法逃往美國。

布魯威雖不過一俄國騙子，但其對於共產主義向中國移植之鋪路工作有所貢獻。

（註一）謝彬「民國政黨史」第四一、四二、一三二、一三三頁。

（註二）關於無政府主義派部份，請參閱波多野乾一「中國共產黨史」第一卷第一章二十一頁。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香港「自由人」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連載，及鄭學稼「中共黨史第一章」，載「今日大陸」第一三〇期。

（註三）關於嚮往派部份主要參考沈雲龍「中國共產黨的來源」，台北「民主潮」一九五九年版所引張西曼「歷史回憶」一文。並請參閱鄭學稼「中共黨史第一章」。惟所列羅秋白與俞頌華等同時赴俄，非是。據稱多餘的話，彼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去俄，任北京晨報記者。

（註四）「研究會」成立時間、「波史」謂在民國七年十月，但中國各方記載均謂在五四運動後。

（註五）據簡明歷史稱：「一九一八年着手共產事業者惟陳獨秀一人」。

第四節 臨時中央成立

壹 吳廷康組織中共臨時中央

中共臨時中央爲中共胚胎，自其形成至出生，得力於吳廷康。

吳廷康生於一八九三年，一九一三年赴美，在美國與加拿大求學、作工多年，擅英語。一九一八年返俄，加入共黨。一九一九年參加阿木斯克暴動失敗，去海參威參加秘密工作，五月被捕，判無期徒刑，在北庫頁島作奴工。一九二〇年一月，與其他政治犯暴動，取得該島政權，旋調往第三國際遠東書記局工作。

民國九年春，吳廷康奉第三國際東方局之命來華，同行者有秘書馬邁也夫夫婦與翻譯旅俄華人楊明齋。抵北京後，與布魯威取得聯繫。布魯威其時所作鋪路工作已有初步成就，因介紹吳氏與李大劍，而與北京有關文化界人士接觸。吳廷康與李大劍討論成立中國共產黨問題，李大劍乃轉介紹至上海與陳獨秀會晤。獨秀於五四運動後，在北京爲當局所不滿，辭北大文科學長職，自辦「每週評論」，以在北京鬧區新世界屋頂散發鼓吹共產主義傳單，被捕，數月出獄，乃於是年冬去上海，寓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即爾後中共誕生之地，繼續主辦「新青年」，鼓吹共產主義。獨秀本有組黨意圖，而吳氏亦適時達到，於是一見如故，而對組黨工作積極進行。（獨秀、李大劍小傳附本章後）。

其時，戴傳賢（季陶）在上海辦「星期評論」，李漢俊、沈玄盧亦在社中工作，提倡社會主義，又爲「上海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發起人，獨秀至滬，即積極參與。時張東蓀爲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主持人，獨秀約其與吳氏見面，共議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至是年（民九）八月，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設臨時中央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註一）。發起者七人，即（一）陳獨秀、（二）戴季陶（當即脫離）、（三）沈玄盧（後脫離）、（四）陳望道（當即脫離）、（五）李漢俊（後脫離）、（六）施存統、（七）俞秀松（註二）。計脫黨者四人，留者僅三人而已。戴傳賢脫離事在成立前一日，彼去函表示：已與國民黨關係太深，因忠於中山先生，不能參加共黨組織。（按：其時中山先生在滬。）會中通過了黨綱，並推陳獨秀任書記。

吳廷康在上海指導中共成立情形，周佛海「往矣集」有所描述，彼於民國九年暑期自日本返滬後即行參預。據稱：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里二號訪仲甫（獨秀字），當時有吳廷斯基（吳廷康）在座。吳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

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爲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太多，實際行動一點也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葆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賓是贊成的。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負責，當時稱爲「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傳賢）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最初草案，他雖然參加起草，他却沒有加入。這個時候只有籌備組織，還沒有正式成立。預備在一年之中，於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後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然後於第二年夏天開各地代表大會，正式成立。

貳 臨時中央之活動

中共臨時中央成立以後，爲準備明年召開代表大會，工作頗爲積極，列舉如下：

第一、宣傳工作：陳獨秀於民國八年底到上海之後，即繼續出版「新青年」，作爲鼓吹共產主義的工具，迨臨時中央成立，即成爲非正式的中共機關報。九年五月一日第七卷第六期出「勞動紀念專號」，刊登本國工人生活圖片三十三幅及工人親筆題詞，發表李大劍之「五一運動史」一文，又介紹蘇俄「勞動法典」。此殆爲中國最早之紀念「五一」之雜誌。同年九月第八卷一號，增闢「俄羅斯研究專號」，介紹蘇俄實況，執筆者有李漢俊、李大劍、楊明齋、震瀛（袁振英）及李達等。在中共成立以前，「新青年」所刊載有關國內工人運動之報導，凡一百三十七篇之多。所發行叢書有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譯「俄羅斯研究叢書」，「康敏尼斯特（共產主義）叢書」，「馬克斯叢書」，及「陳獨秀先生講演集」等。

臨時中央於九年十一月開辦「共產黨月刊」，作爲正式機關報，共出七期，至翌年七月中正式成立以後，停刊。介紹俄共歷史，登載列寧「國家與革命」等若干著作，以及有關共產國際情況，歐美各國共產黨動態等報導，此外有批判無政府主義及極粗淺的如何在中國實行馬克斯學說之文章。大半寄給北京、武漢、廣州、長沙各地支部，對各地共產

黨員頗起教育作用。毛澤東亦從而學到一些共產主義皮毛。

第二、勞工運動：臨時中央於九年八月出版一種小型而通俗刊物「勞動界」，解釋工人在生產中之重要地位與所受的壓迫，勞動價值和剩餘價值之理論，指陳資產階級必然崩潰及勞動階級必然解放到「窮人當家」之前途等。

獨秀又與上海資本家組織「工商友誼會」，於同年十月出版一種刊物「上海夥友」，鼓勵店員與一般被掠奪階級聯合，改造現行階級制度，建設新社會，獨秀在發刊詞中稱夥友、工廠與礦工勞動者及交通勞動者是「階級戰爭的三大軍團」。臨時中央於同年十月建立第一個職工會，即「上海機器工會」，在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六號外國語學社開發起會，到者七八十人。入會者有造船廠、電燈廠、厚生鐵廠、東洋紗廠及恆豐紗廠工人共三百七十餘人，出版「機器工人」。十二月，又建立「印刷工會」，有鉛印工人三百餘人，石印工人一千三百餘人，出版「人世畫報」。另有紡織工會，人數較少。

第三、開辦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俞秀松主其事。主要目的是招收青年學習俄文，準備送往俄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或「東大」）留學。被送往留學者有彭述之、謝文錦、華林等。在學社學生來去無定，多則二十餘人，少則十餘人，十年春學生最多。前後有學生六十人，多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劉少奇曾在該校學習俄文。

第四、設立各地支部：

(一)北京支部：成立於民國九年九月，只有黨員八人。內無政府主義者六人，黃凌霜、華林及王竟林等，立即退出；共產主義者二人，李大釗與張國燾。旋增加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等。出版「勞動音」（後改「仁聲」）週刊，創刊於是年十月革命節。此外，尚辦有「平民教育講演團」及京漢鐵路長辛店「勞動學校」。

在天津之英租界雲芳里某號設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掛「新詩社」招牌，由張聞天負責，出版「新詩」，石印，聞天所發表之新詩頗多。參加研究會者有俄人及周恩來、鄧穎超、韓致祥（麟符）等。事在民八與民九之間，有無支部織組，不詳。（恩來後赴法，任大公報特約通信記者。麟符於清黨後北上，在塘沽被捕，由孫殿英保出軍前効力，在綏遠孫之司令部附近某廟前，被鄭應烈擊斃。）（註三）天津方面尚辦有「來報」。

(一) 廣東支部：其時，廣州莫榮新被陳炯明擊敗，十一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先生先後赴廣州。吳廷康旋與陳獨秀同去廣州，晤陳炯明，獨秀因無政府主義者梁冰弦之推荐，受炯明聘請爲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其時，廣東方面無政府主義勢力頗大，於準備組織支部時，由吳廷康主持開會，將獨秀所草擬黨綱提付討論，無政府主義者多表示反對，退出。十二月底，由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組織支部。平山任書記，公博任組織，植棠任宣傳，並開始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吸收各校教員及學生。林祖涵、劉爾崧、阮嘯仙、楊匏安等先入團而後入黨，出版「勞動聲」，採報刊形式，又出「勞動與婦女」。其時反共者不滿獨秀，謂其主張「萬惡孝爲首，百行淫爲先」，稱陳獨秀爲「陳毒獸」，要求官廳免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而驅逐出境。

(二) 湖北支部：最初參加者爲董必武。日本留學生李漢俊，亦湖北人，爲支援上海組織共產黨而回省，與董必武會面，必武決定加入，並負責組織湖北支部。與必武同時負責者尚有陳潭秋。支部成立於九年九月，地點在武昌多公祠。惲代英、項英、許白昊等旋由該支部所吸收入黨。

(三) 湖南支部：毛澤東爲主持人之一。九年四月，澤東從北京去上海，晤陳獨秀，六月回長沙，辦「文化書社」，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及「留法勤工儉學」等，十二月，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者有何叔衡、郭亮、夏曦，其第二任未婚妻楊開慧及蕭述凡等。長沙共黨支部可能成立於是年底或十年初。(註四)

此外，在四川方面，惲代英、蕭楚女等在重慶，瀘州等處活動，沈玄廬在浙江活動。

在日本東京與在法國巴黎均設有支部，在東京者有周佛海、施存統。其時日本關於共產主義之介紹較中國爲多，中國留日學生，傾向共產主義者不少。李漢俊、周恩來（民六至民八），李大釗及彭湃，均曾在日本留學。旅法支部，民國九年即有「共產主義中國青年聯盟」，參加者多爲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十一年夏秋之間，成立「少年中國共產黨」，參加者五十餘人。重要份子趙世炎是冬在莫斯科與陳獨秀晤面，決改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其已入黨者另組「旅法支部」。支部由尹寬任通訊員，劉鑫任書記。團由周恩來任總書記，兼負宣傳之責。其代表刊物初爲「少年」，後改「赤光」，恩來以「伍豪」筆名撰文。旅法支部爲中共製造不少重要份子，至今死者有趙世炎、尹寬、蔡和森、陳延年、陳

喬年（獨秀二子）等，生者有蔡暢、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陳毅、聶榮臻、王若飛，向警予（蔡和森妻）等。反共之任卓宣、當時亦為旅法支部重要份子之一（註五）。稍遲，在德國者有高語罕、朱德、張申府等（註六）。

第五、設立社會主義青年團，詳第五章。

在此期間，所需經費，由吳廷康供應。

自上海臨時中央成立之後，所有不贊成俄式共產主義者，或自動脫離，或被共黨排斥，自中共言之，其份子漸趨純化。

（註一）此係根據中共方面之記載，另據國民黨調查統計局之「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以後簡稱「中共透視」）四〇頁：「研究會設上海法租界羅飛路洛陽里（現改銘德里）六號。另據樸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見聞」稱，先後租用上述兩地。

（註二）此名單根據「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乃「蘇俄陰謀文證類編」所載，但另據樸梧老人（畫必武）「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之見聞」一文，無陳望道，而有李達。

（註三）據竺墨林面談。彼與張聞天等相識，且曾至「新詩社」。

（註四）鄭學稼「中共臨時中央和各地支部（下）」，今日大陸一三二期。

（註五）李天民「周恩來（一）」，今日大陸一二九期。

（六）史諾：毛澤東自傳。

本節參考書：（一）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二）畫必武「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三）李達「七一回憶」，（四）周佛海「往矣集」，（五）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六）沈雲龍「中國共產黨的由來」，（七）鄭學稼「中共臨時中央和各地支部（上）（下）」，（八）「中共透視」第二章，此書係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價值頗高，惜撰寫草率，校勘不審，乖誤頗多。吳相湘教授收為「現代中國史料叢書」第三輯。

※

※

※

※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三），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少年求學於浙江求是書院。後赴日，畢業於速成師範，又曾留學法國。自日歸國後，任安徽高等學堂教務長。辛亥革命起，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秘書。討袁之役失敗後，在蕪湖辦白話報，去上海，辦「新青年」雜誌。民國六年，元培長北京大學，被聘為文科學長，薦同鄉胡適任教授。新青年成為文科刊物，與胡適共同提倡白話文。復辦「每週評論」與「新潮」，由學生發行，亦用白

話，排斥孔教，文學革命高唱入雲。文科部份學生，以獨秀學術地位不高，又不滿其反孔，呼之爲「陳毒獸」，守舊派之「公言報」加以攻擊。林紆（霏南）致書元培加以責問。安福系新國會議員張元奇提出強勁教育總長傳增湘案，並要求陳、胡與蔡辭職，欲一舉而將新思潮一派人驅逐出京。蔡爲緩和空氣，剖表聲明，廢學長制，理科學長蔡汾轉至教育部任職，改獨秀爲教員，獨秀辭職。不久而有五四運動。九年春，獨秀在北京開「八七會票」，商場頂上散發社會主義傳單，被捕，出獄，赴上海，創設中國共產黨，爲黨魁。十六年國民黨清共後，第三國際爲推卸責任，令中共開「八七會票」，清算獨秀，指爲機會主義者，十八年被除名。自是成爲托洛斯基主義者，潛伏上海，從事活動，形勢衰落。二二年在上海被捕，處徒刑，二八年出獄，時抗戰軍興，居四川江津。晚年思想大轉變，贊成英、美式民主，反對俄共，不問其爲史派或托派。獨秀創立中共，自誤誤國，晚年悔悟，已無補於所歸成之大錯矣。其子延年，喬年法國留學生，亦共產黨徒，延年負責華南方面責任，十六年國民黨清黨時，在上海被執，處死。喬年亦被處死。

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五），字守常，河北樂亭人，經天津北洋法政學堂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文科畢業。在日曾加入同盟會。歸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毛澤東曾被用爲書記。民國八年，創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九年加入共產黨，以後即負北方黨務責任，陳獨秀常在上海，當時稱爲「南陳北李」。十一年，國民黨決定容共，因同鄉張繼之介紹，關中山先生，率先加入國民黨。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當選中央執委及常委。十六年四月，張作霖搜查北京俄使館時，被執，二十八日處死。大釗爲人頗具政治手腕，與吳佩孚、馮玉祥、張宗昌及北洋某些政客均有聯繫。然平時亦頗疑赤色俄國爲新沙皇，其故舊毛以李、李秋生類語言之。

第二章 從第一次大會至第四次大會

第一節 第一次大會

壹 開會經過（註一）

民國十年七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李漢俊寓所及浙江嘉興之南湖，歷時約一週。出席者十三人，代表黨員五十七人。（註二）

代表名單如下：

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一說包代表武漢，包湖北人。）

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

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

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

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一說何未出席。）

濟南代表——鄧恩銘、王盡美。（其出席國民黨一次大會用此名，波多野「中國共產黨史」作燧美，史諾「毛澤東

自傳」譯文作俊美。）

留日代表——周佛海。（公博、國燾、必武、澤東小傳載本節後。）

第三國際代表馬林（Maring）與吳廷康均負指導之責，列席大會。陳獨秀時在廣東陳炯明處，李大釗在北京，均非代表，未出席。

國燾爲北大學生，與陳獨秀、李大釗接近，且早從事活動及籌備工作，遂被推爲大會主席。黨綱由陳獨秀事先擬具，提會討論，其中包括（一）培植黨員，（二）民主主義之指導，（三）紀綱，（四）慎重進行奪取政權等問題。大會所通過之重要決議案

如下：

(一) 中國共產黨黨綱，即黨章。

(二) 中國共產黨關於其目標的決議案。

(三) 大會宣言。

(四) 加入第三國際問題。

(五) 選舉中央負責人。

會中分爲兩派：張國燾、劉仁靜等自命爲真正共產主義者，而李漢俊、周佛海與陳公博較爲灰色，討論問題時，兩派對下列四點發生爭執：

(一) 限制官吏入黨問題：黨綱第十四項規定：禁止現任官吏、議員入黨，進一步解釋，各級學校校長，如爲政府所任用，即視爲官吏，不准入黨。此點引起激辯，公博以爲：教育職務不應視爲官吏，且黨尙在年輕時，應儘量在可能活動場合從事活動，而不問其職務，即爲官吏，亦可不問。贊成原案者不予同意，國燾主張尤力，結果，本案通過，但明晚開會時，國燾以國際代表反對，又提請取消。最後本案保留，移下次大會討論。

(二) 宣言問題：第一次宣言草稿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根據馬克斯、恩格斯「共產主義宣言」觀點，描繪中國政治與經濟之情況，強調中國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第二部份，列舉南、北政府之罪惡，竟謂孫中山先生之政府並不較北京政府爲優。此爲張國燾所主張，而周佛海、包惠僧與陳公博等辯稱：雖然國民黨政綱之許多觀點是錯誤的，但是多少暫時代表一種新趨向，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象徵着國家社會主義。但多數代表認國民黨黨員多反共，所以南方政府亦應推翻。當時宣言卒被通過。但翌日開會時，因國際代表主張應與南方政府合作，此案又被打銷，而將宣言之發表問題移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會後公博返粵，尙留粵之陳獨秀痛陳利害，此項宣言遂不見於世。

(三) 加入第三國際問題：李漢俊亦持反對態度。李謂：現在共產主義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俄式的，主張專政；另一種是德式的，主張民主，兩者是非得失未能懸定，應先派遣同志前往各國考察，才能決定加入與否。陳公博亦附和之。因

此，加入第三國際問題未能解決。

（四）奪取政權問題：李漢俊亦起而反對，漢俊終被開除黨籍。

至大會選舉中央負責人，結果如下：

委員長——陳獨秀。

副委員長——周佛海。（委員長、副委員長名稱係根據周佛海記載，其他方面記載悉稱獨秀爲總書記。）

組織部長——張國燾。（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

宣傳部長——李 達。

開會地點原議定每晚更換，但國燾等認漢俊爲考茨基主義者，而非列寧主義者，是黃色的，而非紅色的，乃故意每晚在漢俊家開會以陷之。當大會開會一週之後，尙有許多議案仍待討論，終爲法租界巡捕所干擾。上海租界捕房在大會召開之前即接獲報告，謂東方共產黨將在上海開會，包括中國、日本、印度、朝鮮及俄國等等。各國租界，尤其法界，均秘密戒備。國際代表亦提出警告。是日深夜，包探與巡捕包圍大會房屋——李漢俊寓，幸各代表多宿於法租界博文女校，得訊，逃脫，惟陳公博與李漢俊尙留會中，經過四小時搜查，無所獲，巡捕撤去。乃由李達之妻安排，改在嘉興南湖船上舉行，歷時一日，完成各種議案。毛澤東之友人蕭瑜隨毛前往，指南湖而嘆曰：「設共產黨得志於中國，此湖真禍水也！」（註三）

第一次大會閉幕後，各代表紛紛返回原籍，從事組織與宣傳工作。民國十年底，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成立，幾分公開，各省執行委員會，據報成立者已有全國過半數省份。勞工組織遍及全國，尤其在廣州，組成工會一百二十個以上。一般類似工會的散漫團體，亦逐漸傾向於共產主義，自是罷工事件，漸次發生。

在臨時中央至第一次大會期間，入黨者有于樹德、林祖涵等。

貳 黨綱

在第一次大會中通過「黨綱」，亦即「黨章」。（此項黨綱，他處未見，在陳公博論文中之附件一載有英譯文，由著者回譯爲中文，刊載台灣出版「今日大陸」民國五十一年八月十六日第一六六期。）

本黨綱與爾後中共黨章頗有歧異之處：

第一、組織系統頗爲簡單，僅有中央及地區兩級。圖示如下：

不足十人者，設書記一人。

中央——地區

超過十人者，設財務、組織、宣傳員各一人。
超過三十人者，設執行委員會。

第二、黨員滿五百人，或五個地區成立執行委員會時，得開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十人，組織中央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未成立前，爲臨時中央。依此，則第一次大會開會以前爲臨時中央，以後爲正式中央。

第三、各級執行人員之任期、會期，均無規定。

第四、未設監察機構。

第五、關於中共組織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制，即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未作明確規定，僅中央委員應經選舉產生，而地方的財政、出版及政策應受中央控制而已。

由以上各點觀之，可知爾時中共雖已正式出生，然只是粗具雛形，不能視爲健全。

至於黨員應與其他黨絕緣，不得任官吏或議員等問題，當時會中發生爭執，決定擱置，留待下屆大會討論，所以此條並未付諸實施。事實上，至民國十一年第二次大會，中共遵照第三國際指示，參加國民黨，已將此條根本放棄矣。

茲將此項黨綱附錄於下：

中國共產黨黨綱（譯文）（一九二一年七月第一次大會通過）

（一）本黨定名爲「中國共產黨」（C.P.C.C.）

第二章 從第一次大會至第四次大會

(2) 本黨綱領如下：

A 以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至階級的差別消滅為止。

B 採無產階級專政以完成階級鬥爭的目的——廢除階級。

C 推翻資本私有，沒收一切生產工具，如機器、土地、建築物及半製成品等等，悉歸之於冊公有。

(3) 本黨採用蘇維埃形式，組織工人、農人及士兵，宣揚共產主義，認定社會革命為本黨主要政策，與黃色知識階級及其他類似黨派絕對斷絕一切關係。

(4) 黨員資格不分性別和國籍，凡接受本黨綱領和政策，並保證忠於本黨者，經本黨黨員一人之介紹，得為本黨同志，但在入黨前必須與反對本黨綱領的任何政黨或團體斷絕關係。

(5) 介紹入黨程序：應將申請人提請地方蘇維埃（註四）審查，審查期間最多以二個月為限。審查以後，經過多數黨員同意，申請人即可取得黨員資格，如該地區已成立執行委員會，則該黨員資格應由該委員會批准。

(6) 本黨主義乃至黨員姓名，在公開時期尚未成熟以前應保守秘密。

(7) 任何地區有黨員五人時即可組織該地區之蘇維埃。

(8) 某一地區蘇維埃之黨員經由該地區書記之正式介紹，得轉入其他地區之蘇維埃。

(9) 任何地區之蘇維埃，其黨員如不足十人，僅可設置書記一人綜理事務；如超過十人，則應設置財務員一人，組織員一人及宣傳員一人，如超過三十人，則應組織執行委員會。該委員會規程以後另行規定。

(10) 各地區黨員人數增加時，應即利用各該地區工人、農民、兵士和學生所組成的團體，依照其職別作外圍活動，但此類團體應置於各該地區執行委員會指導之下。

(11) （註五）任何地區蘇維埃的財務、出版及政策，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與指導。

(12) 黨員人數超過五百，或全國已設有五個以上之地區執行委員會時，應即選擇適當地點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全國代表會議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十人。當上述條件尚未實現時，應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適合需要。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細則以後當另行規定。

(13) 黨員除為現行法律所壓迫或已取得本黨同意者以外，皆不得担任政府官吏、或議會議員。但士兵、警察和機關職員不在此限。

(14) 本綱領於全國代表大會經代表三分之二通過修正案時，得修正之。

叁 工作目標

第一次大會所通過「中國共產黨關於其目標的決議」，即中共的行動綱領。（本件亦不見於中共正式紀錄，亦係著者自陳公博論文中譯出，刊載於「今日大陸」民國五十一年八月第一六六期。）

由於共黨以無產階級革命自命，是以對於工人組織、訓練與運動特別重視。關於勞工組織，要在各產業區域組織產業工會或工廠工會，滲透並改造各同業工會或手工業工會，從而鼓動階級鬥爭與政治鬥爭。在勞工組織成立之前，先在各產業單位中設勞工補習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以爲組織勞工的準備步驟。對於從事此項工作的黨員，設研究機構，以學習馬克斯主義、勞工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方法。

其次，關於宣傳工作，工作目標規定，必須置於黨內控制之下。

以上各項，在臨時中央多已實際進行，經過此次決議，將使其更正規化與積極化。惟關於外國語學社，在臨時中央乃最重要工作之一，而此決議中反未列入。

由於此次大會決定採取不妥協政策，是以在工作目標中規定不與其他黨派或社團發生關係，以免自身成爲傀儡。此項規定與黨綱中規定黨員不得爲政府官員、議員或參加其他黨派有同樣作用。此時中共對初期組織臨時中央時所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黨派人士正厲行排斥，其對國民黨亦不例外，正開始顯示其俄式一黨獨裁的性格。此種性格，由於爾後奉第三國際指示加入國民黨，而爲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特別值得重視者爲加入第三國際問題。依照共產國際組織體系，各國共產黨僅爲國際支部，中共自不能例外。但在此次黨綱中未有此項條文，而經會議決定與第三國際之關係，此在工作目標中有明顯的表示。其方式是向第三國際按月提出報告，並派代表至東方局。

茲將此項決議案錄後：

中國共產黨關於其目標的決議案（譯文）（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一次大會通過）

(1) 勞工組織

組織產業工會是本黨主要目的。凡有產業一種以上之任何地方即應組織一產業工會，如某地並無大產業，而僅有工廠一、二家則可組織工廠工會以適合當地情況。

本黨應向工會灌注階級鬥爭的精神，如各工會所鼓動的政治鬥爭與本黨綱領不符，則本黨應即避免成爲其他政黨的傀儡。至於現存的同業工會及技藝工會，本黨可派黨員加入，作爲改組的初步。

會員尚未超過一百人時不得組織工會，本黨至少應派黨員二人參加新工會助其組織。

(2) 宣傳

雜誌、日報、百科全書及小冊子皆須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管理。

每一地區依其需要得出版工會雜誌、日報與週刊，以及小冊子、臨時傳單等等。不論中央或地方刊物，必須由本黨黨員直接管理和編輯。

(3) 勞工補習學校

因勞工補習學校爲組織產業工會的準備步驟，故此種學校應於各種產業單位內成立，例如運輸業勞工補習學校，紡織業勞工補習學校等。一種補習學校不得同時教授幾種不同種類工作的知識，但遇特殊情形，確有不可辯駁的需要時，亦可不受此限制。

在補習學校內僅工人得爲管理委員會委員，管理學校事務，教師由本黨聘用，但可列席委員會。

勞工補習學校應逐漸成爲勞工組織之中心，否則本黨依據情況，即可不准設立，並得予以停辦或改組。補習學校教學的宗旨，其最重要者應爲促使勞工覺醒及指示其組織工會的必要。

(4) 研究勞工組織之機構

本機構應由各種產業與具有階級意識的勞工領袖及本黨同志組成，並教授產業工會的適當方法。本機構的目標，在訓練從事本黨實際工作之工作人員，使能特別注意於工會組織，協助無產階級各種其他活動，並調查工會及無產

階級的情況。

爲增進黨員能力起見，本機構可分爲下列各項主題之研究小組，勞工運動史，組織工廠工人的方法，馬克斯的經濟理論，各國勞工運動的現況。研究結果得出版叢書。（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應特別注意中國地方上的情況。）

(5) 對現存政黨的態度

對現存政黨應採獨立、攻擊和排斥的態度。在政治鬥爭，反對軍閥與官僚，以及在要求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本黨必須表明態度時，應即維護無產階級，並不與其他黨派或社團發生關係。

(6) 本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

本黨中央機關每月應向第三國際作一報告。必要時應派一正式代表於第三國際遠東秘書處所在地之伊爾庫茨克，此外並應派遣代表至遠東各國，促進階級鬥爭的聯合計劃。

肆 經費之來源與黨務之推動

當時共黨經費，是盧布所換的鈔票。當時陳獨秀被推爲委員長（著者按：亦稱書記），尚在廣東，由周佛海以副委員長代行委員長職權，馬林每月給生活費八十元，尚略有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與馬林大鬧意見，不與見面，因馬林謂：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款二十餘萬元，而成績如此，責中國同志太不努力，而獨秀則謂：中共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國際代表任意揮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員長不足兩月期內，確經手用去一萬二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之「勞動組合書記部」經費，直接經領，尚不在內。（註六）

至於黨務之推動，自一次大會起至翌年（民十一）七月止之一年間，各地區成立黨部者有順直、廣東、湖南、江蘇、湖北、山東、浙江、安徽、四川、奉天等省。其他各省，間有少數黨員，尚無組織。（註七）

（註一）此項資料主要來源：①陳公博一九二四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論文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Prof. C. Martin Wilbur 考訂發行。第一次大會開會日期爲七月二十日起，係根據公博寒風集孔阿琴事件報紙新聞而考訂者。又據鄭文光考證應爲七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見香港「人物」廿三號。中共規定爲「七一」，「簡明歷史」謂「約在五月」，均非是。②陳公博：「寒風集」——我與共產黨。③波多野乾一

中國共產黨史」第一卷第一章三十一頁。④「簡明歷史」。⑤周佛海「逃出武漢報告」。⑥張國燾「我的回憶」，載香港明報雜誌。

(註二) 根據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三七頁，三聯書店香港一九五八年版。其他中共記載，人數頗有出入。

(註三) 蕭瑜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 193。

(註四) 「蘇聯埃」一詞，當係初期中共黨人誤用，或陳公博誤譯，應為「小組」。

(註五) 本件缺第十一條，當係公博遺漏或錯排。

(註六) 此段見周佛海「逃出武漢報告」。

(註七) 「中共透視」四七、四八頁。

附錄 陳公博：「我與共產黨」(節錄)

全文載「駭風集」。公博與譚平山、譚植棠叔姪為北大同學，與陳獨秀有師生之誼。獨秀在上海與俄人發生關係後，有俄共二人至廣州，與公博等取得聯繫，公博與二譚即在廣東成立共產黨，並開始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公開在廣州宣告成立。由於公博、平山在高師與法專任教，徵得教授及學生入黨、團者頗多，「聲勢浩大」。以後林祖涵、劉爾崧、阮嘯仙、楊錦安，均係由該團吸收者。其時公博與二譚在陳炯明協助之下辦「群報」，不久陳獨秀亦至廣東受陳炯明聘為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均對共產黨組織發生助力——以下公博原文。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這次大會給我的壞印象不少，大概我後來脫離共產黨，要以這次大會給我的惡劣的印象為起因，而以仲甫和我的一重公案為後果。

七月初旬法專和高師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轉上海。我們是住在大東旅館，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學的，也有住在別處的。周佛海、李鶴鳴（著者按：當係李達宇）李漢俊、張國燾、包惠僧，都在那時認識，而毛澤東則因為在北大圖書館辦事，可以算是比較熟的朋友。當時的代表大會，所謂共黨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爾時仲甫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係，且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而李大劍則向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短短會期四五日，使我發生極大的反感，其中有幾件事，是使我極端不滿。

第一件事就是開會地點問題，當日原議每日開會均須更換地點，以免被人注意。但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我覺得有些詫異，那天恰恰早上張國燾來找我，我問他為什麼與原議不符。他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理論，而是柯茨基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紅色的，我們在他家內開會，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們偏要在那裡開會。我聽了這句話，默然不答，心想，呵，原來如此！我以為同志間應當相見以誠，相規以義才對，國燾這樣做法，簡直是和漢俊為難，連同志的安全都不顧。現在第一次代

表大會便有這些傾軋現象，以後惡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儼然分爲兩派，互相磨擦，互相傾軋，我心內冷然，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至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爲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係，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唯俄國代表馬令與吳庭斯基的馬首是瞻，當時有幾件提案竟把我氣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黨人員參加政治，甚至乎不許當校長。我爭辯着，共黨黨是應該鬥爭的，爲甚麼連校長都不可幹，國燾硬要通過，而多數居然贊成。可是到了第二晚開會，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爲什麼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極了，我說昨日我本來不贊成，而會內倒否決我的意見，今則議案通過，祇由一個俄人反對，又取消議案，這樣不必再開大會，祇由俄人發命令算了。這次衝突，兩俱不歡。而當時類此之事，不一而足。

第三件是通過宣言，內中對於孫先生和徐世昌（那時孫先生是廣東非常國會選出的臨時大總統，徐是北洋軍閥左右下的國會所選的大總統）相提並論，批評得一文不值。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對，辯論很久，宣言終於通過了。我直急得跳起來，找周佛海、漢俊商議補救的方法，後來到最終會議：才提出一個折衝方案，將來這篇宣言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因此由共第一次大會的文獻，沒有宣言，不過當日共黨是秘密組織的，有無宣言，世間也不注意罷了。

因着國燾個人和漢俊爲難，恐怕其中代表還有附和國燾的主張罷。連日開會均沒有更換地點，終於一天晚上，雙故遂降臨了。我們在漢俊樓上開會，人還沒有到齊，俄代表馬令和吳庭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個俄人跑上樓來報告，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問他經理在家否，這個俄人也算機警，急急上樓報告，俄國代表一聽這樣說，或者因爲長期經驗關係罷，立刻主張解散，我看各人本來已有些慌張，一聽馬令主張解散，都閉前門分頭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來是慣走後門而不走前門的，大家往前門走，等於事急走太平門的辦法。

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爲難，到了現在有些警報又張皇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爲人如何，爲什麼國燾和他有這樣的惡感。他們走後不到三分鐘，我和漢俊談不上幾句話，突然面前出現了幾個人。現在我還記得，有三個法國警察官，有四個中國的便衣密探，至於外面還有多少人，那我被關在樓上是不知道的。這班人上樓之後，空氣一時非常緊張，有兩個人監視着我，不許離開座位，不許說話，甚至乎不許喝茶，其餘的人便監視着漢俊在房間和各處搜索。爲首的法國警察，問誰是主人，漢俊不慌不忙的自己承認。這樣搜索，花了一個多鐘頭，什麼都看過，惟有插在抽屜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却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密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

者因爲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爲一張無關重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這樣過了一個多鐘頭，才審問漢俊爲什麼竊藏許多書，漢俊是懂得幾句法語的，告訴他們他是學校教員，藏書是要來供參考和研究之用。他們問爲什麼有許多社會主義書籍，漢俊說他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什麼書都要看看。他們問漢俊那兩個外國人是什麼人，漢俊說是英國人，是北大的教授，這次暑假來滬常常來談。

審訊完漢俊之後，便輪到我了。在搜索時間，我不能發言，我不能起身，但抽煙是可以許可的。自從國難們走後，漢俊開了一廳長城牌煙捲，我們剛剛燃着一枝，法國警察便上來，我坐着沒有事做，連續把那餘下的四十八枝煙捲吸完，終於被審問了。還幸他們問得早一點，若再遲五分鐘，便無煙可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法國巡捕開始用法語問我，我那時還未習法文，旁邊一個中國人說：「總辦大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這時，我很詫異，爲什麼那位先生倒以爲我是日本人。我想還是直接通話爲便罷，遂用英語問他懂不懂英語。這樣，他便用英語問我，以下是開始的簡單問答：

「你不是日本人」？警官很神氣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不懂你爲什麼懷疑我是日本人」，我有些開玩笑。

「你懂不懂中國話」？

「我是中國人，自然懂中國話」。

「你這次由什麼地方來的」？

「我是由廣東來的」。

「你來上海什麼事」？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這次暑假，是來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就住在這裡，」我一想不好，我決不能告訴他我住在大東，在旅館我還有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也有廣東共產黨的報告，所以這樣告訴他。

法國警官的態度似乎緩和了，但關於我是否日本人的問題，他還反覆研問，我揣測他這樣尋根究底，也許他另按報告，以爲我們中日俄黨人在這裡開什麼會。這個又經過半個鐘頭，那位法國先生使用法語向漢俊演說一番，後來漢俊告訴我，法國人所說的話，大意說

知道我們是知縣分子，大概想有某種的企圖，但中國教育還未普及，什麼都談不到，希望我們以後專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證據，祇好便宜我們了。

他們一窩風下樓之後，漢俊便催我急走，我說危險算是過去，我們何必事後後張惶，再開一聽長城牌享受一下罷，因為我不吸煙已經半個多鐘頭了。尤其是難受的，兩個鐘頭未喝茶，口乾得利害。漢俊重新叫人衝水沏茶，樓梯又響，我那時真有些吃驚，難道他們又捲土重來，誰知那人頭探出來的是包惠僧。惠僧問我們法國巡捕走了沒有，我說此非善地，你還是走罷，詳情明日再談。惠僧走後，我和漢俊再談幾句，看時已十點多鐘，遂和漢俊告別。

我總以為大風過去，海不揚波了，但出了漢俊門後，倏見一個人隱身在弄口，似乎在偵察，我走了幾步，他居然跟着來，我故意走快幾步，他也走快幾步，我走慢幾步，他也走慢幾步。我心想今夜總不能回大東旅館了；然而又不能不回，因為有許多文件，倘不燒毀，終須買禍。路邊恰巧有一家商店，還是燈火輝煌陳列着許多商品，我裝作看商品，一面思量怎樣脫身。可以說是靈機一動罷，我記得去年由北京轉回粵，在上海曾逛過一次大世界。大世界在夏天有兩場電影，地下露天，屋頂也露天，那個地方異常黑暗，是容易脫身的。我主意既定，立刻叫了一部黃包車往大世界，誰知那人也僱了黃包車跟在後頭。我到大世界後什麼地方都逛一逛，很游閒的逛書場，逛戲場，終在地面的露天電影看了三四分鐘，便踱至屋頂的露天電影，在人叢繞了一個圈，從別門下樓僱車回大東旅館，我回到房間叫我的太太打開了箱子，關好了房門，一口氣把文件用火焚燒，全攔在痰盂裏，至此才詳細的告訴她當晚的情形，湮滅證據的工作，算是告成了。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夜是陽曆七月中旬，是上海最熱的時候，我們的汗悶得出來，在床上無論如何也睡不着，兩人把蓆子拖下地板，才安穩睡了一覺。熱極生風，半夜裡起了大風雨，睡至微明，忽然聽見一聲槍響，同時又聽見一聲慘叫，我從地板跳起來，打開房門一看，看見走廊寂寞得沒有一個人，祇是急雨打窗，狂風吹面，我想明明有槍響，有慘叫，那莫不是我變了福爾摩斯的案中人麼？我喚起勵莊，告訴我所聞，但兩人都猜不出什麼事故，我反懷疑是一種夢境。

還是睡罷，到了九時，有一個茶房跑進來，說你們隔壁房間有一個女子被人謀殺了。我問他什麼一回事，他說前日有一男一女投店，今早那男的起身還叫了一碗麵，食後出去，我們問他要錢，因為他只交櫃上五塊錢。他說立刻便回，我們也不注意。不料剛才我入房打掃，那女的已死在床上，經理立刻來看，他身中一槍，並且頸上還有毛巾纏住，看起來大概男的打了他一槍不死，又用毛巾來勒斃的。我聽了之後，我也不告訴他今早所聞，恐怕他還找我做證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煩。不過我再想，如果有巡捕和偵探來偵查，保不定

認識我就是昨夜被偵查人之一。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此地不宜耽擱，還是走罷。我去找着總經理，那時大概是郭標罷，廣東人和廣東人總容易說話，我說我隔壁出了命案，我的太太非常懼怕，所以今日要去杭州一行，把所有行李，暫存旅館，俟回來還要換一個房間。這種說話，自然郭經理坦然不疑，我和我的太太，趁着巡捕和偵探沒有光臨，遂離開旅館，先在一傢飯館安頓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鶴鳴告訴他昨夜的經過，並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經過昨夜的變故，他們也打算停會，另易地方。會期不定，我更可以從容的避西湖，避靈隱了。

在杭州讀報，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叫孔阿琴，是一個絲廠的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記，是一個洋行的西崽。兩個人不知為什麼不能結婚，相約同死。那個西崽，趁他的大班往青島避暑，偷了他一根手槍和孔阿琴來大東開房間。到了天明，開了一槍，而孔女士居然不死，那男的急極了，所以又加工的用毛巾去勒。大概一時男的有悔意罷，或者獨生總比同死為佳。他收拾起死心，寫了一封自白的長信，又叫了一碗麵吃飽，才揚長而去。此事經已大白，初到的杭州，玩了兩、三天地方也游膩了。天熱的杭州，等於一個大汽爐，蚊大如蠅，夜熱逾晝，我們祇好賦歸了。歸來上海之後，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後大會已經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算是結束。大會宣言發出與否，授權仲甫決定，因為仲甫已被舉為中共書記，當日所謂書記，就是黨魁。我和各人草草談了兩三次，遂乘船回廣東了。

寒

寒

寒

寒

陳公博（一八九二—一九四六）廣州人，父為軍官，三合會領袖，反滿清，被捕，辛亥革命成功，被釋。公博為縣職員。民國三年，入廣州法科學校，六年，轉入北大。五四運動，並未積極參加，而據以為廣州各報寫通訊稿。九年夏畢業，與同班同學譚平山返廣州，合辦「群報」，偵陳炯明取廣州，派人加入該報。其時，陳獨秀欲勾結炯明，至廣州，令公博在廣州建共產黨及青年團，年底，獨秀受炯明聘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以公博為出版科科長，十年七月，公博赴滬參加中共一大，會中意見紛歧，公博印象惡劣，至南湖開會時，即未參加。十一年五月，獨秀再去惠州訪炯明，公博偕行，時炯明已因北伐問題反對中山先生，獨秀私告公博：論道理，應當聯孫，論力量，應當聯陳，主張暫時觀望，迨炯明叛變，公博為中共所指摘，憤甚，決去美，過滬時未晤獨秀，實際脫黨。十一月，經日本，晤廖仲凱及趙飛。十二年二月，入哥倫比亞大學一年，擬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論文，獲碩士，繼續讀博士，未卒業。十四年，任軍委會政治部主任兼廣東省政府工農廳長，仲凱遇刺，轉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長，十五年當選中執委，與汪精衛接近，北伐時，曾任江西省政委會主席，十六年，被選為中常委九人之一，兼工工部長。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公博實贊成之。寧漢離合作時，卿汪命赴廣州擬另組國民政府，造成中共廣州暴動，致不得參加四中全會，乃組織改組派反中央。十九年夏，與汪參加北方擴大會議，敗，走廣州。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與汪同當選為中委，汪長政院，公博任實業部長，二十四年底，汪被刺，旋去職，公博亦於二五至二六年遊

歐。抗戰軍興，歸國，爲中委。二七年十二月，汪叛國。三三年起，公博歷任僑立法院長，僑上海市長，及汪於三四年斃命，繼任僑組織主席。勝利後，三五年六月三日，在蘇州處死刑。

張國燾（一八九七——）江西人。北大畢業，民國十年，僑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當選中委，任組織部長。十一年，再當選中委。十三年，國民黨組，當選候補執委。十九年，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二十年起，任僑蘇維埃臨時政府副主席，在那豫皖僑蘇區任紅四方面軍黨委，竄四川通、南、巴一帶活動，二四年，西竄川西懋功，八月，與毛澤東自江西竄來之股會合。毛兒查會議，主西竄新疆，與主北竄陝甘之毛澤東衝突。西竄失敗，返陝北附毛，爲毛所制。二七年清離陝北，至武漢，投誠國民政府，任國民參政員及國大代表等職。大陸淪陷後，居香港。

賈必武（一八八六——）湖北黃安人，前清秀才，日本法政學校畢業，加入同盟會。民國十年，出席中共一大，建立湖北支部。在武昌辦武漢中學。十四年，當選國民黨候補執委。十八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特班受訓，二一年任僑中央蘇區最高法院院長，又在黃安建立蘇區，抗戰時任國民參政員，出席舊金山聯合國組織會議，常在政府所在地從事聯絡工作。三十四年七月大時，始當選中委。亂時期至大陸淪陷後，任僑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僑最高法院院長，僑政權副主席，爲共黨五老之一。至民六一，任僑政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一八九三——）湖南湘潭人。湖南第一師範畢業，民國七年，任北大圖書館書記。十年，出席一大，返湘，組湖南支部，任書記。十二年，當選中委。十三年，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委，十四年，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兼任農運講習所所長。秋，至滬，任共黨中央農民部長。十六年，在武漢任臨時全國農民協會主席。武漢分共後，主持兩湖秋收暴動，失敗，走江西。十七年，任紅四軍黨代表，與朱德合踞江西井岡山，號「朱毛」。二十年十一月，成立僑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任主席。二十四年一月，運籌會議，擊敗國際派秦邦憲，握軍政大權，奠定其共黨頭子地位。旋踞陝北，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任國民參政員。三一年，發動「整頓三風」，打敗國際派。三四年，召開七大，兼中委會、政治局、書記處三主席。八月，抗戰勝利，應蔣主席召來渝商談和平，利用和談以擴張勢力，竄踞大陸。三八年七月，宣佈向俄國一邊倒。十月，在北平建立僑政權，自任主席。四九年九月下台，任黨的主席，與俄共交惡，至今尚居中共首領地位。至民六一，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

第二節 第二次大會

壹 當時政治情勢

民國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註二）。出席者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高君宇、譚平山、鄧中夏、蔡和森、李達、包惠僧、施存統、張太雷、向警予（女）等（註二），（毛澤東未出席），代表黨員一百二十三人（註三）。此時中共，較諸第一次大會，地位鞏固，人數增加，代表質量單純，又有適當的工作

經驗，所以會議進行亦較順利。

自第一次大會後，中國政治情勢有如下的發展：

(1) 外蒙「蒙古人民革命黨」已於十年三月在俄共導演之下成立，至七月，建立「蒙古人民政府」偽政權，此為俄人在中國及亞洲建立之第一個共產政權，堪為中共榜樣。

(2) 勞動組合書記部於十年八月成立於上海，並出版「勞動週刊」，十月，勞動組合先後在廣州設南方支部，北京設北方支部，武漢設長江支部，自是各地不斷發生罷工事件。至十一年五月，第一次勞動大會開會於廣州，中共攫得領導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氣勢日高。

(3)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於九年十一月改組，排斥非俄式共產主義者，至十一年五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中共青年運動獲得相當的發展。

(4) 馬林於十年冬會訪陳炯明於廣州，訪孫中山先生於桂林，要求國共合作，事雖未成，然國民黨對中共態度友善，觀其勞動大會及青年團大會均克在廣州舉行，可知其政治環境頗為便利。

(5) 在十年底至十一年初，東方民族會議先後召開於伊爾庫茨克及莫斯科，中共張羅中國代表三十餘人前往參加，其中有國民黨份子，陳獨秀在其爾後「告同志書」中稱為國民黨為中共所領導，可知此為中共得意之作。

(6) 十一年二月，為中東路問題，中蘇取得四點協議，外交關係正常，予中共以有利影響。

(7) 十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華盛頓召開九國會議，關於中國問題，力圖打破戰時戰後日本在中國獨占形勢，通過「路梯決議案」以維持各國在中國之均勢，但仍不足以鑿中國取消不平等條件之願望。共產國際為破壞中國與列強關係，除極力詆毀華盛頓會議外，亟圖拉攏中國國民革命勢力，以資抵制，對中共活動尤存厚望。

(8) 國內仍為軍閥割據之局，有利於反軍閥之革命運動。

在此種有利政治情勢之下，中共逐漸成長，儼然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為中山先生所重視，成為加入國民黨之政治資本。加以共產國際的壓力，使中共一反第一次大會故態，不再反對，反而支持國民黨。中共復於此時提出反帝、反

軍閥口號，頗能引起國民黨及國人同情。此時中共召開第二次大會，較之第一次大會更有聲色。

此次大會當選中委五人：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與高君宇（註四）。選獨秀為總書記。委員會下設中央政治局、及組織、宣傳、職工、農民、婦女等部。國燾任組織部長，和森任宣傳部長。（註四）

在第二次大會中，吾人所能獲得文件有三：

(一) 中國共產黨組織章程（著者譯自陳公博論文附件五）。

(二) 第二次大會決議案（著者譯自公博論文附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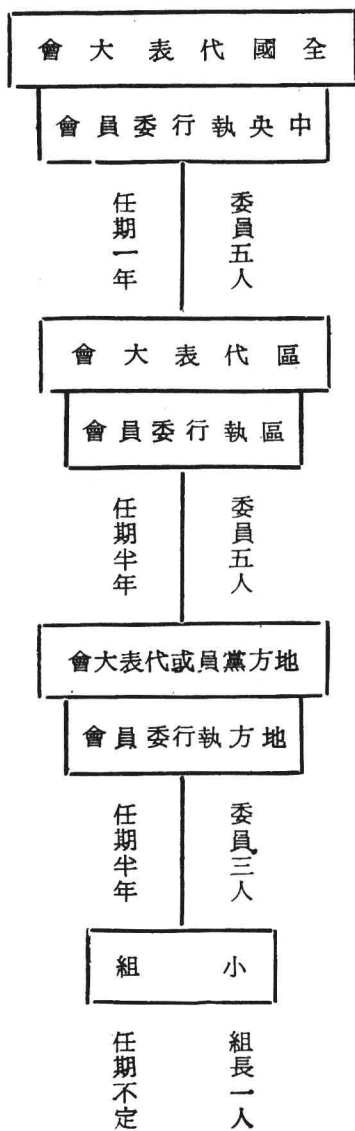
以上兩件他處未見。

(三) 第二次大會宣言。

貳 黨章

第二次大會章程遠較第一次大會「黨綱」為嚴密，組織系統由兩級制變為四級制，如下圖：

第二次大會中共組織系統表



關於各級會期均有明確規定。但監察機關仍付缺如。

關於所謂民主集中制的規定，亦遠較上次「黨綱」嚴密，除選舉與抗議，少數服從多數，略表現民主精神外，上級對下級的控制十分嚴厲：上級對下級可以變更其組織，任免其人員，召集其會議，下級對於其上級必須執行其命令，不得單獨發表意見，非經特准，不得參加其他黨派或担任官吏。

至其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凡國際所認可的黨員即可為中共黨員，則二者直為一體矣。
茲將此項組織章程附錄如下：

中國共產黨組織章程（國文）（一九三二年七月第二次大會通過）

第一章 黨員

- 1 黨員不分國籍和性別，凡信仰本黨主義，服從本黨紀律，並願忠實服務本黨者，即可成為本黨黨員。
- 2 凡願加入本黨者，應由本黨黨員一人介紹於當地地方執行委員會，由該會轉報區執行委員會，再由區會轉報中央執行委員會。經過區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之調查並通過，即可成為正式黨員。
- 3 凡經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承認為第三國際所認可的任何共產黨的黨員，即可成為本黨黨員。

第二章 組織

- 4 在每一村莊、工廠、鐵路、礦場、軍隊團部、或其周圍的社團內，已有共產黨員三人至五人時，即可成立一個小組，選舉組長一人，在當地支部的管轄下執行任務。在尚未設置支部的地方，區執行委員會得決定安排該小組於最近地方的支黨部之下，或直接受區黨部的指導，在區執行委員會尚未設置的地方，該小組則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和指揮，在設有兩個小組以上的地方，該地方執行委員會得指派黨員若干人為各小組之地區代表。小組的組織為本黨組織的正常辦法，並形成訓練與活動的單位，所有的黨員皆應參加。
- 5 任何地方，當兩個以上的共產黨單位存在時，由執行委員會徵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同意，得派代表至該地方召開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由大會選出黨員三人組織該地方執行委員會。同時，又選出候補三人以備於委員缺席時執行其任務。區執行委員會尚未設置之地區，

得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派代表一人召集該地黨員組織該地方執行委員會，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直接管轄，區委員會的管轄權得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接替。

6. 任何地區，已設有二個以上地方支執行委員會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得派代表召開該區域黨員代表大會，選出黨員五人組織區執行委員會，同時再選出候補三人以備遞補遺缺。在必要時，中央委員會得指派地方支委員會暫代區委員會之職務。區委員會之管轄權如受限制時，可由中央委員會變更之。

7. 全國代表大會選出黨員五人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時再選出候補三人以備遞補委員會之缺額。

8.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一年，區與地方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半年，小組長之任期無定，但均連選得連任。各級地方黨部的職員由該執行委員會全權指派與罷免。

9. 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全國大會的決議，審查和決定本黨的政策和行動，區和地方委員會執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於其職權與能力的範圍內，審查和決定處理事務之方法。各級委員會均應選出主席一人，綜理黨務和財務，其餘的委員們則協助主席處理政治上的問題，勞工困難，青年與婦女運動，每一委員須負一種上項工作。

10. 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法規，應予實施，各地所發生的特殊問題由區及地方委員會特派黨員組成特別代表委員會處理之。當特別代表委員會開會時，應由執行委員一人担任主席。

第三章 會議

11. 小組會議，每星期應由小組長召開一次；在小單位內，所有黨員或小組長應每月舉行聯合會議一次；在各地區內，各單位會議應由地方執行委員會每月召集開會一次，每一地區內全體黨員或各小組長應每半年舉行會議一次，區代表會議，應由區執行委員會每半年召集會議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應在一定期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召集開會。

12. 必要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召集臨時全國代表會議。經多數地區之請求，此項臨時代表會議，亦應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之。

13. 全國代表大會或臨時全國會議的代表人選，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規定之。

14. 有關某一地區的特殊問題發生時，該區上級執行委員會得命令其下級執行委員會召開該地區黨員大會解決之。

15. 中央委員會得隨時派一代表至各地召開特別會議，中央委員會所派代表應為會議主席。

16 中央、地區或地方的執行委員會會議，應由主席召集之。

第四章 紀律

17 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但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則成為最高機構。

18 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應為全體黨員所絕對服從。

19 本黨上級黨部的命令，應由下級黨部執行，如命令竟未見執行，該下級黨部得由中央黨部予以解散及改組。

20 當多數黨員對地方黨部的命令提出抗議時，此項抗議得提請區黨部判斷。當地方黨部對區黨部的命令提出抗議時，則由中央黨部決定該項抗議是否正當，中央黨部的判決遭遇反對時，此項反對意見得提請全國大會或臨時全國會議作一決定。但所有上述命令，在未經各級黨部予以撤銷以前，仍應執行。

21 地方黨部或區黨部以及各小組，皆應實施並宣揚中央黨部所決定的政策，各級地方黨部本身無權決定政策，當有關全國的重要問題發生時，在中央黨部未發表其意見以前，地方或區黨部均不得單獨表示意見，如地方或區黨部所持意見與本黨的決議與所定政策相抵觸時，中央黨部得命令該下級黨部改組。

22 本黨任何黨員，非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同意，不得參加其他的政黨或團體，其已參加者，當加入本黨時，應即正式退出其已加入的政黨或團體，非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不得保留其原有黨籍或會籍。

23 黨員非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同意，不得担任資本主義國家的任何政府官吏。

24 本黨所有政策皆由多數投票決定，黨員必須絕對服從，其至少數投票反對者亦必須服從。

25 黨員被發現觸犯下列事項，應由地方執行委員會予以開除：

a 以演說或行動反對本黨宣言和規則，以及全國代表大會或各級黨部的議決。

b 無故連續不出席會議。

c 三個月不付黨費。

d 無故不履行本黨所指派的任務達四星期。

e 恢復黨籍後的黨員仍不認錯經調查屬實。

f 洩漏本黨秘密。

地方黨部開除黨員時，應將理由報告中央及區黨部。

第五章 收入

26 本黨收入的來源如下：

(1) 每月黨費。男女黨員每人工資在五元以下者，每月應繳黨費一元，超過五十元者，應按月繳納其工資收入百分之十，每月無工資收入或每月收入在二十元以下的工人應繳納黨費二角，失業或被監禁者免繳。

(2) 黨內額外捐款。

(3) 黨外津貼。

27 本黨收入及支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管理之。

第六章 附則

28 本章程修正之權屬於全國代表大會，解釋之權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

29 本規則經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之日起生效。

譯者按：各級黨部英文名稱如下：①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presentatives（全國代表大會），②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中央執行委員會），③Sec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區執委會），④Local Branch Party 和Local Executive Committee（地方支部和地執委會），⑤Group（小組）。

另據「中共透視」五二頁，其組織系統為：中央——區委（轄一省或數省）——地委（轄一縣市或數縣市）——總委——支部——小組。支部為基層組織，小組為細胞。

叁 決議案

關於第二次大會決議案，竟達一萬一千字，此可表示中共在政治思想方面已由簡單變為複雜，亦可表示俄式文章已

傳到中國，此後中共重要文件，鮮不又臭又長者。

在本決議案中，其重要而特出之點，綜述如下：

第一、提出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口號。中共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者更積極剝奪工人階級與侵略中國，中國的豐富資源與無盡的勞動力是帝國主義的戰場。帝國主義支持軍閥以保護自己的特權。軍閥的不斷混戰與暴力壓迫，使中國無法統一。要有一個獨立的統一的中國，必須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

第二、提出「國民聯合戰線」的口號。即企圖與國民黨從事所謂「黨外聯合」，此為在俄共假手於第三國際的指導之下，中共的一個重要動向。大會認為帝國主義與軍閥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敵人」，是以中共要與國民黨聯合從事革命工作。但強調：聯合不是投降，有自己的獨立組織，是暫時的合作，是要在革命過程中壯大自己，並認為：「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期間，在經濟與政治的轉變中，無產階級（按：意指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按：意指國民黨）的決戰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加入第三國際與保衛蘇聯。在第一次大會時，中共已決定加入第三國際，然文字尚較含糊，只是向國際作月報，及得派代表至東方書記處而已。至第二次大會，則「正式決定作為第三國際的成員，完全承認第三國際二十一項的決定，並且成為第三國際的支部」，而簽訂自己的賣身契約。在此項前提下，中國工會置於「紅色國際勞工同盟」之下；中國婦女將被中共組織起來，視共產國際婦女部是「自己的部」，社會主義青年團亦置於「青年共產國際」領導之下。中共要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要支援蘇聯的紅軍，更要反對第二國際和黃色工會。

此外，關於工會運動，決議案要求改善待遇、罷工，從事政治運動，提出「同工同酬」口號——不問年齡、性別、種族、技術……的不同，一律同工同酬，因同工異酬「是資產階級的狡計，使工人階級自相嫉忌」。工運應完全置於中共領導之下，要推翻國民黨和無政府黨等對工會的影響。

中共在二大前兩個月，五月一日，已召開第一次勞動大會於廣州，現在二大對工運又作出重要決議。自是之後，工運在各大城市普遍展開，造成無數的工潮和幾件重大的慘案。

在二次決議案中，關於國內政治問題，提出下列主張：

1. 制止內戰，推翻封建軍閥，統一中國本土（包括蒙古）於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之內。

2.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一個絕對獨立的中國。

3. 承認蒙古、西藏和新土爾其斯坦（按：指新疆）的自治。在聯邦原則之下，再統一於中華民國之內。

4. 保障各種自由，保護工人、農民、婦女與兒童。

此時外蒙赤色偽政權「蒙古人民共和國」雖已建立，但蘇俄在外交上仍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是以中共亦主張蒙古統一於中華民國之內。爾後形勢變遷，中共即不再談此調。

茲將此項決議案附錄如下：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譯文）（一九三二年七月經大會通過）

一、關於世界情況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

自從一九一四年大戰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強大已經衰退了，但是相反的，社會革命的力量已經掀起了高潮。革命怒潮暫時低落的原因，是在無產階級的陣營裡有很多叛徒無恥的投降資產階級，變成了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頑強的敵人。在此種情況下，世界帝國主義者，企圖在全世界恢復他們的經濟優勢，並進攻無產階級。此種計劃的顯著表現是各國資本主義者減低工人的工資，增加他們的工作時間。與這一運動處於對立的地位的是第三國際號召世界上一切無產階級站在聯合戰線上鬥爭，以抵抗資產階級的進攻。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民的國家，她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祖國，她也是世界工人和農民與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決鬥的大本營。目前世界帝國主義仍然是強壯的，不斷的進攻俄國，所以勞動階級與羣衆應該竭盡全力去保衛她。

中國共產黨在二次大會中決定號召中國工人與全世界的工人進入這個戰場，去保衛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抵抗資產階級的進攻；本大會並呼籲中國被壓迫的羣衆幫助保衛蘇聯，因為蘇聯是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先鋒隊。

二、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

第二章 從第一次大會至第四次大會

1. 目前世界的重要經濟情況：

A 世界經濟秩序已經被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壞。

B 資產階級正在進攻無產階級，他們正以加倍的力量在榨取無產階級，去恢復在戰爭中被他們自己毀滅的經濟秩序。無產階級必須團結在聯合戰線上，去抵抗他們的進攻。

C 資產階級正計劃着搶奪原料，並通過戰爭以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勞動階級以彌補他們的損失。在掠奪市場上掀起新的衝突，如日美衝突、英法衝突，這將誘發另一次帝國主義戰爭。

2. 中國有廣大的天然物產和廉價的四萬萬勞工，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的戰場，這個市場較之過去更具有重要的誘力。

3 中國資本主義在某種限度內有了發展，資產階級正在拉攏封建軍閥到他們那一邊去保護他們的特權。外國帝國主義者希望保護其更大的特權，幫助中國的封建軍閥，這將使中國資產階級低落。

4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九一一年革命力量是非常衰弱了。在過去的十一年，中國一直在軍閥混戰與暴力壓迫之下，以致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商業陷於停頓，農民是不可忍受的勞苦，工人的不幸是有增無已。

5 中國本土被封建軍閥盤踞着。吳佩孚謀以武力統一南北，現在又召集舊國會以證明他的誠意，均歸幻滅。

6 因爲中國本土，這些勢力範圍的經濟情況完全不同，中國是不能統一的。中國本土還存在着其他的差異。

7 只有當脫離世界帝國主義的壓迫，推翻封建軍閥，建立真正的統一國家的時候，中國統一的夢想才能獲得實現。

8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定其主要努力如下：

a 制止內戰，推翻封建軍閥，建立國內和平。

b 統一中國本土（包括蒙古）於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之內。

c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一個絕對獨立的中國。

d 承認蒙古、西藏和新疆的自治。

e 在聯邦原則之下，再統一蒙古、西藏和土爾其斯坦於中華民國之內。

f 保障各種自由。

g 訂定法律，保護工人、農民、婦女與兒童。

9 以上目標如獲實現，則一切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現存的秩序上獲得扶助，這些階級應當為上述權利聯合鬥爭。
10 為完成這些目的，中國工人應當團結在中共旗幟之下，一方面參加國民革命戰線，另一方面為改善本身利益而奮鬥。
11 中國工人必須統一各種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構成份子。

12 幫助工人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目標。我們聯合國民戰線，則工人可以開始獲得政治權力，所以建立聯合國民戰線是我們政策之一。

三、關於國民聯合戰線的決議

人類經濟和政治革命構成階級鬥爭。在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期間，由於經濟與政治的轉變，民主主義對封建主義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樣的，當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期間，在經濟與政治的轉變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決戰是不可避免的。

人類歷史是一項鬥爭的紀錄。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大戰迄未中止，民主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也仍在激戰中。尤其是東方各國，工業幼稚，封建主義的力量存在於社會的傳統和國家的主權之中。在這些國家中，人民的生命財產，緊握在軍人的手中，法律的力量和輿論支持這種情況，為了公共福利，民主主義有推翻封建主義的必要。如果無產階級不能單獨進行革命，他們必須支援反對封建戰爭。封建軍閥集團是無產階級與民族主義者的共同敵人。沒有這兩個階級的團結，就不能獲得出版與結社、集會的自由，如果不能保障這些自由，就沒有了一個階級獲得發展的機會，當民族主義者獲得成功之後，他們將轉而希望某種特權，而自然的以他們從封建統治者所取得政治權力的工具壓迫無產階級。到那個時候，若要無產階級的力量超過資產階級，就要靠革命時期所表現過的組織與鬥爭能力。

中國名為共和國，但是實際上被軍閥所控制。對外是一個半獨立的國家，被國際帝國主義者所控制。在這樣經濟和政治狀況之下，在這樣內外雙重壓迫之下，無產階級，因為沒有別的方法去保障自由，只有鬥爭，這就是參加國民革命運動。我們應當認識聯合不是向僅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投降，作他們的臣屬，也不是隨着國民黨的勝利而來的無產階級的完全解放，只是為了我們的需要這一事實，與國民黨暫時聯合以推翻壓迫的敵人——國內的封建軍閥和國外的國際帝國主義。另一方面，無產階級聯合並協助國民黨，並不意味着放棄自己的黨的存在，因為國民黨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不是為無產階級奮鬥。相反的，他們將集合無產階級的黨——在中共旗幟之下——並獨立的為自己的階級而鬥爭。

共產黨不是烏托邦主義者或革命的候選人，而是在任何時候站起來不懈工作的黨。在中國與無產階級經濟與政治狀況之下，我們認為國民革命不僅有利於資產階級，也有利於無產階級。事實上，我們應團結一切的黨派和團體，與國民黨組織聯合戰線，以實現我們推翻封建軍閥與帝國主權的壓迫，並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獨立的國家，我們應號召一切工人和農民在我們旗幟之下共同鬥爭。我們將告訴

他們，這個鬥爭雖然不是完全解除他們的痛苦，而是第一步幫助工人和農民，領導他們走向建立他們的權利之路。我們更要告訴他們，這個聯合鬥爭不是爲了國民黨的利益，我們不是爲國民黨而自我犧牲，我們是爲了暫時的自由而奮鬥，在鬥爭中，無產階級必定不忘，他們自己獨立的組織。

中共第二次大會通過執行委員會聯合國民黨聯合戰線的建議，因爲牠適合目前情況的迫切需要。隨後將擴大如下：

A、國民黨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將在一個適當地點召開一個代表會議，討論集合其他革命黨派的最好辦法，並作成綱領。

B、要求國會議員之同情共產主義者，結爲民主聯盟的左派。

C、召集工會、農會、商會、教師協會、學生聯合會、婦女政治同盟、律師俱樂部、各城市編輯人俱樂部，組織民主聯盟。

四、關於中國共產黨參加第三國際的決議

無產階級是世界性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性的。革命的影響，除非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尤其是東方工業幼稚國家，決不會增漲。這唯一存在着無產階級革命大本營，牠代表世界無產階級，就是新近在俄國革命之後組成的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反對第二國際，後者一方面利用無產階級，另一方面作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傀儡。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黨，第二次大會正式決定作爲「第三國際」的成員，完全承認第三國際二十一項的決定，並且成爲第三國際的支部。

五、關於國會行動的決議

1. 在經濟條件被稱爲進步的國家，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多年來已有發展。國會政治與資本主義平行結合，形成一個幾乎牢不可破的堡壘，在這個影響之下，共產黨成爲統治階級的一部份，注意灌輸他們的革命觀念，以求通過議會的行動，改善情況。這在德、奧、法、意、比的社會民主黨已有前例。

2. 在第二國際投降了資本主義觀念以後，由於戰事的緊張情況，第三國際產生了。第三國際認爲通過議會合法團體的行動有其價值（與第二國際所持的理論相反），於是決定黨員應在現存的統治機構中覓得地位，去糾正第二國際所發出的謬論。

3. 中國落後的經濟鬥爭，一方面成爲資本帝國主義掠奪的場所和殖民地，另一方面成爲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組織的軍閥權力的獵品，早期的革命雖然遍及全國，並未成功，國會議黨沒有堅強地建立起來。雖然召開了各次大會，但經常受到軍事勢力的壓迫，干涉和搗亂。

4.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希望。牠將打入被封建軍閥威脅的國會，共產黨必將反對產生軍閥的政治罪惡及繼續援助軍

關的帝國主義。

在國會中不要忘記宣傳共產思想，在各種集會中應為保護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的利益而鬥爭。

5. 因此，中國共產黨應發起革命的國會行動，承認第三國際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原則。（陳公博原註：第三國際所通過原則，美國報紙常有刊載，此處從略。）

六、關於工會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

中國工會運動很難擺脫與老的行會和手工業幫會的關連。勞工階級的鬥爭只是在某些手工業者或某些工廠特殊情況之下的偶發運動。這些運動不是全國性的。工會組織不堅強，會員人數不很多。瞭解了這些缺點，集中於擴大和專門指導勞工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責任。

根據目前中國勞工運動的情況，我們過去的行動和經驗，和近代歐洲勞工運動歷練的結果，我們採取下列的基本政策：

1. 當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為解除資產階級的剝削而鬥爭時，必須聯合最進步的鬥爭份子——羣衆的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應集中力量以影響那些可能的工會，如鐵路工人、海員、礦工、紡織工人等。

2. 為甚麼要組織工會？牠是要保護工人福利，並為工人福利而鬥爭。工人生產貨物，所以他們應該享受他們所生產的東西。這是工會的出發點。

3. 工會必需明瞭和承認：在資本主義和工人之間沒有共同的利益。兩個不同利益的陣營的衝突是無法調和的。不僅沒有必要去調和資本家與工人的差異，反而有必要去加劇他們的對立。工人一個鬥爭的勝利，將幫助他們再鬥爭。工人組織將在勝利中壯大起來。工人必需為罷工而投下大部份的基金，並且同時，工人必需注意選擇機會，號召罷工。

4. 工會要努力改善工人的待遇。工會要計劃迅速實現工人運動的目標，例如推翻工資奴隸制以建立按照共產主義原則的社會。

5. 當工會組織去改善工人待遇時，應該進一步與勞工立法運動結合起來。我們要提醒各工會，他們必須在要求勞工立法以前強大地起來，並改善勞工的待遇。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勞動立法與改善待遇只能在工會堅強足以威脅政府與僱主時才能實現牠的要求。

6. 有些同志常常堅持工會不應該作政治運動。這是安那其的工團主義，是大錯特錯的。這常使工會變成微弱，處於非法的地位。工會應該為國家獨立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包括普選權、刑法中的罷工權），和在國民黨聯合戰線中佔有一個獨立而重要的地位而作政治的鬥爭，這樣，工人才能迅速的獲得最後的勝利。有人說聯合國民黨革命的力量，僅是一種利用時機的方式，並不是依照共

產黨的主義。這是不對的，這對於無產階級領導自己是很重要的，非無階級的工作者是不會為領袖的。

7. 當工會決定反抗個人，如工廠裡的工頭，或者整個階級的個人，如所謂工廠所有人，這類反抗必須依照共產主義的一般理想來處理，而不是私人的意見不合。

8. 工會對於兩件重要的事必須尋求：一個是「集體合同」，一個是「同工同酬」。個人合同是對僱主有利的，並且便利他們剝削工人。這種方式能使僱主任意僱用和開除工人，和控制工人工資。工會必須堅持個人不得訂立工作待遇的合同或協議。這類合同必須由僱主和僱佣的代表訂立。依據種族、性別、年齡和健康的等級工資，是資本來狡猾和殘忍的欺騙勞動階級的工具。利用這個工具，資本來不但更自私的剝削弱幼的工人，並且把工人階級分成各種派別，差別待遇。使其互相妬忌，同類相殘。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會必須堅持「同工同酬」。不管是中國人或外國人，男人或女人，成年人或幼年人，只要能完成同樣的工作，必須付給同等的工資。不准因生理的或社會差異付給不同的工資。同工同酬不是要把高的工資降到與低的工資看齊，而是要低的工資與高的工資看齊，堅持這兩項原則，是工會的基本任務。

9. 工會的性質與行會大不相同。僱主不得成為會員。另一方面，一切工資收入者都可以成為會員。沒有性別、年齡、宗教、種族、國籍、政治見解、技術熟練或不熟練的歧視。工會不得額外募捐或通過苛細審查以限制會員資格。成立工會，工會是羣衆的，這是我們要牢記的第一件事。

10 各工會的主要行動是和資本來與政府鬥爭；互助互諒是另一個重要的目標，因為工會是一個戰爭的工會，不只是一个保障福利的組織。

11 工會必須有他自己的好學校。牠應化最多的時間去教育牠的會員，工會的實際效果必須當作重要的課程來教，這樣工人的階級意識才可發展。

12 每一工會的結構必須迅速納入堅固的統一，集中有訓練的產業單位。在這樣工會中，不得依照職位組織自治團體，這將削弱工會的鬥爭。

13 在各工會的組織中，閉宗明義第一章是工廠委員會。在特別產業的工廠工人要組織一個工廠委員會作為基本單位，其上組織產業工會，但是委員以有組織的受工資者——工人為限，不准願主會員和勞工代表混在一起。委員會對產業工會不是獨立的。

14 工會僅僅建立於產業聯合之上還不能看作最好的方式。最好的聯合方式是以產業為基地，展覽着以革命改變現況。這樣的一個聯

合是置於共產主義一般紀律之下。聯合整個工人階級，在任何個別組織中工人之間不得鬧磨擦，在全國中，工會不得鬧鬥爭。

15 各國的革命工會與世界共產主義共同作戰。世界革命工會的聯合會是「紅色國際勞工同盟」。(The Red International Labor League) 中國共產黨根據上述原則，應組織工會，並在「國際勞工同盟」旗幟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不應讓中國勞工階級遭受外國勞工流入的傷害，但是應該增加中國工人的工資，以制止外國資本家的剝削。

16 中國共產黨和工會不同的是：共產黨是一切覺悟份子的軍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有一定的主義，是無產者的黨，牠的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工會是一切工人的聯合（不管他們的政治意見為何），來試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教育，來促其向共產主義目標前進，但是前進得比較緩慢。像作戰一樣，每一戰鬥體必須有領袖，大軍在牠的後面前進，共產黨好像是領袖，工人就是隊伍。共產黨在任何勞工運動中是首領，必須要注意工會的行動，並且誠實而勇敢的領導工會運動。

17 共產黨是工會的實際首領和無產階級的發言人。在工會工廠委員會和其他的勞動團體，牠應該組織堅強的黨團，無一例外。

18 當一個共產黨活動於國民黨、無政府黨或基督教會所組織的工會中時，不准引導別的工人脫離這些工會組織。共產黨的技術是增加自己在那些工會中的影響，擴大到能夠推翻國民黨、無政府黨或基督教會的領導地位，而使其控制他們自己。

19 在增強現有的工人鬥爭中，我們共產黨在任何時間預備和國民黨、無政府黨，甚至基督教會合作。但是我們同時要讓他們知道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工人和勞動者的政黨。

附帶決議

上列決議是關於重要產業工人的工會運動，最重要的決議，還有些次要之點如下：

1. 工人所辦合作組織應該是自給自足的，只幫助工人階級的，應該由共產黨經理。
2. 要求共產黨在進步的行會中活動。理由是僱主早晚會被排去，新的同性質的或從事於同種類生產的行會聯合起來組織工會。
3. 在保守的行會和資本案所組織欺騙工人團體中，共產黨也應該參加活動，其中應設共產小組。

七、關於青年運動問題的決議

(11)

隨着機器生產的進步，幼弱者變成爲剝削制度下勞工供應的受害者。在許多企業中，青年勞工軍參加進去，他們變成了一種機器附屬

品和成年工人一樣。他們的待遇，關於工作條例及資本家付予青年工人的報酬，逐漸的較對成年更殘酷。青年工人已經是更被剝削的階級。無產階級青年不僅被資產階級壓迫，甚至在發生衝突時，他們被奴役，以保衛他們真正的壓迫者。各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發展的經過，這種強大的武裝是必要的。成千成萬的強壯青年工人被用作防禦和進攻的武力。帝國主義國家，不僅用他們的武裝去剝削弱小國家，並用來打敗他們自己的勞動階級的反抗和革命。在每次戰爭和叛亂，工人們被組成軍隊，受資產階級驅使，常常去打垮自己的家人和國外的兄弟。似此維持資產階級在商業競爭上的優勢，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億萬正是年富力強的青年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流過血。

在資產階級如此殘酷的剝削和無恥的滿足之下，歐洲勞動青年的先驅者舉起了他們反抗的旗幟。他們為他們的福利而英勇鬥爭，和反對軍國主義。不幸他們為了這個運動，許多青年工人受了黃色社會主義者的玩弄和影響，終於沒有實現他們革命的目的。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柏林會議是國際無產青年人痛恨帝國主義戰爭屠殺的大集合。這次會議已經成功地組織了無產青年紅色國際協會——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青年共產國際提出了一個口號「到勞動羣衆中去」，決定了甚麼是青年勞動者的新任務，議決了領導無產青年獨立運動在國際共產黨政治領導之下。

凡是青年人被剝削的地方就是青年共產黨活躍的地方。他們應該組織和指導他們的追隨者作各種經常鬥爭。這將證明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去吸引他們走向共產革命的旗幟。

依靠勞動階級的智識的增進，把資本主義世界推進他們自己的墳墓的門已經敞着。在青年無產階級運動中最重要的是革命教育，教材可以容易的在他們的日常鬥爭中找到。組織本身應該是紀律構成者；每一個運動應該是訓練青年工人成爲自覺的革命份子的課程。支援世界工人的祖國——蘇俄——的紅軍，反抗資產階級的武裝。

世界的經濟秩序已經被帝國主義破壞了。資產階級現在正在剝削他們本國的和弱國的工人，以便恢復到一九一四年前的經濟狀況。青年工人將首先加入這些計劃。目前的要求是青年工人與成年（工人）團結在國際聯合戰線上去抵抗這個進攻。

(二)

中國豐富的出產和四萬萬廉價勞動力的人民，最近八年以來，已經成爲英、法、日、美帝國主義掠奪和競爭的目標。中國的經濟生命是緊握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手中，政治是握在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封建軍閥的手中，爲了達到自私的目的，盤踞各省，以互相反對。

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經發達到新與資產階級起來抵抗外強，推翻封建主義和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程度，一九一二年以來的沒有成功，因爲牠一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之下。

這種情況決定了少年共產黨在中國鬥爭的任務。青年運動，不只是青年工人經濟與文化的進步而鬥爭，不只是組織他們在共產主義專政和青年國際之下加入無產階級革命隊伍，而是要國民聯合戰線聯合一切青年革命力量，領導他們去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勢力。

共產黨要記着：青年工人的福利是第一目標。承認為國民革命而鬥爭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機會。牠將導致革命的青年羣衆的健全與連繫。

(三)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承認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的綱領和決議是實際革命計劃的基礎，並承認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性。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站在青年工人方面的獨立組織；注意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但是在一般的政治運動的目的上，社會主義青年團應該常常在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

爲了維持這兩方面的緊密關係，並保證在各種運動中合作，本大會認爲兩方從各級派出代表互相商討有其必要。至於怎樣做法，由雙方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和實施。

八、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

(一)

數世紀以來，平等與自由的原則已經成了資本主義文化幌子上的裝飾品。在這種制度下，經濟條件既不平，即不能保證婦女的平等與自由。她們不僅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上成爲廉價的生產奴隸，並且在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之下必須負擔沈重的家務與母職。在這種制度之下，婦女是不會獲得解放的。

婦女開始認識只有蘇俄才是平等與自由的土地。她們獲得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平等權。她們已經擔任了社會建設的實際工作，無須男人幫助。公共產科醫院，公共食堂，兒童的公共浴室和嬰兒院的建立在進行中。這一切證明在無產階級專政五年中婦女所得到的平等與自由，遠較資產階級專政一個世紀中婦女所得的爲多。這又證明了婦女的完全解放只有在社會主義成功後才會實現。

(二)

自從國際剝削進入中國之後，無產階級的婦女已經降到奴隸的地。在幾乎不可忍受的條件之下，她們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以上，而按

受僅有男工一半的工資。在勞動團體中，女工與童工的待遇是最不人道的。

在現有秩序之下，無產階級的婦女是已經被殘酷的虐待了，還有許多本來不是勞動階級的，也被驅入工廠勞動的隊伍中，在中國還有許多婦女被囚禁在封建儀式桎梏之下過着娼妓一樣的生活，對於經濟、政治、教育的權利，無疑的，全國一切階級的一般婦女情況是被剝奪了。中國共產黨除致力於工資平等及女工和童工的特別勞動立法而鬥爭外，也要為中國一切被壓迫的婦女解放而鬥爭，而不問其屬於那個階級。

中國共產黨相信，婦女的解放將在勞動階級普遍解放中受到助力。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她們就能得解救。目前中國共產黨為婦女所要求的是：(一)幫助婦女取得普選權和政治的權利與自由；(二)保障產業中的女工與童工；(三)推倒一切社會儀式和傳統的束縛。中國共產黨對一切婦女大聲疾呼：我們的運動只是達到目標的必要步驟。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婦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前進吧！自由之路正在我們的前面。

(三)

第三國際是世界一切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本營，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一切被壓迫的婦女和一切被壓迫的青年，共產黨婦女國際是他的部。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決定，各國共產黨應設立一個部以領導婦女，婦女部應行選舉。共產黨報紙應闢專欄，中國共產黨決定儘速的採取此項計劃。

九、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

我們中國共產黨，既不是智識份子們的馬克斯學院組織，也不是脫離羣衆的幾個狂熱的共產主義者的團體，我們將是由無產階級羣衆所組成的，充滿了革命精神，情願為無產階級鬥爭的真正政黨，將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由於我們既不是講學的智識份子，又不是狂熱的革命者，我們不要進大學、研究所和圖書館。由於我們是無產者的戰鬥的政黨，我們只需要到羣衆中去，去組織一個「羣衆黨」。當我們組織一個革命的偉大的黨，我們必須記着兩個重要的法則：(一)一切共產黨的行動應該和廣大的勞動羣衆相結合。共產黨人應該到每個工人階級中去教育他們主義。(二)黨的管制中心的目的，是準備和訓練黨員，以便他們於時機成熟時，發動革命。

任何革命的黨，如果缺少嚴肅、集中和有訓練的組織與紀律，那牠只有革命的企圖，而不能堅強鬥爭以實行革命運動。嚴肅的、集中的、有紀律的組織是依照下列的原則形成的：

1. 避免暴亂的情況：組織從中央下至小組要有嚴肅的目標，避免無政府狀態現象，要有集中的和鐵的紀律。

2. 每一個同志要受黨的訓練，在行動上要幾乎與軍事訓練無異。
 3. 每一個同志不僅要在言論上表現其共產意識，更重要的要在行動上顯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4. 每一個同志要犧牲自己的意見、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
 5. 每一個同志必須記着：他一天不替黨工作，就是他一天破壞共產主義。
 6. 無論何時何地，他的言論要是黨的言論，他的行動要受黨的指揮。個人的利益不得與黨分離。任何行動脫離了黨的控制，就完全是個人的行動，而不是黨的行動；這就變成了安那其的共產主義。
 7. 每一個同志應該了解：黨加強他的獨裁和紀律，不是像資產階級的法律和命令一樣，牠是要加強牠的革命準備的意志。
- 二次全國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不是要完成學院式的，也不是烏托邦式的革命團體，而是要完成一個偉大的黨，有效的堅強的去實現無產革命。我們的組織是嚴肅的，集中的和有訓練的。我們的行動不要脫離羣衆。

肆 宣言

第二次大會宣言是中共最早的一篇見之於世的正式公開文件。廣泛論及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非洲、亞洲的壓迫，以及第一次大戰時日本對中國的獨佔與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抵制。宣言指出當時日本支持安福系、張作霖和新舊交通系，英國支持吳佩孚，美國利用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及智識份子。關於華盛頓會議，則一面指為日美衝突，「戰爭必在最近期間內爆發無疑」，又矛盾的認為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由互競的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認為民國十一年四月直奉戰爭是美、英對付日本的戰爭，又認為是年六月陳炯明的叛變是英國支持陳炯明「以剷除孫文派在廣東的民主勢力」，而斷定中國將內戰不已。既反對吳佩孚的武力統一，又反對各軍閥的聯省自治，以為聯省自治在中國本部不適用，而主張蒙古、西藏與回疆應實行自治而用聯邦制度統一於中國。

第二次大會宣言明確提出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口號。謂蘇俄是無產階級革命及民族運動的領導者，必將推翻帝國主義，中國無產階級也應與民族聯合打倒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

宣言主張各階級的聯合戰線：歐戰期間，中國資產階級興起，他們也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廣東政府雖倒（著者按：指陳炯明叛變，事在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但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不會消滅。宣言主張貧苦農民、手工業者 and 無產階級應共起革命，工人「將會成爲領導軍」。等到民主革命成功，無產階級還須實行「與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與貧農組織蘇維埃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中共要利用國民黨以壯大自己，然後打倒國民黨以實行專政的陰謀，自始並不諱言。

茲將此項宣言附錄於下：

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

一、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的中國

(一)

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亞洲做大市場和大掠奪場。在最近一世紀內，資本主義侵略的積累，造成二十世紀血染遍了的世界資本主義巨大骨幹；那些資本帝國主義者由競爭掠奪而出於戰爭，把他們自己造成的骨幹從根本上加以損毀；損毀之後，又想用原法鞏固而且擴大資本主義的建築物，同時他們新的損毀事業又正在準備進行中——這種循環式的趨勢，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在現今這般資本主義進程中，全世界有十二萬五千萬的殖民地 and 被壓迫國的人民（還有資本主義國家裡數萬萬的無產階級）輾轉流斃於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等處極少數銀行家、工業家和他們政府重壓之下。除非把世界資本主義的組織完全剷除，這種殘酷的現狀是決不會消滅的。這個現象最值得弄個明白，因爲個個中國人（不但是勞動階級）都應當知道他自已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獲得最大的市場，來銷售他過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奪的市場，只有印度、中國、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麗、墨西哥、安南、南洋羣島、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奪取那些市場的競爭是免不掉的。競爭的結果，便須訴諸戰爭，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殺，便是發源於英、德兩系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爭奪近東市場的衝突。

上次世界大戰的成績，即是屠殺了數千萬的勞動羣衆，瓜分德國的殖民地，毀滅德奧等的經濟基礎，使他們變爲英、法的殖民地，並把全世界的經濟秩序破壞無遺。

戰後，那些帝國主義的國家又企圖恢復戰前經濟原狀，來挽救資本主義根本覆滅的厄運，更想將戰爭的鉅大損失取價於全世界的勞動羣衆；因此，他們先後在巴黎、華盛頓、日內瓦等處開分賊會議，假借「和平」「正義」等名詞以掩飾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耳目，但那爭奪宰割世界而引起劇烈衝突的真相，已暴露無餘。他們那些不可消滅的利益衝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

帝國主義者開多少次的會議，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將來的戰爭趨勢和英、法非相見於疆場不能解決的衝突，不過他們常常被逼着去救濟資本主義無法挽回而日見擴大的世界經濟恐慌，冀圖避免社會革命的銳利鋒芒，故不得不藉此種會議的分賊妥協行爲，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來拉蓋他們中間的裂縫，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戰時期。同時並可在此苟延期間之內，加勁劫奪殖民地 and 弱小國家的富源和勞力，一方可以勉強按住他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使之不能即時脫離羈絆，俾得從容補償前次大戰的損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的和軍事準備。

許多年來，東亞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國鐵蹄壓迫之下，上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侵略東亞各民族又更加厲害。美國勒住菲律賓羣島，一面用假裝慈悲的態度，一面繼續他的經濟侵略，不稍放鬆。英國扼着印度的喉頸，剛柔並用的壓倒印度獨立運動，以維持每年一百萬印度勞動羣衆死於英國資本家的長爪之下的現狀。安南農民更是奴伏在法蘭西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牛馬一般的種出米穀來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儘可每年餓死多少萬種米的農民，但何時都缺不了法國米商成千萬石的米量輸出。日本榨取高麗人民的血汗，更是橫暴無比，日貨盡量的輸入，米糧強迫的輸出。使二千萬高麗農民處在飢餓而死的境遇。

帝國主義的列強屢來侵略中國的進程，最足表現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本相。中國因爲有廣大的肥沃土地，無限量的物產和數萬萬賤價勞力的勞動羣衆，使各個資本主義的列強垂涎不置：你爭我奪，都想奪得最優越的權利，因而形成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開始一八三九年英國艦隊的攻擊，這次攻擊，實是資本主義最著名的卑污強盜行爲，因爲他的起因是由於英國政府和商人要強迫把鴉片毒害中國民衆。從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攻打大沽直到一九〇一年義和團反抗「洋人」的暴動促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這四十三年間，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宰割中國的流血時期，也是中國人在歷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時期。二十世紀的開始，已足到了列強因掠奪而互相衝突的形勢。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爲的是爭奪滿洲，戰爭的損失，又挖取中國人的血肉去填補。

帝國主義列強在過去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之內，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國人民是倒懸於他們懸崖無底的巨吻中間，帝國主義者掠取了中國遼廣的邊疆領土島嶼和附屬國，做他們新式的殖民地，還奪去許多重要口岸，做他們的租界，並自行把中國畫成幾個各自的勢力範圍圈，實行其專利的掠奪事業。在中國自己領土之內，三分之一的鐵路爲外國資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鐵路，也

是直接或間接由外國債權主人管理；外國的商輪是在中國的海口和內河裡面自由行駛；郵電是受嚴密監督；關稅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國帝國主義者協訂和管理的，這樣，不但便利於他們的資本輸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國經濟生命的神經系已落在帝國主義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國資本家還在中國佔據了許多礦山，并在上海、天津等商埠開設了一些工廠，鞭策百萬的中國勞工在那些礦山工廠裡，做他們生利的奴隸。同時又加上外國商品如潮的輸入，漫說布疋、紙張之類，舊有的針和釘都幾乎絕了種，因此生活程度日漸增高，三萬萬的農民日趨於窮困；數千萬手工業者的生活輕輕被華美的機器製造品奪去，而漸成爲失業的無產階級。中國因爲每次戰爭都要被索去一批現金賠償，加上鴉片和商品的吸收，現金日見減少，又加上二十萬萬外債連本帶利不斷的盤剝，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廣州幾個外國銀行家的操縱，國家和民衆的經濟生活都陷在極恐慌的狀態之中。帝國主義者還賄賂中國的官僚政客，派遣許多的顧問牧師，出版報紙，設立學校——這是企圖更順利的達到他們貪婪掠奪目的。同時爲防止中國民衆的反抗起見，帝國主義者的列強又掠得實際統治中國人的領事裁判權，并派遣軍隊、警察、軍艦駐守於中國領土之內。

(三)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起後，歐美各國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佔領膠州灣，并用恐嚇賄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條壓迫中國，意在使中國變爲他獨佔的殖民地，從此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就侵入了中國各種行政、財政、軍事、外交及其他一切政治機關的血管裡面，控制中國經濟生命，自由指揮北京政府以完全實現他的侵略政策；鴻溝雖然填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慾望，但是却引起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嫉妒，日、美兩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奪的衝突，於是起了很深一道鴻溝。

到了大戰告終，所請巴黎和會，便是分配德國的殖民地和從新畫定資本主義國家在近東和遠東的勢力範圍的分贖會議；在那次會議席上，日本既是先行獲得中國的利益太多，美國帝國主義者又難於遷就，衝突無從調和，關於中國問題遂擱置而不能爲平均分配的解決。然日、美互爭掠奪中國的強盜行爲，已是表現得極其明白了。

美國既不能在巴黎和會上與日本調和關於中國的衝突，相互獲得平均利益，便企圖組織新銀行團——國際帝國主義的托辣斯，想用經濟優勝勢力，盡量把資本輸入中國，以達到掠奪中國的優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國經濟的主人翁。但日本却已佔得中國領土的最大部份做他專利的勢力範圍，又豈肯輕於讓步，所以新銀行團的計畫未能即時實現。

在這樣日、美衝突狀態之下，形成中國的特殊政治狀況。日本帝國主義者先後扶助安福系、張作霖、新舊交通系等當權的北京政府，

爲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爲實現日本侵略計劃的工具。英國便站在吳佩孚派的督軍後面，爲的是要藉此鞏固他在長江一帶的權利和勢力範圍的推廣。美國却勾結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知識階級分子，想用障眼法來實現他國際托辣斯的經濟侵略政策。但是這種步驟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時發展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處於利益衝突日甚的地位。

(四)

英國在戰後的歐洲市場日被排斥，生產過剩，經濟恐慌，故以發展遠東市場爲救濟的唯一道路，而又陷於與日本衝突日見緊張的地位，同時又發生一個重大的問題；英國還是繼續與日本同盟來壟斷遠東的權利呢？還是和美國聯合來實現共同侵略遠東呢？在這種糾紛之下，就產生了華盛頓會議。華盛頓會議爲的是要從新分配他們在遠東的市場，希臘圖和那不可避免的日、美和英、美的兩種衝突。遠東問題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看來，是他許多掠奪殖民地問題中間的一個，所以英、美戰爭或許可以久延時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這個唯一的市場，在美國也只有這個唯一可供發展的大市場，所以日、美衝突萬難減輕，而戰爭必在最近期間內爆發無疑，華盛頓會議那能爲力呢？不過他們在爆發之前，拿遠東——特別是中國——的豐富物產和勞苦羣衆，攔在各國集於華盛頓的外交家、銀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國的貪慾，從新宰割一次罷了。

華盛頓會議所以標榜減輕軍備，完全是欺騙在軍備負担底下呻吟而將起來革命的勞動階級。軍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柱石，資本主義國家不但需要他來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來鎮壓本國勞動階級的反抗，因此資本主義國家裁減軍備是不可能的。在他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那些主力艦噸數比例和陸空軍備保持的競爭，愈現出帝國主義者怎樣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計劃壓迫勞動者的陰謀。

華盛頓會議中之主要問題——中國問題，是在美國脅制之下解決的，結果，他們承認日本在滿蒙和東部西伯利亞獨佔的掠奪，將中國置在他們共同侵略的「開放門戶」政策之下。美國之所以採用海約翰以來的舊調，完全是要藉着這個「開放」來打破日、英在中國的优势，讓他們自己插足進來，操縱中國的經濟生命。「開放門戶」政策的採取，顯然是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來駕御中國的英、日同盟雖是廢了，但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國吸血同盟——雖然他的根基極不穩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國所領導的新銀行團，從華盛頓會議算是加了一層保障，將要使農業的中國變成國際托辣斯遺棄的落屬，從此中國的貧苦農民要納租稅給那些外國的銀行，中國所有的實業要歸爲外國銀行的私產了。

華盛頓會議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就是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爲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辣斯的奴隸。因此最近的時期，是中國人民的生死關頭，是不得不起來奮

鬥的時期。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實，都是帝國主義的列強怎樣必須侵略中國怎樣宰割中國工人和農人的貪婪的寫真。

帝國主義者們還口口聲聲唱什麼民族平等，民族自決和人類平等等等好聽的名詞，想把資產階級掠奪無產階級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強國壓迫弱小民族的行爲，輕輕隱瞞過去。但是中國人民受了這九十年被壓迫的經驗，却最易了解帝國主義者所宣稱的平等和自決是什麼意思。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資本帝國主義以後，才能實現平等和自決。

但是被壓迫的中國勞苦羣衆最要明瞭現今世界大勢，才能從受壓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來。最近世界政治發生兩個正相反的趨勢：(一)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二)是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即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國際共產黨和蘇維埃俄羅斯——領導的世界革命運動和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大戰以後，英國生產力停滯，法國經濟破產，美國生產力過剩，而帝國主義者簡直沒有恢復戰前經濟原狀。他們所組織的「國際聯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權利，互相維護其掠奪物的互相保險政策，結果又被他們自己拆散了。

華盛頓會議把日、美衝突弄得更加顯明，日內瓦會議英、法背道而馳，已是回復到比大戰以前的形勢還更危險；大戰的「破壞」既然已將資本主義的牆腳掘掉了一大半，他且夕有發生場倒之可能，還能說及恢復和再造嗎？這便可證明世界資本主義的命運已離他的末日不遠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農民的蘇維埃俄羅斯——全世界勞苦羣衆革命勢力的柱石——不斷的從根本上打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經過五年的奮鬥，勢力日見鞏固；德國和中歐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焰，已達到極烈的頂點，英、美、法、意等國常常發生極可怕的罷工運動，已動搖了資本主義的老巢穴；就是日本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也是聲勢浩大的興盛起來，至於印度、埃及、愛爾蘭、高麗等被壓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戰和俄羅斯革命的影響，獨立革命運動日見有組織，日見緊張，業已驚得帝國主義者心神不寧了。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迅速伸張的確證。

而且這兩種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聯合日趨密切，這個聯合的革命勢力必定會把世界資本主義的枯骨架推到資本主義自己掘成的墳墓裏去。最近數十年之內，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勢力，已是有大進步；而且還會增長起來。但是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一定要併入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壓迫者——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中國勞苦羣衆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有走這條唯一的道路。

二、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羣衆

(1)

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是受他們的操縱的；又因現在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於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軍閥們一方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用唆使，一方為自己的利益把中國割據得破碎不全，張作霖之佔據東三省，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

這樣的情形，即是中國政治上一切糾紛內閣的複雜基礎。

中國目前政治狀況又另開了一個新局面。這個新局面，一方面便利於帝國主義的列強實行華盛頓會議所決定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長中國的糾紛情勢。最近的奉直戰爭，在吳佩孚方面，英、美帝國主義者站在他的後面，為的要協助吳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優勢，達到他們自己把持中國政治中心的慾望；在張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其後盾，帝國維護著名親日派張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內閣，以保北京政府的優越地位。這次戰爭的結果，吳佩孚掃除了張作霖在北京的勢力，但是張作霖在滿洲的勢力并未失墜，仍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做專心掠奪滿蒙的劊子手。吳佩孚戰勝以後，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官僚手裏，這是美國實現對華政策一個絕好的機會。但是美國並不願意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為吳佩孚所主張廢督裁兵如果實現的統一，是與中國資產階級以極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便轉過頭來，與日本強顏攜手，企圖共同利用張作霖、曹錕和其他頑固的軍閥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造成一個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國傀儡政府。英國更又贊助暴亂了反動行為的陳炯明，剷除孫文派在廣東的民主勢力。這樣他們利用軍閥，阻撓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造成軍閥勢力下之有名無實的统一政府做英、日、美的共同工具的計劃，已是顯明極了。即使中國現在能出現一個所謂統一政府，但列強的壓迫不去，軍閥的勢力不除，中國是萬難實際統一的，而且內亂還會不止呢！民國成立十一年，幾乎年年都有戰爭，不是軍閥壓迫民主主義革命戰爭，便是軍閥內閣，如直、皖戰爭和奉、直戰爭等。現在那些督軍間的衝突，無處不現出嚴重的形勢，加以帝國主義者無窮的操縱，因此內亂是有加無已的。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不能成功。因為中國還是軍閥把持和割據的時代，故在現今「統一」呼聲之下，發生兩種矛盾的現象：一派軍閥假聯省自治的名義實行割據，同時他派軍閥假統一的名義壓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長自己的威權。兩派所假借的名義雖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長其政治的命運，則是一樣

的。但是本部各省（東三省在內）經濟上絕無根本的不同，而民國的歷史，若以十年來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據現象便主張劃省為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十年來，一切政權業已完全分於各省武人，若再主張分權，只有省稱為國，督軍稱為王了。所以聯邦的原則在中國本部各省是不能採用的。至於蒙古、西藏、新疆等處則不然；這些地方不獨在歷史上為異種民族久遠聚居的區域，而且在經濟上與中國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為中國本部的經濟生活，已由小農業手工業漸進於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幼稚時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處則還處在遊牧的原始狀態之中，以這些不同的經濟生活的異種民族，而強其統一於中國本部還不能統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結果只有擴大軍閥的地盤，阻礙蒙古等民族自決自治的進步，並且於本部人民沒有絲毫利益。所以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同時依經濟不同的原則，一方面免除軍閥勢力的膨漲，一方面又因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為中華聯邦共和國，才是真正民主主義的統一。

(11)

那些帝國主義者，本來想完全毀滅中國舊有的經濟構造，代以完全由他們掌管的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建築，但是他們畢竟沒有完全毀滅的本領。他們曾經百端阻撓中國經濟自動的改進；如他們不讓中國人民自己建築粵漢鐵路，滬杭甬鐵路及川漢鐵路，強迫清政府借他們的款子來興工，以及他們奪取漢冶萍公司之類。但是這樣阻撓的結果，曾激成劇烈的反抗，對他們經濟的壟斷政策加以打擊。而且外國資本家初到中國的時候，究不能獨立經營，只好借助中國商人和雇用中國賬房、買辦、經紀人之類，做掠奪勾當的中間物。這麼一來，中國資產階級就漸漸完成他們的初步積累階段。大戰期內，歐、美商品不能顧及中國，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國資本家發展的最好機會，如是中國資本主義也漸漸在揚子江流域一帶興旺起來了。

但是壓迫在世界侵略的資本主義極大組織之下的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那能自由發展和自由競爭而達到獨立的地位，只不過做世界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中間物罷了。而且外國資本主義為自己的發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國軍閥，故意阻礙中國幼稚資本主義的興旺。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為要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

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已能結合全國的力量，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北京賣國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運動。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更是中國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但是小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在中國是不會消滅的。還有一層，中國的智識階級，商業的和工業的資產階級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國的愚弄，他們的民主運動才能依正軌進行。

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農民因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災流行，戰爭和土匪的擾亂，軍閥的額外徵稅和剝削，外國商品的壓迫，生活程度的增高，以致日趨窮困和痛苦。近來農民更可分為三種界限：（一）富足的農民地主；（二）獨立耕種的小農；（三）佃戶和農業雇工。第一種佔最少數，第二和第三兩種的貧苦農民至少也佔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貧苦農民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攜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

自從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以來，手工業者，小店主，小屋主也是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加以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增加了手工業者無產階級化的速度。這個大量的羣衆也勢必痛恨那拿痛苦給他們受的世界資本主義，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裏面來。

中國勞動運動已是在第一個階段中發展起來，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為經濟要求的罷工運動，足夠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們的組織近來亦見迅速的擴大。而且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導軍。

（三）

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我們無產階級相信在今日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三、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其目前的奮鬥

（一）

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

我們無產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一步奮鬥是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

（二）

第二章 從第一次大會至第四次大會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工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中國共產黨爲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爲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線裏奮鬥的目標是：

-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共和國。
-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
- 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 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 七、製定關於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

1 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

2 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3 廢除釐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

4 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 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6 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條，是對於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們脫出現下壓迫的必要條件。我們一定要爲解放我們自己，共同來奮鬥！工人和貧農必定要環繞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再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奮鬥！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裏，不至爲小資產階級的附庸物，同時又能爲自己階級的利益奮鬥，那麼工人們要組織在共產黨和工會裏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

埃，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現在他向中國工人和貧農高聲喊叫道：快聚集在共產黨旗幟之下奮鬥呀！同時，向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高聲喊叫道：來和集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一幟之下的工人和貧農共同奮鬥呀！並又高聲喊叫道：一齊來和全世界的革命伙們肩前過呀！只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徑呀！前進呀！共同前進！

打倒軍閥！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爲和平而戰！

爲自由而戰！

爲獨立而戰！

和平、自由、獨立萬歲！

受壓迫羣衆之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國際共產黨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
一九二二年五月
(錄自「紅色文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解放社出版)

伍 對時局主張

在第二次大會前一個月，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共發出第一次對時局主張（註五）。其時，在北方政府方面，吳佩孚已擊敗張作霖，驅逐徐世昌，迎接黎元洪爲總統；南方政府方面，中山先生的護法政府銳意北伐，陳炯明極力破壞，並進行聯省自治。（「主張」發表之翌日即發生陳炯明叛變事件。）由此項主張，可以顯示中共對各方，尤其對國民黨之態度。

第一、對吳佩孚若即若離：其時中共對於「聯孫乎？聯吳乎？」尚游移未定，所以對於吳佩孚尚存利用之意。主張

中說：「我們承認吳佩孚好過張作霖，」他「是反親日派的人」，「倒張去徐是差強人意的舉」。但又指摘吳佩孚是背後也有一種外國勢力的軍閥，他「擁護封建式的武人專政」，主張對南方用兵，是「敵視民主主義」。

第二、反對聯省自治：雖然未提陳炯明，但炯明自在反對之列。主張中於歷述國民黨在民初對袁世凱主張分權，主張聯邦制度，被袁世凱擊敗；民六憲政會議，又因地方制度問題與進步黨爭執甚烈，致北洋軍閥聯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亦歸失敗，而南北戰爭以起，並謂目前所謂聯省分治乃是「聯督自治」，不能使中國歸於統一。

第三、反對好（人）政府派：暗指當時的胡適，明指過去的統一黨章炳麟，進步黨的梁啟超等，都是「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他們「反對繼續戰爭——結果都造成了反動的變亂」。

主張中一直贊成民主主義，認國民黨是「比較革命的民主派」，其時列寧正主張中共與國民黨聯合，中共此種論調顯係受國際壓力之結果。然而中共反對中山先生的護法，「因為多數議員已經失節，不足法定人數。」反對國民黨與軍閥妥協，謂國民黨「希望軍閥自行廢督裁兵，豈不是與虎謀皮！」中共說：他們不排斥和平，但謳歌「把人民從痛苦中解放出來的戰爭」。

關於反帝國主義，主張中較為具體：要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治外法權（著者按：當係指領事裁判權），及收回鐵路管理權。

由這項文件，可以看出中共若干主張，如反對聯省自治，反對好人政府，停止護法運動及廢止不平等條約，均與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所發表主張相符合。這一方面表示中共遷就國民革命，另一方面表示國民黨改組時亦頗受中共影響。

（註一）時間根據所附黨章第十九條。另據中共若干記載，有謂二大於五月召開，有謂在杭州舉行（如「簡明歷史」），誤。依陳公博論文為七月在上海。二大宣言雖記明為五月，但文中提及六月陳炯明叛變事，則五月云者，殆係初稿時間，未予改正。

（註二）依據「中共歷次大會簡況」，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所列者僅毛澤人物，顯然不全。另據獨秀「告同志書」及國黨回憶補入。鄧平山為出席代表，根據陳公博「我與共產黨」。

（註三）據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四十頁。

（註四）據陳獨秀「告同志書」，寄溧青蠟油印本，及國黨回憶。

（註五）見「紅色文獻」。

第三節 第三次大會

壹 開會情況及決議案

在二大與三大之間，陳獨秀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國際四大時，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其時在中共決定接受國際指示紛紛加入國民黨之後。但在會中，拉達克尙對中共代表團嚴加訓斥：你們「滾出孔夫子的共產主義研究室！」「把工人帶到資本主義份子的革命的行列中去！」「議事日程上沒有社會主義，也沒有蘇維埃共和國！」遂由中共代表劉仁靜說明中共執行聯合戰線，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作為「我們爲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國際執委會即於次年一月作成「國共合作」特別決議。獨秀一月返國，携帶此一決議，作為三大主題。（註一）

民國十二年六月，中共舉行第三次大會於廣州。是年一月，孫中山先生已與越飛發表宣言，主張合作；二月，中山先生因陳炯明已退出廣州而走東江，乃重返廣州，組織大元帥府，故中共在國民黨卵翼之下，舉行大會。是次到會者三十人（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載：「中共歷次大會簡况」稱：代表二十七人），包括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張太雷、蔡和森、毛澤東、譚平山等，代表黨員四百三十二人。

此次大會，陳獨秀連任總書記兼中央政治局主席及黨報編輯委員會主席，瞿秋白任宣傳部長（註二），毛澤東首次當選爲中委，留中央工作。討論主題爲國共合作。大會討論情形，毛家史官衆口一聲稱：當時一個極端右傾的代表者爲陳獨秀，主張一切歸於國民黨，取消共產黨，另一個極端左傾的代表張國燾，反對與國民黨合作，認爲合作「混亂無產階級思想。」又謂毛澤東與瞿秋白等在一起，堅決與左右兩極端作鬥爭，使大會正式通過了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決議。（註三）實則此均係事後毛家史官曲筆。中共之加入國民黨，早在民國十一年八月杭州中央會議中決定，無待於毛、瞿之鬥爭。陳獨秀既不會主張取消共產黨，張國燾亦不致堅持反對與國民黨「合作」。且獨秀時爲家長式領導，毛亦不敢對之「鬥爭」。

三大通過九項決議案（註四）：一、C P 應為國民革命之領導。二、C P 鑑於國民黨在國民革命運動歷史上的經驗，承認其為革命運動之中樞。三、C P 應個別加入國民黨（追認杭州中央全會之決定。）四、重新決定黨綱，計十六條（當係下文「貳、黨的任務」）。五、C P 應特別注意於廣東國民黨統治下極力發展工農群眾運動。六、嚴格的執行黨的紀律。七、限期成立各重要企業之全國工會組織。

以上決議案原文均未發現，僅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彈劾案中摘錄其「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見下文第四章第二節，貳）主張應遵從國際決議，中共應加入國民黨，但仍保存中共自身組織，並努力從工人團體中，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份子，擴大組織，謹嚴紀律，以立強大的共黨基礎。此決議案要求中共在國民黨中應注意：（一）保存中共自身的反帝、反軍閥的面目；（二）阻止國民黨只重軍事而忽視羣衆傾向，政治上的妥協傾向，及勞動運動的改良傾向；（三）黨員與團員應團結一致；（四）使國民黨親蘇聯而遠列強。

此次決議要求中共應將國民黨組織擴大至全國，並加強國民運動之宣傳。尤着重使「有階級覺悟的份子盡量加入我們（中共）的組織」；普遍宣傳「國民革命運動中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必要。」

此次大會並命令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亦應保存團的獨立組織。團須受（中共）黨的指揮。在國民黨中團員應贊助（中共）黨員的主張。

貳 黨的任務

關於黨的任務，可視為中共一般政綱如下：

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譯自波多野乾一「中國共產黨史」一卷一章四七、四八頁。）

- 一、廢除帝國主義列強不平等條約。實行保護關稅。限制外人在華教會、學校、工廠和銀行等的設立。
- 二、驅除軍閥，沒收其財產，充公共生產事業之用。
- 三、鐵路、銀行、礦山和大生產事業國有。

四、實行普選。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廢止治安警察，及壓迫罷工的刑法。

六、公私法上男女平等。

七、人民有德權、罷官權、撤回代表權及廢止法律權，中央及地方重要官員民選。

八、西藏、蒙古、新疆、青海與中國本部的關係繼續存在，但各該地得實行民族自決。

九、全國各鄉應實行地方自治，以辦理當地事務。

十、劃一貨幣制度。禁止濫發輔幣及外幣的流通。財政公開。

十一、廢止釐金，徵收所得稅及遺產稅。每年查定租稅一次。

十二、實行義務教育。教育與宗教絕對分離。嚴格保障全國教育經費。教職員年功加俸，給與年退休金。

十三、改良司法。廢止體刑及死刑。免除一切訴訟手續。

十四、廢止募兵制。實行民兵制。軍隊會計公開。

十五、供給並改善都市貧民住宅。制定限制房租法律。

十六、限制日常消費品的最高價格。

十七、關於農民利益的特別要求：

a 劃一並減輕地租。

b 制定限制地租法律。承認農民協會的地租增減權。

c 改良水利。

d 改良種子及地質。國家貸予貧農種子及農具。

e 規定重要農產品的最低價格。

十八、關於工人利益的特別要求：

a 廢止包工制，承認工會團體契約制。

b 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禁止日以繼夜的勞動。

第二章 從第一次大會至第四次大會

- c 每週應繼續休息三十六小時。
- d 男女同工同酬，女工生育期間前後休假六週，不得扣除工資。
- e 禁止未滿十四歲的童工。十四歲以上至十八歲的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過六小時。
- f 規定工廠衛生及勞工病院。
- g 制定強制勞動保險。
- h 救濟工人失業。

叁 宣言

關於大會宣言，於分析國內軍閥混戰之後，提出「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並希望國民黨放棄依賴外力及專重軍事而忽視羣衆的舊觀念，「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但中共始終以擁護工人及農民利益爲自己的特殊責任，而以「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爲自己的特殊使命。

茲將此項宣言照錄於下：

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

中國人民受外國及軍閥兩層暴力的壓迫，國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險到了極點，不但工人、農民、學生感覺着，即和平穩健的商人也漸漸感覺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紛亂兒戲；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工會、學生會日在壓迫權殲中；山東、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之藉端要挾，并要拿回華盛頓會議所賞的利益；沙市、長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強令棉花出口，吳佩孚、齊燮元爭相製造廣東之戰禍，吳佩孚、蕭耀南合力助成川亂；又若未來的奉直戰爭及直系軍閥之內鬨！——在在可以證明內憂、外患更復加於國民之身，除集合國民自己之勢力，做強大的國民自決運動，別無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證明本黨一年以來號召的：「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運動，不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不幸中國國民黨有兩個錯誤的觀念：（一）希望外國援助中國國民革命，這種求救於敵的辦法，不但失了國民革命領袖的面目，而且引導國民依趨外力，滅殺國民獨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於軍事行動，忽視了對於民衆的宣傳，因此，中國國民黨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領袖的地位，而且一個國民黨不得全國民衆的同情，是永遠不能單靠軍事行動可以成功的。

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同時希望中國國民黨斷然拋棄依賴外力及專力軍事兩個舊觀念，十分注意對於民衆的政治宣傳，勿失去一個宣傳的機會，以造成國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

中國共產黨鑑於國際及中國之經濟的政治的狀況，鑑於中國社會的階級（工人、農民、工商業者）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個國民革命，擁護工人、農民的自身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忽忘的；對於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我們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

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

（錄自「紅色文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解放社出版）

在米夫所著「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中曾指出此次大會第三國際的指示，而大會對第三國際所指示「土地革命」未予通過，米夫曾加以指摘，自是毛家史官無不隨聲附和。國際此項指示如下：

「爲要發展民族革命與建立反帝戰線，就必須同時發展農民反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祇有能够吸引中國人民基本羣衆——小農——參加運動，這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因此，中共就應要求工、農聯盟的實現，其辦法爲不倦的宣傳和實際上實現土地革命的口號；如沒收地主及寺院廟宇的土地，無代價的交給農民，取消苛租、現行稅則、稅卡、包稅制、官僚制度，建立農民自治機關，以處理被沒收的土地等等。」（共產國際執委一九二三年五月給中共三大的指示。）

肆 對時局主張

在三大之後，中共中央兩度發表對時局主張，一爲「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發表於民國十二年七月，一爲「第三次對於時局的主張」，發表於十三年五月。（註五）

民國十二年六月，直系軍閥驅走黎元洪，曹錕正準備賄選總統，大不理於人口；而是年在京漢鐵路發生「二七」慘案（參閱第五章第一節），致中共與吳佩孚絕緣；此時中共份子已紛紛加入國民黨，是以中共對曹、吳不再存幻想。中共中央在其「第二次對於時局主張」中歷指當時「幾個錯誤觀念」：(1)擁黎，(2)擁段，(3)國會南遷及製憲，(4)西南聯省自治及(5)借助列強；而要求「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開一國民會議……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够製定憲法，才能够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也只有他能够否認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組織政府統治中國之權」。

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在當時直系權力方張之際，顯然不切實際。直到十二年各方討伐曹錕，在奉軍入關，馮玉祥倒戈，直系潰敗，段祺瑞執政之際，中山先生於是冬應邀北上，此項主張始由中山先生正式提出。

至十三年五月，中共「第三次對時局主張」時，曹錕業已賄選登場，中山先生已申罪致討，而中共「主張」中僅要求「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推翻直系軍閥，解除一切軍閥武裝」，反不提國民會議，殊難索解。

（註一）關於國際四大，參閱 Robert G. North:「莫斯科與中共」。

（註二）此係根據「中共透視」及有關資料，但羅秋白「多餘的話」僅稱一九二三年與陳獨秀歸國，在上海大學執教，在黨內只作「一點宣傳工作，編『新青年』，未提當選中委。

（註三）參閱①米夫「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曾指左右傾的錯誤。②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指陳獨秀右傾，張國燾左傾。③胡喬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四三與四四頁及④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四九與五二頁。

（註四）「中共透視」五六、五七頁。

（註五）兩個文件均「見紅色文獻」

第四節 第四次大會

參加國民黨剛好一年，中共第四次大會舉行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地點在上海。其時正值曹吳倒台，奉、馮軍入京，擁馮祺瑞爲臨時執政，共邀中山先生北上抵京，號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際，此兩個口號，本爲中共所同調，國共關係尙能相安。馮自由等的護黨同志會雖於同月成立，似尙未發生力量與影響（參閱第四章第三節）。段祺瑞以善後會議抵制國民會議，亦正在中山先生與之折衝之中。

壹 三大至四大間中共之活動

自三大大會至四大大會，時間相去一年有半，在此一年半中，中共之重要活動概況如下：（註一）

第一、加強各地黨之領導，派多數中央委員及號稱第一流之得力幹部，分任各區區委書記——如派陳延年爲兩廣區委書記，羅亦農爲江浙區委書記，毛澤東爲兩湖區委書記，張國燾爲順直區委書記等。

第二、民國十二年七月間，C P發表第二次對於時局之主張（見前）。

第三、共黨中央理論機關雜誌「前鋒」，於同年七月一日創刊，由陳獨秀主筆，彭述之編輯。新青年改成季刊出版，由瞿秋白編輯，名義上仍由陳獨秀任主筆。其時共黨中央提出「提高黨員之理論認識」之口號。

第四、同年八月，S Y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五、共黨中央在上海民國路振業里口，開設「上海書店」，作爲共黨之總發行機關。復命各省區委於可能範圍內開設書店，以銷售共黨刊物，於是湖南共黨在長沙開文化書社，在湘潭開湘潭書店，江西共黨在南昌開明星書社，廣東共黨在廣州開國光書店，在潮州開韓江書店，山西共黨在太原開明星書店，安徽共黨在安慶開新院書店，山東共黨在青島開青島書店，海參威中國共黨支部開五一書店，四川共黨在重慶開新蜀書店，浙江共黨在寧波開寧波書店。共黨之發行機關，幾遍全國矣。

第六、同年十月二十日，S Y之中央機關雜誌「中國青年」在上海創刊，由S Y中委惲代英主編。

第七、同年十月，共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在國民黨內的努力及其態度」之決議案（其內容，完全指示如何破壞國民黨，如何吸收國民黨青年，如何離開國民黨幹部，及如何利用國民黨活動等）。

第八、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國際共產黨領袖列寧在莫斯科逝世，中共及青年團均擴大宣傳，藉此吸收新黨、團員不少。

第九、同年二月六日，全國鐵路總工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主要負責份子全係共黨，故該會完全在共黨操縱之下，共黨且於該會組織黨團，由羅章龍、林育南等負責。

第十、同年七月十三日，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亦在共黨操縱之下。

第十一、同年九月十日，中共以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第三次對時局之主張。

第十二、同年十二月，中共煽動上海紗廠工人罷工。

第十三、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指令各地共黨，發起擁護國民會議運動，在各地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表面上擁護中山先生主張，實際上操縱各地國民會議促進會，以為將來操縱國民會議之基礎。

貳 開會情況

此次大會情形，據早期中共史書「簡明歷史」所載，甚為簡略，僅謂中共人數達一千（後期史書有謂九百五十，有謂九百八十），青年團員二千（米夫「奮鬥十五年」稱約有九千。）出席代表，後期各書均謂二十人。但「中共透視」謂七十餘人，指定上海大學，上海書店等十餘處為招待所。「簡明歷史」所記會議過程，僅謂所討論者大致為以前大會所議決之議案，皆無變更，至於如何應付北方一事，亦為最重要問題之一。孫博士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一事亦經討論，以孫已北上，「擱置」。似此，可謂無甚內容。至米夫之「奮鬥十五年」則謂：中心問題為羣眾工作問題。大會對於中共加入國民黨的任務有確切說明。大會通過修改黨章及關於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等問題的決議。

關於如何把反帝鬥爭與工、農及小資產階級之日常的局部的迫切利益的鬥爭配合起來問題，大會亦有詳細的討論，大會着重指出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重要意義，在決議案中說：

「忽略工人經濟鬥爭，不僅要使工人階級本身受到損害，必然要減弱民族解放運動。」

在農民問題上，大會提的太不充分，且未將「沒收地主土地與農民」的口號聯系起來。

米夫此項敘述，羌無故實，例如關於工、農、婦、青等決議案原文未見，即所修改之黨章亦無從搜得。（註二）

所有後期中共史書，雖文字略有出入，而其內容無不本此。

其爲人所周知者，爲陳獨秀繼續任中央總書記，瞿秋白當選中委（註三），毛澤東未參加大會。蘇兆徵當選中委，爲工人分子參加中央之始。

叁 宣言

四大宣言爲目前所能獲得之唯一文件。

宣言照例攻擊國際帝國主義利用軍閥，製造戰爭，歌頌第三國際領導革命。對奉系、馮系軍閥亦無恕詞，尤着重攻擊段祺瑞的善後會議，而努力支持國民會議。

茲將此項宣言錄後：

第四次全國大會宣言

工人們！農民們！全中國被壓迫的民衆！

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當國內戰爭正烈之時，曾向你們表示過自己的主張和態度。

直系軍閥雖然一時傾覆，而現在又圖重新保持其力量，把國內戰爭延長不息。在別一方面，反直系、奉系、安福系，反最動的段祺瑞以及基督將軍馮玉祥，雖然將北京政權孤住了，但是他們不僅不能統一中國，消滅軍閥戰爭，並且他們自己仍舊耍着軍閥的老把戲，爭權奪地，無有息時，他們所與人民的，不過是教工人及無數窮苦的農民更爲遭殃，更爲受苦。

無論直系或反直系軍閥的背後，都站立着列強的陰謀，他們爲着要干涉中國內政，不斷的援助軍閥戰爭以與中國人民爲敵。英美帝國主義者利用治外法權，在租界裏面給失意軍閥齊發元等以機會，教他組織勢力，繼續戰爭，但是另一派軍閥匿居租界有所動作時，他們便把他捉住，並逐出國外。這兩種行動，在表面上雖然不一樣，但是其目的都是要加緊中國的內亂，都是要利用軍閥，以達到他們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美國的軍艦早已停泊在南京，近又在菲律賓調動大批海軍向我們的海岸進迫。每一個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機關報，總是天天高喊什麼有積極對華政策之必要，他公然號召列強用武力干涉中國。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次國內的戰爭，比較別國更會利用機會，然而也就因此引起與英、美帝國主義者的關係更加衝突。現在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圖藉口中國人民的願望，要他的敵人（英、美各國）對於他有所讓步。

日本帝國主義者又重新要立在爲中國人民「保護者」的地位，如以前在歐洲大戰，袁世凱時代和凡爾塞會議時代一樣。日本爲掩飾自己強盜的行爲和趨向，已開始宣傳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和「亞洲人的亞洲」之口號。

工農們和被壓迫的民衆！中國共產黨號召你們起來，努力對世界帝國主義迎頭痛擊，努力打消帝國主義者的陰謀。

世界帝國主義者確實想把中國變爲殖民地，將中國人民淪到萬劫不復的地位！

中國人民應當知道，世界帝國主義者以美國爲領導，去年秋季在倫敦曾經共同籌劃了一個反對歐洲和亞洲人民的陰謀。他們所走的道威斯計劃是什麼東西？就是一方面要把德國變成英、美的殖民地，而另一方面要把德國工人所生產出來的商品找一銷場，好教英、美的銀行家和工業家更加發財致富，爲着要強迫東方特別是非達到此目的不已。

在歐美、我們已看出反動的現象，世界的反動勢力正在聚集向勞、農的國家蘇俄進攻。列強的銀行家和資本家絕不能靜聽着他們的商品不能自由地輸入蘇俄，一定要把蘇俄陷於奴隸的地位。他們更不願意丟却這麼一個好市場的中國！他們老喊着要保全中國的市場，他們一定要成爲中國財富的主人，一定要陷中國人民爲他們的奴隸！

爲着要達到這目的，所以要供給中國軍閥以金錢、火藥，所以美國要擴充太平洋的海軍，所以英國要在新加坡建築軍港，所以他們都派軍艦到我們的海岸和揚子江及西江等內河來。

爲着掩飾自己的貪慾，帝國主義者更說他們自己愛和平，主張和平主義，最近期中戰爭是不可能的，應當創造世界永久的和平……這些好聽的話。帝國主義列強的外交家，現在更加不知羞恥地說什麼列強間邦交和睦，什麼對中國人民懷着善意……等鬼話。當帝國主

義者說這些說話的時候，完全不看看列強軍費之如何增加，軍艦、飛機、軍事工業之如何擴充，大家對於快要爆發的戰爭之如何準備。工、農們和被壓迫的民衆！在這些事實之前，世界帝國主義努力擴充軍備，努力發展軍事工業以及那些被金錢收買的各國的學者盡力尋找殺人的武器之時，東方的人民是如何危險！東方人民自衛的武器，比較起來，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小玩意兒，如何是他們的對手！將我們的國土變爲荒漠，將我們的城市和鄉村變爲墳墓——這一種危險就在眼前啊！

但若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暴動起來，反對自己的壓迫者，將這些武器拿到手裏，同時東方被壓迫的民衆起來反對自己的軍閥，用自己的力量發展國家，對外國帝國主義施以最後的總攻擊，那末，世界帝國主義之破壞力量也可轉變爲反對其自身的工具。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總機關——共產國際，已經組織了無數萬的工人立在社會革命的紅旗之下，共產國際下的紅色農民國際，也已經聚集了無數萬的農民環繞着紅旗。世界工業的軍隊和帝國主義的武備並非生長，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勞、農與資本統治之最後的鬥爭日見逼近了。

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責任上，很誠懇地向中國的勞動羣衆不斷說：勞、農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之鬥爭已臨近了，這種鬥爭將永遠把人類解放出來，將永遠消滅一切的戰爭。中國共產黨以爲不斷地向羣衆解釋：用什麼方法中國人民纔可以脫離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如何纔與世界勞、農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是自己唯一的責任。

中國的解放運動，現在已日見澎漲起來，全國各城市裏面的羣衆現在努力達到召集國民會議的要求，差不多都組織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學生現正組織這種機關，並且高叫着消滅一切軍閥陰謀，反對段祺瑞所要召集的軍閥善後會議。中國共產黨正式向中國人民說：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是段祺瑞要用軍閥制度，而藉着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以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這個善後會議，如段祺瑞所預料的，將成爲段氏團結已派軍閥的工具，藉此工具以對付別的軍閥而引起將來無窮的戰爭。

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的勞動羣衆，起來制止段氏這種惡劣的計劃。倘若國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參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後會議，段氏對於召集國民會議之虛偽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國民會議促成會是人民真正的機關，應當要求在善後會議中有大多數之國民代表。中國共產黨不僅盡力向羣衆解釋軍閥愚弄國家之巨大的危險和帝國主義者擴張軍備對於我們是如何的可怕，並且要使中國民衆知道國內軍閥不給人民召集國民會議及組織羣衆的保護國家利益的機會，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所加於我們的危險將更爲擴充。

我們號召工人和農民、手工業者和智識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組織，並極力贊助國民會議促成會，要求國民會議之召集。無數萬中國民衆的命運真不能再靜聽軍閥的愚弄了！革命的力量在我們國家中日長一日，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鎖鍊已經開始搖動。

英、美所扶植的直系勢力之崩壞是民族革命運動進展的機會，但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又謀重新制服民衆的運動。他們正在那裏預備最嚴酷的反動，我們應當明白現在時機之迫切啊！

中國共產黨將使中國解放運動由自然的歷程生長進於覺悟的狀況。我們惟有在民衆的組織中，在召集國民會議的要求中，在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奮鬥中，才能找得一條出路，才能避免現在資本帝國主義世界的危險。

工人、農民、學生、手工業者，你們趕快組織起來，趕快制止軍閥的陰謀，趕快要求在替後會議中參加最大多數的國民代表，趕快努力國民會議之召集！你們趕快組織大示威運動反對外艦駛入中國內地，要求外兵不得駐紮我們的領土以內，要求取消一切領事裁判權！要使中國不陷於奴隸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國勞苦羣衆的努力，完全靠着全世界勞、農聯合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奮鬥！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錄自「紅色文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解放社出版，國民黨中央六組藏。）

肆 四大後之中共中央（註四）

至此次大會當選中委，除陳獨秀以中委兼總書記爲人所周知，瞿秋白在其「多餘的話」謂自己當選外，其餘當選者，據張國燾稱，尚有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項英、王荷波等人。張國燾時在北京，會後始至上海。毛澤東未參加大會，亦未當選。

大會在國際代表吳廷康指導之下舉行。會後，中央委員會常在吳寓舉行，出席者爲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四人，討論政策性問題。吳廷康爲人尚謙和，與中共中央諸人合作頗佳。另有工作會議，討論實際工作問題，吳廷康不參加，而由負責宣傳之彭述之，少共中央書記任弼時，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留俄學生）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劉少奇、李立三，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向警予（蔡和森妻，與彭述之有染）等參加。

中共中央組織及人事分配：設秘書處，在總書記指導之下，王若飛（留法學生）任秘書，司文書、財務、發行及交通等工作，經費則由國際供給。組織部長由獨秀兼任，宣傳部長彭述之，「嚮導」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編。工運負責人爲張國燾、李立三、劉少奇（主持安源路礦工會）、鄧中夏（主持北方工會，但已不能立足）、項英、林育南（武漢秘密工作）、李啓漢（剛出獄）、王荷波（浦口鐵路工會領袖）。李立三負上海工運之責，餘人則派赴各地工作。（不久即發生「二七」慘案，又不久發生「五卅」慘案，中共中央設軍事部，由國燾兼任部長。直至北伐軍至武漢時，國燾奉派至武漢，軍事部長由周恩來繼任，自是周常負軍事工作之責。）

（註一）「中共透視」五八至六十頁。（註二）中共黨章，除第一次大會「黨綱」及第二次大會黨章已由著者譯載外，目前所能獲得者僅爲六大以後黨章。（註三）瞿秋白：「多餘的話」（註四）張國燾回憶。

第三章 國民黨的容共與改組

中共份子之加入國民黨，其性質與一般革命者加入無異，國民黨初不承認共黨的對等地位。中共黨員之在國民黨中，亦始終以國民黨員地位出現。但在民國十六年武漢共黨猖獗一時，高呼所謂「三大政策——聯俄、聯共、農工」及「國共合作」口號，竟將中共地位與國民黨地位等量齊觀，且有喧賓奪主之勢。是年四月，汪兆銘自海外歸國，前往武漢，吳稚暉爲文責之，提出「容共」名詞，謂國民黨只容納共黨份子，而非聯絡共黨。此後「容共」一詞普遍引用，本書因之。（一說容共一詞乃中山先生所定。）

第一節 初步接觸

壹 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大會與東方民族會議

共產國際於民國八年三月召開第一次大會於莫斯科，中國即有代表出席。十年第三次大會，張太雷前往參加。十一月，共產國際在伊爾庫茨克召開東方民族會議，明年一月移至莫斯科繼續舉行，其宗旨在抵制同時舉行之華盛頓會議，後者目的除列強限制軍備外，並着重調整其在遠東之均勢，頗有利於中國，是以列寧必欲破壞之。對於東方民族會議，中共事先由代理中央委員長周佛海（陳獨秀於九月自粵返滬，被捕），利用報紙、演講及各種集會加以宣傳，復派劉仁靜赴北京，包惠僧赴廣州，本人赴長江一帶尋覓代表。所覓得者多數爲學生，冒充工人及商人，亦有國、共黨員，湊成三十餘人代表團，分批送往俄國。共產黨人有張國燾、蔡和森、卜士琦（道明）等。國民黨人有張秋白，尚有女代表黃璧魂，自命爲中國婦女領袖，向莫斯科要錢作爲中國婦女運動之用。此等代表既無組織，在會議席上亦無一致意見，然於抵制華府會議已盡其能事。時俄國受共產主義破壞之餘，正陷於飢饉，對各代表之供應雖極力張羅，然仍予人以惡劣印象，因而對共產主義頗有懷疑者（註一）。此次會議，爾後陳獨秀在其「告同志書」中，稱之爲「本黨領導國民黨及其

他社團代表參加。」

對於此次會議，國燾回憶有較長之記載。國燾等於十月離滬赴海參威，經赤塔，此段鐵路破壞不堪，由赤塔至伊爾庫茲克，情況稍好。其時俄國經濟凋殘，人民普遍陷於饑饉，俄共宣傳，列寧每日也只分配麪包四分之一磅，而對於代表則供應豐盛。在伊爾庫茲克共產國際設有遠東局，負責人施瑪斯基，集黨政軍權於一身。局下設有中、蒙、日、韓等部，以指導各國共黨。各國代表在「伊」埠兩月，並未開會，至一九二二年一月，得莫斯科電，群往，大會始於元月二十一日舉行。各國代表及若干留學生出席者共一百六十餘人。主席爲 N. I. Novikov，有主席團，張國燾爲主席團之一。並推列寧、托洛斯基、史達林、片山潛等爲名譽主席。中國代表均不懂俄文，留學生如劉少奇、彭述之、卜道明等之由上海外國語文學校送至東方大學者，亦尚不能翻譯，瞿秋白因肺病在療養中，所以中國代表有如盲啞。所有文件亦均棄擲。大會所討論者爲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合作問題。大會閉幕式舉行於列寧格勒。

會中，張秋白、張國燾及另一中國鐵路工人代表鄧培均獲往見列寧。列寧衣着樸素，不做作，狀如一鄉村教師，懂英語，聽人陳述，非常仔細，似重聽。列寧問兩張，國共可否合作，均作肯定答復，甚感滿意，並告鄧培，鐵路工運非常重要，俄國革命成功，得力於鐵路工人不少云。

貳 馬林與吳廷康之奔走

民國十年七月，中共第一次大會時，出席指導者有第三國際代表吳廷康與馬林，如第一章第一節所述。民國九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時，馬林爲第三國際「民族與殖民地委員會」秘書，亦即前節所述「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決策之要角。此次來華，負有令中共與民族主義者建立聯合戰線之任務，吳廷康與馬林四出奔走，請見吳佩孚、陳炯明及中山先生。俄共初欲勾結佩孚，先上以「開明軍閥」尊號。吳廷康會因李大劍之介紹會見佩孚，而李大劍與佩孚之關係則通過其友人孫洪伊及佩孚政務處長白堅武所介紹，李大劍且數度至洛陽會見佩孚。佩孚與親日之張作霖對敵，俄共早感興趣，民國九年十月九日，消息報載遠東問題專家維倫斯基(V. Vilenzky)論文，謂佩孚已在中國諸事變中懸出其旗幟，在其旗幟之下，新中國內閣亦必採取有利於蘇俄之方向。十月二十五日，俄外交人民委員長齊采林(Chicherin)在真理報上稱：

吳佩孚擊敗張作霖，增加中國維護政權力量，日本在華地位將更困難。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共產國際四次大會時，拉狄克 (Radek) 在席上報告，尚謂中國共產黨支持佩孚，歷時僅二月餘，十二年「二七」慘案發生，中、俄共黨與佩孚關係始被切斷。(註二)

吳廷康曾與戴傳賢發起中共，亦曾謁見中山先生。九年十一月，中山先生因陳炯明收復廣州而去廣州時，吳廷康亦前往，並與獨秀會見炯明，獨秀且入炯明幕。其後馬林亦兩度至廣州晤炯明。因其時炯明爲國民黨實力派，俄共及中共對「聯陳」較「聯孫」尤具興趣。直至陳炯明叛變中山先生，中共與炯明關係始被切斷。

叁 馬林謁見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與列寧，爲同時人物，列寧少於中山先生四歲，先一年去世。由於均從事革命事業，早通聲氣，但未謀面。辛亥革命成功，列寧曾爲文加以評論(見第一章、第二節、壹)。列寧十月革命成功，中山先生亦曾去電賀勉。俄共既欲令中共與民族主義者結爲聯合戰線，則中山先生自爲其心目中最適當人物。民國十年十二月，馬林先去廣州訪陳炯明，於同月二十三日至桂林謁見中山先生，提出國共合作問題，遭中山先生婉言拒絕。據鄧家彥追記經過如次。

馬丁謁總理實紀(節略)

鄧家彥

民國十年總理駐節桂林，十二月，忽有荷蘭人馬丁 Martin 者隨帶一中國青年來謁，聲稱奉第三國際使命，而此青年張其姓，春木其名，常熟人(即張太雷)，實馬丁之通譯也。馬丁專誠拜謁總理，乃行抵廣州適總理已出發赴桂。於是向陳獨秀介紹與陳炯明晤談。獨秀譏國民黨如何腐化；而孫公如何空虛無力，以此慫恿馬丁接近炯明。詎炯明與馬丁意旨相乖，馬丁頗感失望，乃求赴桂。

馬丁抵桂之日，總理即命家彥優予接待，暫住於廣西銀行。馬丁身材魁梧，衣黑嘜嘜上衣，覆以灰色棉織外套，冠黑絨俄冠，領圍長絨絛，眼掛近視無框無色鏡，聲音宏亮，談吐雋永，望之不過四十許人；叩其姓名，則曰：「馬丁」，並拼音曰：「M、A、R、T、I、N」。後有作者誤以爲馬林或馬麟 Marling or Marling，皆未嘗與之謀面，或記憶失愆耳。(亡友張君溥泉謂介紹其與總理約見，且引馬麟談話云云，按此或是另有其人。不然，馬氏至粵，總理已離粵，馬氏之得見總理，以在桂爲首次，當時溥泉不在桂林，

而總理又未回粵，顧安所得介紹而約見乎？）馬丁臨別，出一片示余，上有其名及柏林住址，因彼聞余即往德，相期會於柏林也。

馬丁旅桂僅三日，與總理會談約兩次。總理在桂林駐節於舊桂王府（俗稱皇城，位獨秀峰麓），距廣西銀行不遠。總理第一次與馬丁談話，余未參加。其第二次則參加者不獨余一人，胡漢民、許崇智、陳少白、孫科、林雲陔、曹亞伯、朱卓文，皆是夕會議之重要人物也。此會即在皇城舉行。當時馬丁宣布第三國際意旨，力促國民黨與之聯盟。總理顧謂黨人曰：「諸同志亦有說乎？」衆默然。總理於是鄭重答覆馬丁曰：「蘇俄革命甫四載，其事蹟世罕能言者。吾儕革命黨人也，詎不同情革命？顧革命之主義，各國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杆格而不通，故共產之在蘇俄行之，而在中國則斷乎不能。況吾志在北伐。今吳佩孚屯軍洞庭以逆我，吾奪洞庭，窺武漢，直取長江，實侵英國勢力範圍。英知我聯俄，必先圖遏我，吾北伐之師，從此殆矣。為安全計，今僅能與蘇聯作道義上之聯絡。一俟義師師北指，直搗黃龍，再謀具體合作，未為晚也」。翌晨馬丁沮喪頹首率其小共產黨離桂而去。（著者按：馬丁，中外記載均為馬林，本書引之。）（註三）

關於容共問題接洽經過，據陳獨秀「告同志書」中稱：

「一九二一年，由國際石象的遠東勞動人民大會（著者按：即前述「東方民族會議」議決：東方殖民地國家應進行民主革命的鬥爭和在革命中進行農民蘇維埃的組織。於是中國黨的第二次大會（一九二二年）遂議決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並根據此議決發表時局主張。同時，青年團國際代表大林（Dahlin）來中國，向國民黨提出民主革命派聯合戰線政策。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了。他只允許中共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大會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著者按：即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註四），其主要的理由是，黨內聯合為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議決案為言，于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從此，國際代表及中共代表進行國民黨改組運動差不多有一年，國民黨始終怠工或拒絕，孫中山屢次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國際代表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

實則馬林謁見中山先生時，並非全無收穫。馬氏提出三項建議：（一）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二）創辦軍官學校，為建立革命武裝之基礎；（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中山先生未予具體答復。

馬林曾力言蘇俄現所行者爲新經濟政策，而非共產主義，此層引起中山先生甚大之興趣。詳下節。

〔註一〕根據「簡明歷史」及周佛海「逃出武漢報告」。另據毛以亨「俄蒙回憶錄」一五七頁，謂出席之中國代表四十二人，國共各半。

〔註二〕根據「逃出武漢報告」，「俄蒙回憶錄」及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一八七頁。

〔註三〕馬林原名Hericus Sneevliet，馬丁殆爲化名，亦即陳公博「寒風集」斯里佛烈（Sleevele）又化名西門（Dr. Simon），荷蘭人，在爪哇

宣傳共產主義被逐，由第三國際派來中國，強繼陪之至粵，張春木爲其翻譯，主張國共聯合，曾與公博在西礦酒店談話，並由張繼陪之赴桂林。函見中山先生，函並無結果云云。但公博稱：斯里佛烈至粵時，陳獨秀已去滬，此與鄧家彥所載有出入。

〔註四〕一說：在一九二二年中，鄧中夏、李大釗贊成聯合戰線，受到俄使館之支持，而張國燾、羅章龍、何孟雄表示反對，受到陳獨秀之支持——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111頁。

第二節 容共的實現

壹 中共中央杭州會議

馬林雖「垂頭喪氣而去」，但莫斯科聯絡國民黨的政策並未改變。民國十一年八月間，馬林偕第三國際使命，召開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作出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其決議文如下：

「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羣衆的黨，以應目前的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具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之基礎。

「我們加入國民黨之後……應注意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應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註一）

是項決議案清楚指出三個要點：(1)中共以個人加入國民黨，(2)中共保持並擴大本身組織，(3)親俄。此實一完整「滲透與顛覆」策略的具體說明。

儘管俄共與中共別抱陰謀，但與孫中山先生之中共只能以個人加入國民黨的堅定主張在技術上不相抵觸，是以容共在原則上不成問題。

中共杭州會議在中山先生因陳炯明叛變，於八月十四日抵滬之後。當時馬林進謁，請與中共「平行合作」被拒，馬林即召開杭州會議，決議中共個別加入國民黨，馬林再之以請於中山先生，允之。張繼復介紹李大釗謁見中山先生，致其仰慕之誠，並請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亦獲接受。是為容共政策之始。

此事經過「簡明歷史」有如下記載：

「陳炯明之變，孫中山氏遂赴上海。中共以時機已至，應在政治舞台上積極出動。其第一件之工作，即首先實行第二次大會之根本決議案，造成社會革命之（聯合）戰線。……於是中共代表往見孫博士，陳述意見，建議合作，孫博士此次亦甚高卓，其左右雖有許多人以不好之評論，各方面均攻擊之，彼竟能取得當時在上海之最著名黨員如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之協助，容納中共之建議。……此次談判並無具體結果，八月，中共中央在杭州開會，提議中共與國民黨須為有組織之聯合（按：即以個人加入國民黨），一致通過。全黨僅有一、二人有異議。……此決議一經通知孫逸仙，即表贊許，完全同意，胡漢民等亦贊成之。」

貳 孫越宣言

同月二十五日，蘇俄代表越飛 (Adolph A. Joffe) 派人携函來滬謁見中山先生。

越飛甫於是月十二日來到北京。其人乃俄國第一流的外交家，曾任俄駐德大使，主持對德、對波蘭和約及出席日內瓦會議，以長於縱橫捭闔聞名於世。其初抵北京時，若干團體開會歡迎。蔡元培校長在北京大學歡迎會中稱：中國亦將有社會革命，非僅如過去的政治革命。越飛對北京從事外交工作，聲明俄國無履行兩次對華宣言的義務，既不允單獨解決外蒙問題，又不允將中東路無條件交還中國，其交涉並無成就。又從事對日交涉，亦無結果。乃轉而於十二年一月十六日由京赴滬，謁見中山先生，提出聯俄容共問題，經數度商洽，獲致協議，發表孫越宣言，如下：

孫中山先生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聯合宣言

孫逸仙博士與蘇俄派至中國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發表下記宣言。在越飛君留上海時，與孫逸仙博士爲數度之談話，關於中俄間關係，披瀝其許多意見，對以下各點，尤爲注意。

一、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懇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

二、爲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列舉之原則。越飛君因此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祇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爲現在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祇能維持現況。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祇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適時改組。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爲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正式向孫博士宣稱，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爲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古撤退，緣爲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抗行爲之發生，以及釀成較現在尤爲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博士以最親摯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再來中國南部，然後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孫逸仙、越飛簽字。

孫越宣言發表後兩日，中山先生命廖仲凱與越飛同往日本，商討合作具體辦法。個中情形，未見文件，據「寒風集」甲二三〇頁記載公博、仲凱與越飛在熱海之一段談話稱：

「晚上三個人見了面。越飛告訴我：蘇聯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爲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的說：中國只有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絕不能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俄希望共產主義何時在俄國實行，越飛只是搖頭不答。我問越飛：六十年共產主義在俄國實現嗎？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廖先生很滑稽的笑着說：公博，你還有什麼話說？我們要革命黨也要做現

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了。」孫越宣言乃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文獻。其是非得失，姑不具論，茲試一分析促成此一文獻的政治背景。

叁 容共政策之背景及中山先生之見解

中山先生完成辛亥革命後，十餘年來，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始終陷於艱難奮鬥之中。民二有討袁之敗，民六組織軍政府於廣東，不期年而解組。其最使中山先生痛心者莫如陳炯明之叛變，陳炯明爲國民黨之重要黨員，曾宣誓忠於黨魁者。民十非常國會選舉中山先生爲總統，正籌劃北伐，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變起肘腋，砲轟觀音山，直欲置中山先生於死地。中山先生憤然欲一死殉職，爲左右所挾，走永豐艦（後改爲中山艦），仍與炯明相持五十六日，糧食缺乏，淡水不足，天氣炎熱，處境無異牢獄。最後援軍無望，始乘一英船赴港轉滬。中山先生既不容於南北軍閥，而黨人革命意志又復日漸消沉，革命事業之不絕者如縷。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派其副官柯衡（*Morris A. Cohen*）赴加拿大及美國招募大戰後之退伍軍官，以現代化方式建立其軍隊，同時派陳友仁赴香港及英倫，與英國當局接洽，冀得其援助，兩者均告失敗。後再向德國接洽，亦無成就（註二），造次顛沛，無以復加。此時而有赤俄放棄中國不平等條約宣言，而再三派員與中山先生商洽合作，而屈從中山先生容共而非聯共的堅決主張，凡此安能不令人有空谷足音，登然而喜之感。

容共之最重要關鍵尤爲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俄式共產主義本無共同之處。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沒收一切較大工業，廢棄商品買賣，強迫勞動，不勞動者不得食。沒收農民糧食，而不能以工業品供應農民，造成工業停頓，農業饑荒，經濟上大紊亂、大崩潰之勢。擅於運用策略的列寧，實行急劇退却，於民國十年三月八日俄共第十次大會上，提出新經濟政策，廢除糧食收集制，實行糧食稅，農民得以自己餘糧進行買賣，如此，方使工、農、商業得以復活。至民國十四年，大工業達戰前四分之三，農業三分之二，普通工業三分之一；迨六年，幾恢復戰前水平。

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之日，正俄共促成容共之時。

俄共明知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與俄式共產主義之不相容，乃偽裝自己，使後者與前者相似，而新經濟政策成爲最易引起錯覺的外衣。民十，馬林在桂林謁見中山先生時，即陳述蘇俄並不實行共產主義，而改行新經濟政策，使中山先生「至爲欣慰」。中山先生當即電廣州廖仲凱等，謂：

「俄國經濟狀況，尙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主義，甚爲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劃相差無幾，至爲欣慰」。（註三）

由於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時間頗久（一九二一—二七），是以終中山先生之世，對容共政策始終不予置疑。民國十三年夏，中山先生講民生主義時，猶以新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相提並論。

廖仲凱偕越飛同赴日本，商洽容共及改組國民黨細節，歷時一月，仲凱返粵。

自是容共行動實際展開，C P、S Y紛紛成爲國民黨黨員。

中山先生主張容共之見解，見於其對馬超俊的指示。超俊於民元前五年即追隨中山先生，而從事工人運動者。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變自廣州蒙難來滬後，即決心容共，上海工人團體羣情惶惑，相率派代表請見，表示反對，超俊八度密陳諫阻，未納，當時中山先生見解如次：

（一）照馬克思的學說，無產階級革命，應在歐洲的工業中心地區爆發，但却發生在農業國家的俄國，經列寧解釋謂，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是專以壓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爲事，所以得到延緩其本國革命的發生；如果把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自然可以促其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其共產革命的對象，原爲資本主義的工業國家，其所解放者爲被壓迫民族，中國確爲被壓迫的民族，列寧當不至喪心病狂的轉移對象，而叫中國共產黨員來摧殘我們國脈的。

（二）青年富於理想，對現實大都不滿，易於受人煽惑，誤入歧途。中國青年現多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但對之無深刻研究，不知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國情不合，亟宜導之以正，吸收他們，加以訓練，使踏上正當途徑，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和倫理之優點，從而參研西洋政治思潮及制度，自可服膺本黨主義，而成愛國有爲的人才。

（三）歐戰告終以後，列強仍多謀不利我國，可說中國現在尙無真正的與國。蘇俄現既同情於我，願放棄帝俄時代據奪我國的一切權利，而求爲我與國，我自不便固拒。（註四）

中山先生容共政策雖決之於危難之間，但以中山先生自信之堅，決不允共產主義施之中國；以中山先生待人之寬，亦決不慮共產黨人之行不顧言，此則吾人所能斷言者。

肆 李大劍之聲明

關於中共以個人加入國民黨之正式文件，爲民十三年一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之李大劍聲明。爾時陳獨秀以「黨魁」之尊，獨未加入國民黨，而由第二號頭目李大劍爲首，相率加入。

李大劍聲明中強調指出：中共加入國民黨是以個人加入，接受國民黨的命令，服從紀律，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他承認黨，不脫離共黨組織，但他「辯證的」說：這是對中國革命有利的。

就整個聲明觀察：中共份子之跨黨，是偏向國民黨方面，而未來事實顯示，却偏向共黨方面。從此種下糾紛的種子，生長禍患的果實。

茲將李大劍聲明照錄於下。

李大劍對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

諸位同志們：兄弟深不願在本黨改造的新運中，潛植下猜疑與不安的種子，所以不能不就我個人及一班青年同志們加入本黨的理由及其原委，並我們在本黨中的工作及態度，誠懇的陳幾句話。

兄弟們到廣州來，承本黨總理及黨中先進諸同志歡悅的接受，令我們在國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盡其棉薄的機會，我等不能不敬服本黨總理及黨中先進諸同志熱忱的促進負有國民革命的使命的國民黨的精神。但有少數先進的同志終不免對於我等加入本黨致其懷疑者，使此懷疑不能渙然冰釋，則於本黨改造的新機中，即預伏一種妨害將來發展的危機；此斷非吾輩之所願，想亦非先進諸同志之所願。用是不能不將我等加入本黨之理由，開誠佈公的講出來，以求得一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潛萌的危險。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帝國主義及那耀武揚威的軍閥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

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了，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族，奠定民族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們覺得剛是革命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指揮之下，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驟，為國民革命而奮鬥。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因為在今日經濟落後，為帝國主義下半殖民地中國的中國，只有國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國民革命事業，便是我們的事業，本黨主張的勝利，即是我們的勝利。我們以此理由，不但自己願來加入本黨，並願全國國民一齊加入本黨。這種發展本黨的責任，是要先進諸同志與我們共同坦負的。

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為我們加入本黨，本黨便成了共產黨，這亦是一種誤會。我們加入本黨是來接受本黨的政綱，不是強本黨接受共產黨的黨綱。試看本黨新定的政綱，絲毫沒有共產主義在內，便知本黨並沒有因為我們一部分人加入，便變成共產黨了。

又有一部份同志提議：本黨章程應規定不許黨內有黨，黨員不許跨黨。這或者亦是因為我們加入本黨而起的。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會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於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我們若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不但於中國國民黨沒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損失。因為現代的革命運動是國民的，同時亦是世界的，有我們在中國國民的組織與國際的組織的中間作個連絡，作個連鎖，使革命的運動，益能前進，是本黨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國際所希望的。由此說來，我們對於本黨應負二重的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普遍的責任；一種是為本黨聯絡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所懼所我們的才力不勝，不能担当此任，還望先進諸同志不吝指導而匡助之，是我們的欣幸。

總之，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塗混進來的，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據賴於本黨的。土耳其的共產黨人加入土耳其的國民黨，於土耳其國民黨不但無損而有益。英國共產黨人加入英國勞動黨，於英國之勞動黨不但無損而有益。英國共產黨人加入英國勞動黨，於英之勞動黨亦是不但無損而有益。那麼我們加入本黨，雖不敢說必能有多大的貢獻，其為無損而有益，亦宜與土美英的先例一樣。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跨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

行爲，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守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我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以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參加本黨不合，則儘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爲發展本黨而來者，亦不難爲發展本黨而去；惟有猜疑防制，實爲本黨發展前途的障礙，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自今以往，我們與先輩諸同志共事之日正長，我們在本黨中的行爲與態度，當能徵驗我們是否盡忠於國民革命的事業，即以盡忠於本黨，願我先輩諸同志提攜而教導之。

北京代表李大劍意見書（著者按：時間爲民十三，一月二十八日）

（註一）引自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案，參閱第四章第二節。

（註二）China Year Book 1928，I IIII〇—11頁。革命文獻第九輯總一三〇五頁有類似記載。

（註三）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十七頁。

（註四）馮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一冊二二六至二二七頁。

第三節 國民黨的改組（註一）

壹 改組以前之國民黨

國民黨之容共與改組有其連帶關係，且係同時進行。中山先生接受馬林與越飛之容共要求時，即着手於國民黨的改組。國民黨之名稱始於民國元年。其前身爲完成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民元，宋教仁擴大同盟會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及共和實進會，而成立國民黨，聲勢大壯，而份子複雜。討袁之役，意見參差，步驟凌亂，招致失敗。民三，中山先生加以整飭，改組爲中華革命黨，入黨者必須宣誓服從黨魁。風紀雖嚴，而器局轉促。西南軍人多爲黨員，乃不願誓言，時呈携貳。陳炯明之叛，乃其最著者。此時共產國際代表乘虛而入，既說中山先生以容共，勸以由重視軍事活動轉而重視羣衆運動，而尤着重於廣大之農工運動；更勸以排斥敵視革命之英、法、日與袖手旁觀之美國，即打倒國際帝國主義，而壹意聯合不斷表示親善之蘇俄，此係俄共整套計劃。中山先生既允容共，則國民黨的改組，

勢在必行。

十一年九月初，洽在中共中央八月杭州會議決定加入國民黨之後不久，中山先生在滬召集各省黨員張繼等五十三人，商討國民黨改進黨，悉表贊同。乃指定丁惟汾等十餘人起草改進黨方略。十二年元旦發表改進黨宣言，宣佈時局主張及民族、民權、民生政策。其中絕少共產主義色彩。下旬，中山先生任命國民黨本部四部長。旋委參議二十人，而陳獨秀、詹大悲等亦列名其中。中山先生於二月返粵，三月，設大本營，自任大元帥。七月，中山先生批准國民黨總支部通則。

以上黨務改進黨，只能視為改組的前奏。直至十月底，中山先生派廖仲凱、鄧澤如等召集特別會議，商討改組問題，改組之議遂決。旋派林森等九人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共黨份子譚平山與焉。並聘鮑羅庭為顧問。鮑羅庭 (Michael Borodin 亦名 Grinsburg) ，係越飛介紹於孫中山先生，已於八月至廣州。國民黨承去歲改進黨之宗旨，進而為澈底改組之籌備。起草宣言、黨綱、章程草案。同時辦理各地分部登記。在廣州黨員之登記尤為嚴格。着手市黨部、區黨部、區分部之組織，分頭調查農人、工人及中產階級狀況。統一宣傳機關。將大本營黨務處、大本營直轄委員會、廣東宣傳局，一律裁撤，歸併於臨時執行委員會辦理。同時聯絡全國同情革命之報館，應付反對之報館。並限制黨員對外發表關於黨務意見。設講習所以訓練各區分部執行委員。積極準備於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廖仲凱於十二月去上海，召開中央幹部會議，報告改組之意義，推舉汪兆銘、胡漢民等七人為中央臨時執行委員。

貳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高等師範學校，出席海內外代表一百九十餘人。此項代表一部份由中山先生指派，一部由地方選舉。中共份子之充任代表者，如下：(註二)

湖南 謝晉、林祖涵、羅邁(李維漢)、夏曦、毛澤東、袁達時。

浙江 胡公冕、沈定一、宣中華。

直隸 于樹德、韓麟符、陳鏡湖(印潭)。

江蘇 朱季恂。

山東 王盡美

安徽 陳獨秀（著者按：獨秀似未加入國民黨，亦似未出席。）

湖北 詹大悲、劉芬、李能鄧（立三）、廖乾五。

廣州 譚平山、方瑞麟。

北京 李守常。

大會通過國民黨黨章、國民黨政綱、大會宣言各要案，並選舉中央執行委員。

第一、關於黨章：係鮑羅庭所起草，原爲英文，廖仲凱譯爲中文，而經大會修正通過者。此項黨章完全採用俄共組織方式，凡十三章。其體系爲：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省（市、海外）代表大會與執行委員會——縣（市）代表大會與執行委員會——區代表大會與執行委員會——區分部黨員大會與執行委員會。採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嚴申紀律。以區分部爲核心組織，吸收黨員，領導羣衆。設置黨團，使其深入羣衆，起領導作用。

第二、關於政綱：分對外對內兩部份。對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爲主，對內爲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確定縣爲自治單位。保障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保護農民、工人及婦女的權益。此項政綱，均爲中山先生及國民黨一向之思想與主張，共產色彩並不濃厚。

第三、關於宣言：全文分爲三大部份：一、「中國之現狀」。略述自辛亥革命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專橫，列強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黑暗地獄。此全國人民爲之疾首蹙額，而有識者所以徬徨日夜，急欲爲全國人民求一生路者也。而所謂生路，各方面有不同之擬議，一曰立憲派，二曰聯省自治派，三曰和平會議派，四曰商人政府派。以上各種擬議，雖或出於救國之誠意，然終爲空談！其甚者，則本無誠意，而徒出於惡意的譏評而已。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詳闡主義，發布政綱，以宣告全國。二、「國民黨之主義」。略謂國民黨之主義即孫總理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本此主義以立政綱。吾人以爲救國之道，舍此末由。一爲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

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二爲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於憲法，以孫中山先生所創之五權分立爲之原則，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也。凡此既以濟代議政治之窮，亦以矯選舉制度之弊。三爲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三、「國民黨之政綱」。分爲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兩部。對外政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爲主，對內政策則爲規定中央及地方之權限，確定縣爲自治單位，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等。

此項宣言，所帶共黨色彩亦並不濃厚，如其有之，則爲（一）排他性較強，對當時非國民黨的各黨派，除中共外，莫不加以指摘，此與國民黨過去經常與各黨派縱橫連系者固有所不同，且此後活動，無不對彼等予以排斥。（二）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即反帝國主義具體化。此二者與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時局主張」有其相似處。（參閱二章、二節、伍）

第四、關於選舉：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其中中共份子三人，即譚平山、李大劍及于樹德。又選候補執委十七人，其中中共份子六人，即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及張國燾。

大會閉幕之後，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設常務委員三人，譚平山與焉。內設八部，即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軍事部、婦女部及海外部（註三）。任部長之中共份子二人，即譚平山長組織，林祖涵長農民。各部秘書尤多中共份子。詳下章第五節。

叁 聯俄

容共史劇本爲俄人所導演，是以國民黨的容共與聯俄政策相併而行，而未能截然劃分。本節姑將容共之始，若干聯俄史實略予敘述。

孫越宣言，爲國民黨容共的歷史文件，已如前述，然就文件本身言之，並未提及容共問題，只是中蘇的外交文件。越飛表示，中國的統一與獨立，可獲得蘇俄的同情與援助，此自可解釋爲中山先生同意聯俄，然仍附有三個條件：第

一，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不能推行於中國，第二，中東鐵路問題的解決，及第三，外蒙不應脫離中國。

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期間，蘇俄駐北京代表加拉罕曾來一賀電，其文如下：

「廣州孫逸仙先生：今日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期，茲以誠懇之意慶祝我公與大會之成功。予深信國民黨之事業，在公指導之下，實為中國人民之民族解放運動之最佳希望。蘇俄對於中國人民為民族自由與獨立之勇猛奮鬥，表示其友愛之同情。凡被世界帝國主義所壓迫者，皆吾人之兄弟，凡為人民爭自由者，皆吾人之同志，蓋皆在共同奮鬥中也。加拉罕於北京。一九二四、一、十五。」

大會於二十四日復電，文曰：

「北京全俄蘇維埃代表加拉罕君：尊電致祝全國國民黨代表大會，情詞懇摯，不勝感謝。本會目的在繼續辛亥革命事業，以底於完成，使中國脫除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壓迫，以遂其再造夫積弱而分裂之中國。為保障亞洲及世界和平計，其最善唯一之方，惟有速圖中國之統一及解放。本會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將予以同情。而俄國人民來此先聲，尤為吾人所感激。孫文。」

二十五日，中山先生知列寧逝世消息，在代表大會提出以大會名義致電莫斯科，表示哀忱。廿九日，得加拉罕復電，文曰：

「廣州孫逸仙博士鑒：予謹電表個人謝忱，轉達賀趣林（即本章第二節貳之「齊采林」）同志來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列寧同志逝世，極表同情與哀悼，蘇聯政府至為感謝。列寧同志逝世，不僅為蘇聯之重大損失，亦為世界被壓迫民族之重大損失。蘇聯政府謹遵列寧同志遺教，繼續進行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特別是東方被壓迫民族，而尤以中國國民黨解放中國民族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工作，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之基礎，以促進民治主義之大聯合。加拉罕。一月二十九日。」

除上述幾件外交詞令的應酬外，中山先生先派蔣中正先生赴俄考查軍事，及黨政情形，可稱為聯俄政策的第一個具體步驟。

民國十二年八月，蔣中正先生奉命組織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率同團員沈定一、王登雲及中共份子張太雷訪俄，十二月返國。訪問結果，蔣先生對俄共的專制及恐怖政策留有深刻的印象，尤其對俄共的不肯放棄中東鐵路及侵略外蒙得到明確的認識，因而認識俄國是推行一種新的帝國主義，中國即令得其協助，抵抗西方帝國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中國自由獨立的目的。而且認為蘇俄「世界革命」較之西方殖民主義對東方弱小民族更為危險（註四）。

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期間，中山先生令蔣先生籌設黃埔軍校，此乃接受俄人建議，做照紅軍組織與訓練方式，得到俄人物質的援助而設立者。

自是聯俄政策更趨強化。以鮑羅庭總顧問爲首的俄國各種專家顧問陸續來華。俄國借款及武器亦不斷到來。政治的一黨專政，軍隊中的黨代表制度及政治工作，大體均爲俄國顧問之建議，與俄國制度之做效。

(註一) 國民黨改組文件，浩如煙海。羅家倫主編的「國父年譜」所載頗爲精審，本節多採用之。

(註二) 鄭魯：「國民黨史稿」上，第一篇三一八至三一九頁，所列爲著者所知者之共黨份子。及李靈漢：「從容共到清黨」二五七至二六三頁。

(註三) 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一次中全會決議設八部，有調查部而無海外部，尙設祕審處。上海、北京、漢口執行部不設軍事部。四川、哈爾濱應分設各部，俟調查後再定。

(註四) 「蘇俄在中國」十九至二十五頁。

第四章 容共的紛擾

第一節 國民黨的愛慮與共產黨的謀略

壹 中山先生與其左右之態度

國民黨雖然容共，然而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左傾也好，右傾也好，在本質上，未有不反共者。因為國民黨是中國的、民族的，而共產黨是俄國的、國際的；國民黨是民主的、全民的，共產黨是專政的、階級的；國民黨是承認私有財產的，共產黨是否認私有財產的，實行集產的。除反軍閥、反帝國主義而外，兩黨實無共同之點。是以在馬林一再要求國共合作時，孫中山先生首先根本拒絕，其後雖允許共產黨以個人加入國民黨，但堅決表示：「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中山先生左右手廖仲凱乃最贊成容共者，容共政策的實現，乃仲凱與越飛赴日本所商定，其後且因執行此政策而犧牲，但他是非共的，也可以說是反共的。仲凱為在中國鼓吹全民政治的第一人，「全民政治」一詞，是其創譯。是書獲得中山先生贊譽。其全民政治主張，得中山先生民權主義思想的啓發不少，同時亦供給了中山先生民權主義內容。（註一）

與仲凱同為中山先生所親信之蔣中正、胡漢民、汪兆銘等，亦莫不反共。漢民於民國十六年南京清黨之後，在中央黨部一次報告中說：當總理決定容共時，廖仲凱最贊成，汪精衛最反對，蔣先生與本人則無所可否，廖仲凱批評馬克思與列寧，謂馬克思為學者，列寧為縱橫家。汪精衛謂國民黨如豬精，共產黨如石猴子，一旦讓石猴子鑽到了豬精的肚子裏，翻起筋斗來，可以要豬精的命。（註二）

實則漢民當時雖無所可否，而以後事實表現，在以上諸人中，他反共最早，亦最堅決。至於蔣中正先生，不是無所可否，而是在訪俄以前甚為贊成，十分相信俄共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信心完全消失，斷定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

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爲危險，蔣先生以其意見報告中山先生，未被接納。於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蔣先生即離開廣州返里，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之職，終以中山先生之堅予挽留，始在只辦軍校，不問黨政的要求下返粵。

在其返里期間，蔣先生於三月十四日致廖仲凱一函，足以說明其對容共的態度，如下：

「尙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猶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拜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黨員也，而我國黨員之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厭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的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爲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註三）

貳 跨黨與黨團作用

問題之所以嚴重，不在於共產份子加入國民黨，而在於「跨黨。」中共份子一面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一面又不脫離共產黨黨籍。當其在某一時期，革命目標與行動一致時，尙可相安無事；設一旦兩黨發生紛歧，則此等跨黨份子，將忠於共產黨呢？抑忠於國民黨呢？以常識判斷，他們必忠於共產黨，而不忠於國民黨，因其基本信仰爲共產主義，欲從事於中國的及世界的共產革命運動。其所以加入國民黨者，因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已有四十年歷史，三民主義已深入人心，政治基礎甚爲雄厚，而共產運動，歷史既短，力量又弱，既不合於中國傳統的思想，又往往不爲當時政治上及社會上所容，以共產黨術語言之，則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尙未發展到足以領導革命，所以第三國際堅決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欲藉國民黨的掩護，達到減少敵人壓力，壯大自己，篡奪國民黨領導權，最後加以推翻的目的。此事洞如觀火，共產黨人知之，國民黨人亦知之。共產黨方面，前引李大釗聲明，自承跨黨，而加以解釋說：「我們若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不但於中國國民黨沒有利益，且恐有莫大損失，因爲現代的革命運動是國民的，同時亦是世界的，有我們在中國

國民的組織與國際的組織的中間作個聯絡，使革命的運動益能前進，是本（國民）黨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國際所希望的」，此種解釋當然十分勉強，我們要問：假使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發生衝突時，具體的說，中俄兩國發生衝突時——這是隨時可能的——中共份子究竟站在哪一方面？這是李大劍聲明所不會也不能解答的。

國民黨方面，對於跨黨問題，戴傳賢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致蔣介石先生書」（戴季陶文存第三冊九九七至九八六頁）有透闢的評論，摘錄其二段如下：

（民國十二年）「當弟由四川回滬，便聞吾黨有改組之舉，總理且任弟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人，但其詳細則不知，及問諸滬上同志，乃知改組之動機所在，時兄往橫未返，弟再四研究，覺以此為改組之動機，殊非適當，蓋一黨有一黨之中心，亦有一黨之歷史地位，若失却獨立之地位與組織之中心，必召他日無窮之紛擾，此乃集團之原則，絕不能違背者也。改組之事，弟為最早主張之人，吾黨應以教育宣傳為基礎，而不宜僅利用土匪與政客為軍事政治之活動，此之主張，乃在從日本返國之時，政綱之起草，六七兩年之中，前後修正，且及念餘次，總理自身修正草稿，亦凡四五次，其時屢格於衆議而不行，今日改組，又不事獨立之規畫，而乃以外力為動機，一切糾紛，必由此起。因是之故，電粵辭臨時執行委員不就，且再四說明弟所以不任執行委員之故。其時仲凱特自粵來，勸我就職，弟則告以此根本政策不能相容，萬難為不可能之努力，而尤期期以為不可者，則借款之一事，借款非不可，借小小之款，而事事時時受人之節制，決非黨之福，他日必因此而致大權旁落，不可挽回。故當日告仲愷以三點：一、絕不能借款作黨費，即借款亦須如舊日吾人借款之辦法，絕對自由，不因借款而受牽制；二、共產黨人加入，必須造成單純之黨籍，而不能存留兩黨籍，以啓他日之糾紛；三、我自己絕不任中央執行委員，並不出席於代表大會，而願以全權担任一出版所或報館，為此事，與仲愷爭論累日，仲愷不知我所見者何在，何以向來主張改組之人，而至此反對改組生疑問，蓋其時仲愷一心一意欲圖黨之整理與改革，而為財政所苦，故對於俄國財政援助之事，殊不敢毅然打消也。」

（民國十三年三月）「粵中政治之糾紛，與黨務之糾紛，同時並作，而謠言蜚語，則層出不窮。此時弟深知自殺之道，必種因於此，曾力勸展堂（胡漢民）、哲生（孫科）諸人盡力合作，除去部下猜疑之原因，而毫無效果。黨中共產、非共產之疑心，又隨時隨地而發現。弟在此時，確知其他問題，皆不過部份之爭端，與一時期之現象，惟此兩種中心之不能容，則為本黨之基本問題，此根本問題不能定，則其他相為因果之糾紛，將永無已時，蓋主義思想為一問題，而組織與人事，又為一問題，此混雜不清之組織，雖有上智，亦無能為力，因此而憂心不已者累日。三月二十九日，祭黃花岡，與平三（譚平山）及（何）香凝夫人同車到廖宅，是日所感特深，乃

將數月來潛藏於胸之意見盡量言於平三，弟云，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共產黨人亦既承認之矣，若於此日，共產黨之同志能犧牲其黨籍，而完全作成一純粹之國民黨，使國民黨中同時不致有兩中心，然後一切糾紛可乃盡除，而組織工作乃不至受此無形之障礙。……平三云，此事現在絕作不到。兩黨之合作能至何時，現在亦殊難逆料，將來總有分離之一日，今日欲共產黨人拋棄其黨籍，則絕不可能。」

跨黨之足以引起紛擾，不僅在跨黨之本身，而尤在黨團作用。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後，除在中央之著名份子，僉知其為共產黨員外，其餘各級，則並不向國民黨公開。他們開口「本黨」，閉口「本黨」，儼然以純粹國民黨黨員自居，而國民黨亦只知其為國民黨，而不知其同時為共產黨，共產黨居於暗處，國民黨居於明處，只有共產黨可以運用國民黨，而國民黨不能運用共產黨。國民黨顯然處於不利的地位。

共產黨運用國民黨的法寶就是當時國民黨員十分恐懼的「黨團作用」。黨團，在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中亦有之，此顯係鮑羅庭將共產黨法寶傳受國民黨。此一法寶，國民黨用之以對一般羣眾組織是有用的，而完全不能用以對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處於暗處。反之，共產黨以之對國民黨是有用的，因為國民黨處於明處。

「黨團」必然載於中共黨章，雖當時中共黨章吾人一時尚未搜得，但在民國十七年中共六次大會所通過黨章第十四章「黨團」，與國民黨黨章第十三章「黨團」的規定幾乎完全相同，則在較早的中共黨團作用的內容可以想見。六次大會中共黨章關於黨團規定大意如下：

「在非黨組織——如職工會、農會、社會團體及文化團體等——之各種代表大會或會議，上述機關中，凡有黨員三人以上者均成立黨團，其任務，在非黨的組織中，加強黨的影響，實行黨的政策，並監督黨員的工作。黨團得選舉幹事及書記進行日常工作，黨團應執行黨委的決議，黨團所在組織中，各項要解決的問題，應先經黨團會議討論。凡黨團對於每一問題的決議，加入該團的黨員應在該組織的大會上一致擁護和表決，凡破壞此條之黨員，應給以紀律的制裁。」

在容共期間，國民黨即被視為中共的「非黨組織」，而實行其黨團作用。

叁 對國民黨中央之把持

此種黨團作用，僅就中共把持國民黨中央黨部情形觀之，即可知其情形如何嚴重。據鄒魯「中國國民黨黨史稿」三五四至三五八頁所載，自民國十三年一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至十四年五月終第三次中央全會止之年餘期間，中共份子對於中央各重要部工作及人事已加以有力控制與操縱，而鮑羅庭尤極專擅跋扈，其情況如下：

第一、組織工作。組織部係管理黨務，為黨中最重要機關，以共產份子譚平山任部長，於是一切黨之組織章程，悉歸其擬訂，各地組織之人員，悉歸其委派，平山對於各地黨務之籌備員，有共產份子者派之，無者則竟不派。其派出人員，專收容共產份子，與接近共產黨之人。忠實黨員，多不願其登記，普通入黨，多被拒絕。中央黨部得此消息，曾由委員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疊次提出，以此事屬組織部職權範圍，當然交組織部查辦，而平山以「攔」字了之。共產人數不多，各地可派之人無幾，以致各地成立黨部者寥寥，以廣東而論，黨員之衆，人所共知。自十三年改組至十四年五月終，當第三次全體執行委員會會議時，仍不能成立五縣黨部，以組織省黨部。雖經監察委員提出質問，亦置不理。其已派籌備員者，對於非共產份子入黨，不發黨證，使其在正式黨部選舉時無選舉權。至通告選舉期，則對於非共產黨員，故意遲發，及至接到，選舉已畢，亦無從行使其選舉權。倘選舉結果，共方勝利，雖違法，訴之組織部，仍斷為合法，共方失敗，必借事搗亂，雖合法，訴之組織部，仍斷為違法，且不惜加以「反動」「反革命」之罪，以相陷害。入其阱者，輕者開除黨籍，重者不免誅戮。而各地黨部不辦者停頓，辦者紛紛爭執，國內如武漢、北京、南京、海外如法國、日本，皆其爭執最甚者也。及至第三次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組織部提出大會選舉法：「未有組織之省份，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特別委員一人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如此，即無共產黨可派為組織員之省份，即不能成爲有組織之省份，未有組織之省份，即無表決權；反言之，即有表決權之省份，皆爲共產黨所把持也。且選舉章程十一條，限於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以前選舉完竣，而至六月終，始通過選舉法，印刷分發，又費若干時日，尤非與組織部預通之省分，不能將初選、複選如限辦理完竣。據四川執行部抗議，則選舉法達到，已在七月十五日以後，此中作用，不言而喻。至於臨選舉以前，紛紛准共產派之機關團體設立特別區黨部，其他區黨部、區分部，更有一屋而掛數牌者。此種現象，廣州最多，各地均發見之。

第二、工人運動。工人部部長爲廖仲愷，秘書爲馮菊坡，其時仲愷一身兼十三職銜，當然掛名而不能辦事，部事惟有交其秘書馮菊坡，馮共產黨也，於是工人運動之事，悉操於共產黨之手。工人部房門首標字曰：「非工人部中人，不准入內，」更不知其借工人部作何陰謀。至其辦工會，如係共方之工會，隨時准其成立，非共之工會，則多方阻礙，復掛一有名無實之全國總工會牌子，以吸收及壓抑各工會，共產黨操縱工會之法：屬共方之工會，則直接用共產黨訓練指揮之；非共之工會，則用工人部及政府迫挾之；其終不歸順不受利用者，則別立一同業之工會以破壞之。二者相爭之時，共方極少數之工人，可以借工人部壓迫大多數之工人。所以國民黨所領導之廣州工會無日無時，毆打殘殺，時時發生，而卒能保持精神，不爲消滅者，實經無數犧牲而始得。共產黨又以鮑羅庭爲太上皇帝，廣三鐵路工人風潮，以管有最高黨部最高政權之汪兆銘，尙須囑局長陳耀祖向鮑羅庭疏通，其勢可想而知。當五卅及六二二慘案後，香港將罷工；伍朝樞問鮑羅庭曰：「即時罷工與稍緩孰宜？」鮑逕答曰：「我已命令工會矣」。伍大不憚，語人曰：「鮑爲顧問，即有主張，亦須向黨或政府通過執行，安有自己直接命令之理！」及罷工事情發生，初欲本其隔斷國民黨與工人之議決，不使國民黨與罷工發生關係，及後見勢不能，乃不得已以廖仲愷、汪兆銘掛名於罷工委員會。蓋罷工工人皆爲國民黨所號召，而罷工運動者，復大多數爲國民黨黨員，非如此莫能支持也。罷工以後，一切經費由國民政府供給，共產派則出金錢以收買其工會首領，主持罷工委員會，名爲國民黨，實爲共產黨之黨員。復用糾察隊名目，搜查水陸交通，四出敲詐迫勒，民衆痛苦，不可勝言，而此輩囊橐累累矣。

第三、農民運動。農民部，其部長初爲共產黨員林祖涵，林去職，彭素民繼之，然一切部務，則爲秘書共產黨員彭湃所把持。及彭素民逝世，繼任者爲黃居素，彭湃公然曰：「若非就我範圍，則不能居此部長職。」黃請免彭湃職，卒之彭職如故，而黃去，廖仲愷兼農民部長矣。廖既事多，加以信任共產黨員之故，農民部便爲彭把持。初設農民講習所，突然提出黨部，通過招生，數日即考試，閱卷在譚平山室，非閱卷中文字，乃閱卷面名字，凡非共產黨人之名，悉予棄置。設農民協會、農團軍，尤爲共產黨所包辦。專收土豪、土匪，以供爪牙。一入農民協會與農團軍，不惟以前之罪悉免，以後更可肆意作惡。東莞林樹巍部捕得之匪，係入農民協會者，廖仲愷致函林樹巍曰：「不論是匪非匪，見字務

即釋放。」廣東各地有民團，實地方之自衛團體，平日捕匪，既爲匪所疾首，共產黨更不欲地方有自衛之團體，以妨其農民協會之進行，於是農民協會日與民團爲難，勝則民團被殺，地方遭劫；敗則請諸農民協會及政府，派兵會剿。廣寧四會農民協會爲民團所敗，鮑羅庭竟使政府於滇、湘、桂、粵、豫各軍，每軍抽調一團，復加以大元帥府之鐵甲車而會剿之。此等細事，鮑羅庭必出此嚴重辦法者，一以示共產黨之威，一以使各軍與民團結不解仇，供其利用，而解決某地某鄉民團，更時有所聞，甚至解散全省民團，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矣。至於農民部所派出之農民運動員，可以用共產黨運動者，則用共產黨名義運動之；不可以用共產黨運動，則以國民政府壓迫之，務必達到使國民黨與農民斷絕之目的而後已。

第四、青年運動。青年部長爲鄒魯，秘書譚克敏，幹事張善銘，張共產黨也，排譚使不安於位，鄒即去張，共產黨乃使張遊俄，此即共產黨對工作失敗者一種手段。嗣以孫甄陶爲幹事兼秘書，卒被共產黨設計用數人證其辦青年聯合會排共產黨之名目而去之。對於青年部所屬之學生聯合會及各校學生會，共產黨不能握其權，則用種種方法以破壞之，對於反共產黨之學生，用種種手段以陷之，各校校長非供其利用者，尤急謀去之。時國立廣東大學爲國中有數之大學，教職員三百餘人，學生三千餘人，共產黨尤欲得而利用，乃校長鄒魯兼青年部長，不爲共產黨利用及挾持，共產黨進行至爲不利，故共產黨大會報告廣東情形，謂組織完全成功，農民大半成功，青年失敗，於是共產黨利用及挾持，共產黨進行至革命之大本營」之謠，以搖動鄒魯，無效，欲先去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蕭冠英，省立一中校長鄒卓然以孤鄒勢，又無效。鮑羅庭乃借統一財政之名，在政治會議提議取消中山先生所許廣東大學經費獨立之成案以困鄒魯，鄒據成案及本黨政策以爭，鮑提議撤鄒校長職，且以去就力爭至九小時之久，卒由政治會議警告鄒。實則鄒爭教育經費之文，通過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由會達國民政府，而鮑不顧也。蓋怨鄒不助共產黨，欲去其校長，同時去其青年部長，則可以攫之手中，以便於青年之運動，故不惜以全力赴之也。青年部所辦之平民學校，初有一部在共產黨之手，所編教科書，宣傳共產黨階級鬥爭等主張，常以擇師自由，鼓動學生反對教員，以使風潮發生，彼得乘機引學生入共產黨，適公警逐教員風潮起，中山先生親至中央告青年部長，謂「學生無自由，如學生有擇師之自由，以後良教員無從存在，且學生如有擇師之程度，

則當爲教師，不當爲學生矣。」青年部依之以解決公醫風潮，自是共產黨鼓勵各校風潮之事稍斂。在廣州之共產黨青年，除新學生社外，隨時隨地有許多名目以吸收青年，有借隸於青年部者，有不隸於青年部者。

第五，婦女運動。婦女部部長初爲廖冰筠，秘書爲唐允恭，皆非共產黨，共產黨無能利用，且亦不甚注意。及何香凝爲部長，辦貧民產科醫院，女子商業販賣所等等，共產黨漸侵入，女權運動會始終反對共產黨，故共產黨設女子大同盟，以爲其女子運動之機關。

第六、宣傳工作。宣傳部部長爲戴傳賢，秘書爲劉蘆隱、郎醒石、陳揚煊等。本部沒有周刊。日報則有上海民國日報，廣州民國日報。由黨出資辦之雜誌爲北京之「新民國」，上海之「新建設」，二雜誌實操於共產黨員之手。

海外部司華僑黨務，部長爲林森，當時鮑羅庭蔑視華僑，謂爲亡命之流，國家不應予以保護。除法國、日本外，其餘海外各總支部、支部等，尙能按步進行。

此爲第一次大會以後一年餘之情形。至第二次大會時，反共中委多被迫離粵，並遭處分，於是各部實權幾全爲共產份子所控制。

肆 湧入軍中政治工作（註四）

民國十三年五月二日，中山先生特任蔣中正爲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九日，中山先生以國民黨總理名義派廖仲凱爲軍校黨代表，十日，派戴傳賢爲政治部主任。軍校於六月十六日正式開學。成立伊始，由全國各地招來學生僅四百餘人。軍械缺乏，經費拮据。滇、桂軍及陳炯明部隊驕縱不法，把持一切稅收，校中經費由廖黨代表向該軍等「乞借」，以維伙食。然而軍校學生在中山先生開學訓詞：「要用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的號召之下，及蔣校長，廖黨代表堅忍不拔精神感召之下，卓然發揮青年人之革命志向，確能奠定革命武力之基礎。

軍中設黨代表及政治部，係蔣校長所倡設，且係仿效俄國制度。（註五）

在軍校最早之人事編制中，中共份子就已知者有教授部副主任少校葉劍英及管理部衛兵長中尉胡公冕。至於教練部

副主任中校鄧演達，則爲始終親共者。

廖仲凱於十四年八月被刺後，九月，國民黨任汪兆銘繼任黨代表，繼續執行親共政策，將軍校政治工作一概委之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當是年三月中山先生逝世時，軍校前後任政治部主任戴傳賢、邵元冲均屢從在京，參加西山會議，由周恩來繼任政治部主任，復兼軍法處長。會軍校擴大政治部組織，設前後方政治部，恩來爲前方政治部主任，隨軍參加是年夏第二次東征陳炯明於惠陽，而以包惠僧爲後方政治部主任留校工作。此二人均爲中共重要份子。自是中共在軍校發展組織，訓練學生共產思想，且伸展至各軍政治部。

十五年二月，軍校改爲政治軍事學校，以邵力子爲政治部主任，亦爲始終親共者。適力子奉派赴俄，由副主任中共份子熊雄代理。中共另一重要份子惲代英則充任主任政治教官，充教官之共黨份子有張秋人、蕭楚女、高語罕等，而胡公冕則升任政治大隊長。軍校設政治科，殆係俄顧問建議，自是中共份子相率進入軍校政治科，以爲把持未來軍中政治工作之準備。

軍中政治課程及出版宣傳刊物，幾全爲馬列主義教條。

政治工作且在廣州開始從事民衆運動。

十三年秋，軍校中設立兩教導團，以何應欽、王柏齡分別兼任第一、第二教導團團長。在團、營、連中均設黨代表，權力甚大。是爲軍中推行政工之始，而任其事者亦多爲中共份子。如胡公冕即任教導第一團第一營黨代表。

十四年一月第一次東征陳炯明，教導團擴充爲黨軍，出發作戰，周恩來原任前方政治部主任，至是改任黨軍政治部主任。

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設軍事委員會，將革命軍編爲七個軍，軍事委員會下設政治訓練部，以陳公博爲主任。各軍政治部主任，就已知者，第一軍爲周恩來（兼第一師黨代表），第二軍爲李富春，第五軍爲李朗如，第六軍爲林祖涵。第一軍軍長爲蔣中正，下轄三個師；第一師師長何應欽所部第三團黨代表爲包惠僧，第三師師長譚曙卿（此人似係共黨一著者），所部第七團黨代表爲蔣先雲，以上各軍政治部主任及團黨代表均爲中共份子。

軍中滲透大量中共份子係史達林所策劃，欲以控制革命軍思想者進而控制軍隊本身。史達林於十五年十一月指示中共：「一、中國共產黨應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強軍中的政治工作，力求軍隊成爲中國革命思想底真正的模範的代表者。

二、中國共產黨應當研究軍事，以便逐漸向前邁進，在革命軍隊中佔某些領導職位。」（註六）

中共份子奉命進入軍中之後，努力工作，力求表現，「國軍政工史稿」有如下的分析及描寫：（註七）

中共份子由黨部滲入軍校，既取得可爲本黨代表的資格，深知當時本黨缺乏此類人才，乃裝出技術人員的姿態，藉以冲淡政治色彩，在本黨或軍校的邀請敦促下，始勉爲其難，加入軍校政治部工作。在工作當中，又表現幾種態度：（一）爭事不爭權。願在政治部內多做事，而將握有實權的黨代表職位儘量讓與國民黨黨員担任。（二）你不幹我幹。凡某一政工職務，爲國民黨黨員所不願爲，不屑爲或不能爲者，他們欣然接受，全力爲之。（三）不信任不休。對國民黨黨員之爲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者，恭順備至，每有所使，必達成任務，對其職務內應辦之事，則全神貫注，力求表現，以時間和事實來換取主官的信任，非至主官全無戒心全權信托不止。（四）看後不看前。前一段完全在表現能力表現服務精神，勞苦毀譽，在所不計，待取得主官完全信任後，則關鍵不放鬆，不顧一切地貫徹共黨所指示的原則，達成共黨所付予的任務。如汪兆銘繼廖仲愷爲軍校黨代表，即將黨代表職務，交政治部代拆代行，事前不指示原則，事後不檢查結果，其時政治部而正爲共黨份子把持包辦，故（軍校）三期以後的政治訓練，幾乎是共產黨在主持。由軍校滲入軍隊，從軍校，黨軍至國民革命軍，經第一次東征，討伐楊劉，而至第二次東征，每次都有共黨籍的政工人員參加，而且在作戰中特別賣力，特別勇敢，尤其對於民衆的策動工作，做得格外徹底，而每次領導前線政工，指揮政工作戰的，好像都是周恩來，可說以共黨份子爲主體。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校長對黨代表制度作如下之建議（註八）：

「中正認爲革命未成功以前，此制不能取消，惟黨代表資格，應有相當限制，凡跨黨黨員，不宜任黨代表之職，且須限入黨在若干年月以上者（即黨齡），方有任黨代表之資格」，並認爲當時所行之政治訓練部條例，已不適宜，主張在此項條例「未修正以前，各軍黨代表，應一律調回，加以訓練，而留政治部人員在軍中，實習政治相當

工作，宣傳三民主義，則軍隊內部，既無思想衝突之慮，政治工作又無中止之憂，其與軍隊之精神，不致如前日之渙散也」。

自是中共份子之任黨代表及政治工作者紛紛退出，但退出後，仍由政治訓練部予以訓練，以爲他日捲土重來地步。其時政治訓練部主任爲陳公博。迨北伐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爲鄧演達，副主任爲郭沫若，此二人爲中共之同路人，於是中共份子又被大量引入，致北伐期間，軍中政治工作再度爲中共所把持。

(註一) 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冊九七三頁。

(註二) 胡漢民於民十八清黨紀念日講於中央黨部，見中央半月刊二卷十期。

(註三) 「蘇俄在中國」第七節「我的遊俄觀感」。

(註四) 採自「國軍政工史稿」(上)第二章至第六章(民國四十九年七月國防部總政治部出版)。

(註五)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十五年四月八日蔣校長對軍校學生講詞。

(註六) 俄國革命史

(註七) 該書上卷二二〇頁。

(註八)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第二節 初期的反共活動(註)

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前後，黨員之反共活動即不斷發生。

壹 廣東支部彈劾案

李大釗等相率加入國民黨後，廣東支部鄧澤如、林直勉等十餘人，獲得中共不利以於國民黨密報，即於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書中山先生，彈劾共產黨，並指斥陳獨秀陰謀略云：「竊以本黨改組，其動機雖出自我總理之乾綱獨斷，惟組織法及黨章黨綱等草案，實多出自俄人鮑羅庭之指揮。然此表面文章，尚無大害。惟探聞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

策，全爲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陳與蘇俄本有密切之關係，其所組織之共產黨，爲蘇俄政府所給養。此回改組，陳獨秀因粵人對伊感情太壞，乃避去；而以其黨徒譚平山出而任事。陳獨秀則在暗中牽線。經爲其黨徒范體仁因爭權利而衝突，遂向國會議員徐清和詳細陳述，謹密報於我總理，以免令外人弄我如傀儡。此爲黨員等天職所在，勢難容已，非敢反對此回改組也。」繼指出「陳獨秀率其黨徒，羣然來歸，識者早知其別有懷抱；蓋彼等乃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加入。其大前提，則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其方略，一爲使我黨叢國際之仇怨，一爲使吾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此陳獨秀共產黨對我黨陰謀之綱領。此次改組，陳獨秀實欲藉俄人之力，聳動我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爲彼共產黨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又黨章草案，定總理一職爲選舉職，竊恐事實隨環境變遷，五年之後，將見陳獨秀被選爲總理矣，思之實爲寒心！至蘇俄政府之協助我黨改組，與陳獨秀是否同一鼻孔出氣，雖未敢斷定，惟陳獨秀利用我黨改組，而施行陰謀，則凡黨員皆能共見矣。」

中山先生於十二月三日詳加批明，其中要點爲：（一）黨章黨綱等草案稿，爲我請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爲英文，廖仲愷譯之爲漢文，陳獨秀并未與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二）陳獨秀之共產黨，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三）民權主義發端於選舉，若因嗜廢食，豈不自反其主義乎？若怕流弊，則當人人竭力奮鬥，不可放棄責任，嚴爲監視。如察悉有弊端，立爲指出，以後我每兩禮拜與各人集會一次，如遇有問題，可公開解決之。因一人所見有限，故不得不付之公舉。亦自覺所任常有不當之處，故不得不改革。（四）種種方法有不善者，目當隨時改良，方期進步。吾黨自革命以後，則日日退步，必有其故，則不圖進步改良也。並於信封上親批：「交鄧澤如照所批，約各人會齊，細心研究，如尚有不明白者，可於星期日再來問明。」

迨國民黨改組後，不及半年，中共對於國民黨初則陽奉陰違，不久即露跋扈狀態。中山先生乃指示廣州市黨部黃季陸、孫科等：共產黨驕橫不法，應予教訓。六月一日，黃、孫等提案於中央黨部，請裁判共產黨不法行動。共黨乃指市黨部爲「右派」、「反動」，破壞其指揮系統，由其控制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令各區黨部，區分部組織聯合會，撤開市黨部，直達中央，以遂其直接操縱之目的。

貳 監察委員彈劾案

至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獲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宣言及決議案」，決定遵照中共的決議，加入國民黨，但保存該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仍受中共的指揮，以擴大國民黨的組織與宣傳，並「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而阻止其集全力於軍事行動，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團員之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凡此均無異認國民黨如行屍走肉，注入共產黨靈魂而驅策之。澤如等乃提出彈劾案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並呈報中山先生。本案中央執行委員會雖提出討論，但對中共並未採取行動。茲將彈劾案錄後：

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案

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書

中央執行委員會公鑒：現查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團刊第七號，即擴大執行委員會特號」（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刊行），及其他印刷事實，經本委員會審查，認為中國共產黨員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為黨員者，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本黨改組以來，首重紀律，今共產黨、社會青年團加入本黨之諸黨員，如上述認定其違反紀律之處，尤為嚴重，關係巨大，不敢忽視，特列舉事實，加具意見，提出貴會，希即從速嚴重處分，俾本黨根本不致動搖。不勝迫切企望之至。事實及意見條舉於後。此致中央執行委員會。

專 實

第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

甲、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報告決議案（摘錄）

本團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及「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革命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

民黨」。同時大會指出本團尤須注意強烈的國民運動宣傳，以促進國民革命的實際的行動（如示威及政治罷工等）。（原案第二節第一段摘錄原冊第九頁第六行至第十行，原冊每頁十三行。）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

(1) 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

(2) 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原案第二節之第二段全文，原冊第九頁第十一行至第十頁第二行。）

乙、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摘錄）

（此案係附錄於決議案及宣言冊中者）

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眾黨的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原案第五節全文，原冊第六五頁第九行至第十三行。按此節所述，與本黨本無妨害，持違之備考。）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具有無產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之基礎。（原案第六節全文，原冊第六六頁第一行至第四行。）我們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

(一) 在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

(二) 阻止國民黨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衆之政治宣傳，並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

(三) 共產黨黨員及青年團員之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

(四) 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醒國民黨，勿爲貪而狡的列強所愚。（原案第七節，原冊第六六頁第五行至十一行）

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目前政治的鬥爭，自然只是國民運動，排除外力及軍閥的運動，因此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運動的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凡已了解國民革命之必要，更進而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當盡量加入我們的組織。並當於羣衆中，普遍宣傳「國民運動中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必要」。（原案第八節摘錄，原冊第六六頁第十二、十三兩行，又第三行至第八行。）

第二、團刊（第七號即擴大執行委員會特號）

附註：擴大執行委員會開會期，係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同年四月一日止，共議決十六案。第七號團刊，係同年四月十一日發行。

甲、北京報告決議案

我們加入國民黨合作，要注意下層切實的工作，宜極力避免無益的競爭。我們於國民黨中高級機關位置之競爭，對內既易發生不良之影響，對外又引起其他團體的反動，於不十分妨害本團活動範圍之內，應採取容讓的態度，而致全力於區分部或市黨部等切實工作（原案第九條全文）。對於國民黨下面的各種團體，我們同志應注意聯絡其感情，非必要時，不宜取敵視態度。（原案第十節摘錄）

乙、上海報告決議案

應注意學生運動，設法整頓上海學生聯合會。此種工作，最好督促國民黨青年部，要他們命令在校黨員向各校活動，改組學生聯合會。（原案第六節全文）

丙、關於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

本團為求擴大且改進國民黨的組織，以督促中國國民革命的進行，對於C、P中央之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關於此項之決議案，完全接受其指導。（原案第一節全文）

丁、（附C、P議決案）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

我們的同志在參與國民黨各種組織每種工作時，應於該項組織或工作詳細加以討論辦法，以為我們的一致努力的根據，以免臨時慌張分歧，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教育本黨同志，在國民黨進行組織及工作的事。如關於開會報告，議事表決，分配工作，考核成績，進行黨員教育，向外活動方法等之教育事項，應由區及地方委員會負其責任。（原案第四節摘錄）

本黨以後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於國民革命的，均應用國民黨名義，歸為國民黨的工作，因此（一）可減省人力財力；（二）可使國民黨易於發展；（三）可使各種努力的聲勢與功效比較擴大而且集中。但對於我們所認為必要事項，而國民黨不願用其名義活動的，仍作為本黨獨立的活動。（原案第七節全文）

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原表第八節摘錄）

第三、其他

(一) 此次中俄交涉，凡由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之黨員，不願本黨黨義，無論在何地者，皆一致主張北京偽政府承認蘇俄簽字於王正廷加納罕所議之中俄協定。(即承認北京為正式政府)

(二) 崔文成所著「中國國民革命與無產階級」一文，所說無產階級，若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可有下例幾條好處。其第二條云：「無產階級若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可以實際上感受到資產階級革命之不做底，猛勇的要求無產階級革命。」此種宣傳，何能出諸本黨黨員之口？乃崔黨員竟作此文，且硬要揭布於本黨上海民國日國之附刊「覺悟」(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刊行)，是不僅本黨黨員自毀本黨，且欲以民國日報為共產黨宣傳機關矣。

(三) 本年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李大劍在大會說明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之加入本黨的意思，并印布意見書，其中最扼要之語：「我黨之加入本黨，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我們對於本黨，實應負着二重的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普通的責任；一種是本黨聯絡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查本黨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是本年一月(即一九二四年一月)，距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之發佈，幾數月矣，李大劍等知其決議，且遵行此冊附錄之中國共產黨決議，而乃發此意見書，以欺蒙本黨總理及全國代表，其不忠不德，險詐不信，真令人不可想像。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是今年三月，第七號團刊發行是今年四月，距李大劍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意見書之期，亦數月矣。大會代表中有原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者若干人，皆耳聞李大劍之演說，目覩李大劍之「意見書」，何為其擴大委員會會議之決議又如此？合先後而觀察之，其用心積慮，令人不寒而慄。

見 意

本委員之意見如下：

(一) 本報告書之提出。

(1) 非反對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加入本黨。

(2) 非反對或排斥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為黨員者個人。

(3) 完全為本黨之生存發展起見，認為絕對不宜黨中有黨。

(4)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之加入本黨爲黨員者，純係共產黨在本黨中之一種黨團作用。

既有黨團作用，則已失其爲本黨黨員之實質與精神，完全不忠實於本黨，且其行爲尤不光明。(秘密之議決如彼，李大劍發表之意見書如此。)

(二)本黨總理尤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跨黨，係爲聯絡世界革命起見，然界限極明，觀李大劍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發表之「意見書」，足見當時彼等之陳說於總理者，亦確如此。在彼等之計，以爲共產黨之議決、社會青年團之議決、皆屬秘密的。今既爲本黨查得，詐謀畢露，與准其跨黨之旨完全相反，欺蒙總理，以求售其計劃，可謂陰狠極矣。

(三)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既全體加入本黨，彼等時欲以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而強本黨辦理。即如中俄交涉主張北廷簽字恢復邦交一事，彼等祇知有第三國際共產黨，何曾計及本黨耶？雖跨黨猶恐不免發生此類抵牾之問題，況尙有黨團作用乎？

四)彼等既爲本黨黨員，則無論在何種印刷物中，對於本黨主義及本黨政府軍事政治之行動，均不應妄加指擊或批評。「衛專」、「新青年」等刊對於本黨之議論，瑕瑜互見，尙可曰兩刊物者，非本黨之報；至「覺悟」固本黨民國日報之附刊也，竟有「國民革命爲資產階級不澈底之革命」之宣傳。此等宣傳，實於本黨不利，黨團行於內，言論發於外，本黨根本未有不搖動者矣。

(四)即退一步言，不論彼等以本黨黨員應具之義務與責任，而但言合作，此種行動，已摧毀破壞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本委員有上述意見，認爲關係重大，非速求根本解決，不足以維持本黨之存在及發展，故提出報告書，希貴會從速處分，是爲公便。

附 陳

彼等固有之黨既有「在發展本黨組織時，關於彼黨組織之發展不能停止」之決議，故社會主義青年團於粵、湘、鄂等區及北京、上海、安源，皆有組織。即就粵區而論，廣州、香港皆有機關，粵漢路及兵工廠青年工人補習學校，皆有支部，東莞、順德、香山、新會，亦有支部。(此係截至本年四月十一日之狀況)

此種辦法若就黨言，爲彼黨本分上應有之工作，然

(1)彼黨黨員固已全體加入本黨。

(2)由彼黨加入本黨之黨員，在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重要職務者，實非少數。

(3)學生、青年、婦女、工人、農人各方面之活動進行，本黨與彼黨實立於同一之進行線上。

(4)本黨進行取公開，而彼黨進行係秘密。

此四種關係，實屬特別，而半年來本黨派出組織黨務之專員有共產籍者，實占多數，以跨黨之人，同時辦理兩黨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於固有之黨，其結果可以想見。試舉一例以明之，彼黨「粵區議決案」有曰：「廣東農團特別發達，此種武裝勢力，不可忽視，應注意調查，相機活動。」

本黨對此決議將如何？本黨委任有共產黨籍又有黨團活動之黨員，出而組織農團，其進行與結果又將如何？是誠不可忽視之事也。此關於黨務進行上之影響頗巨，故附陳之。

叁 監委與鮑羅庭談話

上列彈劾案提出後僅一週，監委謝持、鄒魯特往訪俄顧問鮑羅庭，辯論C P及S Y在國民黨中黨團活動問題。鮑竟謂國民黨已死，非有共產黨利用黨團以救之不可，又謂兩黨互相利用，實行合作，又謂國民黨宗旨尚可行一百年，而不贊成分共。其語頗無倫次，然其中心問題，即不否認黨內有黨，實與李大劍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所發意見書中所謂「我黨之加入國民黨，斷乎不是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諾言顯相刺謬。

茲將中央監委與鮑羅庭的談話錄後：

謝持張繼與俄人鮑羅庭談話紀要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半在廣州東山鮑寓），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與俄人鮑羅庭談話，孫科翻譯。

監察委員曰：今日吾二人以中央監察委員資格與君說話。

鮑羅庭曰：余以中國國民黨訓練員資格與君等說話。

監曰：君見過此等小冊子乎？（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一九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團刊第七號而言)

鮑曰：未見。

監曰：君知此次發生問題之真相乎？

鮑曰：只在上海聞陳獨秀君云黨內發生問題，昨日胡漢民、汪精衛二君來，亦提起黨內問題。

監曰：即是一個問題。

鮑曰：指「非必要時不宜取敵視態度」之謂乎？（團刊中語）

監曰：非僅如是，乃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之黨團問題。

鮑曰：此問題須由根本上解決，勿論及枝葉。

監曰：誠然，我認爲中國共產黨不能自己作主，須受第三國際指揮，第三國際爲蘇俄所創造，又須受蘇俄指揮；然則俄國對中國革命，究取何種態度，是否只求友國民黨，抑同時扶助共產黨雙方並進乎？

鮑曰：余先述國民黨之真相，再提此問題。遼列舉金佛郎問題，德債問題，中俄協定問題，吳佩孚捕殺工人問題，皆關係極大者，不見國民黨有何等主張。中央執行委員已開會數十次，不見議事日程有關於國民大問題之討論：：：。

監曰：請君不心歷數此等缺點，本黨確不能免，或尙可加舉數十條，今春改組，全由於此，今既改組，先須解決組織上之大問題。本體上既發生問題，作用如何，可暫不提。組織上最重要問題，是否承認黨中有黨，即指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國民黨內組織黨團而言。

鮑曰：黨中分派，是不能免，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不能作黨之中心，當然黨內發生小團體，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對中俄協定之宣言，可認爲右派，共產黨則爲左派。

監曰：以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在黨內作黨團活動，認爲合理乎？

鮑曰：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只可說有國民黨員，不可說有國民黨。加入新分子如共產黨者，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黨可復活。

鮑又曰：小冊子何時發刊？

監曰：一爲去年八月，一爲今年四月。

鮑曰：不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三個月之後，見國民黨不振作，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不起來，並有許多右派分子加雜其中，乃不得不組織黨團。

監曰：依吾輩見解，君所用方法，欲令國民黨復活者，實足以使國民黨死亡耳。使多數小團體在一範圍內相傾軋、相競爭，乃致死之道也。

鮑曰：誠然，或可致國民黨死命，惟不希望如是結果，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

監張曰：余個人素來贊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共同從事革命，此次問題發生，仍主張交誼解決，今聞君之言論，則不能不變更主意。國民黨是一腐敗革命黨，余亦不能全否認，假如君所說共產黨是新生革命團體，如斯則兩種性質不相容，不如分道揚鑣，腐敗者團結起來，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兩無阻礙，分作兩起，豈不更佳？

鮑曰：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只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反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有不奉命者，則認為違反命令。

監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否全體加入本黨，抑只則加入一部分？

鮑曰：不知。按原則說，應該全體加入。

鮑又曰：假令將共產黨分出去，共產黨或者更換黨名，而主義仍與國民黨同，徒分離革命實力也，前途必不利。

監曰：吾輩亦非絕對主張分離者，惟黨團作用萬不能容許耳。

鮑曰：今日兩者本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惟兩相利用之結果，國民黨更多得利益。

監曰：此為一重要問題，正願與君明言。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互相提攜，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結果。如只有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自今春以來，只見有害，不見有利。

鮑曰：中國共產黨歷史甚短，在中國社會無十分勢力，假使只有一個共產黨人，為國民黨計，亦當招之來，不可揮之去。

監曰：中國共產黨原無足輕重，因其不過第三國際之差違，第三國際為蘇俄所創，俄國對中國革命政策，將由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操縱左右之，俄國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俄國之子；中國國民黨或可為俄國之交，尚不可知，余之觀察如是。

鮑曰：誤解。然吾知國民黨人許多反對與俄國共產黨合作。

監曰：社會主義青年團決議案及團刊第七號所登載關於國民黨者，君是否認為正當。

鮑曰：此兩種印刷，未經莫斯科本部審查認可，尙不能承認。

監曰：如君所說，國民黨已成待斃之人，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爲一復活劑，將打注射針而救濟乎？

鮑曰：事相類而語不如此說。我們合作，我們合作。

監曰：國民黨腐敗分子，僅爲退步的而已，并未表明反對國民黨宗旨，亦未組織團體與本黨相抗衡，即使有一時的組織，亦不過一時之作而已，并未將國民黨作一對相的研究物。照此兩種印刷物觀之，共產黨持永久之計劃，將國民黨作一對相，日日以如何對付國民黨爲切要目的，國民黨不能不認共產黨團爲本黨本體上之大問題。

鮑曰：無妨，凡黨皆有左右派之分。

監曰：國民黨與共產黨只能說是兩黨，不能說是兩派，君如認之爲合理，吾不料所謂組織者竟如斯，直欺人之禪耳。

鮑曰：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中國尙可應用一百年。假使國民黨改爲共產黨，吾亦不贊成，只有提皮包離廣州耳。

監曰：誠如君所言，反面說在中國行共產主義，尙須待至一百年之後。共產黨全體既加入國民黨，實行國民革命主義，又何必另掛中國共產黨招牌，保留共產黨組織耶？

鮑曰：國民黨中央幹部尙未能組織完好，不能指揮全體黨員，又未能對全國最有關係之問題，時時有所主張，共產黨不能取銷自己的組織。

鮑又曰：國民黨依多數決議，可自由的驅逐共產黨員出黨，但不希望如此作。

監曰：今日談話只如是，改日再按續討論。

（註）本節文件見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九輯

第三節 中山先生之逝世與國民黨之分裂

（註）

由於容共與反共之紛歧，造成國民黨之分裂。

民國十二年，直系軍閥曹錕以賄選爲北京政府總統，中山先生聲電致討。十三年八月，張作霖率奉軍入關討曹，是謂第二次直奉戰爭。由於吳佩孚之下馮玉祥倒戈據北京，致直軍潰敗。當奉軍入關時，中山先生亦駐節韶關，率師北伐。直系既敗，張、馮等擁段祺瑞於十一月出任臨時執政，共同電邀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乃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山先生乘船經日本，十二月抵北京，患肝癰，不治，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中山先生北上後，黨員先後至京者甚衆，而反共活動，亦於此時迅速展開。

壹 北京護黨運動

十四年一月中旬，馮自由等在北京組織「國民黨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自由爲國民黨老黨員，因反對容共，當國民黨改組時，即與謝英伯、馬素、鄧家彥等憤而離粵，至是組織同盟，上書中山先生，略以中共加入國民黨以來，日以宣傳共產主義，破壞本黨爲事，一年以來，構陷、傾軋、離間、收買、脅迫之陰謀，無所不用其極。本黨同志對主義發生懷疑，內外人士對本黨信仰因而減低，至堪痛心。去秋（按：當係指去年六月）廣東方面同志，列舉共黨罪狀，提出彈劾案，未蒙總理採納，深以爲憾。其後共產黨反對北伐，離間友軍感情，攻擊總理北上，焚燬廣東商場，侵吞社會捐款等，罪行昭著，今不急圖挽救，本黨將淪於萬劫不復之境。因此組織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決議挽救方法七項如左：

- (一) 在中央黨部及執行部共產黨員一律撤職。
- (二) 與共產黨有關之黨內印刷所、新聞雜誌、學校、宣傳機關之津貼，一律停止。
- (三) 現在一切有關政治問題，由總理指定無共黨嫌疑之純粹黨員三人以上，負責辦理。
- (四) 派至各省國民會議宣傳員，其有共產黨籍者，一律撤換。
- (五) 最短期間內在北京召開二全大會，共產黨員代表不得出席。
- (六) 各地黨員去年提出之彈劾共產黨各案，由純粹黨員組織特別裁判委員會裁判之。
- (七) 本黨一切大小事權，以後不准外國人干與。

與此同時，「國民黨護黨同志駐京辦事處」之鄒魯、謝持等，一月十日，發出通告，公布彈劾共產黨宣言如下：汪兆銘勾結共產黨加入本黨一年有餘，紊亂黨綱，蹂躪黨紀，專擅已極。我黨外受敵黨挑撥，內起黨義爭執，遭遇難關，朝暮難保。本黨監察委員張繼等及各地同志去秋（？）提出彈劾案，揭發共黨陰謀（共產黨員之國民黨內工作決

議案)，特披露如左，促請全黨同志注意。

(一)共產黨認國民黨各級黨部爲其活動機關，我黨（共產黨）應以全力達成運用國民黨的目的。

(二)對不願與吾人合作之國民黨右派，吾人暫取停止鬥爭，極力忍耐的和平態度，對國民黨左派，親共的汪兆銘、廖仲愷等，以慎重態度使其成爲純粹共產黨員，以強大我黨基礎。

(三)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實力派的提攜。

(四)防止國民黨與俄國以外的國家發生親善關係。

(五)除運用國民黨外，對其他黨派，實行局部聯絡，必要時應予運用。但局部聯絡應保持秘密。

(六)深入社會組織中心，破壞社會現狀。

(七)破壞國民黨的改良工人生活計劃。

(八)深入北京及各地學生總會，作爲我活動運用機關。

以上兩個組織，直至中山先生逝世前夕，三月八日，合併爲「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排斥共產黨宣言，選唐紹儀等六十人爲理事。宣言如下：

「我黨盡力建國大業，歷數十年，內行民治，外求國際平等，舍實行三民主義外，其道莫由。然辛亥革命，終以與反革命妥協，未能循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次第發展。最近共產黨加入後，更形惡化。黨貴有一定主義政綱，衆人在同一旗幟下，爲國盡力。然共產黨欺騙總理，伴稱歸順國民黨，實則利用本黨名義，自圖發展，爲禍本黨。彼等接受俄國運動費，收買青年，欺騙勞工。彼等百計謀不利於本黨，高唱放棄外蒙，作俄人走狗，阻礙黨務，罵本黨大多數同志爲反革命，非黨人，以赤化本黨。三民主義決不與共產主義同科。欲言救國，必先有國民革命運動，欲言國民革命運動，必須擁護三民主義，欲擁護三民主義，則同志之意見疏通，實爲急務。本此旨趣，爰有同志俱樂部之組織。網羅同盟會、民國元年之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民國九年以後之國民黨之同志，準備數月，各地協議結果，於三月八日在北京成立，出席者二千餘名，內部之機關亦組織就緒，特此宣言。」

爲對付此種反共活動，汪兆銘等於三月十日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聲明，謂中央與「同志俱樂部」無任何關係，

並決議將馮自由等三百二十名開除黨籍。至十二日，中山先生逝世，分裂運動停止一時，不久再起。容共派及共產份子相率南下，置反共份子於北京而不顧。六月三日，中央聲明，聯俄容共政策並無赤化意味。七月一日，廢大本營，設國民政府，置於國民黨指導之下，行委員制，以胡漢民爲主席，廖仲愷爲財政部長，而鮑羅庭權勢甚張。在京之同志俱樂部聲稱：(一)在共產黨存在黨內期間，廣東政府一切行動無效。(二)在共產黨問題未解決前，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切職務，由同志俱樂部代理，至此，國民黨已陷於分裂之境。

貳 西山會議

自是之後，在民國十四年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分化，國民黨的反共活動及國民黨內部反共與容共兩派的衝突更形尖銳化，其著者有軍校員生的國共雙方的對立事件，戴傳賢在理論方面的反共事件，廖仲愷遇刺事件，及西山會議事件。

中山先生北上之後，共產份子分化國民黨的陰謀活動益趨積極，乃欲奪取革命武力的中心黃埔軍官學校，在軍校中，本有許多共產份子，如周恩來即爲軍校政治總教官，葉劍英任教官。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產份子發起「青年軍人聯合會」，吸收軍校及其他部隊中的跨黨份子，甚至散佈謠言，說蔣校長已加入共產黨，來誘惑軍校學生加入該會。軍校學生及部隊中忠於三民主義及國民黨之官生，不堪其組織的壓迫，於是陳誠等乃發起「孫文主義學會」與之對抗。

戴傳賢出席十三年一月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中央執委，然隨即返滬，其時胡漢民、許崇智，及蔣中正均先後離粵，直至中山先生一再電召，並經蔣中正相約，傳賢始於三月赴粵就職，至六月，竟被中共份子排斥而去滬。十四年五月，在滬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謂中山先生思想乃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統，以別於共產主義者舶來的及唯物物的學說。又著「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謂「共信不立，則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則團結不固」，以反對容納信仰不同主義之中共。此項論著成爲反共之理論武器，黃埔軍校之「孫文主義學會」即接受此理論，而被中共指爲「新右派」，予以不斷的攻擊。

此時被中共目爲左派者爲廖仲愷、汪兆銘及蔣中正等，廖仲愷始終主張容共者，其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財政部長

及軍校黨代表等職，權重一時，遂爲反共者所嫉視。八月二十日，仲愷被刺於中央黨部，主持者爲胡漢民之弟胡毅生。刺客被捕，同謀者亦被拘處刑，而鮑羅庭及中共份子遂指胡漢民爲右派，指爲與聞此事。漢民暫避居於軍校附近蔣中正寓所，卒被迫出國，赴俄遊歷。

在廣州之國民黨中央仍持容共政策不變，而離粵之執監委員，則於十月二十三日召集會議於北京西山碧雲寺中山先生之靈前。此即著名的「西山會議」，參加此次會議者被目爲「西山會議派」。

自「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成立後，租定北京城內菜市胡同三十七號爲辦公地址，反共之國民黨員參加者甚衆。九月，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等到北京，在北京執行部召集開會，爲于樹德糾衆拒絕。（于爲中共份子，代表直隸省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執委，在北京執行部工作。）於是林森等聯合在北京之中央執委，電請各地執委到張家口開會。上海執行部葉楚傖、邵元冲、沈定一、戴傳賢等應邀前往。到京後，適馮玉祥與張作霖間戰雲密布，楚傖等乃主張即在西山中山先生靈前開會，乃舉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大會」。決議案指出：「兩年以來，凡共產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本黨一切言論工作，皆係受共產黨機關決議與指揮，完全爲共產黨團之作用」，乃決定開除具有共產黨籍之李大劍、譚平山、林祖涵、于樹德、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等九人國民黨籍，汪兆銘停止黨權六個月，解聘鮑羅庭顧問之職。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其後移至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

在西山會議時尚有一插曲。戴傳賢雖同意反共，然仍希望國民黨人不因此而造成分裂之局。彼於偕同沈定一等四人至北京後，數度訪問在京之監委吳稚暉，決以稚暉之意見爲從違，絕對不自行發表意見。及十八日開預備會時，稚暉到會，細述其意見數小時，主張對汪兆銘爲勸告，而勿爲彈劾，對共產黨宜約李大劍協商，而不採片面決裂之行動。詎十九日下午，忽有數十人各携手杖、棍，乘汽車三輛，至戴、沈等寓所西山香雲旅社，戴、沈出見，拳棍交加，滿身皆傷，然後擁上汽車，駛至「同志俱樂部」。戴、沈之所以被毆者，因彼二人均曾發起中國共產黨。實則傳賢根本反對容共，已如前述。至定一之退出共黨，則由於其抱三點見解：（一）主張以移民政策解決中國之人口問題；（二）反對單純之階級鬥爭；（三）贊成傳賢所主張：國民黨重要職員不得跨黨。傳賢方被中共指爲新右派，而竟爲西山派所不容，故其致友人書

中肯引「白亦可蹈，中庸不可能」二語，而不勝感慨系之。

至民國十五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仍繼續容共，制裁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開除黨籍，林森、張繼、居正、沈定一、石青陽、茅祖權、傅如霖等七人警告，戴傳賢訓令處分，仍選爲中執委。而西山派亦於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新執監委員，與之對立。

西山會議派，直至民國十七年南京與武漢先後清共之後，始在「滬寧漢合作」口號下而結束。

（註）本文主要資料來源：①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三七至三八頁。②「張溥泉先生全集」六七頁。③戴傳賢先生文存九七五頁、九七九頁及九八六頁各文，④波多野乾一「中國共產黨史」九八至一〇五頁。

第四節 中共對國民黨之分化

面對國民黨之憂慮與分裂，中共更不斷進行分化活動：親共者被指爲左派，反共者被指爲右派，尙有所謂中派，新右派等等。對右派、中派及新右派則予以打擊，對左派則予以捧場。而所謂左者，非左到同共產黨一鼻孔出氣不止。儘管在宣傳上是辯證的，花樣百出的，而其中心思想確是如此。

壹 「嚮導」論左右派

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僅四個月，國民黨之派別尙未發生，中共機關報「嚮導」即公開發表一文，預言「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謂：「左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忠誠的要貫徹國民主義，對於任何列強與軍閥，終以羣衆的反抗爲目的，而不肯出於根本的妥協；右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急於黨的勝利，甚至於是急於自己個人地位的成功，主張在與列強或軍閥妥協之下，靠少數人的武力，獲得若干政權」。「這可以說不算國民黨了」。

當時反列強、反軍閥原爲中國人民一致呼聲，亦即國共兩黨共同主張，但必須照中共方式去作，方是左派，否則就是右派，而不算國民黨，如此，國民黨之行動即爲共產黨所箝制。儘管此文中辯稱：並不是「國民黨相信社會主義的是

左派，不相信的是右派」，但觀高一涵表示：「國民黨若採社會主義他方肯加入」，可知中共所造成的空氣如何不利於國民黨，而有利於共產黨！

茲將嚮導所刊原文錄後：

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

(民十三、四月二十三日嚮導六二期)

凡是一個大黨，內中總難免含有若干派別，簡單的分左、右、極左、極右及中央五派，這是主義及政策實施時自然的結果。中國國民黨之改造方在萌芽，此時不但不應各懷意見，且實際的政治運動未認真活動以前，也斷然沒有真的左右派之意見發生，即有意見，也不過是私的感情衝突，決不是公的左右派政見之不同。但將來國民黨在政治上實際運動豐富時，左右派政見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他們不同之點，所爭者自然屬於具體的政策；此等政策，此時我們還不能夠預知，惟那時採用政策之主張所以不同，必然由於兩方之出發點有一些不同的根本觀念，此不同的觀念，乃是左右派之真意義，這是我們可以預知的。

將來國民黨左右派之不同的觀念，即不同的出發點究竟是什麼？我們可以說：採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採用妥協方法的是右派；兩方的觀念不同，出發點不同，兩方所採用的方法與具體政策，便自然不同了。左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忠誠的要貫徹國民主義，對於任何列強與軍閥，終以羣衆的反抗爲目的，而不肯出於根本的妥協；右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急於黨的勝利，甚至於是急於自己個人地位的成功，主張在與列強或軍閥妥協之下，葬少數人的武力與權謀，獲得若干政權。

這是將來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照這個意義，左派乃是真的國民黨真的國民主義者，右派乃是拋棄了國民主義，實際上可以說不算國民黨了。

怎樣才是國民黨的左派或右派，本應該是如此解釋：有人以爲國民黨中相信社會主義的是左派，不相信社會主義的是右派，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例如高一涵君前曾表示：國民黨若採用社會主義他才肯加入；又如國民黨某君曾在廣州支部演說：國民黨應採社會主義，否則便是官僚黨；他們這些錯誤的見解，乃忘記了國民黨不是社會黨，忘記了國民黨的使命和社會黨的使命不同。社會黨的使命是爲階級的革命而奮鬥；國民黨的使命是各階級合作爲國民的革命而奮鬥。國民黨固然也可以採用若干社會主義的政策，而他的使命究竟與社會黨不同，所以決不能拿相信社會主義與否爲國民黨左右派的標準。而且社會黨的右派（即反對革命的改良派），在世界革命的工作

中，其價值遠不及國民黨的左派，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因此，相信社會主義的人也肯加入國民黨；但他們加入國民黨，是為國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來做社會主義的運動而加入的；因為真懂得社會主義的人，應該明白國民黨的分子及使命和社會黨的分子及使命根本不同，不是可以隨便瞎來的。

社會主義者在國民黨中，理論上固然應該屬於左派，但事實上將來是否左派，還是個問題。因為所謂國民黨的左派，他的真意義乃是「始終採用革命方法，忠誠的貫徹國民主義，不肯妥協」。并不單是唱些共產主義的高調，便算是左派。口唱什麼共產主義，什麼社會主義，或什麼無政府主義，而實際上不去做革命的工作，這種分子在國民黨中是右派不是左派；因為負有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他的左派，應該以革命分子、非革命分子為標準，不應該以相信社會主義與否為標準。

我們希望國民黨對於社會主義者之加入，及一切社會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都有一個明確正確的認識；同時，我們又希望自命為國民黨左派的人們，對於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及左派之使命，也要有一個明確正確的認識！

貳 為「左派」定四個標準

此等有利於共產黨，不利於國民黨之空氣繼續發展一年，至中山先生逝世後，情形更形激化，青年們不僅不願為右派，而且不願為中派，他們甚至於懷疑：「我們既不是共產黨，怎好自列於左派呢？」中共於此火上加油，「時時準備幫助左派，希望全體忠實的國民黨員都是左派」。中共並且替左派定出四個標準：(一)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及賈辦；(二)與蘇聯攜手；(三)與右派決絕；(四)保護農工羣衆利益。並唱出「不左即右，無中立的餘地」的口號，希望國民黨青年及一切領袖人物左化。

此等主張，亦見於嚮導，茲將該文錄後。

何謂國民黨左派

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中有一種最好的現象就是黨員羣衆之左傾。不僅廣東如此，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各處亦莫不然。他們左傾

的程度，恰好與右派反革命和段政府招降納叛破裂國民黨的陰謀成正比例。

記者近日會見好幾個從北方南方的朋友，都對我說：現在國民黨大多數的青年黨員，不僅不願為右派而且不願為中派；但他們又懷疑——「我們既不是共產黨，怎好自列於左派呢？」

這可謂是一個誤會。我敢鄭重的申明一句：我們共產派不願居（自然更不願獨佔）國民黨左派的美名，但願一切革命的中山主義者成為國民黨本身的左派，我們共產派是時時刻刻準備幫助國民黨左派的，並且希望全體忠實的國民黨員都是左派，成功無派別的整個的國民黨，以完成中山主義和國民革命的偉大使命。

一個革命黨若任何許多反革命的派別同時並存，是不能成功其革命使命的。俄國共產黨之所以成功，便因為他是建立在整個的革命的政綱策略和紀律之上的無派別的革命黨。他如何能成功個這樣的黨呢？因為他不停的和各種各色的反革命派決裂，嚴格的淘汰一切改良主義分子、投機主義分子以及妥協分子；不僅不容許黨內有右派，而且不容許黨內有中派，所以才能成為整個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黨，而成就其偉大的歷史使命。

我們希望國民黨「只是」左派的國民黨麼？可說是的，也可說不是的。因為我們希望國民黨是整個的建立在中山革命主義上面而成功為無派別的黨。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實踐兩個先決條件：一是開除反革命的右派；一是全體忠實的黨員之左傾。所以在目前這個時候，國民黨最大多數黨員之左傾，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然而左派決不是一個念頭或無條件可以做到的。左派的必要條件至少有四個：（一）澈底的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及其附屬物軍閥、買辦階級……（二）恪守中山先生引導中國民族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聯手的方針；（三）與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決絕；（四）進行保護革命中堅勢力的工農羣衆利益之政綱。這四點也就是中山主義最重要的內容。必須具備這四個條件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才是真正的中山主義的國民黨員。

從北方來的朋友又對我說：「許多國民黨青年黨員不僅以右派為恥，而且聽着中派這個名詞亦很不高興。他們現在覺得只有兩途：不左即右，沒有中立之餘地。」羣衆心理是革命的寒暑表，國民黨青年黨員這種直覺是很正確的！一九一七年以來的西歐革命運動史，早已證實了這種「不左即右」的真理，不僅各國社會黨右派是革命的敵人，中派也是革命主要的障礙；結果中派與右派終歸同趨於一個反革命的營壘。德國的中派（考茨基派——獨立社會民主黨，不久仍與右派愛倍爾的社會民主黨合併）如此，法國的中派如此（朗格派以至佛洛沙派），其他各國的亦莫不如此。他們開始創立第二個半國際，自謂介於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之間，不到兩年，第二個半國際

然復歸於第二個國際與之合併，一切中派「英雄」完全破產。革命潮流愈高，「不左即右」的真理便更被證明。中國國民黨自去年以來，已從新入了這個試驗時期，中山死後，這個試驗將愈加嚴重。所以我們不僅希望國民黨一切青年分子之左化，而且希望一切中堅分子領袖人物之左化。

然則這種左化的意義，是可化於共產派麼？不是的，絕不是的。只是真正的同化於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中山主義。中山主義與共產主義顯然是兩個不可混淆的標幟；不過共產主義者願意幫助中山主義之實現。共產主義者既無赤化國民黨的希望，更無赤化國民黨的妄想，假使不如此，我們便不成其爲馬克斯、列寧派了。所以我說，我還應再說：共產派不願居國民黨左派的美名，但願一切革命的中山主義者成爲國民黨本身的左派，我們共產派是時時刻刻準備幫助國民黨左派的，並且希望全體忠實的國民黨員都是左派，成功無派別的整個的國民黨，以完成中山主義和國民革命的偉大使命！

叁 指戴傳賢為「新右派」

（民十四、五、三，嚮導一二三期）

於是，戴傳賢在上海刊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從理論上反對共產式的革命及其分化國民黨的行動。此在當時確實發生重大影響，予國民黨一切反共者，過去的及未來的，以理論的基礎，亦予國內一切不滿中共人士以思想的啓發，此當然爲中共所不能容忍，於是陳獨秀出面，公開的給傳賢一封六千餘字長信，在理論上，反傳賢只要民族爭鬥，不要階級爭鬥的主張，而以爲要實行民族爭鬥，非階級爭鬥不可。在態度方面，獨秀否認共產黨是借國民黨的軀壳以自圖發展，否認在國民黨選舉中排斥非C P，否認挑撥國民黨人內部的感情，否認在工運中排斥國民黨，獨秀與傳賢是朋友，初次交手，又採取寫信的方式，總算客氣，還沒有向傳賢戴帽子。（該信在嚮導發表，時間爲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文長，不錄。）

迨西山會議開會之後，國民黨正式分裂，而傳賢又與西山派有所關連，於是中共繼續攻擊右派，而指傳賢及其同情者爲「新右派」，在陳獨秀「什麼是國民黨的左右派？」一文中，歷數國民黨早有左右派：最初是孫、黃（興）分裂，右派由歐事研究會變爲政學會；其次是孫、陳（炯明）分裂，右派變爲聯省自治派；再其次是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右派變爲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最近又漸漸形成戴季陶一派。「文中指當時尚主張客共的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闓

、程潛、于右任、徐謙、吳稚暉、李石曾、顧孟餘、丁惟汾、王勵齋等是左派領袖。又定出左右派的新標準：凡是主張聯俄，與共產黨合作，保證農工權益的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獨秀此一「發明」，當是爾後民國十六年中共在武漢所高呼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農工」的張本。茲將此文錄後。

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

獨秀

(民十四、十二月三日擲筆一三七期)

我們要明白國民黨的左右派是什麼，這不但為國民黨之重要問題，並且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重要問題，我們若是把國民黨看做整個的而無左右派的分別，便無由判定國民黨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我們若是懂得國民黨中有左右派之區別，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然後擁護國民黨的人才不至受人指摘，非難國民黨的人才不至一概抹殺。

有些人不相信國民黨有什麼左右派之分別，可是在事實上，國民黨左右派之分化，及歷來右派另自形成組織，都非常明顯：最初是孫、黃分裂，右派由歐事研究會變為政學會；其次便是孫、陳分裂，右派變為聯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右派變為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最近從中山先生死後到現在，又漸漸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黨內之階級的背景都更明顯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幟都更鮮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說是國民黨右派在思想上最後完成了，同時，左派的思想亦因之明瞭而正確了。

有人以為共產黨是國民黨左派，這是非常之大的錯誤。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行動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產黨是共產黨，國民黨是國民黨。國民黨自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產黨做國民黨的左派呢？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與政策，無論如何左傾，如何急進，究竟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就現有的事實而論，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如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闓、程潛、于右任、徐謙、吳稚暉、李石曾、顧孟餘、丁惟汾、王勵齋等一班人，沒有一個是共產黨黨員。

國民黨的左右派之分別究竟是什麼呢？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前後，可以說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義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義的是右派；現在的左右派，却不是這樣簡單的分別了，以前不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不信仰三民主義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實際上脫離了國民黨了；現在新的右派，雖然口頭上也說主張反帝國主義與軍閥，並且高高的掛起信仰三民主義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實際上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理想與策略，他們如何實行三民主義之方法，都完

全與左派不同。

在理想上，左派之反對帝國主義，乃根本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這一制度之本身為壓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勞動平民擾亂人類和平的怪物，右派之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根本反對帝國主義這一制度，乃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同時他們並企圖中國民族也發展到帝國主義；左派之反對軍閥，其目的是在去掉軍閥政治代以民主政治，右派之反對軍閥，其目的是在去掉軍閥政治代以仁愛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謂仁政，現代所謂賢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實現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國民革命，國外有聯合蘇俄，國內有聯合工農階級及共產黨之必要；右派則反對聯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工農階級之階級利益的爭鬥而失其同情，所以右派雖然口裡也說要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口裡也說要國民革命，然而實際上只能口裡說說，而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國民革命之實際工作，一步也不能動手去做。他們口中所說的「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所說的「國民革命」，都和不能兌現的支票一般。他們的專門工作只是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階級爭鬥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飯睡覺，至多只能閑暇無事時做幾句孫文主義、三民主義的頌聖文，他們雖然掛着革命的招牌，可是不會為革命流一滴血，不會為革命坐一次牢監，並且不會為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舉行過一次示威運動、散過一次傳單；他們不但自己不去做這些革命工作，並且還極力向廣東、上海、北京正在革命戰線上拚命的左派加以不斷的攻擊，袖着手不革命的，還算是右派的好分子。

右派所謂「真正三民主義」，所謂「三民主義的信徒」，也只是一塊騙人的招牌，他們並不會想過如何才能夠實行三民主義。他們極力排斥國外最反對帝國主義的蘇俄，極力排斥國內最反對帝國主義的共產黨，極力排斥反對帝國主義最有力的工人、農民之階級爭鬥，試問他們還有什麼方法實行民族主義？他們輕視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之階級的利益，試問他們所要實行的是甚麼一種民族主義？他們反對階級爭鬥，試問在資產階級爭鬥之下，有何方法可得保證農、工、平民之民權？倘若不讓工、農階級由階級爭鬥而形成級他們的勢力，足以挾制資產階級，使他們不得不承認節制資本與大產業國有，足以挾制地主階級，使他們不得不承認平均地權，試問國民革命另有何種力量可以實行民生主義？不實行三民主義，則「真正三民主義」豈不是騙人的招牌？左派知道三民主義不是一個宗教，單單信仰主義是不够的，單單信仰主義，只是一個信徒，不是革命家；左派知道單單宣傳三民主義，而不能指陳其實行政策，也便是胡適之所譏諷的「名詞運動」；左派爲了要實行三民主義，便不得不採用「聯俄」「與共產黨合作」「不反對階級爭鬥」這些實際需要的政策。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國民黨中現在的左、右派之分別，已經不是在口頭上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與否或信仰三民主義與否之間

題，乃是在實際行動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是否真能實行三民主義之問題。

左派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

右派是口頭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口頭信仰三民主義，而不想實行的非革命派。

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必須贊助國民黨的左派而反對右派。

「右派」固為中共所反對，「新右派」亦為中共所不容，於是陳獨秀繼續發表「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一文。指新舊右派是在勾結帝國主義的英國破壞廣州國民政府，指為「公然反動」、「背叛了國民革命」，而「脫離了國民黨」。

於是連國民黨的右派這一地位亦為中共所否認矣。

值得注意者：中共對於國民黨「日取其半」方式予以不斷分化，使其逐漸減小幾至於無，而國民黨之被捧為左派者亦漸漸形成自保的非共運動。在本文中，所提國民黨左派領袖只有汪精衛與蔣介石，而不及胡漢民以下諸人；但同時不得不顧忌孫文主義學會的興起。此學會以黃埔軍校為起點而向外發展，惟當時蔣校長尚未公開予以支持耳。

茲將該文錄後：

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

（民十四、十二月二十日籌導一三九期）

一個黨內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較之詞，並不是絕對的，所以一個黨裡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則以前的左派會比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脫離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傾分子，也會形成新的右派。

中國國民黨早已有過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歷史，我們已常常說過。自去年正月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黨內階級的分化，隨着中國社會運動之階級分化，日漸明顯；中山先生死後，黨內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正式另立組織：北京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及上海的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謀在北方發展勢力；後者結合唐繼堯、趙恒惕、陳炯明等，謀在西南發展勢力；這兩個俱樂部對於段政府之態度雖不一致，而反對共產派，反對國民黨左派，並且勾結帝國主義的英國，破壞廣州的國民政府，則是一致的。這班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已公然反動，他們雖然還以國民黨自居，並且以純正的國民黨自居，可是我們只能當他們是社會上的一種反動

派，不能當他們是國民黨右派了。因為一個黨中的左、右派，雖然有政策的右、左傾及行動緩、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國民黨，即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也不能離開國民革命，國民黨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來破壞國民政府，已明明不但不離開而是背叛了國民革命，已經事實上脫離了國民黨，還算得什麼國民黨右派呢？右派畢竟還是以國民革命為目的之國民黨啊！

這班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已經脫離了國民黨，那國民黨中有沒有新的右派呢？有的，五卅運動的高潮，表現出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中最偉大的社會勢力，同時也就加速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形成的過程。這個現象直接的反映到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他們便竭力想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並且要想在組織上鞏固起來。在具體事實所表現的就是：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上海各馬路商聯會極力和反動的總商會結合起來，反對學生及工人，又一小部分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國民黨黨員，勾結以前的右派即反動派，假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爭鬥，反對共產黨，並反對國民黨左派，甚至於反對國民政府。一個黨，總不免有比較右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傾而至於反動，還算是右派而非反動派，我們對於這種右派，並不必特別反對，可是現在國民革命的新右派，一開始即帶有反動的傾向，這都凡是忠於中國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們加以不客氣的警告。這一新右派在理論上並且在組織上（孫文主義學會）形成起來，一天比一天明顯。他們雖然竭力自別於代表官僚買辦的反動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實他們當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並且在事實上他們既然反對階級爭鬥，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左派，並且反對國民政府，客觀上便實實在在的幫助了反革命和帝國主義者。（如謝持、居正、周頌西、孫鏡亞等）。

李陶先生對我說：他們並不反對階級爭鬥，只是在國民黨的立場不便鼓吹階級爭鬥；然而事實上近幾天的民國日報上反對階級爭鬥之論調都非常之高。

他們暫為顧全中山先生遺囑計，尚未公然反對蘇俄，然而他們在取消共產派黨籍宣言上，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藉以維持蘇俄」；又說「掃除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所謂任何屬性，不用說所謂「赤色帝國主義」也包含在內。

他們反對共產黨更不用說了，他們說共產黨只要民族主義，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唾棄而且加以攻擊，其實共產黨不但努力民權運動（集會、結社、出版、言論自由之要求），並且他的民生運動（工農解放）比任何黨派的政綱都徹底。他們說共產黨借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黨的主義；其實共產黨有他們自己的各種機關報，各種印刷品，宣傳他們的主義與政策，從來不會借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主義，而且在事實上又何能够在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主義？中山先生、李陶先生都曾經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而共產黨人都不會先此驚人之談！他們口裡雖說不信口雌黃地誣蔑共產黨，其實他們公然著書通電（例如最近廣東孫文主義學會的通電及孫鏡亞告國民黨

同志書等），捏造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無稽之談，誣蔑共產黨人簡直陰險賊狠不成人境，最近為廣大問題，不但說共產黨早已開除的陳公博是共產黨人，並且硬指顧夢漁（孟餘）先生也是共產黨人，藉以證明共產黨奪取廣大的陰謀。他們口中雖說承認共產黨和他們是政見略有不同的黨（孫鏡亞都說是「貌為同舟，實類敵國」啊！），可以聯合起來，共同作戰，其實在北京、在上海、在廣州，無論民族運動、民權運動、民生運動，他們都表示不和共產黨合作，並且他們自己也不獨作，他們雖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會，他們竟不肯參加，在北京的反段國民大會，他們雖然參加了，而他們的首領鄒魯，却硬逼鹿鍾麟下令壓迫國民大會，說這次國民大會是赤化運動。

自討伐楊、劉以來，左派領袖汪精衛、蔣介石等在國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們也應該說功多於過；然而右派對於他們的攻擊，竟無所不用其極，不惜羅致許多罪名，假造許多謠言，彷彿汪精衛等真是罪大惡極之徒（見他們致各級黨部電，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國日報論文，孫鏡亞致汪精衛書等）。他們不但這樣攻擊汪精衛，並且在西山開會議決開除汪精衛黨籍，不許他任國民政府職務，他們這樣的舉動，簡直是有意動搖國民政府，為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梁鴻楷、魏邦平、張國楨、熊克武等復仇。鄒魯等在西山開會，表面上雖然是反對共產黨，實際上另有破壞國民政府的陰謀，李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會議，正因為發見了他們這種反革命的陰謀。

他們說共產黨慣以反革命、反動等罪名加諸異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實，他們應自問和馮自由、鄧家彥、馬素相去幾何？即客氣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說是反動的傾向罷！

他們這反動傾向的根本，是不識中國的國民革命乃整個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們口中雖然不贊成國家主義，其實他們的根本思想和國家主義者一樣，同是誤認中國國民革命乃整個一國家的孤獨運動，不認識雖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外也有友軍，國內儘有敵人；因此，他們遂至對外反對蘇俄，對內反對階級爭鬥，反對主張階級爭鬥的共產黨，因為左派聯合蘇俄及共產黨，他們遂至反對左派，因為國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們遂致反對國民政府，他們的反對傾向就是這樣相因而至的。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固然應該和國民黨左派結親密的聯盟，無論在黨內或黨外；即右派，亦應與之在每個行動上聯合作戰；至於反動派，則在於聯合戰線外了，因為他們已經背叛了國民革命，站在敵人那邊了。此時新右派之反動傾向，也非常嚴重，這傾向若繼續發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動派畢竟是一家眷屬，則所謂「新右派」這一名詞便應該取消了。

必須指出：當時中共反右派之活動不限於宣傳，宣傳不限於嚮導，而嚮導也不僅此數文。中共造成一龐大壓力，打擊「右派」，使其不能抬頭，控制左派，使其不能異動，此種壓力，只有身歷其境者始能感到其強大。

第五節 自國民黨二次大會至整理黨務案

民國十五年上半年，容共政策有所修正，中共氣勢，由極度的囂張轉爲一時的收斂。其間經歷三大事件，即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中山艦事件及整理黨務案。

壹 國民黨第二次大會

因西山會議派之成立，國民黨陷於分裂之境，已如前述；然在廣州之中央仍爲國民黨之正統，統一兩廣，握有軍政權，並繼續執行容共政策。

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九日，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決定①接受總理遺囑，②完全繼承一次大會所定之政綱，③修正黨章，④發布宣言，⑤整飭黨紀——處分西山會議派，最後，⑥選舉中央委員，除戴傳賢繼續當選外，所有西山會議派黨員概被剔出。蔣中正先生此次當選爲中委。在中委三十六人中，共產份子佔七人。中共份子之當選中委及候補中委者有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于樹德、毛澤東、韓麟符、高語罕、惲代英、彭澤民、江浩、謝晉、詹大悲、吳玉章、鄧穎超等，而陳公博、鄧演達、徐謙、顧孟餘、甘乃光、宋慶齡、何香凝等親共份子亦均當選，至中央黨部職務，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祖涵任農民部長，彭澤民任海外部長，汪精衛任宣傳部長，而以候補中委毛澤東代理，李大釗任北京政治分會主任，中共份子依然盤踞要津，把持黨務，較之一次大會之後尤有過之。（註二）

最堪重視者爲此次大會所發表之一萬二千餘字之宣言，其所得的結論固然以完成中山先生所倡導之國民革命爲依歸，而其論點則幾完全同於列寧的理論，其對世界現狀之分析，謂帝國主義本身之弱點爲①各帝國主義間相互之衝突，②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的民族運動，及③帝國主義國內無產階級之反資本主義鬥爭。宣言指中國國民革命爲世界革命之一部份，應與反帝之蘇俄聯合，又謂國民革命之對象，對外爲帝國主義，對內爲軍閥、官僚、買辦及土豪，此則又與中共的觀點幾完全一致。據張國燾回憶稱：大會前夕，莫斯科來一革命理論長電，鮑羅庭譯出後，適汪兆銘來訪，即交汪

，並謂可作大會宣言參考資料，其後大會宣言前部即本此。所以表現於宣言者，幾與中共同一口吻，其顯著不同者，惟不強調階級鬥爭耳。

此一宣言爲容共史劇最高潮，特照錄於後。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本黨總理孫先生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於廣州。大會一致議決，通過總理提出之宣言，其宣言內容，首在說明中國之現狀，次爲三民主義之解釋，次爲最少限度之政綱。自第一次代表大會閉會以來，本黨同志，在總理指導之下，努力奮鬥。總理更於此時，制定建國大綱，完成民權民族民生主義之講演，更於挺身北上之際，發布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而殿以最後之遺囑。凡總理之所宣言者，必以力見之於行，本黨同志，以總理遺言爲軌範，以總理之行爲表之，無間生死，以迄於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深念總理之遺教，綜覈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之事實，確信總理所定主義及政綱，實爲今日中國之唯一生路。謹按諸世界現狀，中國現狀，及本黨努力之經過，宣言如左：

第一 世界之現狀

總理遺囑有言：「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孰使此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曰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實國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而打倒帝國主義之方法，總理於遺囑中，亦已明告曰：「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有已能以其自力，打倒帝國主義，自救於平等，同時以平等待我者，如俄是，有與我同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期相與努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如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壓迫民族者。此等民族，對於平等之觀念有二：（一）自求平等；（二）同時求他人之平等，合此二觀念，故民族運動，與國際運動，實爲相須。而民族主義，與國際革命主義，其內容實爲一致。准其如是，乃能與以不平等待人之帝國皇帝，作殊死戰。本黨既抱此目的，故對於蘇俄，以誠意與之合作。雖受帝國皇帝者及其工具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之種種誣蔑，種種挑撥離間，而繼續進行，初不因之少撓。至於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壓迫民族，地位相若，觀念相同之故，其聯合實出於自

然，且聯合之程度，亦日以密切。請析言之如下：

歐戰以後，世界地圖，實表示一幅人類被奴隸之可怖的寫真，如世界全面積等於一萬三千四百萬方基羅米突，則屬於帝國主義及被管轄於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其面積等於九千萬方基羅米突。如世界人口爲十七萬萬五千萬，則其中有十二萬萬五千萬爲帝國主義之牛馬奴隸。英國爲帝國主義之巨擘，其本國面積僅三十一萬四千方基羅米突，而其殖民地之面積，則爲約四千萬方基羅米突，蓋百三十倍於其本國面積矣。英國本國人口，僅四千六百萬，而其殖民地人口，則爲四萬二千九百萬，蓋一英人與九殖民地奴隸之比矣。法國本國人口僅三千九百萬，而其殖民地人口，則爲五千四百萬，甚至渺乎其小之比利時，其本國人口僅七百萬，而其殖民地人口則一千七百萬。日本之殖民地人口，幾與本國人口相等，此猶專就殖民地而言耳，至於半殖民地，如中國、暹羅等，尙不在內。帝國主義者以極少數之本國人民，而能駕馭大多數之殖民地人民，其工具有三：

一、高度發展的工商業，龐大的資本積聚，能供給帝國主義者以偉大之信用。

二、強大的海軍及航空隊，能使所有半殖民地之民族，雖蓄怨望，謀反抗，而卒不能脫離勢力範圍之外。

三、強有力的宣傳機關，若干百種之新聞雜誌，若干百種之學校，若教會及戴面具的慈善事業，若無數受薰陶於統治殖民地人民的精悍之官吏，皆足以爲帝國主義之喉舌與爪牙，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奴隸，不特有摧殘的能力，而且有麻醉的作用，對於一切帝國主義者，不特能幕蔽其罪惡，且能使人相與歌功頌德之不暇。

爲此三者，帝國主義之歷史，乃能趨於發榮滋長。以極少數之人類，乃能強制大多數之人類，而使之屈服，然而歐戰之後，帝國主義之基礎，已被動搖，其所以使之動搖之條件如左：

一、帝國主義之最龐大者俄羅斯帝國，已歸於覆滅。其結果使世界六分之一之土地，脫離帝國主義之區域。同時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在自求解放的奮鬥中，得一先進者以爲之指導，此爲帝國主義之一大損失。德意志帝國，本亦爲帝國主義之極猛烈者，而以戰敗的關係，受其他各個帝國主義者所排斥，而處於被抑服之地位。此亦爲帝國主義之一大損失。蓋不啻帝國主義家庭中分子，因減少之故，而即於衰微也。

二、各帝國主義者中，以利害衝突而互相妒忌，互相排斥。英國對於法國之陸軍與航空隊，極端懷疑，乃於近東及歐洲大陸，爲不斷的暗鬥。例如洛加拿協定，即英國所設之圈套，欲使德國，入其玄中，而即利用德國，以對抗俄，並於相當時機，對抗法國。此等帝國主義之互相衝突，適足陷於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之陷阱中，而莫能自拔。而東亞帝國主義之日本，則又以美國在太平洋與在中國之經

濟勢力之增漲，認為相逼太甚，謀以陸海軍之勢力，摧挫而覆滅之。凡此各國帝國主義者間之互相衝突，皆所以自暴其弱點也。

三、在歐戰中，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工業，驟形發展，其天然結果，適為工人階級之發展。工人階級已以可驚之速度，而成為國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時更於民族解放運動中，取得領導的地位。

四、為帝國主義巨擘的英國，其殖民地之廣大，而於經濟上已與本國脫離，由是其加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羈絆，亦更為嚴緊，法國本國之領土，被燬於歐戰中之槍林礮雨，則欲其力所能至，刮削殖民地以爲之補償，於是此兩帝國主義者之殖民地之奴隸，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乃不得不挺而走險，爲不斷的騷動與反抗。

五、一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已於繼續的民族運動中，表示其自覺，此等自覺，蘇俄與土耳其之獨立革命，與以暗示，且與以模範。其最大之主義，則爲蘇俄與土耳其能以民族羣衆的勢力，而打倒強有力的帝國主義之軍隊也。

六、在帝國主義之本國以內，因勞動羣衆之失業，生活程度，日以低落，貨幣日以跌價，不得不陷於貧窮之境遇，而貨幣跌價，且使中等階級，失其儲蓄之資，此種經濟上之慘淡與恐慌，足使階級鬥爭，更形激烈，其結果必至於將大多數民衆驅入革命的戰線以內，而此大多數民衆，又必同情於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願與之合作，爲解放而奮鬥也。

由此種種，可斷定帝國主義之基礎，已被動搖，其崩潰之期，必不在遠，而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及民衆，聯合奮鬥，實足爲其致命之傷。中國之國民革命，由中國言之，爲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由世界言之，爲一大部分人類之自求解放，故中國之國民革命，實爲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中國人民從事於國民革命，決非孤軍轉戰，若蘇俄，若世界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若帝國主義本國內之被壓迫民衆，皆與中國之革命民衆，立於同一戰線者也，試錯舉事實如下：

美國之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國，其共和制度，爲美國所蹂躪，其城市爲美國海軍所佔據，其國民爲美國所摧殘，其憲法爲美國所修改以適合美國銀行家的利益，其自決權被拒絕，其獨立被完全打銷。此外尚有無數黑種人，爲自命民主先進國所壓迫、所剝削、所虐待。夫壓力愈重，則反抗力愈大，故夏威夷之愛國團體、墨西哥之農工黨、全美洲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墨人之救國保種的組織，皆一致努力，以求其種族或民族的解放。

普通的觀念，皆以爲歐洲乃帝國主義的老巢，在此老巢中，必不至尚有被壓迫的民族。按之實際，則殊不然。阿爾塞斯、羅倫，歐戰以前，被德國帝國主義所壓迫，歐戰以後，被法國帝國主義所壓迫。四十五年以來，法國以阿爾塞斯、羅倫由祖國淪於異域，引爲莫大之悲哀，其實則法國工業爲阿爾塞斯、羅倫之煤鐵而悲哀也。一九一八年以來，阿爾塞斯、羅倫，重歸於所謂祖國，以嘗試法國帝國

主義之壓迫，乃較德國帝國主義之壓迫爲尤甚。前以二十萬操法語之民族受德國民族主義之壓迫，今則以一百萬操德語之民族受法國狹隘的愛國主義之壓迫。法國政府，在學校，在官廳，在法庭，在商業上，禁止土人之操土語。法國政府所派遣之官僚、憲兵、警察等，所在充滿，爲嚴厲之監視。青年被強迫而在殖民地的軍隊中服務，工人運動，遭遇最嚴酷的摧殘。於是阿爾塞斯、羅倫之人民，因工人與農民的團體之指導，已宣告自主。

其在墨西哥尼亞(Macedonia)，有居民二百三十萬，在其歷史中，已以不斷的奮鬥，而求其民族之獨立。乃凡爾賽條約，竟相與瓜分之，南斯拉夫(Jugoslavia)取其五，希臘取其四，布加利亞取其一，此等新興之帝國主義，其對待墨西哥尼亞，一如法國之對待阿爾塞斯、羅倫。對於所征人民，務壓抑之，或使其同化，此實爲現在巴爾幹半島各國的共同政策，實受國際聯盟所擁護，爲是之故，墨西哥尼亞之革命黨人，已於聯邦派指導之下，努力進行，以求實現其國家的獨立，及爲巴爾幹半島革命的聯邦。

其在皮沙拉比亞(Bessarabia)、布哥維那(Bukovina)、西里西亞(Silesia)、克洛西亞(Croatia)諸地，其民族所受之待遇與墨西哥尼亞大略相同。故此等民族，已各準備其戰鬥能力，以求脫離奴隸之待遇。

其在非洲，被壓迫的民衆，已由沉睡而即於猛醒。自地中海以至於好望角，反抗帝國主義之空氣，瀰漫於黑人及阿拉伯人的大陸，其民族革命運動之最顯著者，爲里夫(Rif)的戰爭，里夫民族，爲數不及一百萬，而能與世界上開拓殖民地最早的西班牙，及世界上陸軍最強的法國，爲勇猛的對抗。里夫民族革命運動之領袖，爲阿白爾克里姆(Ab El Krim)，以所部兵六萬五千，擊敗西班牙兵十萬，繼以法國之陸軍六萬，及航空隊、鐵甲車隊，統以最善戰之將領，戰爭半年，法國之陸軍，死者萬人，而里夫民族，仍能於艱難危苦之中，支持其勇氣。至於阿爾及利亞(Algeria)埃及等，其反帝國主義之運動，亦隨時勃發，經一度之屈服，復爲一度之反抗，且其反抗之程度，更烈於前。帝國主義者，已知非洲種人非復如曩日之易與矣。

其在亞洲，如波斯，在歐戰以前，受英俄帝國主義雙重壓迫。及俄國革命，波斯人民，已由俄國革命黨人之手，解除俄帝國主義之羈絆，而受平等之待遇。波斯人民，受此刺激，更謀脫離英帝國主義之羈絆，使英帝國主義之工具波斯國王，卒於人民一擊之下，而成立波斯民主的政府。如阿拉伯，其民族解放運動之思潮，已達於最高點。能以碎石擊走波爾福(Lord Balfour)動員於巴勒士登(Palestine)，最近更宣布政治的罷工，以表同情於敘利亞(Syria)同胞。如敘利亞，自去年七月二十四日以來，反抗法國帝國主義，法軍之陸軍屢敗於敘利亞愛國黨人之手。其狼狽之態，不亞於在摩洛哥(Morocco)，而其野蠻之行爲，亦較在摩洛哥爲烈，殺戮擄掠，縱火擄掠，無所不爲。此等野蠻行爲，實足使敘利亞人奮鬥之志，益以堅決。國民政府已於最近成立，敘利亞之愛國運動，雖一時或

不免爲法國陸軍優越的勢力所屈服，然終信最後之勝利，必操於敘利亞愛國黨人之手也。如土耳其，在一般帝國主義者中，久已觀爲無問題之捕獲物。證之以近東病夫，加之以壓迫基督教之罪名，刀俎魚肉，一惟所命。而近則以土耳其國民黨之努力，及蘇俄之扶助，已脫離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而成爲自由獨立的國家。最近土耳其國民政府，因英國搶奪莫塞爾（Mosul），集合國民軍，並與蘇俄成立更密切的同盟，以準備保護其領土及其政治的經濟的主義。如荷屬東印度，其國民革命的奮鬥，已積極進行。荷屬帝國主義者對待土人，與英、法同其殘暴。土人所有學校及種種團體皆被封鎖，一切集會及示威運動皆被禁止，教授新聞記者，可以隨意監禁；愛國黨人，可以隨意殺傷。一九二五年三月，荷蘭警察在爪哇槍擊愛國黨人一百有七人，伏尸枕藉；九月，復捕獲愛國黨人一百六十三人。此等殘暴行爲，適足使爪哇之國民黨及農民，更堅固其團結力，及更增益其爲國民革命而共同奮鬥之決心與勇氣而已。如印度自治黨人，及共產黨人，正共同努力，以反抗英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對之，雖以無人性之殘暴加以摧毀，而所謂不合作運動，經濟的絕交，消極的不服從，進行如故。如菲律賓、安南、台灣、高麗，其民族革命之奮鬥，或以公開，或以秘密，相與爲不懈之努力，此等奮鬥，終必使帝國主義所施與之桎梏，歸於粉碎。綜合此等錯舉之事實，可得結論如下：

一、被壓迫的民族，已開始覺悟其所處地位之不平等，已認識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之種種壓制及掠奪，故民族革命運動已普及於全世界。此等民族革命運動，有已與帝國主義直接發生武裝的衝突者，如里夫民族及敘利亞民族是。有其武裝的衝突已得勝利，使其民族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已得解放者，如土耳其是。而其中尤當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帝國主義者直接衝突之過程中，有一種歷史的事實，能促進此過程。此事實爲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業發達而產生之無產階級是已，此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能於漸立於前線，而爲民族革命運動之指導者。

二、凡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農工民衆，尤爲必須。過去民族革命運動之失敗，由於參加者限於知識階級，故不能得廣大之基礎，與廣大之勢力。於現在及將來，爲民族革命運動，必須以其意義普及於田間與工廠，且必須使之組織於反抗帝國主義的奮鬥中。

三、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明瞭共同之敵人爲誰。對於共同之敵人，而共同奮鬥，自助與互助，初無異致。所以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之革命運動，有聯合戰線之必要。

四、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排除狹隘的國家主義。此等狹隘的國家主義，常爲帝國主義之誘因。縱使民族革命成功，亦徒成爲新興之帝國主義。故一切被壓迫民族，相互之間，要求人以平等待我，同時亦要求我以平等待人。必如是，乃能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共同奮鬥。中國之國民革命，對於革命先進之蘇俄，固共同奮鬥；而對於一切被壓迫之民族，亦共同奮鬥。於此之時，彼此以平等相待，以期民族革命成功之後，同進於大同。

五、各個帝國主義者間之衝突，及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人民之憤激與怨望，實為與世界上被壓迫民族以推倒帝國主義完成民族獨立之良好機會。凡從事於民族革命運動者，必須勿失此良好機會，務使一切革命的勢力，皆得以集中，而活潑進行。

六、在民族革命運動進行中，必須看破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及防止其一切包藏禍心的宣傳。此等宣傳，實含有挑撥離間之兩種作用。帝國主義，為遮斷其本國內大多數人民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則倡赤化共產之論，以為恐嚇，此種恐嚇手段，能使革命的勢力，歸於離散。故凡從事民族革命運動者，必當大聲疾呼，以揭破其陰謀；同時益於誠意與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人民及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聯合一致，向共同敵人帝國主義者猛烈進攻。

第二 中國之現狀

如上所述，可知中國國民革命實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所挾以為梟之工具，前已言之，然使中國以內無為帝國主義之內應者，則帝國主義亦無所施其技。試列舉如下：

一、軍閥：軍閥之大者，藉口武力統一，把持中央，其小者，藉口聯省自治，把持地方。其唯一目的，在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一手段，在擁兵自衛。其所兼養之軍隊；不知有國家，不知有人民，祇知為其受兼養之軍閥而效死。顧其兼養之程度，乃至為微薄。軍閥掠奪所得國家及人民之利益，祇以自肥其身家，及分肥於同惡共濟之將領，至於大多數之士兵，不過仰其所不屑之餽餘。故大多數之兵士，其生活至為困苦。戰時則驅之死地，平時則不免於飢寒。由是大多數士兵，遂被迫而為盜賊之舉動，以自權於人民。而為將領者，則以軍閥為終極之目的，惟知以相斫求其大欲。中國之內，於是兵戈相尋，而莫知所屆。

二、官僚：凡民主之國家，所有官吏，本人民之公僕。其自身實為人民，於執行國家之政務及事務時，乃為官吏，而中國之官僚，則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階級。其結果惟有助軍閥為虐，以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肥軍閥，且藉以自肥。

三、買辦階級：帝國主義者如虎，而買辦階級則為之俛，帝國主義恃之，對於中國國民，得以擇肥而噬，而買辦階級則於無數中國國民被噬後之殘尸中，吮吮其血肉，以贖其下流之欲望。

四、土豪：此為封建制度之餘孽，其在鄉村間，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其為屬於人民，基於盜賊。

以上四者，在帝國主義者之心目中，實為應用之工具。蓋帝國主義者，欲使中國永為其次殖民地，則其所採之方法，莫大於阻遏中

國之國民革命運動；而欲阻遏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則其所採之方法，又莫大於遮斷國民間之各階級的聯合，尤莫大於摧殘農、工階級之發展。蓋不如是，則不能分散國民革命之勢力也。而買辦階級與土豪，其性質上實爲摧殘農、工、商各階級之利器，故必利用之，以壟斷中國經濟之利益，同時即以窒塞中國國民革命之生機。顧經濟上之勢力，必得政治上之勢力，爲之輔助，然後能活潑無礙，以日即於繁榮，故又必收軍閥官僚，以爲己用，使政治上之勢力，歸於掌握。所以軍閥官僚買辦土豪之爲帝國主義，實猶車之雙輪，鳥之雙翼，而軍閥、官僚與買辦、土豪，其生活之目的與條件，同爲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自肥，於是四者之間，不期然而日趨於共同行動，帝國主義得此工具，遂敢悍然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而無所懼。

徵之民國元、二年間，五國銀行團，不惜以二萬萬五千萬之大借款，貸諸袁世凱，以助其驅除東南之革命黨人。六、七年間，日本又不惜以三萬萬之參戰借款、軍械借款及種種借款，貸諸段祺瑞，以助其掃滅西南之護法軍隊。八、九年以後。歐戰終了，各國恢復其遠東勢力，則又相與痛抑日本，助曹錕、吳佩孚，以推倒段祺瑞。其各種借款，爲額之巨，至今尙未能知其確數，而曹錕、吳佩孚則亦以摧破廣州革命政府，爲效忠於帝國主義之表示。蓋帝國主義者，由借款而得之利益，不特經濟方面而已，於政治方面，尤獲有種種特權。而其最大作用，則爲助軍閥以鎮壓國民革命也。前歲秋、冬之間，直、奉再戰，其結果曹錕、吳佩孚推倒，而段祺瑞、張作霖崛起，要不外易英、美帝國主義之傀儡，爲日本帝國主義之傀儡而已。帝國主義得軍閥爲之傀儡，對於中國，遂得爲所欲爲，軍閥得爲帝國主義之傀儡，則亦有恃無恐，雖獲罪於人民，亦恬然不以爲意。前歲冬間，段祺瑞不恤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各國承認臨時政府交換條件。去歲五卅以還，張作霖之軍隊，在天津、上海，極力摧殘各界人民之愛國運動，而於工人運動，尤遏抑不遺餘力。軍閥及土豪，平日於經濟上既占優越之地位，洎乎得帝國主義者之媒介，以與軍閥官僚勾結，則進而於政治上亦占優越之地位。試觀全國，商埠表面，雖似趨繁榮，而其內幕，則不免受帝國主義及附庸者之支配。至於村落，則其困窮之象，每況愈下。蓋商業爲所操縱，新興工業爲所扼制，農業、手工業爲所摧毀，（則）農民、工人之利益爲所吞蝕，更無待言。民窮財盡，悉由於此。加之各個軍閥間，其互相衝突，在原則上無可倖免。或爲擴張地盤而戰，或爲保障地盤而戰，或迭相雄長，或以下征上，數年必戰，甚至數月必戰。其破裂之期，可以預測而逆臆，有如前歲秋間、江、浙之戰，直、奉之戰，去年冬間，江、浙、直、魯及遼東之戰，所殺傷者，人民之生命；所蕩析者，人民之財產，蓋人民至是，已岌岌然不能保其生存，更無生活程度之可言矣。

在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之現狀中，官僚則駭奔以爲軍閥之給事者。在買辦階級受帝國主義之煽指氣使之現狀中，土豪則齷附以爲買辦階級之應響者。不寧惟是，買辦階級之流爲帝國主義之鷹犬，以咋噬人民，阻礙人民革命之進行，有如此者。

大軍閥之把持中央者，受帝國主義之羽翼，爲之救命，如上所述。小軍閥之把持地方者，論者或以爲其地位勢力，尚不足當帝國主義之一顧，故把持地方之小軍閥，其殃民之罪狀，雖視大軍閥爲甚，而實國之罪狀，似反從末減，顧按之實際，則殊不然，徵之去歲夏間，唐繼堯起兵，寇桂、窺粵，語其內幕，乃在受日本帝國主義之唆使，與法國帝國主義之慫恿。而十二年來，陳炯明等之得苟延殘喘於東江，以爲禍於廣東，乃全恃（英）帝國主義者爲之後援。自去歲夏間以還，更公然以香港爲其寇粵之大本營，運兵籌餉，皆以香港爲策源地，北洋兵艦，彙中於香港，以往來窺伺廣東之沿海岸，復由香港輸運軍械，以接濟南路諸賊。而陳炯明等更於海豐擄殘農民運動；於汕頭催殘工人愛國運動，務殘害同胞，以取媚於帝國主義。嗚呼！——五州以來，青島、九江、上海、漢口、廣州各處慘殺案相繼而起，全國之愛國民衆，方血肉狼藉於帝國主義槍刀之下，而陳炯明等乃忍心受其餒養，聽其嗾使，以危害國民革命運動。蓋小軍閥之末路，倒行逆施，久已梟獍之不若矣！

以上爲各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之現狀。至於買辦階級，受帝國主義之頤指氣使，以爲屬於國民，其罪狀亦擧髮難數。大抵數年以來，北京之財政總長，幾成爲買辦階級之專利品。自王克敏以至李思浩，無非竊國幣以納諸外國銀行，同時更以無數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權爲之賤，至於各省巡閱使、督軍之屬，其盜國、病民之所得，莫不由買辦階級爲之置業於租界，以爲其贓污之保障。財政現狀之紊亂，政治現狀之污濁，實以此爲一大原因。買辦階級之罪惡，深足爲國民所唾棄。而爲罪惡之尤著者，莫如十三年秋間廣州沙面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之作亂。陳廉伯始則藉英帝國主義之資助，而得自由販運軍械，組織商團，以謀反抗廣州革命政府，繼則受英帝國主義之袒護，以類似的美教之通牒，恐嚇廣州革命政府，其始末，於總理致英國前首相麥克唐勞之電報中及宣言中已詳之。及乎作亂失敗，仍得安居香港，終日從事於破壞廣州革命政府之行爲，贖資助賊，擾亂地方，視爲當然，曾不稍怪。蓋中國自有買辦階級，而國民人格幾於掃地以盡矣。

中國之現狀具如此，吾人苟一體認，可知今日之中國，其當前待決之問題，實爲求一生路。然所謂生路者，果如何乎？關於此點。第一次大會宣言中，曾列舉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商人政府派之各種主張，而指示其謬誤，近更有所謂國家主義派者，以爲今日欲救中國，但當如日本之維新即能自至於富強。爲此說者，不惟未知日本維新之際，尙留封建制度之餘毒，以爲害於其人民；且已生帝國主義之風陷，以爲害於世界；且其於日本維新之際時代與環境之關係若何，亦忽焉不察。日本維新之際，帝國主義正如旭日初升。故日本之摹仿，出於不知其然而然。若夫今日，帝國主義已近末路。其自然崩潰之期，已可以推算而得。尤亟效之，適見其忒而已。至於所謂良心救國派，所倡導者，爲性善，爲自由，陳義不爲不高，然其除惡不勇，其紀律不嚴。一方坐視率獸食人之猖獗，啞啞扼

腕，而不能制；一方不能組織民衆，既不能以紀律自繩，自亦不能以紀律繩人，遂使團體行動，散漫而無力。於此而欲求撥亂致治，亦徒見其幻想而已。凡此，皆坐不能體認中國之現狀。故求治之法，亦茫然莫知所措。吾人所指爲中國之生路者則如下：

其一、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聯合世界革命之先進國，二曰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三曰聯合帝國主義在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

其二、對內當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首爲軍閥，次則官僚、買辦階級、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軍隊；二曰造成廉潔的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新興工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扶助其發展。

凡此對內對外之必要手段，約而言之，即 總理遺囑所謂喚醒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也。於此中國之現狀爲對症發藥之救治，觀於以上所列舉之事實，可灼然而無疑。

第三 本黨努力之經過

吾人既深信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爲中國之唯一生路，故於第一次大會閉會之後，即服從於 總理指導之下，以努力而進行，吾人非不知當時所處之環境，至爲惡劣，所挾持之勢力，亦至爲微弱。彈丸之廣州，已爲香港帝國主義者，納諸掌握之內。而北洋軍閥，如曹錕、吳佩孚等，復耽耽欲滅此而朝食，不恤百計以求逞，陳炯明等跳梁於東江，鄧本股等負隅於南路，楊希閔、劉震寰等，更反側於肘腋之下。吾人苟鮮明其主義及政綱，無異自樹一的，以待此等敵人之共同進攻。況所謂官僚、買辦階級、土豪，正環繞於吾人前後左右，將以保護其不正當利益之故，而同心合力，務置吾人於死地。惟吾人則百無所畏，準備與之爲殊死戰。吾人於此四面包圍之中所艱難成立者，有中央及各地之黨部，以宣傳民衆，組織民衆，有陸軍軍官學校及黨軍，以造成與人民合作之軍隊，使進而爲人民的軍隊；有各種工人的組織，及農民的組織，俾能保衛其利益，而發揮其能力。吾人曾與勾結北洋軍閥之叛軍戰，曾與勾結帝國主義之商團戰，其結果，此等敵人，不特不能困苦吾人，且使吾人益增長其氣勢，進而與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戰。曹、吳推倒之後， 總理挺身北上，以開國民會議，制軍閥之死命，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制帝國主義之死命。事雖未成，而以身殉道之精神，已普及於全國民衆，而深入其肺腑。去年五月卅日以後，青島、上海、九江、漢口、廣州等處之慘殺案，接踵而起。帝國主義窮兇極惡的面目，暴露無遺。而全國民衆，努力從事於國民革命之精神，已漸爲全世界所認識矣。最近北京民衆之示威運動，又足以振軍閥之魂，使知與帝國主義勾結，非惟不能恃以爲固，且適足以犯衆怒而促其死亡。大河南北、大江南北及湖南湖北間，農工民衆，團體組織日以堅固，能力日以發

達，其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亦日以熱烈。吾人更於此時鞏固廣州之革命根據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及與人民合作之軍隊，以坦白真摯之精神，爲民衆謀利益。同時領導民衆，從事於國民革命。雖受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之重重壓迫，屹然不爲之搖動，且決其覆滅之期，必不在遠，最後之勝利，終屬之吾人。此吾人於第一次大會閉會之後至於第二次大會閉會之前，努力之經過，所可爲國人告者也。

第四 結論

世界之現狀，中國之現狀，及本黨努力經過，綜合而觀察之，可得結論如下：

總理所提出之第一次大會之宣言，對於三民主義之解釋，及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爲中國之唯一生路。吾人於第一次大會閉會以後，所努力者，僅爲掃除障礙，以準備主義及政綱之實行。不獨主義之自身，未能實現，即最小限度之政綱，亦未能施之實際，故第二次大會，對於主義固當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即對政綱，亦無所修改，惟期其得見諸施行。前乎宣言，有建國方略，其後復有建國大綱，及民族、民權、民生之講義，暨閉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以迄今。總理臨終之遺囑。凡此皆 總理披荆斬棘，爲中國開此生路。吾人循此路前進，若 總理時時指導於吾人之前，使吾人之熱誠，彌以興奮，吾人之信念，彌以堅固，吾人惟有一致遵守 總理之遺囑，以奮鬥不懈。吾人敢舉此信念與熱誠，以昭告於世界民衆及全國民衆之前，吾人願獻此身以爲一切民衆之前驅，爲一切民衆而效死，吾人尤知欲爲民衆有所盡力，則不可不鞏固吾人之組織，擴充吾人之能力，以期能負荷吾人所欲盡之責任。第一次大會，已於黨員之紀律及訓練加以注意，第二次大會更將使此紀律益以森嚴，訓練益以精密。凡爲革命黨人者，不可不忠實誠篤，勇於改過。黨員之間，互相親愛以互相互助，互相改錯。蓋不扶助不足以爲親愛，不改錯尤不足以爲親愛也。

若過而不改，則不能不以鐵的紀律，加諸其身。蓋對於黨員姑息，即對於黨爲不忠也。吾人必努力使黨員成爲革命團體化，以期不負 總理之指導，不負民衆之期望。吾人大呼以祝：中國國民革命萬歲！世界革命萬歲！

大會在共產空氣籠罩之下之情形，蔣中正先生事後在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席上曾追述稱：當時共產黨意排斥西山會議老同志，本人於歡宴代表時致詞，要求以總理之心爲心，但有共產色彩之代表均取反對態度，處分西山會議派案卒被通過。在會場中，除蔣先生外，竟無人敢提三民主義。

貳 中山艦事件

民國十四年三月，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失去重心，中共對之分化甚力：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汪兆銘任主席與廖仲愷同被中共稱為左派。八月，仲愷被刺，中共更指胡漢民有嫌疑，包圍兆銘，迫漢民出使俄國，轉而挑撥兆銘與蔣中正先生之間，製造另一矛盾。十五年一月間，國民黨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蔣先生提出北伐主張，兆銘贊同，鮑羅庭亦無異議。會後，鮑稱返國述職，返粵後，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Kisarko）忽在軍校會議中極言北伐必敗。目是不斷表示反對，並破壞北伐計劃。蔣先生知此為俄共整個策略，二月八日，乃向當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之汪兆銘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職，不報；二月二十七日，蔣訪汪，告以如不准本人辭職，即應令季山嘉返俄；三月八日，再訪汪，表示革命實權不可落入俄人之手，此種密談，不久即為季山嘉所知，蔣先生由是始知兆銘與俄人勾結甚深。至三月二十日，而中山艦事件發生。（註二）

先二日，三月十八日，蔣中正先生在廣州，海軍代理局長中共黨員李之龍，矯令蔣之坐艦中山號由廣州返黃埔裝足煤斤。十九日晚，開回廣州，升火，通宵不息，戒備極嚴，將以劫蔣先生赴海參威，轉往俄國。事為蔣先生所覺，乃於二十日清晨在衛戍部宣布戒嚴，逮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份子，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內（註三），監視俄顧問住所，收繳省港罷工委員會槍械，收回中山艦。

二十二日，蘇俄駐廣州領事館來人謁蔣先生，問以對人抑對俄，答以對人，乃令季山嘉等歸國，中俄關係仍舊。至四月十日，李之龍獲釋，並曾登報脫離共產黨，北伐時，為軍校血花劇社負責人，至武漢，十六年七月武漢分共，之龍去廣州，旋被捕殺。

在軍中任黨代表之中共份子集中軍校待命，旋由蔣校長在軍校中設一高級訓練班，予以訓練，以周恩來為班主任，結業後仍分派工作。

四月下旬，鮑羅庭與胡漢民均返廣州。鮑仍執行聯俄容共政策，嘗謂「中共命中注定要使國民革命的苦力」。中共中央在上海聞變，派張國燾去廣州，試圖向鮑請示，脫離國民黨，不許，共產國際聞之，亦嚴加禁止。五月，國民黨整理黨務案提出前夕，俄國有運軍火船到廣州，中共要求分給槍五千枝，亦為鮑拒絕。

任海軍局長歐陽格。實則此一事件爲中共企圖篡奪國民黨權與國民黨自衛行動之總爆發。遲早均不能免。

過去汪兆銘經常奔走於鮑羅庭之門。經過此事件後，鮑之氣餒稍殺，對國民黨中央要人，往往移樽就教。事件發生後，汪兆銘稱病謝客，五月赴法。胡漢民亦偶然同船離廣州，當年至友，竟不交談。

叁 整理黨務案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鮑羅庭於四月廿九日自俄回粵，迭次與蔣中正先生會商國共關係問題，訂定「整理黨務案」，於五月十五日（「蘇俄在中國」作二十五日）提出於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至十七日通過，凡四個決議，綜合內容要點如下：（註四）

（一）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瞭國民黨之基礎爲總理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及批評。

（二）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三）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四）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

（五）凡屬於國民黨籍者，不許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黨務會議。

（六）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七）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出通過時，應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追認。

（八）本黨黨員未受准予脫離黨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

(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即取消其黨籍，或依所犯之程度，加以懲處。

(十)爲處理此項問題，設一聯席會議，由國民黨五人，共產黨三人參加。

經此次大會後，中共在國民黨中央之各部任部長者均離職。組織部長譚平山去職，由蔣中正繼任，旋改爲張人傑；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去職，由顧孟餘繼任，青年部長鄒魯已參加西山會議，由邵元冲繼任；秘書處原由譚平山、林祖涵、楊匏安三人負責，茲改由葉楚傖任秘書長，均於六月一日就職。

此外，戴傳賢亦到粵，任中山大學校長。

蔣中正先生原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因出師北伐，以主席職務分別請張人傑、譚延闓代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分設黨務會議與政治會議，人傑代理黨務會議主席，延闓代理政治會議主席，汪兆銘離職後，延闓並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陳果夫任組織部長。

六月一日，張人傑爲組織部長時，陳果夫任秘書。部中職員二十九人，跨黨者竟有二十六人之多，其餘各部，及各級黨部亦大多數爲共黨份子。經果夫逐漸整理，直到十六年一月，各省市黨部改組，始得依照中全會決定：國民黨三分之二，共產黨三分之一的選舉，而最後由中央圈定。於是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優勢始被扭轉。(註五)。

自是，中共氣餒被抑制一時，有助於北伐之進行。

肆 鮑羅庭之態度

中山艦事件後，蔣中正先生對聯俄容共政策仍欲維持，故極力容忍。俄人方面亦不欲造成破裂局面，故鮑羅庭及中共，亦抱持以往態度，在國民黨內繼續活動。

第一 鮑羅庭之飛揚跋扈

鮑羅庭爲國民黨總顧問，對國民黨之黨、政、軍均可過問，且幾乎完全在其操縱之下。其操縱樞紐爲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下之政治委員會(頗似今日俄共、中共之中央政治局。)據鄒魯「告爭木」一文中稱(註六)：

最近（著者按：當為十四年冬）黨權不在最高黨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的國民政府，而完全集中於政治委員會，於是俄人鮑羅庭就拿政治委員會顧問資格在裡面肆行操縱，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由於鮑羅庭勢大，於是中共及投機份子奔走於鮑羅庭之門，鮑羅庭公館儼然成爲小政府。據陳公博稱（註七）：

鮑羅庭的操縱政治，還在於他的技術。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他多數是列席的，對於小事，他都沒有意見，但每逢大案，他必預先和出席的人們個別交換意見，等到大家都無異詞，或大多數沒有異議時，他才以顧問的資格提出。因此彷彿鮑羅庭所提的議案沒有不通過，這樣傳聞一播，鮑羅庭真似可以左右政局了，他還有空閒的時間，不像我們負責的終日忙於工作，所以有許多時間可以考慮，可以思索。每逢個別談話，他有許多材料，還有許多理論，怕麻煩的人終於折服了。除了共產黨不算，許多投機家便奔走於鮑羅庭之門，聲勢更加浩大，儼然鮑公館是一個小政府。

中山艦事件後，鮑羅庭之權力並未削弱，甚至左右中央黨部領袖人事。其時胡漢民、汪兆銘均離廣州，張靜江被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據陳公博稱，亦起於鮑羅庭之建議。當中山先生彌留之際，靜江被抬（著者按：靜江不良於行）上北京晉見，中山先生會對之流淚，鮑認爲此事佔革命史上極重要的一頁，遂建議推靜江爲中執會主席，卒被通過（註八）。此項記載只能說明鮑善於投機，非真有所愛於靜江，靜江之任主席亦無待於鮑之建議。

（註一）此名單依據波多野「中國共產黨史」第一卷一〇六頁，及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七二頁。

（註二）中山艦事件，採自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三八至四一頁。

（註三）胡華「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七四頁。

（註四）「革命文獻」第九輯九四至九五頁。

（註五）此人事處理部份，依陳果夫「民國十五、六年間一段黨史」，載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中央文物供應社「本黨與匪黨博鬥史實」。

（註六）「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一冊七十八頁。中華民國開國文獻附錄。

（註七）（註八）「寒風集」甲二四四至二四八頁。

第五章 民衆運動

根據以上各章的記載，吾人可以得一認識，中共自民國十年七月成立之日起，至十四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之日止，未滿四年，其勢力業已坐大。黨員人數，各次大會均有幾何級數的增加：計第一次大會爲五十七人，第二次爲一百二十三人，第三次，容共之後，更增爲四百三十二人，第四次約一千人。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重要部均爲共黨份子所把持，反共份子均被排斥以去。

不僅此也。自容共之後，中共以國民黨名義，攘奪羣衆運動領導權，一時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無不由滲透而加以掌握。召開數次勞動大會，歷次罷工事件，各地慘案，青年團的活動與學生運動的發展，以及農民的組織與活動，風起雲湧，造成中共之實力及形勢。

第一節 工人運動（一）（註一）

壹 中共非無產階級

中共史官所撰有關中共歷史，靡不先敘工人之數量、生活、地位及活動，以顯示中國共產革命之背景。意謂中共之產生乃由於無產階級的興起及需要，此乃倒因爲果之曲筆。實則中共之產生是移植的，非土產的。發起中共者乃高級智識份子：教授、留學生、大學生等，其文化水準及職位最低者僅有一毛澤東，而根本無工人份子參加。在鄧中夏（鄧之小傳在本節後）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三四、三五頁有如下記載：

「當時（一九二三年以前）黨的關門主義，以爲工人覺悟程度還不够加入共產黨。介紹工會會員入黨要經過數個月考察，且必先介紹入（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部成了工人入黨的經過機關。當時工會中黨的組織普遍沒有，只有共產黨個人作工會英雄式的領導。」

中國工業革命較之世界工業先進國遲二百餘年，且進步緩慢，致中國工人人數，在中國人口中未能佔得適當比例。中國之有近代的所謂無產階級工人在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江寧條約，外國船艦可以駛入五口，船上即有中國海員。一八

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以後，中國開始興辦洋務，三十餘年間，由軍事工業而交通工業而民生工業，在國內各城市次第興辦；甲午之役，馬關條約允日人在內地設廠製造，各國復本「最惠國待遇」羣起效尤，於是外人競相在華設廠，並強租我沿海港口，攫奪我築路開礦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尤其在上海的輕工業頗有發展，凡此均使中國無產階級的工人之數增加。據民國七年農商部調查，中國工人之數如下表：

中國工人數目表（民國七年農商部調查）

製造工廠	六三八、六八一一人（染織、機械及器具、化學、飲食、雜特工廠等）
運輸	二二一、八一一人（鐵路與海員）
礦山	五三〇、八八五人
郵差	一一、〇〇〇人
政府直轄	二一、六四〇人
外國工廠	三二四、三六二人
總計	一、七四九、三三九人

在四億以上人口的一個大國中，屬於無產階級的工人僅一百七十幾萬人，還不過總數千分之四，其微小殊不足道。假使真正工人組織一個黨，一定是一個小黨，代表極少數人的利益；假使這個黨領導革命，或實行專政，一定違背大多數國民利益。何況中共黨員並不是工人，它要領導革命或專政，只是幾個野心智識份子的事，與工人無關。

中國之有工運亦早在中共移植之前。中山先生對工運素甚重視。民國七年，國民黨所領導「廣東機器總會」與「華僑工業聯合會」召集首次慶祝五一勞動節於廣州。八年廣東機器總會奉中山先生之命，擴大基礎，成立「中華機器總會」。此會甚為健全，始終反共。無政府主義者在廣東亦頗從事於工人運動。直至九年十一月陳獨秀入陳炯明幕，始陸續將共黨份子譚平山、馮菊坡、楊範安、鄧中夏、劉爾崧、施卜、阮嘯仙、羅綺園、彭湃等招至廣州，民國十年，在廣州素坡巷租一房屋，貼「勞動組合書記部」招牌，陰作攫奪工會領導權的活動。

在上海，原有許多類似工會組織，但組織者既非工人，亦鮮活動。民八，成立「中華全國工業協進會」，發起者四人，陳獨秀在內，此時尚無中共組織，工會本身亦不健全。

民國九年十二月，在香港成立海員工會，中山先生命名為「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領導者均為國民黨黨員，同年，「湖南勞工會」由黃愛、龐人銓組成，後被趙恆惕指為無政府黨，殺之。民十十一月，粵漢鐵路工會正式成立，「湖北工團聯合會」亦於是年成立，皆與中共無關。

然而中共對於工運實特有興趣。在中共臨時中央期間，上海及各支部會出版若干勞動刊物，開辦若干勞工學校，試辦若干勞工組織（見第一章第四節）。中共第一次大會後，即成立一公開的做職工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從事工運。主任為張特立（國黨），幹事為李啓漢、李震瀛（後脫黨）等，發行「勞動週刊」，隨即從事上海工人的組織與運動工作。各地亦設分部，在京漢鐵路的長辛店、鄭州、漢口的江岸、武昌的徐家棚、江西的安源、廣州、浙江等地設工人學校（勞工補習學校）、工人子弟學校，共產黨員多充教員；並辦工人俱樂部，或用「職工同人會」、「工人十人團」、「精業研究所」等名義，以接近工人，從事組織工作。

至於工人運動，自中共滲入工人組織後，推波助瀾，工人活動與公私企業之罷工事件逐漸增多。中共史官所盛稱香港海員大罷工事件，京漢路「二七」慘案，記載頗多失實，茲參考各書分述如下：

貳 香港海員罷工事件

民國十一年一月，香港海員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領導之下，因要求增加工資不遂，開始罷工，前後加入之海員二萬餘人。香港全市苦力與運輸工人數萬亦起而作同情罷工。各地及各鐵路工人同聲支援。京漢鐵路工人募捐援助，並在火車頭上豎立「援助香港海員」旗幟，往返於京漢之間。在罷工期間，泊港而不能開出之各國輪船達一六六軍阻計二八〇、四〇四噸，英國約佔半數。各船公司損失達五百萬元。英政府初行高壓政策，海員相率離港赴廣州，英艘，於沙田，開槍射擊，海員死二人，傷者甚衆。堅持八星期，英政府讓步，允增加工資，並將被拆去之「中華海員工

合會」招牌送還。

此次罷工，中共史官歸功於一海員其後爲中共重要份子的蘇兆徵，實則香港工人加入國民黨者逾二萬人，而海員佔半數。中山先生時在桂林，時予指示。陳炯明在廣州每日以數千元予以支持，並由馬超俊代表國民黨，古應芬代表省政府與罷工工人保持聯系。最後工潮的解決，乃馬超俊等奉中山先生之命前往調解之結果。

此次罷工乃海員爲要求增加工資而起，因得國民黨的支持而獲得相當的成功。時中共的「勞動組合書記部」雖已遷至廣州，似尚未發生力量。至於蘇兆徵不過參加罷工的一名「積極份子」而已。

叁 第一次勞動大會

自民國十年中共「勞動組合書記部」遷至廣州後，工運工作即秘密進行。十一年二月，廣東省總工會籌備會成立，中共未能滲入，乃公開的對未組工會的工人，爲之組織工會，對已有工會者，則勾結部份工人另建一工會與之對立；復約同若干工會，在廣州市仙鄰巷成立「廣東工會聯合會」，以與廣東省總工會對抗，於是廣州工人陷於紛擾之中。

共黨張特立、鄧中夏、羅章龍、李啓漢等，均以青年學生身份主持勞動組合書記部。民國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一說十日），突以該書記部名義發出通知，刊登廣告，發起於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並向廣東機器工會商借中華機器總會會議室爲大會會址。機器工會將拒之，旋經馬超俊請示於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以此舉尙屬正當，雖非本黨主持，亦應予以贊助，勿示人以不廣，乃允借用。到會代表一六二人，代表百餘工會。代表以廣州、香港爲多，佔百分之八十。其餘代表省外各鐵路、礦區及各省、市工會者，是否爲共黨包辦或冒充，無從分辨。無政府黨代表亦有參加。大會時起爭執，幸尙未致決裂。廣東工會團體對省外代表尤優予招待。由於中共事先有準備，大會佈置全用赤色，並有「中國共產黨萬歲」口號。又由於主席團發生爭執，結果由一共黨份子任主席到底。

大會重要決議案如下：

一、八小時工作制案。

二、罷工援助案。

三、工會組織原則案——以產業組合爲原則，手工業者可採職業組合。將來各地產業與職業組合結爲地方勞動聯合會，再由各聯合會組成全國總工會。

四、明年五一節在漢口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案。

五、在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之前，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爲通訊機關。

此次大會，由於中山先生寬容提攜，使中共獲得三項最大的成就：第一、中共在當時雖尙缺乏工人羣衆作基礎，然經此一號召，對於全國性工運儼然居於領導地位；第二、爾後各次勞動大會均被據爲中共的工運正統；第三、勞動組合書記部儼然成爲全國總工會的代辦機關。

自是中共以勞動組合書記部名義從事指揮各地工運，並推動勞動立法運動，聲勢爲之一振。

肆 「二七」慘案

民國十一年底，京漢鐵路各站成立十六個「工人俱樂部」，其義務秘書均爲共黨份子。

十二年一月五日，全線代表在鄭州舉行會議，決定於二月一日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時直系軍閥吳佩孚駐節洛陽，方提出「保護勞工」爲其四大主張之一。先是，十一年直奉戰爭，直系獲勝，佩孚風雲一時。國際共黨企圖聯合佩孚。陳獨秀唱「孫吳聯合」之說。李大劍與佩孚之政務處長白堅武有舊，令其說佩孚聯共，佩孚允之；是以主張保護勞工，兼以打擊共同敵人交通系在鐵路上勢力。大劍復請准交通處長高洪恩，在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及津浦六路，每路派一鐵路密查員，悉以共黨份子充任。待遇每月均在百元以上。既可以所入勻作工會活動之用，又因係密查，可以私授同志，參加工作，自由乘車，往來各線，員工莫測權威，趨奉唯恐不及，乃組織工人，煽動罷工，鐵路從此多事。民十一，長辛店罷工，改善員工待遇，使佩孚收入損失不貲，佩孚已有戒心。至是，工人代表會議決定成立總工會，於是謠傳全線即將總罷工。佩孚乃以在軍事區域不准開會爲由，下令禁止開會。工會派代表五人見佩孚，說明只成立總工會，並無罷工之意。佩孚態度溫和，重申保護勞工政策，但謂命令已發，不能收回，勸會議改期或改地舉行。代

表回報，工會有允意，詎共黨份子王功、李震瀛等堅決反對，乃於二月一日照常於鄭州舉行大會，軍警出動阻止，被代表衝入會場，乃包圍會場，強行解散，代表概被監視，羣情憤激。王、李等遂於是晚召集主幹人員會議，決定四日起罷工，要求撤換鐵路局長及鄭州警察廳長，賠償損失及改善待遇等項。於是罷工令下，事態擴大。

一日晚之會議並推定負責之總代表三人，一在長辛店，一在鄭州，一在漢口江岸，而無一人能負全責。罷工既起，路局與軍政各方與工會交涉，三代表彼此推諉，始終不得要領。佩孚乃下令強迫復工，工人以無總工會命令，拒之。七日，佩孚命軍隊分別進攻長辛店、鄭州及江岸各工會，結果，長辛店及江岸死者三十九人，著名者有林謙祥與施洋，傷者數百人，三處被捕工人二十四人，事後員工被開除者數百人。九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處）及武漢工團聯合會聯合下令復工。其他各路因援助京漢鐵路工人而罷工者，亦先後復工。

此次中共所造成的工潮及工人所遭受的災難，換得第三國際的嘉獎，在其致工人書中說：「你們的行動已經走到世界無產階級的隊伍裡去。」

自是中共與佩孚絕緣，而壹意要求加入國民黨。

伍 二次勞動大會（註二）

二七慘案使中共滲透勞工組織稍具基礎之京漢鐵路備受打擊。民國十三年冬，直系軍閥既倒，孫中山先生北上，國民黨透過交通系之葉恭綽、鄭洪年之疏通，由段祺瑞將二七慘案被拘之工人釋出。十四年二月七日，復舉行二七死難烈士追悼會，馬超俊代表中山先生出席長辛店之大會，即席致詞，京漢鐵路工會即於是月復活。當孫中山先生北上時，各省區工人代表亦相率北上，擬籌備「全國各省工會聯合會」，在馬超俊指導之下，於十四年三月一日在北京成立。中山先生時肝病正劇，派孫科、鄭洪年代表出席致詞。此一聯合會為國民黨領導之全國性工人組織，其所轄之單位有上海工團聯合會、廣東總工會、廣州中國機器總會、香港工團總會、湖北工團聯合會、湖南勞工會、京漢鐵路總工會、安徽勞工會、湘鄂鐵路總工會、正太鐵路總工會、平綏鐵路總工會、北京工界聯合會及哈爾濱總工會等十三個單位。此一組織如能健全發展，則全國勞工組織自不難步入坦途。不幸甫及洽旬，中山先生逝世，政局突變，國民黨人不能立足於北

京，反共的國民黨人又被排於國民黨之外，以致非共的工人組織趨於解體。

於是中共撤開國民黨，召集第二次勞動大會。

在第一次勞動大會時，係由中共之勞動組合書記部名義所召集，並決定以該書記部為通訊機關。二次大會，中共本擬仍用書記部名義召集，但國民黨領導之工會羣起反對，在上海者即有三十三個工人團體通電否認。武漢、長沙、天津以及北方各鐵路工會亦多持異議，廣東之機器總會及廣東總工會亦拒絕參加。其時上海工團聯合會已被中共份子打入，因中共中央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均在上海，而中共份子毛澤東、譚代英、沈澤民、向警予等均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主任要職，故能利用國民黨容共關係，控制上海工團聯合會常務委員職掌。中共乃用上海工團聯合會發起，用中華海員工會聯合會、全國鐵路總工會、漢冶萍總工會及廣州工人代表會四個單位副署，不顧多數工會反對，於五月一日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於廣州。

同日，廣州尚召集一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與工人大會合併舉行一號稱十萬人的示威遊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奧斯脫洛夫斯基出席演說，謂工會是炮台，以之打倒資本主義制度。台下一片「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赤色職工國際萬歲」呼聲。大會並通過工農兵聯合決議案。

在歷時七日的勞動大會中，通過三十多個決議案，其重要者如下：

第一、政治鬥爭決議案：主張工人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關鬥爭，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直到工人階級自己掌握政權，而要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實行階級鬥爭。工人階級對於民族革命的態度，主張必須由工人階級取得領導的地位，不可和其他階級混合，以保持其本色。工人階級應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及普選等自由，這只是「初步目標」，其最終目標是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

第二、經濟鬥爭決議案：認經濟鬥爭的改良運動是「走向總解決的第一步」，而應轉為政治鬥爭。

工人階級切近的要求是：規定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反對虐待，改善女工、童工生活，勞動保險與社會保險，取消包工制。

罷工時應互相支援、響應及救濟。

第三、組織問題決議案：工會不妨因其性質環境的不同，組織不同形式的工會，但應以產業組織為中心，其基層為支部，五十人以上者得組織辦事機關，各辦事機關得組織地方機關，每年經上級批准，得開代表大會，選舉總工會執行委員，當地各工會又得組織省、市聯合會。

工會在不能公開活動地區得採半公開或秘密組織，而用補習學校或協作社去從事活動。

此外，尚有工農聯合決議案，由工人領導農民從事階級鬥爭；剷除「工賊」決議案，將所有非共的工人領袖，包括國民黨從事工運數十年之馬超俊在內，予以開除；加入赤色職工國際決議案，及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決議案等。

關於全國總工會，大會選舉執行委員二十五人，其中二十三人為中共份子，其可稽者有林偉民、蘇兆徵、鄧培、王荷波、劉文松（脫黨）、李立三、劉少奇、鄧中夏、劉華、張佐臣、李森（啓漢）、項英、許白昊、鄧亮、譚竹影（脫黨）、劉爾崧等。並以林偉民為委員長，劉少奇、劉文松副，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森為組織部長，孫雲鵬為經濟部長。總會設於廣州，並在上海設辦事處。中共在總工會內設置黨團，以鄧中夏為黨團書記（註三）。

國民黨中央工部本為共產份子所包辦，此次大會自然合法化，於是中國工運幾完全赤化矣。

此一勞動大會系統及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直至中共竊據大陸政權後仍維持不變。

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1. 本會定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
2. 本會以團結全國工人，圖謀工人福利為宗旨。
3. 本會總機關暫設廣州，並得擇定其他相當地址，特設辦事處。

4.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真正工人組合，均得爲本會會員，凡產業工人已有全國一總組合之組織者，或一市、一縣、一省之城市工人已有組合組織者，由該總組合加入本會爲會員。各單獨組合直接加入本會者，則須經本會之審查認可。

5. 本會之職任如左：

- (一) 發展全國工人之組織；
- (二) 統一全國工會運動，務期密切之團結；
- (三) 整理各工會之組織系統；
- (四) 指揮各工會之行動；
- (五) 仲裁各工會間或各工會之爭端；
- (六) 發佈全國工人共同奮鬥之目標；
- (七) 代表全國工人與國際工人謀密切之結合；
- (八) 提高工人知識，聯絡互相之感情；
- (九) 促進各工會彼此間有效之互助；
- (十) 保障工人利益，設法解決救濟及職業介紹等事項。

第二章 組織

6. 本會之最高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並得舉行臨時大會，均由本會執行委員會召集之。各工人團體派駐代表大會之代表額數，由本會執行委員會按比例決定之。

7. 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執行委員會二十五人，組織執行委員會。代表大會閉會時，執行委員會爲本會最高機關。

8. 執行委員互選正執行委員長一人，副執行委員長二人。委員長不能執行職務時，執行委員會重新互選之。

9. 執行委員會之下，須組織一幹事局，受執行委員會之指揮監督，駐會辦理一切事務（幹事局幹事人選由執行委員會決定之）。

10 幹事局分設下列各部辦事：

(一) 組織部——掌管本會所屬各工會之組織事項，並幫助各處無工會組織之工人羣衆，組織工會。

(二) 秘書部——掌管本會一切文件收發、統計、報告等事項。

(三) 宣傳部——掌管本會宣傳教育工作，並指導工會之教育方針。

(四) 經濟部——掌管司庫、司賬、庶務等經濟事項。各部須設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由執行委員會斟酌事之繁簡選任之。

11 幹事局設總幹事一人，由執行委員中之一人兼任為幹事局會議之主席。

12 本會為會務發展及便利起見，得於相當地點特設辦事處。各處主任一人由執行委員會斟酌情形決定之。

13 執行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設立各種特別委員會或機關，並得聘任顧問、編輯等人員。

14 本會執行委員會幹事局及其他機關人員，均每年改選一次。

15 執行委員會、幹事局、特設辦事處、特別委員會，及特設機關之會議及組織細則，由執行委員會另定之。

第三章 公約

16 各工會須實行本會代表大會及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及命令。

17 如一處或一種工人發生為工人階級鬥爭時，各工會接到本會之通告後，應一致為聲勢上、經濟上、或實力上之援助。

18 在同一產業及職業，或同一地域內，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同等性質之工會發現時，應依本會之勸告，互相讓步，併成一個工會。

19 各工會間，如有爭端，須直向本會控訴，聽候仲裁，不得互相攻擊。

20 各工會對本會有不滿意時，得直向本會抗議，或向代表大會控告，不得有破壞本會之行動或言論。

第四章 經費

21 各工會應按月向本會繳納經費，其數目由各工會按比例法認定之。

22 遇必要時，經本會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得向各工會徵收特別捐。

23 本會經費發生困難時，得向外界熱心幫助本會者捐募。

第五章 附則

24 本章程經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後即發生效力。

25 本章程如有不適當處，應由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修正之。

(註一) 本項主要參考書：①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編一三六至二五三頁。②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〇至八九頁，一九四九年七月天津知識書店版。

(註二) 本項主要參考書：①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三五六至三六一頁，②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二七至一五一頁。

(註三) 此段參閱「中共透視」六五頁。

鄧中夏(一八九七—一九三三)湖南宜章人，地主，入北大，參加五四運動。未畢業，在長辛店組織鐵路工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勞工組合書記部」，第一次勞大後，任書記部主任。屢次鼓動罷工。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起當選為中委。一九二三年創辦上海大學，在滬仍從事工運。「五卅」時在廣州，從事省港大罷工。一九二八為駐「赤免職工國際」代表，旋被選為執委。在俄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由俄出版。一九三〇年歸國。一九三三年被殺於上海。

第二節 工人運動(二) (註一)

自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之被分化愈甚，亦即中共對國民黨之滲透愈深，運動羣衆愈力。於是是年五月，爆發「五卅」慘案及其相繼發生之各地慘案；六月，爆發「省港罷工」，相持達年餘之久；直至十五年五月「三次勞大」，已臨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羣衆運動始告一段落。上列各史實併於本節述之。

壹 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發生於上海。

甲午戰後，中國允許日人在我若干通商口岸輸入機器，設立工廠。日人利用我廉價而充分之勞動力以從事經濟侵略。以紗廠論，至民國十四年，日本在中國的紗廠凡四十一家，工人八萬八千餘人(均約等於中國紗廠數三分之一)，

而在上海者佔二十七家，工人五萬八千人。工人絕大多數爲女工及童工，工資甚低，每月不過數元，工作時間，日夜班均達十二小時，常有打罵工人情事。工人積不能忍。此時各地各業間有罷工事件發生，自足以刺激工人情緒。加以自民國四年五月九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強迫袁世凱政府承認之後，國人反日情緒往往隨中日關係的波瀾而隨時高漲（如山東問題引起五四運動等），而不易收拾，此均爲五卅慘案之背景及環境。至民國十四年二月及四月，上海與青島之日本紗廠先後發生罷工風潮，遂成爲五卅慘案的導火線。

日本內外棉紗廠，因其在日本、在中國均有廠而得名。內外棉株式會社共十九廠，而在日本僅三廠，其在上海者十一廠，在青島者三廠，在東北者二廠。十四年二月一日，上海第八廠因擬多用女工而開除整批男工，乃羣起罷工，要求復工，並提出若干條件，被拒，遷延至十三日，各廠相繼罷工，人數達四萬餘人。至二十五日，日本紗廠代表與調停者上海總商會獲得協議如下：

- 一、不得無故打人，
- 二、依照工作動情增加工資，
- 三、不得無故開除工人，
- 四、發還儲蓄金。

似此，除依據第三條被開除工人應允復工外，工人方面並未獲得勝利。然而在工人方面取得罷工經驗，在共黨方面，則漸能掌握工人。

中共自成立以來即致力工運，但效果甚微，「二七」事件之後，更爲消沈。至此次工潮發生，中共中央臨時組織一委員會，令李立三、鄧中夏負責指揮，並令其在滬全體黨員百餘人參加工作。在滬西小沙渡成立一「滬西工友俱樂部」，工作者七八十人，每日集合工人開會，組織糾查隊，教以提條件，防破壞等方法，於是中共與工人羣衆接近，而使其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略具內容。

四月，有青島日本紗廠罷工事件。時紗廠工人秘密組織工會，其文書、名冊被廠方發覺，加以搜查，引起反感，工

人乃提出條件，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減少工時，至十九日，各廠相繼罷工，達萬人。日廠在青島商會及日領事調解之下，稍有讓步，允食費每日加日金一錢（約合國幣一分），吃飯時休息三十分鐘，日夜各班勤務中休息十分鐘，及不打罵工人等，至五月十日復工。

然廠方無論在滬、在青，均不承認工會。在青島者，奉軍應日方請求，拘捕工會人員，引起五月廿二日再罷工，至二十八日，槍殺工人二，重傷六，輕傷十餘，卒於六月十四日被迫復工。此時五卅慘案已起矣。

二月，上海日紗廠四萬人罷工解決後，廠方不承認工會，三月，幾致罷工。十五日，第七廠工人顧正洪（中共改其名爲正「紅」，並謬稱爲中共黨員）等，因故與廠方交涉，發生爭執，被擊殺，又引起罷工。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羣治大學及上海大學學生先後至租界演講，支援工人，被阻，各有學生被捕。時馬超俊在上海，正創立孫文主義學會以抵制共黨，聞訊，亟與在滬國民黨員，孫文主義學會人員，各工團幹部及紳、商、學界領袖交換意見，決於五月卅日發動市民、學生、工人於九畝地開羣衆大會。及期，到會者十餘萬人，對被捕工人、學生作聲援。上海學生聯合會響應此一號召，組織宣傳隊二千餘人分途出發。在南京路老閘捕房被捕南洋大學學生三百餘人，各校學生及羣衆集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西、印捕開槍，斃四人，重傷二十餘，被捕五十餘，後重傷者又死九人（CY上海地區書記何秉義被殺）。此即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是晚，葉楚傖、馬超俊、劉蘆隱等在環龍路四十四號西山派辦公地點召開各界緊急會議，決定支援慘案辦法，於翌日起全市罷市、罷工、罷課，並電全國，擴大影響。英、日當局則宣布戒嚴，召集西捕、水兵及商團從事鎮壓。復封閉學校，驅走教員，並繼續槍殺民衆，五卅而後，釀成慘案九次，死者六十餘人，國人生命，毫無保障。

此案經北京政府交涉毫無結果，然反英、反日之風瀰滿全國；各地慘案，如漢口、沙基、重慶、南京、青島等，到處發生。民族反帝國主義的怒潮達於最高點。

五卅慘案之造成雖非由中共直接領導，而擅於攫奪之中共迅將工運領導權奪入自己之手。上海之工會總機關本爲「上海工團聯合會」中共份子本已滲透與操縱，至此，乘上海工會聯合大會羣情憤激之際，李立三等遽提出成立上海總工

會，共黨份子起而附和（按：此即黨團作用），獲得通過，並推立三爲委員長，謝文副之，隨即發出六月一日總罷工命令。於是上海工運瀾漫赤色氣氛。

自六月一日起，五卅慘案引起全國運動怒潮。是日，上海工人開始總罷工，上海租界商人罷市，而全國學生聯合會之成立，在中共羣衆運動中尤具有重要性。（詳第三節）

六月二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

四日、共黨大本營之上海大學被封，旋遷至華界開學。

六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成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上海罷工人數，據中共稱，達三十萬人。誇爲東亞歷史上最鉅大之罷工。

截至六月二十日止，各省市均成立「滙案後援會」，多由中共份子把持。並先後在各地，如北京、鎮江、漢口、九江、長沙、天津、南京、青島、重慶、廣東，因援助滙案運動而發生慘案。

對於此項運動，國民黨亦極力予以物質及精神之支援，使革命運動爲之高漲，中共勢力亦大見擴張。

關於中共對五卅慘案的基本態度，表現於其告民衆書中，認爲是帝國主義對民族主義的壓迫，也是後者對前者的反抗。它不是法律的、經濟的，而是政治的。非取消不平等條約，則中國民族生命即沒有保障。因而要求全國各被壓迫階級要靠自身的力量來鬥爭，而不要依賴（北）政府的交涉，不與帝國主義調和，停止上流社會的妥協活動，及謹防帝國主義的離間中共與蘇聯與中國羣衆的關係。

茲將此項告民衆書錄後。

中國共產黨爲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衆

全國工人們！農人們！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

血肉橫飛的上海，現在已成爲外國帝國主義的屠場了，這是偶然的事嗎？不是的。這是資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必然現象。資本帝國主義存在一天，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每日都有被屠殺的可能呵！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歐、美各國被壓迫階級，不是常常被資本帝國主義的強盜們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殺嗎？我們中國民族的被屠殺亦非始於今日呵！自鴉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國史，完全是一部外國強盜宰割中國民族的史書。然而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國民族自覺的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頁呵！

年來全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之普遍的覺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掠家的殺機。尤其是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工、農階級勢力之形成，更堅決了各強國的強盜階級（即帝國主義的資本家階級）對於中國的鐵血鎮壓政策。上海的大屠殺，便是帝國主義者重新表示他們獸性的志願——只准中國人做奴隸，不准中國人謀解放，只准中國人在「奴隸」與「鐵血」的兩種慘境中有個選擇。

帝國主義的列強，對於侵掠中國和鎮壓中國的民族運動是一致的，無論他是先進的帝國主義（如英國）或後起的帝國主義（如日本）。這次上海事變，起於日本帝國主義向上海以及青島紗廠工人積極的進攻，而成爲英國帝國主義向學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殘殺。美國帝國主義在這大屠殺中完全與英國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揚威的萬國商團，美國商團的兇暴與英國的沒有兩樣；美國海軍陸戰隊悉數上岸加入英兵的隊伍之內，即在楊樹浦一帶任意殘殺中國路人，尤其望見工人、學生經過即開槍；美國「大陸報」同英國「字林西報」一樣的兇惡，一樣的造謠，誣指這次運動爲蘇俄和共產黨所主持，聲言美國在華之三十餘艘軍艦將全部或大部分調向上海新殺。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互衝突與狡猾也擺在我們面前：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努力企圖將此次事變的目標移嫁於英國，而德國駐滬領事亦向學生表示一種假仁假義的態度。

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爲這次事變是起於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民族運動的主力軍——工人階級——進攻，而成爲英國帝國主義對援助工人的民族運動之鐵血鎮壓政策。所以因英、日帝國主義之大屠殺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國的反抗運動之目標，決不止於懲兇、賠償、道歉等「了事」的虛文，解決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爲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一日不推翻，中國民族的生命與自由便一日沒有担保，隨時隨地都有被橫暴殘酷野蠻無恥的帝國主義蹂躪屠殺之危險。全中國人民的生命與自由，決不能由懲兇、賠償、道歉等虛文得到担保，只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這次大屠殺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國的反抗運動，將是一種長期的民族爭鬥。這爭鬥的得失將不以英、日帝國主義是否允許懲兇、賠償、道歉爲轉移，而將被決定下列

的兩個條件：第一、這爭鬥是否能長期的持續的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與統治，並使其在經濟上生活上發生永久的危機；第二、這爭鬥是否能引導全國各階級的民衆入於反帝國主義的高潮，並形成各階級分別的羣衆組織與聯合的民族組織。

中國共產黨政號召全國各種被壓迫階級的羣衆來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中國共產黨更號召全國各種被壓迫階級的羣衆堅持到底的來維持並發展這個長期的民族鬥爭；務使野蠻殘暴的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特權與統治不斷的動搖，務使其在華的政治經濟地位發生永久的危機；而在這個爭鬥中務必提高並普遍反帝國主義的宣傳與組織，成功各階級分別的與聯合的民衆政治勢力。

中國共產黨請全國憤激的反抗帝國主義之屠殺的人民，注意四件事：

第一、須將這個鬥爭持續的依靠於全國民衆自身力量，萬不可倚賴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輟民衆的反抗；須知段、張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賣國媚外是其特長；我們雖不必拒絕政府的交涉，却不可相信並依賴政府的交涉而中輟民衆的反抗。

第二、須知中國人民與野蠻殘暴的帝國主義無調和之餘地；更須知外國大資本家、大商業家、大銀行家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主人，在上海的外商廠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這次大屠殺的正兇，萬不能自欺欺人把殘殺之罪轉移於其僱用之巡捕，而反認真正的敵人爲「調人」，希望他們出來講什麼「斡旋」、「公道」和「諒解」。帝國主義對付我們只有奴隸地位與鐵血政策，我們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也只有我們屈服他們或他們屈服我們之兩條路。與其認賊爲父，敷衍面子以了事，毋寧乾脆的鬥爭，乾脆的失敗之光榮。

第三、在這如火如荼的大反抗運動中，上海上流社會和各報新聞記者已多少暴露其調和妥協和「速了」的傾向；縱然上流社會現在還是這反抗運動中的要素，然這種傾向若不停止，實大有害於全民族的利益。

第四、須謹防帝國主義的離間破壞政策。帝國主義的離間破壞政策，第一是用種種方法捏造蘇俄和共產黨主使的謠言，第二是離間商界與工人學生的一致，並企圖和緩商界領袖與商人羣衆分離。

中國共產黨敢告全國人民不要受帝國主義的暗示與欺騙。這樣反抗帝國主義野蠻屠殺的大運動，各階級各黨派都應當積極的參加，積極的鼓動或主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農階級的黨，工、農階級既不是冷血動物，又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品，乃是帝國主義之最堅強最可怕的死敵，中國共產黨那有不參加運動的道理？假設這次運動真如帝國主義機關報之所說——是共產黨所鼓動的，那末這不僅不足使各階級羣衆來避共產黨而望不前，反而要使他们們親近共產黨，並加倍勇往的團結中國民族之一致的奮鬥。因爲中國共產黨只有這樣的積極努力才能使各階級羣衆深信共產黨不僅爲工、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並且爲全中國被壓迫民族而奮鬥。

蘇俄亦然。假如帝國主義機關報所說蘇俄鼓動是真的，那末不僅不足使各階級民衆畏避蘇俄，停止運動，反而要使他們證實只有工農共和國的蘇俄是被壓迫民族唯一的摯友，摯友的幫助，無論是精神的或物質的，都要大大增加他們反帝國主義的情緒與勇氣。只可惜蘇俄的力量現在還不能助中國民族一舉打倒帝國主義，使他從野蠻殘暴的列強中解放出來。然而中國全國民衆正殷殷的望着蘇俄及其領導的各強國無產階級有幫助中國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呵！

中國共產黨敢提醒全國民衆的注意：這次上海的大事變是由帝國主義向工人階級之進攻引起的，這是證明各階級的民衆已經深悟擁護反帝國主義的新動力之重要。幾十幾百幾千幾萬的上海學生、市民不惜殞身飲彈，在帝國主義的砲火中前仆後繼的來援助工人，這是何等可歌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犧牲呵！務望上海和全國奮起的民衆，繼承流血烈士之遺志，在長期的民族爭鬥中時時擁護最被帝國主義仇視壓迫的工人羣衆之利益；勿中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使最忠於民族利益的工人階級有任何不堪之危險，而民族解放運動亦因此而遭毀滅不振之打擊呵！

全國工人們！農人們！一切被壓迫的羣衆們！起來，起來！打倒野蠻殘暴的帝國主義！

各階級聯合戰線萬歲！

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原載「嚮導週報」第一百一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出版。）

貳 省港罷工

省港罷工，起於香港，延及廣州，自民國十四年六月起，歷時年餘之久，其反抗對象爲英國。

五卅慘案本起因於日本紗廠，其事發生於上海英租界，上海英國當局從事壓制，於是國人轉而反英。爾時大英帝國爲第一強國，爲俄共之頭號敵人，故中共之反英較之反日尤具興趣。加以國民黨對英亦深具反感，於是亦集中於反英。五卅慘案風潮迅速遍及全國，而廣州方面，國民政府正從事於裁定楊希閔、劉震寰之亂，未能兼顧。至六月十三日，亂事弭平，即起而作響應五卅之準備。

六月十八日，香港、澳門及廣州海員即開始罷工，於是粵、港其他工人即有罷工醞釀。是日，廣東省長公署即召集

總商會及市商會代表，告以沙面工人醞釀罷工，號召商人予以經濟支援。十九日，中共在香港搶先發動其所能影響之海員，電車、排字及洋務之工會工人罷工，於是各工會相繼響應。至二十一日，大罷工形成，歷時十五日，罷工者達二十餘萬人。

其時中共在港工會中並無何基礎，黨員不滿十人，僅林偉民與蘇兆徵在海員中具有影響力。但由於國民黨中央工部及中華全國總工會操於中共之手，獲得國民黨之支持，加以民情憤激，於是此一罷工運動幾完全為中共所掌握，而助長中共之氣焰。中共之參加此項活動者尚有陳延平（獨秀子）、鄧中夏、楊殷、羅登賢等。（註二）

其時，廣州各界因五卅慘案組成廣州各界對外協會，六月二十二日，該會執行委員會決於明日舉行市民大會，遊行示威。次日午，工、農、商、學、兵到者十萬人，由譚平山主席，胡漢民宣讀國民黨中央決議案，略數五卅而後，帝國主義者在各地施其暴行，主張應遵照中山先生遺囑，取消不平等條約。廖仲凱、汪兆銘、孫科、伍朝樞、鄒魯、甘乃光等均到會，發表演講。會後遊行，將畢，後隊經沙基橋口之際，英軍遽行開槍，死者數十，傷者甚衆。是謂「沙基慘案」。此案使正在罷工之風潮益形強化。

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集香港及沙面工會八百餘人的代表大會，成立以十三人組成的「罷工委員會」，委員長為蘇兆徵。其下設幹事局，分七部辦事，另設一財政委員會。復又設一會審處，審判破壞者，設監獄，拘押犯人。罷工委員會擁有絕對權力，處理一切與罷工有關事項，廣東政府不得過問。他們「懲戒」所謂「黃色領袖」，逮捕送會審處，處以有期徒刑。他們判處香港帝國主義「走狗」林和記以死刑，引起廣東檢察廳長的抗議，結果由廣東省政府組織特別法庭對此類案件加以處理。

他們更組織糾察隊，為一總隊，轄五個大隊，大隊轄三個支隊，各設隊長訓育員等職，下轄三個小隊，下設三個班，每班十二人。總部二千餘人，以後尚有擴充，有槍四百枝。此無異中共的一枝武力。

此次大罷工顯然予香港經濟以致命之打擊。據鄧中夏稱：據「中國海關貿易冊」，香港每年出入口貨價為一億五千萬金磅，約合華幣二十五億二千萬元，每罷工一日，使香港損失七百萬元。

在七月與八月，香港兩度召集「公民大會」，請英政府出兵進攻廣州，未被接受，會由倫敦借給三百萬鎊作為救濟商業之用。

在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亦難免受其影響。罷工工人之食宿費均由廣東政府及各方面捐款予以維持，廣東商務上之被反封鎖，以及香港中國商人之損失，為數甚鉅。其後，罷工委員會准非英國之外國貨物入境，情況始稍改善，而日貨轉而大增矣。

省港罷工，經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工人糾查隊槍枝被繳而趨於鬆懈，至七月革命軍北伐而實際取消，至十月十日，罷工委員會正式取消對香港的封鎖。國民政府與香港政府談判復工所獲的交換條件之一為海關之二五附加稅。

叁 第三次勞動大會（註三）

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於民國十五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日開會於廣州。到會代表五〇二人，代表有組織、可統計的工人一二四萬餘，工會四〇〇餘。其決議案為：(1)職工運動之總策略，(2)組織問題及其運用之方法，(3)經濟鬥爭之最近目標及其步驟，(4)罷工的戰術，(5)農關係，(6)宣傳、教育問題，(7)女工、童工問題，(8)合作社問題。大會中有下列的報告：(1)一年來職工運動之發展及其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2)全國政治與社會狀況，(3)國民政府現況，(4)世界革命現況，(5)世界職工運動，(6)蘇俄狀況，(7)全國總工會報告，(8)上海總工會報告，(9)省港罷工報告，(10)各地代表團的報告，(11)工農兵大聯合的報告，(12)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經過報告。担任報告的有國民政府委員、俄人、中共黨員等。

關於總策略的規定：指出五卅前後工人階級地位的不同；指出工人階級最近目的在改善經濟生活，而責任在促成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死亡；又指出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一為政黨，一為工會。政黨乃階級的最高組織，工會須從原始的簡單的形式進而作嚴密的團結。又確定與農民的親密攜手及與城市各階級革命民衆建立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在組織方法決議案裡，說明下層組織、工廠支部、支部幹事會、工廠委員會、產業聯合會會議、秘密組織等的規律和實際。在經濟

鬥爭決議案裡，提出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勞動保護，改良待遇，優待女、童工等與進行步驟和交換經驗。罷工戰術這一新的問題引起大家的討論，決議案中分析罷工的性質，決定的條件，準備的步驟，注意的問題及估計敵人的破壞等。於此，必須向讀者指出：中共的工人組織與運動，如改善待遇，鼓勵罷工等，其目的不在改善工人生活，而在作為奪取政權手段。在其敵人區域，則從事政治性的及經濟性的罷工，以困擾其敵人，不惜造成流血事件以接近其目的，一旦自身獲得區域的或全國性的政權時，則罷工固所嚴禁，改善生活亦不容提及，而只有「生產競賽」，為中共增加財富以從事奴役性的勞動。所有共產國家莫不如此。

此次大會中，正值英國工人舉行總罷工，中共對之大感興趣，致電加以支援。又值國民政府準備北伐，乃推派代表請願出兵。大會曾參加五四、五五、五七等紀念，又在省內連續舉行工農兵、工農商學等聯歡大會。最後發表宣言。

此次大會洽在中山艦事件之後，中共氣餒稍被抑制，但國民黨之容共政策仍繼續執行，中共亦未敢遽採決裂行動。大會開幕之日，蔣中正先生蒞會致詞，於稱述五卅慘案及省港罷工後，並鼓勵工人努力參加國民革命，略謂：

「五卅慘案發生，香港十餘萬工人，因反抗英帝國主義之殘暴，罷工回國，聯合革命戰線，奮鬥到了現在，有十個月之久，還是不懈。在這時期中間，工、農羣衆，又與政府合作，促成廣東的統一，肅清了一切反革命派，使國民政府的基礎，反加鞏固。又謂我們看一看全國的工、農運動，這兩年以來工、農羣衆，本已一天一天的覺悟團結起來，到去年五卅運動的時候，職工運動的發展，幾達於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度。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人數二十餘萬，時間三個月，後來因帝國主義者勾結奉系軍閥來摧殘壓迫，竟致失敗；但中國工人，已在世界上及全國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全國各地重要地方，都是罷起工來，帝國主義者知道中國人民已經覺悟了。上海總工會封閉以後，仍能在暴力壓迫的下面，嚴密的進行；反奉戰爭起後，北方鐵路工人頗給與奉軍以打擊。雖然他們力量不厚，但北方國民軍能維持到現在，仍是農、工的力量；我們相信革命能努力為農、工謀利益，而全國農、工又真能參加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便可成功。」

大會認為重要決議案之一是鮑羅廷的「世界革命狀況」報告。實則此項報告仍然是些革命八股，並無新義。首先指出第一次世界戰爭使歐洲帝國主義破產，而美國乘機發財，成為英國競爭者。歐洲資本家為清還美債及準備再戰事而繼續加重無產階級的壓迫。只有俄國革命成功，從事反帝戰爭，才解脫了資產階級的壓迫。繼謂二月前成立的國際聯盟是歐洲資產階級用以反蘇的工具。由於目前歐洲工人的覺悟及東方民族的覺醒，歐洲資產階級乃用法西斯手段以壓迫工人

階級及民族運動。最後鼓勵中國工人努力參加國民革命。

大會於五月三日有致共產黨書，至十二日始有致國民黨書，前者表示無條件的擁護，後者仍作謹慎的分化，從此可以測知大會為中共所操縱，不過不十分囂張而已。

茲將兩書錄後：

(一) 致國民黨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轉全黨同志鈞鑒：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特決議誠懇的致書於貴黨，表示中國工人階級，對於貴黨深厚的同情，亦誠懇的願望。中國工人階級深感自身的民族的痛苦，正從悲慘的境遇裡，為自身利益與民族利益，而參加國民革命之浩大奮鬥。貴黨代表全民族的利益，為國民革命之總部，由偉大的不朽的導師中山先生所遺留之革命工作，我勞動羣衆，已從實際上履行，而正逐日從事於廣大的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戰鬥。中國工人階級，決意擁護貴黨，並願以全力擁護由貴黨所創造的為民族之自由與獨立而建設的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貴黨的農、工政策，深得勞動羣衆之同情，在國民政府的勢力下，所賦與人民的自由亦深受誠懇的贊許與擁護；故大會謹代表全國工人羣衆，向貴黨表示誠懇的感謝由貴黨工、農政策所得之利益與自由。惟在貴黨中尚未免有少數不良份子，昧於民族革命的意義，違悖中山先生之遺教，而間有摧殘工、農利益事實，誠不免為我勞動羣衆與貴黨共同遺憾。茲後深望貴黨注意此種事，盡心維護勞苦人民之利益，保持貴黨農、工政策之真義；則貴黨將更為我勞苦羣衆所愛戴，革命前途，將愈見光輝，而早底於成。大會對於貴黨，敢表示革命的信任，特謹致忠實的革命敬禮。中國國民黨萬歲，國民革命萬歲，世界革命萬歲。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主席團簽名，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二) 致共產黨書：「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貴黨為中國工、農階級的利益，甚至為中國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利益，而奮鬥，而犧牲，已經幾年了。在幾年當中，我們在各方工作上，在各種戰爭中，都證實貴黨所持策略之正確；尤其感覺到貴黨黨員之勇敢與犧牲的精神。我們知道在近年各種壯烈鬥爭的過程中，尤其在「二七」與「五卅」的鬥爭中，貴黨黨員犧牲了不少性命，如「二七」中施洋烈士與「五卅」中之劉華烈士等，都是我們工人階級公認的領袖，是為我們階級的利益而犧牲的。但是因為貴黨和我們許多先進革命份子奮鬥與犧牲的結果，在我們工人運動上，和民族革命運動，都創造出了一種偉大的勢力，已經使得敵人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大的資本階級恐怖；因恐怖而製造許多輕蔑貴黨的謠言，想藉此毀壞貴黨在羣衆中的信用，即是離散我們革命的勢力。但是在我們工人階級，和進步的革命份子看來，敵人此種卑鄙惡濁的離間手段，不惟不能使我們對貴黨有所懷疑，反而增進了我們對貴黨的敬信與親愛。因為我們在各方面處處都是與貴黨黨員一塊兒工作，我們在各種鬥爭中，都親眼看見貴黨黨員之奮鬥和犧牲的精神。因此本大會敢代表

全中國一百數十萬有組織的工人，很懇懇地向貴黨表示十二分的敬信與親愛。同時當此敵人正向我們工人階級和革命勢力進攻之時，希望貴黨格外努力，繼續貴黨之正確策略，與奮鬥和犧牲之精神。敬祝貴黨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人階級解放萬歲，中國工人階級革命萬歲。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主席團簽名，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

（註一）關於五卅慘案及省港罷工部份主要參考資料爲①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三六二頁，三七四至三八二頁，四〇一至四〇四頁。②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一〇至一二六頁，一五二至二二二頁。

（註二）米夫「奮鬥十五年」三節。

（註三）本項主要參考書：①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五二五至五二九頁。②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二一九至二二三二頁。

第三節 青年團與學生運動

中共以黨領導青年團，又以團領導學生運動。

壹 社會主義青年團

青年團爲共黨的預備隊，爲黨外的最重要組織，亦可視爲黨的組織的一部份。組織青年團，乃臨時中央最重要工作之一。社會主義青年團（SY）之成立，是民國九年八月在上海漁陽里二號，與臨時中央之成立同時同地，且同在吳廷康指導之下進行。組織的中心人物爲陳獨秀、俞秀松、張太雷、蕭楚女等，亦即臨時中央諸人。以俞秀松爲書記，執行團務。吸收團員比較寬鬆，不及一月，達三十餘人。派張太雷爲代表，出席莫斯科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在國內，協同臨時中央從事組織工會，設立工人學校等工作。此時團員，亦與臨時中央黨員相似，思想紛歧，凡傾向於社會主義者，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均有加入，至十五年五月，被陳獨秀解散。嗣張太雷奉命組織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支部，自莫斯科歸國，十一月，開始改組，名稱仍舊，只團結純粹共產主義者。此後半年之間，在全國各地設立十七個支部。十一年五月一日，由中共臨時中央召集並主持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出

席代表二十七人，代表十五個地方團部，據稱團員已有四千人。少共國際派大林（A.S. Dailin）出席指導。會期自五月五日起至十日止，凡六天。會中決定加入「少共國際」，並通過「綱領」及「章程」。（註11）

民國十二年八月，中共三大大會後兩個月，青年團接受黨的訓令，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於廣州，完全接受中共第三次大會的政治號召，表示願意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決議案」中有云：

「本團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中國』。『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量範圍的國民革命宣傳，擴大國民黨的國民黨』。同時，大會指出本團尤須注重強烈的國民運動宣傳，以促進國民革命的實際行動（如示威及政治罷工等）。」

「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委員會的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

(1) 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論行動完全一致。

(2) 本團應保存本團的獨立的嚴密的組織。（註12）

稍後，該團舉行擴大執委會會議，譚平山以廣東區負責人出席報告，謂「我們在國民黨中高級機關位置之競爭既佔完全勝利及優越地位，今後應注其全力於區分部或廣州市黨部實際工作。」

在上海方面，該擴大會議決議「沒法整頓上海學生聯合會，使爲我用」。並通過「關於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要擴大國民黨組織，避免衝突而注意下層工作，介紹工、農及中等學生入國民黨及勿忘無產階級立場等。（註13）

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是以青年及學生爲對象。是年中國學生聯合會及全國青年聯合會成立於廣州，顯然是該團在國民黨掩護之下發動的。

社會主義青年團僅開大會兩次。至民國十四年二月緊接中共第四次大會之後，舉行該團第三次大會於上海，改名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並決定新章程，新綱領。此項文件，一時無法獲得。

大會選舉中央委員名單如下：（註14）

中央執行委員：張太雷 惲代英 任弼時 賀昌 張秋人 劉伯莊 劉爾崧 夏曦 徐正廷
候補中央委員：張伯簡 林育南 李逸 劉昌羣 陳喬年

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所決定之職務分配如下：

總書記——張太雷

組織部長——任弼時

宣傳部長——惲代英

勞農部長——賀昌

婦女部長——張太雷（兼）

江浙特派員兼上海分區主任——張秋人

青島特派員兼北京分區主任——劉伯莊

兩廣特派員兼廣州分區主任——劉爾崧

湖南特派員兼長沙分區主任——夏曦

安源特派員——徐正廷

青年團機關設在上海華界。民國十四年，上海方面共產主義青年團先後舉行兩次（羣衆性的）大會：第一次在西門一個小學裡舉行，外表上是爲紀念中國外交史上失敗的種種恥辱。第二次在一個星期日，慶祝國際青年工黨成立一週年，在會場上追述六年前柏林舉行的青年工人代表大會，旋並議決每年舉行同樣的紀念會。席間由著名共黨份子，上海大學教員兼民國日報副編輯施存統（後改名施復亮）發表煽動性演說，另有韓人三名則籲請中韓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隨後會衆呼口號，有「打倒現代帝國主義」，「打倒爲外國走狗的軍閥」等等。（註五）

茲將第一次大會所通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及章程」附錄於下：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及章程

（一九二一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大會通過——自日文回譯。）

壹 綱領

由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必須合力去幫助革命鬥爭，才能形成一種無產階級的實際力量。我們不要採取一種旁觀的或反對的態度，而使封建制度生命得以延長。我們要知道，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無產階級雖然可以獲得少許自由和權利，但不能得到完全解放。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後，他們便會立刻變為大資產階級，因之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便仍然存在。所以我們希望乃至促成民主革命的成功，但須發動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種革命目標在於實現工農制度，也就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也就是為完全解放中國無產階級而奮鬥的。主張一切生產工具公有，不勞動者不得食，以建立起初期共產主義社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方面要改良青年農民生活，為青年婦女與青年學生的利益而奮鬥，另一方面則培養青年的革命精神，為解放一般無產階級而奮鬥。

貳 章程

第一章 團員

第一條：凡十五歲以上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願遵守本團綱領與章程而為本團服務者，一律得為團員。

第二條：超過二十八歲者可為本團特別團員，僅有發言權。

第三條：團員入團應經團員二人的介紹，並須經該地方執行委員會通過。

第四條：團員入團：應在該地方團書記處登記後，應取得由地方執行委員會發給蓋印的團證。

第五條：團員入團，須繳納入團費五角，每月繳納常費一角，但勞動者免繳。

第二章 組織

第六條：各工廠，各學校以及各街村有關於治安機關，一律組織小組，在各小組中，凡滿十八歲（人？）以上者得組織成幹事會，執行事

務，幹事任期為二年，不能組成幹事會的，須設置書記一名。

第七條：各地方所屬小組，組織該地方青年團，並選舉執行委員，委員任期為六個月。（任期中如因特殊事故出缺時，由上級委員提名遞補。）

第八條：各區代表大會選出執行委員，任期一年。

第九條：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任期一年。

第十條：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全國代表大會中選出五人組織之，並選出候補委員三人。

第十一條：中央執行委員會互推一人為書記，管理事務。

第十二條：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要職務分三部份如左：

一、書記部：管理組織，財政報告的蒐集及文書收發等事宜。

二、經濟部：改善青年、工人及農民的生活等事宜。

三、宣傳部：推動教育和政治的策動及主義的宣傳與出版等事宜。

第十三條：區及地方執行委員會的組織，依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規定的原則辦理，但須經中央委員會的核准。

第十四條：大會或執行委員會的議決案，得設各種委員會，分別設計推行。

第三章 紀律

第十五條：全國代表大會為本團最高機關。

第十六條：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

第十七條：大會及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取之於大會或執行委員會的多數表決，少數應服從多數。

第十八條：下級執行委員會必須服從上級執行委員會的命令，否則上級執行委員會得予以取消或改組。

第十九條：對於下級執行委員會議決的抗議，須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連署，提出上級執行委員會；但在抗議進行中，仍須服從上級執行委員會的決議。

第二十條：對於中央執行委員的抗議，得提請全國代表大會決定。

第二十一條：團員如有違反本團綱領、章程或決議案時，由該地方委員會開除其團籍。

第二十二條：團員無故不出席會議二次或兩個月不繳納常費時，由該地方委員會開除其團籍。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三條：各小組每週開會一次。

第二十四條：各地方青年團每週開會一次。

（代表會議或大會依各地方情形而定）

第二十五條：各區每年召開代表大會一次。

第二十六條：全國每年召開代表大會一次。

第二十七條：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開全國臨時會議，但有過半數以上之區請求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亦須召開全國臨時會議。

第二十八條：區及地方臨時會議，依照全國臨時會議的方法召集之。

第二十九條：下級執行委員會每月必須對上級執行委員會報告一次。

第五章 機關

第三十條：適應各地政治情況，設立平民學校，青年俱樂部、繪圖、講演部、圖書館及出版事業等機構。

第六章 經費

第三十一條：經費以團費、捐款及其他收入充之。

第七章 機關報

第三十二條：本團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行一種機關報，團員有定期訂閱或推銷的義務。

第八章 附則

第卅三條：本章程經全國代表大會過半數之議決修正之。

第卅四條：本章程經本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自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之日起施行。所有以往各地方青年團的章程，一律作廢。

貳 學生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後，翌日北京學生三千餘人在北京大法科大禮堂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並通電全國，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於上海。其時各地學生響應紛紛成立當地學聯。五月十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於上海大東旅社，到會者北京、上海、各省，各地十九個單位，代表有段錫朋、張其昀等三十餘人，來賓有蔣夢麟、黃炎培等，共二百餘人。是為全國學聯組織之始。（註六）

民國十二年，全國學聯遷至廣州。十五年，第八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一致主張擁護三民主義。（註七）

關於與青年團有關之學生運動，尤其關於學生聯合會之組織及起源，當時有關資料，台灣亦不易覓得（註五）。

中共之羣衆運動，學運較工運爲遲。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中央設青年部，由鄒魯任部長，廣東即有學生聯合會，抵制中共，使中共無法操縱學運。十四年一月，中共四次大會有關青年運動決議案（見二章四節），但內容不詳。中山先生北上時，於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事先並應開一預備會議，各省學生聯合會應爲九個組成份子之一。

五卅運動之後，學生組織風起雲湧。六月一日，所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在上海民國路舉行，出席代表六十一人，中共及青年團份子佔多數，青年團並於大會中組織黨團，由惲代英任書記（代英並非代表，站在幕後指揮）。大會通過四項重要決議：（一）規定全國學生反帝之任務與方略；（二）決定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努力於民族革命，並應參加校務會議，干涉學校行政；（三）學生應參加各地工農運動，在學聯會中設農工部；（四）確定民主集權爲全國學生運動之組織原則

(註八)。至此，則學生運動最高權力機關實握於中共之手。

五卅運動之後，全國各市發生慘案，均有當地學生參加。著者時就讀於武昌武漢中學；該校創辦人之一爲董必武，所以該校對學生運動甚爲積極。著者曾參加援助五卅慘案學生羣衆活動。至於湖北學生立體系統的組織，約自民國十四年秋季或十五年春季開始。

學生的基本組織爲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會。設主席及各部，爲總務部、宣傳部、組織部、遊藝部。部設部長。各部設若干股，股設股長。其更重要職員爲出席省(市)學聯代表，代表出席省(市)代表大會，組織省(市)學聯。再由省(市)學聯選出代表出席全國學聯代表大會，組織全國學聯。全國學聯指揮省(市)學聯，省(市)學聯指揮各校學生會，以從事學生運動。

著者當時莫名其妙的當選武漢中學學生會一名部長。此校有二部，選兩名出席代表，其一聞知爲共黨份子。

自是學生運動更趨激烈，所有各校學生(除若干教會學校外——教會學校後來亦被發動)幾乎都拋棄書本，上街遊行、演講、呼口號、發傳單、請願……。當時紀念日特別多，尤其是五月，如五一、五四、五七與五九，以及五卅等，再加臨時政治上發生的問題，引起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活動，學生不斷參加。學生羣衆運動成性，無心讀書，除政治運動外，又轉而在學內鬧風潮，如驅校長、轟教員、打飯堂等，當時學校當局及教師怕學生，軍閥對於學生亦頗顧忌，於是學生運動如火燎原，不可嚮邇。

學生運動的波瀾在實際上比工人運動更爲壯闊，因學生可以不讀書，而工人到底不能不做工。

由於當時的學運多爲政治性的，一般學生略知有政黨領導，亦略知此種領導有共產黨參加，不過不知其內情而已。

(註一) 以上根據波多野乾「中國共產黨史」第一卷三六至四一頁，附錄綱領及章程均係自日文可照。

(註二) 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

(註三)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二九四—五頁。

(註四) 「中共透視」第六一至六三頁。

（註五）一九二六年伍氏英文「中華年鑑」第九〇四至九〇五頁。

（註六）「五四愛國運動資料」二五八頁，中共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註七）據民國三十六年拔提書店出版包滄彰之「中國共產黨青年運動史論」

（註八）「中共透視」第六七至六八頁。

第四節 農民運動（註一）

中共的羣衆運動，最先着手者爲工人，其次爲青年與學生，而農民運動則較遲，其原因殆爲初期馬克斯主義者略知馬克斯主義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不知列寧主義之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其次爲工人與學生是集體的，較激進的，在城市中生活的，其組織較易，而農民是散漫的，保守的，在鄉村中生活的，其組織較難，以初期中共份子人數之少，不可能發動廣大的農民運動。所以民國十二年五月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信，命其實行土地革命，而中共六月舉行的三大會未予通過。（見第二章第三節。）

中共着手於農民運動當在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容共之後，中共份子遂假國民黨名義以行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初爲林祖涵，其後部長雖有變動，而部務始終握於中共份子秘書彭湃手中。是年設「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山先生曾於八月二十三日蒞所講「耕者有其田」。該所是由農民部提出開辦的，招生時，閱卷在譚平山室，儘量錄取共黨份子。（參閱第四章第一節。）十五年春，第六屆擴大招生，毛澤東以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兼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所址在廣州番禺學宮。學生籍屬於二十個省區，共三一八名，而湖南學生人數獨多，佔三十六人，此等毛澤東的同鄉，成爲爾後毛在湖南搞農民運動的資本。

北伐以前，中國農村一般情況及廣東農民運動情形大致如下：

壹 中國農村一般情況

中國人口四億以上，農業人口約佔百分之八十，耕地少而人口多，糧食不足，土地分配不均，小農、僱農、佃農生活尤苦。農業技術落後，水利不修、租重、稅苛、天災流行、戰亂頻仍，更加重農民痛苦。中國歷代每遇天災人禍交迫

之際，農人輒起而叛亂，民國成立至北伐以前，農民亦類於叛亂之邊緣。

關於土地佔有情形，金陵大學教授卜凱（J. Lossing Buch）所著「中國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一書（英國牛津大學一九三七年出版），根據一九二九—三三間由金大農業經濟研究所作實地調查報告，包括二省，一五四縣，一六八處之一六，七八六農戶，經過分析，中國農村之地主、半地主、佃農之百分比如下：

地主：五四、二 半地主：三九、九 佃農：五、九
 在華北之小麥地區：

地主：七六、一 半地主：二一、八 佃農：二、一
 再以耕地平均面積（單位：公頃）作為比較標準，就小麥地區言，如下：

地主：二、二五 半地主：二、二五 佃農：二、〇五
 由此可知幾乎無大地主之存在，該書又將農戶分為八等，其百分比如下：

①極小：二 ②小：二四 ③中：三四 ④中大：一七 ⑤大：一二 ⑥較大：九 ⑦最大：二 ⑧極大：〇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國農村經濟情形，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只有大貧小貧」，其階級對立情勢並不嚴重，然中共虛造數字，據民國十六年由譚平山任國民黨農民部長時所報告之數字如下：

全國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農民中：

(一)有土地的農民（有一畝起以至大地主）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二)無地的雇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游民、土匪、兵士、無固定職業之鄉村小商人共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三)全國農民數減去(一)(二)兩項農民數，剩下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則是無地而租人田地的佃農。

轉依上統計有土地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佔農民總數百分之四十五，無土地的佃農、雇農、游民，共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五。此農民之多數是完全無土地，而要求得到土地的。

有地的農民（百分之四十五）中：

成份	佔有畝數	人數百分比	佔地百分比
佃農	一一〇	四四	六

(甲)富農	三〇—五〇	一八	一九
(乙)中小地主	五〇—一〇〇	九	一九
(丙)大地主	一〇〇以上	五	四三

富農及小中地主及大地主三項人數，共佔有地農民中的百分之三十二，而其土地則佔全數土地中百分之八十一。

以有地無地農民全數論

(一)無地農民佔……………百分之五十五

有地而地極少的貧農（一畝至十畝的）佔……………百分之二十

(二)有地十畝至三十畝的中農佔有百分之十一，他們不需為土地而鬥爭，不反對貧農取得土地，反倒幫助貧農。

(三)有地三十畝以上的富農，小中地主及大地主佔百分之十四。

（摘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林部土地委員會報告。」一九二七年六月發表。）

這一報告是要顯示兩個極端：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四四的貧農，只佔有土地百分之六，而只佔人口百分之五的地主，却佔有土地百分之四十三。這就是中共在農村中鼓勵階級鬥爭的根據。

實則中國農村問題是普遍的貧窮，而不是階級的對立。地主出租土地，其收租率普遍為正糧百分之五十，雜糧及力役，即令間或有之，而地主亦往往以贈予或周濟相抵補，地主且負納稅之義務，所以地主生活亦頗簡樸。以教育為例，中等以上學生多為官吏或商人子女，地主子女則百不得一。加以中國社會財產繼承習慣均為衆子均分，縱令某一代為大地主，逾數十年即變為破落戶或自耕農，所以土地不均之情形並不十分嚴重。反之，少地及無地農民，亦可賴勞苦耕作或從事副業以營生，所以不易產生如中共所謂「階級意識」。農村問題，正如中山先生所謂「大貧小貧」，而非貧富懸殊。中共鼓勵農村階級鬥爭，是要藉鬥爭以裹脅農民，掠奪土地及農產品，以解決其「革命」的需要，而不是要解決農村問題。其後在江西時期的「土地革命」及竊踞大陸後的「土地改革」，血腥的階級鬥爭，何嘗能解決農村問題——減少農民的痛苦。

當然，農村不是沒有問題，問題也不是不應解決。解決的原則是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而其方法是和平的，

法律的，如今日台灣的土地改革，再加上改善農業技術，開拓耕地面積，以求糧食的增產。

當時造成整個農村的貧困，除土地佔有問題外，爲稅捐、兵災與天災。田賦之外，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不肯官吏與土豪劣紳上下其手，更增加農民負擔。四川軍人有超徵田賦六、七年之久者。民國以來，連年內戰；其著者如民討袁之役，民五護國之役，民九直皖戰爭，民十一、十三兩次直奉戰爭，民十四江浙戰爭與直奉對瀋戰爭，以及川、湘、滇、閩、粵各省大小戰爭，既乏寧歲，亦少一片乾淨土。每一戰爭，所費動以百萬元計，幾無不轉嫁於農民。農村之直接遭受戰火蹂躪，致農民喪失其田園生命者更不可勝數。天災，由於政治腐敗，戰亂頻仍，預防及救濟均不注意，因而增加農民痛苦。民二，各省災田達六億餘畝，民七達六千餘萬畝，民五，東北發生二十年來未有的大旱災，安徽發生六十年來未有的大水災，山東發生二十年來未有的大水災，湖北旱災達六十四縣……農民流離失所，餓殍載途。因之，農民參加各種結社，如紅槍會等，反抗官廳，流爲盜賊，時有所聞。此種嚴重問題，自應爲秉政當局或革命政黨所重視，而在中共看來，實爲組織暴動，奪取政權的良好工具。

貳 廣東農民運動

在北伐以前，有農民運動者，實際上只有廣東一省，而敘述廣東農民運動，即不能不敘及彭湃。（彭湃小傳附本節後。）彭於民國十二年即在海豐組織農會，旋成立「惠州農民聯合會」及「廣東省農會」。六月，海豐農會因水災要求減租百分之七十，被陳炯明解散。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中央設農民部，彭湃任秘書，除設農民講習所，培植各省農運幹部外，尤着重於廣東農民協會之組織。十四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日，召開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一百十七人，與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同時舉行於廣州，發表「廣東省農民協會成立宣言」。列舉此次大會之工農兵聯合反資本主義之意義，帝國主義與軍閥，貪官污吏與土豪劣紳之壓迫，而號召工農兵聯合反抗，「爲全省、全國、全世界的貧苦羣衆聯合奮鬥。」大會並通過「經濟問題議決案」，要求減租減稅，「農民協會今後通行方針議決案」，主張團結自耕、佃、僱、貧農以與地主鬥爭，及「農民自衛與民團問題議決案」，主張武裝農民以抵抗「地主階級的民團」（註二）。

茲將此項宣言錄後。

廣東省農民協會成立宣言

吾人從實際地，身受其苦，比較任何人都苦不過的，現在已感覺着了，並且十分知道從何來了。不但如此，吾人更加在一年鬥爭中之經驗教訓，找到一條共同的路了。千百年呼號跳叫，暴動流血，做不出來的一篇農民歷史，現在居然在革命策源地廣州，於世界勞動者聯合會資本主義進攻之紀念日「五一」召集有組織之二十餘萬農民的代代表，開第一次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同時與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青年軍人聯合會，確定並宣言革命的工農兵聯合戰線，這就是開宗明義有價值的第一篇歷史呵！

工友們，農友們，一切被壓迫的貧苦同胞們，吾人已由自然的過程進於覺悟之途了。但吾人不要忘記永遠與敵人作戰，不要忘記只有奮鬥才可以解除敵人反攻之危險。

中國目前之現狀，吾人所處之地位，仍是危險萬分，在全中國來說，仍是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利用來壓迫工農階級的政局，仍然是番鬼佬與國內一班帶兵老爺，鬼鬼祟祟來謀害我工人農民的時候。北京政變，馮玉祥雖然將曹錕、吳佩孚打走，但是走了兩個猛人，又來了無數猛人，現在北方的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這班猛人，其殘害我農民、工人，與曹錕、吳佩孚是一樣的。況且曹錕雖倒，其走狗蕭耀南等依然在；依然想維持其原來的勢力；依然捨不得食工人、農民之肉。東江戰爭，雖然將與曹、吳同一鼻孔出氣之軍閥陳炯明及林虎、洪兆麟等打走，但是走了三個猛人，還有無數猛人存在：現在進兵廣西之唐繼堯，盤據湖南之趙恒惕。霸佔瓊州之鄧本殷，這班猛人包圍廣東，殘害廣東百姓，壓迫工人農民，通通是一樣厲害的，彼等自然會聯合跑到福建之陳炯明、洪兆麟，跑到江西之林虎，圖謀反攻的。因此，吾人可以看到，北方的一班軍閥與南方的一班軍閥，都是翻來覆去，大家同弄把戲，爭權奪地，無有已時，使我農民、工人、無數貧苦同胞，提心弔胆，寢食不安，做彼等之槍架、把子、砲夫，更爲遭殃，更爲受苦。這班軍閥（帶兵大老爺），何以會弄到如此田地呢？此無他，無論北方軍閥或南方軍閥都有後台老闆（司頭）幫助，他們的老闆（司頭）就是英（紅毛鬼），美（花旗鬼）、法（法蘭西鬼）、日本（倭奴）帝國主義者。那班帝國主義者（紅髮、綠眼、勾鼻孔的番鬼佬），是時常想謀害我中國的；想我中國做彼等屬地；想工友農友做彼等奴僕。中國軍閥想陞官發財，所以甘心賣國賣同胞，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因此帝國主義與軍閥通同一氣，蛇虎同穴，來與中國同胞作對，來與工友、農友爲仇。

你看上海、漢口、天津等處，時常發現番鬼佬，一船一船裝砲帶槍到中國私賣。去年商團作反，槍殺我等工、農團軍，就是番鬼佬

私賣槍械與陳伯之結果，就是一件事實的明證。軍閥打仗沒有錢用，帝國主義就借錢給他，你看曹錕想做總統，袁世凱想做皇帝，都有帝國主義借錢給他。陳炯明打廣州，却有（紅毛鬼）英國帝國主義者，或（花旗鬼）美國帝國主義者借錢與他。最近消息，美國資本家與殘害廣東工、農階級魔王鄧本股，訂定三千萬美金借款合同，以廣東瓊州之森林、礦產做抵押。參與此次借款進行者，有北方軍閥段祺瑞的代表，新失勢力的廣東軍閥陳炯明、林虎的代表在內。這更是帝國主義和軍閥謀害我工人、農民、全國同胞的鐵證。帝國主義謀害吾人，還不止此，佔我重要海港，如北方之威海衛、膠州灣、大連灣、旅順口、青島；南方之琉球、台灣、香港、九龍、澳門、廣州灣都被帝國主義佔去了，變了老番的土地了。強租重要的商埠，如天津、上海、漢口、廣州、沙面都是老番租借地了。管理出入口貨的海關也在外人手上。出金、銀、銅、鐵的礦山，往來交通的鐵路，也在外人掌握之中。還有外國領事裁判權：老番在中國犯事，吾人不得管理他；中國人在租界犯事，老番就來干涉，就要受他的領事裁判。從此外國人在中國就橫行無忌了。外國軍艦可以在中國內河行駛了。南京、上海、廣州白鵝潭就有無數的紅毛的、花旗的、法蘭西的、日本的戰艦停泊了。彼等就可以明目張胆向中國人民示威了。從此外人就可以自由運載洋貨入口發賣，大扒特扒中國金錢、財寶而去，使吾農民在鄉村造出來之農產品被其抵制，不能銷售，因虧本而不敢再造，專用彼等洋貨。從前用火石，現在用火柴，從前點豆油，現在點火水，從前穿紡棉布，現在穿洋紗；你看食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番的東西了。這就是帝國主義在經濟上、政治上對吾人的侵略，尤其是吾農民被侵略更厲害。

還有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被帝國主義者侵略也不在少，不說別的遠的，單說廣東，東江的惠州、潮州地方，北江的韶州地方，西江的肇慶地方，南部的瓊、雷等處，農村中的耶穌教堂，教會辦的學校，幾乎遍地皆有，這也是帝國主義侵略吾人之工具。一班進教佬（耶穌教徒）天天向吾農民講道理，稱頌上帝，引誘農民子弟到教會學校讀書，使吾人不知道病苦之何來，一味只向上天祈禱，弄得不會向壓迫和侵略吾輩的敵人進行反抗。彼等還時常霸佔田莊起教堂，勾結地痞欺壓良民。

照上面的事實看起來，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軍閥怕帝國主義，弄成中國之政局如是紛亂，攪到中國人民（尤其是工人、農民）如是慘痛，豈不是吾人當前最可恨的仇敵嗎？並不止此，軍閥之下還有一班走狗呵！這班走狗更是接近吾人的，就是貪官污吏。因為軍閥壓迫吾等，做其陞官發財的生理，專舞貪官污吏直接向吾人進攻，籌餉呀，抽捐呀，就是彼等唯一替軍閥盡的義務。彼等是為自己荷包，因此彼等也要倚帶兵老爺做護身符而甘心做走狗。現在各縣的縣長，各區的區長，都是擁戴一個或大或小的帶兵老爺的，彼等並要貢獻許多錢與上官，才能得到下官做的。或者從農民扒到的錢，亦要時常奉送上官一些，這班下級官長，就變成貪官污吏了。彼等剝削農民方法：除了直接派兵派警之外，並時常派許多步哨，這些步哨就是劣紳土豪了。劣紳土豪，上通官府，下結游民（地痞），利用失耕的

農民兄弟們，來損害自己階級的人，真是一件精心之事呵。操縱農村政治，拿聯防局、民團、保衛團、護商局等機關做工具，設種種苛稅雜捐，以盤剝魚肉吾民。照實際調查，在廣東各縣，以東莞、香山、順德等處為最著，抽捐名目，如人頭稅、婚姻捐、菓木捐、水道捐等不下三十餘種，農民血汗，能有幾多供他們刮取呢？貪官污吏，劣紳土豪，是未有經濟地位做基礎的，因為彼等多數在所在地未有田地收租的，彼等又因此以利害相同的關係，自然與田主聯合，聯成地方反動階級的戰線。而壓迫農民。

田主們用重租、押租（批頭）、租信（田信雞或銀錢）、租契壓迫農民，農民稍有反抗，就可借軍閥、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做鎮壓農民暴動的利器。吾人可見浙江蕭山的農民運動，湖南衡山的農民運動，此外如山東、河南等處，不是農民因受苦不過而發生過暴動嗎？不是因地主和貪官污吏，劣紳土豪、軍閥聯合成反攻戰線而失敗嗎？在廣東因連年戰爭，地主階級也會受帝國主義和軍閥之壓迫的，也會主張人民自衛，鄉村自治，利用農民以武裝自己，成立民團、鄉團之組織為反抗軍閥之工具，吾等農民也會在此等糊塗階級意義之組織下，過了無聊生活的，現在也許是有許多農民仍然過此無聊生活的，可是有農民協會組織之地方，形勢就不同了。這種起初假名人民自衛，鄉村自治而本來是地主階級的機關，現在已反過臉來，為地主階級壓迫農民之反革命武力了。不但如此，彼等已進而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劣紳土豪，聯合成反攻的戰線了。當廣東廣寧農民協會做減租運動與地主鬥爭的時候，從前利用農民而武裝的民團，居然不要農民當團兵了，冒牌的國民黨員廣寧的縣長也不革命而幫助地主壓迫農民了，革命政府下的駐防軍隊而同時為國民黨員的也不革命而幫助地主了。地主被農民進攻最厲害的時候，也說失敗了，跑去租界居住，將所有土地財產抵押洋行（老番的）。彼等聯合戰線向農民進攻，豈不是有了事實證明嗎？農民同志們！農民協會的組織完全建築在階級意識上面，不同的階級，便是利害不相同，任你平時說得如何好，等到利益相衝突的時候，就會壓迫我們了。同志們，當心呵。

霹靂一聲，廣東有組織的二十餘萬的農民同志，已聯合起來成立全省農民協會了。從此吾人為更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更完密的統一而共同奮鬥。吾人在此過去一年中，也有許多令吾人不能忘記之事實，就是省農民協會之有今日，完全為自身組織及鬥爭得來。廣寧為減租而死的是誰？陳桂桑等十三位死者，都是我農民兄弟，當時衝鋒陷陣的，也是我農民兄弟。花縣與地主階級作戰而死的是誰？王福三同志，被地主們去手割耳而死，他是花縣農民協會的職員。廣州芳村被民團殺死的是誰？林寶宸同志，他是番禺第一區農民協會委員長。在東莞被土豪買兇暗殺的是誰？李海東同志，也是東莞第一區農民協會的職員。在順德被劣紳土豪勾結防軍殺十餘人是誰？也是順德教鄉農民協會的職員或會員。其餘為農民利益坐牢的亦有許多。吾人固然要紀念為農民利益而犧牲的死難先烈，農民同志們，吾人亦要知道為農民運動而犧牲是我們同志，受損失是我們農民，更因此認識解放我農民，只有靠我們自己團結本身奮鬥的力量。更要

認識因本身奮鬥的經驗而成立省農會的統一機關，從此爲更有組織更統一的全國的普遍運動，其力量更大，其成功必速。

吾人在「五一」節那一天，得到和全國勞動代表聯合起來，熱烈表示其力量。在工人農民開始見面的第一天，已實地的爲有組織的工農大聯合，我們從此就認識了同一戰線的好兄弟。吾人在平時也見得到農工是好兄弟；受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大地主壓迫的農民，與受帝國主義、軍閥、資家壓迫的工人，其痛苦是一樣的；工人失業跑回鄉村去耕田，農民失耕跑到城市去做工，或同樣的流爲兵匪，賣身給洋人做苦工，華工之厄運。因此，帝國主義、軍閥、資家、大地主，是壓迫階級，是聯合向我們被壓迫階級工、農反攻的，我們應該聯合成工、農革命戰線，向壓迫階級進攻，這才有解放自己階級之希望。我們在東莞、寶安、香山、順德、廣寧各處的農民運動，得到工人同志助力不少，使我們知道工、農聯合之意義加明顯，工、農聯合越堅固，力量越大，其成功自不待言。吾人於正式討論大會第一天，已全體贊成加入世界組織農民國際了。這個農民國際，分明是聯合世界的農民，爲整個反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解放被壓迫階級的全體人民。工人們，農民們，聯合起來，爲全省、全國、全世界的貧苦羣衆聯合共同奮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推翻國內一切軍閥！農民大聯合萬歲！工、農大聯合萬歲！廣東省農民協會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農民國際萬歲！

廣東省農民協會

（原載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十三、十四日。）

十五年一月，國民黨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中共最爲活躍，大會關於農民運動決議案如下：

「本黨無論何時何地，皆當以農民運動爲基礎。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運動，亦應以農民運動爲基礎。黨的政策，首先着限於農民利益本身，政府之行動，亦須基於農民的利益，而謀其解放。」

自民國十四年春至十五年五月；全省有農民協會之組織由二十一萬人增至六十二萬人。在此期間，農民協會已擁有武力，在各地與「民團」武力不斷發生衝突，革命軍常奉命協助農民進攻民團（參閱第四章第一節），是爲廣東農民運動最高潮時期。國民黨二中全会通過整理黨務案，雖對中共活動加以抑制，然廣東農運已造成一種形勢：有組織，有武力，鬥爭地主，反抗官廳，其幹部份子，無論其起於羣衆之中，或派自農民運動講習所，皆握於中共之手。清共以後，海陸豐的農民暴動及廣州暴動，悉種因於此。

民國十五年五月一日至十五日，召開第二次廣東省農民大會，與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同時舉行於廣州，到會代表二

百餘人，廣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蘇、河南、山東、山西、貴州等十一省均有「代表」參加。通過決議案三十件，發表宣言，修改章程。決議案中包括「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報告決議案」，反對黃色國際，主張工農聯合，把中國的農民運動也變成共產國際的羣衆活動。

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雖在中山艦事件之後，中共氣燄稍受抑制，然尚在整理黨務案之前，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仍在中共份子把持之下，所以大會紅的色彩與第一次無異：推崇工人階級爲先鋒，反帝、反軍閥、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不同者，惟在第一次大會後，革命軍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宣言中誇張農民如何幫助軍隊而已。

此次大會所修正通過之章程，其組織體系，爲省——縣——區——鄉四級，其格式大抵與其他民衆團體相類似。茲將此項章程錄後。

廣東省農民協會修正章程（一九二六年五月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通過）

前文

農民協會爲本三民主義解放勞動階級之意旨，集合廣東受壓迫之貧苦農民而組織之。其目的在謀農民之自衛，並實行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其會章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廣東省農民協會，謹遵照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孫先大元帥審定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頒佈之全國農民協會章程各項原則組織之。

第二章 會員

第二條：凡居住廣東之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農村中之手工業者，及在農村中爲體力勞動者，不論男女，凡年滿十六歲而行第三條所列入會手續者，皆得爲本會會員。但有左列條款之一者，得拒絕之。

（一）有田地百畝以上者；

(二) 以重利剝削農民者；

(三) 與農民處於利益相衝突之地位者；

(四) 爲宗教宣教師者，如紳甫、牧師、僧、尼、巫等類；

(五) 受外國帝國主義操縱者；

(六) 吸食鴉片及嗜賭者。

第三條：入會手續：

(一) 填寫入會志願書；

(二) 承認遵守本會章程；

(三) 承認恪守本會紀律；

(四) 繳納入會金與月費。

第四條：凡農民入會時，須有會員三人之介紹，經所在地之鄉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通過。若非農民而贊成農民協會，請求加入者，必

須會員全體大會四分之三通過，始能正式承認其會員資格。

第五條：凡農民協會會員，須在所屬農會領取會員證章，其證章由廣東省農民協會制定之。

第三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六條：會員在各級全體會員大會中，均有發言權、表決權、及控告權（但所控告之案件，無論書面或口頭，必須經過大會之審查，始能向上級提出。又如控告該會職員，或呈請查辦軍隊騷擾，官吏土豪專橫等事，亦必由大會討論通過，始能向上級提出，或遇特別情形未便召集大會時，得由執行委員決定向上級提出）

第七條：會員有依章選舉或被選舉爲農民協會職員及代表之權（如遇選舉上級或下級協會職員時，不得兼別協會之常務委員）。

第八條：會員須遵守本會章程與紀律，並須服從本會決議案，如有違背及破壞之者，均受紀律之制裁。

第四章 組織

第九條：凡一農村有成年農民三分之一以上之申請，由上級報告省協會，經省執行委員會之認可，並派員至該鄉召集全體會員大會，依法選舉執行委員會，組織鄉農民協會（各級農民協會之成立，須經省執行委員會審查核准後，頒發旗印）。在各小鄉會員不及三十人者，組織一小組，互選組長一人，受附近鄉農民協會之管轄。其會員人數逾一千人以上者，亦須分組組織，以便訓練。

第十條：各行政區之鄉農民協會如佔全區鄉數三分之一以上成立，省執行委員會認為有組織區農民協會必要時，即派員到該區召集區代表大會，或會員大會，選舉執行委員，組織區農民協會，如區之範圍遼闊者，得在區之下組織分區。

第十一條：各縣有三個行政區農民協會以上成立，省協會認為必要時，即派員到該縣召集縣代表大會，選舉縣執行委員，組織縣農民協會。各級協會之組織手續另定之。

第十二條：本會以鄉農民協會為基本組織，自區協會層級而上，其組織系統如下：

- (一) 全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全省執行委員會。
- (二) 全縣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全縣執行委員會。
- (三) 全區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或會員大會——全縣執行委員會。
- (四) 全分區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或會員大會——分會執行委員會。
- (五) 鄉農民協會會員大會——鄉執行委員會。

第十三條：各下級鄉會執行委員會，須受上級鄉會執行委員會管轄。

第十四條：各級鄉會代表大會或會員大會，須選出執行委員，組織執行委員會，執行會務，並選出候補執行委員。各級協會開執行委員會時，候補委員亦得列席，但祇有發言權。各級協會之執行委員遇故缺席，或離任時，即以候補委員依次充任。

第五章 省農民協會

第十五條：全省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但所轄縣執行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請求，得召集臨時全省代表大會。

第十六條：全省代表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人數，由省執行委員會審定之。

第十七條：全省代表大會，接納及採行省執行委員會及該委員會內各部之報告，決定本省會務進行之方策，選舉執行委員及候補委員。

第十八條：省執行委員十三人，候補委員四人。

第十九條：省執行委員職權如下：

- (一) 互選常務委員五人，執行會務；
 - (二) 設立全省各縣、區、分區、鄉協會，並指揮其活動；
 - (三) 組織省執行委員會內各部；
 - (四) 支配會費及財政；
 - (五) 設立各路辦事處以便指揮各縣協會工作。辦事處設主任一人，書記一人，委員一人。辦事處之主任，須為省執行委員或候補委員。(辦事處組織大綱另定之。)
- 第二十條：省常務委員會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至少三個月開會一次。

第六章 縣農民協會

第廿一條：縣代表大會每半年舉行一次，若遇省執行委員會訓令或所屬各區執行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時，得召集臨時全縣代表大會，縣執行委員會認為必要，或有該縣會員過半數之請求時，得召集臨時全縣代表大會。

第廿二條：縣代表大會之組織法、選舉法及人數，由縣執行委員會審定後，經省執行委員會核准施行。

第廿三條：縣代表大會接納及採行縣執行委員會及該委員會內各部之報告，決定本縣會務進行方策，選舉縣執行委員九人，候補委員四人，並互選派赴省代表會議之代表。

第廿四條：縣執行委員九人，候補委員四人，並互選常務委員三人執行會務。

第廿五條：縣執行委員會設立全縣各區、分區、鄉協會，並指揮其活動，組織該委員會內各部(但須經省執行委員會之核准)，支配會費及財政。

第廿六條：縣執行委員會須每兩星期將其活動經過情形，報告省執行委員會一次。

第廿七條：省執行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一次。

第七章 區農民協會

第廿八條：區之高級機關爲全區會員大會，但因鄉離區太遠，或會員過多，不能召集時，得召集全區代表大會，每三個月舉行一次，若遇上級機關訓令，及（或？）所屬執行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時，得召集臨時大會。

第廿九條：區代表大會之組織法、選舉法及人數，由區執行委員會審定後，經縣執行委員會核准施行。

第三〇條：區會員大會或區代表大會討論會務之範圍如下：

- (一) 接納及採行區執行委員會之報告；
- (二) 選舉該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候補委員，與選派赴縣代表會議代表；
- (三) 核計及批准鄉執行委員會之決算；
- (四) 訓練會員之工作，並幫助農會設立各種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
- (五) 討論及批准鄉農民協會本任期內之進行計劃。

第卅一條：區執行委員會之職權如左；

- (一) 指揮本區內各組織之活動；
- (二) 召集全區會員大會或全區代表大會；
- (三) 受省協會之委託或農民之請求，組織本區內之分區、鄉農民協會及各種機關，報告省執行委員會認可之；
- (四) 保管本區會員之登記與履歷；
- (五) 發給本區會員證書；
- (六) 支配會費及財政。

第卅二條：區執行委員七人，候補委員三人。互選常務委員三人，執行日常會務。每星期開會二次，並將每星期內活動經過情形，報告縣執行委員會。

第卅三條：分區農民協會隸屬於區，由區報告各上級，經省協會之核定，始准組織。分區執行委員五人，候補三人。互選三人爲常務委員，執行日常會務。每星期開會二次。

第八章 鄉農民協會

第卅四條：鄉農民協會爲本會最低最重要之基本組織。會員人數須在該鄉成年農民三分之一以上，由省執行委員會或由省委委託其他代理機關，如各路辦事處，組織之。如果自行組織，必須在（向？）各上級協會報告，經省執行委員會之審查批准。

第卅五條：鄉農民協會爲農民直接之機關，應親向民間實行左列任務：

- (一) 實行協會之決議及口號；
- (二) 宣傳三民主義之農民政策，並從事於三民主義建設的工作；
- (三) 說明農、工業與商業之經濟關係，及其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互相聯絡與利益；
- (四) 提倡各項建設事業，如舉辦農民學校、合作社、改良農業、水利交通之類。

第卅六條：全鄉會員大會，每月由鄉執行委員會召集開會一次。決定本鄉會務進行計劃，選舉該鄉執行委員，並選派出席代表大會之代表。

第卅七條：鄉執行委員會，委員三人，候補二人。

第卅八條：鄉執行委員會之職權如左：

- (一) 互選書記、宣傳、組織各一人；
- (二) 指揮鄉會之活動；
- (三) 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
- (四) 調查及統計鄉中農民生活及教育之狀況；
- (五) 徵求新會員。

第三九條：鄉執行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二次，並將兩星期內活動經過情形，報告區執行委員會一次。

第四〇條：鄉農民協會遇有特別事件，得組織各部以處理之。其大要如下：

- (一) 軍事部
- (二) 農業改良部
- (三) 雇農部
- (四) 佃農部

- (五) 手工業部
- (六) 婦女部
- (七) 青年農民部
- (八) 教育部
- (九) 合作部

第九章 任期

第四一條：代表於開會期終了時，其任務即爲終了。但須向所代表之該會報告大會之經過及結果。

第四二條：省執行委員任期爲一年，縣執行委員、區執行委員、分區執行委員任期均爲半年。鄉執行委員任期爲三個月。

第十章 紀律

第四三條：農民協會各級大會，或執行委員會之決議，經該大會或執行委員會多數公意之通過，會員須一致服從。

第四四條：下級委員會須服從上級委員會，否則上級委員會得解散或改組之。

第四五條：會員對於上級執行委員會決議有抗議，有五分之一贊成者，得聯署提出於上級委員會判決之。但在抗議期間，仍須服從各該上級執行委員會之決議。

第四六條：任何會員，有破壞本會紀律者，均須受紀律之制裁。執行紀律之機關爲會員大會，省執行委員會。關於破壞會中紀律可分下列數種：

- (一) 不能履行章程中各種規定者；
- (二) 不奉行會中之命令者；
- (三) 賭博與吸鴉片者；
- (四) 破壞本協會之根本原則者；
- (五) 作反革命運動者；

第五章 羣衆運動

(六) 無故連續三次不到會者。

第四七條：關於處罰之方法如下：

- (一) 詞判之宣佈；
- (二) 警告；
- (三) 除名。

甲、在定期內除名；

乙、永遠除名。

第十一章 經費

第四八條：農民協會經費如左：

- (一) 入會費最高不得超過一元；
- (二) 會員月費最多不得超過一毫；
- (三) 會員所得捐；
- (四) 特別捐。

第四九條：會員入會費之多寡，由省執行委員會議定之。貧苦會員會費之減免，應由鄉大會通過，區執行委員會之批准。

第五十條：鄉會收得之會費百分之六十用於本鄉會。百分之四十，以類推法用於其餘高級各會。

第十二章 農民協會與他機關之關係

第五一條：農民協會對於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教育機關，合作社等，應有相當的勢力，以顧全農民之利益。

第五二條：農民協會會員在前條所列各機關中有三人以上者，應組織會員團，以擁護農民協會之利益。

第五三條：農民協會得派遣相當會員作代表到行政官廳及各機關，以解決農民各種問題。

第十三章 章程之實施

第五四條：本章程自公佈日施行。

第五五條：本章程有未盡妥善之處，得於全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時修正之。

（農民運動叢書第七種「農民運動須知」一九二六年九月廣州出版）

（註一）本節資料主要來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平。

（註二）原載一九二七年一月「農民叢刊」。

※

※

※

彭湃（：：——一九二八）廣東海豐人，原名漢育，大地主出身，留學日本後歸國，於民國十年，任海豐教育局長，五月，第一高小參加「五一」紀念，打「赤化」二字旗幟，彭乃被撤職，辦「赤心週刊」，鼓吹農工革命，着手組織農會。十一年九月，成立赤山約農會，十二年一月，成立海豐總農會，會員號稱二萬，旋以附近農民入會，乃成立「惠州農民聯合會」及「廣東省農會」。是年六月，造成「七五」風潮，農會被解散。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任中央農民部祕書，把持農運，成立廣東省農民協會。清共後，十六年十一月，在海豐成立蘇維埃，自任主席，十七年在上海被捕，處死。

第六章 北伐與反蔣

第一節 北伐

壹 北伐之決策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件大事，對中共而言，亦有深刻影響。

自袁世凱死後，中國軍閥割據，內戰頻仍，孫中山先生組府廣州，時思北伐，統一中國。十一年，中山先生籌劃北伐，因陳炯明叛變；未果。十二年，直系軍閥曹錕賄選總統，中山先生即聲罪致討。十三年，奉軍入關討曹，中山先生亦率師出韶關，入轍，期予直系以夾擊。直系既敗。中山先生應張作霖、馮玉祥及臨時執政段祺瑞之邀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但祺瑞召集一善後會議以抵制之，國民黨拒絕參加。時中共在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對中山先生之主張與行動尚無敢非議，相率服從。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後，蔣中正先生平定廣州楊希閔、劉震寰之叛亂及陳炯明割踞之惠州。廣西之李宗仁、黃紹竑亦效忠國民政府，兩廣遂告統一，七月，國民政府成立。

是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蔣中正先生即提出北伐案，鮑羅庭初無異議，其後，鮑去俄返華，態度忽變，季山嘉且公開反對與破壞，終發生三月中山艦事件（參閱第四章、第五節。）

中共對北伐問題，當然追隨鮑羅庭之後，陳獨秀於「嚮導」唱反對論調（註一），謂北伐是南方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軍事行動，代表民族革命的全部意義。這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民衆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解除全民族，特別是工農羣衆的困苦。北伐不是爲了滿足個人權勢慾望，誅求農民的軍事投機。目前就國民政府實情、實力、軍隊的戰鬥力及革命意識各方面言，北伐時機尚早。國民政府現下職責不是北伐而是防禦，以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廣東。茲將原文錄後。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北伐的意義，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在此時北伐聲中，我們若不懂得這個意義，便會發生許多錯誤的觀念及行動。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衆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這種軍事行動，對於推翻軍閥確是一種重要方法，然亦僅僅是一種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衆，若誤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致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弔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慾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

現在廣州國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樣呢？在第一點，他自然還不是直接的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在第二點，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確有坐待北伐軍到來之幻想；在第三點，我們敢肯定地說，現在國民政府之北伐，還不是由於革命力量膨脹而向外發展。乃是因爲吳佩孚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衛；在第四點，國民政府之北伐戰費，應該發行軍事公債，向紳富籌募，如果因北伐而預徵錢糧和抽收賭捐，向農工平民搜刮，不但當年中山先生不會因北伐搜刮平民，及現時唐生智在湖南，軍費并不比廣東寬裕，他只發行股實公債，而未向農工誅求，國民政府對農民政策總不應該比唐生智不如。國民二軍之潰敗，對農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來國民政府對農民的態度，已經使農民懷疑，若再因北伐戰費而預徵錢糧和抽收賭捐，若更進而剝奪廣東革命的民衆從護法政府以來所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給予反革命的買辦、土豪、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則我們在野黨應該向政府嚴重勸告，必須北伐與民衆利益雙方兼顧，如此才能鞏固國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謂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現在尙成問題；因爲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個的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所屬軍隊之戰鬥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尙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

帝國主義者早已定下了吳、張分途討滅南、北二赤的計劃，如此英吳、日張分據南北，才能和緩他們當中的衝突；現在英吳對日張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讓步，則吳佩孚南下進攻廣東，無論對國民軍作戰勝敗，都必得張作霖之援助而實行。吳佩孚一回漢口，必以全力

取湖南，再由湖南進攻廣西，屆時動搖不定的小軍閥如贛鄧、閩周，都必然決定態度，奉吳令一致向廣東進攻；不但如此，還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封鎖於外，陳林魏邦平蕭部，勾結土匪、土豪、官僚、買辦，擾亂於內，如果竟至如此，國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神經過敏，這樣危險的局勢，實已迫在目前，絲毫不容我們忽視。

所以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廣東民衆的口號，也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全國民衆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

將陷於四面圍攻的國民政府，他的領袖們，應該和衷共濟，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革命軍正爲此和軍閥戰爭，也就是革命軍和軍閥不同之一點）。使人民心悅誠服的和國民政府合作，以戰勝此困難，使此困難不但不能覆滅國民政府，轉而能够鍛鍊國民政府領袖及其軍隊和一切民衆的革命意志與戰鬥力，然後再匯合全國民衆革命的勢力，進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國民革命。

經過中山艦事件與是年五月整理黨務案，俄國與中共反對北伐之言論與行動均告中止，國民政府北伐行動迅速展開。先是，三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已頒佈政治訓練部組織大綱及黨代表條例。政治訓練部從事軍中黨、政、文化工作，受軍委會之指揮，轄所屬各部隊、機關及學校黨代表；孫文主義學會及青年軍人聯合會兩對立團體尚存在於軍中，亦受政訓部指揮。任命軍隊中政治人員。軍法機關亦隸屬之。軍隊黨代表代表國民黨指導政治工作，其所發之命令與指揮官同，有會同指揮，審查軍隊之權。黨代表雖不得干涉指揮官行政命令，但於發現指揮官異動時應報告上級或徑行設法制止。此項政訓制度自係倣自俄國紅軍政治部。其後總司令部成立，政治部主任即親共的鄧演達，軍中各級政治部大量任用中共份子，如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爲周恩來，二軍爲李富春，三軍爲朱克清，六軍爲林祖涵，是以軍隊中政治工作及北伐軍所至之處的民衆組織、運動工作幾全爲中共份子所把持。（周、李、林小傳見本章之後。）

六月五日，國民政府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組織總司令部，統率陸軍七個軍及海空軍。總司令爲軍事委員會主席，總司令部設於軍事委員會內，以作戰進歩隨時進出前方。政治訓練部受總司令指揮（註二）。並授總司令以特權，「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部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

七月四日，國民黨發表北伐宣言，於敘述當時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之下，工、農、商、學各界所受痛苦，及中山

先生所主張和平統一中國之方案——召開國民會議，又爲段祺瑞所破壞後，明白指出打倒軍閥吳佩孚，以完成國家之一。其時國內大軍閥尚有張作霖、孫傳芳等，爲減少敵人，未曾提及。

七月九日，蔣總司令就職，吳敬恆代表國民黨致勗詞。總司令發表就職宣言，告廣東省人民書、告士兵同志書及告海外僑胞書，並動員北伐。

茲將就職宣言照錄於下。（註三）

蔣總司令就職宣言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於國民革命軍誓師時發表！——

六月五日，奉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竊中正自奉命興學以來，惟以養成革命幹部爲職志，治軍振旅，既非素長，尤乖夙願。第革命指揮，必求統一；黨員義務，首在服從。國民革命之成敗，匹夫有責，中正敢不竭其驍鈍，盡忠革命，以從國民之後。而中國今日何以有國民革命之需要？革命戰爭之目的究爲何如？中正尤不能不於就職之始，爲我全國同胞宣告也。慨自辛亥革命，迄今十有五年，禍亂相仍，擾攘不止，人民陷溺於水火之中，日益深熱；追求致亂之源，悉由國際帝國主義者爲之厲階。彼既挾炮艦政策以保持其脅迫而取得之不平等條約，攘奪我關稅自主，妨害我司法獨立，壟斷我全國金融與交通，使我新興工業受其扼制，所有農產被其把持，因而商業蕭條，民生凋敝，以致遍地皆匪，百廢莫舉；而彼復利用萬惡之軍閥爲其工具，摧殘愛國運動，剝奪人民自由，更驅使全國軍人，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必使我國內亂不絕，而彼乃得操縱我政治與經濟之全權。環境險惡，如此其甚；猶謂於國民革命以外，別有救國途徑，寧非欺人之談？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三民主義爲基礎，擁護國家及人民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勢力於三民主義之下，乃得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昔昔革命之失敗，皆由於我軍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戰爭之目的，不求犧牲之代價，尤不知主義爲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爲統一中國之根本，受軍閥至微薄之餽養，而甘爲帝國主義者効死命。即號稱革命軍人者，亦絕無徹底革命之決心；甚至爲反革命勢力所吸引，與之同腐而不自覺。而全國人民對於革命之成敗，亦漠不關懷，不能與革命軍同仇敵愾，起而自救。長此以往，豈徒革命難成，必至國亡無日。彼帝國主義者施於各殖民地之政策，乃在遏抑其國民革命運動，分散革命勢力，使其民族自相屠戮殘殺，絕無抵禦外侮之能力；彼之所以能亡人國，滅人種者，亦惟此而已。我全國軍人及同胞一念及此，必皆翻然大悟，樂與我革命同志共同奮鬥也。中正今茲就職，謹以三事爲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

工具爲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第二、求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爲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如我全國軍人有能以救國愛民爲職責，不爲帝國主義之傀儡者，中正必視爲革命之友軍。如能向義輸誠，實行三民主義，共同爲國民革命奮鬥者，中正尤引爲吾黨之同志，決無南北畛域之見，更無恩仇新舊之分。若是倚恃武力，甘冒不韙，謀危我之革命根據地，抗拒我各省國民革命軍，樂爲帝國主義者効忠，不惜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則必認爲全國人民之公敵，誓當摧破以廓清之。總之，國民革命以主義爲依歸，絕不同於軍閥武力統一之夢想。中正惟以主義之成敗，決個人之生死，亦即以主義之從違，定順逆之標準，其他一切皆非所計。邦人君子救國之誠，豈後於我？當念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一致興起，共同奮鬥，視今日國民革命之需要，爲我全民之生死關頭；一改往日袖手旁觀之故態，各竭其能，各盡其責，督促全國軍人，使皆爲我國家與人民之利益而戰爭，參加革命戰線，掃除帝國主義，改造我中華成爲獨立自由之民國。中正誓必竭盡愚忠，爲國犧牲，繼承吾黨總理與諸先烈未竟之志也。謹此陳詞，伏維鑒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叩印。

（錄自「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貳 中共對北伐之態度

在國民政府積極部署並開始北伐之際，中共態度如何？吾人可於兩個文件中得到答案。中共於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召開二次中央擴大會議（一次擴大會議於去年十月召開，文件未見），於十二日公開發表「第五次對時局主張」；而將會議決議案列爲密件，送呈蘇俄駐北京大使館。在對時局主張中，居然無一字提到北伐；在決議案中，則指北伐「僅是防禦反赤軍（奉張及直吳）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勢力的充實的北伐」。此並非表示中共對其公然列入新右派之蔣總司令北伐大計之無知，而祇是表示中共不贊成北伐，不響應北伐，不願對北伐有所貢獻，而圖於北伐中別作活動，甚至準備作武裝暴動。

在其別作活動中，又具有兩套手法：其表現於「對時局主張」者，爲「國民的聯合戰線」，其表現於「議決案」者爲「分化活動」。爲便於比較起見，列表如下：

中共對北伐之兩套手法表

二次擴大會議決議案（秘密）		五次對時局宣告（公開）	
一、關於北伐——祇是對反赤軍的防禦戰，而不是革命勢力充實的真正北伐。		不提北伐	
二、關於反赤——其着重之順序為(1)英、(2)日、(3)美、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為目的。		只提英、日，未提美，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	
三、關於革命力量——主要是工、農、學生，拉攏中小商人，暫時利用國內資產階級，反對軍閥、買辦、官僚、新舊紳士（包括大學教授。）		主張工、農、手工業者，大資本人、中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機關職員，大家建立「國民的聯合戰線」。	
四、關於對國民黨——劃分：(1)右派：馮自由、孫科等；(2)左派：汪精衛、甘乃光等；(3)新右派：蔣介石、戴季陶等；主張聯合左派，逼迫並防止新右派，打擊右派。		指摘右傾份子——資產階級及智識份子等所主張「國民的聯合戰線」以犧牲工、農利益為條件是錯誤的。	
五、關於國民會議——未提及。		仍提召開國民會議。	
六、關於所提主張條文——關於工、農、商、學、軍、婦各運動決議案，列舉其要求。並準備武裝暴動。		僅提出一綜合性最低政綱。	

中共對北伐是如此不合作，如此別作活動，則其爾後在北伐過程中，表面作熱烈的參加，而於參加之中，一面破壞蔣總統司令之領袖地位，一面努力於工人、農民及士兵運動，企圖以羣衆力量打擊領袖力量，甚至準備工、農武裝暴動，凡此均是預定計劃，而不是隨時勢推移使然。

此兩項文件均甚冗長，而決議案中，除政治報告內容略如上表外，尚有組織、宣傳、職工、農民、紅槍會、學生、濟難會、軍事等議決案，由於其具有重要性，併錄於下。

(一) 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

現在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起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壓迫之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時期；精神上物質上都日就衰弱的中國民族，正因這一個運動才有新的轉機。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的勞苦民衆之代表，既覺得現時的中國，確是到了民族解放運動之重大時機，故必須將我們對於時局的根本觀察及職任，佈告於全國民衆之前。

自從北方的國民黨退敗之後，奉直兩派軍閥壓迫人民比以前更加一天天的厲害起來。英日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勾結這兩派軍閥，正在計劃怎樣在中央及各地方建立軍閥專政，以帝國主義者爲後盾，并且利用買辦官僚及老國民黨中之賣國分子，以撲滅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各界人民，深受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及本國軍閥的虐政和連年戰禍，尤其是最近兩年，不但農民破產，就是中等商人，甚至於大商人、小官吏、自由職業者，也都不免破產困窮，流離失所，更用不着說最窘迫的工人了。

一般農民都備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的魚肉和兵匪擾害的苦，無地的農民更苦於租重無以餬口，有地的農民又苦於預征錢糧，勒派公債以及各種名目按畝附加的捐稅，以至一方面農民被迫失業，流爲兵匪，一方面農業衰敗，生產減少，不但農民無以自存，且影響到城鄉一般平民，米荒問題日益劇烈。在工業方面，因爲外人把持海關，對進口貨出口貨都不能採用保護稅制，國內製品不能與外貨競爭，又加以國內戰爭，運輸阻滯，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不但未能自由發展，且日在破產愁煩的生活中；工人所得工資不敷維持生活，還要受中外廠主及職員之任意凌辱打罵，童工尤甚，雖女工亦不免。手工業工人及廠主，均因外資輸入，日益失業破產。一般商人因爲連年戰爭不能做買賣，軍人扣火車不能運貨，各種苛稅雜捐不算事，還要強用軍用票及濫發紙幣，等於沒收商人的財產，軍閥直接或勾結商會領

袖向商人攤派公債，強索報效軍餉，強索不遂，甚至於拘捕恐嚇，等於土匪綁票。學生因為學校經費不足，或家庭無法供給費用，而時有中途輟學的恐慌。新聞界日在中外官廳控告、逮捕、罰金、監禁、槍斃、封禁報館、干涉言論及記載的狀況中生活。一切在國家行政機關教育機關月薪生活的下級職員教員受欠薪及搭發公債、國庫券、軍用票及紙幣跌價的苦，至於不能養家活口。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餉，連給養衣服都不足，還要為官長去屠人搶劫，搶得太不好了，槍斃抵罪的仍是兵士；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還要加上軍隊的壓迫。

解除這些痛苦乃是中國人民目前最急迫最低限度的要求，決不是什麼赤化，或者可以說是國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產主義的赤化。可是真正赤化的中國共產黨之目的職任，正是要團結全國受苦受難的民衆，為免除這些痛苦向帝國主義及軍閥爭鬥。照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策略，凡是被壓迫國家在殖民地的共產黨，都應該代表一切被壓迫民衆之利益，向外國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爭鬥，不單是代表工農利益向資產階級及地主爭鬥。因為殖民地的工農羣衆，為自求解救計，必須力爭整個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國軍閥及世界帝國主義，才有出路。

中國工農及一切受苦受難的民衆所以這樣窮，這樣苦，這樣受壓迫，不用說乃是軍閥尤其是帝國主義之賜。帝國主義的強烈，在中國駐紮海陸軍，把持中國的海關，強迫中國的關稅要尊重他們的協定，阻礙中國工商業之發展，使他們的貨物盡量輸入，使中國的原料賤價輸出，於是中國每年進口貨價超過於出口貨價總在三萬萬兩銀子左右；賠款和外債本息之償還，單是在關鹽兩稅項下撥付的，每年就有九千八百萬元；至於他們在中國經營的礦山輪船各種工廠及銀行紙幣所吸收去大批款項，更不計其數，如此中國安得不窮！

帝國主義用經濟侵略手段，把整個的中國都弄窮了，復用政治侵略手段，各自勾結中國一派軍閥，使之對他派軍閥戰爭，或對接近人民的軍隊戰爭，以鞏固其在中國既得之權利，並繼續增高其經濟侵略，如是贛寧戰爭，洪憲戰爭，直皖戰爭，三次奉直戰爭以至最近反國民軍戰爭，遂充滿了民國十五年之歷史。被外國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而原有手工業農業經濟日漸破壞之整個的窮中國，又加以十餘年繼續不斷的戰爭，所以農民、工人、商人、學生、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兵士等一切民衆的痛苦都由此而來。

所以中國人民要解除切身的痛苦，追求痛苦的來源，則推翻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的壓迫，實是不容緩的事。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大資本家、中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機關職員等，無一不受外國資本家和軍閥的雙重壓迫，大家起來建立「國民的聯合戰線」，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這應該是人人所贊成的。解放中國也只有這條道路。

現時國民運動中的右傾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及附屬於此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雖然與帝國主義爪牙純粹的買辦階級稍有不同，他

們雖然也贊成「國民的聯合戰線」，可是他們以為大家既然要共同對付帝國主義與軍閥，工人農民便應當犧牲自己的利益，即放棄階級鬥爭以免破壞「國民的聯合戰線」。其實這種見解非常之錯。

第一，他們不明白工人羣衆組織工會以罷工爭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這種最低限度的階級鬥爭，不但沒有減少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戰鬥力，並且中國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戰鬥力，當隨工人的階級鬥爭的戰鬥力而增加；因為工人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在五卅運動中已實際表現出來，他們主張工人放棄階級鬥爭，便不啻主張削弱反帝國主義反軍閥戰鬥中的主要軍力。第二，他們又不明白中國資產階級只有參加國民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及軍閥，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階級鬥爭，不是他們的出路。第三，他們更不明白革命的工人階級，是不肯妥協的，是要為全民族利益奮鬥，參加「國民的聯合戰線」到底的，香港工人犧牲職業，艱難困苦的支持一年餘的罷工，便是一例；不像資產階級只顧狹隘的自己階級利益，他們只要於自己利益有損，便馬上主張停止民族運動，如五卅運動中工部局一停止電力供給，中國廠家即時主張停止罷工，便是一例；他們只要敵人對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有點讓步，便馬上拋棄全民族利益的鬥爭而與敵人妥協，如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民族運動給資產階級一點小小讓步（關稅會議，漢口上海租界增加華董，部分的交還上海會審公堂），一部份資產階級便急急和帝國主義者妥協；修改工商學聯合會的要求條件，解決日廠英廠罷工，嗾使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破壞五卅運動的聯合戰線，高唱「中外合作」「中日親善」，這也是一例；主張抑制工人階級鬥爭的他們，這樣只顧狹隘的自己階級利益，這樣不顧民族的利益，這樣為自己階級利益而出賣民族利益，試問他們能比賣國實民的買辦階級高明多少？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罪人，軍閥及買辦階級之次，就要算到這班一面反對階級鬥爭，一面向帝國主義妥協的資產階級右派了。誰要「國民的聯合戰線」，誰便應當脫離這班破壞聯合戰線而妥協賣國的右派，現在的根本問題，便是資產階級的右派是否因妥協賣國脫離「國民的聯合戰線」——而不是工人農民的階級鬥爭破壞聯合戰線。

農民反對軍閥、土豪、大地主的鬥爭，也同樣能夠增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因為這樣，中國大多數人民才能脫離少數特權階級的壓制束縛，自由團結起來，去和帝國主義者奮鬥。廣東農民以反抗地主、土豪的力量，助國民政府對平英國走狗陳炯明，便是一例。

誰說工人、農民的團結和爭自身的利益便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便是他們自己不要「國民的聯合戰線」，不要最不妥協的工人農民參加「國民的聯合戰線」。

我們的黨認「國民的聯合戰線」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最緊要的職任，并不因階級鬥爭而有所搖動；我們要揭開妥協賣國的右派藉口「反階級鬥爭」「反赤」等口號，幫助帝國主義者離散中國民衆之黑幕，我們更加要堅決的主張建立「國民的聯合戰線」。

在過去的經驗，五卅運動的聯合戰線，即以上海總商會只顧自己階級利益之故首先退却，加以英、日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拿「過激」「赤化」這類口號離散民衆而失敗了。

這一聯合戰線失敗，英、日帝國主義者乃指揮奉系軍閥，封禁上海的工商學聯合會及總工會，壓迫總罷工，摧殘由奉天到上海的一切民衆運動；五卅運動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英、日帝國主義者，不但離散了中國民衆的聯合戰線，還進而團結了奉、直兩系軍閥成一反赤的聯合戰線，向接近民衆的國民軍進攻，號爲反赤戰爭。此次反赤戰爭的意義：是英、日等帝國主義者以聯合的力量，一面根本斷絕中國民衆運動得到武力援助的機會；一面強迫奉、直兩系軍閥結合起來，以鞏固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之地位。因爲自從五卅運動爆發於上海、香港以及全中國，又加以北方國民軍之發展，郭松齡之倒戈反奉，那時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地位，實有些根本動搖。

反赤軍在奉天、在天津、在大沽、在北京、在河南，都由英、日有力的幫助，在北方得了勝利，殺人、縱火、奸淫、搶劫、勒捐、強用軍票、搜查學校、封閉報館、槍殺記者、嚴禁工會農會等反赤政綱，已遍行於北京及直、魯、豫諸省，將來或更推行於南方。

反赤軍入北京後，其內部英日間、吳張間都發生了利害衝突，衝突的焦點乃是內閣問題：一方面是英、吳，一方面日、張，都想組織自己派勢力佔優勢的內閣，并想有一個自己派勢力支配之下的國會以控制北方政局；因此相持不下，而一時又不易決裂，因爲他們尚有一利害共同目的未曾達到：英、日之共同目的是討滅南北二赤（國民政府與國民軍），吳、張之共同目的是獲得關稅二五增收及大借款，在這等共同目的之下，他們不得不暫時勉強合作。在他們合作之下的北京政府，無論是那一派稍佔優勢，無論是顏內閣、杜內閣、孫內閣，他的大政方針，終不能抹殺現行的反赤政綱，並且還要加一條更重要的反赤政綱——賣國借款。帝國主義者始終需要這樣的一個中國「中央政府」來替他們宰制中國人民，擁護他們在中國之特權與權利。

人民若不承認軍閥反赤政綱和這樣的政府，便應該自己馬上團結起來，恢復五卅運動的聯合戰線，并擴大這一聯合戰線到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充實這一戰線到一切民衆中，自動的召集全國農民、工人、商人（實業家包含在內）、機關職員、教員、學生、新聞記者、兵士等民衆的國民會議，發表人民自己的政綱，更進而推翻軍閥政權，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民國十一年奉直第一次戰爭後，本黨第一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即已指出軍閥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又指出「恢復國會以維法統」「聯省自治」「依賴吳佩孚」這些辦法都不能解決時局，尤其特別指出吳佩孚得勢，「更要因此釀成和袁世凱成功後、段祺瑞成功後同樣更難解決的時局。」同時我們的提議是：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

席會議，在上列原則（即改正協定關稅制等十一條）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並說明一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人民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

民國十二年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變時，本黨第二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又指出「逐黎不過是歷來外力和軍閥勾結爲患，造成中國危局之一個必然的結果，而非時局危機之因，北洋軍閥奮勢力統治中國，抑制民權，勾結列強，斷送利權，此乃是中國危機四伏之根本惡因，此惡因一日不除，其危機連續起伏之惡果將一日不止。」又指出「擁護黎元洪」「擁護段祺瑞」「國會南遷及制憲」「團結西南聯省自治」「藉助列強」這些辦法都不能解決時局；同時我們的提議是：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來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

民國十三年九月第二次奉直戰爭開始時，本黨第三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指明「此次戰爭直接是直系與反直系之戰爭，間接是英、美與日、法帝國主義的戰爭」。主張：「目前解救中國唯一的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權利與勢力，只有這樣才能免除定期的慘殺與戰爭，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民國三十一年馮玉祥倒戈，直系潰敗後，本黨第四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只有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並希望國民黨努力使他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我們更主張各階級的民衆及各派與帝國主義者尚無確定關係之武力，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爲臨時國民政府。

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因爲國民會議及國民會議的運動無論在全國或在一地方都是民衆聯合戰線之具體的表現；因爲不但現在的國會已因賄選而死，即另行選舉一新國會，也只能代表軍閥官僚而不能代表民衆。吳張對於國會之爭執，並不真是因爲護憲問題，乃是各自爭得北京政權，以便進行賣國大借款。吳佩孚要叫直系的賄選議員佔住國會，張作霖則想叫自己的政客另組國會，以便借「人民代表機關」的名義，實行自己和帝國主義的大買賣。在理在勢，今後都必須以人民團體親自直接選派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官僚包辦選舉的國會制度。

有許多人對於國民會議還有三種懷疑：一是以爲各地方各職業的人民團體尚未普遍的成立；二是以爲各人民團體選派代表，仍然與國會選舉一樣免不了軍閥及政黨之支配；三是以爲國民會議之議決，無力令軍閥政府執行。

其實這三種懷疑都似是而非；我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的運動，並不似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也不限於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樣速

成；我們固然要努力使國民會議這一制度迅速實現，我們更要努力使國民會議這一運動儘量擴大；國民會議的運動就是國民革命時代國民的聯合戰線」之具體的表現，也就是國民革命時代自始至終一切運動的骨幹。這一運動必須在空間上普遍的發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擴大到窮鄉僻壤，由商人、工人、學生努力擴大到農民、兵士、機關職員等一切民衆；必須在時間上有長期的鬥爭，由各地方公團聯合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努力進行到全國發表政綱的國民會議，更努力進行到接收政權的國民會議，如此才算完成國民會議這一運動的意義。

不但國民會議運動可以促進各地人民團體之組織，即現時已有的團體至少已經可以實現發表政綱的第一次國民會議；於此可見對國民會議第一種懷疑之錯誤。由人民團體直接選派代表到國民會議，選舉者和被選者的關係始終不斷，不像國會議員由官紳包造選民冊，包辦初選複選，選舉者和被選者終始沒有關係，因此至少可以減少軍閥支配大部分的可能；至於受政黨之支配，如果能如此，那便更好，現在國會議員選舉的大病，正因為沒有有力的民衆政黨支配，才受軍閥支配；於此可見第二種懷疑之錯誤。由人民團體自己召集發表政綱的國民會議，或者還可以在軍閥政權時代實現，接受政權的國民會議決無在軍閥政府之下實現的道理；於此可見第三種懷疑之錯誤。

由現在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到將來接受政權的國民會議，必須經過相當時期的困苦鬥爭。在這種困苦鬥爭時間，廣州國民政府固然是這一爭鬥之擁護者，即對於一切比較接近民衆的武力如國民軍等，也應當要求其擁護這一爭鬥。但人民僅僅希圖由這些擁護而達到成功，便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至於希望軍閥政府採納民意召集真正民衆的國民會議，並執行國民會議之議決，那更是做夢。只有參加國民會議運動之各階級的民衆，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農民、學生、商人、手工業者等各團體的力量於各地方的國民會議促成會，一面進行自動的發表政綱的國民會議之實現。一面各自在當地立刻起來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奮鬥，由反抗苛稅苛捐力爭民權自由，一直到推翻當地的軍閥政權，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匯合全國民衆的力量，由發表政綱的國民會議，進行到接受全國政權的國民會議，由此會議建立全國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

在這些困苦鬥爭期間，各階級的民衆，必須有一共同政綱，爲這一聯合戰線之共同鬥爭的目標；這共同政綱最低限度者亦須如左：

- 一、廢除辛丑條約及其他不平等條約；
- 二、收回海關，改協定稅爲國定稅制，收回會審公堂，廢除領事裁判權；
- 三、各國撤退駐華海陸軍；
- 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順、大連灣等）；
- 五、解除直奉兩系軍閥的武裝，並沒收其財產分給老弱不能繼續服務的兵士及失業游民；

- 六、改善軍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
 - 七、禁止軍警拉夫、封船、扣車及強住民房學校；
 - 八、禁止非軍人犯罪交軍法裁判；
 - 九、禁止軍用票，濫發紙幣及勒繳公債、軍餉；
 - 十、停止預征錢糧、徵收陋規及一切苛稅雜捐；
 - 十一、由國庫、省庫撥款救濟水旱災及抑平米價；
 - 十二、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關於罷工刑律第二百二十條，保護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
 - 十三、廢止督理、督辦制，實行省長民選、縣長民選，實行由省到鄉村的地方自治平民政權，肅清貪官污吏。
 - 十四、頒布工會法，修改現時便於買辦、劣紳操縱的農會法、商會法；
 - 十五、制定工人最低工資及農民最高稅租額之法律；
 - 十六、承認農民有自衛之武裝；
 - 十七、禁止勒種鴉片；
 - 十八、豁免災區的錢糧及欠租，限制重利盤剝；
 - 十九、頒布工廠條例，禁止中外廠主及職員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廠有害衛生的設備，特別保護童工及女工；
 - 二十、承認商業職工（店員）得在商會之外的獨立組織，并確定其最低工資；
 - 廿一、確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屬各學校經費，并免除學費；
 - 廿二、確定并增加國家行政教育各機關下級職員的薪水，并承認其組織；
 - 廿三、承認婦女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及一切法律上和男子同等的權利。
- 這一個政綱恰恰和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吳佩孚、王懷慶等此時在北京及直魯豫各省所行的反赤政綱相反，他們或者要說這一個政綱是赤色的，可是這一個二十三條赤色政綱，確是各階級民衆目前最急迫需要的東西。此時勾結爲患的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勢力，還是很強大，除了全國各階級民衆聯合戰線的力量，不斷的給他們以痛擊巨創，使他們潰敗，他們決不會因人民的要求而讓步，給人民所需要的這些東西。

各階級的民衆聯合戰線，必須有一共同政綱才能成立；尤其要參加這一聯合戰線之各階級的民衆，都忠實於這共同政綱，爲共同政綱而共同爭鬥，不只顧自己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共同政綱，而消極退却，如上海總商會在五卅運動中的態度，然後這一聯合戰線才能鞏固持久，才能奮鬥到底，才不至中敵人始而離間，終而各個擊破之計，而獲得最後勝利。

各階級革命的民衆啊！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所加於我們的痛苦，已經使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們有沒有推翻他們的力量呢？確是有了，所差的只是「國民的自信力」。此外渙散與孤立，也是我們的力量表現之障礙。現在據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報告，全國已有一百二十二萬有組織的工人，有組織的農民也有八十多萬，這二百萬有組織的工農羣衆，乃是國民的聯合戰線中最耐苦戰的基本軍隊。至於商人、學生早已有了全國的及各地的組織，他們大部份迫切的需要革命，而且已經有組織的參加革命運動。兵士是有組織的，只要我們能努力將他們從帝國主義、軍閥手中搶奪過來，也是一種革命的力量。我們現在仍舊是渙散的嗎？不是的。所需要的只是這些有組織的民衆總團體起來的「國民的聯合戰線」。我們是不孤立的呢？也不是的。去年五卅運動，因爲有了英、俄、法、德、美、捷克斯拉夫及日本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之同情與援助，帝國主義者遂不敢把我們當做義和團看待，并不得不給點小小讓步，如關稅會議，司法調查，租界增加華董等。五卅以來各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如里夫及敘利亞之對法戰爭，如埃及之排英運動，如阿拉伯以政治的罷工表同情於敘利亞，如土耳其聯結蘇俄反抗英國侵奪其莫塞爾，以及最近朝鮮對日之大示威，這些運動都足以使帝國主義者手忙腳亂，阻礙其對於中國的進攻。至如蘇俄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和英國工人之革命化及最近大罷工，更是促成世界革命之顯著的進步，而爲國際帝國主義者無法救治的隱患。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已成爲世界革命的聯合戰線之一員，我們已經不是孤立的了！

各階級革命的民衆啊！我們已經不是渙散的了，也不是孤立的了，其速奮起毋緩！其速發揮「國民的自信力」，鞏固「國民的聯合戰線」，以此推翻國內軍閥，推翻世界帝國主義，如此中國民族才有出路啊！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載「紅色文獻」七七至九二頁）。

（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

（「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中國共產黨類三十至六十一頁）

中央政治報告

一、去歲擴大會議至現時政治狀況的變遷與我黨在各時期的政策

自去年十月擴大會議至現在，九個月間的政治變動，可分為三個時期，每時期，我們均有不同的策略，這三個時期的分劃是：自直奉戰爭至郭松齡反戈為第一時期；自郭松齡失敗至國民軍退出北京為第二時期；自國民軍退出北京至張、吳會面為第三時期。

第一時期，是軍閥政權動搖時期，在此時期中，奉系軍閥已經潰敗，皖系軍閥沒有實力，直系軍閥猶未起來，帝國主義者，一時亦失去馴制各派軍閥之能力，表現非常恐慌，段政府極力勾結國民軍，吳佩孚亦向國民政府示好，彷彿南之國民黨與北之國民軍，可以會合起來支配全國政權，成功一比較赤色的政府之形勢。在此時期中，本黨的策略是自孫傳芳反奉軍事發動，即提出擴大此次戰爭性質之口號，說明反奉戰爭應該是「為民衆爭自由而戰」，集合一切革命力量於反奉旗幟之下，這個宣傳，在民衆中是發生很大的影響，并深入軍閥的隊伍中去，於是郭松齡之反戈，本黨同時又提出，反對直系護憲運動，防止奉直聯合之口號，蓋已預見直系得勢，必然護憲，奉系若敗，必力求與直系妥協，企圖軍閥統治的政權，即今回觀過去政策，一點都沒有錯。

第二時期，是帝國主義者想消滅此革命高潮，一方面努力促成英、日、吳、張軍事上的反赤聯合戰線，一方面在民間造成廣大的反赤宣傳，遂將此革命勝利打消下去。在此時期中，我們的策略是要先破壞反赤的聯合戰線，所以主張在北京暫時成立一灰色的政府，可以容納皖直兩系參加，專門對奉。但此策略終未實行，而吳佩孚已在漢口發動攻豫，遂又主張廣東速出兵討吳，然結果此策仍不能行。所以如此原因，是由我們黨的政治力量還不很強大，故雖有好的政治，仍不能影響國民黨、國民軍充分實現。

第三時期的重要現象，是一方面軍閥政權重新穩定，一方面英、日、張、吳暗潮極烈，同時廣東國民政府實際出兵北伐，英、日、張、吳間衝突雖很嚴重，但國民軍還是有力的存在，奉直咸有戒心。所以祇是暗潮，而未進於明顯的破裂，在此時期中，我們政策，在北方是和奉反直，在南方是援湘禦吳。北方的反赤軍（奉、直、晉三方）若能一致合作進攻國民軍，則國民軍很難存在，但三方合作均無十分誠意，各有私圖，故國民軍似不至於失敗，然在奉、直間無大變化時，國民軍亦祇能自保而難於衝出，南方國民政府之出兵，亦尚祇是防禦反赤軍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北伐。

總之，目前軍閥政權的穩定，只能在國民軍不死不活的狀態中，得到很短暫的穩定，這個穩定，是決不能持久的。

二、帝國主義對華的政策

帝國主義政策，在中國最有權威的是英、日兩國，現時他們共同的目的，是討平南北二赤，其不同的意見是對於關稅會議，日本因欲得關款增收，以整理西原借款，主張繼續；英國因增收影響於英貨之輸入，遂想拖延，又在對於軍事問題上，英的規模很大，有囊括全國的野心，日本則偏重東三省一隅，量力而進，沒有英國這樣誇張。

除英、日帝國主義政策之外，在中國影響較重要的，要算美國帝國主義政策，從表面看去，美國人現正計劃幫助中國人反對英、日帝國主義之可怕侵略，幫助中國資產階級和平發展實業的要求，反對不能滿足中國人民願望的關稅會議，然而他的目的，就在用大美國資本的道威士計劃來代替英、日的統治。

我們對付這些帝國主義的政策，是特別注重反對英國，其次日本，其次美國，因為英國在華的勢力根深蒂固，領域極廣，日本祇是一部分，美國更無固定的地盤，所以尚利用其相互間之衝突，利用分裂的政策以破壞其聯合。

三、各部分社會力量對於民族革命的態度

在民族革命過程中，我們應知道社會各部分力量及其趨向，現時中國社會各部的力量，可以分爲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軍閥、買辦、官僚、新舊士紳（新士紳如大學校教授等）之反赤運動，這都是反革命的力量，是結合於帝國主義勢力的。

第二種是工農學生的革命運動，這是新的革命勢力，剛與第一種舊的反動勢力正對抗。

第三種是中小商人之反抗運動（如抗捐抗稅等）。

第四種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資產階級在現時尚未脫盡買辦階級的思想，但他終將隨着產業之發展而日漸分化，他與買辦階級對帝國主義不同的態度是一爲無條件的合作，一爲有條件的合作，換言之，即他想向帝國主義要點東西，得到之後便可與帝國主義妥協，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很難獨立發展的，因爲帝國主義不容許其這樣做，資產階級現時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未來也是一種反動的阻力，在以上四種力量中，我們將用何種力量來革命呢？當然的，祇有第二種工農學生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第三種中小商人，帝國主義經濟上之壓迫，苛稅雜捐之剝削，祇有感覺革命之必要，並無反對革命之必要，工農方面應該拉他們，纔能免自己陷於孤立。第四種資產階級，因感中國經濟爲外資外貨所占去，不革命沒有出路，加以苛捐雜稅之搜括，軍閥戰爭之破壞，按理是應比較小資產階級更革命的。但事實確相反，一因中國資產階級並非由本國資產積累而成，乃由發洋財（買辦借款）或搜括地皮而來，本身不能斷絕與帝國主義之關係，二因見着無產階級發展起來了，他們一方面想向帝國主義要點東西，一方面又恐怕助長無產階級革命勢力，遂覺進退維谷，踟躕不前。資產階級有兩條出路，一是完全不革命與帝國主義妥協，二是由自己專作民族革命運動，不要無產階級有革命的領導權，一方

向帝國主義要東西，一方面壓迫無產階級不要動，待到東西得了便不革命。我們知道第一條路是不會有的，中國資產階級正走的是第二條路，現時的問題，就是這個革命要不要資產階級參加，我們的回答是，暫時我們還是要利用資產階級，若果我們攻擊他太利害，則他可以完全被帝國主義拉去，更增強敵人的力量，是革命的一個損失。

我們對資產階級的態度，應與對第一種軍閥、官辦、官僚、新舊士紳不同，對前者是要根本消滅，對後者是在與之爭取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國資產階級確已有了一些力量，上海五卅運動，事實上是總商會領導，而不是總工會領導（指後一段期間言），落後的富於宗法思想的工人，亦易被資產階級拉去，小資產階級更不用說，我們應該鞏固工農力量，拉住小商人，脅迫資產階級左傾。

四、國民黨內部之分化

國民黨內部之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種社會力量。反動的右派（馮自由、馬素、孫科、古應芬等），代表第一種，共產派代表第二種，左派（汪精衛、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種，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蔣介石等）代表第四種。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政策，與對全國各階級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們要聯合左派并逼中派向反動的進攻，同時防止中派之發展，迫其離右向左，如果我們聯合戰線的策略應用得好，則民族革命的勝利是有把握的。

五、民族革命的前途

民族革命運動的前途，我們可以預見有兩條道路，一是由工農領導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以革命的手段對民族的資本主義的建設，一是由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拿住小資產階級，并結合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撲滅革命運動，實現道威士的資本主義之侵略，此時甚至連工人亦可發生一部分右傾。前一條路是革命的，後一條路是很悲慘的。將來實現何種，我們尚不能預言。我們的責任，就在努力擴大和鞏固工農的力量，拿住小資產階級，對大資產階級爭奪民族運動的領導地位，如果小資產階級被大資產階級抓去做改良運動，則我們一定失敗。革命的前途是非常明顯，我們要能領導這個革命，必須我們的黨先有很好的組織，否則不但抓不住小資產階級，恐連工農亦組織不好，更何望於領導革命。

說到我們黨的現狀，在全國一般的宣傳上，固然有很大的影響，但實際我們的力量，還說不上就能抓住全國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進行我們的工作，還須更大的努力。

六、九個月中黨的發展及工作

黨的發展，在九個月以來，從好的方面看：一、黨員數量是已增加了三倍；二、我們雖不能在組織上完全取得小資產階級，但很模

糊的能領導全國的民衆運動，尤其是在京、滬、粵、湘等地；三、在全國的政治鼓動是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對於每個重大的政治事變所發出的口號及政策，均能領導民衆要求；四、上海、天津、唐山、湖南的職工運動，均較前有基礎，特別是上海職工運動已漸充實起來，唐山、天津雖在反動勢力嚴重壓迫之下，而根基尚未完全破壞。

從上面看，固然我們的黨是發展了，但在發展中也包含不少的缺點：

一、是黨員數量雖然增加，而質量確退化了，可從幾方面看出：

A 同志都缺乏理論及實際應用經驗，沒有確定的革命人生觀。

B 負責的工作同志，有僱傭勞動傾向，缺乏從前那樣勞苦奮鬥的精神。

C 同志中的一部分，發生貪官污吏化（即有經濟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二、是各級黨部，自中央以至支部，指導訓練的力量，均不充足。

三、支部組織不健全（惟我們現時能注意到建立支部工作，也可說是進步的現象）。

四、理論宣傳非常缺乏，鼓動工作亦多不切實際，不能深入羣衆。

五、職工運動多祇是機關運動，沒有羣衆充實這一機關，惟上海總工會現在總算往羣衆中去了。

六、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往往敵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損失。

總之，現時全國的政治情形，是軍閥政治的穩定并不能持久，革命運動仍向前發展，但究竟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呢？抑是無產階級領導？這就看無產階級的黨有沒有很好的組織，我們必須有一個爲列寧主義所指導的多數黨的組織，纔能爭取這個民族革命的指導權。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

一、廣州三月二十日事變，國民黨中央五月十五日會議，黃埔軍校六月七日又提出處置共產派問題，凡此一切，都是一貫的對共產的進攻。廣東方面，現時獲得政權者是武裝的中派，而全國則有右派的反赤運動，他們都向共產黨進攻，這種進攻之所以可能，固然是因爲客觀政治形勢大有變動（國民黨敗退，北方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勝利，吳佩孚重登政治舞台與英國勾結，日本又扶起張作霖，並借中東路事件反對蘇聯等等）。然而我們的黨，自身亦作了些錯誤，因此我們一方面從中央直到支部，應當宣傳解釋此次右派及一部分

中派國民黨對我們的進攻，是和帝國主義軍閥的反赤運動相呼應的，實質上確是反革命的行動，但是別一方面，我們還要研究右派、中派之所以容易利用最近政治形勢向我們進攻的原因，並且要設法消滅這些原因。

二、國民黨右派以至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們進攻，提出要求我們退出國民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們前次指導國民黨的方式錯誤，實際上簡直使左派自己不參與黨務及反對右派的鬥爭，我們自己造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形勢，而使實質是左右派之爭的性質隱蔽起來，同時我們既使左派在政治上及組織上自己形成起來，當然國民黨的發展，便因此遇見妨礙，不能充分吸收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可是右派及中派，却正利用機會而在這些分子之中發生影響，我們既沒有實行去年十月中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我們自己各地黨部更加獨立行動及結合左派與右派，實行思想上組織上的鬥爭，我們因此也就沒有能充分的在羣衆中建立鞏固的基礎（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等），更沒有能在北方政治形勢惡化之後，以民衆革命化的勢力反對右派及武裝的中派之進攻。

三、去年中央擴大會議，關於國民黨的意見是：一、我們留在國民黨裡與左派結合，密切的聯盟，幫助他們發展國民黨，並且反對右派，但是我們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二、我們自己的黨，政治上更加獨立起來，這種決議的理由是因為我們看國民黨的性質，是各種社會的力量政治聯盟（革命的知識分子、中等工商業的民族資產階級、手工業及小商人的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並且仍然認爲國民黨的發展及我們參加國民黨的指導，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前提之一。我們在國民革命中的策略，應當更加明確規定，一方面，我們黨應更加緊在政治上表現自己的獨立，確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數農民中的勢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衆中的政治影響，別方面組織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於國民黨以充實其左翼，更加以無產階級的農民羣衆革命力量，影響國民黨，這樣去和左派國民黨結合強大的鬥爭聯盟，以與資產階級爭國民運動的指導，如此纔能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所以現時我們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應當是擴大左派，與左派的密切聯合，和他們共同的應付中派，而公開的反攻右派。

如果有些同志認爲共產黨應當與國民黨完全脫離組織上的關係，現在就要消滅這一各階級聯盟的政黨，以爲共產黨已經就能獨自領導無產階級，使其他被壓迫民衆跟着他來完成資產階級的主權革命，那麼這種觀點，是完全不對的，完全看錯了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遠景。主張現在就與國民黨脫離組織關係，而僅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實和國民黨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理由是一樣的，這種傾向是表現最近一年來日益形成的資產階級要奪取國民運動的指導。

如果有些同志，仍舊認爲共產黨應當包辦國民黨機關，自己占領發展國民黨組織及黨部的工作，那麼這已經有廣東的經驗證明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爲現在國民黨的組織形式和他的社會基礎，本不適當，再加之以我們的占領，自然因過分的集權而實際上變成狹隘

的小團體，反使大多數革命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因散亂避離而消失其力量。

這兩種觀點雖然恰恰相反，而却有同樣的政策上的錯誤，對於中國解放運動，有同樣的危險，最終的結果，是使共產黨及無產階級與大多數城鄉小資產階級隔離，實際上是將這些羣衆的指導交給大資產階級。

四、我們黨裡，現在所有這些錯誤的傾向，因為最近形成的客觀形勢，的確是非常之複雜，一年來，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雙方的「自我形成」，必然直接反映於國民黨，這就是共產派與右派互爭，對於中派及左派的影響，我們的黨，所以現時應當格外對於國民革命發展的遠景，有明顯的觀察，對於國民黨有確定的策略，須使中央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相互關係的觀點，真正能為黨員羣衆所了解，而造成相當的正確的觀念。

本次（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擴大會議，認為解決我們和國民黨組織關係的正當形式問題，雖然是下次大會問題，但是現在已經必須有下列的決定：

(一)、實行去年十月擴大會議的議決，我們各地及廣東黨部的獨立行動。

(二)、積極發展國民黨左派，同時改正以前束縛左派，及實際上不使左派管理黨務參與反對右派鬥爭之策略上的錯誤。（著者按：根據國民黨整理黨務案，不許共黨份子把持國民黨，此所云云，不過中共聊以解嘲耳。）

(三)、積極發展左派的黨外羣衆的組織，尤其是城市資產階級之中（政治的俱樂部等），以這些社會團體，擴大國民黨的基礎。

(四)、我們應當使國民黨左派，明瞭國民黨的組織，不能是一階級式的集權的政黨，有太嚴格的紀律和章程，現在必須引進許多小資產階級革命化的羣衆於國民黨，所以黨的組織形式，可以通融而寬大些，例如國民黨下級黨部，至少要有政治俱樂部的性質，使與羣衆接近，不必太側重於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縛自己，例如革命的社會團體，未始不可整個的加入，這樣則使國民黨成爲極大的羣衆的黨。

(五)我們應當和左派共同進行更實際的反對右派的經常鬥爭，暴露他們的妥協及賣國賣民的罪惡，祇有這樣纔能使中派與右派隔離。五、我們對於現時的國民黨的目前緊迫的職任，尤其以實行反右鬥爭爲最重要，我們在現在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及對廣東內外反革命勢力之鬥爭裡，雖然他們在中派指導之下，當然還要竭力贊助他們，我們同時應當有擁護勞動民衆利益的自己的政策，而且這一政策，做贊助他們的根本條件。

組織問題議決案

第六章 北伐與反蔣

黨的發展經驗和缺點

一、自從上次擴大會議以後，本黨組織在數量上，又發展了三倍以上，最近八個月來，雖在五卅運動潮流已經逐漸低落之後，而本黨在全國各地的組織，仍能於各種形勢之下領導民衆運動，從全國革命運動的實質看來，本黨確成了一個政治核心，從各地羣衆運動的實質上看來，許多方面本黨確已漸漸的站在領導地位。

二、在過去的組織工作中，我們有了下列的經驗：

A、經過各種的運動，我們得以接近廣大的民衆，得到民衆組織的發達和黨自身的發展。

B、因爲注重於發展工作的結果，已使本黨在幾處革命潮流較高，民衆運動較發達的區域，取得了羣衆，並從羣衆中建築了基礎的組織。

C、因爲開始注重支部工作的結果，已使本黨有了較好的社會成分，吸收了進步的分子，深入在無產階級羣衆裡，於秘密工作形式下，種下了初步的基礎。

三、這些經驗，從實際工作上得來是幾件好的結果，但是本黨在組織上，仍是非常幼稚，有許多大的缺點，這些缺點之最大者有四：第一是各級黨部尚不認識組織工作的意義，多以爲組織工作只是技術的，而不了解組織工作的政治意義；第二是支部工作尚未真正建立，過去的支部，都僅有其形式，各級黨部尚不明瞭支部的意義，亦尚不知支部工作的方法；第三是黨團的工作不太好；第四是黨的機關不健全。

組織工作的意義

四、組織工作的意義，絕不止於是技術的，而是政治的，換言之，便是組織工作即是黨指揮羣衆運動的樞紐，沒有好的組織，便不能指揮廣大的羣衆運動，運用黨的政策。一個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組織才能實現的。布爾塞維克黨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組織的工作，一個幼稚的黨，要能做到布爾塞維克化，要能作到從小團體變爲羣衆的黨，要能做到從思想的團體變爲行動的團體，要能做到從支部基礎的工作得到大的羣衆行動，便要算有好的組織工作。

五、本黨在組織上正當發展，但某一種危險時有發生之可能，這種危險，便是指導力之薄弱，主觀的力量，不能適合客觀的需要，以致失掉了許多活動之機會，尤其是羣衆的政治行動，若遇指導力薄弱時，其損失甚大，這是組織上最嚴重的問題。客觀的革命運動之進程，是逐日發展的，本黨在組織上的最大責任，就是要推進革命的運動，拿住運動的重心，在其最大可能的範圍內指揮一切，這不僅是中央組織部的責任，亦是各級黨部組織部的責任。此擴大會議決定以後，中央對於各處，各區對於各地方，最好能常派遣特派員

考查並執行此種任務，在某地發生特殊事變時，此種派遣更不可少。

六、什麼是組織工作的最大障礙呢？那就是對於發展組織的懷疑心理，在目前暫時的軍事反動政局之下，革命運動就進行不已，依反動政局而革命化之大多數的工人農民與知識分子，在此時的問題，就是這些羣衆，若不接近於無產階級，黨的勢力，便會走入買辦資產階級的圈套。自「五、卅」以迄現在，羣衆運動的問題，便是聯合戰線之最多數羣衆屬於何種勢力之問題，這個意義便是說，假若本黨不能擴大與領導羣衆，便會使資產階級與反革命勢力日益增加，因此擴大會議特別提起嚴重的注意，重新提出擴大本黨的口號，務使本黨更加發展，徵集更多的革命工人、農人與知識份子。

七、對於無黨的羣衆，及無組織的羣衆之工作，也是本黨在組織上的責任之一，在各種工作形式下，造成許多同情於本黨的組織和羣衆，是目前最需要的工作，如濟難會工作已有相當的成效，惜各地黨的機關，未能加以充分注意，此後如救濟會遊藝或體育之團體及教育文化性質之團體，都應加以注意與活動。

支部的意義與工作方法

八、支部並不是分部，而是黨在各工廠、礦山、學校及某區域的核心，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就是集合這許多的社會的核心而成爲一個黨支部的組織，是按照社會的生活，而精密分割的。但本黨現有的支部，大半失去這個意義，祇是在各種社會組織或區域裡，徵集了革命的分，而成立黨的分部，給以黨的訓練，而並未做到支部自身在此社會組織或區域裡的核心作用，黨的支部若沒有這樣作用，決不能接近羣衆、領導羣衆。這一個最嚴重的缺點，應當要立刻的改正。

九、改正缺點，以建立真正支部的方法有五：(一)現在我們黨的基礎，仍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黨的活動工作者也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今後要把黨的真正基礎，建築在各支部上面，要把黨的基本工作，責成各支部，建立每個支部的活動工作，在每一個支部裡實行分工，使每一個同志都有活動實行「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口號，使各支部裡都有全黨形式的各樣工作（如職工會運動、農民運動、協作社、濟難會、婦女運動、青年運動、分配書報、介紹同志、報告消息、交通傳達等等，按照各支部的情形，其人數與環境的需要而定）。大的支部，在秘密時代因人數過多，不便常開支部黨員大會，又爲收取黨費、傳達命令等事務，支部內可按工作部份編小組。但我們必須認清，小組是在上述情形之下而存在，不是黨的基本組織，祇是每個工廠、每個礦山、每個學校等整個的支部。(二)建立強有力的支部幹事會，以領導本支部的工作。如大支部內又分小組時，除支部幹事會應擴大外，且需按期召集組長會議。支部幹事會須有計劃的、有秩序的、積極的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訓令。(三)改造支部的性質，只許有兩種性質之支部存在：A工廠支部，農村支部或學校支部；B

街道支部或區域支部（即按住居地址而分割）。這種確定支部性質的作用，一為必如此始能建立支部的工作，一為避免與黨團的作用相混雜。如在大的工業區域中（如上海、香港、武漢、天津），及大的農村中如組織發展支部加多時，應於區委或地委下添設，部委按區域分割幾「部」，聯合若干隣近之支部組織「部委員會」，管理本區域內的各支部工作。如從中央至區委或地委，從區委或地委至部委，從部委至支部幹事會以至組長會議，是黨的本身一個系統，這個系統的關係，要非常密切，在組織工作上，從事黨的支部小組起，要嚴格執行：A 政治行動；B 發展工作；C 推銷書報；D 繳納黨費諸種工作。

十、黨的發展狀況中之時，組織工作的懈怠與不精密，便會使黨沒有行動，各種性質的會議，無論在怎樣情形之下，務須要設法舉行，祇要各個分子在會前有預備，便是十分鐘或二十分鐘的會議，亦是有益且有效的，支部或小組的會更不可間斷。在開會前預備自己的報告和意見，是每個同志的責任。召集開會，綜合各種報告作結論，執行決議和訓令，是每個組長與支部書記或幹事的責任。各區委、各地委或部委下的「活動分子大會」或「負責工作同志大會」，應盡可能的多多召集。

黨團工作

十一、黨團的作用，是為實現黨的政策，加重黨的影響於各種非黨的組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各種社會團體裡，和黨的支部組織及作用均不同。黨團的組織，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單位或自成一個系統，而是依隨黨的組織，在各級黨的機關之下成立並受其管理，從中央至支部幹事會，有各級各種性質的黨團，黨團的性質且多臨時的，常為變動的，由各級黨部規定其存在，人數過多時，指定其幹事會。

十二、黨團的工作，便是整個的代表黨的意見，貫徹黨的政策，其中沒有各分子單獨意見。黨的機關對黨團有決議時，就必須執行。黨團中的每個分子就應為這個決議而動員。黨團中大多數的決議，除必須通知受指揮的黨機關外，每個分子就應為這個決議而動員。在一定範圍以內，黨團的工作是須由自己討論的。黨團的意見與黨的機關（如某廠工會的黨團與同廠的支部幹事會）意見有不同時，便須立刻提出於上級黨的機關去解決。

十三、過去黨團工作之缺點甚多，甚至有未明瞭黨團的意義，有成為黨的第二組織之傾向，這些缺點，是應竭力改正的。各級黨的組織，尤須不要忽視黨團中的同志，在黨的基本組織（支部）是不能脫離的。

黨的機關

十四、政黨是不能沒有機關的，共產黨自然也有其機關。我們的黨的機關，便是列寧所說的「職業之革命者」之組織。黨的機關

的作用，就在推進黨的組織，執行黨的政治的與技術的職任，尤其是在發展狀況中的我們的黨，不能沒有很好的機關，無產階級科學的組織。

十五、黨的機關之健全，其必須條件有二：(一)組織的完善與合乎需要；(二)工作人力之充分與負責。過去的組織，往往僅具其形式，或甚至祇有一個名稱而沒有實際的工作。如各部的組織，各種委員會的組織，都有這種毛病。這些毛病之來源，雖有由於人力之不足者，但亦有時是不合乎需要。欲求糾正這些毛病，一方面是要從組織構造上檢查，以求整頓；另一方面也須從人力補充和適宜的分配上着手，使負責工作者增多並充實起來。據中央組織部此次的報告，統計全國工作人才，僅依目前的需要，至少應有區的工作人才三十五人，地委或部委工作人才百六十人，特支工作人才百六十人，共三百五十人，而實際現在担任黨的工作者，勉強祇有百二十人上下，由此可見，人力與實際需要相差之遠，應竭力養成工作人才，以為救濟。

十六、上次擴大會議曾經決定，中央各部要有確定的組織，中央及區書記，應當不兼部務，中央之下，應有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委員會及軍事部，經常的執行自己的工作，這些決議，祇有一部分已實行，大部分尚未做到，如中央組織部，至今尚無專人負責，職工運動委員會負責同志，時常派往他處臨時工作，農民運動委員會至今尚未成立，自此次擴大會後，都必須逐漸實行，力求改正過去在工作上的缺點，並應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各級黨的組織，同樣的要整頓起來，必使黨的組織都健全以後，纔能推進羣衆的革命運動。自中央以至各支部各級機關間，必須建立相互密切的關係，各上級機關對於下級機關，各下級機關對於上級機關，都須有定期報告。

關於宣傳部的工作議決案

擴大會議看了中央宣傳部報告之後，認為今後宣傳工作，應當趕緊整頓，宜即採取下列的具體辦法：

(一)出版物問題：

一、中央政治機關報「嚮導」應當更加加增鼓動的性質，使能反映中國革命民衆的日常鬥爭，而予以指導，不可太重於分析的論述，再則(一)應再多加宣傳各地工農運動的意義，(二)各地政治通信都須整頓，務使每一地方重大事件，都不空放過。

二、中央理論機關報「新青年」務須按月出版，適應革命的思想鬥爭之急需，因為黨內理論力量既然很少，必須把他們暫時集中於新青年(如嚮導)上過於偏重理論分析的論文，北京政治生活上的歷史的理論文章，都可以登載於新青年，再則，新青年上須設法增加中國經濟的研究，及工農運動的歷史的理論的論述，新青年上還應加增CY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使他成爲CP及CY中央的共同出版物。

三、中央通俗的機關報「勞農」（或「工農」）亟須添設，先辦月刊，以後設法改為週刊。這一機關報，應當給工農羣衆讀者以政治的指導，復能搜集全國工農狀況及其政治經濟鬥爭的消息，登載各地方的工農通信，這種機關報的目的，是使工農羣衆能明瞭全國革命鬥爭的狀況及意義，並充分表現實際上的工農生活及其鬥爭。

四、黨報還須改良整頓，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黨內生活和工作經驗，以爲訓練同志之材料及指導。

五、爲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審查，爲使我們所主持的工會、農民協會、婦女團體、青年團體的機關報，能與黨有密切的關係，並能適當的運用策略，爲使中央對於各地方的各種出版物能有周到的指導起見，必須設立一編輯委員會，由黨、新青年、勞農、黨報、中國青年（CY）、中國工人（全國總工會機關報）、中國婦女（婦女聯合會機關報）等之主任編輯組織之。這委員會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報告中央及各地黨的工會的機關報之狀況，加以審查。

（以下（一）部務問題，（二）編譯工作問題，（三）地方報告問題，（四）農工通訊問題，約二千餘字，均係事務性質，略。）

職工運動決議案

一、「五、卅」運動以來，已經證明工人階級，在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是一個主要勢力，並且在這一革命的怒潮中，工人階級的階級自覺和民族自覺，及初步的組織能力，都有很廣泛的推進。雖經帝國主義與軍閥歷次的屠殺和摧殘，然工人階級仍繼續不斷的反抗，同時在廣東歷次肅清反動軍閥的爭鬥中和北方反奉戰爭中，工人階級都能有組織的參加奮鬥，也證明工人階級已有進一步的覺悟。

最近因軍閥搜括及戰禍天災，和輸出品之漫無限制，發生普遍全國的經濟危機，如紙幣跌價，強發軍用票，米價奇漲，百物昂貴，欠薪等等，工人階級在這危機中，實際上工資日見降落而受猛大痛苦，因此經濟罷工風潮，遂普及於各處。雖無組織的絲廠工人和手工業工人，都不斷的罷工。這種罷工風潮，且將隨著經濟危機，而日益繼續增高。工人階級的境遇，既然如此，祇有日趨革命化。同時這種組織力薄弱的罷工，亦易於爲帝國主義者軍閥和中外資本家所壓迫。我們爲抵抗敵人的壓迫起見，應加緊努力，不要失掉一個指導的機會，務使經濟罷工運動的結果，足以強大中國工人階級的勢力。

二、中國職工運動自始迄今，都是在本黨指導之下，尤其是在「五、卅」滬港工人罷工中表現最爲明顯，所以本黨對於職工運動，不是黨與工會關係密切與黨的問題，而是如何使本黨各級組織，經過工會的形式，去指導和訓練廣大的工人羣衆的問題。

(一)本黨指導工人運動，不在於包辦工會機關，而在於能夠不斷提出切合工人階級實際的經濟、政治的要求，與黨員之確能爲工人羣衆的利益而奮鬥。

(二)是經過本黨的工廠支部，去影響廣大的工人羣衆，因爲黨的工廠支部，都是最接近羣衆的組織，所以無論工廠裡面發生何項與工人利益有關的事件，本黨各工廠支部，應該立即起來活動，爲全體工人奮鬥（但須經過工會這一形式），一面藉此組織和訓練工人；一面利用這些具體的、日常的爭鬥，促進工人羣衆階級的覺悟，引導羣衆去參加工會的工作。工會就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所以我們更應該用工會的工作和日常的鬥爭，去教育工人羣衆，如此方能將過去用黨團包辦工會機關的工作，轉而爲黨員羣衆影響工人工作的職業運動。

三、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主要職任，是領導全民族的解放鬥爭，工會與其他階級民衆團體，建立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行動的聯合戰線，就是實現這一職任的唯一策略。所以工會須時常發布有關各階級民衆共同利益的主張，並且須領導工人羣衆，實際參加這種行動，我們運用這一政策，往往易於發生毛病，不是因恐怕聯合戰線的分裂，易於忽視工人階級的利益，就是階級爭鬥口號與要求過高，易於妨礙各階級的聯合戰線。我們要知道，必須工人階級團結愈堅固，然後聯合戰線的勢力纔能更充足；工人階級的團結力，又必須在階級鬥爭中漸次發展。所以輕視階級的利益，不但是有使工人階級離開我們的危險，而且足以根本搖動聯合戰線的勢力。同時階級爭鬥的口號與要求過高，易使資產階級利用這種要求與口號，爲隔離工人階級之宣傳，而使工人階級陷於孤立，還有第三個毛病，就是利用一個策略時，祇是發表一些空洞抽象的全國的政治口號與要求，而不能運用到實際的日常的鬥爭上去，這個毛病差不多很普遍的，這就是除「五、卅」時的上海及現在的廣東外，完全不能把這一個策略發生的行動的總原因。要使這一個策略能夠實現，必須從羣衆的、日常的、切身的問題做起，就是許多地方的政治、經濟問題，如苛捐雜稅問題，米價問題及軍隊的騷擾問題等。實行這一策略，不但是由工會發表幾篇宣言就夠了。並且要以工人階級做中心，起來號召各階級的民衆，作實際反抗的行動，然後這個聯合戰線纔能深入羣衆，漸次的鞏固起來。

四、本黨中央的或地方出版品，祇須切實登載關於職工運動的消息和論文（此事雖屢經決定，但未切實執行）。過去本黨的定期刊物，都不免犯了一個共同的毛病，不是文字太艱深，就是憑空發議論，不切事實，很少登載工人的投稿。最近雖有些進步，但是還未能普遍的羣衆化。根據過去的經驗，祇有畫報最能影響工人羣衆，各級黨部以後應注意發刊工人畫報的工作，而各種刊物，亦須注意插畫一欄。

五、自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後，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此一年之內，全總在廣東工會中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尤其在香港罷工工人中間，可是在全國各地工人中，全總尚無何等影響，今年「五一」舉行的第三次勞動大會，雖然沒有在全國工人羣衆中發生重大影響，可是很有教育和宣傳的意義。最好的現狀，是全國所有羣衆的工會（除廣州少數工會外），都加入了全總，而全總的領導機關，還算健全。因此在最近期內，應注意全總上海辦事處的工作，第一要在組織上與全國各地工會發生密切關係；第二要在上海發行一個領導全國職工運動的定期刊物；第三建立巡行員的制度，實地指揮各地工人的爭鬥，如北方能建立全國工會的最高指導機關，實際統一全國職工運動。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應注意指導和運用全總這一機關。

六、我們有了許多工會的高級統一機關，固然是很好的，同時我們的職工運動，却發生一機關化的危險。此時我們要注意工會組織的羣衆化，就是要注意工會的低級組織。在過去我們對於工會組織問題有兩點錯誤：一、偏重機關組織的形式，二、雖會注意工會基本組織，但未能正確的運用這一基本組織。在工會組織不能公開的地方，不必拘工會的名稱和形式上的組織，要想出種種形式的組織和名稱來組織工人（如學校俱樂部、飯堂、醫院、音樂會、體育會、合作社、技擊會均可）。這種組織祇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有羣衆的，雖少亦可；二是要階級的。關於工會基本組織（工廠內的各部門的支部或小組）的運用，過去的缺點，不是太偏於形式，就是太偏於嚴格，或近於機械。其實基本組織的主要意義，是工人羣衆活動的單位，基本組織不在於形式上的一律，而在這個基本組織真能爲羣衆的核心，再次吸收工人羣衆和構成工會的一個活動單位。如果過於嚴格，成爲死板機械的東西，也就失掉了工廠支部或小組的作用和意義（類如一個工廠裡，某個工作部門，共有一百個工人，其中加入工會的有二十個工人，無論廠主或監工虐待這一個工人中任何一個，這二十人工會會員所組織的基本組織，應立即召集這全廠一百工人，開會討論和解決一種適當的行動，反對這件虐待事實，就是在不能開會的地方，亦須在廠內或廠外，分頭進行宣傳和煽動的工作，務使這工作部門的全體工作，都同情於工會組織而加入工會，並使工人羣衆學得日常的方法，這就是工會基本組織的主要意義）。同時我們要注意下級工會委員會和工廠工人代表會的教育訓練工作，這些工人委員和代表，多半是工廠中的中堅分子，必須他們受了相當的訓練，纔能適當的運動工廠支部或小組這一組織，這是建立工會組織比較切實的辦法。

七、因爲中國政治情形紛亂和經濟情形的複雜，全國工人的要求很難得到一致。除廣東外，工人的自由權利的獲得，可真是全國工人一致的要求。至於改良待遇等，當按各地各種工人的實際境遇，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一時不能達到目的，也要開始宣傳關於工作時間，我們應立即宣傳至多不得過十小時及每星期休息一日的制度。中央及地方都應提出全國的及地方的工人要求的大綱，向工人羣衆及一般社會廣爲宣傳。

八、在輕工業工廠中，如紗廠、烟廠、絲廠等，青年工人和女工數量都佔很重要的成份，因此青年工人和女工參加工會運動、罷工運動以及一切羣衆運動，均能積極行動。爲提倡他們更加努力的參加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及訓練工人階級戰鬥的人材起見，我們應當注意引導他們奮鬥，施與他們以必要的教育和訓練。在各種經濟罷工中，應注意提出他們的特殊條件。在有青年工人和女工的工會內，必須選擇他們的能幹分子，當選爲工會委員會的委員，在各工會黨團中，亦必須有團的代表參加，以便CY組織在工人羣衆中，能爲一致之活動。

九、按照各地職工運動實際狀況和各地工人的最低限度要求，各地區委員和地委，都應擬定目前職工運動的實際計畫，報告中央批示，並督促黨的工廠支部和工會的黨團切實執行。全國職工運動中最重要之產業有鐵路、海員、礦山等，最重要的地方爲上海、廣東、漢口、天津、青島等處，各種產業及各城市工人運動，各自有其應注意之點。

(一)北方鐵路工會，除京綏路工會外，都被壓迫而不能公開的或半公開的存在，過去鐵路工會，尙未能獲得羣衆的基礎，黨在鐵路上的支部也不發達，加之鐵路工中，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的差別甚大，客觀的組織上也有許多困難之點，以後應該引用不拘形勢，不拘名稱的公開或半公開的方式，以及秘密的方法，組織各大站鐵路工人，自司機、升火至路棚工人、搬運夫等鐵路工人，一面應用方法反對賣國軍，一面應以日常最感痛苦的事實，團結自身，並與沿鐵路的他種工人和農工發生密切關係。爲達到上項目的起見，當地黨部須努力發展鐵路上的本黨支部，並認定鐵路工會的工作，是該地黨部職工運動中，第一重要的工作。此後，鐵總除派遣巡行員指導和考察各地鐵路工作外，並不派遣駐在各站之經常特派員而發展各站工會的工作，當完全由當地黨部負擔。鐵總祇與各站工會發生正式關係，而經由各地黨部發展之各站鐵路工會，亦須注意與鐵總關係之密切，以鞏固鐵路工會之統一，亦須注意將工作情形，由各站工會報告鐵總，以便鐵總發行定期刊物，指導各鐵路工人之運動。

(二)過去海員工會，除在一部份航海輪船上有相當基礎外，內河輪船上的海員加入工會者尙少。粵漢罷工後，一部最革命的海員，又離開了他們的工作，因此海員運動，在最近的將來，應在航海輪船上進行秘密工作，並設法使內河輪船的海員加入工會。海船工會的組織，亦應推廣到各大口岸。自然黨的組織，亦應隨着工會的發展而努力。發展以後各地黨部，對於海員運動，更應十分注意。

(三)過去礦工運動，除安源已被摧毀，一時無法恢復外，祇有開灤、淄州、博山、焦作、大沿、水口山錫、礦山等處有過相當的組織，以後一面應繼續進行這些地方的礦工運動，一面又應派人進行撫順、井陘、臨城、自流林等地礦工運動。

(四)上海總工會，雖為上海全體工人所擁護，然其基礎尚在一部分紗廠和印刷工人上面，以後組織海員、鐵路、郵電、碼頭、街道交通工人等工作為最重要。上海工人因生活痛苦或階級自覺心較甚之故，最宜發生無組織的罷工與暴動，須本黨工廠支部和低級工會強大起來，方能使上海工人的工作，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動作，同時應極力爭得上海工會的公開存在，並普遍宣傳上海工人的總要求。上海黨部尤須指導上海工人參加上海的地方政治和經濟的改良運動，上海工人方能積聚他們革命經驗和奪得他們的社會地位。

(四)廣東職工運動有兩個缺點：(一)一部分產業工人，尚在少數反動領袖影響之下；(二)工會中舊有會的積習甚深。本黨的廣東職工運動，在最近的將來，一面應注重獲得兵工廠、鐵路、郵電、自來水等工人羣衆；一面要注重建立擺脫舊行會積習的少數模範工會，不能專注重所謂工會統一運動。省、港罷工應急謀解決，尤以今後香港職工運動的恢復，為粵區主要工作之一。本黨工廠支部的發展，應注重吸收工人羣衆，對於工會職員之加入本黨者，須嚴加選擇。

(四)天津、漢口、青島、大連等處，都在嚴重壓迫之下，多數工人尚無組織，今後應極力發展這些地方的工人組織，同時須避免機械式的和太嚴格的應用工廠支部或小組這一毛病，須注意應用日常爭鬥事實，以各種公開的或秘密的方式，組織工人團體和工會基本組織，尤其要注重黨的工廠支部的發展，目的在於獲得工人羣衆中的中堅分子，以為發展各種爭鬥的準備。

(四)在各城市中，各小工廠工人，商店店員和手工業工人亦須特別注意，因為他們是這些地方大產業工人的代理者，即是國民運動中有力的羣衆。這些職工的組織，雖然不能十分嚴緊，可是第一步須使這些職工團體成為階級組織，不使資產階級分子參雜其中，是要最注意的。

十、過去一年中，全國工人階級，都在熱烈鬥爭的狀況中，因此本黨即忙於指揮這些熱烈鬥爭，因此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負責人員，常被調遣而未能經常的擔負責任，因此對於全國職工運動的發展，未能為有計劃的進行。以後中央須指定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經常負責人，根據上項決定，計劃實際方法，由中央隨時指導各地黨部，切實執行。

十一、現在職工運動的人材，極為缺乏，尤其是下級幹部人材，最近期內應於上海、漢口、天津、廣州等處，設立職工運動訓練班，訓練下級幹部人材，並須設立一高級訓練班在上海或廣州，養成全國高級指導人材。

農民運動議決案

一、農民運動的趨勢

自近年來，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軍閥加緊剝削和壓迫，以及軍閥戰爭的頻繁和擴大，以致形成現時彌漫全國的農民暴動，如最近河南、山東的紅槍會暴動，四川、陝西、直隸的減租稅抗捐運動，廣東、湖南的農民協會運動，並且在這些運動中，表現一些共同的傾向：反對苛捐雜稅，預征錢糧，反對貪官污吏，反對民團之壓迫，反對戰爭之擾害，同時且表現積極的要求，要求自己的組織；要求武裝自衛；要求有一個不苛取，不擾民的政府。在農民運動較進步的廣東，更要求取得一部分地方政權（縣長民選等），總之，現在的農民，已經感覺到自身的痛苦而不能再忍耐了，已經自動的起來（不管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原始的或有組織的）反抗剝削和壓迫他們的階級（地主、土豪、劣紳、買辦階級帝國主義），換言之，便是農民已經起來參加國民革命的戰線了，並且在實際政治上，現已發生很大的作用（如廣東國民政府之勝利，河南國民二軍之失敗），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

照這種趨勢看去，我們可以說，民衆的政治覺悟與其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的發展，將要成爲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主要勢力。我們的黨要想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順利的進行，就在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農民運動的指導權，因此擴大會有以下的決定。

二、經濟的與政治的要求

廣東的農民運動，已需要一個最低限度的政綱，從全國來說，則尚早一點，尚不能即定出一組織的政綱。在這個決議案，不是要有系統的說明農民之要求，而祇是找出全國最急切需要的，是那幾項是馬上就要行動的。至於整個的農民政綱之提出，須待至第五次大會時方能議及。

A 屬於經濟的：

1. 由政府限定最高租額，農民所得至少要占收穫50%。
2. 限制高利盤剝削，利息最高不能過三分。
3. 反對預征錢糧及苛捐雜稅。
4. 要求免除陋規，一切征收按市價計算。
5. 統一度量衡。
6. 禁止囤積居奇，提倡農村消費合作運動。

B 屬於政治的：

第六章 北伐與反蔣

1. 農民集會結社自由。

2. 縣長民選。

3. 鄉村自治機關，由鄉民選舉。

4. 地方財政公開。

5. 反對民團執行逮捕、審判等司法職權。

三、組織問題

1. 農民的組織，不能太嚴格，太拘於農民協會之形式，如果各鄉鎮已有聯莊會，守望社等真正農民羣衆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而又不易變更，則不必一定強之變爲農民協會形式，且容許其加入縣農民協會，惟全縣農民的組織，仍統一於一個縣農民協會。

2. 現時農民協會的組織，尚不能帶有很顯明的階級色彩，至如單提出雇農的組織或佃農的組織，不能明確的指出有若干畝田地者，不能加入，因爲不易定出一個適當標準，祇能比較概括的指出以下之兩種人，不准加入農民協會。

A 不耕種而擁有多數田地者。

B 重利盤剝者。

3. 對舊農會政策：農民協會會員，一面須儘可能取得舊農會，以免劣紳、土豪利用舊農會所謂合法機關，壓迫農民。當地主與貧農有衝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居調停地位。

四、宣傳問題

1. 一切鼓動和宣傳，當以農民實際生活痛苦爲出發點，切忌廣泛的宣傳及機械式、講義式的訓話。

2. 鄉村中的迷信及宗教的關係，不可積極的反對，應該有方法的、有步驟的去提高鄉村文化程度，有時爲使自己生活農民化，冀求容易接近農民，且有暫時附和羣衆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發展。

3. 農村中階級關係極複雜，故不必提出農民階級字樣，祇是以全體農民反抗劣紳、土豪宣傳。

4. 宣傳方法，當注意利用畫報、標語、歌謠、幻燈、小說式文字等項，好能改變鄉村傳說神話，而把我們的宣傳附會上去，禁止作毫無興趣的機械式的、講義式的宣輸。

五、對地主民團及地方政府政策

1. 對地主政策：我們的政策是團結佃農、雇農、自耕農，與中小地主取聯合戰線，使不積極作惡的大地主中立，祇攻擊極反動的大地主，如成爲劣紳、土豪者，不可簡單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號，以打倒劣紳、土豪的口號，事實上亦打倒地主。

2. 對民團政策，民團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紳利用以壓榨平民，擁護自身利益的「架機器，但現時就望要根本消滅這種組織，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政策，是一面對團丁宣傳，使不與土豪作惡（團丁皆是農民）。一面對團總人選，主張由鄉民大會選舉，或用其他適當策略，以正紳代替劣紳爲團總，使民團的勢力，第一步移到開明的小資產階級手上，使不爲農運之障礙。

3. 對地方政府問題，應分別來說：

A 對軍閥統治下的政府，應以反抗或分裂形式，達到要求。

B 對國民政府治下的地方，及國民政治所影響之下的地方，應以民衆要求的形式，取得權利。

六、農村聯合戰線問題

主要的政策，是勿使農民孤立，應該注意利用一切機會，一切所謂社會公益，聯合其他羣衆共同行動，聯合形式可有下列幾種：

1. 在平時可取工、農、商業聯合大會形式，或各界代表大會形式。

2. 在國民會議高潮時，可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各城鄉分會。

3. 在地方有事時，可組織人民保安委員會，至關於農民運動對各方面所取的政策與態度，已包含於本議決案各條之內。

七、對教會所取的态度

在口頭宣傳上，應極力說明教會是帝國主義之先鋒，他們一方面替帝國主義作偵探，偵探中國內地情形、政治、經濟、民情風俗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狀況；另一方面他們又用着和平、博愛等說着好聽的名詞，甚至用一些金錢出來，收買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仰，他們想把所有被壓榨的民衆，一齊都欺壓下去，他們想引導一般被壓榨的民衆，都忘掉他們自身生活實際的痛苦，以保證帝國主義壓榨民衆基礎之鞏固與恒久。但在目前，我們不要造出一個與他們發生實際的衝突的機會，因爲我們所處的環境（他們與軍閥勾結，處處藉口條約保護），使我們祇能取如此一個態度，如果遇着教會，他們明顯的爲惡，如霸佔田莊，壓買民房等的時候，我們便須鼓動公憤羣起反對，我們在此時努力參加。

八、對土匪政策

對於壓迫農民的土匪，當然要盡力反對，就是不壓迫農民的土匪，亦不可能讓他加入農會，發生組織上的關係，祇可使他在農民與

土豪、劣紳鬥爭時，站在中立地位，不為土豪、劣紳所利用，因為若讓土匪混入農會，是易使農民組織腐化而遭外間攻擊口實。

九、武裝自衛

1. 農民現時要求武裝自衛，是必要的，但須注意兩點：

A 不要超出自衛的範圍，如干涉行政，收繳民團槍械等，是防禦的自衛而不是進攻的自衛。

B 不可有常備的組織，因為有了常備的組織，便免不了因權力關係，而時引起與各方面的衝突（如地主、民團、駐防軍……等）。

2. 自衛軍名目可易為自衛團或其他名目，以免引起誤會和嫉視。

3. 自衛團之組織，不要過於複雜，務取其簡單，容易行動。

4. 自衛團之政治訓練尤重於軍事訓練，否則素無組織訓練的農民，在有了武裝之後，很易發生超出於客觀限度以外的行動。

十、農民運動與KMT關係

各種農民組織，不必帶政黨色彩，不必用政黨名義去做（工會名義可以用）。如果已有KMT農民運動工作的地方，我們當與KMT合作，惟農民協會對KMT關係，在組織上應是獨立的，不可成為黨的附屬品。

十一、農村中我們黨的發展

我們的黨在一切農民運動中，應努力取得指導的地位，應在每個最低級的農會內，均有本黨支部的組織，為這個農會行動指導的核

十二、工作方法

我們的農民運動，工作時間還不很長，除廣東外，差不多纔在開始，雖然做了不少的錯誤，却學會了不少的經驗，在以後工作方法上，特指出以下幾個可注意之點：

A 一般的注意：

1. 做農民運動工作的人，必須注意先使他們自己的言語行動，生活服飾農民化，而後始能接近農民，使農民接受宣傳。

2. 要深知民間疾苦，纔能說出農民的要求，要懂得客觀可能行動的限度，纔能引導農民去鬥爭，要會應用聯合戰線的策略，纔能使農民免陷於孤立而失敗。

B 在未工作的地方：

1. 應利用鄉村小學教師或本鄉同志，城市中的本鄉工人，假期回里的學生等，去發起組織，尤其是鄉村小學教師是農村中天然的指導者，當努力取得這部分人。
2. 利用各種重要事件下鄉宣傳時（如「五、卅」宣傳，北伐宣傳），乘機組織農民協會或類似的組織。
3. 設法辦農村補習學校，農村俱樂部或組織遊行講演團、消費合作社……等，以深入農村，發起組織。
4. 應詳細調查該地農民生活狀況，風俗習慣，找到可以接近他們，組織他們的方法。
5. 須注意從許多無組織農民暴民中，去使他從暴動中發生組織。

C 在已有工作的地方：

1. 應特別注意下層工作及秘密工作，村或鄉的農民協會，是農民組織的基礎；村或鄉農民代表大會，要做到能定期開會，會前須有充分的準備，開會時須儘量引起農民發表示見，禁止機械式，講義式的宣傳。
2. 時時調查農民的疾苦及與農民有關的各種方面的現象，能夠不斷的找出農民要求，而引導其有方法的行動與取得農民利益，纔能維繫農民對於組織之信仰與擁護。
3. 對農民要求當設法知道，設法提出，有時客觀環境不能提出時，亦當詳為解釋，並慰勉他不要喪氣，切忌簡單的將其壓下。
4. 必須使黨在農民中的發展，能成爲一切農民運動發展的核心，纔能鞏固農民運動的基礎。
5. 不可貪圖工作便利，倚靠政治勢力，應處處注意使農民相信自己組織的力量。

對於紅槍會運動議案

一、紅槍會是軍閥政治下的產物，是一般中小農民不堪貪官污吏之搜括，苛捐苛稅之剝削，軍閥戰爭之破壞，土匪潰兵之騷擾，以及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破產，土豪、劣紳之魚肉，纔發生這種農民原始自衛的組織，雖然這種組織在發展以後，混入了一些游民分子參加在內，或是他的指導權落在土豪、劣紳手上，然而絕不能說他純是土匪的組織，從過去及現在直隸、山東、河南一帶的紅槍會運動，他的要求和行動，都是直接間接反抗軍閥政治的，他是真正民衆的武裝，他已成爲民族革命中破壞軍閥的一個重要力量，我們必須努力引導這個力量；並要努力使這個力量，不爲軍閥、土豪所利用。

二、紅槍會不僅是民族革命運動中一個重要力量，並且是發展農民協會必須注意的工作。在紅槍會最發達的河南、山東、直隸數省，農民運動與紅槍會運動，尙不能十分劃清楚，惟應注意使農會成爲整個的農民組織，紅槍會成爲農民武裝組織，在眼前須利用紅槍會去發展農民協會，待農民協會的發展普遍充實後，當使紅槍會成爲農民協會之武裝力量。

三、紅槍會是民衆反對軍閥政治的一種力量，但這種力量，必須與別的革命力量聯合，且受別的革命力量之影響，始能減輕其失敗成分與反動性質（因其組織散漫與迷信，故不經戰鬥，且當破壞性而少建設性）。

四、我們應該給他們一點組織的方法和行動的政綱，這個組織方法和行動政綱，應該是極簡單明瞭，十分易懂的。

關於組織方法：第一步我們先宣傳他們聯合地方紅槍會，組織一秘密交通機關，爲各方面互通聲氣，接洽互助之所，這個通信處由我們紅槍會同志負責來做，最初祇是一通信調查機關，漸漸的使他有力的造成一指導機關。

交通機關設立後，第二步便想法召集各地方紅槍會、黑槍會等領袖，開一代表會，形成一簡單的組織，議定一共同行動的政綱，這個共同行動的政綱，不外下列幾項：

A 抵抗土匪。

B 抵抗無紀律軍隊之騷擾。

C 抵抗苛捐雜稅。

D 抵抗拉夫拉差。

E 拒絕行使軍用票，或要求以政府所出紙幣納稅。

F 保護地方秩序（即參加地方自治工作）。

G 監督地方財政公開。

H 反抗貪官污吏。

這些口號，必須換成當地民衆所最易懂的話句。

紅槍會現時的行動，祇能在上列口號範圍以內，祇是自衛的組織，可以要求參加地方自治，萬不可純以這部分勢力，企圖拿住整個的地方政權。

五、不必積極去反對紅槍會的迷信教條，因爲這正是他們所能團結奮鬥的要素，這本是落後農民不可免的現象，祇要求他實際行動

有利於革命之發展。

六、在河南、山東現時的特殊情形，真正農民的紅槍會與土匪性質的紅槍會、土豪利用的紅槍會均是反對張宗昌和吳佩孚的。我們自然要使他結成反對當地軍閥政府的聯合戰線，同時須鞏固農民真正的組織。

七、紅槍會的指揮權是常常容易落在土豪手中，變成土豪利用的工具，土匪性質的紅槍會，又常常成爲土豪最得力的基本羣衆，戰鬥力亦以他們爲最強，我們對他的政策是：如不能把他結合在反對當地軍閥政府的旗幟下時，須先取得其羣衆，第一步使真正農民的紅槍會，不受其虛聲恐嚇，能够壯膽的獨立存在。第二步努力使土匪性質的紅槍會，不爲他所用，反而站在農民方面去攻擊土豪。

〔商人運動議決案〕，主張組織中小商人，反對大商賈辦階級，約八百字，內容空洞，略。〕

婦女運動議決案

看了中央婦女部的報告，婦女運動在各地都有相當的成績，婦女運動已在民族解放運動中，表現了相當的作用，不過同時又發現出許多缺點，如祇有機關活動，而少深入羣衆。廣東、北京不注意黨的發展，出版物太單調、太政治化等。因此今後我們的婦女運動，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注意羣衆 過去在許多地方，我們都是拿國民黨的婦女部、婦女協會、各界婦女聯合會等機關去活動，去號召羣衆，但結果多忘記了羣衆，沒有打入羣衆，而祇佔據這些機關，遇到某種運動發生時，便借這些機關的名義，去發宣言、傳單、打電報等，因此愈使羣衆懷疑而畏懼。而我們便愈離開了羣衆，我們便愈加孤立，這是我們很大的錯誤。今後我們的工作，固然不能不利用民校、婦女部、婦女協會等機關去號召羣衆，但我們根本的責任是在「號召羣衆」，取得羣衆，決不是佔據機關，形成一種機關運動，因此我們要根本注意羣衆的工作。

二、聯合戰線 現時在婦女羣衆中，也因階級化分的影響發生派別，尤其是在廣東，因此在婦女運動中，對於各種派別的婦女間之聯合戰線問題，成了很重要問題。在過去，我們對於這點未免太主觀了，我們往往祇顧自己行動，祇提出自己的口號，而很少注意到各階級婦女羣衆的利益，各派婦女團體的主張，結果我們成了很單調的、孤立的活動，而喪失多數羣衆的同情，這也是過去錯誤之一。因此我們今後應該特別注意各階級婦女及各婦女團體間的聯合戰線，要建立這條聯合戰線，我們便須注意：（一）多注意婦女本身的利益；（二）遇各種運動時，須相當的尊重其他婦女團體的主張；（三）避免包辦的形勢，及各種不必要的衝突。

三、勞動婦女和女學生 應該怎樣注意勞動婦女和女學生，我們在第四次大會及去年的擴大會議的決議案上，曾經說過，可是各地至今還很少有成績，有些地方甚至還很少注意，如北京、廣東、湖北等，這是很壞的現象。我們須知，勞動運動是我們一切婦女運動中骨幹，女學生在現時是一切婦女運動中之一種工具，我們如果對於此兩種運動沒有成績，那對於其他的一切婦女運動都是空談。

四、農村運動 現時還祇是開始，但當農民運動，正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往前發展的時候，將來的農婦運動，在中國婦女運動上，一定要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們此時雖不能有怎樣具體的計劃，但我們至少要開始嚴重注意這個問題，開始準備作農婦運動的人才，尤其是廣東和湖南，須特別注意。

五、婦女出版物的婦女羣衆化 最近在各地婦女出版物一天一天的加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可是這些出版物的內容，不是千篇一律，便是太政治化或太籠統的理論化，而很少能代表婦女本身說話，表現婦女的真正痛苦和實際要求，因此以後各地，我們自己的及在我們指導之下的婦女刊物，均須力謀改良，切戒空洞的政論和其他空洞的理論，多描寫婦女的切身痛苦和實際要求，務使每個婦女看到，都感覺爲她自己說話，祇有這樣纔能收到對於一般麻木婦女宣傳和鼓動的效果。

六、整理各地婦女部及婦女運動委員會 各地現時雖有婦女部和婦女運動委員會，但多很不健全，故都不能指揮各種的婦女運動，我們今後要想加緊進行婦女運動的工作，整頓各級婦女部和婦女運動委員會，是一個先決問題，各級黨部，須特別注意此點。

七、發展黨員和養成婦女運動人才 自上次擴大會議後，女黨員雖增了不少，但是比較起男黨員的數量來，還是差的多，並且祇限於上海、湖南一二區域，其他如廣東、湖北、北京等地女黨員的數量，簡直發展非常之慢，這是很不對的。以後各地須特別注意女黨員的發展。至於婦女運動的工作人才，更是缺乏，以致各地婦女運動的工作，都感覺進行困難，因此養成婦女運動的人才（尤其關於女工、農婦運動的人才），也是目前各地黨部最重要的責任。各地黨部在可能範圍，可開辦婦女運動訓練班或婦女運動特別討論會，或召集負責及可造就之女同志，與以經常的訓練等。

學生運動議決案

在民族革命運動中，革命的學生算是一種重要的成分，在五卅運動、五卅運動，都可以看出，因爲他們在客觀上，大部分是瀕於破產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在主觀上，學校生活中有易於接受革命宣傳的知識與機會，今後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工人、農民之次，便算學生是重要成分，不獨學生要在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中有力量，必須自身要有學生的聯合戰線，以集中學生羣衆的勢力。

過去，我們在學生運動中，也曾注意到學生的聯合戰線政策，即統一學生聯合會，在北京、在上海都收了相當的效果，在他處或未採用此項政策，或表面上採用此項政策，而無適當的方法應用此政策收得效果。

今後當依左列原則，決定適合各地實際情形之策略，以鞏固並擴大學生的聯合戰線。

1 在各校學生羣衆中努力宣傳學生運動統一的口號，不分主義、黨派、宗教的組織統一，主張統一，行動統一。

2 所謂學生的聯合戰線，所謂學生運動統一，決不是說，要各派學生都聯合統一在我們的主義主張口號之下，而是由我們向學生羣衆提出各派學生之大多數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革命口號與主張，以統一學生運動。

3 所謂主張統一，乃是行動上的主張之統一，而不是思想上的主張之統一。因此，在一切實際運動中，我們固然祇能提出大多數學生所能够接受的口號與主張，以擴大學生的聯合戰線，以統一學生運動，而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傳上，仍應儘可能的列舉各種具體事實，宣傳我們的革命理論與策略之必要，在思想上影響學生羣衆，以取得我們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

4 我們固然要與國民黨左派學生親密的合作，在一切對外的政治鬥爭和學生自身利益的鬥爭，都必須十分懇切的邀請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及基督教的學生合作，以暴露其領袖之無能，使其羣衆左傾。

5 我們的力量，應在各學校學生羣衆中、學生聯合會職員，我們祇須聯合左派占過半數已定，必不可取包辦形式。

6 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傳上，我們對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及基督教派絲毫不能讓步，惟所謂不讓步，乃指事實分析與理論辯駁而言，不可輕以反革命、反動派等惡聲相加；在私人關係上，尤不可失了友誼的態度，致惹起無黨派的學生不快之感。

7 我們對教會學校的態度，祇能攻擊宗教教育，而決不能攻擊整個的教會學生。

8 我們在各校的同志，宜努力學校功課及注意學生生活，如學生俱樂部、講演會等，儘可能的不脫離本校學生羣衆，然後纔能够建立我們在學生羣衆中領導地位。

對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議決案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一年的奮鬥中，組織上有了很大的發展，且漸能接近青年工人羣衆，吸收了一部分革命的青年工人，工作上頗能儘領導學生工人及一般青年羣衆參加黨所領導的政治運動，這是擴大會認爲滿意的。

但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一領導青年作本身利益鬥爭和一般文化運動，及在黨指導下作政治鬥爭的青年革命組織，過去中國共產主

義青年團，仍是沒有盡到本身的使命，未能青年羣衆化，這是以後應當注意改正的。

自去年「五、卅」運動後，中國工農和一般國民革命運動，均有極大的發展，因階級分化所發生的反動思想和組織日漸擴大，甚影響於青年羣衆，這時團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和青年本身利益上，去獲得更廣大的青年工人、農人和學生羣衆，領導他們在黨的指揮下，去參加目前的革命鬥爭。爲此，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獨要繼續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多吸收革命的工人、農人和學生，和其他被壓迫的青年份子，使團的組織深入下層青年羣衆，而且要力求工作青年化，因爲沒有關於青年切身的工作，團組織是不會深入青年羣衆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放鬆應有的政治活動。

中國學生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革命作用，仍將繼續擴大學生運動，若能在我們指導下而發展，這對於黨以後的農民運動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運動，必有很大的幫助，今後黨應與團切實指導，但團切不可因學生運動的政治指導，轉交於黨而減少其積極活動的成分，反而影響於學生運動的發展。

黨與團雖然經過一次年齡的分配，但仍有許多地方沒有黨的組織，另有許多新的地方宜於先發生黨的組織，在這許多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團應負責幫助黨，以發生黨的組織，在黨沒有組織之前，且須執行黨的各種決議，同時在有黨而無團組織的地方，黨應幫助團發生黨的組織。

團既應注意組織與工作青年羣衆化，在這工作進行中，黨應更加多量的指導與幫助。黨在工人運動中，應注意青工、童工工作，特殊經濟利益的擁護。黨對團的指導與幫助，須注意保持團獨立精神，不可處處干涉團的行動，反而阻礙其工作的發展，各地須注意整頓下層黨與團的組織關係，不宜任意調用團內負責同志，凡是兼團員的黨員，應積極參加團的工作，以盡領導團員積極活動的責任，同時團應注意從工作中培養積極活動分子，以充實下層指導力量。

總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後的工作，應注意求其青年羣衆化，同時黨應視團的工作，即黨指導下的一部分工作，而加以切實的指導與幫助。

濟難運動的議決案

濟難運動爲實現聯合戰線的一種工具，此種運動，直接可以聯合各階級、各黨派反抗軍閥與帝國主義之暴行；間接可以引起大羣衆，參加或同情於革命運動。各級黨部應重視此項工作，並切實執行以下數事：

1. 各級黨部應在各方面幫助濟難會之組織，使各該所在地方成立正式分會，其分會已經成立，應設法促進其發展。
2. 督促全體黨員積極參加濟難會為會員，並在可能範圍內，擔任濟難會的各種工作。
3. 凡在本黨指揮下之團體，應引導之使加入濟難會為團體會員，並使其分子完全加入濟難會為個人會員。
4. 各級黨部須在委員會中或黨員中，指定濟難運動委員會或特派員，擔任各該區域內之濟難運動。
5. 各支部須在各學校、各工廠、各機關及各市區中，指定相當同志至少一人為負責人，擔任各該學校、機關、工廠或市區內濟難會會務。
6. 在各大城市及大工業區域中，須在濟難運動委員會或特派員之下，設各種羣衆組織委員會，以分擔任各種羣衆中之濟難會之組織如工、學、農、商、婦女、兒童等，此項委員會應使之與黨的各種運動，發生密切關係，其負責者遇必要時，應當參加各該種會議運動負責同志之會議。
7. 各級黨部應會同濟難運動委員會或特派員，制定各該地方濟難運動詳細計劃，並經濟預算呈報中央核准，此項計劃之制定及負責人之指派，須於本年八月內寄到，至遲不得過八月底。
8. 濟難運動委員會或特派員，在政策上須完全受黨的指揮，中央濟難運動特派員對於各地的指揮，應經過各地區委或地委，如果是沒有黨部的地方，則暫由中央濟難運動特派員直接指導。
9. 黨部應定期召集濟難運動負責人出席會議，使之了解黨的活動之全部，以為濟難運動之參考，一切濟難運動政策之規定，重大問題之解決，以及用人之指派，黨部須交濟難運動特派員或委員會擬議而決定之。
10. 黨員擔任濟難會工作時，均須用公開名義，並受公開機關之委任，最好為大會當選之職員。
11. 同志應在各公開的濟難會中，擔任實際工作之職務，而不必取過高的位置，此項較高位置，應以非黨員之左傾分子充任之。
12. 各地公開機關之職員同志及左傾分子，須佔大多數，但同志不得過三分之一。
13. 同志之在濟難會工作者，應切實與非黨員分子合作，不得包辦一切，在可能的範圍內，應將工作情形公開報告。
14. 濟難運動負責同志，將其活動情形，按月報告黨部轉呈中央。
15. 各地濟難運動負責同志，關於濟難會之宣傳，其態度應灰色，文字應通俗，更應注重地方問題。
16. 各地如有反動的壓迫發生時，應用濟難會的名義，召集各界、各團體作堅決的反抗，同時應將該項事件發生之真象，連同照片報

告濟難會全國總會，以便作廣大的宣傳。

17 全國之總宣傳機關（光明半月刊及濟難畫報），各地濟難運動負責同志，應設法為之徵集材料，濟難會總會之臨時的新聞宣傳、通電等、應設法在當地報紙發表。

18 各地之被難者，不論其黨派、階級、宗教之別，同志皆應詳細調查，報告濟難會及其上級機關，請其適當的救濟。

19 各地工作同志，應當遵守公開濟難會之章程規定，不得任意變更，以引起反對者之藉口。

軍事運動議決案

一、中國目前是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與反動軍閥武裝衝突的劇烈時期，在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中，客觀上至少可以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同時反動的軍閥，又因彼此敵視和軍隊中的內部衝突，與雇傭兵之因過分虐待而離異，使我們易於在反動軍隊內部進行工作。

鄉間有許多窮苦農民，秘密武裝組織，且已開始暴發有政治意義的武裝暴動，如河南、山東紅槍會之種種行動，就是一例。

城市工人階級鬥爭中，亦常常發生與工賊武裝衝突的事件，南北鐵路工人，都漸能於內戰中表現他們的作用。

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羣衆的武裝勢力。同時此項工作，就是使本黨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

從前我們同志不注意軍事運動，表示研究性質團體的色彩，最近本黨同志雖然注意軍事運動，却偏重於運動上級軍官，表示未能了解本黨目前軍事工作的責任，和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的意義。

二、過去半年的工作，祇形成了中央及各地工作機關及其相互之關係，對於收集材料和工人自衛團的進行獲得相當成績，除在進步軍隊中做了相當的政治宣傳工作外，對於反對軍隊中的工作，多半注意上級軍官間的衝突，未能與下級官佐和兵士羣衆發生關係，對於武裝農民團體（如紅槍會等）尚未開始有計畫的工作。

三、此後應設法在反動軍閥的軍隊中，組織能受我們指揮的兵士支部，並與兵士羣衆發生關係，利用軍隊中日常事故，口頭的或文字的宣傳兵士羣衆。同時應用全力在兵工廠、軍械局等處活動並組織支部，務使反動軍閥不能利用這些武器。對於農民武裝團體，應首先注重訓練他們下級領袖，特別是政治訓練。至於工人自衛團的進行，不在人數的擴充，而在從政治上和從軍事上訓練工人自衛團的中

堅分子。

四、對於國民革命軍和國民軍，如果我們派人去作政治工作，便須取「少而好」的主義，如果有人去當軍官，其責任必須是使這個軍隊愈漸團結和愈漸革命化，極力避免革命軍隊的過早分化，他們的行動須完全依照當地黨部的指示。

五、軍事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軍事工作負責同志應與當地黨書記發生密切關係，向書記報告工作情形，並和書記商量自己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八日——著者註。）

在北伐過程中，由於蔣總司令卓越的指揮，士氣的高昂，人民的協助，及軍閥的腐敗，進展甚為迅速：

七月，敗趙恆惕，克長沙，定湖南。

八月中，大敗吳佩孚於汀泗橋，十月，下武昌；定湖北。

十一月，大敗孫傳芳於南潯鐵路，克九江、南昌，定江西。

十二月，敗周蔭人，克福州，定福建。

十六年二月，克杭州，定浙江。

三月，敗直、魯軍褚玉璞，張宗昌於滬寧鐵路，克上海、南京，四月，克蚌埠，五月克徐州，定江蘇。

三月，安慶守將陳調元歸誠，定安徽。

五月，武漢方面唐生智，西北國民軍馮玉祥會師於鄭州，定河南。

歷時不及一年，半個中國已入國民革命軍之手，而中共竟於此時在武漢把持黨政機關，發動反蔣運動，造成寧漢分裂之局。

（註一）「指導」一六一期，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註二）以上「政治訓練部組織大綱」、「黨代表條例」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等件，均見「革命文獻」第十二輯總一八四至一八二一與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二等頁。

（註三）見「革命文獻」第十二輯總一八三一頁。

第二節 武漢聯席會議（註一）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武漢方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簡稱「聯席會議」），乃俄國顧問鮑羅庭所導演，其目的在排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先生。

是年五月，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時，本已由蔣中正先生與鮑羅庭取得協議，但鮑僅係一時的退却，伺機反攻。當大會閉幕時，一具有中共黨籍中委，無意中透露鮑羅庭之指示稱：「這次退却，不是失敗，一年以後必定反攻」，其目標顯為蔣先生。

北伐軍興，勢如破竹，蔣總司令威望震動中外。師行所至，由於中央授總司令以戰地軍、政指揮權，其權力甚高，尤為鮑羅庭所忌。

革命軍於七月北伐後，鮑羅庭即發起「迎汪」運動，並開始反對當時代理中常會主席張靜江及組織部長陳果夫，而包圍代理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及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一日，張靜江召鮑羅庭至寓，責之曰：「總理請俄國派顧問來是幫助中國革命，不是破壞革命，而你們的行爲簡直是破壞革命。」並指出迎汪倒蔣及挑撥陰謀。鮑矢口否認，但稱：「這是外間對蔣先生空氣太壞，所以有些人主張要汪回來負責」。張說：「空氣太壞，就是你們造出來的！」並告以：現在前方戰爭緊要，決不能動搖國本。時延闓在座，亦加以指責。鮑颯然認錯。

十月，在中共份子吳玉章主持之下（註二），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市黨部聯席會議，蔣總司令自前方來電，請汪、胡歸國共負革命大業，致鮑與中共無法提出他案，而決定「迎汪復職」。時武漢已光復，此次會議並決定遷都武漢（註三）。十一月九日南昌光復，蔣總司令駐節於此，中央黨部及國府委員亦紛紛至此集會，決定中央機關暫駐南昌，主持裁定東南大計。鮑羅庭與外交部長陳友仁、司法部長徐謙、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等及部份中委則去武漢，十二月十日抵達，開談話會，由鮑提議，在武漢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執行「黨的最高職權」，於十三日成立。出席者有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王法勤、鮑羅庭

等。會址初設武昌，旋遷漢口南洋大樓，以徐謙爲主席（葉楚傖爲秘書長），而聽命於鮑。徐謙係於八月下旬由蘇俄至廣州，充馮玉祥代表，在鮑羅庭支持下，提倡所謂「黨紀的革命化的司法」，取得司法部部長職位。鮑欲藉徐聯馮以抵制蔣先生。先是，馮玉祥爲獲取俄援，去莫斯科，由李大釗介紹毛以亨與馮，作爲外交助手，徐亦偕行。九月，馮由俄返西北，誓師五原，響應北伐，加入國民黨，其政治部主任則爲共黨份子劉伯堅。馮原爲軍閥，另成系統，不屬於國民黨軍總司令。

民國十六年一月一日，國民政府發佈以武漢爲首都命令。

黨政「聯席會議」，既係臨時組織，且於法無據，其所爲決議，自不足以執行「黨的最高權力」。徐謙在該會議席上致詞，謂係「適合革命利益，應付革命時機，代表中央權力之必要組織」，亦不敢稱爲合法化。蔣總司令爲避免黨的破裂，於十二月中旬，尙兩電武漢，支持聯席會議。至十六年一月三日，鮑羅庭至武漢提議，以聯席會議名義代政治會議提議，定於三月一日召開三中全會，更提出所謂「提高黨權運動」。時黨、政、軍最高負責人：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蔣中正，常務委員代理主席張人傑（靜江）、政治會議主席蔣中正、政治會議代理主席兼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在國外），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總司令蔣中正，尙有一部份中委及國府委員均在南昌。一月四日晚，蔣主席召開一聯席會議，決定國民政府設南昌，準備於東年底定時遷至南京，令漢口各委員前來。並指定前江西高等學堂，即元年之李烈鈞之都督府，爲政府辦公處，以百花洲之陳列所爲中央黨部辦公處。南昌政治會議又決定：三中全會於三月一日在南昌舉行，武漢之「聯席會議」應予結束，另成立武漢政治分會，令宋慶齡、宋子文、孫科、陳友仁、蔣作賓、陳銘樞、唐生智、鄧演達、王法勤、李宗仁、劉驥、董用威組織之。但鮑羅庭堅決反對，仍固執國民政府必須遷至武漢。蔣先生於一月十一日至十九日且有武漢之行，武昌總部會開一盛大之歡迎會。鮑羅庭即席演講，謂：「吳佩孚壓迫農工，他的結果你們已經看見了，以後若有人想以吳佩孚的手段對付共產黨，那是萬萬不行的！」其言外之意顯係威脅蔣先生。

二月間，戴傳賢去武漢，約鄧演達至南昌。時演達爲總政治部主任，代理軍校武漢分校校長。總政治部爲中共份子

廢積之所，秘書處長朱代杰亦中共份子，而爲演達之左右手，被總司令免職，演達心懷怨望。迨演達赴贛，中共份子即在武漢造謠，謂已被蔣先生扣留；及演達安然返鄂，又謠稱其幾被槍斃，幸設法逃出，軍校總政治教官共黨份子惲代英竟向演達當面造謠，謂他們得確實消息，總司令一定要殺他。自是演達益不自安，而日與中共份子陰謀反蔣。

二月二十一日，武漢即宣佈中央及國民政府在武漢正式辦公，並增選唐生智等爲政治委員，在武漢成立政治委員會。時唐在武漢，擁重兵，懷異志，欲藉俄人之力以取代蔣先生。南昌中央，以武漢聯席會議未行結束，乃電請第三國際自動撤回鮑羅庭職，無效，鮑益無顧忌，而決於三月十日在武漢召集三中全會。

鄧演達隨戴傳賢至南昌時，共產黨派謝晉隨來，歡迎中央委員至武漢開會。謝晉住譚延闓家數日，說延闓前往，延闓爲所動，至此，蔣中正先生亦勸其他中委及國府委員前往。行前，蔣先生設餞，即席致詞，痛陳中國革命原以求國家之自由平等，今蘇俄顧問指使共黨到處破壞革命進展，非但得不到自由平等，倒好像先亡了國，由蘇俄派統監宰制中國，如果武漢方面都願意，我也誓不願意。並謂：三中全會如能於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逝世紀念）舉行，我決定參加，再早，我就不能去了。全座肅然，李烈鈞、柏烈武至於泣下。

七日，在南昌委員一行至武漢，武漢方面派小輪船來迎，僅迎譚延闓一人，李烈鈞自行跨入，餘人悉置不理。當日，開預備會議。決於九日開正式會議，延闓力爭十二日開會，不能得。於是蔣先生被排於會外，而三中全會議題，在鮑羅庭操縱之下，竟以反蔣爲中心。其事去中山艦事件恰爲一週年，鮑羅庭「一年以後必定反攻」一語，絲毫不爽。

自一月三日「聯席會議」提出「提高黨權案」後，反蔣運動即開始醞釀，同時不斷宣傳迎汪。對此，蔣總司令曾加以駁斥，轉錄於下：

蔣總司令駁斥武漢聯席會議之演詞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南昌行營總理紀念週講

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份同志，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黨權本是最高，黨權本是集中的，那一個

要剝削黨權，使黨不能自由行使他的黨權的，就是叛黨的叛徒。黨權無所謂提高，本來是最高的；黨權也無所謂集中，本來是集中的；今日提出集中黨權、提高黨權的口號，不過拿這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志，做他們真正要想把持黨權的武器就是了。中正是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的主席，而且是政治會議的主席，就是最高的政治機關主席，對於擁護黨權，擁護我們國民政府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我敢說決不使得黨權分散和旁落，為一人或一派來操縱或利用，這是我們黨員無論誰也有監督的責任。現在有人主張集中黨權和提高黨權，究不知黨權分散那裡？是那一個人來剝削我們的黨權？現在有人說本黨頗多獨裁的傾向，恐怕會發生拿破崙的覆轍；還有人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有最高權的，不能有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並立之機關。這一句話，不曉得是指那一個機關說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是最高，誰也不能增多一點，誰也不能減少一點的，無論誰也不能搖動的。現在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限有衝突的，我以為沒有第二個機關；如果有，就是現在漢口的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是沒有根據的，如要提高黨權，就要取消漢口的聯席會議；不然就是沒有黨，也沒有政府了。而他反要來命令黨和命令政府，這樣還有黨的紀律嗎？還說能提高黨權、集中黨權嗎？政治會議是最高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會議明令取消漢口聯席會議，要他在武漢組織一政治分會；而該聯席會議却不遵照命令，置之不理，還繼續開會，黨權還能夠集中麼？如果隨便設有機關，他自說是最機關，這樣不照黨章，不守紀律，那和西山會議有什麼分別？這樣下去，黨的權威自然會一天一天喪失的，一般的黨員對於黨的信仰和權威，也自然會漸漸失掉的。

現在還有人說我們黨裡有獨裁的傾向，這句話不曉得是指那一個？如果是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呢，那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是他自己產生出來的，也不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他的權限的確是很大，可是他的權限是中央黨部和政府授予他的，他是受黨的命令，就是順從黨紀；今日所謂他的，是不是黨命令他的。我以為只有徐謙是獨裁制的，他以沒根據的漢口聯席會議，自居主席，不受黨的命令，這才是獨裁制。至於旁的，無論那一個軍長，或無論那一個機關，決不會獨裁制的。中正是政治會議的主席，凡是政治會議所議決的事情，可以請問一問政治會議的各委員，還是大家公決的？還是中正獨裁的？中正要是獨裁的傾向，成為獨裁制的時候，那就是失了民主政治的精神，就是違背了我們黨的紀律，中正就不算是總理的信徒，而是黨的叛徒。既是黨的叛徒，任何人都可以懲辦我的，任何人都可以槍斃我的。

本黨有本黨的根據，如果硬要抹煞本黨的歷史，這個不行的。本黨是有本黨的精神，有本黨的目的，也有本黨的主義的；假使不管本黨的歷史，隨便漫罵，對於年紀大些的同志，總理最誠實的信徒，偏要破口罵他是反革命，或咒罵他的昏庸老朽，我想這樣無異於分散我們的黨，排斥我們最忠實的同志，而使革命難以成功。我講這種話，我相信不是出發於封建思想，我完全是站於歷史觀點上來說的。中國國民黨的光榮歷史，如中正存一天，一定要保持一天，不能把總理所相信，所敬重的，最忠實的同志一概抹煞，隨便加以罪

名，使他們不能夠革命，沒有革命的餘地；這樣不是中國國民黨同志應取的態度，應有的行爲。凡是本黨的同志，應該互相監督，互相規勸，不好的地方，老實儘有鐵面無私的責備；但是責備要有理性，要根據本黨的歷史和環境，以及革命事實，方能使本黨同志團結起來，親愛起來，這樣才是忠實的黨員同志所應該的。如果無意識的、懷恨的、以個人的感情作用，詬斥其餘的同志，那就不算是真心的黨員，乃是本黨的敗類耳。我們要保存國民黨的光榮歷史，實行總理遺下來的政策。至於總理平生所最尊重的，最敬愛的同志，我們要同總理一樣的尊重他，敬愛他，對於任何同志不能隨便意氣或感情用事，以敗壞本黨，妨礙國民黨命之完成。

我在本特別黨成立大會時說的汪精衛同志、譚祖安同志、張靜江同志這三位主席，乃爲本黨和國民政府及一般同志以及總理在生前最信任、最親愛的。如果這三位主席批評中正有不好的地方，如說中正違反黨紀，或有反革命的行動的時候，只要他們三位主席簽名，隨便以什麼罪罰我，我必毫無遲疑，完全承受。倘有人來破壞革命，擅造是非，毀壞本黨的時候，那便要問一問本黨全體同志及本黨最公平高尚的監察委員會，中正對於黨是否違反總理的政綱和政策？有無違反總理所遺留下來的遺囑？是否有獨裁的傾向？至於說汪精衛同志和中正合作的事，那更不要旁人來說話。汪精衛同志和中正的關係，我們兩個人是如手如足的，可以說我們是最親愛的同志。如果有人硬使我們兩人不能合作，故意造出一種空氣來，名義要汪精衛同志出來，而事實上不願意他出來，阻礙他出來，使他不能銷假，使我們兩人不能合作，這樣決不是忠實同志要使本黨團結的行爲。真正的同志要顧到我們黨的歷史，要顧到我們黨的領袖和關係，以及黨的領袖的人格；如果中正想一個人把持黨，不要汪精衛出來，中正便是沒有人格，誰都可以來殺我的。我相信汪精衛同志一定可以同我團結到底的。我們兩個人的感情道義，無論爲公爲私，並沒有什麼阻礙；唯一的阻礙就是現在許多故意造出一種空氣，使得他不能夠出來銷假。凡是東方人總是感情作用的。無論什麼樣，如果以汪精衛同志爲口實，而要出來排斥我中正，或可藉此以爲推倒我中正的武器，這樣子決不是好意要汪同志出來；不過利用我們二人的弱點，使得我們國民黨領袖不能團結就是了。前一回中正打電報給汪精衛同志，那原電稿在報上已經發表了，那樣懇懇的哀調，我對旁人是不肯講這話的，因爲汪精衛同志同我的歷史不是浮浮泛泛的關係，我方肯講這最懇切的話，希望他趕緊回來。怎樣能使黨的威權高起來的問題，不是個人問題。現在黨對於黨員沒有威權，即因黨員對於黨沒有堅強的信仰；這沒有信仰的原因，並不是組織不良，紀律不嚴，亦不是領袖不能團結，實在是黨裡的分子複雜之故。究竟那個是真正的黨員？那個是跨黨的黨員？究竟那個是忠實的中央執行委員？不說諸位同志不明白，要懷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了。如此，所以弄得大家沒有一個堅強的信仰，就是不能夠互信。譬如中央有一個決議，有一個命令，或委一個幹事，有許多同志來問這個決議，這個命令，這個幹事，究竟是那一個執行委員提出的；這個執行委員究竟是跨黨份子不是？這個會議，這幹事是否是真爲本黨的？

這個壞疑之點不明白地解決，怎樣使黨的權威確實提高呢？這話中正並不是講我們和共產黨合作，如果我不想同共產黨合作，那我去年不會提出整理黨務案來了。去年提出整理黨務案，爲什麼呢？就是爲了兩黨可以有合作，使本黨同志對我們的黨有堅確的信仰，使大家開誠布公，可以通力合作，這就提高本黨權威，集中黨權的根本問題。現在還有一種語言，說中正現在對於共產黨的同志有不用，并有反對他們的傾向。其實並不能這樣說的。中正並不會反對共產黨，中正正是向來扶助共產黨的，各位同志看看我前年在黃埔的講演詞，就可以明白。前年黃埔第二期學生部成立的時候，當時一般學生對我有一種非議，說校長是偏袒共產黨的。我當時有一句話對他們說：「我並不是偏袒共產黨，我是扶助中國弱小的革命團體，來和本黨共同革命，增加國民革命的力量。」因爲這時候共產黨同志爲數很少，他們對黨對學校都很忠實誠懇。共產黨既是一個革命的團體，我們要扶助他們，所以不許大多數的國民黨黨員壓迫他們。但是我也會附帶的有一句話，就是說「將來共產黨強大起來了，如其黨員有跋扈強橫的事實發現，那我一定要糾正他，並且一定要制裁他的，也要以今日對待本黨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現在共產黨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並且有排擠國民黨黨員的傾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這樣我是不能夠照從前一樣的優惠共產黨了；如果還同從前一樣的態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國民黨的地位，我就不能做國民黨黨員。我如立在國民黨黨員的地位，我便當有國民黨員的態度；並且我是一個國民黨的領袖，我要團結國民黨革命的勢力和精神，我們的態度要持正公平。在他人看，以爲我或左或右，態度和主張沒有一定，其實國民黨的領袖，誰也信仰他是革命的。只要他是革命，對於主張是不變的，那他的態度和行動，就無所謂左右。如果今日左派壓制右派，那我要裁制左派；倘使一日右派跋扈的時候，我也是一樣的制裁。各位同志假使要想國民黨革命成功，革命的勢力就要團結集中起來；但不是一句話隨便就可以集中，可以團結的。同志中如果是三心兩意、陽奉陰違的，那革命勢力便要分散，革命事業就要失敗。革命事業的失敗，不但是國民黨員失敗，共產黨亦要連帶的失敗。共產黨員對待國民黨員如同近來這樣排擠壓迫，我以爲決非共產黨之幸。如果共產黨員不幸錯誤而至於失敗，這失敗並不是共產黨一黨失敗，乃是中國革命勢力的失敗。我是中國革命領袖之一，所以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說起來，共產黨的成敗，我要負一分責任的。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勢力之一部份，所以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所以我立在革命的領袖的地位上說話，對於一般的黨員，對於革命的勢力，隨時隨處要顧到的，如今說我對於共產黨的態度不好，甚至說我反對共產黨，這樣就着錯了；我並不反對共產黨，我對於共產黨並不是不好，我對於扶助共產黨的思想與前無異，因爲我要糾正他們，就是要使得他們不來壓迫國民黨黨員，並要希望共產黨不使國民黨黨員太難堪，生出一種衝突破裂出來，而希望他們真正能同國民黨黨員奮鬥，合作到底。如果還同從前一個樣子，不單是使得中國革命勢力不能團結，而且

一定要使革命勢力一天天在給敵人消滅那一方面走去，這樣就是增加敵人力量來消滅自己革命勢力。凡是中國國民黨黨員都要明瞭我這個意思。中正不是排斥共產黨，不要以中正對共產黨的態度，來做各同志的態度，中正自有中正的地位，中正自有中正的態度，在這個革命期間，兩黨一定要奮鬥合作到底的。只要共產黨黨員對國民黨黨員不加一種壓迫，國民黨黨員對於共產黨黨員的態度，還是要同從前一樣的。這一點，國民黨同志同共產黨同志必須要明白。現在革命的環境一天好似一天，革命勢力能够集中團結起來，革命成功就在目前；如果像現在這個樣子，同床異夢，兄弟鬩牆，那樣下去，就是沒有敵人來打我們，我們自己也會失敗。今天紀念週中間，中正有所感懷，我們對於總理要負責任，對於本黨更要負責任，所以對於各位有這個貢獻。還有一點，各位要曉得，獨裁制的傾向，如果對我而言，那完全是不明白事實的人說的。各位一定曉得革命軍總司令不是同北方或其他的總司令住在後方，一天講笑話，刮地皮，自私自利來亂幹的；我總司令是在最前方指揮陷陣拚命犧牲的。各位同志為什麼要交這種大權給總司令？黨為什麼相信我中正，委任我為總司令？總理為什麼要以軍事責任完全交托中正？因為軍政時期，軍權不集中，必要為他人來牽制，並且易招人妬忌、齷齪、陷害，如同近來發現的毛病一個樣子，使革命受許多障礙，不能成功，所以不能不授他的特權。因為要他負這個重大責任，因為要他不惜犧牲，所以不能沒有一種特權，而且不能不信任他，亦不能不監督他。如果一方面要負責任，而一方面却要懷恨他、妬忌他、反對他，這樣對中正個人是沒有什麼要緊，就是許多人說中正將要成爲一個軍閥，我果真成了軍閥的時候，那是本黨要怎樣處罰中正，就可怎樣處罰的，這不是一個黨員的關係，是全黨全國的關係。至於中正個人的地位，無論何時可以下野的；在主席的地位，無論何時也可辭退的，並且在今年主席和總司令職務已向黨部與政府堅辭了幾回；如果我願意做總司令，那末我就不是蔣中正；做總司令比奴隸還要痛苦。同志們不明白這點，反加以齷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對於中正個人的關係小，對於全黨的關係才大。如果中正能將總司令的職務早一天交卸下來，便早一天得到自由；如果本黨允許我交下來，我是決不戀棧的；如果中正有一點違反命令的態度，中正便是總理的叛徒，隨便那一個黨員都可以懲罰槍殺我的。我說這一番話，是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南昌行營總理紀念週講的，中正如果以後有反革命的行爲，各位同志不必信仰我，隨便那一個可以當作我是一個沒有人格的人，不是總理的信徒。今天所講的話，就是一點，如果各位有什麼意見，或有以爲對的，請各位批評，可隨便講話。（錄自國聞週報第四卷第十六期）

（註一）本節參考資料：①「蘇俄在中國」四五至四六頁，②「革命文獻」十六輯總二七八三至二七八九頁，③陳果夫「民國十五年間一段黨史」，

④周佛海「逃出赤都武漢之報告」，⑤毛以李「俄國回憶錄」所涉及徐謙、李大釗部份，⑥蔣永敬「鮑羅廷在武漢變化中國的陰謀及活動」，台灣出版「新時代」二卷四期。蔣君在國民黨黨史會工作，確閱武漢時代檔案。⑦國聞週報四卷三期，十六年一月五日出版。

【註二】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八一頁。

【註三】決議原文未見，據陳果夫「民國十五、六年一段黨史」稱：「十五年」十二月間，靜江先生等依照全會遷都武漢的決議……」此所稱「全會」，當係指廣州聯席會議而言。又據蔣永敏文，謂「決議政府暫不遷移」，當係遷移武漢的時間問題。又，據胡華「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八一頁，當時決定遷都武漢，因為那時兩湖和武漢的民衆運動有很大的發展，號稱鐵軍的第四軍獨立團團長共黨葉挺担任武漢衛戍工作，對中共有利。另據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國聞週報三卷四七期，謂國民政府遷都，經政治會議及中央黨部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決定，幹部準備出頭，公文移至武昌，日期未定。

第三節 武漢三中全会

壹 會議情況

民國十六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会舉行於武漢，到委員三十三人，譚延闓主席，此次全會幾完全由鮑羅庭導演，領導中共，拉攏左派，以反對蔣中正先生爲中心。蔣先生與張人傑、戴傳賢等均未出席。丁惟汾、陳果夫雖至武漢，以其時情勢惡劣，中途避去，據果夫事後追述，當時情況如下：

「開會後第四天，就把正式選舉出來的廣東省、江西省、廣州市三個黨部的委員取消。（著者按：此三個黨部係在陳果夫主持之下選舉，十六年一月選竣，中共份子約佔三分之一，爲中共所不滿。）中山日報登載江西省黨部選舉消息，將段錫朋得票最多，改爲最少。細庵（延闓字）先生要我第二天出席把這件事爭回來，那知主張維持原案的竟爲本黨同志！我當時退席，當天就秘密住起來。（著者按：丁惟汾、李烈鈞旋亦退出。）這時細庵先生才對我說，情勢太壞了。同時外面已有「打倒昏庸老朽的張人傑」的標語。到了「三八」（註二）遊行，又有「打倒蔣介石」，「驅逐陳果夫」口號。過了幾天，標語到處都是。蔣先生在安慶得訊，派人送信來，要我立刻離開漢口到安慶去。我於動身前夜向細庵先生告別，他對我說：你能够自由離開這裡，真是幸運，我已不能像你這樣自由了。初來時，我總以爲不致如此嚴重，那知竟不出蔣先生所料……但我將來總要想法和他在南京見面。」

另據周佛海「逃出赤都武漢的報告」，三中全会舉行之日，發生軍校學生與工人羣衆毆鬥事件。是日，湖北省黨部召集會員大會於漢口血花世界（著者按：原新市場），軍校武漢分校學生應邀參加，遇湖北省總工會糾察隊與宣傳隊開

宣傳會議，提出打倒蔣介石。當時反蔣空氣雖異常濃厚，然尚無人明目張胆喊出打倒口號者。於今軍校學生見工人要打倒蔣校長，乃憤加毆打，取其記錄，捕去工人若干名。結果，代理校長鄧演達，依照黨部決議，處分軍校學生，釋放工人。自是之後，武漢一片反蔣聲，著者會身歷其境。

貳 各項決議案

當時中共與左派所提口號為「提高黨權」，「反對個人軍事獨裁。」三中全會宣言，決議案及對黨員訓令，即以此為中心，並以發動農民運動為控制軍事力量之工具，全會所通過各案，為敘述便利，擇其要者，分類如下：

第一、關於提高黨權者：

(1) 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除說明依照黨章說明黨的權力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外，本案變更中央常委員會組織：常委九人，互選三人組織秘書處，廢止原有常會主席及秘書長制，而主席蔣中正，代理主席張人傑及秘書長葉楚傖之職權被分割。

(2) 改組政治及軍事兩委員會案：常務委員會之下，轄政治及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十五人，由常委九人及就中委與候補中委中選六人組織之，設七人主席團，廢止原有主席制，而主席蔣中正及代理主席譚延闓之職權被分割。軍事委員會由最高級軍官九人至十三人，並選不任軍職之中委及候補中委六人組織之，設七人主席團，廢止原有主席制，而主席蔣中正之職權被分割。似此，在黨、政、軍三方面，均排除蔣中正先生之職權，且將葉楚傖、張靜江、陳果夫諸人排除於黨、政、軍之外，而位置一班中共份子及左派份子。

(3) 統一革命勢力案：本案以組織兩黨「聯席會議」方式，以兩黨「共同負擔政治責任」為理由，以提高中共勢力。本案特別重要，全文如下：

統一革命勢力案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聯席會議須立時開會，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特別是以下各問題：

A 統一民衆運動，特別是農民與工人運動，共同指導。

B 國內少數民族問題。

C 共同負擔政治責任問題——應由共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

D 設法使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與本黨機關報關於兩黨相互之批評與記載不違背合作之精神。

兩黨聯席會議之本黨代表五人，即以中央之組織、宣傳、工人、農民、青年五部長充之。

E 本黨應第三國際之邀請，應即派代表三人參加第三國際會議，接洽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特別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

(4) 統一財政案：以「目前舍粵、鄂兩省外，財政長官均就地委派，故中央財政管理尚無系統可言。」因此，要求「集中各省管理權於國民政府財政部徵收。凡百捐稅，均由財政部集中。」

(5) 統一外交案：決議分爲三項：「a 本黨黨員對外交方面，有擅自發表變更本黨外交政策之主張，或直接間接向帝國主義列強接洽任何條件者，以違背黨紀論，應予除名處分。b 政府職員，非外交當局或未受外交部部長之委托，私自與帝國主義者爲外交的接洽或進行秘密交涉者，一經發覺證實，應即免職查辦。c 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地區，所有外交人員，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地方政府及軍事長官不得再有任免交涉之事。」

當全會開會時，正在漢口「一·三」事件之後，與南京「三·二四」事件發生之前。其時鮑羅庭推動反英運動，漢案後，由於英人退讓，放棄漢口及九江租界，事態未致擴大。及寧案發生，鮑羅庭未始不欲藉以引起國際上更大紛糾，以中國作爲俄國革命犧牲品，賴蔣總司令在長江下游迅速處理，得以遏止。此項「統一外交案」用意，顯在對蔣。（關於漢、寧兩案，詳第七章第三節。）

第二、關於抑制總司令權力者：除上述改組軍事委員會，使總司令不得任軍委會主席外，全會通過「總政治部組織大綱案」及「總司令條例案」。其重點爲改政治訓練部爲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前者受總司令指揮，而後者則否，並藉以牽制總司令。

第三、關於農民運動者，包括農民運動決議案及對農民宣言。關於農民運動決議案，主張設置區鄉自治機關，減租減息，武裝農民。決議文中於指陳農民痛苦外，並謂「有好幾省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加入農民協會之農民已有四百萬人」。又稱；全會「主張國民政府設立農政部，其責任為實行土地改良及農民所要求經濟的、政治的改造與建設」。此一農政部部长，其後即由譚平山擔任。

茲將本案條文部份錄後：

農民運動決議案（條文部份）（民十六、三、十六、二屆三中全会通過）

一、政府應立即着手建立區鄉自治機關，由區鄉居民按照區鄉自治法組織之，管理區（鄉）一切行政、經濟、財政、文化事宜。農民協會應在本黨指導之下為組織與指導此自治機關的中心。區鄉自治法另定之。

二、區自治機關內應設立土地委員會（必要時鄉自治機關內亦可設立之）。由農政主管機關派員及農民協會代表組織之，以籌備土地改良及實行政府所規定關於土地整理與土地使用之各種辦法。

三、所有鄉間不屬於政府軍隊之武裝團體，必須隸屬於區或鄉之自治機關，如有不服從者，即應依照處置反革命條例處辦之。區或鄉之自治機關，應有改組此等武裝團體之權力，使此等武裝團體確能保衛鄉村人民，而為鄉村人民之武力。保衛鄉村人民所必需之武力，如感覺槍枝不足時，政府必設法補助之。

四、本黨聯席會議關於減租百分之二十五的議決，應於本年內完全實行。田租契約應向鄉自治機關註冊，鄉自治機關與農民協會得決定當地最高租額，並監視不得超過。鄉自治機關與農民協會，應廢除一切租約內或租約外之任何苛例，應由政府下令准許親自耕種之佃農，有永久使用土地權；非地主親自收回耕種，不得調用另佃；如佃農自願退田，或地主收回親自耕種時，佃農對土地所增善者，應得相當報酬。

五、區鄉公地及廟產，政府應下令飭其交給鄉自治機關管理；各宗族公有之祠堂地產，須禁止族長或少數豪強份子把持，致違反宗族內貧困（份子）之利益。

六、政府應嚴重懲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者，並應依法沒收其土地財產。此等土地財產之屬於區鄉者，應視為人民所

共有。

七、舊有田稅法則，實為不合理不公平之稅則，急應改革。至於現在徵收於農民之各種苛捐雜稅，為害農民經濟甚大，亦應逐次廢除。政府應從速規定與當地需要相當的劃一的稅率。其他對於土地及鄉村生產品所征之新稅，須一律廢除。如此方可減輕農民之負擔。一切收稅機關應移轉於區鄉自治機關及財政主管機關特派員之掌握，不准劣紳土豪盤踞。

八、為減輕農民高利貸之剝削起見，政府應明令禁止高利盤剝，規定利率，不得高過年利二分或月利二厘，並禁止利上加利。對於農民債務，國民政府農政部應從速確定辦法以解除農民因債務所受之痛苦，並應設法立即組織農民銀行，年利百分之五，貸款與農民。九、為防止地主及奸商濫高糧食價格及救濟天災時之貧農起見，政府應准區鄉自治機關請求農政主管機關，給以管理糧食出口及保存一部份糧食之權。

十、國民政府應加緊籌備以下各問題，預備提出於下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1)付租須經由區鄉自治機關，如此，政府可由租內扣除田稅；(2)實現民主制度之縣政府，(3)組織獨立的民主主義的司法制度，以解決由土地發生的問題及他種問題；(4)解決貧農土地問題之具體辦法。

附帶決議：

(1)下次全會，政府應對於以上各項（提出）實施成績報告；

(2)號召本黨全體黨員，一致來宣傳此項議決，使中國農民全體了解。在各鄉村、各軍隊、各團體中，或用印刷品，或對於不識字者用宜讀方法，務使每人多能了解此項議決。

其次，對農民宣言，強調國民革命與農民關係，原文如下：

對農民宣言（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二屆三中全會於武漢）

經濟落後，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民生活的大部份，還是農業，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中國農民受了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三重剝削，其困苦達於極點！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因此，中國國民革命最大部份的目標，在於使農民得到解放。農民如不得到解放，國民革命斷不能底於完成。中國國民黨為領導國民革命之最大政黨，負有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民國十三年一月本黨改組時，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發布宣言，對於農民問題特加注意。民國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又議決對於農民運動的綱要，同年十月中

央各省聯席會議發佈新政綱，關於擁護農民利益者二十二條。三年以來，本黨黨員從事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引導廣大的農民羣衆，爲擁護自身利益，參加國民革命，組織之廣，幾遍全國，使革命風潮特別擴大，革命進行特別順利，這都是農民受痛苦最深，求解放最切，黨適能擁護其利益，擴大其組織，領導其行動，才能有這樣的結果。

最近各地農民起來的形勢至爲迅猛，特別是湘、鄂、贛三省，短期間內有極大的發展。長江下游及北方各省，以北伐軍的進展，農民必定迅速的起來，成爲擁護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參加革命的第一個行動，除參加戰爭，扶助革命軍得勝利外，就是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在鄉村特權；這個封建地主階級，乃直接剝削農民最厲害的一個特殊階級，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對於農民的剝削，都憑附這個特殊階級，才能達到目的。故封建地主階級，乃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之真實基礎，不推翻這個特殊階級的權力，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雖有形式上的破壞，其使之存在的實質，並未消滅，時常有使革命改變性質之可能。在農民方面，幾千年來被統治於封建地主政權之下，不推翻封建地主在鄉村的政權，則一切經濟鬥爭，如減租、減息等等，簡直無從說起。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個農村的大變動，每一個農村裡都必須有一個大的變革，使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動，在農民威力之下，完全消滅。使農村政權，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轉移到農民的手中，在鄉村中建立農民領導的鄉村自治機關。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本黨具有最大決心，使得到最後的勝利。

本黨爲領導代表民主的勢力的農民與代表封建勢力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爭鬥，並使這個爭鬥勝利得到保障，則農民得到武裝，實爲重要條件之一。農民應有自衛的武裝組織。封建地主階級的武裝，如民團、保護團、及團防局等，均須解除，交與農民。此外本黨須設法使農民廉價購得武裝。總之，須使農民有足以保衛其自己利益的武器，這是農村的革命勝利，即民主勢力推翻封建勢力勝利之確實保障。

農民在政治鬥爭勝利之後，經濟鬥爭便隨着開始。農民經濟鬥爭的意義，爲反抗帝國主義、軍閥，特別是地主階級的剝削。本黨聯席會議議決政綱有如下數條：一、減輕佃農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禁止重利盤剝，年利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三、禁止上期租。四、禁止預征錢糧。五、禁止包佃制。此次全體會議決定佃農使用土地權，改良田稅法則，並規定區、鄉自治機關關於地方經濟事務之各項主管權力。此皆屬農民初步的經濟爭鬥之綱領。本黨必須領導此爭鬥，使繼政治爭鬥而得勝利。在國民政府管轄區域內，當用政治力量助農民達到目的。

不但如此，因爲革命的進展，農民的要求已是迅速初步達到了第二步，即在許多地方，已發生最重的土地問題。原來中國的農民

問題，其內容即是一個貧農問題。貧農的數目，到近年愈擴大，完全無產的赤貧農民，與有產不多不够生活的次貧農民，佔全體農民之大部份。這個廣大的貧農階級之存在，乃一切糾擾變亂的根源，同時即為革命動力的要素。貧農問題不解決，一切紛擾變亂却不會平息，革命亦將終久沒有完成的一日。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現在國民政府管轄下的各省，特別是廣東、湖南、湖北，農民運動發展的地方，貧農對於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貧農羣衆的土地問題，也是極其嚴重。本黨總理孫先生深見於此，二十年前，即已提出「平均地權」為革命政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到：「農民之失去土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種」，總理並於民生主義演講中，提出「耕者有其田」口號，此皆深知農民的最後要求在於土地。不使農民得到土地，農民將不能擁護革命至於最後之成功。因此，本黨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爭鬥，至於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而後止。

貧農不僅無土地，而且無資本。革命發展的結果，鄉村富有階級極端閉借，許多地方幾於斷絕借貸關係，至使貧農社會惶惶不可終日，非有一具體政策，不足解決此資本缺乏之問題。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云：「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中央各省聯席會議（著者按：指民十五年十月在廣州舉行者），亦以農民銀行問題列爲專條，並規定以年利百分之五貸予農民，本黨當於最短期間，於革命所及之地，使本黨政府努力設立此等條件極低之貸款機關，以解決農民之資本缺乏問題。

總之，國民革命的完成，有賴於全國農民的興起。本黨始終站在農民利益方面，代表農民而奮鬥。本黨始終擁護農民一切合理的鬥爭，務使一切剝削農民的特殊階級失其憑藉，減輕其剝削，使每個受壓迫的農民都得到切實的解放，這是本黨歷史的使命，本黨當毫不猶疑的執行之。

第四、關於一般者：有全會宣言及對黨員訓令。

(1)宣言：對外方面置重點於反英，對內方面置重點於農民運動，及提高黨與政府權力，以克服「國民政府統治內反革命勢力」，而對於繼續對北方軍閥戰爭以統一中國，雖亦提及，但並未強調。質言之，是要引起中英更大的糾紛及抑制軍事領袖。

茲將此項宣言錄下。

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於武漢）

同志們，同胞們！

我們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自北伐佔領武漢以來，已到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前時期比較起來，有下列的特性！

(一) 中國全國的一半，已經從帝國主義同盟者與工具——軍閥——的直接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

(二) 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因為他們的聯盟者吳佩孚、孫傳芳的失敗及革命民衆的奮鬥，不得不應允放棄他們幾種剝削中國人民的特權。

(三) 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一面對國民政府作不重要的讓步，一面却藉口虛造的事實，集中兵於上海及其他各地，以援助北方各地反革命勢力目前對革命勢力的戰爭，並藉此摧殘中國民衆方興未艾的革命鬥爭。

(四) 中國工人、農民及城市中的廣大的民衆，已經逐日起來了，被壓迫的民衆已經漸漸的參加鬥爭了，這就是我們戰勝帝國主義與國內反革命的穩固基礎。

(五) 同時，國民政府統治區內一切反革命勢力：反動派、買辦、大地主、紳士、安福、交通、研究、外交各系，正在設法牽制國民政府政策使不得行，並用全力破壞革命的根據地。

(六) 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除去侵略行動以外，還和他們奴僕——北方軍閥——正在設法分化革命的戰線。我們的敵人不能抵抗整個革命的勢力，不得已採用這種分化方法，足以證明我們革命的力量已經大有增進。但是我們更要因此時注意這種分化的危險，而預為防備。帝國主義者最近的策略是聲明贊同中國人民的期望，願意和中國革命運動中的穩健份子合作，只是反對激烈份子，這個策略，就是很顯明的要想分化革命的戰線。

(七) 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要干涉中國，又顧慮歐美各國的反對，所以用他無數的宣傳機關，傳播謠言，毀謗中國的革命運動。同時，英國的反動政府，正在用無理的文牒，恫嚇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目的在軟化中國革命的意嚮並且隔離中國革命與世界被壓迫的民衆與被壓迫的國家。

(八) 但是英國的和其他各國的被壓迫的民衆，還是對中國革命表同情的。雖然也有些反動派，投機派的領袖，調曲鼓惑，貶損中國革命的價值，却是各國被壓迫民族與勞苦民衆已漸漸的瞭解中國革命的真相了。

同志們，同胞們！

由此所解析的，我們的革命現狀裡，我們找出行動的方針。本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正在這個國民革命進行中的緊要時候，已經決定了中國國民革命的行動方針，現在鄭重的向全國同胞宣言，我們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實行以下各項：

(一) 國民黨要用種種方法繼續援助工人、農民和城市一般民衆的革命運動，及改良他們本身生活的鬥爭。這種鬥爭，不但不能違反國民革命的利益，並且正足以增加國民革命的力量，使他可以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國內反革命勢力。我們就要設立農政部和勞工部，實現本黨的農工政策。我們同時要反對那些緩和民衆運動的主張，我們要使民衆運動充量的普遍的發展。

(二) 我們要把一切行政、立法權集中在國民政府手裡。國民政府一定可以實行民生主義，防止個人專政，或一部份人專政的傾向。只有本黨所表現出來的民衆意志，才能確定國民政府的政策。

(三) 我們要指導城市、鄉村的民衆作創作的革命工作。由鄉村到城市，我們要把民衆組織成自治委員會，代表民衆，作國民政府的基礎。

(四) 我們要以革命的方法統一中國。這種統一，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民族的眞統一。由這種統一得到政治，才是一個由上而下建設於民主主義基礎上的政治。

(五) 我們要繼續向帝國主義作戰，直到我們達到目的；就是說，得到中國眞正的政治的經濟的獨立而後止。我們反對那些對於革命厭倦的人們，反對那些對帝國主義妥協的人們，這些人都是革命的敵人。我們要指出他們醜惡的罪惡而打倒他們。但是我們可以聲明：任何外國，但能對於中國國民的眞正願望容納的，我們決不傷害他們的合法的經濟利益與經濟發展，他們是不用畏懼的。

(六) 我們要繼續對於北方軍閥的革命戰爭，直到我們統一了中國，肅清了封建軍閥的勢力為止。

(七) 我們要繼續並且鞏固我們對於蘇聯的關係，蘇俄是誠意援助我們國民革命民主革命的國家。凡是願意在民族平等原則之下與中國誠意合作的國家，一定願意中國統一與獨立。

(八) 有些人以為不要幫助革命民衆，不要與世界被壓迫民族合作，也可以繼續革命，這是錯誤的。我們要在人民面前指明這個錯誤，這些人實在就是幫助帝國主義與反革命，他們是與我們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的主義無關的。

(九) 我們要幫助國內少數民族（蒙古、西藏、回族等）的自決與解放。

(十) 這一年來，國民革命軍勇敢的、榮譽的為國民革命而奮鬥，我們要承認他們的功績。我們並且要用種種方法鞏固國民革命軍，使他們更能奮鬥，我們要使人民與軍隊密切的結合起來。

同志們！同胞們！

我們鄭重宣言，我們的黨要領導民衆朝着上述的綱領進行。任何人或任何部份的人，如果反對這些綱領，我們便要反對他們。國民革命必須成功。我們的國家必須獨立。我們的人民必須自由。帝國主義的宰割，封建軍閥的壓迫剝削必須打倒。這便是三民主義的真意義。

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黨的紀律與黨的指導萬歲！

革命勢力統一萬歲！

(2)對全體黨員訓令：略述北伐勝利，湘、鄂、川、黔、閩、浙、贛、皖已克復，馮之國民軍亦奠定甘陝，漢口之「一三」慘案，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及粵、湘、鄂，有數百萬有組織之農民興起，而將訓令重點置之於「反個人軍事獨裁，」如下：

「本黨自去年以來，（著者按：當係指三月中山艦事件及五月整理黨務案），黨內即多糾紛。中央執行委員會因外慮反動勢力之縱橫，內恐革命勢力之分裂，屢次遷就事實，冀圖能集合一切革命份子，以保全中國微弱之革命根基。自北伐軍興，軍事、政治、黨務之集中個人，愈使政治之設施，不能受全黨的指揮，而祇受軍事機關之支配，此種制度，弊害甚多，不但使黨內之昏庸老朽份子盤踞於內，官僚市儈及一切投機份子乘機而入，因此縱成個人獨裁、軍事專政之謬誤，妨害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威權，形成黨內投機腐化之傾向，且亦使軍事呈紛爭與複雜之象，而不能收整齊統一之效。蓋國民革命軍至於今日，已擴充至四十餘軍，非有黨之最高機關，以絕對的威權，統一指揮，決不能在名義上與實際上悉納於革命軍統系之下也。且各地黨部亦間有參雜投機份子，爲士紳把持，與民衆隔離之錯誤。與本黨集中革命民衆之旨背道而馳。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深感目前本黨之危機，認爲必須有切實挽救之方法，方足以副全國代表大會之委托，故詳慎考慮，決定將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集中於黨。此等議案，乃爲適合中國革命之需要，將藉此以防止黨內投機腐化，與個人獨裁、軍事專政之傾向。」

繼言本黨之革命乃爲農工之利益，並「誠意的與世界革命戰線上先進之蘇俄親密聯合」。最後述及謀國內少數民族平等，與國家主義者壓制弱小民族不同。

自黨政聯席會議至三中全會，爲鮑羅庭於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後決於一年之內反攻計劃下所導演的歷史悲劇，參加演出者爲中共份子及國民黨「左派」，劇情雖穿插複雜，而以反蔣爲中心，以奪取革命領導權而倒向蘇聯爲目的。

當時參加此一悲劇，認真演出者，在中共方面有吳玉章，擔任聯席會議主席；譚平山，擔任國民政府農政部長，蘇兆徵，工人部長；次等脚色有董用威（必武），擔任湖北省政府農工廳長；張國恩，民政廳長；劉芥，司法廳長。國民黨方面有司法部長徐謙，外交部長陳友仁，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及汪系中央宣傳部長顧孟餘，工人部長陳公博及新與軍閥唐生智。生智原任第八軍軍長，三中全會驅走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總司令陳銘樞，而以生智代之。其餘中央黨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均爲此等份子所盤踞。

叁 監委之指摘

武漢之聯席會議及三中全會，國民黨多數監察委員均未列席。監委爲黨內老同志，從事國民革命歷史甚久，愛黨愛國，自不能無視鮑羅庭之此種破壞革命，危害黨國之行動，遲至四月九日（汪兆銘自海外歸國潛抵武漢之後），發出青電，指陳聯席會議與三中全會「不合者」二，「可痛心者」十一。此文不僅可以澄清黨的法律觀點，亦可規知當時會議若干内幕。

茲將青電錄下。

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等列舉武漢中謬措施電

汪主席並轉全體同志鑒：本黨半載以來，革命工作之發展，一日千里，長江既全部肅清，帝國主義所盤踞的最大營壘之上海，亦告克復，凡此基本之發展，足證民衆熱望本黨之殷切，與本黨同志此後工作之艱鉅。不幸當此時期，表面成功之迅速與內部重心之崩弛，適成正比，黨員工作感指揮之無力，內外要政受無形之停滯，黨的整個意思無由顯明表達，黨的機關權力莫能適當行使，內之百萬黨員準備奮鬥，而不知聽命之何從，外之受治於黨之民衆對本黨之中心失寄，漸次增加其憤怒，推原其故，不能不謂武漢聯席會議以來種種措

施，爲造成此局面之主因。本會爲中央監察機關，當此重要時機，爲顧全革命利益與鞏固黨基起見，未便放棄鐵錘之職責，爰集會議，詳加討論，僉認以爲武漢最近之動作，實有極危險之傾向，茲特酌舉其錯誤之點，俾知事所實在，不容詭妄。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係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據徐謙報告，係爲「適合革命利益，應付革命時機，代表中央權力之必要組織」，其爲臨時機關可知。彼時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而置中央之機關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此其不合者一也。於中央已有明令停止聯席開會之後，復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根據上述，其仍爲毫無根據之自由召集可知。查主席及常務委員爲第二次全體會議所產生，躬負重託，非至合法召集之第三次會議以後，不能解除職責。今武漢之第三次會議既未經常務委員會之提議及同意，即常務委員之列席者，亦僅寥寥數人，而竟毅然不顧，宣布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代表大會未開時之最高權力機關，又適當本黨北伐軍蘇皖戰爭最吃緊之時候，竟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出以如此草率浪漫之態度而開會。此其不合者二也。至於開會以後之行動，凡足以破壞革命利益，惹起黨務糾紛者，尤爲更僕難數，條而舉之，有如下列：開會後劈頭第一事，即爲「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案」。夫本黨爲革命之政黨，指導機關有無效率，以革命勢力能否在此指導機關下發展爲斷。第二次全體會議產生之常務委員會，成立於北伐出師以前，在此機關指導之下，北伐軍事以最困苦之給養，任最艱鉅之工作，於極短之歲月，竟其頑強之一大軍閥，苟非指導得宜，得民衆之信仰，與武裝同志之奮勇效命，何以臻此？若非反對本黨革命勢力之發展，別有肺腸，何於前方最吃緊之時，破壞卓著功績之指導機關？此可痛心者一也。當該會議開會武漢之時，正中東兩軍武裝同志在蘇皖肉搏疆場之日，政府即不憫念其憂勞，亦何忍加以妨害。槍械子彈，爲北伐之命脈，乃武漢聯席會議三電粵兵工廠，令其停工，拆移機器於漢陽。此其壟斷軍械、阻礙北伐之陰謀，已顯然畢露。乃猶不止此，當國民革命軍力攻蘇浙時，連電請濟子彈，漢方均置苦罔聞，是實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乃快厥心，此可痛心者二也。國民革命軍受命北伐，義不容得一隅以自封，故自克鄂、贛以後，即分道並進，規復東南。而該會議中乃發軍事進行過急之辭，以爲詭謀，甚至原定調赴東南之兵，亦爲該會議所遮阻，逗留上游。及淞滬底定，漢口黨報竟公然詆認國民革命軍爲匪軍。該會豈無耳目，何竟絕不糾正？此掣肘於事前，詎毀於事後，用心積慮，昭然若揭。此可痛心者三也。國民革命軍之有政治部，原以統一黨的訓練，使整個的軍隊成總理之信徒，爲三民主義而作戰。自爲少數搗亂分子把持以後，純粹之三民主義者被排斥無餘；甚至周納罪名，拘留滿獄，是實欲中國國民黨之黨員絕跡於國民革命軍中，而高呼提高黨權者，至此又不發一言。此可痛心者四也。農工政策本爲總理所貽留，指導農工、組織農工，爲國民黨

黨員之天職。乃自共產黨分子加入以後，對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盡量排斥，偶有組織，動遭摧殘。中央對此，不聞有糾正之舉；而對於農會、工會之幼稚行爲，則又視爲驕子，絕無指導制裁之權能。此可痛心者五也。廣東省市黨部及江西省黨部之組織，並無不合法之點，而兩省黨部之選舉辦法係經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通過，此次列席武漢會議之各同志中，有多人皆曾親自列席於該會議，一切經過，均所親見親聞。今忽謂違背總章，勒令改選；不知究係違背總章之何章何節？各級黨部均爲指導本黨同志革命工作之機關，今以在合法情形下產出之兩個重要省份之黨部，在本黨革命勢力發展之環境下而橫被取消，是本黨各級黨部在軍閥勢力下猶能冒死奮鬥而存在，而在本黨黨內轉成毫無保障之機關，一切黨部均將寒心，下級黨部莫知秉承，妨礙黨務之進展，實開重大之惡例。此可痛心者六也。特別黨部原爲應付特別情形，以求革命勢力能迅速發展之組織，且已定有條例。武漢會議不從修改條例入手，竟決定除軍隊及產業工人外，一律取消；且限制特別黨部不得有同樣選舉第三次代表大會之代表之權。是不僅破壞本黨之組織，亦啓不平等的歧視之端，而妨黨務之進行。此可痛心者七也。欲革命工作之完成，必須令各個黨員於負責努力中有所保障，今乃毫無正當理由，僅憑若干私人之愛憎，即可橫加處分，如因贛案而開除爲黨努力同志之黨籍，令熱心者不敢負責，忠耿者人人自危，是爲黨員無保障。又如因一執行委員（彭澤明）之提議，不具確實證據，不經審查手續，立談之際而可停止中央執行委員（蕭佛成）之職權，中央執行委員爲代表大會所選出，如此摧殘，於法何據？是中央執行委員亦無保障，又在該會議開會之武漢，凡爲地方權力者所不懂之人，雖爲黨中任重要職務之同志亦不免於任意被捕，任意拘留，該會議及政府絲毫不加以制止；是則自命爲中央所在地之武漢，一般的人權亦毫無保障，殘忍慘劇，演成恐怖。此可痛心者八也。黨報爲宣傳本黨革命主義之機樞，亦即黨治下一般民衆視聽之所寄托，乃漢口民國日報一月以來之所掲載，大書深刻，莫非播動革命基礎，壞壞本黨中心人物信仰之紀錄。如湖南省黨部之通電中，有蔣同志密令李宗仁同志監視中央執行委員等毫無根據之謠言，影響所及，不獨毀壞革命軍人之令譽，且屢中央執行委員之神聖名詞於何等地位。又如吳玉章同志以負責之委員，主席湖北省黨部，而發表極端惡意之憤說，甚至有「軍費佔一千三百萬……，但是我們武裝同志還是饑寒交迫……，究不知他如何支配」等語。此等意存中傷之籠統誣蔑，雖敵人之反宣傳，亦何以加茲，而竟公然宣傳於會場，復大登特登於黨報，若非蔣同志深得軍隊信仰，試問此等言論散佈軍中，將令前方發生如何影響。吳同志既不知檢點如此，而中央宣傳部對於黨報竟任令登載，而不加管理，有意癡聾乎？漏棗戰守乎？此可痛心者九也。武漢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出之中央機關近來所發表之命令尤多不顧黨國利益，如江西省政府成立未久，正在努力辦公，以贛省貧瘠之區，遣去戡兵費之慘，休養勞來，方冀擊劃，而武漢竟下解散之令，馴至忠實同志不敢負責，千萬人民惶惑無主；當此全功未竟之時，唯省政府爲最能負責實際責任，以普樂利於人民。贛省如此，何能望各省政府安心負責，甚

礎政治；顛覆是虞，人民徯蘇之望，何由實現？此可痛心者十也。又本黨為負責建國之唯一革命的政黨，亦為領導國內一切革命之勢力統一指揮之黨，其旨趣已見於歷屆之決議案及宣言。所謂以黨治國之精神，即為本黨對世界，對中國民族毅然負起一切責任之表示。今觀於武漢會議中所決定採用之統一革命勢力案，竟有共同担负政治責任問題之一條，內稱：『應由共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此種誤認之決議，大有背於本黨治國之精神，極端毀滅本黨組織之根本旨趣，減少羣衆對於本黨之堅固信仰。乃於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竟以若干中央委員非法的會議中為此重大之決定，亡黨之責，誰當負之。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不謂一部份之執行委員竟輕輕斷送之而不稍惜，此其尤可痛心者十一也。如上所言，皆為武漢會議中所加於本黨之根本創傷，致使革命勢力發皇張大之本黨，有遍體創痍之觀。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衆，亦將何所寄托！險象如此，詎能再安誠默，爰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懷喪亡之無日，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披瀝奉陳，敬候明教。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黃紹紘、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青。』(民國十六年四月九日發。錄自國民政府公報第字第一號，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肆 汪兆銘歸國繼續親共

民國十五年三月中山艦事件之後，汪兆銘稱病出國，而中共時思反攻，汪、共之間均懷反蔣之念。是年十月廣州聯席會議，通過迎汪復職案，蔣先生欲汪歸國以制共，而中共欲汪歸國以制蔣。自是迎汪之聲不絕，而中共尤高唱入雲。十二月，武漢聯席會議時，蔣先生一再電兆銘，促其歸國，請其主持黨務與政治，本人只負軍事之責，並謂：『汪如不歸，本人亦將引去。兆銘遂於三月自西歐經莫斯科歸國，在莫斯科五日，接晤其黨政領袖，四月一日，抵上海，中央執、監委員蔣中正、蔡元培、吳敬恆、張人傑等均往晤談，無不屬望兆銘主持大計，勿任鮑羅庭及中共分化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兆銘表示，應於十五日召開四中全會於南京。解決一切問題，而於容共一事，迄未作肯定之表示。諸執、監委員對此並無異詞，蔣先生且於三日發一通電與各軍事首長，推崇兆銘主持黨、軍、政大計，願率各軍一致服從。電文如下：

(銜略)，我軍勢力進展，業已全定東南，江北戰事，迭傳捷音，豫境敵勢，已難復振；在此巧虧一篑之際，果能統一黨權，得有

全黨信仰之人指揮領導，俾紛紛悉泯，障礙齊闕，則國民革命指顧即可完成。汪主席假期年，不獨全國羣衆渴望冀殷，而黨國要政亦受重大影響。中正迭電請求，今幸翩然再出，大旱雲霓，莫喻忻慰。汪黨爲最忠貞之同志，亦爲中正生平最敬愛之師友，此次回國，對於黨國大計，業已懇切晤談；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貫徹此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縣，以底國民革命之全功，而竟總理未竟之志。此後黨務政治既已負責有人，後顧無慮，中正唯當專心軍旅，掃除軍閥，完成革命之天職，爲此電告我軍將士，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率各軍，一至服從。至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請統一，而中正獨司軍令，俾專責成，同心一德，完成革命。務抑各軍官長遵照此意，對於汪主席完全服從，竭誠擁護，俾汪主席得完全自由行使職權，黨權得以真正集中，以完成本黨革命之使命而促成三民主義之早日實現。特此電達希各遵照。

蔣先生與在上海中央執監委員對兆銘屬望如此殷切，武漢跨黨份子及「左派」亦正迎汪之不遑，倘兆銘能利用形勢，加以領導，相機予中共以抑制或清除，則寧漢分裂之局可免，中共之策略不售，革命事業必可及早完成。詎兆銘一面與諸人周旋，忽於四月五日潛行離滬赴漢，同時與中共首領陳獨秀發表一聯合宣言，已舍「容共」，而稱爲「兩黨合作」，一子下錯，全局皆非。

茲將此項宣言錄後。

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

國民黨、共產黨同志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份存在，並且還在那裡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必要。

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

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

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至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獨裁。

兩黨合作大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到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羣衆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精神。

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

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在共產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致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贊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衝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表示贊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具在，更無造謠之餘地。

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得乘間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致爲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汪精衛、陳獨秀，十六年四月五日。

四月十二日漢口舉行迎汪大會，由鄧初民主席，汪兆銘自行出席，向羣衆演講，高呼「革命的向左邊來，不革命的滾出去！」自是成爲武漢方向最響亮的口號。（註三）

汪兆銘至漢口後，四出演講，辯明上海工人糾察隊並無衝入租界之意，亦無故攻擊龍華國軍之舉；並嘲笑上海各執監委員，陳獨秀且公開演說：「他們對汪先生哭起來了。」

汪兆銘既查意親共，則上海方面之國民黨人已無猶疑之餘地，而一致支總司令，實行清黨。

（註一）本節資料主要來源：①同上節，②國民黨歷次宣言及決意案。

（註二）民十五、三月十八日，北京段祺瑞執政被殺辭職事件。

（註三）此種著者親歷所記憶，演詞原文無從搜得。

周恩來（一八九四——），別名少山、伍豪，浙江紹興人，生於江蘇淮安。南開中學畢業，民九，以動工儉學赴法，與李立三、蔡和森等組「社會主義少年團」，旋改「旅法支部」、任宣傳部長。民十三，任廣東省委，兼軍事部長。十四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旋兼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十六年，出席五大，當選中委。「八一」暴動，爲領袖之一。十七年，在莫斯科出席六大，返國任軍事部長，兼特務負責人，推行「立三路線」。二十年冬赴江西蘇區，任蘇維埃軍委會副主席。二十二年任紅一方面軍政委。二十三年，西竄，二十四年「源義會戰」與秦邦憲及李特被清算，轉而附毛。二十五年「西安事變」，爲幕後活動份子。二十七年起歷受政府聘爲國民參政員及政治部副部長等職，自是與政府保持接觸，直至三十八年，和談破裂爲止。三十八年，僞政權成立，任僞政務院總理，四八年，改爲僞國務院總理。周儀表不惡，擅詞令，長應變，在黨內外風波中，隨機應變，七朝元老，號「紅色不倒翁」。始終任軍事職務。在僞政權中，與毛、劉同居最重要地位。至民六之，任僞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富春（一九〇一——）湖南長沙人。留法，創旅法支部。十五年，任革命軍二軍政治部主任。十六年，參加「八一」暴動，敗後，潛匿上海。十九年赴港，任廣東省委書記。二十年入蘇區，任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旋改江西省委書記。二十三年，代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隨軍西竄。二十四年，任中央組織部長。三十四年，七大當選中委。旋在東北局工作。三十八年十月，僞政權成立，任僞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及重工業部長。四八年，任僞副總理，九月，任僞國務院工業交通辦公室主任。妻蔡暢，爲中共婦運領袖。至民六一，任中共中委，僞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

林伯渠（一八八一——一九六〇）字祖涵，湖南臨澧人，爲中共五老之一。前清秀才，常德師範、日本高師畢業。同盟會員。民五，任湖南護路軍司令程潛秘書。十年，加入中共，任中山先生總務部長。十三年，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執委。十四年，任國民黨農工部長。十五年，當選國民黨中執委，旋任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主任。十六年，參加「八一」暴動，亡走日本。十七年赴莫斯科受訓，十九年至蘇區。二十二年，任蘇維埃政權財政部長。二十七年，任陝甘寧邊區主席。三十四年七大當選中委。三十八年，僞政權成立後，任僞人民政府委員兼秘書長。

第七章 寧漢分裂

自汪兆銘潛赴武漢，領導當地國民黨「左派」與中共沆瀣一氣後，即造成一種情勢——寧漢分裂，兆銘去後一星期，四月十二日，南京即開始清黨。在此以前數閱月間，發生許多事件，其較為重大者為各地國民黨之黨務糾紛，上海工人暴動，及漢口與南京等地的外交事件，併於此章述之。

第一節 各地黨務糾紛

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在民國十五年五月整理黨務案以前，為中共份子譚平山所把持，自此以後至武漢三中全會以前，則由中央組織部部长陳果夫主持。各地黨部未經果夫改組者，多操於中共及「左派」份子之手，已改組者，依照中央決定，國、共兩黨委員人數為二比一，仍須由中央審定，致中共無法把持。但由中共份子操縱之三中全會對新改選之省、市黨部又加以否決，於是各地糾紛迭起。

壹 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之改選

關於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之被中共滲透與把持情形，詳載於「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中國共產黨類第六三頁至一〇〇頁，幾達四萬字，為研究中共運用國民黨手法之良好資料，其中包括下列文件：

- 一、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向三中全會建議案，民國十六年三月一日。
- 二、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向中央報告改選及各項工作情形文電存稿，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 三、共產黨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四、共產黨最近在京與各黨派競爭聯絡之內容及市黨部改選共產黨完全勝利之結果（原題為「北京地方國民運動工作報告」）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以上各件，前兩件屬於國民黨文件，後兩件屬於共產黨文件，均呈蘇聯駐華使館，而為張作霖所搜獲。可知國民黨一切曝露於中共，而中共文件則列為「極要」，為國民黨所不知。在如此不平等的情况下「競爭」，國民黨安有不失敗之理！如國民黨求一時之存在，只有自命「左派」，受中共指揮，北京市黨部正是如此，試閱市黨部對三中全會建議案：1. 一切權利（力）集中於黨。2. 切實執行中央及各省聯席會議決議案。3. 中央黨部及政府設在武漢。4. 從速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5. 促汪精衛同志即日復職。6. 取締解散黨部之軍隊。7. 保護各種職業團體，禁止壓迫民衆運動。以上建議，何一而非鮑羅庭之主張！何一而不含有反蔣意義！

其所以然者，則因一月間北京市特別黨部選舉結果，幾乎完全為中共所把持，據上開文件第四件——北京地方國民運動工作報告——所載選舉結果，及職務分配，如下兩表：

(一) 國民黨北京市黨委名單表

市黨部執委	所屬團體	所屬黨派	備考
吳可	CP	CP	代表黨（著者按：黨指中共）當選
謝伯俞	實踐社	CP	同上
鄧文輝	實踐社	民校左派	（著者按：當係國民黨之暗語）
蕭忠貞	實踐社	民校左派	
莫同榮	瓊島魂	CP	
譚祖堯	新軍社	CP	
鄭蘭積	協進會	民校左派	與實踐社有關係
劉耀西	新中學會	民校左派	過去與新右派有關
路友于	大同盟	新右派	尚未就職

以上九個委員中，中共佔四人，親共「左派」佔四人，所謂「新右派」僅一人。

(二) 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職務分配表

何	部	部	長	黨	派	備	考
常	委	鄧	文	實		鄧——主席，譚——文書，劉——財務	
組	部	劉	祖	C P			
宣	部	謝	耀	新	中		
工	部	蕭	伯	C P			
農	部	吳	忠	實			
青	部	莫	同	C P			
商	部	鄧	蘭	協	進		
婦	部	張	友	新	右		
		路	于	游	離	路未就職，姚彥補上	
		蘭	蘭	左	派		

最重要之常委，組織部，中共最感興趣之工、農兩部，均握在中共份子之手，而碩果僅存之「新右派」則未就職，顯被排斥，由此可知中共對市黨部完全掌握。

貳 安慶「三、二、三」事件 (註一)

三月，安慶光復，蔣總司令由九江乘軍艦至安慶，十九日到達。翌日，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會同皖省臨時省黨部執委光昇，定二十一日召開全省代表大會，下令解散魯班團之反共的總工會。總工會向總司令請願，獲允調查處理，共產份子立即一面派人去打總工會，一面由郭沫若報告總司令，反指總工會打傷光昇。蔣總司令立派楊虎前往處理。二十

三日上午，安慶五大民衆團體召開市民大會，歡迎蔣總司令，會中有人要求撤換光昇，驅逐共產黨。散會時，共黨又發動親共份子打架。楊虎乃號召工人群眾與之毆鬥，將共方擊敗。楊虎皖人，故有號召群眾之力。

接着，在省黨部，市黨部，若干左傾工會及郭沫若所領導之江右軍政治部之共黨份子被打者六人。郭沫若走南昌。中共在安慶勢力遂被鎮壓下去。

叁 重慶「三·三一」事件（註二）

四川受軍閥割據，川中國民黨亦甚活躍，十三年容共之後，亦造成左、右派之對立。有兩個「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均設於重慶。右派黨部在總土地巷，領導份子有石青陽、王陵基、唐式遵等；左派在蓮花池，領導份子有吳玉章、王維舟等。王陵基時爲重慶衛戍司令，左派時派宣傳隊至司令部或其寓所門外，大罵陵基袒護右派。兩派及其所屬民衆時相兇毆，並藉軍閥協助。雙方軍人均爲劉湘部下，互控於湘。是秋、湘忽左袒，令陵基解散右派黨部，左派氣勢大振。（吳玉章小傳見本章之後。）

民國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發生「三·三一」慘案。是日，國民黨左派「召集重慶市民大會」於打槍壩，九時，羣衆齊集，主席上台，剛發言，台下手槍一響，立斃。會場沿邊，爆竹與槍聲齊鳴，羣衆狂奔，四周伏起，刀棍齊下。會場靠城，又有多人自城上墜下，加入毆打，被打及自相踐踏而死者七十餘人，傷者逾百，多爲男女學生。兇手逃逸，莫可究詰。

此一慘案，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稱：「乃軍校學生楊引之聯合王陵基所爲」（註三）。楊引之旋在漢口爲中共所執，中共於一羣大會上，縛引之及陳少平（均黃埔生，反共）於台上，大加斥責，當時著者亦在羣中，不久，引之秘密處死。

「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並稱：在安慶、福州，三月間，亦有「屠殺」事件，均未舉事實。

肆 南昌「四·二」事件

民國六年一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開代表大會時，黨務尙控制於中共份子方志敏之手。國民黨員被中共挑撥，精神渙散。經段錫朋等努力工作，至大會開會時，竟能將代表一百一十餘人團結到九十餘人，使共黨慘敗（註四）。其時，中

央黨、政要人自廣州齊集南昌，譚延闓並蒞會致詞，略謂：「總理費四十年努力，得到現在結果。總理所遺下的主義，我們應完全接受，不要在總理主義以外再有別的什麼言論。但現在黨裡存在一種不好現象，看見軍事勝利了，便發生驕矜的意思，有了別的言行發生。要知道總理指示我們的還沒有完全做到，那能於總理指示之外，而別有所圖？……我們的黨是要與民衆接近的，現在勝利中的現象，却有與民衆分離的傾向。……現在有些工會在常軌外行動，這是很危險的。」（註五）

其後，武漢三中全會取消此次選舉，果夫爭之無效，於是方志敏等於四月二日奉命再打入省黨部。爲此事，江西省政府致各報館電文如下：

李烈鈞等報告江西省黨部被共產黨徒搗毀電（註六）

各報館鑒：贛民質樸，夙稱易治，對於黨義，尤抱純一之信仰。邇來才智之士立異標新，漸啓爭論，識者慮之。乃日昨忽有百數十人闖入省黨部，肆行搗毀，並敢撕毀總理遺像，揉碎黨旗、國旗，高呼打倒三民主義之口號。伏念總理逝世，僅二週年，黨員中言行竟有如此者，悲痛何如！烈鈞等忝司省政，未獲維持黨律，對同志既增慚悚，對總理尤負罪多矣。謹電奉聞。李烈鈞、朱培德、楊廣笙、周雍能、徐元誥、程天放、王鎮寰、周利生等叩。（民國十六年四月三日發）。

此一事件，當時江西稱爲「四二事變」，據當時任江西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我所親歷的四二事變」一文（註七），記載甚詳，摘錄於下：

四月一日，武漢的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命朱培德做主席，將一班忠實同志都免了職。這個電報在四月二日到達南昌，同時郭沫若也奉了共黨命令潛來南昌，指示機宜，所以當天共黨份子就實行暴動。首先是共黨學生搗毀教育廳，將職員全部趕出，將房屋封鎖。我那時正在省政府，所以他們未找着我，可是我住在廳內，私人的衣服、書籍等統統損失了。下午我從省黨部出來，在街上遇着共黨學生，就將我抓住。先送到衛戍司令部拘押，衛戍司令部不肯接收，又送到總工會。我被囚禁在總工會大約一兩小時後，羅時實等幾位同志，也陸續被工人糾察隊押送總工會來和我關在一間房裡。

事變後第二天，共黨分子就在小校場舉行一個民衆大會，慶祝他們的成功。他們將被拘禁的同志，全部押解到大會主席台上示衆，雙手被反綁在身後，而且每個人有兩個糾察隊緊緊捉住。共產分子一個接一個地發表演說，罵蔣總司令屠殺農工，罵我們是蔣的爪牙，助桀爲虐。民衆大會大概閉了二小時才結束，我們又被押回總工會。

事變消息傳到上海，蔣總司令立即致電朱培德，勸他不可自毀歷史，與共產黨勾結，並責成他保護這批忠實同志的生命，朱培德才將我們由總工會移押南昌衛戍司令部。五月中旬，轉送法院，法院因我們無犯罪事實，這案子就自然擱下來。

直至湖南「馬日事變」後，朱培德把共產份子送走，我們才自法院看守所釋出。

另據共方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八四頁所載，三月十六日，國民黨南昌市黨部被段錫朋解散，十九日，九江市黨部及總工會被解散。此殆係反共之段錫朋等於省黨部選舉勝利後，對所屬下級黨部之爲中共把持者所進行之整理。（方志敏小傳見本章後。）

伍 南京「四·九」事件

南京方面，四月九日，中共份子張曙時、侯紹裘、許甦魂、鄭江華等，以江蘇省黨部名義，召開市民迎汪大會及軍民聯歡大會於公共體育場，號稱二十萬人，當民衆集合時，又改開「肅清反動派大會」。會中，反共方面與之發生衝突，造成死傷。中共份子復裹脅羣衆向總司令部請願，亦被制止。蔣總司令是日適自上海抵南京，乃恢復被二軍政治部中共份子所封閉之花牌樓之國民黨市黨部及下關之總工會，而將中共份子所設之國民黨市黨部及工會予以搜查。二軍政治部秘書李世璋亦畏怯潛逃。（註八）

（註一）台灣「傳記文學」十卷六期「杜月笙傳」。

（註二）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三編五六七至五六八，六四八至六四九頁。

（註三）據軍校二期工君稱：引之爲軍校孫文主義學會負責組織者，其時在漢口，未入川。

（註四）陳果夫「民國十五、六年一段黨史」，果夫謂江西省代表大會爲二月，誤，應爲一月。

（註五）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國聞週報四卷三期。

(註六) 革命文獻十六輯通二七九七頁。

(註七) 「今日大陸」一四六期。

(註八) 採自四月二十一日李世璣電文，武漢剪報，未註報名及日期，藏國民黨黨史會。

第二節 上海的工人暴動

壹 二月罷工事件

上海工人運動，自中共成立後，即與國民黨競爭領導地位。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中共即成立「上海總工會」，攙奪領導權，具詳於第五章第二節。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夏超在杭州起義，投誠國民政府，進兵上海，時國民黨鈕永建駐上海，主持工運，下令於二十三日夜半以海軍砲聲為信號，開始罷工，予以響應，詎夏軍為孫傳芳所阻，而信號亦因故未發，其事中止。二月十九日，北伐軍克杭州，中共所操縱上海總工會，即發出總罷工命令（註一）如下：

總同盟罷工令

全上海工友們！民衆革命勢力日強，北伐軍戰爭勝利，軍閥孫傳芳抵抗失敗，惟有由民衆起而行動，以推翻軍閥勢力。本總工會特宣告全上海總同盟罷工，以完全消滅軍閥殘餘，表現革命民衆勢力。令到之時，即刻行動，全體工友總罷工。罷工之後，須有組織有秩序的聽候總工會指揮，無復工命令，不得復工。切切此令！

（口號五條略）

上海總工會 二月十九日

同日，總工會發表「罷工宣言與總要求」，此項總要求並非對軍閥政權，乃「我全上海工人目前行動之目標，在消滅殘餘軍閥勢力之共同作戰中，願與社會各階級民衆協同奮鬥，願新政府容納我們的要求」。其總要求如下：

一、繼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

二、消滅軍閥黑暗勢力政治。

三、肅清一切反動勢力。

四、建立真正保護人民利益的政府。

五、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

六、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權。

七、增加工人工資，規定最低工資額。

八、限制物價高漲，保障工人生活。

九、要求八小時工作制。

十、星期日，節日休息，工資照給；不休息，工資加倍。

十一、恢復失業工人工作，僱主不得藉罷工關廠，抵制工人。

十二、不准打罵工人，濫罰工資。

十三、不得任意開除工人，開除工人須得工會同意。

十四、規定因工作而死傷的撫卹金。

十五、工人在疾病時，廠主須負責醫治，並須發給半數以上之工資。

十六、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產前後休息六星期，工資照給；童工不得做過重的工作。

十七、改良工廠之設備，如增設門窗、天窗、廁所等。

至於罷工人數，據共方記載：十九日十五萬人，二十日增至二十七萬五千人，二十一日增至三十五萬人，二十二日又增萬餘人，總數在三十六萬以上。至第五日總工會即下令復工。但據當時租界外文報紙謂：第一日六萬五千人，第二日五萬五千人，第三、第四日即漸復工。

其時孫傳芳之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對罷工者下令「格殺無論」，派隊巡邏各街道，捧大令、執大刀，隨處斬決逮捕，四日中，死傷被捕者在百人以上，學生、市民亦有之。

在罷工中，向軍警奪取少數槍枝。（註二）罷工之後，中共上海市委及中共中央均有告民眾書，主張召開市民會議，組織上海市民政府，於此可窺見中共欲建立蘇維埃式政權之野心。其共同政綱如下：

上海市目前最低限度共同政綱

- 一、由上海市臨時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會，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轄於國民政府。
市民代表大會由工、商、學、兵、自由職業者（教職員、醫生、新聞記者、律師、會計師等）以各職業機關（如各職工會、各馬路商會、各學校學生會等）為單位，按人數比例，選舉代表若干人，各政黨各派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每年召集常會四次，每年末次常會改選其執行委員會，其執行委員會中之主席團即為市民政府。
- 二、市內一切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皆絕對自由，非經市民代表大會的執行委員會之緊急法令，不受任何限制。
- 三、撤退各國海、陸軍，收回租界，統一市政。
- 四、不分國籍的徵收市內一切居民財產（土地在內）累進稅及所得累進稅，免除紙煙、染缸、菜場、保衛團等一切苛稅雜捐。
- 五、確定發展市政（尤其是貧民住所、馬路與自來水）及教育之經費。
- 六、頒佈勞動保護法，中、外工廠商店均須一律強制執行。勞動保護法須規定八小時工作制，規定依物價而增高其必需工資，限制童工年齡，女工產前後之優待，改良工廠衛生，改良童工、女工工作條件，規定死、傷、疾病的撫卹及保險辦法，承認僱人解僱之團體契約權等。
- 七、成立失業救濟機關。
- 八、限制自由增加房租。
- 九、現有的保衛團改歸市民政府直接管轄，並擴大到市內各區，分區組織武裝人民的保衛團、保衛全市治安。
- 十、改善本市警察及駐滬軍隊的兵士生活，按月發餉。
- 十一、由市民政府設立糧食管理局，嚴格管理糧食之輸出入及其價格，以裕民食。

十二、由市民政府募集交通公債以發展鄰市間的交通事業，如汽車、小輪、航船等，以充分供給商業及軍事運輸。禁止軍隊自由拿船、扣車妨害商業及交通。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

(原載「嚮導」週報第一百八十九期，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此次罷工事件，中共竟有一個暴亂團體，殺死反對罷工者及「壓迫工人者」十餘名之多，引起市民恐怖與反感。俄人且欲促成畢庶澄所部直魯聯軍與外國軍隊發生衝突。此項內幕，在四月六日張作霖搜查北京俄大使館文件中暴露出來(詳第八章第一節)。其文件如下：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蘇聯鼓動工潮及挑撥中外兵衝突會議錄

(「蘇聯陰謀文體彙編」政治類二十三頁。)

列席人員：赤維特果夫、左吉果甫。文委：阿爾諾切爾那克。

(前略) 上海赤黨暴亂團體之工作頗見成效。該團體曾殺死罷工者及壓迫工人者十餘名，一般人因之逃亡者有之，改變主義者有之。工頭人等爲與此項工作之團體聯絡感情，有約彼等飲宴者，席間聲明彼等皆非惡人。(著者按：此一「暴亂團體」，當係暗殺團或工人糾察隊，爲收買流氓所組成者。)現在決定：對此普通工作酌減，而致力於剷除重要人物，該團體在慘殺時間並未受若何損失(中略)。吾等應繼續工作，在外國軍隊中宣傳。最近期間將散布由俄國同志等交來之傳單。吾等極希望畢庶澄兵與外國軍隊衝突。此種時期已到成熟，因兩天以前，有山東兵十餘名經過外國租界被英兵扣留。彼時一般士兵聞此消息，皆持槍欲赴租界營救，雖軍官哀懇士兵勿擊英人，勉強罷爭，而山東兵對於英國兵感情非常惡劣。

貳 三月暴動事件

三月二十日，國民革命軍已抵上海近郊之龍華，軍方預先奉令，避免與租界內之外兵衝突，而駐防上海之畢庶澄所領之「直魯聯軍」正在洽降，是以革命軍暫按兵未動，而中共爲奪取軍警武裝以裝備其工人糾察隊，於三月二十一日，以上海總工會名義宣佈罷工(註三)，並從事進攻警署及軍閥守軍。其時守軍戰志崩潰，警察亦坐待收編，是以一遭受工

人羣衆攻擊，即紛紛繳械，自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起至二十三日下午六時止，最後得革命軍之助，敵人軍警即告瓦解，共方亦無正確死傷報導（註四）。可知此次暴動，並無必要，乃中共誇稱之爲「上海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走入最正確之路線」，「是儘量使用了革命的技術，勇敢真誠的遵守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教訓。」

當二月罷工時，共方負責人，已知者爲李立三、趙世炎、羅亦農、瞿秋白與其妻楊之華及侯紹裘等。隨即自廣州調來周恩來，負軍事之責，調來陳延年，負江浙區黨務之責。陳獨秀，彭述之亦在上海（註五）。此時中共首領廬集上海，三月暴動，顯係企圖奪取上海政權。暴動失敗，彼等遂相率去武漢。

此次暴動，工人參加者號稱八十萬人，避開租界，而在上海週圍進行。據共方記載，各區「激戰」情形如下：

因爲敵人所在地的勢力強弱不盡同，廣大的淞滬區域，有帝國主義的租界橫貫於中央，暴動突起，在當時的作戰劃分於下列七個區域：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與開北。

七個區域中的行動，前後開始於一小時以內，惟解決及成功之遲速不同，尤以開北一區，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後六時止，前後兩日一夜始解決，統計激戰至三十小時。

南市——是包括上海縣城的滬南區域。暴動未發前，南市全城的羣衆，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區的羣衆，陸續齊集於街市中。一時半武裝動作開始，先進攻警廳，二時即完全佔領警廳。同時，佔領電話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佔領。從警察廳與各分署中，徒手的羣衆奪得了槍械。沿途的游巡隊，在最短時間中，經羣衆繳械降伏。大隊由警廳進攻兵工廠，無激戰而降伏，四時完全佔領兵工廠。南火車站是時已無敵蹤，被羣衆佔領；鐵路工人奪得車頭往來運輸。五時到華商電車公司集合。廣大的南市區域，在四小時內便全部解決。

虹口——在租界區域夾間之中，三面接壤於租界，一面近市郊，無駐兵，只有警署，在時間上說，虹口是首先被佔領的。虹口電力、絲織與金屬業的工人羣衆，當暴動開始時，最先發難，奪得警署，奪得槍械。逃散的警察，利用地方的流氓與工人爲敵，時來襲擊工會，襲擊已佔領之警署。因此而工人糾察隊既戰勝警察，復抵抗流氓之擾亂，以武裝鎮壓，維持區域內的秩序，替代警察的崗位，直到全部的勝利完成之後，虹口工人的糾察隊，以武裝管理全區域，撲滅反動派。（著者按：所謂「流氓」、「反動派」當係反共之工人。）

浦東——在黃浦江東岸。黃浦江西之暴動起，浦東所有各廠的工人羣衆，均起而響應，全體工人罷工，先撲攻滬泥渡第三區警察署。圍降警察百五十人，全體繳械。素來壓迫民衆，殘害工人的第三區警察署，首先被羣衆佔領。羣衆奪得武裝後，即進而掃除孫傳芳時代所設置的游巡隊，沿途繳械。羣衆復佔領三區一分所，及三區二分所。當時有由前線潰敗的魯軍，包圍保衛團，被羣衆圍攻而繳械。保衛團對工人糾察隊樹白旗，糾察隊長遂召集糾察隊與全體保衛團，暨參加戰鬥之數萬羣衆，合開羣衆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保安局，武裝佈防。自此以後，工人糾察隊與商人保衛團，合同管理浦東全區。「浦東區各業人民代表會」，立時成立。暴動前後經四小時，而「區民政權」成立，右派與反動派之投機份子，攜帶武裝，偽造旗幟、徽章、委任狀來接收公共機關者，盡被糾察隊拒絕撲滅。

吳淞——是砲台防守地，原有駐軍。自前線潰敗後，畢庶澄的軍隊之一部，復乘車逃吳淞，欲經水路，奪得輪船，逃離滬。但吳淞的工人，與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時間內，起而罷工暴動。鐵路工人、鐵工廠工人、紗廠工人，立時圍攻駐軍，奪取其槍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車欲回上海，往滬寧線逃脫，至閘北江灣路附近，鐵軌已斷，遂據守天通庵車站作戰。吳淞工人勝利後，保衛團亦出而與工人合作。經過羣衆大會後，「吳淞的區民代表會」立時成立，吳淞各工會聯合會領導近十萬工人羣衆，實際管理「臨時區政權」。

滬東——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罷工開始後，羣衆即圍攻虹鎮警察署，繳警察槍械而佔領之。一時許，楊樹浦與引翔港兩地工人羣衆，分頭在韜朋路底之馬玉山路，召集羣衆大會，各處到會者逾五萬人。會後整隊出租界，齊赴閘北。武裝糾察隊至胡家木橋及虹鎮兩處，打碎警察崗亭，佔領五區三分所警局，完全解除警察槍械，奪得武裝。香烟橋警署縱火向羣衆圍攻，羣衆撲滅火勢而解決之。總計前後，擊斃巡官一人，警察三人，餘則僅解除其武裝。大隊羣衆與武裝糾察隊向江灣路進發，欲至閘北；連天通庵路車站附近時，適由吳淞開來兵車一列，羣衆折斷路軌，兵車出軌側地，以排槍及機關槍向羣衆掃射，死傷甚衆。糾察隊英勇抵抗，羣衆高呼革命口號助威。自此以後，即與閘北糾察隊夾擊倒車潰兵，直至翌晨始解決。

滬西——亦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華界即濱北與閘北連接。羣衆罷工行動後，先圍攻曹家渡第六區警署，繳警察械並佔領之。武裝警察隊護衛軍飛渡河往閘北，並與小沙渡警察隊會合，圍攻四區警署，經激戰後而佔領。率領警察隊衝鋒之總指揮死難，警察亦有傷亡。同時，兩處糾察隊分隊圍攻警署第二分所及游巡隊署，俱獲佔領。各警署佔領後，隨即查封。武裝糾察隊集合同攻北火車站，直至翌日。

閘北——以上各區域的行動，都比較的順利。最後的激戰，乃集中於閘北境域內。工人武裝會聚於閘北者，乃滬東、滬西兩部及閘北境內的一部。其餘以租界隔絕，均不能來援。各區域均在二十一日次第解決，而閘北獨相持激戰至兩日一夜。當各處行動開始後，總

工會代表乘汽車至龍華請兵，國民革命軍東路前敵軍白崇禧總指揮方遲疑問，又接駐滬軍事特務委員鈕永建報告，請緩一日進兵，以待畢匪澄投降。總工會代表涕泣力請，最後第一師師長薛岳始率全師進攻。

二十二日下午六時薛師至麥根路，適值北站魯軍潰敗而退，最後的軍閥殘餘始告肅清。前後二日一夜中，閩北境內激戰經過如下：在閩北境內，除警崗不計外，敵人盤據的勢力，多至二十餘處。行動以後，羣衆的主要目標在下列六處：（一）北火車站；（二）湖州會館；（三）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四）五區總署；（五）廣東街分署；（六）中華新路警署分所。嗣後自吳淞開回兵車，在天通庵車站雖被滬東羣衆邀擊，但因敵方人數甚多，武裝極強，於是六個主要目標之外，又增加一處勁敵。閩北的巷戰，遂遍於全境。自十二時起，罷工工人羣衆到街市中者，逾十餘萬。槍聲突然四起。

北站魯軍的大砲，對向市鎮轟擊。魯軍中白俄兵，且以鐵甲車開砲射擊，在砲聲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國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乘機開砲射擊，助魯軍對民衆作戰。（以上兩事，爲糾察隊指揮者所親見，但事後帝國主義者默不敢承認，上海各報紙，亦不敢以此項消息登載。）（著者按：何以十萬羣衆無死傷？）至下午四時，羣衆已奪得各警署與湖州會館。全境內各處警崗，悉被驅散。居民紛紛懸青天白日旗，不及備者，或以手巾被單作白旗懸掛。自此以後，羣衆的武裝，除布防保護居民，免潰兵搶劫外，進攻目標，乃集中於（一）北火車站；（二）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三）天通庵火車站。三處在一直線上。工人糾察隊夾於三處之間；對於北站取防守勢，對俱樂部取包圍勢，對天通庵車站取進攻勢。

巷戰逐漸激烈了。商務印書館俱樂部的敵人雖係少數，但擁有機關槍與多量炸彈，不斷的向羣衆轟擊，十分頑強。二十一日午後四時，糾察隊以紙作書，口呼停戰，投書入，勸降並負責保護其生命。魯軍亦就紙之背面回書，請求停止攻擊，但不肯降。嗣後糾察隊即取包圍戰略，防守終宵。天通庵車站敵人，因鐵路軌斷車倒而驚惶不已，伏兩旁溝中，防守終宵，以軍械力弱，糾察隊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敵人於夜間縱火圍攻，火勢漸熾，燒民房數百間。難民紛紛向工人糾察隊防線中逃走，糾察隊分隊護送往青雲路空地，火勢盛時，糾察隊乃棄防線前進，以水龍皮管，開自來水管猛勇撲救，卒至撲滅火勢，附近居民，義憤填膺，對工人糾察隊感激至於流涕。居民壯丁，以義憤所激，自願加入作戰。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版磚石布袋，爲工人糾察隊布置防線，建築障礙物。火勢熄後，敵人不敵進攻，惟時以排槍射擊，白俄人的鐵甲車，則時以大砲轟擊，英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時時偷襲向我們射擊。此時的工人糾察隊爲保護居民，對軍閥之殘餘作戰，亦對帝國主義者防禦作戰。

通宵的激戰轟動於淞滬全境，各處皆知閩北的戰事，稱贊感嘆工人糾察隊的豐功偉績。翌日（二十一日）天明以後，敵人已至感因

乏，糾察隊仍從各方猛勇進攻。當時居民咸傳說革命軍已至，實則革命軍尚未自龍華起程。至中午，天浦庵車站敵兵解決稱降，俘虜三百餘人，餘人逃散至廣東街者，被糾察隊繳械，至北四川路者，則被日本水兵繳械。下午四時半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中敵人，易便衣欲逃，被生擒，餘人願降，苦戰一晝夜之地最後解決，糾察隊總指揮處遂由五區總署移至俱樂部中，自此以後，全部武裝集中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敵人復用第三次火攻，延燒房屋無數；是時自來水管已斷，無從施救。糾察隊防線退至五次，但敵人亦不敢前進，最後各方隊伍集中後，猛攻一小時餘，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魯兵亦潰退，六時北站遂得克復佔領。因避免與租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之故，糾察隊乃退至車站之後布防。潰兵大隊逃散時，適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長親率部隊趕到，完全將潰兵俘虜。是時車站地雷爆發，但已無敵蹤，最後師師進駐北站。鐵路工會下令修復滬淞與滬寧鐵路，鐵路工人首先復工，依工會令組織交通隊三百人修路，恢復交通，寶山路，寶通路，中興路一帶，居民燃鞭炮慶祝。暴動之功，至是完成。

(滬導一九三三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叁 俄人的導演

當時國民黨人及上海一般市民只知上海工人因響應北伐而罷工，而暴動，而收繳軍、警武器，初不知此為中共武裝工人以武裝自己之陰謀。此項陰謀，更有俄人在背後指使。據伍氏一九二八年英文中華年鑑 (Woodhead's China Year Book) 有如下之記載：

共黨在蘇俄人員指揮之下，曾作軍事佈置，以期在國民革命軍未到達上海以前，即將上海佔領。他們這一陰謀計劃，有一部份在本年四月六日，張作霖部隊在北京搜查蘇俄大使館營武官處時，檢獲其證據。

共黨最惡毒的行動，是在國民革命軍中，秘密設立共黨的軍事核心，儘量展開滲透和顛覆的詭謀；對於西北的馮玉祥部隊，早已發動滲透工作。對於上海有英國方面派來的印度軍，共黨的軍事小組也蓄謀用歪曲宣傳來加以挑撥離間，兼用種種手段來使之腐化。它並曾企圖挑撥當時駐防上海的畢庶澄軍隊，和外國軍隊衝突，以期擴大變亂，以利共黨的「混水摸魚」，和其他奸險的措施。

在北伐軍尚未克復上海前，共黨在上海設有軍事小組，專從事搜集江蘇、浙江以至安徽、山東方面軍事動態的情報，並策動上海工人的武裝暴動。該軍事小組經常舉行秘密會議，參加的有中共份子周某，蘇俄人員查底柯夫 (Jotikoff) 阿諾 (Anno)，齊尼斯克

(Chernisk) 以及布哈洛夫 (Bucharoff)。

(一) 工人突擊隊，總數暫定一千二百名，予以正規的訓練，特別注意如何使用武器。

(二) 工人糾察隊，全部人數五千，準備成立四隊，由迅行成立的總工會領導，但隨時須與小組保持密切接觸；如情勢有變，其第一隊即為基本隊，其餘三隊為後備隊。至其武裝，計有手槍二百五十枝，手榴彈二百枚。

此外，該軍事小組，已會和浦東方面四個農民區的監工取得聯繫，必要時他們將增援上海市區的工人。

實際上該軍事小組之權力範圍還及於五省的暴動委員會，每一委員會都有軍事教練員，和大工廠的工人代表。在軍事行動期間，軍事教練員就是戰鬥指揮人員，他們大多是黃埔軍校的少數共產黨學生。(註六)

在上引中共市委「最低限度共同綱領」中，中共曾提出成立「上海市民政府」，此一「政府」，據稱「上海市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召開市民代表大會，選舉政府委員，成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在爾後四月十二日，上海工人糾察隊被繳械後(詳本章第四節)，該「市政府」並有一公函致國民革命軍總指揮白崇禧(註七)。此一「市政府」，中共及其他方均未見詳悉記載，或係有名無實，但可藉以窺知中共在當時藉奪取武裝以奪取政權野心的一斑。

(註一) 據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謂鈕永建所發。

(註二) 見「上海總同盟罷工的紀錄」，擲彈一八九九期，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註三) 據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稱：鈕永建亦發出罷工命令，工人接到雙重命令。

(註四) 據同上書，工人死者三人。

(註五) 「紅旗飄飄」(8)楊之華「憶秋白」，一九五八年北平中國青年出版社。

(註六) 譯自一九二八年伍氏英文中華年鑑第十九章八二〇至八二三頁。

(註七)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五一四頁。

第三節 漢案與寧案

壹 國共兩方反帝的觀點

中國國民革命與俄國共產革命，關於反對帝國主義，有其相同點，亦有其相異點。其相同點是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

的侵略勢力；其相異點是國民革命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手段，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目的；而共產革命則爲達到根本推翻世界上的資本主義之目的，雖犧牲中國而不惜。在北伐之前，國共雙方都從事於相同點的活動，尙能相安；在北伐後，雙方從事於相異點的活動，矛盾立見。

自五卅運動以至省港罷工，國共的反帝活動均集中於反英。因爲自國民革命之意義言之，英國侵華最久，在華勢力最大，而一向嫉視國民革命，非推翻英國在華特權，中國無自由平等可言；自共產革命之意義言之，英國爲帝國主義之首領，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力量雄冠全球，而在歷史上又與俄國長久處於對敵的地位，如能推翻其在華勢力，即爲削弱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的初步勝利。但北伐以後，鮑羅庭所支配的中共及國民黨「左派」的反帝活動，與蔣中正先生所領導國民革命的反帝活動，開始走上異點。國民黨武漢三中全會所通過之「統一外交案」所稱：「本黨黨員對外交方面有擅自發表變更本黨外交政策之主張」云者，顯係指蔣總司令十五年八月在長沙發表之對外宣言而言。此項宣言深望各國勿再支持軍閥，而應贊助中國國民革命，外國人士如不妨害國民革命，其一切生命財產，總司令負完全保護之責。此爲國民革命應有之義，而鮑羅庭指導下之左派外長陳友仁竟公然指爲「變更外交政策」。茲將蔣總司令宣言錄後：

蔣總司令在長沙發表之對外宣言

中正秉承吾黨孫總理之遺囑，負荷本黨及政府之重任，順應全國人民希望中國自由平等之要求，仗義出師，伸張天討；茲於與吳佩孚決戰之日，謹敷數義爲我友邦告之。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年凡數亂；一亂於袁世凱稱帝，再亂於張勳之復辟，三亂於馮、徐之竊國，四亂於段琪瑞之專政，五亂於曹、吳之賄選。舉凡足以妨害吾國國民革命之事，靡不竭其陰謀；舉凡營私賣國荼毒人民之事，無不盡其惡毒，國無寧歲，民不聊生，此不獨吾黨孫總理引爲深痛，即吾各國之友邦亦當代爲惋惜者也。民十以後，吳佩孚崛起，以繼北洋正統，凡北洋派之餘毒未盡者，吳則長之；人民稍有喘息，吳則殲之；國命之不絕如縷者，吳則戕之；全國所託命之革命根據地，吳則更欲顛覆之。關稅會議，本於中國之自主有礙，不獨吾國人民不願以無聊之會議，害及友邦真正之交誼，降貶吾國之平等地位；即各國之公正人士，亦本國際平等之義，發表反對之主張，良以世界欲求和平，則國際先須平等。當開會之頃，吳氏因嫉段氏之秉政，固曾高樹反對之

旗，乃不旋踵獲政柄，既欲以二五附加，以延長內亂之張本。甘心賣國，實爲人民之罪人，餽誘友邦，更爲和平之公賊。且吳氏自竄踞岳漢以來，早爲國人所共棄，至今僞竊名號，亂發命令，貽禍各省，罪不容誅。吳氏昔日所擁護之曹錕憲法，賄選總統，已爲全國人民所反對；吳氏今果何所根據，以求取得對內外之資格？吳佩孚者，直一叛國之罪犯，人民之公敵耳。至其過去之歷史，決堤殺湖南之民衆，聚斂京漢之工友，無論直皖、直奉之戰，純爲個人之地盤；福湘、福川之謀，皆爲本身之利益，猶且大唱禮教，欺我國人，綜其罪惡，筆不勝書。此而不討，四萬萬人之人格，皆掃地以盡；此而不討，則友邦更受其欺蒙，引起國民外交之障礙。國民政府爲統一中國計，爲救人民疾苦計，爲革命根據地自衛計，爲求將來之國際和平計，爲保持中外人民之平等利益計，爰命中正躬行北征，掃除吳賊，以平國難，完全應全國人民國民革命之要求，履行吾黨孫總理求中國自由平等之使命。其有贊助吾國之國民革命者，皆以最親愛之友邦視之，其有妨害吾國之國民革命者，皆與四萬萬人民共棄之。須知國民革命，皆各國歷史所必經，自由平等，皆各國國家所需要。一國之不獨立，即爲國際戰爭之禍胎；一國之壓迫，即爲正義人道所不許。夫自工業革命以至今日國際戰爭，皆爲殖民地被壓迫者因痛苦不可得伸；而壓迫者之人民損失，亦恒超過所得之利益。恫歐戰之往轍，所以吾民有民族獨立之要求；測世界之將來，吾黨更主國家獨立，即所以求國際和平之根據。故中國之統一獨立，即世界之永久和平，吾國家之自由平等，（即）各友邦之無窮利益。深望各國鑒於我國民運動之光榮，予中國國民革命以贊助，此不獨吾國國民有深切之希望，全世界人民亦利賴之。但中正有重爲吾友邦告者：自辛亥以至今日，各友邦間有未明吾民之迫切要求世界和平之眞旨，每有內戰，軍閥之後必有帝國主義之投機者，發縱指示其間；屢次借款，皆爲延長內亂之因，言及外交，必以助長軍閥爲旨，所以每有一次內戰，國民對於友邦之誤解更深；因而軍閥每有一次勝利，外人之無形損失亦更大。此由其各國對華之政策錯誤，觀察未明，反國民之要求，損本身之利益。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統一中國，實爲完成世界和平，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軍之行動及作戰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若有利用不平等條約，援助軍閥，害我國民，致爲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縱欲保其友誼，亦恐礙於正義，此則不得不於戰前聲明，以求我友邦諒解者也。吳賊之罪惡已至滿盈，中國之假擾十有五載，中正敢領導全國之民衆、革命軍人，於最短期間，撲滅禍國殃民之軍閥，進求國家之統一。要之，中國之獨立，即世界之和平，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敢援此義，反覆聲明。其扶持正義贊助我國民革命軍者，中正受之敬之；如其有妨礙我革命運動者，中正攘之闢之。敢掬忱悃，敬告友邦，謹此宣言，昭示天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發於長沙軍次。（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發。錄自「蔣介石全集」，並經就「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所載校正。）

武漢方面外交活動與蔣總司令背道而馳，於是造成漢案與寧案。

貳 漢案（註一）

民國十六年一月三日，漢口宣傳員與租界英國軍警發生衝突，英人撤退，武漢軍警進入英租界，因而將租界收回，此一事件，當時稱爲「一·三事件」或「漢案」。

漢口爲通商口岸之一，原有租界五處，即英、法、日、德、俄五界。德、俄兩界已收回，至是存者有英、法、日三界，均臨江。英界最大，佔地一一五英畝，有外僑七一二二人，華人七、二八八人。

鮑羅庭至武漢指導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作爲「最高權力機關」後，其反帝策略以反英爲中心。

當國民政府於十五年十二月初遷至武漢時，英駐華公使藍浦生先至武漢等候，與代理外長陳友仁作多次談話。據友仁稱「雙方感情頗爲融洽。」關於承認國民政府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藍浦生頗爲動容，並表示以後繼續商談。但鮑羅庭之反英乃本諸俄人既定政策，並不因友仁之接觸而改變。

適天津發生江鎮寰事件，遂成爲鮑羅庭反英之口實。

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工作人員被英租界巡捕逮捕，其中有共黨份子江浩之獨生子江鎮寰。英捕藉口彼等不承認爲國民黨員，遂以普通罪犯引渡與張作霖。鮑羅庭乃就此事件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中提出反英辦法及行動如下：

「現在首先要決定在反英大會中如何宣傳及主張。其次，如英、法不處分關係此案之領事，不釋放同志時，應有以下運動：（一）應否採取對英經濟絕交及其他必要的報復手段；（二）應否於人民要求時，對英、法在中國的一切宣傳者亦拘捕之，以交換被捕同志；（三）應以此事情通知各地黨部，召集羣衆大會，提出民衆的抗議，要求釋放被捕者，不可引渡，但避免直接衝突；（四）應由政治部通告各軍隊，說明不能忍受此種恥辱，同時通知國民軍（按：馮玉祥部）作同樣運動；（五）應致電張作霖，不可摧殘本黨同志；（六）被捕七同志如已被難，應召集全國追悼大會；（七）外交部向英國嚴重抗議，詳述真相，普告英國人民，希望工黨與我爲友者反對此事；（八）宣傳總意歸結到帝國主義

與軍閥勾結。租界爲反革命大本營，此後收回租界爲革命運動之事實問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濟生三馬路開「反英市民大會」，李立三爲總指揮，到會羣衆號稱二十餘萬。會中決議要求收回英租界。十六年一月一、二兩日，召開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三日召開反英、反奉大會，到會羣衆號稱十餘萬。三日下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生宣傳隊在江漢關附演說，聽衆聚集甚多，英水兵上岸干涉，引起衝突，雙方各傷五人。其經過情形，據漢口市公安局報告如下：

漢口市公安局呈外交部文

爲呈報事：昨日下午二時，據職局警察第六署署長戴維夏電話報稱：「中央軍事政治宣傳隊，在一碼頭中英交界地方講演，民衆聚集靜聽，秩序井然，乃英人無故調多數水兵登陸，密排武器示威，並干涉演講，聽講民衆置之不理。詎英兵胆敢以刺刀殺傷數人，徒手民衆因無力抵抗，請派警保護等語。局長比即派員率保安隊馳往救護，並由電話通知武漢（衛戍）司令部及前敵總指揮部，速派隊前往，協同維護。旋據戴維夏呈報，英人以刺刀刺傷民衆祝香山、方漢山、李大生等，並呈繳英兵馬槍一枝，上冠刺刀，血跡甚多，隨帶同王庚書及受傷人祝香山到局。詢據王庚書供稱：「適才經過該地，見一英兵持槍刺傷數人，經羣衆將槍奪下」等語。復據保安隊長……等報稱：英兵又刺傷張義貴、明宿生等前來，局長並親履該地與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開槍激變，並勸導民衆解候政府處理。幸雙方允可。局長以事關外交，即親赴南洋公司（大樓）聯席會議，報告經過情形……謹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一月四日）」

據此，可知英兵已接受勸告撤退。

三日晚，聯席會議開會，推徐謙、蔣作賓向民衆說明，四日晨，又發表佈告，略謂「同胞一人被殺，數人受傷」，政府決於二十四小時內決定辦法。

四日下午，漢口各界在總商會開會，決定對英辦法八項：

一、請政府立即對英提嚴重抗議。

二、令英賠償死、傷同胞損失。

三、令英領將行兇水手交我政府懲辦。

四、撤銷英艦及沙袋電網。

五、撤銷內河航權。

六、英領道歉。

七、英界巡捕繳械。

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

並推代表向政府請求。

下午六時，聯席會議接受此八項要求，嚴重交涉，並令衛戍部陳銘樞派兵入駐英租界維持秩序。

九時許，在新世界大舞台開羣衆會，由李立三報告英水兵行兇詳情，徐謙、孫科、蔣作賓亦代表黨政機關報告。十時餘散會。

五日下午，又在濟生路開市民大會，市黨部代表李國璋爲主席，李立三爲總指揮，旋遊行至英租界，又有衝突。時英界已有衛戍部隊三連開入，原有華捕，均已撤去。

事件發生之日，外交部長陳友仁親赴英領署抗議，請其撤出水兵及義勇隊，解除武裝，由中國軍警接防，否則不負責任。英領當請俟二十四小時請示英使後辦理，旋知情勢嚴重，至四日清晨即撤除武力及工事，七時許，衛戍部已派兵三連入駐。翌日，又增一連，由營長與黨代表陳羣駐英捕房辦公。英人於五日起，因市民入租界遊行，全關門停業上船，陳友仁乃張貼佈告云：

爲佈告事。照得一月三日，英國水兵登陸，慘傷華人，民氣激昂，衆怒沸騰，英租界當局無法辦理，當經本部長嚴重交涉，令其撤退水兵，並於昨日起，由國民政府派軍警入界保護，始得維持秩序。本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議決設立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實行主持英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所有界內中外居民生命財產，概由國民政府完全保護。凡我民衆，務

各協助政府，維持公共安寧秩序，爲此佈告，仰中外人士一體知悉。此佈。

至臨時英租界管理委員會，經聯席會議決定，由外交、財政、交通三部各派一人，武漢衛戍司令部漢口辦事處處長及臨時聯席會議黨代表陳羣五人組成。（七日，聯席會議決由外交、財政、交通三部長任委員，以外長爲主席委員。）

六日，陳友仁又訪英領，負責保護英人生命財產。又，外間謠傳政府將收回日、法租界，各國僑民紛紛逃走，友仁又約美領晤談，告以政府對外人負保護之責。嗣並由聯席會議通知九江衛戍司令賀耀祖及各省，避免與英人直接衝突。此時英國在華外交人員均抱穩健態度，英政府與輿論以及列強均未主張干涉。

自是，漢口租界實際收回，再經過外交手續，加以處理。

漢案發生後，九江英租界亦隨之收回。先是，九江工人對英罷工，六日，有「工賊」一人運糧接濟英艦，爲工人糾察隊所拘，英水兵上前干涉，引起衝突，該水兵奔回英艦，向岸上發炮兩響，事後調查，「華人死一人，傷者無數」。九日，九江英租界即由革命軍獨立第二師派隊接管。

漢口與九江英租界之收回，聯席會議即製定「一三慘案宣傳大綱」，誇大工人糾察隊及羣衆向租界進攻的結果，然一究其實則爲當時國內外情勢所造成。

英國對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國民革命，尤其在廣州建立政府時期，向持敵視態度。但鑒於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現實的英國對華政策，自不得不謀加以適應。十五年八月蔣總司令之對外宣言，必爲英人所重視。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英政府發表「對華現狀宣言」，聲明英政府要立刻無條件的實行華盛頓會議所決定由中國政府增收關稅二五附加稅，並對革命政府表示友善。漢案發生前，英使藍浦生且有武漢之行。此項附加稅，漢口於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即開始實行，而北京政府，由於張作霖剛於十五年十二月始自任「安國軍總司令」，政局搖動，尙在折衝之中。但英國之友善表示，立爲武漢政府所駁斥，指出此項附加，在國民政府範圍之內者僅佔三分之一，而在北京政府範圍之內者則佔三分之二，因而認爲英國此舉無異對張作霖與孫傳芳作「善後借款」以反對國民政府。其時，日本對華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六十，關稅附加，日人受影響甚大，是以英國之聲明爲日人所不喜。當武漢不斷反英時，英國曾邀約美國出

兵干涉，美國置之不理（註二），是以爾時英國在對華外交上處於孤立地位。其時英國保守黨執政，而工黨則同情於中國革命，反對保守黨的干涉政策。且爾時武漢尚未公開反蔣，蔣總司令在一月中旬尚有武漢之行，武漢及九江軍隊均在指揮之下，此自為漢案及滬案行動上有力之後盾。英國是在以上形勢上讓步的。中共宣傳完全歸之於羣衆力量或工人力量，並不正確。

漢案發生之後，莫斯科訓令駐華武官時，指示彼等應利用漢案，擴大反英運動，鼓動羣衆排外，採取劫掠及殘殺手段，以引起各國之武力干涉。當時若非蔣總司令在長江下游採取持重立場，則上節所述上海之工人暴動及下文所述之寧案，必將發生更大之騷動，引起國際上更大之糾紛，而義和團事件亦將再見於此日。

茲將莫斯科是項訓令錄後。

莫斯科根據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 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案致駐華武隨員訓令

（按：此件業已被焚，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燬，僅遺全文二分之一，照譯如左。極要。）

（著者按：本件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政治類九至十頁，未記時間，當緊接一九二七年一月漢案之後。又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見第八章。）

茲特附送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並將根據該項議決案所擬定之訓令寄發，仰即遵照辦理可也。

一、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運動之國民性質。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以國民黨爲中國國民獨立黨，而爲有利於國民黨之宣傳。應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之態度實爲證據，第一可以證明國民黨國民工作之進步，第二可以證明歐洲各國反對中國革命戰鬥力之顯然衰弱。

二、必須於張作霖軍隊所佔領之地域內造成排歐之混亂。

三、破壞張作霖之威信，宣傳張氏爲國際間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妨害中國國民黨自由工作之受僱者。

四、激動反抗歐洲暴行之風潮及英國計劃（以下被焚）。

五、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黨衆排斥外國人。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黨衆之適用武力戰鬥。爲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徹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事件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

六、現時應暫緩實行共產黨綱，因此時實行，可使張作霖之地位鞏固，並加重國民黨之分裂。吾人已向鮑羅廷嚴重訓令，暫時停止對於資本階級之過激手段。張作霖失敗以前，應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國民黨內暫行保留國民之各種階級，資本階級亦應保留。

七、實行此種排斥歐人之運動時，保存各國間之不協調非常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數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爲特別重要。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但於激動排斥外風潮之時，將日本除外，殊足引起不愉快之觀感，故實行激動排斥外風潮時，必須假托反對不列顛（英國）之名義也。

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揮人員（以下被焚）。

叁 寧案（註三）

寧案，一稱南京事件，發生於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其時直、魯軍戰敗退出，革命軍入城，隨即發生革命軍人侵入英、美、日領館，殺害館員，同時又有侵入教堂、學校、醫院，殺害外國傳教士事件。此一事件，經外電渲染，轟動全世界，幾召義和團之禍。

當時入城者爲魯蘇平之第二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爲共黨李富春，程潛之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爲共黨林伯渠（彼其時在武漢參加會議，不在南京）及賀耀祖之第四十軍。三軍均歸程潛指揮。

本案發生之後，程潛於三月二十五日報告，指爲「反動份子」所爲，此「反動份子」究爲何人？屬於何方面，並未能指證。電文謂「反動份子乘秩序未定之際，煽動逆軍及地方流氓，對於外僑掠奪財產，焚毀房屋，並無傷害生命情事。」此等搶犯，當即槍決多名。報告中稱：英、美軍艦砲轟下關及城內，官兵死三十餘人，燬房屋無算。三十一日，武漢外

交部長陳友仁致英、美抗議書內容與程潛之電文略同，並謂逆軍衣國民革命軍之制服。但英、美、法、意、日五國代表於四月十一日聲明書中所述，及彼等向陳友仁面述，均謂爲程潛部隊有計劃所爲。又據鈕永建所派駐寧垣代表章杰向武漢報告亦暗示爲程部所爲，其搗毀英領館，擊斃英人兩名，英領事亦傷足等情，章杰曾往查勘，認爲「情形甚爲可慘。」本案發生時，外人之轟動情形，據胡適「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一文中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方軍隊逃亡後，國民革命軍即進入了南京，對城中的外國人予以無情的打擊。侵犯外國人的住宅和領事館，殺死了幾名外國人，其中有美國教會主辦的金陵大學的副校長。停泊於長江的外國炮艇，於是發炮阻止進一步的侵害行動，並掩護逃亡的外僑避入小艇中。

拉脫萊特教授(K. S. Lakourte) 記述此一事件說：「南京事件，激起了外人的憤怒，使他們在某一時期，竟有採取強烈干涉的趨勢。」

南京事件那一天，我剛好由紐約到芝加哥去，我可以感覺得到，一向同情國民革命的美國輿論於一夕之間突然改變，轉而反對革命。可是是直到將近一月之後，我到了東京，一個日本外務省的朋友領着我出外觀光之前，我還沒有完全瞭解這種「廣泛的」(外國)干涉「如何的險些發生」。當時「東京每日新聞」正在其新建築中舉行「現代新聞事業展覽」。我的日本友人對我說：「胡適博士，我只希望你去看一個小室。」這一小室的三面牆上貼滿了南京和上海發給「東京每日」總社報告日本駐南京領事館被掠，日皇的照片被污辱，日本領館衛隊長因奉令不得抵抗憤而切腹等新聞的原電報。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天便有四百多封急電。「甚至到現在你也可以感覺到日本在這重大的一天會有什麼感覺，」我的朋友說。他然後又告訴我，列強會鄭重磋商干涉中國的問題，據他所得的情報，日本政府是反對干涉者之一。

實則當時外人之死亡者僅三、四人，既無姦淫，亦未放火，自非大規模的排外活動。國聞週報「寧案調查紀實」一文，報導當時實情，此文缺點在對搶劫領館及殺死外人方面，未加詳報，其他情節則頗爲客觀，堪供參考，轉錄如下：

寧案調查紀實

(民十六、六、十二、國聞週報四卷二十二二期。)

三月二十四日之南京黨軍劫掠外人一案，當時外電開動世界，以為黨軍亦變為義和拳，殺死外人幾百名，某某領事等斃命，又劫奪外人財產若干，又某某領事夫人被姦云云。一時北京之英、美公使，持論極為激烈。不數日外電自為反證，謂僅死三、四人。而於被劫、被姦等事，則至今猶無異詞也。外人於此事之發生，初概指為黨軍，繼則指為黨軍中之共產黨所為，且謂係黨軍軍官之豫定行動，不然何以除外人之外無被劫者也。即黨軍當局至今亦無其他之反證焉。此事在今日幾釀成爲世界之確論，不特外國人信之，即中國人亦多信之。今日寧案交涉雖由激烈而和平，二次通牒各國未再提出，然世人大抵謂出自美國對於南京政府之善意爲之也。記者初在北京，即疑此案必不如外電所傳，繼而研究外電所自行反證者，亦多不可解之點，未敢信今日悠悠之所傳焉。此次游寧，至後即詢之現時駐寧之四軍司令部，以其爲最初入寧身居規案中也。所言與外間所傳，固大不同，然亦多不能指證，且有不能自圓其說者，記者亦不敢盡信。住寧半月，逢人輒詢真象，得證漸多。最後遇楊君某者，爲言當規中曾本好奇心四出察看，述其目見者十餘處，所得聞者二十餘處，證以記者之心得，乃知此案真情大有異於世人所傳言者。此案交涉現尙未結，雖不無明日黃花之感，記者亦有不得不盡平反之義務者也。茲述其大要如下：

直、魯軍本身決定南京命運之不可救也，實在三月二十三日，故至是日下午五時起即開始退寧，徹夜未息。是晚八九時即有黨軍第四十軍之第一師師長谷正倫所率之一團，已入通濟門。見城內寂靜，燈火不甚明，即時退出，因其後路大軍隔離尙有二十餘里，恐以少數中伏而被覆也。盡是役黨軍之作戰者，爲魯濬平之二軍，程濟之六軍及賀耀組之四十軍之三部。程由皖之當塗入以攻大勝關，黨軍之西北，賀由皖入以攻寧之正南，此兩部作戰極烈，魯由浙之宜興入，以攻寧之東面，戰事較和緩。當二十九日晚，此三軍均逼近寧城，以黑夜未盡審敵人虛實而未敢深入，至二十四晨五時，始相繼入城。而直、魯軍由下關渡江，至是日午前方止，褚玉璞亦於十二時後方渡江而去，黨軍之至下關，亦在午正，故其時猶與直、魯軍殘部小戰也。其時未得退出寧垣之直、魯軍，實不下數萬人，至見黨軍入，即拋棄槍枝於路，自去軍服，雜於亂民中。即就大方旅社之直、魯軍團部言之，約十餘人固無一亡退去者，蓋自信即爲黨軍所俘亦無生命之憂也。是日黨軍之入者至高爲師長，因軍長均在後方，故無一人入焉。此爲當日兩軍出入之大概。

規案之開始實自是日午前起，至正午後而甚，至次日(即二十五日)午前而止，蓋各軍入城時本無巷戰之事，故其入也實整隊而來，約合三軍不過萬餘人而已，初入時各軍急於尋覓駐房及收檢敵遺軍器軍用品等，以萬餘人任此工作，可見其必甚忙碌，故至正午後始得休息。據親眼見者云：有一、二湖南口音兵，手無槍枝，大聲言「有要發洋財者統隨我去」，於是洋車夫、流氓等，千百成羣，附之而入

外人之教堂、學校、醫院。至實行搶劫時，則該兵等身穿制服立於門前，見有搶出者則取物美價高者而強留之。甚至謂：「我要此物，你去再搶可也。」一時滿城風動，共搶教堂、學校、醫院至五十餘處之多。此幫搶去，彼幫再入，一地而再搶不已。此實爲當日之現象。至中國人之被劫者僅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係一小舖面）一家而已。外人商業機關被劫者僅大坂公司之躉船而已。有見劫該船者，初爲持槍兵二人上船，謂因無餉，請借若干，初給以二十元，要索增加，又給二百元，尚不退，如是避難該船人約二三千，有與以一元、二元者，一時鈔票飛揚，約不亞五六千元。日人不能耐，遂急請日本兵船開砲，此爲該船買辦所自詡以爲功者也。但衆口一詞，均謂行劫者，始終未見有十人以上成羣之兵士，蓋一、二人或三、四人爲最多，若軍官領率，則無論至如何下級，均無人焉。以時間及事實證之，蓋必各軍入城駐紮安定後，兵士歸營休息，不肖者託詞請假外出爲之，或入城之初，即托詞外出，亦事所不免，但究竟爲至少數也。又聞總部人言，行劫者，以六軍人爲比較多數，二軍次之。蓋入城之兵，賀軍之外，六軍約五、六千餘人，二軍約三千人故也。賀軍紀律最佳，無論何人，亦未有證其會行劫者，但聞有兵士遇行劫者負贖物以行，該軍有一兵會奪而有之，持歸營中，爲執法官所知，報告軍長，即時梟首示衆云，此一場轟天動地之劫案，其內容實情不過如此而已。

然實際上搶劫者，領事館之外，僅外國教堂及附設之學堂、醫院而止，中外商業僅南洋公司及大坂躉船而已。此外中國人及外國人均未有被光顧者。在世人自不得不疑爲劫匪之有排外的意味在其中，其實此輩既以劫物發財爲目的，當然說不上有愛國心的排外概念也。據楊君證明此輩所以會劫教堂者，蓋金陵城內外，共有教堂及其附設之學校醫院不下五十餘所，分布四城，均係高大洋房。自直、魯軍勢日惡，寧地紳商無不將其家中所有搬寄外人宇下，至二十四日前的數日間，滿街大車搬運，尤其忙碌。全城流氓、土匪無不目之而垂涎三尺。蓋至是全城之一切精華，均歸此五十餘所之外人屋中矣。即外國領事館及各國躉船亦無不如是者。黨軍於是日早間方入城，何以即知及此，此必爲流氓、土匪乘機煽動不肯兵士起而爲之。而教堂多有槍枝自衛，流氓不敢擅動，故必假兵士以威脅外人而後乃能爲之，此亦自然之勢也。且入城士兵多爲湘人，素不諳地理，何以於入城數小時後即能盡全城教堂而一網打盡，此尤足證必出流氓、土匪之豫定計劃無疑也。且自黨軍逼近寧城，流氓、土匪之投效黨軍自任偵探擄奪者遂陸而來，指不勝屈，故尤有利用士兵之機會也。二十四日早間入城不數小時，劫事即起，其時各軍政治部人到者極少，且彼輩多文士，奔馳半日，入城即佈置住房辦公，尤無注及外事之致力，故謂爲政治部下級人員之共產分子爲之，吾不能不爲西披呼冤也。

當二十四日各軍入城者僅一、二師長，餘多爲團長，軍長則至次日始到，團長分位既小，何敢行非常事件之處斷，故當時雖見有劫者亦不敢過問，故至次晨其風猶未息。至二十五日午前十時前後，日本兵船砲艦三艘泊於下關，其第十八號即開始放砲。蓋其事前殆已

與英，美各艦接洽安定也。故十八號砲艦放十餘砲，美艦繼之，英艦又繼之，共放一百二十餘砲乃息。各艦所放之砲，一實無定之標的，不過向城內亂打而已，當日北京外電傳爲向何山擊敵何處兵匪云者，實爲掩飾之詞也。擊死中國人生命卒無確實之調查，據所知者，僅擊死三人，據傳言則死三十餘人，共毀傷財產則實不爲少，即就夫子廟商業學校言之，實以美艦之兩炮炸焚者，已成焦土矣。此外言者雖多，而最大物件亦無也。當二十五日晨賀、程、魯均以昨日以來搶劫，即時會商懲止之法，即時派出師、團長等領兵分區剿辦，不問何軍之兵，見搶者即殺，其時外艦之砲，亦來矣。搶風至此遂全息。不知者謂爲外砲擊散，其實係由各軍長派兵鎮壓而止也。並由各軍自查，如有贓物在手者，即自行槍斃，故程軍斃四、五十人，魯斃二十餘人，賀斃一人也。軍官及政治部人員無一被殺者，此可知其即無一有贓物者也，果有下級官長在內，豈有無贓物者，豈有得贓不殺而獨可以殺兵者乎？且果有官長領導以搶，則爲整排或整連、整營之兵，既劫之後，何能師營？此次各軍所殺均係零散兵士，故雖殺多人而未嘗有一排一連之損失，蓋被殺兵士，當行刑時猶多大聲呼冤，謂其所得之物，係街市上搶來，或從土匪奪來者，此亦足證明其非豫有整個的對外人之計劃也。

當行劫之初，目的本在得財，故雖間有持兇器者，亦始終未傷一人，而外人尙有死傷者三、四人，則多以外人當時自持兇器，欲恃此以行正當之防衛，而行劫者，乃亦以此行其正當之防衛，遂至有死傷，此證之外電亦能明之。至謂爲行姦，則此地人實無道及之者，記者再三訪詢，均視爲笑談，謂外人不惜自污其名譽以訛人，未免太卑下。記者引某外人之言，謂婦女受不可說之污辱，即其自認被姦之證，聞者無不爲之捧腹。某師長且謂：我軍轉戰半年，於姦、殺兩字實可以質鬼神，對天地，豈見了數名之半老鬼婆而不能忍俊乎！我軍兵無過三十歲以上者，是未免辱我軍兵士名譽矣。

被劫以後，外人本多離寧者，即由各軍及公司局派人看守其地或其物件，近日各物主已有自來向當局交涉恢復原狀者。日本領事館近日如是，聞其汽車、馬車、電燈、電話等均由當局爲之修理完善，日領不日即擬回館辦公。前此五國提案，本由英人利用外電之造謠鼓噪，以激動美、法人意圖以苦我，我當局窺見此隱，故從公式上雖未容納各國通牒之意，而事實則使各國多得其滿意於不言中，蓋如懲辦行劫官兵一條，則被殺之兵至六、七十人之多，而官長則六軍、二軍幾全盤加以處分。至損失物件，則多修理恢復原狀，此在各國間，除英國外，均應能滿意。但各國開砲之毀傷我國人生命財產者，不知各國將何以對我也。且各教堂領館中之物產，多爲我國寄存者，如必按件索償，將來各國是否對物主負賠償之義務，此亦將來之重大問題。寧城教堂本以美人爲最多，英、法人無幾焉，日無教堂、學校，但須藤醫院實被害。總算此賬，外人損失實可謂至微。而我國人之被砲殺、砲毀及奇頓教堂而被劫者實不知若干倍於外人，乃外人竟大吹大擂，欲藉此以行其壓迫手段，至恐我人責其無理，乃竟假婦女之曲線美爲盾牌，藉以抵吾人公理之矛焉，此又世間之一大不

平事也。吾國上海婦女真被強姦者則可判爲無罪，而未強姦者則反假託被姦以凌我，世界公理之謂何？此記者今之誌此，實敢負文字責任以爲世界公理者告也。（六月二日）

但龔德柏「還是愚話」稱：外國男女多被強姦。日海軍陸戰隊少尉荒木向龔自承受辱，卒自殺。

不問當時林祖涵是否在南京，不問寧案是否中共有計劃的豫謀，亦不問當時暴動是否如外電所傳之甚，然本案如非蔣總司令迅速約制，則在華俄人與中共，必將依照上述莫斯科訓令，繼續造成更嚴重之糾紛，可以斷言。

本案發生後，蔣總司令乘軍艦本擬赴南京，聞變，未停，徑駛上海。龔德柏則謂：中共事先令林祖涵轉告程潛謀害蔣先生，故程潛登艦勸阻之。上海係於三月十二日克復，蔣先生於二十六日抵達。共產黨原計劃發動一個星期日大遊行，被擁護蔣先生者改爲一大歡迎會。蔣先生旋接見新聞記者，表示對寧案願負全責，業經派員澈查，任何官兵，凡經證實有暴行者，定予嚴懲。更說明其對外人立場如下：

一、國民政府之政策爲不用武力或羣衆暴動以改變租界之地位。茲更鄭重聲明，國民政府所採者爲和平方法，即協商方法。

二、國民革命之目的，在依照總理遺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三、凡願以平等待我之國家，不問其過去會否壓迫我國，中國均視爲朋友，願與之合作。此項聲明，立即引起外人之信任，使寧案問題走上外交解決之途徑。

蔣總司令向外人重行申明：對於寧案之煽動者定採取迅速處置，不稍姑息。隨即派兵將南京附近之鐵路截斷，以孤立南京之部隊，經過暫短接觸，即將孤立之部隊繳械，對犯罪士兵，立予正法。第六軍受懲後，殘餘部隊向上游逃竄，而至漢口。（註四）

蔣總司令此一明快措施，阻止了寧案之更爲惡化。

對蔣先生以上一系列措施，鮑羅庭立即將其鬥爭的集中點由對英，對各帝國主義，轉而對蔣。據鮑羅庭四月一日在武漢政委會報告所云：「南京事件並算不了什麼一回大事，最要緊的，就是我們自己中間，有許多灰色態度的人，他們

現在已有一隻腳站在反革命方面，將來或許兩隻腳都站過去。……假使帝國主義者切實幫助反革命派，那就可使革命軍消滅。……我們應當使用各種的對付方法，極力宣傳，打消帝國主義者所散佈的一切謠言。……特別是對武裝同志宣言。」又云：「現在反動份子自由委派重要官長，損害黨權，使帝國主義者躍躍欲試。……所以我們要明白：反帝國主義運動，要同反革命運動聯合舉行。」「對本國人民及軍隊所發之宣言，要說明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陰謀，同反動派有關係。」（註五）

鮑羅庭所謂「灰色態度」，「反動份子」顯然是暗指蔣先生。寧案未能發展成爲更惡劣的形勢，鮑羅庭是很失望的。

（註一）資料來源：①「國聞週報」四卷二、三期，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三八三至三九八頁，③「新時代」二卷四期蔣永敬文，及蔣君「鮑羅庭與武漢政權」八九至一〇九頁，④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七號，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

（註二）此爲著者當時在武漢從報紙上所知悉，此項報紙，台灣不見。

（註三）同上蔣永敬文及書。

（註四）採自曹顯光「蔣總統傳」（一）八八至九〇頁。

（註五）同註三。

第四節 南京清黨

觀上章及本章各節所述，南京清黨，實遍處此。

正式清黨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實行，一稱「四、一二」事件。是日，蔣總司令在京、滬等地看管共黨份子，並收繳上海工人糾察隊之武器。

壹 監委會通過清黨案

先是，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緊急會議。出席者有蔡元培、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張人

傑、吳敬恆、李煜瀛、陳果夫等，佔該會人數三分之二。由蔡元培主席，由吳敬恆提出中共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敬恆提案原文如下：

吳敬恆致中央監察委員會請查辦共產黨函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吳敬恆謹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總理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分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黨員李大劍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看共產黨有謀逆之準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黨份子，有兩層用意：

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為，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

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鬥爭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

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專予以最大之庇護，且藉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為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正叛亂。本委員以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為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譎為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愉快迷離，一犬吠影，衆犬吠聲，函電紛紜，詈罵交關，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巧其虎踞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廷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為若輩包圍，脫離逆跡，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辭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為共產黨之責；若

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止是贗鼎。」陳說：「你更瘋癲，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麼？但你以為康有為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形。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即亂以閉語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於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盤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聽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為內部奸賊，仍未澈底剷除，那裡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 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的一般舊軍閥。

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的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裡去取燬果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

(二) 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

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閉首喚起語，所謂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麼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箭剝蕪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已可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為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腳的爪，最

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讓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在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澈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這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試，難道因為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尙够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仰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總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澈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思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裡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耀，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多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仁書，曾言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屢更其國籍。鮑羅庭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閉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脫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事來是惡惡辣辣，說謊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爲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之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帶首者甘爲傀儡，鮑羅庭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會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蓋，脫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脫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止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正好共產黨去新嘗試，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列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贊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等之言，則明明爲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爲俄煽動員鮑羅庭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爲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爲變相之屬國，控之總領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有人脫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爲最惠國，猶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率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據。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攻堅肉搏之時，而肆其營兵抑將之謔，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議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客氣，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黨難下摧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迅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份，合併附呈備查。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

敬恆提案，經監察委員會一致通過，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措施，將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就近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此項檢舉咨文如下：

中央監察委員會咨中央執行委員會檢舉共產份子文

（銜略）竊本會職責所在，「黨員施政方針，是否根據本黨政綱」，尙應過問，則棄裂本黨政綱，釀成亡黨賣國之行為，尤應舉發。是以本會委員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於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開臨時會，決定於四月二日下午七時，召集中央監察委員會等全體緊急會議，到會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張人傑、吳敬恆、李煜瀾、陳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爲主席，由吳敬恆提出共產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一案，經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復由各委員報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江西、安慶、上海共產黨之所爲，皆有不利用於國民黨，受外人指使之事實，其騷亂社會，擾亂後方，尤其餘事。故全場一致議決，將訪查所得首要

各人(名單另附)，咨請貴委員等以非常緊急處置，姑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致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仍須和平待遇。一方面由貴會公決，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共議處分。再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皆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顧問鮑羅庭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為發生疑問，並請貴委員等應按着事實，分別接受與否，其准予接受施行者，以備下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追認。其有不得不否認者，應暫時擱置。因中間雜有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適釀大患也。本會此等建議，因防止非常大亂，恐亡黨賣國不及救止，為萬不得已之所為。是否有當，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請公核，如有失察，甘受處分可也。並將吳委員敬恒提呈一扣，先行由電附達；其本會議記錄一冊，隨後郵奉。謹咨。四月十日。

咨文以外，中央監察委員會發出青電，歷數武漢聯席會議不合及可痛心之點，已載第六章第三節。

貳 蔣總司令解散總政治部

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會議主席接受監察會咨文，即轉令看管共黨份子。四月十日，蔣總司令首先電令解散中共份子操縱之總政治部，並令各軍、師、團、營部各政治部，嚴密注意此種搗亂份子。

先是，武漢光復，總政治部即隨總司令部遷至武漢。及蔣總司令抵南昌，為適應軍事需要，乃成立總政治部南昌分部，以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主持其事。時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在武漢一意附共，擅以主任名義派何遂為軍長，又擅設總政治部滬、寧兩辦事處，以郭沫若、林祖涵分任主任(註一)。總司令電文中所謂：「把持總政治部者竟喪心病狂，假借名義，潛植反動勢力」，當與此等越權行為有關。電文如下：

蔣總司令解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電

(銜略)查封總政治部佈告：總司令部之設置政治部，目的在整個的國民革命軍中統一政治訓練，團結戰士精神，使全軍將士皆成總理之信徒，為三民主義而作戰。乃自出發以來，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傳訓練等工作，祇圖破壞國民革命軍

之戰線，分散國民黨革命之力量，以故軍事之進步愈速，內部之糾紛愈多，若不嚴加制止，整個的國民革命軍，將因受私惠而分離，因分離而崩潰。中正受總理付託，膺黨國重寄，斷不忍觀其如此。不特此也，政治部職責，原為軍隊中政治的訓練，而若輩利用與將士有直接往來，竟破壞軍令之統系，對三民主義之忠實同志，盡量排斥，對阿附過激之私交，則盡量延致，國民革命軍之總政治部，幾為少數跨黨分子及投機少年所獨佔。因此之故，犧牲生命以求三民主義實現之戰士，遂成為別有肺腸者之前驅。自克復武漢後，上下數千里，革命血染山河，均呈社會不安之現象。國民革命軍為解放人民而來，又怎能聽其如此？更不特此也，在此整個的國民革命軍進行中，殘餘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方互相勾結，對革命勢力作最後之決鬥，在此情況之下，苟為忠實黨員，急應團結一致；而把持總政治部者竟喪心病狂，假借名義，潛植反動勢力，妨礙北伐進行，甚至嗾使黨羽，引起暴亂，喪失本軍之信用，阻礙北伐之大計，此種行為，無異內奸，中正又何能任其如此。根據以上事實之指示，中正為完成國民革命計，實行三民主義計，乃不得不將淆惑軍心、背叛主義、違反軍紀、分散國民黨革命勢力、破壞國民革命戰線之總政治部，下令封禁，并按治其罪。惟在此少數敗類包辦操縱之人，未必無忠實同志，此種同志平日焦頭爛額，懼饑畏饑之苦心，為中正所深知，向望當此革新之日，各上正大之途，中正無不信任，引為同志也。嗣後望各軍師團營部各政治部，嚴密注意此種搗亂分子之軍人，如發現有此種情事，或該政治部仍假名義派人到部，應即嚴行拒絕或嚴行懲辦。此為劃一黨軍政治統系，防止分散革命勢力之要著，急盼嚴厲執行為要。總司令蔣。灰印。（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自南京發）

叁 各地清黨

十二日，蔣總司令在上海實行清黨，並分令各地軍政機關執行，當時，除兩湖在中共及左派控制之下，江西朱培德意存觀望，南京、浙江、福建、安徽各省在清黨前對中共已加以抑制外，上海及廣州為中共勢力頗為囂張之地，均厲行清黨，經過如下：

(a) 上海方面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共所操縱之上海總工會發動暴動，繳獲軍、警數百槍枝，成為工人糾查隊武裝，並成立所謂市民政府，糾查隊動輒捕人，並有衝入租界，引起國際糾紛之說。其時，楊虎來自安慶，陳群來自武漢，訪上海青幫首領黃金榮，杜月笙及張嘯林，結為兄弟，歃血為盟，共同反共，聯合洪幫，成立秘密的「共進會」及公開的「工界

聯合會」，組織帮會群眾數千人，自備武器，臂纏白布，上書「工」字為號，由原任寧波砲台司令張伯歧任總指揮，準備向中共領導之工人糾察隊進攻。出發前先取得國民革命軍及租界當局總領事費信惇之同意。並獲悉共方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為行動首領，顧順章為糾察隊總指揮，周恩來為黨代表。壽華與月笙素有往來，屢欲拜月笙之門。至四月九日晚，月笙招宴壽華於家，至則有四壯士挾之上汽車，疾駛楓林橋郊外，扼之垂斃，遂埋之於叢樹中。十一日夜半後，各隊分別向閘北，南市各工人糾察隊進攻。至四月十二日，雙方發生槍戰，當時東路軍總指揮兼戒嚴司令官白崇禧，第二十六軍軍長兼戒嚴副司令周鳳岐，對雙方持械工人實行繳械。此項任務於是日清晨執行完成，其經過，據共方資料，大致如下（註一）：

總工會之糾察隊總數共有二千七百人，分駐閘北、吳淞、浦東、南市四地。十一日下午四時後，忽有二十六軍第二師大批軍隊，散佈街市，形勢十分緊張，糾察隊總指揮處亦迭接各方密報，謂今夜將有「流氓」，聯合軍隊襲攻工人糾察隊。糾察隊總指揮處當即送函二十六軍司令部，請求萬一發生不幸事件，望予援助，但未得答覆。糾察隊總指揮處遂通知各地糾察隊，加緊戒備。延至次晨（十二日）四時左右，各地「流氓」、軍隊，同時動作，向糾察隊進攻。茲將各地經過分誌如後。

一、閘北總工會會所。十二日晨四時許，總指揮處方面據閘北會館總工會會所發生槍聲，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著者按：當係顧順章）即往該會館總工會會所觀察情形。入內略事休息，約過二十分鐘，槍聲復作，糾察隊總指揮外出探視，即見有六十餘人，臂纏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會所內放槍，門前糾察隊二十餘人，亦向之抵禦。未及十分鐘，又有大批二十六軍部隊開到。當有五團團長邢靈如向糾察隊謂：「請你們不要還擊，我們來，為你們繳他們的械」，說畢，即將所有槍械，未經抵抗，即完全繳下，並用繩索捆綁。糾察隊見狀，即請黨軍入內吃茶及香煙，邢團長、章營長即對糾察隊總指揮謂：「既有今夜這件事實發生，請你同我們到二師司令部，見我們師長，商議解決辦法。」總指揮即偕六糾察隊員同往，行至半途，邢團長謂：「他們槍械已被繳了，可是你們的槍械，也應該繳下才好。」總指揮答：「不可，他們是搗亂的，我們工人糾察隊是革命的，如何能够繳械呢？」章營長即指揮衛隊，將總指揮及糾察隊之械繳下，又令他回會，下令全部糾察隊自動繳械，總指揮堅持不可，謂：「本會委員長外出，未得總工會命令，不能擅專。」於是邢團長、章營長即說：「是的，繳械這事，是不好看，不要繳吧！我們另外想法子，請你們把槍通通拿起來。」該會糾察隊見總指揮被捉，只得依言三叉式將槍靠好。黨軍又逼令糾察隊，向後退三步，並將機關槍等對準湖州會館糾察隊，至此遂無能為力。黨軍即入內佔

據該會，辦事員亦全部退出。隨後邢即要總指揮同赴第二師師長處談話，總指揮無法反抗，遂同到寶山路天主堂二師司令部，時在上午七時，至下午三時許始出。

二、閩北商務總廠。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在俱樂部對面）樓上，本有糾察隊六十餘人，耳門有六人通宵守衛。十二日晨五時許，忽有六人自租界出，臂纏白布，上書黑色「工」字，手執盒子砲，向耳門守衛轟擊。守衛與之抗拒，但樓上糾察隊已有被彈擊傷者。俄而二十六軍大批從寶興路方面開來，大呼：「不要打，我們都是自己人，不要誤會，我們是來調解的。」及抵門首，即令守衛開門談話。守衛即依言開門。門啓，大隊入，上樓將糾察隊完全繳械，並將簿子問及商務工人辦事室完全抄過，計抄去步槍六十餘枝。糾察隊員由後門向公學校逃避，並被拘捕一人，解至二師司令部。

三、閩北商務俱樂部（即糾察隊總指揮處）。商務總廠糾察隊被繳械之同時，約在五時二十分左右，俱樂部總指揮處。忽來手纏白布「工」字符號者二、三百人，在該號鐵門前高喊一聲「散開！」即有數十人向前門衝鋒，並大呼「繳槍！繳槍！」。時鐵門前糾察隊副隊長楊鳳山與之理論，該項人等即將楊所携之盒子砲一枝奪下，並當場將其擊斃，轉向內面衝鋒。登時槍聲大作。初僅長槍盒子砲聲，繼以手提機關槍，閉至十數排之多。在內之糾察隊，亦作防禦戰。至八時許，第二十六軍第二師派出第五團前來，並携一函，略謂「貴處與某方發生誤會，應即雙方停戰，如有某一方面不服從調停者，即解決某一方面，調停時間以十一時為限」云。該部隊一至，即向俱樂部取包圍形勢，並擬進內交涉繳槍，糾察隊方面不允。第五團團長邢某，要求派代表同往上海總會交涉，而總指揮不在，適此時有職員周某（著者按：當係周恩來），從某醫院得悉此訊，急奔至俱樂部內，力謂可負全責。該團長又謂須先向司令部呈明，周君即偕往，當被禁於司令部。該團長即回俱樂部，要糾察隊全體集合談話，說：「外間對於今早這件事情發生誤會，最好由我派一連徒手士兵，與糾察隊徒手遊行一次，表示切實聯絡。」糾察隊員是時鼓掌贊成。後糾察隊出發，該團部隊在寶山路一帶者，乘機紛擁入內，將俱樂部佔據，並將檯械全部搜去。

四、閩北天通巷路。天通巷路樓流所，駐有總工會糾察隊四、五百名，十二日晨七時半，亦由司令部派遣第四團前往繳械。雙方開槍約半小時左右，糾察隊不敵，終屈服，並被捕去五、六人。

五、南市華商電車公司。十一日晨三時許，有形似工人臂纏白布黑「工」字符號者，約二百五十名，自法租界南洋橋乘汽車衝入華界。彼等手持槍、盒子砲、炸彈等。分三路包圍南車站前面之華商電車公司：一由南站火車軌道越過，一由兵工廠望道橋而過，一由滬軍營地方前進。迨越軌而過之一隊甫至南站前門地方，為糾察隊放哨之士兵所見，向詰口號不合，急向電車公司報告（該公司內亦有糾

察隊百餘人駐防），乃由糾察隊發令拒敵，時已四時三十分。二十六軍一團三營及機關槍一連亦到，先放空槍兩響，繼以步槍，至五時許未能攻破，乃用機關掃射，兩面牆壁上之槍洞，密如蜂窩，附近電車線亦完全倒下，垂地如綯。至六時，遂將大門打開，各兵一擁而入，於大門內抄得舊式機關槍四架，盒子砲四桿，手槍三枝，步槍三百餘枝。

六、南市三山會館。圍繳南車站後面三山會館糾察隊槍械之軍士，係二十六軍二團一營楊其藻部。該部於十二日晨二時半開抵該處，即將會館四周包圍，先由連長翁國華、排長傅國俊叩門入內，限十分鐘內將槍悉數繳出，當即遭拒絕。該部遂開始用機關槍、步槍、迫擊砲等分兩面射擊。因館牆高厚，彈不得入，遂用仰射法，彈子紛紛由高下墜在內，糾察隊則分藏大殿及後屋等處。至五時頃，槍聲稍息，越五分鐘，兵士又高吹衝鋒號，槍聲又作，傷糾察隊五名，死一人。至六時許，在內之糾察隊一百餘人，知困守無益，遂閉門繳械。軍隊一擁而入，繳步槍三百四十五枝，重機關槍五架，新式機關槍二架，手提機關槍三架。各隊兵士制服亦均卸去。並將大隊長何傑等多人，連同槍械，一並解至新普育堂團本部。經團長趙觀濤一訊明，即行開釋。隊長何傑，於下午解往龍華總指揮部。

七、浦東各處。原駐浦東三區警署糾察隊第八隊，春江碼頭第九隊，暨各分隊約六、七百人，每晚與該地駐防軍隊，輪流守衛。是晚得總工會命令，特別戒備，多未解衣而臥，至清晨四時許，軍隊來換班，糾察隊多回隊休息，軍隊遂乘機攻入。糾察隊不加防禦，紛紛棄械由後門出走。

八、吳淞。吳淞糾察隊向分駐三處：一在大街西市聖公會；一在旗站大管公所，為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宿舍；一在大街。十二日晨三時，由軍隊前往，分令將所有軍械繳出，糾察隊無抵抗，只開放空槍兩響而已。

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亦恰於是夜赴杜月笙之約，不見歸來。

工人糾察隊既經繳械，白崇禧發出布告如下：

「為布告事：本早聞北武裝工友大舉械鬥，值此戒嚴時期，並當前方用兵之際，武裝工友任意衝突，殊屬妨礙地方安寧秩序，本總指揮職責所在，不得不嚴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隊將雙方肇事工友武裝一律解除外，並派員與上海工會妥商善後辦法，以免再啓鬥爭，而維地方秩序。所有本埠各廠工友，務各照常工作，毋得輕信謠傳，自貽伊戚。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律知悉。此布。（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陳羣，當日即派董福開等十餘人為專員，組織委員會，調查處理本案。該會即在前上海總工會

會址湖州會館宣誓就職，決定取消上海總工會及工界聯合會，而改爲「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在各報刊登啓事，指責共產黨徒操縱上海總工會，利用工人，供其犧牲，並勸告工人在統一組織之下，努力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

十四日，中共組織之「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被搜查，人員解往龍華司令部。中共與左派所操縱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亦由潘宜之等接收。上海學生聯合會被改組。中共之「中國濟難會」亦予封閉。

四月下旬，上海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楊虎任總司令，陳群任軍法處長，以一杜月笙門徒任行動隊長，執行清黨任務，被捕共黨嫌疑份子在一千人以上。中共爲之語曰：「羊虎成群，民不聊生。」

(b) 廣州方面（註三）

廣東清黨由李濟深主持。濟深於四月五日赴滬，參加龍華會議，十二日返粵。中共方面即頗感恐慌，陰謀抵抗。十四晚，廣州全市即特別戒嚴，濟深派遣海、陸軍、保安隊及武裝警察分別駐守各地。半夜十二時後，由一向反共之廣東總工會及廣東機器工會體育隊爲先鋒，進攻共方之工人糾察隊，緝私衛商隊及赤色工會，由第四軍二十師師長即臨時戒嚴司令錢大鈞部及李福林部分頭助攻。時工人糾察隊一部留駐東園，一部駐西園，其餘悉駐粵漢路，與附近所謂農軍早有聯絡。農軍原先預備五千人集中廣州近郊援助。十五日已到三千人。一部進駐西郊援助赤色工人，與革命軍作猛烈抵抗。至午後二時，軍方頗有傷亡。迨生力軍趕到，共方抵抗不住，紛向西村一帶潰退。但西村原有軍隊堵截，故剩餘槍枝，全被繳去，並捕去百餘人。此役共方死傷約百人。廣三路激戰情形亦相若。結果，共方敗退，被繳槍二百餘，惟傷亡不及粵漢路之多。因粵漢路有「農軍」援助激戰，時間較長，而廣三路之援軍，即「農軍」趕到時，糾察隊已被擊敗，遂即退去。廣九路共方工人，人少力弱，無甚抵抗，即被繳械。當革命軍開始襲擊糾察隊，衛商隊時，同時反共之工人佔領各共方工會，並逮捕職員，凡總政治部、工代會、罷工委員會、濟難會、婦協會、婦運所、中山大學及第一中學等共方機關，無不被攻入搜捕，清黨動作，繼續一星期之久。據共方報導，共捕去二千餘人，死者二百餘人。被捕工人悉分別禁錮於公安局、戒嚴司令部、警察廳及南關戲院等處。至黃埔軍校則和平接收。

直至六月底，李濟深因廣東共黨殘餘尙潛伏於各工會，計畫反動不絕，乃計畫第二次征伐共黨，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逮捕約二百名共方工人，尙在繼續搜索中，市內一般民衆，與反共工人極平靜。六月二十九日，警備司令部公安局突然襲金屬工會等，逮捕共產分子，其內有主要人物之目者十三名，即時在黃埔槍決，此次搜捕之時，抄出槍百餘枝並炸彈二枚。

南京於四月十二日起清黨，十五日決定設立國民政府，十六日汪兆銘在漢口通電加以指摘，十七日武漢國民政府通緝蔣先生，寧漢分裂，遂成定局。

(註一) 國軍政工史稿(上) 二九四頁。

(註二) 「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四九四至五〇〇頁。及「杜月笙傳」，載「傳記文學」第十一卷一、二期。

(註三) 取材①十六年四月武漢方面郵報，藏中央黨史會，②十六年七月十日國聞週報四卷二十六期。

X X X X X X X X

方志敏(一九〇〇——一九三五)江西弋陽人，漫初在江西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在江西從事農民運動，並因國民黨容共，而把持江西省黨部及各級黨部。一九二七年清黨後，乃從事農民武裝活動，以「兩條半槍」起事，竄擾於贛、閩、浙、皖邊區。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次圍剿之後，稱「抗日先遣隊」北竄，一九三五年被國軍包圍，俘虜，解南昌行營，處死。

吳玉章(一八八一——)字永瀾，四川榮縣人。民前八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參加黃花崗之役，不死，再去日本。旋返川，參加廣州兵變。民國肇建，在南京任總統府總務科長。二年，耐震失敗，赴法，入巴黎法科大學，自此思想左傾。十二年返國，在川組「中國青年共產黨」。十四年赴平，正式加入中共，仍返川活動。十五年黨選國民黨候補中委，自是在國民黨中央從事赤化活動。十六年參加南昌暴動，任僑革命軍委會祕書長，敗後，赴日。十八年至莫斯科入中大受訓，自是在哈爾濱、莫斯科及巴黎從事國際宣傳。二十七年返國，任歷屆參政員。二十八年返延安，任魯迅學院、延安大學校長及文化運動。三十四年當選中共中央及政委。三十八年偽政權成立後，任政務院立法委員會委員，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及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等職。玉章專攻歷史，以學者自況，經常從事文教活動，能置身於黨內鬥爭之外，為中共老五之一。先時任三屆人大常委。

第八章 俄人之幕後策畫

以上各章，屢次提及鮑羅庭之專橫與俄人之陰謀，以從事於破壞中國革命，其實際情形如何，均於本章加以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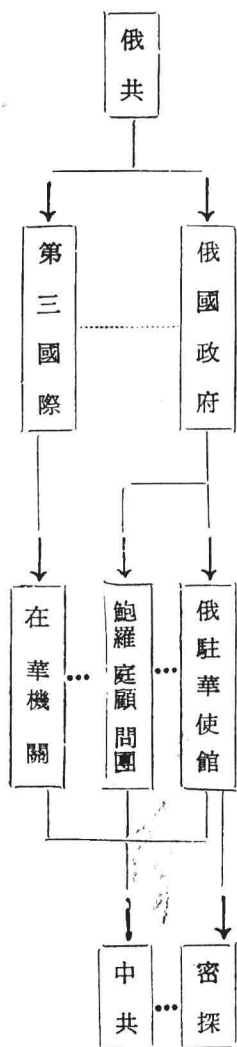
第一節 北京搜查俄使館

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南京清黨前八日，在北京之張作霖搜查俄國大使館，將所得百數十箱文件，編爲「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擇其要者譯爲中文，次要者舉其目錄，都百萬言，於是俄國赤化中國之陰謀大白於天下。

時奉軍自稱安國軍，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安國軍於辦理本案之初，即派人密商之於駐京各國公使，公使雖無異議，但以中國軍警入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區，有悖於辛丑條約，宜由外交部出面協商。安國軍以之告外長顧維鈞，維鈞遲疑未動。旋以京津謠言甚熾，中外疑懼，乃再由安國軍總部商諸英、法兩使，兩使召集各公使會議，同意在某種條件下進行搜查，其具體辦法由總部與荷蘭領袖公使會商進行。五日晚，總部召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至授，以方略，定翌日清晨執行任務。六日上午，軍警及便衣人員入俄使館搜查，拘獲共產黨人李大釗等六十餘人，檢出關於蘇俄赤化中國之文件甚夥。下午二時，俄使館武官室忽起火，意圖毀滅文證，旋被撲滅，損失不重。

在所搜獲之文件物品（包括武器、書籍等）中，發現第三國際、俄共與俄國政府、俄駐華大使館、鮑羅庭與其政治及軍事顧問以及中國共產黨，完全是一體的，有關的指揮機構，圖示如下：

俄共赤化中國系統圖



——↓示指揮線。……………示聯絡線。)

至其工作對象則分爲三方面：(一)對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則採合作、分化及蠶奪策略，(二)對奉系及直系軍閥則採利用國民革命軍予以擊潰策略，(三)對國際帝國主義則採以反英爲中心，而分別先後，各個打倒策略。由於其工作地點在中國，則中國自將首當其衝而蒙其禍。

其經費開支(甲)蘇俄密探局一九二五至二六半年度預算，共計美金九三。八六三元，其中中共中央軍事人員薪俸五〇・〇〇〇元。(乙)對於馮玉祥軍費共計美金一四八・三八〇元。(丙)對於國民二軍、三軍經費共計美金一四一・二四〇元。(丁)對於廣東方面經費共計美金三八三・九三三元。總計美金七六七・八六六元。此一數字，以今日觀之，微不足道，然在當時當能發生支配作用。

有關蘇聯在華密探之情形，「蘇俄陰謀文證彙編」所載者凡七件，由此類文件，可知蘇聯在華設有軍事及政治兩種特務系統，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揮，在華亦通過使館互相協助。軍事密探組織只有縱的關係，而無橫的關係。各地共產國際機構，在國民革命軍中顧問人員均須協助軍事密探工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代表，且接受蘇聯訓令，參加其北京軍事總機關部，以從事「研究及計劃吾人(俄國)在中國之軍事行動等項工作」(見第四件)。似此，則第三國際固爲俄人之御用機關，而中央則百分之百爲俄國特務之爪牙矣！

上列七項文件都約三萬言，茲僅節錄其密探組織法於下。

第一件 蘇聯在華密探組織法(節略)

一、宗旨 (甲)研究中國實力部分之組織及兵力，並時時注意其軍隊發展及擴充情形。(乙)隨時搜集有關軍事之材料，並注意與中國關係各國援助中國之數量而編輯之(首應注意者爲日本及英國)。(丙)上項材料，隨時寄往莫斯科及北京，並由海參崴寄往西伯利亞軍司令部。

工作之方面及範圍，應注意以下兩點：(甲)須認定蘇聯與日本及中國有戰爭之可能。(乙)須認定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能以發展，因之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及新大陸，不致予蘇聯以封鎖。對於甲項，吾等應詳細研究中國北部及高麗各地之情形，以該各地爲未來之戰場(以該處爲進攻之起點及軍隊集合之中心，並在該地籌備後助)，注意該各地出產及其有組織之軍隊，對於國民革命運動之態度。對於乙項，亦照上項辦法研究中國各部分之情形，以該各部分爲反帝國主義運動接濟之來源，並認爲將來在抵抗日本、英國、美國及其餘

各國時，蘇聯與中國有聯盟之可能。中國現時大局之具體情狀，爲兩大主要軍閥之活動，即奉天派（張作霖）及直隸派（吳佩孚）是也，兩派與廣東國民軍及外國人之相互關係，處於具有組織之工人、農人及知識階級之發展的國民運動中，被牽入於戰鬥之漩渦，日甚一日。吾人據上述之觀察，對於中國實在狀況之研究，應以蘇聯最高革命委員會之意旨及其具體計劃爲根據，定吾人進行之方針；因該委員會爲全部軍事工作唯一之全權機關也。再應經由主管之中央機關之密探總局，並與戰事計劃機關保持協議。所有莫斯科中央方面之意向及計劃，應根據駐華平時及戰時各項偵探之報告爲之確定。故該偵探等對於中國全局之研究，應力求洞悉。吾人工作前途根本步驟與嚴格的範圍，均可依此定之。一切詳細情形，見諸計劃書內。在當地之工作，必須與大使館及大使館武官處（指導機關）及國際共產黨部三處之動作一致。

二、職務 爲實行以上宗旨，須組織大規模之探訪機關，搜羅及教練各種探訪人員，散布各處，隨時加以引導指揮。各探訪機關，平時須預備妥善；一至戰爭時，即可供諸材料，不致發生困難。組織須堅固，通信須靈速，且須與本總機關部及各軍隊、土匪等通消息。

三、機關部之組織法 密探各分機關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機關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員。各分機關部除得消息後，各自報告北京總機關部，由北京轉達莫斯科，在中國之各分機關部，得藏設於使領館等機關內，以託庇護；有時亦得暗設於市上飯店商號之中（按日本人在東三省，德國人在中國內地，皆係此種辦法），現爲節省經費工作便利起見，宜正式藏匿於大使館或商務代表處等機關，因吾俄人頗不易與華人發生關係故也。又如廣東俄國技師、顧問能與該司令部有直接關係者，分機關部即可藏彼處，以資保障。惟在此種保護之下，無論如何，須以能保全秘密，及隨時探寄消息爲要。

四、與外交偵探之關係 本局與大使館之關係，即得到軍事材料，按期兼送。又與大使館武官處之關係亦同。而大使館及大使館武官處兩方面特別材料，亦兼送本局。本局人員遇必要時，大使館須發給外交護照，並在使領館內留予相當位置，俾可與官場發生關係，辦理中央交辦事項，且可保障其行動自由，秘密行事。本局各分部與各處領事館及總領事館之關係亦同。

使領館各外交機關，須與各分部預備住所，保障工作之安全，保守所有之秘密，協助一切。

五、與政治偵探局之關係 政治偵探局國外部密探，探得軍事材料，應隨時供給於當地本局或分機關部。惟現在各處所得材料或不傳遞，或僅傳遞一部分，殊與工作前途有礙。於工作之完善上，及所得材料之整理編纂上，均多不便。甚至已得之材料，本處須重行搜羅，費力甚多。縱使此項材料可在中央（莫斯科）交換，不但多費時日，亦且聲氣隔閡。如此，欲期各地方偵探機關全部進行，勢所不能；故各偵探機關應將所得之材料，隨時傳遞於國政局外務科。國政局亦應將自己區域範圍內之計劃，與偵探機關互相交換。若本局或

分機關部遇有採集政治材料時，亦可請當地政治密探代爲偵探。所有關於軍事密探事件之工作，應集中於國政局外務科之手；但應將此項工作之結果，隨時通知本處各分機關，該各分機關亦可將軍事密探事件，送請該外務科查辦。

六、與國際共產黨機關部之關係 共產黨各機關部須在當地隨時協助本局分機關部尋覓秘密住所，幫同搜羅探員，其軍務處亦須時時與本局各分部接洽互換軍事材料。接洽方法，須斟酌當地情形，秘密辦理。

七、與國民軍內顧問之關係 國民軍中之顧問技師，係遵照大使館武官處給予之方針，單獨工作；但彼等遇有關係之材料，皆須供給當地本局分機關部。吾等探員辦理事項，或假借顧問、技師等名義，名爲司令部人員，但仍直接受北京總局之管轄，辦理北京總局交辦事項，由北京總局領取薪水。至於假借領事館人員名義工作之人亦同，各分機關部之全部報告，皆須供給司令部之顧問，其密探並可辦理司令部一部分之事務，但辦理之事，必須報告本局。

八、與商務代表處、商船處、遠東銀行及中東鐵路等機關之關係 以上各機關，須盡力協助密探局，供給各種材料。其互相協助方法，斟酌當地情形辦理。

九、海參崴庫倫東京附近各機關之關係 本局各地分部除後表（後表缺）所載人員外，其餘人員，不得與上述各機關有來往。北京密探總局與上述各機關應交換人員，及業經編訂之材料，並互相協助。

十、密探之分類 中國戰爭不息，政變極速，以致軍隊之變化，倏忽不定，除在一地方常駐之密探外，必須添設周遊各處之外動密探，追隨軍隊，偵探事件。又因鐵路非常阻滯。電線亦有時斷絕，爲使密探員與密探機關互通消息起見，須委派通信員，傳遞消息。

十一、分機關部設立之地點 按照中國疆域及外國人在中國之勢力，與現在戰事情況，則本密探分機關部應散布之地點，可以明瞭以中國之勢力範圍而言，大約區分如下：（一）奉系方面，爲東三省。（二）日本方面，爲高麗與關東。（三）直系方面，爲揚子江流域。（四）國民軍方面，爲西北各省，京兆區域，亦在其內。（五）國民黨方面，爲中國南部（廣東）。共計分爲五區。

中國北部與蘇聯及蒙古、朝鮮等地接壤，按照地理關係，除北京中央密探部外，至少亦須設立三個密探分部，一在奉天，二在哈爾濱，三在海拉爾，齊齊哈爾，吉林亦極重要之地，就蘇聯與日本有戰爭之可能看來，自然的軍事運輸區域，當係南滿線。至於旅順、漢城、安東、奉天四平街、洮南、吉林等地均係重要區域，擬設密探分機關各處如下：

（甲）哈爾濱密探分機關部（第三號）管轄吉、黑兩省分團，如海拉爾、齊齊哈爾及吉林之處是。至於哈爾濱聯絡之部份，則爲奉天及海參崴兩處。內動密探分機關部有四：一在哈爾濱，一在海拉爾，一在吉林，一在齊齊哈爾。……

(乙)奉天密探分機關部(第一號)管轄遼東、四平街、安東、大連、營口、錦州等處。至於與奉天聯絡之部分，則為哈爾濱、漢城。內動密探分機關部有六：一在奉天、一在安東、一在四平街、一在大連、一在營口、一在錦州。……

(丙)漢城密探分機關部(第二號)密探分團五處，均歸漢城密探分機關部管轄，其五處地點如下：(一)漢城、(二)謝信(譯音)、(三)干站(譯音)、(四)釜山、(五)里結(譯音)，至於與漢城聯絡之地點，則為奉天與海參崴。

(丁)北京中央密探部(第四號)管轄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察哈爾、熱河、綏遠等處；至於與北京聯絡之部分，則為莫斯科、庫倫、海參崴、東京。……

(戊)揚子江流域上海密探分機關部(第九號)管轄所謂聯盟之五省，即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至於與上海連絡之地點，則為海參崴、廣東、漢口。……

(己)漢口密探分機關部(第十一號)管轄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及青海特別區域；至於與漢口之連絡地點，則為上海、廣東……

(庚)中國南部廣州密探分機關部(第六號)管轄廣東、廣西、雲南；至於與廣州連絡之地點，則為上海、漢口。……

各密探機關之組織，即如上述，自然均係擬議之性質，因各該地情形之變遷(尤為戰時)，各密探分機關之組織，無論外動密探員之數額，或根據地點之分配，均將加以相當之更動也。

十二、管轄各密探分部之中央總機關，考察中國全國情形，及核編各處報告文件之總機關，為北京中央密探總部。(下略)

至於俄國密探在南方之活動，當然配合鮑羅庭之反蔣運動，而尤着重於拉攏唐生智以反對蔣總司令。由下列報告可見一斑。惟報告內容僅能顯示俄人之陰謀與希望，而與實情大有出入。

蔣唐分裂情形(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俄國南方密探報告)(「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廣東軍事類五十三頁。)

國民政府移駐武昌問題業已可決。蔣介石已顯露其反對國民黨左派之專橫與陰謀。關於任用汪精衛於國民政府一事，尤足顯明其態度。初則表示甚願汪君歸國，及汪君奉召由巴黎動身後，蔣復發電致汪，內中所敘之境境，示汪無須歸國，電報係於柏林達汪，因此，汪遂仍還巴黎。蔣氏此種行卒為人知，結果遂致多激動搖份子及國民政府右派黨員之一部，均與蔣離異。除國民政府黨員分裂之外，蔣

氏於軍隊中亦失去大部份之勢力。福建、浙江兩省軍官皆不肯力助蔣氏，而與其他軍團互相提攜（著者按：此段顯不確實），如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及第十軍團是也。

第三軍軍長朱培德被任爲江西總司令後，不能維護蔣氏之政策，蓋因國民政府一旦移至南昌（蔣之主張），則朱氏在江西之權力必盡喪失也。第四軍、第十軍均被唐生智疏通反蔣。第十一軍軍長以前所統係第四軍內之第十師，後以第十師改編爲第十一軍。蔣欲以第四軍劃歸第七軍軍長李家柱部下，藉以削弱唐氏兵力，唐氏與第四軍軍長均表示反對，未成事實。因此，李宗仁在九江處於搖動地位，擬遇有機會，即歸附某（蔣）方。李氏來漢口後，受唐氏及其他諸人之疏通，遂驟附於反蔣方面，公然仇蔣。第九軍、第十軍亦陸續加入。唐氏戰勝貴州軍隊，肅清湖南，兵力愈加充足。總之，精銳之國民軍，已均不爲蔣氏所有，第因此遂謂蔣介石已完全失敗，不復能從事於內爭，則爲時尚早也。

民衆對於革命之意味頗示冷靜，對於國民政府亦無一月以前之恐怖景象。資產階級互相團結爲復活運動，提出種種要求條件及各種章程，其一部份已經政府予以批准，蓋革命運動現時已引入經濟要求之途徑，職工聯合會，爲避免危險計，亦不肯爲政治要求之主張，以爲非此時所宜也。

上述種種事實，足以證明國民政府雖已移至武昌，而關於消滅蔣介石內爭之舉，尙未完全收效。

第二節 鮑羅庭之跋扈

上節所述爲蘇俄在華全套特務組織，包括韓國、日本在內。在理論上，在國民政府範圍之內的鮑羅庭的一切特務活動亦應在蘇俄大使館特務系統指導之下，而在實際上，由於鮑羅庭之地位特別重要，大使館並不直接指揮，而由莫斯科指揮。

鮑羅庭 (Michael Borodin)，別名鮑格 (Berg)，又名格盧森堡 (Grusenber)。一八八四年生於俄國，早年參加俄國革命工作。一九〇七年赴美，在美國工作並受教育，後改名鮑格，在芝加哥主辦一所俄人學校若干時，參加美國社會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翌年返俄工作，改名爲鮑羅庭。一九一九年奉第三國際之命往墨西哥吹鼓共產革命，嗣又奉派至蘇格蘭工作，但不爲蘇格蘭所歡迎，被捕，並驅逐出境。鮑氏乃被派至土耳其，充凱末爾總統顧問。最後被派在

匈牙利工作，亦鮮成就。

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先生既已決定聯俄容共，蘇俄乃遣司托諾維却赴粵，謁中山先生，介紹鮑氏，力言其人大可用。鮑氏長於肆應，風度宜人，表面上亦似忠誠可靠，遂獲中山先生信任。鮑自稱信仰三民主義，認爲此正合乎中國之需要，其態度與詞令與馬林及越飛如出一轍。

鮑羅庭至廣州曾發表一項談話，極力討好於中國人民及國民黨，自稱會居中國二十年，反對外國以退步國對待中國之態度。並誇誕俄國革命後，因工、農之努力，使俄國獲得發展，令俄國大多數人民有最大之幸福。其談話如次：

文明國開化退步國

(民十二、十一、七、橋導第四五期)

上海商報載(十月)十九日專訊云：俄國代表鮑羅庭氏來粵，考察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狀況。日昨覺悟社記者趨訪鮑氏，詢以對於中國內情之觀察，鮑氏發揮盡致，極中肯綮，茲譯述如下：

(記者問)先生來華，對於中國社會之觀察如何？(鮑氏答)外人初到中國，別個外人，常告之曰中國人其所處境遇，及其習慣心理等，極難了解，余(俄代表稱)非此等之外國考察家，余在中國居住二十年，豈尙自認不知中國者。余相信此是一種陰險及有時不自覺之宣傳，以使全世界之人，相信中國情確如是不同於別國，及確如是退步，須急由先進國爲之開化。藉此爲外人在華所做之種種惡事之辯護，及爲領事裁判權、外國法庭、租界、管理關稅、自命保護中國主權，及其領土完全等等之辯護。在中國之外國報章上，毀謗中國之愛國要人，使無數外國走狗，得遂其慾望機會，以輕藐中國國民，而待之如次級之民族。此即所謂「文明國開化退步國」之責任。惟余則不見中國與世界各國政治上、經濟上在同一發展之程度上有如何之差別，即有差別，亦不過屬於外物而已。同一事情，別國大行之，似有正當之組織，在中國則小行之，似無組織，其方法或較舊式而已。即指吞款或賄賂者而言，此無他，亦不外文明國人所謂「經紀費」，但無莊嚴之事務所及告白招牌而已。余在華曾遇許多政治家、軍人、新聞記者、科學家、律師、工黨首領、工人、女子，彼等亦如世界別國各兄弟姊妹，具同一之賢愚善惡。余敢說中國較以開化中國爲任務之各國，尤有理想之主義。其所以然者，非中國有異於人，亦因彼爲一被壓迫之國家，國民正爲謀國家獨立，脫離千古未聞之外國掠奪而奮鬥也。

(問)先生對於中國政治之觀察如何？(答)中國在紛亂之狀態中，已十二年矣，凡視中國為許多消費者，天生成文明國消納不知所用之貨物之市場者，此種觀念極感不當，此余所當說出者也。且一大國民，欲圖謀方法以適合別國經濟之需要，實非易事，況彼復不能自由以自救耶。試觀歷史，美國殖民地革命，須經若干年而後終止，法國革命，又經許久而完成其歷史上之工夫，凡社會、政治之大受變動，需經許多時日而後完成，國民運動亦須許久而後能自定其所運動之如何進行與如何貫徹目的。中國現已有一種勢力，為將來引導其國民運動以至於健全成功者，此勢力為何，即中國國民黨。此最後余所滿意者也。該黨現尚未自覺其自己之力量，及未組織完備，以完成其歷史的職務，但吾人深信其不久即能自覺，必能組織完備。蓋吾人一想該黨有如是偉大之領袖，如孫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也。孫先生之經驗，將能供給被黨之所缺乏，其所缺乏者何，軍事精神，及國民的組織二者是也。中國國民黨主義之精神，正在勃興奮鬥，一有軍事精神，及國民組織，則國民黨主義之精神，將更為之增勢。

(問)俄為勞農先進國，革命已成功，中國勞工事業在萌芽，其發展方法應如何？(答)俄人因革命之故，各階級犧牲甚大。但此奮鬥之重任，均落在工人身上。今日吾人(指俄人)之所以能成功者，皆以工人當內亂時在戰壕作戰，或節衣縮食以供給軍隊，而使俄羅斯團體堅固也。勞農革命成功，乃能造成俄國民現在如是發展之境遇，此境遇之結果，即令大多數人有最大之幸福。各國勞工，皆正在奮鬥，以求獲此幸福境遇，但現已得之者，惟俄羅斯而已。故全世界無數工人，皆視俄國工人為勞工奮鬥之先鋒。至於中國之勞工運動，余信其發展之最要條件，在與國民為中國統一自由獨立之奮鬥聯合，如俄之工人一般。中國勞工，必須自造發展必要之境遇，但此境遇須待國民黨所引導之國民之奮鬥之成功，而後能實現，中國一日不脫離半殖民地之狀況，勞工即百無達其目的之希望云云。

鮑羅廷不以退步民族對待中國，正如抗戰前夕，日有田大使向中國領袖表示：日本承認中國為一頭等國家，聽之使人刺耳。其時俄國於軍事共產之後，正實行新經濟政策，國內經濟尚未恢復至戰前水準，人民自無幸福可言，鮑氏談話，顯屬誇大。凡此，似未使廣東方面對鮑氏之信任減低。

鮑氏在中國所扮之角色，自俄國方面視之，乃「中國南部蘇聯軍事政治工作團」首領，作為「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總顧問」，指揮俄國一切軍事及政治工作顧問人員。此項工作團組織如下：

中國南部蘇聯軍事政治工作團體組織大綱（節略）

〔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政治類十七至二十三頁，原文約七千字。）

第一章 宗旨

- 一、組織、訓練中國南部國民軍，將中國國民從帝國主義壓迫下救出，並將中國組成統一獨立之民主共和國。
- 二、幫助政府在中國人民及軍隊中實行民主主義之工作。
- 三、使共產主義及蘇聯國家得一般中國人民之同情，並極力使彼等接近蘇聯，得蘇聯之援助，在軍隊中及民間，組織工人團體，預備作將來之革命運動。
- 四、偵察中國反革命之實力及壓迫中國者反革命之實力。
- 五、研究中國情形，從南方着手。

第二章 組織

- 一、在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中設軍事總顧問一員，該顧問即為本團體之首領，指揮一切，對一切所有事務負責。
- 二、首領下設二幫辦：其一幫辦為代理首領，同時為總司令部之高等顧問；一幫辦為首領之政治幫辦，同時為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中之高等顧問。
- 三、在總司令部各處課，如參謀、偵探、行政、步兵、炮兵、運輸、工程、軍醫等處課，皆須設有蘇聯顧問，指揮各該處課之工作人員工作。
- 四、總司令部處課顧問，受總司令部高等顧問之直接指揮。
- 五、在海軍處、航空署、兵站處、軍事政治學校，每處設一高等顧問，實行總顧問之意旨。
- 六——十、各項，規定每軍設一高等顧問，指揮該軍中軍事顧問、政治顧問及技術顧問。
- 十一、師設顧問及幫辦與政治顧問各一人。

第三章 首領

一——四項，規定首領對國民革命軍之軍事政治工作負完全責任。

首領受北京大使館武官處之指揮，但政治方面須商同廣東國民政府之總政治顧問辦理。

第四至第十七章，規定代理首領，政治幫辦，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處課顧問，國民革命軍海軍處、航空處、兵站處軍事政治學校及各軍之高等顧問、師部、各軍部中專門顧問，政治顧問，各師部中副顧問，政治顧問，普通顧問，以及預備組等之指揮隸屬系統及項目等。第十八章規定，設「軍事政治工作人員南方團體司令部」，作爲「機關之領袖」。此司令部以「司令部參謀長爲領袖，各處處長受其管轄」。其下設「通訊偵探處」及「政務處」，分掌偵探及事務工作。

鮑氏在中國所扮角色，自中國方面視之，則不僅是政府及軍事顧問，而且是黨的顧問，不僅是技術的顧問，而且是決策的顧問。

國民黨的章程是鮑羅庭所起草；國民政府之成立，軍校之設置，軍事之組織，政工制度，均爲鮑所直接或間接予以物質及技術之協助，鮑氏可以出席政治會議，可以發布罷工命令，更可以干涉北伐大計；中共是鮑氏的工具，國民黨左派是鮑氏的外圍，而所謂右派成爲其打擊的對象。最後他着手打倒國民黨領袖蔣中正先生，篡奪中國革命領導權。

鮑羅庭是國民黨的客卿，身任總顧問之職，然以陰謀特務手段對付國民黨；並不問其爲左派或右派。民國十六年七月四日，上海字林西報載有「在華之蘇俄共產黨」一文，作者爲一俄人，爲加倫將軍侍從，曾在漢口參加鮑羅庭之秘密會議，謀刺蔣總司令，由於其意見與其首領不合，幾被整肅，乘間逃出，而將此項密謀公之於世。（註一）

彼曾參加鮑羅庭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及十一日兩次秘密會議，地點在漢口跑馬場後被沒收之楊森住宅，其目的爲謀刺蔣總司令及其親信。該文經國聞週報譯載，如下：

在華之蘇俄共產黨（節略）

本年四月十日及十一日，余兩次所參加之會議，亦即在該處（楊森住宅）舉行。此項會議之動機，係以蔣介石反對武漢政府及其他

蘇俄顧問，彼等遂召集此項會議，以期以可靠及簡易之方法，除去蔣氏及其同僚，以及附從者。

共產黨徒李鐵山及陳武波（均譯音），甫由南京來此，彼等在寧保秘密刺探蔣介石之行動及計畫，此次來漢，曾有報告，謂蔣氏以爲鮑羅庭留在日，則其不能與武漢政府有任何妥洽，並對於武漢政府尚有任何仇視計畫，準備防禦。陳武波又報告謂：蔣氏頗得民衆之歡心，自胡漢民加入後，蔣氏之地位更形穩固。外人對於其反對武漢政府，表示贊助之傾向。李鐵山之報告謂：照此情形，蔣氏似乎可以贏得數軍及師長之心。余（本文作者）所以知此者，係因余曾暫代伏羅新氏之職位，充鮑羅庭之秘書，並守護其房屋，及措置糾察隊之分配也。

當加倫居漢口城外時，余曾充伴隨之職務，亦以此故得同至楊森舊宅，參加秘密會議。余意以爲在南京方面所來之報告，實予鮑氏一種深刻之印象，故召集會議以討論之。兩次會議之被邀參加者，爲司法部部長徐謙，武漢政府顧問披脫老夫，高等軍事顧問加倫代表麥利（此人曾充華文通譯），由南京來此之李、陳二人，著名工會首領及共產黨暴動者李立三，又一陳某，及不能記憶者多人。然須知此次會議，非常秘密，絕對不使陳友仁、鄧演達、及唐生智等知之，若有詢問者，則托辭謂此會議爲一種社交事務，在鮑氏家中舉行，僅歷一小時許而已。

開幕時，宜讀浮丁斯基（按：吳定康）上海來電，向鮑氏要求向遠東銀行鮑氏名下之款項，購買機關報，電文讀後，鮑氏謂所列入援助各種之華文報紙，如「民國日報」等，暗中共謀發起一種反共產運動。鮑氏曰：「各報似已聯合，彼等似已忘却英、日而開始攻擊吾人矣。」

鮑氏續謂其與遠東銀行之特別來往，已於黨軍佔領上海時資助工會，賄賂在兵工廠之將領，爲數不敷，現已用竭，故彼請徐謙使陳友仁及宋子文兩人，立刻在滬籌款，此爲十日會議之內容，對於蔣介石事，未加論及。

翌日，余聞一奧籍猶太人名蔡根司者，將於今夜參加會議，此人各國皆知其爲著名罪犯，爲暗殺及盜竊文件之專家，雖披脫老夫竭力阻余參加，然余仍隨加倫蒞會，加氏並求余勿離其身，其談話之詳細經過，余尚能回憶，茲記之如下：

鮑羅庭以十時乘其自備之車來，遂即開會，披脫老夫當即忿然向與會各人聲明：謂團結革命，有採取激烈手段之必要，凡贊助蔣介石者，悉須剪除之，並應將以上任務授彼及陳麻子爲之。會議並未絕對加以拒絕，但主張持所有認爲有嫌疑者，應以共產黨人試驗之。若彼等不服從，再交付法庭懲辦。披脫老夫聆此項建議後，即奮然躍起，大聲而言，謂此種辦法，又將爲蔣介石操勝算，堅持須不加審問立刻剪除之。並要求大會允可將其清單上所列之人，按其辦法除去之，並準備向會中宣佈各人姓名，披氏取出真人名單，內除蔣介石

之親信外，更有富人名，徐謙起而反對，但鮑氏置之不理，遂簽准決議，並蓋華文黨印於其上，以之授請徐謙簽字，徐謙亦簽字焉。經過此番非常手續後，討論宋慶齡事，據云伊欲赴滬，會上諸人表示反對此項意見，以為孫夫人在途中有被蔣氏扣留，並利用其贊助之虞，並且漢口工人若知宋氏離漢，其信仰及保證必將減退，故決定不允宋氏離去。

有人詢問鮑氏對於反革命有何意見，鮑遂坐而發言曰：「同志多人，曾經建議吾人除去蔣介石，並已有人將擔任執行此項使命。」徐謙遂問如何辦法，鮑氏答稱：披脫老夫已準備擔負此事之全責，且披氏已確有效忠之中國共產黨人數名，於必要時，將願犧牲本身，以完成此事。李立三便起立辯論，謂無須犧牲，因其熟悉進蔣介石司令部之路徑，可毒斃蔣氏，甚為易事，只囑一醫生出而證明其為患心弱而死即可。加倫氏至此遂發言，狀甚忿激，蓋加氏在席上，靜觀各人之言論發言，甚為緘默，然至此乃奮然而起，以拳擊案，而直接向鮑發言曰：「余深知披脫老夫同志效忠於革命，但余有數事欲質問之：第一，彼欲執行其建議，曾得中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共黨莫斯科中央委員會之批准否？第二，彼是否能保證現仍在蔣氏幕下充當顧問之七人，將不遭苦及處決，余要求披同志應先確定之。倘然披脫老夫同志願進行其計劃，而由其幕下派遣在漢無事可為之密探，余頗反對之，事實上，余反對實行此項計劃，余信席上諸同志，將贊助余之主張，請蔣加利同志，將余所言者，譯告各中國同志。」

加倫語畢後，披脫老夫亦起立釋辯，旋即謂另有他事未了，遂借拳爾根離會，加倫之意見，亦經譯成華語，果不出所料，會議決定將披脫老夫之建議，延期決定，並主張將來商議他種方法以除蔣氏，至此散會。但余與加倫及裘利同車返城中，彼等在車中，儘情高談會議事，亦不顧余之在側，彼等痛罵鮑羅庭、披脫老夫，淋漓盡致，同聲謂此等人已將蘇俄在華之事業一旦盡毀。

以上關於暗殺蔣介石事之討論，就余所知已於此告段落，但鮑氏請求中國款項，收買上海之華文報紙，已生效力，因四月底余在滬時，伏丁斯基告李立三，謂彼已得款項，收買報紙及雜誌，雖為價甚昂，但論調已恢復排外而非反共產矣。

至於鮑羅庭在中國之地位及活動情形，該文亦有詳細之報導，如下：

人皆以為中國共產黨當然有重要華人為首領，得加入莫斯科中央委員會之機密會議，並由其指導一切活動，然不知由莫斯科方面之眼光觀之，其視名義上之華人首領，不過如小學生之流，實際上指導之責任，操諸鮑羅庭等人之手。其手下尚有多人助之辦理一切事務，對於華人，殊少信賴，偶遇不關緊要事，始與之商議而已。

在中國及遠東西伯利亞邊陲之共產黨人中，有高級黨員五，對於莫斯科企圖參預之事務，有專斷管理之權，各人皆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之頭銜，此五人之姓名及轄境如下：東西伯利亞秘書高比克、漢洲里秘書維萊迭米羅夫，中東鐵路區域秘書兼鐵路管理首領蘭

昔維却，華南秘書伏倫，管理中國共產黨秘書鮑羅庭，至此可見鮑氏之權力所及，並無地理上之限制。下文所述，可表示鮑氏在莫斯科以外，其行動及決定之自由，少有所阻之時也。鮑氏之授有專斷之權力，初未向華人說明，蓋因華人程度幼稚，而鮑氏等則從事于社會革命事業已歷二十餘年，就此經驗一端，自宜服從之也。

對於蘇俄政府之構造，及其附屬機關之性質，不甚明瞭者，出言之妄，未有如謂鮑氏係獨立性質，與莫斯科並無關係者也。鮑氏與其在華使命之關係，並未取消，請述其詳。五年前（著者按：應為四年前，即民國十二年），蘇俄遣司托諾維却氏赴粵，向孫中山轉達意見，並勸其聘用鮑羅庭為顧問，其時鮑氏正在不得意之秋，蓋在匈牙利煽惑革命，為該國法西底黨所放逐也。孫中山與鮑初不相識，最有關係者，即其時中山亟欲得蘇俄物質上之援助實較聘用一顧問為迫切，故自經與司氏長談，司氏並予保證，即鮑氏應偕同軍事專家同來，蘇俄政府應供給軍械、子彈、飛機、兵工廠機械，並墊款供革命之用，此種任何真正之利益，即保得自未來之顧問者也。

不久鮑氏在粵所居之地位，已頗著名。鮑氏據權，其勢力直達北部，即東西伯利亞秘書高比克亦有時受鮑氏之干預。鮑氏不但利用各領署運送「外交郵件」，且可使用蘇聯通信社之電報以通消息。當余在鮑氏部下服務時，鮑氏地位之尊，權力之大，不但對於武漢政府之閣員常置諸不理，即對於溫和派之共產黨，及蘇俄或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間諜，亦不顧也。其權力伸張，至所有蘇俄之一切活動，即名為獨立軍事機關，亦包括其中，因上自加倫，下至郵差，無不受其指揮，故在華共產黨冒險經營之結果，為外所知者，大半確為鮑氏個人之建樹也。

鮑氏在中國全境組織共產黨之巢穴，組織工人、農民、運輸業職員、各種手藝人及各類小工之工會，創造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革命軍事參議會，創設「中國及亞洲宣傳部」，蓋祇中國一國，由鮑氏視之，似乎太小；鮑氏進行破壞國民黨，組織該黨左派，使共產黨人能在革命中佔優勢焉。鮑氏在漢，以數月之發展，成立一種組織，大體上為蘇俄政治部之縮影，余與鮑氏本身接近，歷時三月有半，故對於該部工作之內容，尚能約略追述之。

辦事機關中，鮑氏之下，有重要人物二人，即其機要秘書伏羅新及客利普夫二人之妻，皆任鮑氏之打字者，故一切秘密事務，不啻即其家事也，伏羅新為鮑氏友人，追隨鮑氏已逾三年，原籍猶太，昔曾充俄羅斯東南部軍隊附屬之政治部主任，其妻為俄人，客利普夫則為俄人而娶猶太人為妻，昔為莫斯科之工人，為共產黨員，現司來往信札，此數人之下，按各人與鮑氏之關係而論，責任較為重要者，當為各譯員，為數則自十一人至十四人之間，……

鮑氏有親信之衛隊二十人，皆係中國共產黨人，由一俄人名奈查利夫者統率之，終日武裝，以防不測。鮑氏偕同其秘書、譯員及衛

隊，居於屋之最上層，有種種特別戒備，入內頗覺不易。以上所述各人，出入無阻，但外人出入，須有特別徽章，其記號或為一種磁質紅星，或為厚紙上繡成紅星，上有絲帶者，當外來者由街中進內，則須在樓梯下停步受盤詰，有時甚且加以搜查，如得許可登樓，則樓下即鳴電鈴警告樓上之見訪者，告以有人前來。

其餘三層，僅敷鮑氏之複雜機關職員之用，最下層為宣傳部及印刷所，該部主任，為一美國無政府黨人，名哲梅生者，係鮑氏在倫敦時所結識之友人，並發衛日報一種，名「人民論壇報」，編輯者為美人百羅姆夫人，助理編輯，一為譯員菲潑令昔夫；一為由莫斯科派來之青年英人，此人為莫斯科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余只知其名為約翰而已。華人之充排印工者，余以為皆係共產黨員人也。

傳單及小冊子等，皆大批印成，其性質自不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現在則又添反對蔣介石一項矣。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之宣言，亦大批印刷，對於反對宗教之宣傳小冊子，亦極為注意，哲梅生對於宣傳小冊子及傳單之工作，係設法使英美海陸兵士得一種印象。

在此鮑羅庭之赤集中，最大一部為第三國際，漢口之首領為裴加利氏，原籍喬阿加利，在俄頗有勢力，隸屬此部者，大半同時有他項職務或派往他地，故在總部時頗少。（尚有最重要人物名單略。惟華人方面有徐謙、李立三、鄧演達、陳公博等。其餘各國人有意大利人、德人、保加利亞及其他，不斷來往，皆負有間諜之使命。）

次要於第三國際者，為軍事部，以加倫為其首，辦公處亦在鮑氏屋中，完全隸屬其管理。

一切軍事行動與政策有任何關係者，先在第三國際大會討論。達到決定後，再交付另一鮑氏參加之會議。鄧演達、陳友仁、孫科、徐謙，有時唐生智皆參預焉。加倫亦參加此種會議並發議論，但決定則無與也。重要軍事，交付中國革命參議會（著者按：或係軍事委員會）時甚少，不過徒具形式而已。

此時鮑羅庭之妻已為張作霖所逮捕，其人亦為俄國特務份子，據該文稱：鮑妻雖自稱為家庭主婦，而實際上在中國婦女中組織一切工作，時國民黨左派召集許多婦女黨徒，從事政治活動及戰地工作，在前方實行宣傳，並在前、後方從事擾亂對方，鮑妻則在其中發動共產黨婦女組織。

據該文所述，在華之特務組織，第三國際人員及俄國駐華使領人員，均在鮑羅庭指導之下。駐北京俄大使加拉罕去

職後，繼任者爲吉爾尼，鮑羅庭爲吉民預擬對北京政府應提通牒之主要點，文未達而北京使館已被搜。漢口俄領事完全受鮑氏指揮，領事館之大廳且時常供鮑氏夫婦及其他共產領袖開會之用。

鮑羅庭在中國之地位，眞如蔣總司令所謂成爲俄國在中國之監督，叱咤風雲，不可一世。

（註二）轉載自「國聞週報」四卷二十九、三十期，民國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與八月七日。

第三節 第三國際之指示

鮑羅庭在中國之飛揚跋扈，從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係根據第三國際所指示之策略，而第三國際之策略，則係根據俄國赤化世界之要求，所以第三國際之策略，即是俄國對華政策的反映。

在民國十五年底，亦即鮑羅庭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及地方聯席會議，決定遷都武漢，並從事「迎汪反蔣」之際，第三國際於是年十二月第七次大會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而此項決議案，是根據史達林十一月三十日在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所作「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詞而作成的。

在史達林演詞中，於照例論及反帝，論及資產階級較軟弱，論及無產階級領導外，特別強調農民問題，主張滿足農民土地要求，主張建立農民政權，而中共應參加此一新政權，以奪取地主土地。農民因供應軍隊所遭受損失，主張應幫助農民反對地主以補償之。此等論點及主張，均爲「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基本內容。

史達林之演詞及第三國際決議案，爲中共於民國十六年在中國行動最高指導原則。如將此兩項文件對照閱讀，將可恍然於俄人如何通過第三國際以指揮中共。茲將此兩項文件，轉錄於下：

（一）史達林：論中國革命底前途（註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在講問題以前，我認爲必須聲明：關於中國問題，我等還沒有展開中國革命全幅圖畫所必需的詳盡的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局限於幾個原則性的，對中國革命基本方向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一般意見。

我有彼特洛夫底提綱、米夫底提綱、譚平山底兩個報告以及賴扶思對中國問題的意見書。我想，所有這些文件，雖然有它們的價值，可是都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們都忽略了中國革命底好幾個根本問題。我想，首先必須注意這些缺陷。因此，我的意見同時將帶有批判的性質。

一 中國革命底性質

列寧說過：中國人在很快的時間內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某些同志把這句話了解成這樣：我們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所發生的事情，一定會在中國人那裡完全重演一番，這是不對的。同志們，列寧決沒有說過：中國革命將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翻版。列寧只說過：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這就是說，除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底一般特點以外，中國革命將還有它自己固有的特點，這些特點一定會給中國革命刻上自己特別的標記。

這些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特點就是：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也是民族解放革命，其刀鋒是對準着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底統治，這便是它與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首先不同的地方。問題是在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不僅表現在它的軍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現在中國工業底基本命脈，鐵道、工廠、礦井、銀行等等，都是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掌握之中或控制之下。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與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走狗作鬥爭的問題，不能不在中國革命中起嚴重的作用。因此，中國革命是與各國無產者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直接相聯繫的。

中國革命底第二個特點就是：民族大資產階級在中國是極端軟弱的，他們較之一九〇五年時期的俄國資產階級更軟弱得無比。這是很明顯的。既然工業底基本命脈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裡，那末中國民族大資產階級就不能不是軟弱和落後的。在這一方面，米夫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底軟弱性，是中國革命特有的事實之一，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倡導者和領導者底作用，中國農民領袖底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中。

也不應該忘記中國革命底第三個特點，這個特點就是：在中國旁邊，還有蘇聯存在着和發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幫助不能不促進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

中國革命底基本特點就是如此，這些特點決定了中國革命底性質和方面。

二 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干涉

這些提綱底第一個缺點就是：它們都忽略了或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在中國干涉的問題。要是仔細讀一讀這些提綱，那就可以認為：目前在中國老實說是沒有帝國主義干涉的，而所有的只是北軍與南軍的鬥爭，或者是一派軍閥反對另一派軍閥的鬥爭。並且喜歡把干涉了解成爲這樣的一種狀態，即有外國軍隊開入中國境內的事實，如果沒有這種事實，那便不是干涉了。

同志們，這是大錯特錯。干涉決不限於軍隊入境，而軍隊入境也決不是干涉底基本特點。在現代資本主義各國革命運動底條件下，外國軍隊直接入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抗議和衝突，所以干涉便帶有較爲靈活的性質和較爲偽裝的形式。在現代條件下，帝國主義寧願採取在附屬國家內組織內戰的辦法，採取資助反革命力量以反對革命的辦法，採取在精神上或財政上援助其中國走狗以反對革命的辦法，來進行干涉。帝國主義者就喜歡把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尤登尼奇和弗蘭格爾反對俄國革命的鬥爭，描寫成爲純粹國內的鬥爭。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而且不僅是我們知道，就是全世界也都知道：在這些反革命的俄國將軍背後站着的是英、美、法、日帝國主義者，假使沒有他們的援助，俄國嚴重的內戰就是完全不可能的。關於中國，也必須這樣說。吳佩孚與孫傳芳、張作霖與張宗昌反對中國革命的鬥爭就簡直是不可能的，假使各國帝國主義者不鼓舞這些反革命的軍閥，假使各國帝國主義者不供給他們款項、軍械、教練官、「顧問」等等的話。

廣東軍隊底力量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有思想，有熱情，這些東西鼓舞他們從事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就在於他們給中國帶來解放，中國反革命軍閥底力量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背後站着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所有一切鐵道，租借地，工廠、銀行和洋行底主人。

因此，問題不僅在於或甚至並不在於外國軍隊底入境，而是僅於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反革命所給予的援助，借他人的手來干涉——現在帝國主義干涉底根源就在於此。

因此，帝國主義在中國干涉是一件毫無疑問的事實，而中國革命底刀鋒也正是對準着這件事實。因此，誰忽略或過低估計帝國主義在中國干涉的事實，誰就要忽略或過低估計中國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東西。

據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廣東派和一般中國革命表現着某些「好感」的徵象。據說美國帝國主義者在這方面並不落後於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這是自欺欺人的話。必須善於把帝國主義者——連日、美帝國主義者也在內——政策底本質和它的假面具區別開來。列寧常說：很難用棍棒和拳頭戰勝革命者，可是有時候却很容易用甜言蜜語戰勝他們。同志們，永遠不要忘記列寧所說的這個真理。日美帝國主義者很好地領會了這個真理底意義，這無論如何是很明顯的。因此，必須把帝國主義者對於廣東派的甜言蜜語和恭維奉承同下列事實嚴格地區分開來，這一事實就是：最无情惡毒的帝國主義者牢牢地緊握着「自己」在中國的租借地和鐵道而無論如何不同意放棄他們。

三 中國的革命軍隊

對於上述提綱的第二個意見，是關於中國革命軍隊的問題。事情是在於：這些提綱中都把軍隊問題忽略了或過低估計了（座位上發出喊聲：「對呀！」）。這些提綱底第二個缺點就在於此。普通把廣東派底北進不是看作中國革命底展開，而是看作廣東軍閥反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鬥爭；看作一部分軍閥對另一部分軍閥爭權奪位的鬥爭。同志們，這是大錯特錯。中國的革命軍隊是中國工農爭取自己解放的極重要的因素，在今年五月或六月以前，中國的情況被估計為在馮玉祥軍隊失敗以後所到來的反動底統治，可是後來到了今年夏天，廣東派勝利的軍隊北進而佔領湖北以後，景況又根本改變而有利於革命了，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廣東派底推進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對其在中國的走狗的打擊，就是中國所有一般革命分子，特別是工人的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這就是中國革命軍隊底特點和極重要的意義之所在。

從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紀，革命總是這樣開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沒有武裝或武裝很壞的人民舉行起義，與舊政權的軍隊發生衝突，力謀瓦解舊政權的軍隊，或者至少部分地把它拉到自己方面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底典型形式。一九〇五年我們俄國的情形就是這樣。在中國，事情却不同了。在中國，不是那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武裝的人民，即革命軍隊，起來反對舊政權的軍隊。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革命。中國革命底特點之一和優勢之一就在於此。中國革命軍隊底特殊意義也正在此。

這就是為什麼過低估計革命軍隊是上述提綱底不可容許的缺點。

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對軍隊工作予以特別的注意。（著者按：毛澤東對此項教誨有深切的領會。）

第一、中國共產黨人應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力求使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範的代表者。這點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與國民黨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各種各樣的軍閥現在都歸附廣東派了，歸附這個摧毀中國人民敵人的力量了，而且

他們在歸附廣東派時，把腐化帶進了軍隊。使這種「同盟者」中立，或者使他們變為真正的國民黨人，只有採用加強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對他們建立革命監督的方法才能辦到。不這樣作，軍隊就可能陷於極困難的地位。

第二、中國革命者，連共產黨人也在內，應當着手精密地研究軍事。他們不應當把軍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因為軍事在中國現在是中國革命極重要的因素。中國革命者，也就是說，連共產黨人也在內，應當研究軍事，以便逐漸向前邁進，在革命軍隊中佔據某些領導職位。中國革命軍隊循着正確道路前進，一直達到目的，其保證就在於此。不這樣作，軍隊中的搖擺和動搖就會是不可避免的。

四 中國未來政權底性質

第三個意見是關於提綱中對中國未來革命政權性質的問題沒有估計或估計不足。米夫在其提綱中接近了這個問題，而他的功績就在於此。但是他在接近的時候，却不知害怕什麼，不敢把事情進行到底。米夫以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小資產階級底政權。這是什麼意思呢？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期也是小資產階級政黨，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革命的政黨。這不是說，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式的政權呢？不，不是這樣的意思，為什麼呢？因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式的政權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政權，至於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則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在這裡是有根本差別的。麥克唐納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權，但它同時又是帝國主義的政治，因為它是以保存英國，比方說，在印度和埃及的帝國主義政權為基礎的。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比起麥克唐納政府將有這樣的一個優點：它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問題不僅在於廣東政權——即未來全中國革命政權底萌芽——之資產階級民主性質，而且問題首先在於這種政權是而且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個政權之每一進展就是對世界帝國主義者的一個打擊，——因而也就是有利於世界革命運動的一個打擊。

列寧說得不錯：既然從前，在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前，民族解放運動是整個民主運動底一部分，那末現在，在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一部分了。

米夫沒有估計到這個特點。

我以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就其性質講來，大體上將類似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所謂的那種政權，即像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東西，然而有一個差別：這個政權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這將是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或者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

這就是中國革命所應當走的方向。

便利於這條革命發展道路的是下列三種情況：

第一、中國革命，既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將以其刀鋒對準着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

第二、中國民族大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要比一九〇五年時期俄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更軟弱些，這就便利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便利於無產階級政黨對中國農民的領導；

第三、中國革命將在可能利用蘇聯勝利了的革命底經驗和幫助的情況下發展起來。

這條道路是否一定和絕對勝利，——這要決定於許多情況。有一點不論如何是很明顯的：爲中國革命這條發展道路而鬥爭，是中國共產黨人底基本任務。

從此就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對於國民黨和中國未來革命政權問題上的任務。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假如中國共產黨人現存退出國民黨，這就是大錯特錯。中國革命底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留在國民黨內，並且在那裡加強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國共產黨可不可以參加未來的革命政權呢？不僅可以，而且應當參加。中國革命底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雄辯式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應當參加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

使中國無產階級領導權在事實上實現的必要保證之一就在於此。

五 中國農民問題

第四個意見是關於中國農民的問題。米夫以爲：必須立即提出成立蘇維埃，即在中國農村裡成立農民蘇維埃的口號。我以爲，這是一個錯誤。米夫太往前跑了。不能離開中國底工業中心而在農村裡建立蘇維埃。可是，在中國工業中心組織蘇維埃的問題目前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此外，必須注意：不能脫離周圍環境來考察蘇維埃。蘇維埃，這裡是農民蘇維埃，只有在中國已處於打破舊政權和創造新政權的農民運動最高漲的時期，只有估計到中國工業中心已經衝破堤防並進到了成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才能加以組織。可不可以說，中國農民和一般中國革命已經進到了這個階段呢？不，不可以。因此，現在談蘇維埃，就是太往前跑了。因此，現在必須提出的不是蘇

維埃問題，而是成立農民委員會的問題，我是指從農民選舉出來的農民委員會，這種農民委員會可以製訂農民底基本要求，可以採取各種辦法以運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些要求。這種農民委員會應當成爲展開農村革命的核心。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甚至在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不認爲展開農村革命是可能的，害怕農民捲入革命就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同志們，這是大錯特錯。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快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就愈有力量 and 愈強大。提綱起草人，特別是譚平山和賴扶思說得很對；立即滿足一些最成熟的農民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底最必要的條件。我以為，現在應該打破國民黨某些分子底行動中所表現的對農民的漠視和「中立」。我以為，不論中國共產黨或國民黨，也就是說廣東政權，都應當立即從講話轉到行動，提出現在滿足農民最緊要的要求的問題。

在這方面前途應當如何，可以而且應該作到什麼程度——這要決定於革命底進程。我以為，歸根到底應該作到土地國有化。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撥斥像土地國有化這樣的口號。

中國革命者，爲了喚起中國千百萬農民起來革命，所應當走的大小道路是怎樣的呢？

我以為，在當前條件下只能談到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就是成立農民委員會以及中國革命者滲入這種委員會以影響農民的道路。（座位上發出喊聲：「而農民協會呢？」）我以為，農民協會將團結在農民委員會周圍，或者農民協會將變成農民委員會，被賦予實現農民要求所必需的某種權力。關於這條道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但這條道路是不夠的。以爲中國有足夠的革命者幹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國約有四萬萬人口。其中約三萬萬五千萬是漢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農民。以爲幾萬個中國革命者就能汲乾這個農民底汪洋大海，那就弄錯了。這就是說，還必須有其他的道路。

第二條道路，就是經過新的人民革命政權機關以影響農民的道路。無疑地，在新的已解放的省份裏將成立廣東政權類型的新政權。無疑地，這種政權和這種政權機關，如果要使革命真正向前推進，就應當設法滿足農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和一般革命者底任務就在於滲入新政權機關，使這個機關接近農民羣衆，並經過這個機關幫助農民羣衆滿足其迫切的要求，至於用奪取地主土地的辦法還是用減稅減租的辦法，則依情況而定。

第三條道路，就在於經過革命軍隊以影響農民。我已經講過革命軍隊在中國革命中極重要的意義。中國革命軍隊是這樣的一種力量，它第一個滲入到新的省份，它第一個深入農民羣衆中間，農民首先拿它來判斷新政權，判斷新政權質量的好壞。農民對新政權、對國民

黨、對一般中國革命的程度，是決定於革命軍隊底行為，決定於它對農民和地主的態度，決定於它幫助農民的決心，如果注意到不少可疑分子緊貼在中國革命軍隊身上，這些分子可以變壞軍隊的面貌，那就可以理解軍隊底政治面貌及其對農民的政策在農民眼中有多麼大的意義。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一般革命者應當採取一切辦法中立軍隊中反農民的分子，保持軍隊的革命精神，並做到使軍隊幫助農民，喚起他們參加革命。

據說，在中國，一般人民都是熱烈歡迎革命軍隊的，但是後來，在軍隊駐紮下來之後，却發生若干的失望。我們蘇聯在內戰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這是由於軍隊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裏駐紮下來時，不得不這樣或那樣地依靠周圍的居民來養活。我們蘇維埃革命者普通能夠彌補這些缺點，因為我們竭力通過軍隊幫助農民去反對地主。必須使中國革命者也學會通過軍隊實行正確的農民政策來彌補這些缺點。

六 中國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

第五個意見是關於中國無產階級的問題。我以為在提綱中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底作用和意義強調得不够。賴扶思問道：中國共產黨人應當依靠誰來確定自己的方向——依靠國民黨左派還是中間派？奇怪的問題。我以為，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應當依靠無產階級來確定自己的方向，使中國解放運動底活動者都以革命為方向。只有這樣提出問題才是正確的。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同志認為工人改善其物質狀況和法權地位的罷工是不應有的，勸告工人不要罷工（喊聲：「在廣東和上海就有這樣的事」）。同志們。這是很大的錯誤。這是極嚴重地過低估計中國無產階級作用和比重。這個絕對不好的現象應當在提綱中指出來。假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利用現今順利的環境去幫助工人改善其物質狀況和法權地位，即使是經過罷工也罷，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如果這樣，中國還要革命作什麼呢？無產階級不能成爲領導的力量，它的兒女在罷工時期被帝國主義底走狗鞭笞和拷打。無論如何必須消滅這種中世紀的罪惡，以便在中國無產者中間提高他們的力量感和自尊心，使之能夠領導革命運動。不這樣作，就休想中國革命底勝利。因此，中國工人階級底經濟和法權的要求，是爲了認真改善他們的地位，應當在提綱中佔有相當的位置。（米夫說：「這在這提綱中已經說到了」。）是的，在提綱中曾經說到這一點，但是可惜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七 中國青年問題

第六個意見是關於中國青年的問題。奇怪地，在提綱中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然而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却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譚平

山報告中講到了這個問題，可惜講得不夠突出。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有頭等的意義。學生青年（革命學生）、工人青年、農民青年——所有這些都可以大大推進革命的力量，如果使他們服從國民黨底思想和政治的影響的話，必須注意：沒有誰像中國青年這樣深刻和活生生地體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沒有誰像中國青年這樣尖銳和沉痛地感到必須與這種壓迫作鬥爭。這個情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者從極力加強青年工作方面講來，應當盡量估計到。在中國問題的提綱中，青年應當找到自己的地位。

八 幾個結論

我想指出幾個結論——在中國與帝國主義鬥爭方面以及在農民問題方面。

無疑地，中國共產黨現在不能只限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要求。現在甚至像張學良這樣的反革命者也都贊成這個要求了。顯而易見，中國共產黨應當更前進一步。

其次，必須提出鐵路國有化問題作為前途。這是必要的，應該做到這一點。

其次，必須注意到最重要工廠國有化的前途。在這裏首先出現了把其主人對於中國人民特別仇視和特別侵略的企業收歸國有的問題。然後必須把農民問題向前推進，使之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我以為，歸根結底必須做到沒收地主土地，交給農民，並實行土地國有。

（「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三五七——三七四頁）

(二) 國際執委第七次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

（蘇聯陰謀文體彙編，政治類第一頁）

（著者按：本譯文與一般用語頗不一致，若干處著者略加註解或修改。如本標題誤為「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又，譯件未註時間，應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 帝國主義與中國

(一) 中國之革命，乃一最重要最雄厚之主力，足以破壞資本主義之根基者也。近兩年來，資本主義在中國境內已受重創，其結果可使

世界資本主義之恐慌益加劇烈。近因國民（革命）軍隊逐漸勝利，由南而北，遂使帝國主義之霸權，在中國半壁江山之內，實際上呈破裂之象。廣東革命既受中國廣大羣衆之擁護，則其繼續之勝利，必能戰勝帝國主義者，以求中國之獨立，而成革命之統一，此則對於帝國主義之勢力增加抵抗力不少也。

今各帝國主義之國家，已自惜其利用軍閥破壞國民革命之故技，不完全合於現在之情勢，又因利害各殊，不能聯合一致爲公開之武力干涉，於是不能不另籌新法，以期合於現今之情勢，其新法爲何，即趨向於廣東（國民）政府是也。此議倡自美國，英、日兩國亦以爲策略上所可允許之事，雖然此不過外交上之手腕，其心目中終含有仇視之意。

（一）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根本勢力，在於實際上壟斷中國之一切財產與實業（如鹽稅之專辦，關稅之抵押以及鐵路、航路、電線、礦產並其他重大實業，大致均爲外國資本。）蓋中國人民極衆，利於投資，一切天然物產尚在將開闢之時，是以帝國主義竭其全力破壞中國之革命。如用其傳林之方法（即是鼓動內亂）不能破壞之，亦必另尋策略加以剷除。

（二）現時中國之革命，就其表面，雖僅具有反對軍閥之性質，然試以下列種種問題觀之，中國革命前途定能發展。

甲、各帝國主義國家，因在中國境內彼此競爭，致使其自己地位衰弱。

乙、資本主義之恐慌。

丙、西歐無產階級運動之增長，因武力干涉中國，必遭各帝國主義國家勞動階級之抵抗。

丁、中國革命之發達，各國殖民地內之國民革命運動亦日益形發展。

戊、蘇聯與中國土地毗連接近，而各帝國主義之國家，則距中國經濟、軍事、政治威權之中心相去甚遠。

（四）國民革命運動進展之中，其參加此種運動之社會力有種種之派別。

中國之國民革命別具一種特別情形，不特與上世紀西歐資產階級之革命不同，即與一九〇五年俄國之革命亦異。其所不同者，因中國受外帝國主義之束縛，而成其半殖民地之地位；又因中國之革命適發生於世界革命之際，而爲世界剷除資本制度之運動，有此兩種原因，可以判定中國革命之社會力之派別矣。

中國革命之所以發展，基於經濟之極端腐敗；經濟腐敗之原因，由於實業之資本、農業之技術均不甚發達，而半封建之制度猶多存在。經濟現況，上自財政資本，下至酋長性質之遺制，以及各種形式之商業，城中村零售工藝及手工業等，包羅萬有，形形色色。而人民辨別力薄弱；缺乏高級組織，此外，一九一一年革命成功以後所發生之各種事件，近年中央政權之特別墜落，全國境內大半均成爲軍

閑組織，與經濟狀況均極有關。

軍閥割據領土，操縱中國社會政治之原動力，而具有半封建性質國家組織之制度。鄉村經濟以半封建遺制與新發達之資本主義互相交錯，極形混亂，因之經濟腐蝕，處於半殖民地之地位。中國鄉村以農民居多數，故國民運動之發展，應着重於農民革命。

總之，中國經濟極爲陳腐，即如土地所有權之零碎，地主及半地主之衆多，大小農藝技術之頑舊，田少農多，以及買賣農田之發達，鄉村中之層層階級，均足使鄉村之情形益加糾紛，故中國農村之階級奮鬥，須遵照下列之方針，而達其發展之目的，即反對外國之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之軍閥，反對大地主，反對鄉紳，反對重利盤剝之資本家，並有時反對農界之小地主。

(四)在中國革命發展之途徑中，因社會力之派別，分成階級，繼起迭興。第一期之動力爲國民（民族）資產階級及資產的智識階級，於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中尋覓倚靠。

第二期之動力爲勞動階級。此時社會基礎已經移動，革命成分亦較前加多，勞工階級在中國舞台上爲第一等之政治原動力，一面以經濟罷工與帝國主義奮鬥，取得世界歷史上，最重要之關係，一面與爲自己利益而奮鬥之農民及城市之小資產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之一部份互相結合。此種結合，已於國民黨之一派中及廣東（國民）政府爲政治上之表現矣。不久又將由第二期而入於第三期，此時各階級發生新組織，無產階級及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結合爲一切權勢之動力，將大資產階級加以剷除，大資產階級因見反帝國主義之奮鬥發展於無產階級指揮之下，脫離自己之勢力，有危及其自己利益之虞，竭其全力攫取指揮之權，必將試行借助於資產的國家主義與階級主義對抗。

(五)當各派角立之時，有反革命勢力之組織與帝國主義發生密切關係，亦因有帝國主義政策之勢力而發生反革命，恰如民族勢力能使世界革命發展；亦因有世界革命（蘇聯及西方之無產階級）而民族勢力乃得發生也。

軍閥之結合，成立於帝國主義之下，大資產階級對之則頗躊躇疑懼，轉欲與外國資本家協調，授外人以管理中國之權。帝國主義亦深信軍閥不能爲其破壞革命之工具，不能不另覓同盟，竭力鼓動資產階級與革命結合。許多大資產階級及軍閥，前此對於革命運動處於旁觀或仇視之地位者，現均漸漸加入廣東政府。此種手腕，蓋欲由結合之中，奪取革命運動之指揮權，藉以阻滯革命之發展。玩弄此種手段者，帝國主義也。

是以，當此時代，大資產階級應任其脫離革命運動，惟中、小資產階級，現時爲帝國主義及軍閥主義之革命奮鬥者，無產階級應充分利用之。此外並應利用脫離革命之各種資產階級間之齟齬，及帝國主義各派間之齟齬，但因於戰略步驟上，不可忘却自己之根本目的。

二 中國革命之前途

(外)就兩種階級之派別加以觀察，中國之革命，雖現時具有資產的民權主義之性質，然當此資本主義衰敗之時，決定不能成爲純粹資產的民權主義之國家，必將爲無產階級平民政權之國家，中國國民黨應竭其全力使革命之前途入於非資本主義之軌道，否則資產階級戰勝，國家實際的權力必仍落於帝國主義之掌握。

(內)中國革命前途之發展，首繫於無產階級就近年來之各種事件觀之，足徵國民革命之戰線，只有在無產階級指揮之下，始能成立；反對外國資本主義霸權（專政）之奮鬥，亦必須適用無產階級之霸權（專政）方能迅速施效。

軍閥領域內之資產階級，因商務及財政之種種關係，與外國資本家密切結合，一切反帝國主義之奮鬥從未加入。當革命發現之初，或持旁觀態度，或忽視之，小資產階級（小資產之智識階級、學生、工人、藝人及小商人等），尙可稱爲革命之黨派，彼等從前亦曾爲重大之角色，但無獨立動作之能力，必須與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任何一方面結合。資產階級背棄革命之時，此輩必將歸入無產階級勢力之下。彼時中國革命勢力，必屬於此等階級之結合，而無產階級爲其中最有力之主方。

三 國民革命與農民

(外)當此革命過渡時期，農民爲一切問題之中堅。凡能以激烈堅決態度趨重於此根本問題者，必將爲革命之領袖。中國現在情形，無產階級應以農民爲宜於實行激烈政策之唯一階級，乃反帝國主義奮鬥及完成革命之前提也。

軍閥勢力之存在，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之維持，一方面由於大地主之維持，以其半封建之制度，官僚之機關，大地主之鄉紳，重利盤剝之資本家，剝削數萬萬農民，使其失其田地，而爲地主及資本家之奴隸，供給無量之苦力，備城市軍隊之用。以此剝除封建遺制，與推翻帝國主義之壓迫，同爲中國革命之唯一任務。爲完全消滅軍閥起見，必須將農民的經濟政治奮鬥，加以開拓，至謂鄉村中階級奮鬥之激進，有促成反革命削弱反對帝國主義唯一戰線之危險一節，則殊無根據，國民第二軍之潰敗（著者按：當係指馮玉祥指揮之岳維峻部），非由於反革命之勢力，乃由於農民不滿意而變亂。對於農民問題無果敢之進行，不能維護其經濟上、政治上之要求，因恐資本主義某一階級之不穩定的及不誠懇的合作，而不肯將農民革命問題公然置諸國民解放運動大綱之內，此非無產階級之革命政策也。共產黨應免除此種錯誤。

(f)現時情形爲過渡中之關鍵。無產階級應選定與何種階級結合。鞏固與農民聯合之前途，如不積極進行農民問題，則不能使農民加入革命之奮鬥。而資產階級，因受帝國主義者直接間接之助力，復得充任指揮之權，外國資本家之地位（即帝國主義之地位），益加鞏固矣。

如國民解放與農民革命不能合而爲一，則不但廣東國民政府不能維持其政權，即革命事業亦不能完全戰勝帝國主義及中國之反動力。因各農區內層層階級之發展，致使農民與專營利益之階級，彼此奮鬥，日益劇烈，共產黨於此，必須特別注意統率農民運動，以經濟、政治等口號鼓動之。

中國共產黨必須進行要求土地收歸國有，此爲農民之根本問題，應參照中國各區域內之政治、經濟等特殊情形，就此根本問題，討論農民之戰略。

(g)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民運動提出之政權問題，應剷除鄉紳，村吏之專制，而代以革命之機關。（遵守革命政府之命令而保護農民羣衆之利益者。）並使農民參與縣政府之組織。

國民政府所轄領土之內，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爲使農民加入革命起見，應實行下列各項：

子、地租大加減低。

丑、農民所担负之各種租稅一律取消，代以一種農業累進稅。

寅、農民羣衆組織應大加整頓。

卯、凡與國民政府作戰之守舊軍閥、買辦、大地主、鄉紳等，所有之廟宇地畝均沒收之。

辰、租賃人（佃農），對其所耕之田地，應保有永租（佃）權，並應由各農民協會與革命官署之代表，規定租金之最高限度。

己、廣東（國民）政府以各種方法維護農民之利益，免受大地主、鄉紳、重利盤剝者之壓迫排擠。

午、解除民團及各種鄉團之武器。

未、對於鄉間之貧窮農民及中等農民與以武裝，使鄉村中之一切武力均隸屬於國民（政府）官署之機關。

申、農民之各種組織（農民協會亦在其內），由政府予以大量之維護。

酉、組織輕微利息的國家貸款，與重利盤剝之入堅決奮鬥。

戌、由政府扶助消費組合及互助機關。

(四)、以上所述各項，乃係趨向農民革命便捷之途徑。共產黨之目的，務在能使廣東政府一一實行。其實行之方法，應組織農民協會，由共產黨負指揮之責。農民協會應先取得實行以上各項所必需之事情及實力，然後發動為更激烈之要求。農民協會應為革命政府及國民軍在鄉村之根基。

至於中國其他地方尚在反動派管轄之下者，共產黨之任務，應使其農民對於封建制度軍閥主義及帝國主義種種奮鬥，此為破壞反革命軍最正確之方法。共產黨對於各種農民組織，如紅槍會之類，應利用之，在該項組織中，加入自己之勢力。

(五)農民對於革命之態度，全視國民(革命)軍之行為如何而確定。蓋農民將視國民(革命)軍之舉措判定新政權之良否，是以國民(革命)軍對於農民與地主間之關係如何處置，對於農民之如何協助，均關係農民對於新政權之態度，農民對於革命雖曾到處熱烈歡迎，然此種熱烈與時俱減，因軍隊繁重之需索，復使農民增加新負擔也。但共產黨與其他革命份子之指揮運動者，若能以正確果敢之農民革命方法補償農民之負擔，則農民不但踴躍輸付，且將歷久不變。

(原譯者按：據上文所列各項，對於地主則收其田地，而對於農民則無賦與出地之規定，則所謂補償農民負擔之正確方法，不外假以武器，使掠奪有產者之財產而轉輸之政府也。)

四 共產黨與國民黨

(一)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廣東(國民)政府之關係，亦為於農民中取得之勢力之所必須者，因政府之機關為接近農民之捷徑，共產黨應利用之。最近所佔據之各省，亦將按照廣東制度設立政府之機關，共產黨員應亟行參入，以便實行農民計劃(沒收田地，減少租金，並賦與農民協會實力。)根據政策，實行改革之制度。

(二)因上述情形及種種之主要原因，故主張共產黨應拋棄國民黨者，其意見實屬謬誤。蓋中國革命之作用與其前途，在在均使共產黨應存留於國民黨之中，於國民黨內增進自己之工作，共產黨欲於國民黨中增進自己之作爲，以期繼續發展，應行加入廣東(國民)政府，因廣東政府自成立以來，所有實行政權，均操之於右派之手也。(委員六人有五人屬於右派)雖廣東政府無勞動階級(著者按：此「勞動階級」與「共產黨」同義)之維持不能存在，而以最近之事實證之，勞農運動於廣東省內尚受有種種之障礙，不能暢所欲言，共產黨應參加廣東政府，協助左派，反對右派。廣東政府土地日闕，權力愈大，共產黨加入廣東政府之問題應堅持到底。

(三)中國共產黨應使國民黨向真實的方面發展，使無產階級及農民與城市之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各種被壓迫之階級(凡與帝國主義

及帝國主義代理人堅決奮鬥者），均爲堅固的革命結合。爲實行此種計劃起見，應依左列之方針進行：

- 甲、對於國民黨之右派及該派之戴季陶主義，以及該派將國民黨改爲資產階級之黨派之企圖，均應加以有系統的及實力的奮鬥。
- 乙、敵視左派，與之確定密切合作之關係，於指導之工作中，不以中國共產黨員代替該派之人員。
- 丙、對於因左派、右派關係，因革命前途發展，因與帝國主義妥協等問題而發生動搖之中央，爲連續之譏評。

五 中國革命之目的及革命政府之性質

(均列寧有云：「世界上之革命，從前之國民（民族）解放運動，屬於一般的平民運動之一部分。當俄國蘇維埃革命成功之後，世界革命開始之時，現在國民之解放運動，則當屬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一部分也」。

中國革命之綱目及由此種革命綱目所構成之革命政府，均應由此種觀念決定之。廣東政府雖具有資產的平民主義之性質，根本上實具有小資產的革命國家雛形。小資產階級的平民主義運動，乃係反對帝國主義之運動。廣東政府因具有反對帝國主義之性質，成爲革命政府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權勢，自應與以根本之削除。但拒絕不平等條約，取消租界，尚不足以削除帝國主義之權勢，必須於其經濟基礎加以打擊，應將鐵路、租界、製造廠、礦坑、銀行及其他屬於外國資本之實業等等，逐漸收歸國有。如此舉動，國民政府乃可以擴大資產的平民主義之狹小界限。倘以中國之革命在第一期內具有小資產階級之性質，故其任務亦只能限於（一）削除帝國主義；（二）取消封建之遺制，則謬誤矣。蓋中國之革命，若不越過資產的平民主義之界限，即不能剷除帝國主義。以現在情形觀之，無產階級應引導農民入於革命奮鬥之途徑，使廢除封建制度之運動，在無產階級權勢之下，變爲農民之革命。因此種種特別情形，革命政府之任務如左：

甲、鐵路、航路交通均歸國有。

乙、鉅大之實業、礦坑、銀行，凡具有外國特權之性質者，均予沒收。

丙、土地收歸國有。由革命政府以連續的激烈的改革方法實行之。

六 共產黨與無產階級

（均中國之無產階級爲於革命中充任有勢力之角色起見，應鞏固自己之階級組織（政治及經濟之組織）。共產黨首要之任務，乃係組

織並培植無產階級，以備充任有用之角色。至於中國無階級之幼稚及人數無多，則應以組織之勢力及顯明之主義輔助之。

職業聯合會之大同盟（全國總工會），現時所有實業界之工人已達數十萬之多。鐵路職工及水手之國民聯合會（鐵路工會及海員工會）亦同，均足為共產黨之根基。共產黨之急切的任務，乃應誘致多數勞工羣衆，以增進此種組織。近兩年來，當國民革命奮鬥之時，勞動階級擴張極大之勢力，得於革命運動中獲得權勢。就上述之情形觀之，勞動階級之組織，應依左列之根據擴充而發展之：

甲、成立多數生產業之聯合會，依生產之基礎而為聯合，鞏固職業聯合會中國之大同盟（全國總工會）。

乙、增加羣衆內之工作，並鞏固職業聯合會（著者按「職業聯合會」當為英文之「Trade Union」，通常譯為「工會」，中共亦常稱為「職工聯合會」），指導機關與中國勞動羣衆間之聯合。除實業工人外，并應誘致工藝人、手工業、小實業之工人、及農工等，加入職業聯合會。

丙、對於工人之經濟奮鬥應大加注意，改成政治奮鬥。編製罷工運動之策略，設立互助及補助罷工基金，並創立消費組合。

丁、以改革奮鬥之方法，增進勞動羣衆之教育工作。

戊、鞏固中國職業聯合會運動與世界職業聯合會運動之聯絡關係，尤應鞏固與遠東各國職業聯合會運動之聯合關係。

（由）中國共產黨為引誘工界之羣衆加入革命運動，並鞏固其在國民革命內之地位起見，應以鼓勵宣傳方法，爭左列要求之實現：

甲、農工機關之行動完全自由，及承認職業聯合會為合法機關，施行職業聯合會之根本法律，規定罷工權。

乙、工人之立法如下：每日八小時之工作，每星期之休息日，最低限度之工資。

丙、社會之立法如下：衛生之監察，勞動之條件，住所問題，疾病、殘廢及失業人之保險，保護婦孺之勞動，婦女夜工之禁止，未滿十四歲之幼童禁止在工廠工作。

丁、設立工廠之監察部。

戊、廢除罰金及身體刑之制度。

己、撤退各工廠之軍警。

庚、防止失業，以職業聯合會之勢力，權致失業之人，並在該會內設勞工介紹所。

（甲）現時之革命，尚有一大部份之勢力未曾完全利用，即城市中之手工業及工藝人等為帝國主義所破壞，而對外國資本含有仇視意味者也。中國無產階級之共產黨先鋒，應糾合此項羣衆，使其加入國民革命運動之總匯。既有此種目的，中國共產黨尤應對於此項階級達

到左列各事：

- 甲、減輕稅課。
- 乙、組織手工業及工藝業之聯合會。
- 丙、組織勞動組合。

七 中國共產黨之組織任務

（一）中國共產黨乃係有組織之勢力也，該黨應有首領創立基礎，並引導羣衆附隨自己。該黨之工作，現時獲得極大之發展，且具有堅固組織之形式。近半年來，對於擴充黨員一事亦頗有進步，加入者多係勞動份子。

共產黨內之農民部分人數不多，但現時共產黨，於農民之中，已積極進行擴充之工作。

中國共產黨最要之任務，現已迫於眉睫者，厥爲黨內之教育事務應力求擴張、深造、改善、鞏固也。

共產黨對於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事致力獨多，現時中國之共產主義青年團人數增加，於一切事務頗能積極進行，誠爲中國之偉大之革命勢力。革命之學生及勞農之青年，倘能服從共產黨政治上及主義上之勢力，必能成爲促進革命之實力，蓋無論何人，均不若青年者感受帝國主義壓迫之深切，亦無論何人，均不若青年者感受必須與壓迫者奮鬥之激烈也。中國共產黨應熟慮及此，而致力於青年工作。爭公開之存在，爲共產黨各種主要任務之一。

（二）應招募新黨員，先於各實業區域內進行之。對於此項新黨員之工作，應以設立短期傳習所，並開特別談話會，講演黨綱、黨略問題之方法，使各新黨員加入各共產黨宣傳分部之逐日工作，並經各分部而加入全部之黨務工作。

凡黨員之組織，上自中央委員會，下至各工廠、各街市之共產宣傳分部，均應堅確實行聯合（統一）之指導。

然後切實引導黨內優秀工人（工作者）辦理黨內之指導事務。對於造就共產分部秘書（書記）人員，羣衆組織指導人員及各省、各區黨委員會指導人員等事，均應特別加以注意。中央委員會及各省委員會，均應備有常川巡行之指導人員，此項指導人員，應就各地方優秀黨員中選擇之。

設立巡行組織人員之幹部，以備鄉村工作之用。

各下級的動作機關，各共產宣傳分部，以及黨員集會等動作及自動能力，應求增進。鞏固黨之各部分於職業聯合會、農民協會之指

導機關，以及國民黨之各種組織內，並以黨的部分工作（黨團作用）保障有系統的堅固的黨務之指導。

八 國民革命軍之勢力

①國民革命軍乃最大之主力，足以戰敗孫傳芳而開拓國民政府之領土者也。設使該軍之將校、士卒，對於革命之覺悟能堅定不變，則該軍既已完成其從前角色，並可演其將來之角色，然欲使將校、士卒仍堅持其革命之覺悟，必須以相當之政治工作人員投入未經政治陶鑄各軍之內，而從事於政治工作。其積極之政治工作，應與國民革命軍各基本軍內之工作相同。中國共產黨應竭其全力提高軍隊內之政治工作，並鞏固在國民黨左派各軍中宣傳分部之勢力。

②欲得勞動羣衆之信仰及其擁護，並聯合中國革命各機關，以便共同行動，反對國民革命仇敵之各項任務，均應由政治工作之入輸入於軍隊羣衆之內。

③關於國民革命軍之勝利，應向羣衆詳爲解釋，如無羣衆之直接奮鬥，僅以國民軍之武力破壞軍閥，尙不能獲得最大之勝利，惟有各革命機關之團結及羣衆之自立的奮鬥，始能爲勝利之保證。

④使勞動羣衆及勞動機關，對於國民革命軍予以各種協助，此亦爲中國共產黨各種最要任務之一。其協助之方法，在使國民革命軍與勞工階級、勞動機關互相聯絡，以保證軍事行動之勝利。

⑤因中國鄉村內武力奮鬥之發展在所難免，是以中國共產黨應設種種方法，務使國民政府對於農軍及農民機關積極助以軍事指導人員，以及軍裝、軍需物品，增長農民革命運動之勢力。

九 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共產黨之任務

①以各種可能之方法維護中國之革命，此爲各帝國主義國家內共產黨最要任務之一。共產黨維護中國之革命，應依下列之方法：

甲、宣傳反對武力干涉中國及外國在中國干涉之危險。應向無產階級之羣衆加以說明。帝國主義挑撥中國內亂，及以財政軍械協助

軍閥之政策，均應予以披露。

乙、要求撤退中國領土內之外國陸軍及中國領水內之外國海軍。

丙、煽惑駐紮中國境內之外國陸軍及水手。

丁、宣傳承認廣東政府爲中國之真正國民政府。
此種要求，應於露天演說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提出之。社會平民主義之工人及無黨籍之工人，均誘之加入此種運動。

（註一）「列寧、史達林論中國」九四至一〇五頁，解放社版。

第四節 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對中國問題之爭論

在第三國際，實際上是在史達林，指示之下，鮑羅庭領導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從事農民運動，從事反帝運動，更從事國民黨分化——迎汪反蔣——運動，造成革命陣營大紊亂，終於引發了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南京清黨運動。清黨，對於中共及其指揮者當然是一個鉅大的打擊，而使第三國際與俄共均陷於手忙腳亂之境。爲此，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發生激烈的爭論。托氏的言論已經被史達林「消滅」了，一時無法引證。至史氏的言論，在四月二十一日發表「中國革命問題」一文，五月二十四日發表「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一文（前者是向俄共中央提案，後者是向國際執委八次全會演詞），其主要作用在藉中國問題對托洛斯基及季諾維也夫作生死的鬥爭。雙方爭執要點，根據史氏片面文件，在中國革命性質方面，史氏認爲是無產階級聯合農民、小資階級及部份資產階級反帝封建的鬥爭，是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而托氏認爲是無產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應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上，史氏主張土地革命，主張不脫離國民黨，主張積極參加武漢國民政府，不主張成立蘇維埃，而托、季等等主張則反是。上述史氏兩個文件達五萬言，未便引用，僅引其第二個文件的結論部份——兩條路線，如下：

這樣，我們面前有着關於中國問題的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線：共產國際底路線與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底路線。

共產國際底路線。封建殘餘及依靠它們的並由各國帝國主義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軍閥上層建築，是現在中國現實底基本事實。

中國目前正經歷着既反對封建殘餘又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礎和內容。

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底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底中心。

支持武漢的政策，同時就是展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伴有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產黨人之參加武漢國民黨和武漢革命政府，這一參加並不排斥共產黨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批評國民黨的自己所同盟者底不徹底與動搖，而是以此為前提。

應當利用共產黨人底這種參加來促進無產階級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者作用，並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迫近我們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到了在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看出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必須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來作為兩重政權底因素，來作為為爭取新政權的鬥爭機關，來作為新政權、蘇維埃政權底機關。

到了這個時候，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內的聯盟，應當代以在國民黨黨外的聯盟，而共產黨人應當成為中國新的革命底唯一領導者。現在，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處在其發展初步階段的時候，當國民黨是最適合和最適應於中國特點的民族民主革命組織形成的時候，提議立即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和立即建立兩重政權，就像托洛斯基和李諾維也夫所作的一樣，——這就是互解革命運動、削弱武漢，促進它的倒台，幫助張作霖和蔣介石。

托洛斯基和李諾維也夫底路線。中國的封建殘餘乃是布哈林底捏造。封建殘餘在中國或者是簡直沒有，或者是如此地微乎其微，不能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看起來土地革命現在中國是有的。然而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鬼也不知道（笑聲）。

但是這個土地革命既然是有的，那當然要設法支持了。

現在主要的事情不在於土地革命，而在於爭取中國關稅獨立的革命，在於所謂反關稅的革命。

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斯基），便是基馬爾主義（李諾維也夫）。

一方面，必須用立即建立蘇維埃的方法來成立兩重政權以推翻武漢政府（托洛斯基）。另一方面，應該堅固武漢政府，必須給武漢政府以有力和全面的幫助，看起來也是用立即建立蘇維埃的方法（李諾維也夫）。

照例講來，共產黨人應該立即退出這個「空架子」，退出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可是，最好還是讓他們留在這個「空架子」裡，即是，既留在武漢政府裡，又留在武漢國民黨裡。既然武漢是「空架子」，為什麼他們還要留在武漢呢？——看起來這只有上帝知道。誰要是不同意這一點，誰就是奸賊和叛徒。

所謂托洛斯基和李諾維也夫底路線就是如此。

幾乎不可能設想比這種所謂路線更荒唐和糊塗的東西了。

人們就得到這個印象：我們不是同馬克思主義者打交道，而是同什麼脫離生活的事務員，或者說得好一些，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這些旅行家遊歷了蘇虎姆和機司羅瓦得（按：高加索的風景區和療養地）之類的各個地方，瞥見那提供了中國革命基本方針的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後來從報紙上知道了中國確實爆發了什麼革命，好像是土地革命，又好像是反關稅革命，於是決定必須寫一大堆提綱——四月裡一個提綱，五月初第二個提綱，五月末第三個提綱，把這一大堆提綱寫好之後，就扔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顯然他們以為有很多糊塗和矛盾的提綱，就是挽救中國革命的基本手段。

同志們，這就是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條路線。

你們必須在這兩條路線中間加以選擇。

史達林擊敗了托洛斯基的提綱，贏得了國際八中全會的支持，而通過又一個「中國問題決議案」，更堅決的反對退出生在武漢的國民黨，其文如下：

中國問題決議案（錄自「紅色文獻」）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

一 中國革命之意義（本節指摘社會民主黨及黃色職工國際，約八百字，略。）

二 民族革命運動與中國的新形勢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中國革命中事變的進展，證實了共產國際最後（第七次）擴大會議之革命動力的估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尤其認定事變的經過，完全證實了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資產階級必然脫離民族革命聯合戰線轉到反革命方面的診斷。

這個過程的表現是國民黨軍事領袖的反革命政變，是右派離開國民黨後組織南京政府，假借國民黨組織，成立他們自己反革命的組織。因此企圖與蔣介石或國民黨右派妥協之任何嘗試，必會變成直接投降，顯然背叛中國革命的利益。

資產階級與其軍事領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工農羣衆運動之發展與中國共產黨之勝利，他方面在於帝國主義聯合壓力之加大。民族資產階級看見羣衆運動發展，看見那革命的階級要求與口號，必然要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不願革命繼續進展——他也真

這樣做了。這樣一來，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民族戰線，跑到反革命的營壘去。革命雖有部份的失敗，但是走進了一個更高的階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的聯合分裂了，開始轉變為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同時加大。在中國革命的進展中，那已告終結的階級的特徵，在乎兩個營壘對峙：一方面是外國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與買辦階級——一部份大資產階級——的營壘；另一方面是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工人的營壘。這個階段有由兩個營壘對峙轉變為三個營壘鼎立之趨勢，劃去資產階級，使之與無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之「左派聯合」相抗。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為其特徵。南京政府屠殺工農，但仍反對北方軍閥。

然而戰鬥的全般邏輯，仍將變三派為兩派，為新式的兩派，因為南京政府所領導的大資產階級必然日與封建反動的領袖及外國主義接近，以促成這個過程。

中國革命的危機與社會階級力量目前的組合說明并證實，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農民革命屬之，只有這樣，才可說到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只有在反對已經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可完成。澈底的民族自由鬥爭，不僅與發展工農羣衆運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無衝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層廣大民衆奮起推翻帝國主義之革命運動的擴大為前提。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在革命的過去階段中，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策略，完全是正確的。僅拿北伐戰爭來說，他遍處擴大了工農羣衆運動，工人、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以及中國共產黨，已可為這個策略在歷史上的辯護。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認為，主席團同時指令設法取得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機關中戰略上最重要的地位，以孤國民黨右派之勢，而集中視線於羣衆，這樣做也是對的。

同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志主席團在國民黨所謂「清黨」後即刻發表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宣言內，對於此次事變所持的態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反復提明，南京政府及其表現的劇烈的階級離開，是將來全盤策略之出發點，資產階級既背叛了民族革命運動，成了反革命的積極的勢力，不能再與他統一、妥協或聯合。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社會民主黨及黃色職工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內部問題之路線，是直接由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在華政策的態度演出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口頭上是贊成上海工人，實際上，把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間劃條鴻溝，反對中國工人的先鋒——共產黨人——反對民族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此他們是贊成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聯合的勝利的。正統社會民主黨與黃色職工國際愈趨於擁護南京政府之途，聯合黃色「工人組織」，希圖以反革命的工會代替革命的工會。（著者按：此處所謂「黃色工會」即南京

濟黨後之新工會，自是中共徑稱之爲黃色工會。）國際少數主義認爲共產黨人：不說他們分裂了中國革命運動（右派社會民主黨人這樣說），便說他們擁護中國無產階級的特殊利益不力（這種中傷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發出來的），而實際上，他自己不僅成了帝國主義的盟友，而且是他那中國代理人的拜把兄弟——南京那夥工人階級劊子手的把兄弟。

三 中國革命的部份失敗與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政變（上海、南京、廣州等處），中國革命的部份失敗，相當的加強了反革命的聯合。但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若說這個失敗便決定了革命的全部命運，這是錯誤的見解。

這見解之所以不正確，僅舉一端便可瞭解。他認爲中國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大敵，而置帝國主義勢力與資產階級間之關係不顧，且同時看輕了勞動羣衆偉大的無間的運動。要曉得帝國主義用盡手段向革命進攻，在民族革命戰線中，一切動搖份子中間，佈滿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反革命的策源地不得國際帝國主義的保障，蔣介石的全副力量早被勝利的革命軍打得粉碎。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一切支部的必要任務，是向工人階級及農民，說明事實的本相，要知帝國主義的軍隊，事實上佔據了全國的工業區域，正是中國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比較弱小的中國資產階級，若不直接間接受外國武裝干涉者的擁護，必不會成中國革命之大患。外國武裝干涉者集中戰鬥力，封鎖海港，困圍革命的中心，接濟反革命的軍隊，離開破壞革命的武力，用盡外交上的壓迫手腕，在革命政府下資產階級的陰謀破壞勢力，驅策外國和土著資產階級組織生產上、商業上、金融上種種怠工封鎖的政策。

至於帝國主義之狂暴猖獗，以撲殺工人、撲殺共產黨，壓迫農民運動，孤因蘇聯，尤須特別提明。

但是革命雖有部份的失敗，而另一方面，過渡於更高階段的發展，更有力的動員羣衆之發覺，農民運動之擴大，暴動武裝隊之組織，此項與日俱增的組織武力屢次戰勝了叛軍。雖然反革命的恐怖猖獗萬分，而工人階級的組織繼續保存，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之增大無已，——凡此種種，都是中國革命增長增高之主要徵象。

武漢國民政府及左派國民黨，就其主要的趨勢看來，是城鄉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革命聯合之表現。雖然某個軍官以及國民黨「左派」某個政治領袖、某派政治領袖有繼續叛變之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但是階級鬥爭的發展，必將調動羣衆，此羣衆運動正是將來勝利之擔保。

所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認為取消派（著者按：「取消派」首見於本書，係指托洛斯基派）意見根本錯誤，這派意見竟以為中國革命目前的危機是勝負已決的失敗，必然造成一種國際的局面。這種顯然錯誤的意見，只會成為破壞無產階級隊伍的工具；在這共產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特別必要的現在，這種破壞組織尤其危險。

四 組織工農羣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中國革命中艱鉅的困難，尤其是因帝國主義聯合勢力的武裝干涉或他種干涉，以及中國國內動搖的社會成分叛變革命、投降敵方所生的困難，造成了目前鬥爭的條件；為戰勝這種困難計，必須廣大勞動羣衆加入鬥爭始可。只有這些羣衆參加積極鬥爭，才能造成一種政權，打退內部的反革命及帝國主義的干涉，消滅封建制度的殘餘，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造成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去先決條件。

要想引導羣衆加入鬥爭，只有在鄉村實行土地革命，在城市滿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要求，才有可能。毅然取消繳納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之一切田產，禁止高利契約，取消貧農受重利剝削之債務，大減賦稅，課稅攤派於富豪之家等等——這些口號必須在全國，特別在武漢政府統制區域內實現出來，必須拿這些口號推動羣衆，使之反對叛賣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北方軍閥。

農民革命（沒收土地和國有土地包括在內），這是中國革命中新階段之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使千百萬農民從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共產黨站在前線，指導這個運動，在目前最為重要。同時共產黨必須在政府內努力，使政府促進土地革命之爆發擴大，只有這樣才能使政府在目前發展的階段中成為實際上工、農革命的組織政治中心，成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權獨裁的機關。另一方面，只有在這種從上面和下面協同實現土地革命的政治原則上，才能在堅固的革命的基礎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編一切舊的軍隊。

在城市中，必須設法提高工人羣衆的物質生活，改善工人在工廠內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其箝制工人成為毫無權利的「等級」之一切法律，須一律廢止，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承認工人組織之權利等等。

同時必須迅速、大膽、堅決的實施武裝工農羣衆之政策。最先武裝那已經有組織的，覺悟的部份，此政策務須以全力使了實現。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為，中國共產黨必須竭盡力量，直接的、間接的，以及聯同國民黨左派，動員羣衆，組織羣衆。在工人中極

力發展黨員，在城鄉勞動羣衆中極力爲國民黨發展黨員，必須使國民黨極大的速度成爲最廣大的組織——這是目前中國共產黨之主要任務。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促起中國共產黨極大注意。一切工農羣衆組織須有各方面的加強并擴大之必要，如職工會、罷工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工人自衛團等，以及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鄉村工人組織、農民自衛軍、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組織、小手工業工人、家庭工業工人組織等等。在這一組織中，必須宣傳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革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及工人階級之強大的羣衆組織。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否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任務可以和民族革命之任務，相互對峙。他以為，像那歐洲極左派和社會民主黨提出的這種對峙說法，沒有別的作用，只有使無產階級在中國民主革命中放棄領導權，名義上是爲保護那所謂「無產階級的」行會精神，其實這種行會精神，在政治上是機會主義的變相，因此，這不過是使無產階級成爲民主派的附屬品而已。資產階級退出革命轉入反革命的營壘以後，無產階級却逐漸成爲整個民族革命運動中可公認的領導者。只有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可完成的中國革命，如不提高工人階級的作用，不使之成爲整個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則必不能繼續發展與最後勝利。

五 共產黨與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要想把肩上的任務完成，只有保有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劃分清楚才行。

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共產黨不許融解於別個政治組織之內，也必須成爲獨立的力量，他是一特殊階級的組織，是無產階級的組織，是全國最徹底最革命的階級的組織。因此，共產黨在宣傳自己的政見時，在自己的旗幟下動員羣衆時，不能爲外力所阻，對於革命小資產階級民主的動搖不定，尤不能放棄批評的權利。恰恰相反，須知只有這種批評，才能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鬥爭中，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不可解作是與無產階級等動羣衆，尤其是與農民斷絕關係。從這點出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堅決的反對那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反對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國民黨的態度。目前提出「即刻勿須退出國民黨」，與提出「退出國民黨」兩個口號，一般荒唐，因爲在目前的瞬間，無產階級的政黨恰要在國民黨內，確定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固有的組織形式，

是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合作的黨。

在目前的情形下，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作用，則無產階級便不能在全國取得領導作用。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如果看輕國民黨這個革命運動的特殊組織形式，實際上便是助成右派獲得國民黨的旗幟。正因為國民黨的旗幟是國內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南京政府引着資產階級領袖們，千方百計，要打起國民黨的旗幟前進。共產黨的策略，萬不可為國民黨右派的機變作保障（退出國民黨路線，便不能免這種結果），而要揭破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賊，是國民黨的叛賊，是中山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叛賊，是投降帝國主義者的降將。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說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經「告終」，另一革命即工人階級革命已經「開始」，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在此次改變之後，便是廣大的羣衆也明瞭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繼續進展。正因為這樣，所以不能把國民黨的旗幟，不能把民族自由鬥爭的旗幟讓給民族自由鬥爭的叛賊。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既要大膽的擴大羣衆運動，必要一般大膽的堅決的努力變國民黨為真正的羣衆組織。使他包納城鄉勞動羣衆才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為完成其自身任務，須使其組織形式能相當適應。趕快改組，儘量接近羣衆，實屬必要，其次，要在工農手工業者中間大徵黨員，容納工、農、兵士、手工業者之整個組織入黨（工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手工業者行會、軍隊組織、農民游擊隊如「紅槍會」等，惟須肅清其反革命分子，以及工人自衛團等等）；國民黨的地方及中央指導機關應進行選舉等。

只有把定這個堅決的路線，國民黨發展為真正廣大的、羣衆的、革命民主的組織，指導機關真正是由選舉產生——才能為中國民主革命之鞏固與勝利的發展，造下先決條件。

只有把定這個路線，才能為防止廣州國民黨左派某個動搖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落伍（如廣州的事實），為防止那某個動搖軍官及其他軍事領袖之叛變，造成制裁手段。應時的揭破一切勾結反動份子或帝國主義之動搖趨向，並在宣傳煽動上採用具體辦法，或竟用組織上的制裁手段，這是共產黨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維持且擴大自己黨組織外，尤須極力影響國民黨的行動。要想實現這個任務，必須完全了解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澈底把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線，加強鞏固自己的組織，使工人同志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在工農羣衆中加強黨的影響和黨的威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在中國共產黨中，恰恰對於這點有無數動搖存在；黨在批評國民黨的領導者，不能常常表現充分的堅決，而且在黨內對於發展羣衆運動表現相當的畏怯，尤其是在農民運動中，關於沒收土地，驅逐豪紳地主等問題上，可以看出。這些動搖，在目前階段中，特別有害於革命，在這裡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內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路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同志內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中，相當的動搖之危險更加高了。

中國共產黨必須以工人階級的政黨站在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之前端，要最無情的反對遏制此運動高漲之一切企圖而奮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信，年幼的中國共產黨，發展極速，已經做下了革命的英勇的模範，必須很快的改正這些錯誤，須知這些錯誤是由事變的異常複雜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幼稚中發生的。

六 武漢政府、政權問題、軍隊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看輕武漢政府的意義，因此實際上否認他極值大的革命作用，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武漢政府及國民黨左派領袖，就其階級成分而言，不僅代表工、農及手工業者，亦代表一部分中產階級。所以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但他已經走到工、農專政的路上。在階級鬥爭中，如果無產階級獲得勝利，趕去了那些跟着資產階級跑的人們，戰勝了無數叛變之後，則武漢政府便必然發展到這個專政的方向去。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武漢「臨時革命政府」的活動，是必要的。那個不主張參加，或對於此問題抱一種不定的憂疑的態度，他形式上很是「激進革命」，但在實際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國少數黨的錯誤。俄國少數黨那時以爲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寧願組織「極端左派的在野黨」，但是實際上跟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背後，搖尾乞憐。

少數黨的態度的特點，正因爲他反對參加革命的政府，而參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因爲武漢政府的確用革命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者，反對封建制度，現在更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大部。

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共產黨必須積極參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同時，對於自己最親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堅決，也要加以批評，並確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確路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促中國共產黨特別注意，革命政府與民衆間的親密聯合，在目前實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這種親密的聯合——這種聯合是特別要國民黨幫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堅決的走向羣衆的路線，才能永久加強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爲革命的組織中心。

爲武漢政府劃定這條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實現此項任務，不擴大羣衆運動，沒有農民革命，不堅決改善工人階級地位，不變國民黨成爲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偉大的組織，不繼續加強職工會，擴大共產黨，不造成武漢政府與羣衆間之最密切的聯絡，則勝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能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僅僅可用這策略辯護，不是這樣，則參加政府將成爲領袖結合、政客勾結的戲劇，受了實際生活的沖刷，目下偉大的階級鬥爭之進展，必至煙消雲散，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樁任務，更要把政府中的活動和羣衆中的活動聯結一起。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在目前的條件下，擴大國民黨內民主化，收容最廣大的羣衆，迅速發展各種工農的羣衆組織，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國發展中的特點，像革命的國民黨這樣特殊的組織，可以直接決定政府的成分，是絕不可忽略過去的。用國民黨收容廣大民衆，使羣衆選舉國民黨的指導機關，經過這些在選舉制的基礎上建設的組織，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這是勞動羣衆和革命的國家政權間聯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適合中國革命的目前階段。因爲武漢政府統治下各省狀況之不同，則地方政權的組織，在最初時期，必然採取種種色色的形式（在鄉村間「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政權，以及國民黨委員會政權等等）。共產黨人組織地方政權時的主要任務，便是領導廣大勞動羣衆，領導千百萬工農羣衆參加組織，組織成後，參加工作。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在目前提出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口號是決不適宜的；這個口號沒有別的意思（在武漢政府統治區域內），只好作爲佈告蘇維埃政權解釋。

在中國革命進展目前的階段中，即刻成立工、農、兵蘇維埃，必要被認爲是兩個政府，是推翻武漢政府的路線，是超過國民黨這個羣衆的組織及國家的政權，直接把蘇維埃政權作爲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但是革命的繼續發展，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已經開始，則成立工農兵代表委員會即成必要，這時，成立蘇維埃的口號便成了黨的中心口號。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改編軍隊的問題，編制絕對委身革命的隊伍，軍隊與工農組織間之聯絡，建立軍隊中幹部，改編傭兵爲革命之常備軍，在目前特別需要。至於武漢革命的工農編成絕對可靠的隊伍，在軍隊內確立共產黨及堅強不拔的國民黨左派的影响，肅

清軍隊中反革命份子，組織工團軍，尤須特別注意。

七 目前中國革命政策之幾個策略的根本問題

中國共產黨站在極端複雜的任務前面，反對帝國主義、軍閥的鬥爭與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之並進。實際上中國之分裂為三部，經濟狀況及政治狀況，綜錯萬分，帝國主義之統一戰線與此統一戰線內之衝突，帝國主義大批軍隊之駐華，中國各部革命成熟程度之極端參差，革命之特殊「軍事」形式，以及國民黨左派內及軍隊內部之種種矛盾：凡此種種，都使革命在進展中，發生無數非常的困難。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為，武漢政府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縱橫捭闔的策略，根本上是完全可用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反對那借口「國家政權既是非無產階級的性質，根本上便不能用縱橫捭闔的『布列斯達策略』」的意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這項意見是建築在疏忽的理論的和政治的錯誤上面。

在無產階級革命日形成熟的條件下，如果無產階級的政黨站在革命的反對派，與政府對峙，他照例是反對戰爭的，是贊成推翻現政府，是絕不救濟現政府的困難的。

在中國目前現有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是贊成武漢政府所進行的戰爭的，他既參加武漢政府，則他對於武漢政府所行的政策，是負責的；他是要儘量救濟武漢政府的困難的。所以共產黨不能「根本上」反對縱橫捭闔的策略。負責武漢政府的共產黨，如果永遠而且在一切條件下，反對妥協的策略，這就是說，共產黨要無條件的同時向各方作戰，這真是大愚特愚。

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為，這個問題必須最具體的，拿各種具體條件去解決，這些具體條件不能夠事前看到，因為交戰各種勢力的比例不能事前精確看到，不能絕對精確估計的原故。

這縱橫捭闔策略的可用性也必須適用於政府的經濟政策。政府絕不能無條件的即刻沒收一切外國企業。在這裏，妥協也是根本上可以應用的。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為，民族及外國資產階級在各種企業內（工業、商業、銀行業，）怠工破壞，產生失業，希圖製造經濟之紊亂而破產，政府便須沒收與國有這些企業。民族革命政府不能姑息革命的敵人任意破壞經濟生活，在這種情形下面，政府必須採取嚴厲手段，改用自己的機關和無產階級組織的幫助，經營此項企業。

何時應該妥協，何時必須轉守為攻，這就要具體條件決定。共產國際特別以為，有些同志在上海政變時建議實行暴動的策，十分

謬誤。這項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動進攻帝國主義及其羽翼作先發制人之計，便須廣佈陣線，用武裝力量和他們鬥爭。須知暴動的策略乃是暴動既發，便要採取攻勢。所以有了相當勝利的希望存在，才可着手暴動。暴動是「玩」不得的。「無論如何都要暴動」的策略，不是列寧主義的策略。假使上海工人發起了廣大的武裝行動，則必被帝國主義聯合武力撲滅，中國無產階級的鮮血，在一個毫無勝利之望的戰爭中，便會平白灑盡。

在中國目前一般形勢看來，共產黨須採用如下之軍事政治的戰略：共產黨擁護向北發展之軍事計劃，而同時無條件的加深武漢政府統治全國區內之農民革命，極力破壞南京政府之後方與軍隊，以圖撲滅此賊，這自然不是說在適當時機也不該以直接軍事行動進攻南京政府。須知「向着羣衆」之足以克敵，在內戰中亦然。加以政策正確，革命之勝利，是靠得住的。

共產黨必須盡力從各方面加強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戰線，除以全力擴大農民革命外，尤宜同時保障小資產階級勞動財產不受侵犯，並助其反抗高利資本等等之鬥爭。除這樣去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的真正革命勢力之聯合，並以全力團結這些階級力量在武漢政府管轄區內組成強有力之組織外，在反革命的區域內，共產黨也必須站在羣衆運動的前端。

自黨組織到農民協會，建設大的秘密組織，組織且領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準備羣衆行動，以及兵士中的工作，這些統是黨的最重要的任務。

八 共產國際之各國支部與中國革命

從中國革命之一般意義作用出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

一、國際大部分支部未曾十分了解這個意義，在擁護中國革命的工作內，表現積極性之缺乏。

二、參加「反帝國主義」之共產黨人同樣表現積極性之缺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加速糾正此項錯誤，因此建議於各支部，種種方案宜在下列各項嚴厲執行：

甲、報紙上的鼓動和宣傳。

乙、職工會內及其他工人羣衆組織內之工作。

丙、在各國殖民地內及依附其宗主國之各國內的工作。

丁、預備派往中國之軍隊內的工作。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促各黨部注意，必須加十分嚴重的準備，不僅口頭上，要實際上阻止軍隊軍械運往中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令各支部担起這項任務，在帝國主義軍隊中最積極的活動，並宣傳這些軍隊直接轉到中國民衆革命軍隊方面。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令各支部中央委員會，製造上項之各種具體方案。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支部以弟兄的敬禮，誓以全力擁護他偉大的革命鬥爭。

此決議案：除上文所指出與托洛斯基的不同之點外，特別值得注意者爲：

一、農民土地革命應由農民從下面直接鬥爭，而不必根據政府的法令，共產黨應參加政府，促進土地革命，發展而成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權獨裁機關」；

二、武裝農民；

三、改組國民黨，容納工、農、兵、手工業者之整個組織入黨；

四、制裁國民黨左派之「落伍」及軍官之「叛變」；

五、共產黨積極參加中央及地方政府；

六、當民主革命發展而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時，即成立蘇維埃；

七、改編軍隊，與工、農組織聯絡，建立軍中幹部，共產黨組織工農軍。

在史、托鬥爭中，托派更爲左傾，但史派主張，如決議案中上述七點內容，也並不對武漢國民黨「左派」有絲毫利益。史達林及鮑羅庭執行此項決議案，卒以促成武漢分共，是以史達林與托洛斯基鬥是勝利者，而對中共之指導是失敗者，詳下章。

國際執委八次會議，托氏尚獲出席，至九月下旬其執委即被撤消。

第九章 中共之傀儡活動

第一節 在武漢期間中共黨務

壹 中共處境之狼狽

中共在民國十六年年初之活動，當然是遵循第三國際十五年十二月七中全會「中國問題決議」之指示。其具體事件爲反蔣、反英及擴大農民運動，但實際情況與史達林所指示者大有出入：以言反蔣，則不僅東南諸省，如粵、閩、浙、蘇、皖等，均在蔣總司令指揮之下，即湘、鄂、贛等省之軍政人員及民衆亦並不擁護中共。以言反英，雖收回漢、潯租界，而未能動搖英國在華之根本勢力，更去「打倒」英帝國主義甚遠。以言農運，則湘省農民協會會員號稱二百五十萬（史達林在國際八中全會中曾提及），其後又號稱六百八十萬，然其堅強程度如何，真正生產農民是否擁護農民協會？均堪懷疑，農民武裝更談不到。

實則當時中共處境已頗狼狽。在國際七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會於十六年一月向俄使館提出一項「政治報告」，此項報告，其調甚低。承認在北伐進展中已「發生反共之偉大思潮」，不僅國民黨「右派」堅決反共，即「左派」「對吾人亦不表好感。」在報告中，中共欲藉羣衆力量及帝國主義力量以威脅左派，以「補救現時發生之危機」，然仍承認當時「反赤運動」較之中山艦事件時「尤爲嚴重數倍」。

中共中央之報告如下：

中央委員會關於政治問題之報告（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著者按：此係中共中央以俄文向俄國駐華使館所提之報告。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政治報十四至十七頁，原文頗長，此係節略。）

自（一月三日）漢口事件發生以來，英帝國主義亟圖如何達到國際及本國內部一致反對中國革命之辦法，但尙鮮成效。

一、二五附加稅已在南方實行，英人自以爲可以買得華人之歡心，北方軍閥亦可增加收入。此項附加，蒙受最大之損失者爲日本，而英國則不多，足以引起英、日之衝突。另一方面，此項附加使北方軍閥得極大之幫助（北方獲百分之八十，南方約百分之二十）。

二、義、法因損失不大，採觀望態度，來積極助英。

三、美仍採一向主張，尊重中國之民族平等運動及其要求。

四、英保守黨主張對華讓步，自由黨亦不靜，惟工黨首領較惡。（著者按：漢案發生，工黨頗同情中國，但因其爲「黃色」，最爲俄人所嫉，中共不得不作此曲論。）

英國在國內外未能達到所希望之一致，近來對華，一方面引誘國民黨之溫和派，一方面對南方以軍艦示威。至軍閥方面，散佈一種消息，謂中山主義可以容納，但必須與赤俄脫離關係，並驅逐過激派，且提出交還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及召集國民會議之口號，此與帝國主義者如出一轍。如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完全一體時，此項策略斷難生效，情現在環境至爲不良，國民黨右派勢力日漸雄厚，自西山會議及上海會議後，其組織上頗爲失敗，但主義及策略已獲勝利。現在國民黨內反蘇、反共、反農工之趨向非常強盛，其原因：（一）蔣介石及張靜江確信中國只應有一黨，階級間應調和，不應鬥爭，且不須要共產黨。（二）彼等以國民革命已發生效果，不久將有反階級革命之運動發生，現時最大之敵人不是帝國主義與軍閥，而是共產黨。（三）處於第三者地位者，鑒於北伐之發展，而農民運動揮於共黨之手，遂發生忌妬畏懼之心理。有此三因，遂發生反共之偉大思潮，而其共同原因仍爲階級問題。資產階級與吾人處於反對地位，但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無關重要之衝突，吾人應加讓步，但吾人未加注意，因之，國民黨左派對吾人亦不表好感。此種衝突將日漸發展，而無法避免。

對此，本黨擬具如下策略：（一）喚起羣衆，使其在各方面擁護國民政府（著者按：當時國民政府已遷至武漢），使國民黨知悉革命尙在艱難階段，須民衆協助，一方面減少對共產黨之畏懼——畏其發生共產革命。（二）宣傳方面，應盡力宣傳以下之要旨：

甲、解釋革命距成功尙遠，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仍舊存在。

乙、譏評國民黨資產階級主義之發達，根斥戴季陶、甘乃光等之資產主義，無論如何不可將彼等歸入革命方面，藉以挽救國民黨之右傾丙、集中於反英運動，使其孤立。

祇有如此，始能補救現時發生之危機。此種反赤運動，無論國內國外均可聯合一致，較之三月二十之事（中山艦事件）尤爲嚴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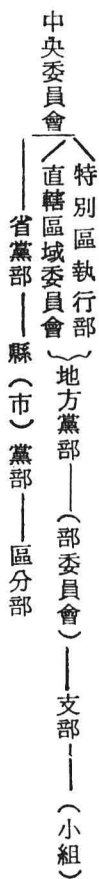
倍，因三月二十之事僅得蔣介石及孫文主義學會之單獨動作，而現時之情形，則國民黨右派及左派之一部均有反共運動也。

貳 推進黨務計劃

關於中共組織，目前所能獲得者為第六次大會以後各次會之黨章，在此以前，僅見之於陳公博論文所載第一次大會之黨綱與第二次大會之黨章（著者譯，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第二節），是以對二次大會以後中共組織系統，無從瞭解。至民國十六年二月，中共中央頒佈「各省黨務進行計劃」一件，由此可窺見中共組織之概況。（註一）

在此項計劃頒佈以前，中共似尚無省、縣級組織，而只設中央——各地執行部或直屬區域委員會——地方委員會——支部，凡四級。在此項計劃頒佈之後，始籌設省黨部、市、縣黨部及區分部。其原有組織系統似亦未廢除，而照新計劃，於地方委員會之下得設「部委員會」，大支部之下得分設小組。依此，則是後中共組織實行雙軌制，如下：

中共組織系統圖



中共所設執行部，據張國燾回憶錄有北京、廣州、漢口與上海四處。在文件上尚發現有哈爾濱。「委員會」與「黨部」並稱：如「地方黨部」亦稱「地方委員會」通常簡稱「地委」。國燾並稱：北京區執行部書記為留法學生趙世炎，同時受駐京俄大使加拉罕指導（李大釗當然可以就近指導），廣州區執行部書記為陳獨秀之長子，亦留法學生陳延年，

同時受鮑羅庭指導，均有獨立傾向。上海區在中共中央直接指揮之下，哈爾濱區工作似未展開，均少提及。至於漢口區，在北伐軍達到後，張國燾於十五年九月奉中共中央派以全權代表赴漢口，處理一切黨政軍工作。當時執行部組織及人事如下：

書記：彭澤湘（至十一月由張國燾接任，澤湘轉任唐生智第八軍政治部主任；至十六年四月，中共中央遷至武漢後，區書記由張太雷接任。）

組織：陳潭秋。

宣傳：林育南。

國民黨工作委員會委員：董必武、錢介盤等。

工運委員：李立三、劉少奇、項英、許伯昊。省工會於十六年十月十日成立，向忠發爲委員長，立三、少奇、項英副之，分任總務、組織、宣傳工作，許伯昊任秘書長。

農運委員：陸沈、陳蔭林、劉子谷等。

婦運委員：蔡暢、黃木蘭等。

青年團委：李求實、李書渠等。

民十六年十月十日武昌光復後，武漢三鎮均入革命軍掌握。其時唐生智擁重兵，有野心，鄧演達爲總政治部主任，兼任武漢軍政要職，權重一時，均借重中共。張國燾與之周旋，形成第三勢力。唐生智以其政治部主任國民黨員劉文島任漢口市長，國燾乃推薦彭澤湘繼任唐部政治部主任，復推薦自德歸國之朱德，自四川來漢之劉伯承於演達，分派至四川楊森及鄧錫侯軍中工作。鄧演達親共，在總政治部工作中中共份子有李和林、章伯鈞、朱代杰。中共在軍事方面有葉挺，軍校方面有憚代英等。其陸續來武漢者有自上海之李立三、劉少奇，及自湖南之毛澤東。至十六年二月，魯易(Roy)譚平山來自俄國。其時因遷都至武漢或南昌問題，中共不贊成至南昌，並主張反蔣，吳定康，一直代表國際指導中共，不贊成鮑羅庭及中共之反蔣意圖，亦於二月來武漢，與鮑大吵。吳且有赴南昌謁蔣總司令之行，但無結果而返上海。迨上海四月十二日清黨前，中共中央諸人則幾全至武漢。（註二）

但四月六日北京搜查俄使館，李大釗、趙世炎等處死，北京執行部被破獲，四月十二日南京清黨，上海及廣州執行部被破獲，負責人羅亦農、陳延年亦先後被捕處死。中共勢力蒙受打擊甚鉅。

(註一)「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中國共產黨類六一至六二頁。

(註二)國慶回憶第十二篇第一章，第十五章。

第二節 第五次全國大會

壹 大會的紛擾

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六日(註二)舉行於漢口。此次大會之記載有米夫之「中共英勇奮鬥的十五年」，以後毛家史官所編史書悉以此爲本，所稱開會情形大致如下：

大會採公開方式。代表約百餘人(一段約八十人)，代表五萬七千九百多黨員。汪精衛、譚延闓、徐謙均曾參加，開幕時並致賀詞。

大會指出：「黨的領導機關對民族資產者在革命中的態度有了偏向的見解」。在北伐時期，黨並未注意到在革命領土擴大時，必須加強革命的社會基礎（第五次大會決議案）。

大會駁斥了陳獨秀機會主義的理論。所通過的決議大部份是與國際立場相符的。

第二個問題，接受國際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提綱。（著者按：即前述國際七中全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

第三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大會並未給以明確澈底的解決，後來不久，根據國際的指示（著者按：當係指國際八中全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兩決議案均見第八章），修改了這個決議。

在所有毛家史官中，眾口一聲稱：在大會上，毛澤東、瞿秋白、任弼時等如何堅決反對陳獨秀與彭述之等之機會主義，陳獨秀如何反對土地革命，而只主張沒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毛澤東如何提出「迅速加強土地鬥爭」之「正確意見」而竟被陳獨秀抑制，甚至被排斥於大會之外，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中甚至沒有毛澤東的名字，而僅當選一名候補委員。

以上米夫及毛家史官記載，均毫無故實。因中國革命形勢至此，第三國際之指示既不合實際，而中共內部亦陷於紊亂，無論史達林之史官或毛澤東之史官，除將一切錯誤委之於陳獨秀，而加以謾罵外，實無從置詞。

著者友人某君，當時曾逐日至大會觀察，據其就記憶所及，會議情況甚為紊亂，亦未作成何種決議，所談情況如下：

中共五次大會在漢口跑馬廳附近第一小學禮堂舉行，雖有工人糾察隊司警衛，而實際完全公開。時中共尚無省、市黨部，中央而下，只有地委，如廣東、兩湖、四川、浙江等地委。北方黨務，因張作霖搜查俄使館，李大釗被捕殺，而完全陷於停頓；江、浙及廣東黨務，亦因南京清黨而星散，是以代表人數不多。陳獨秀以總書記，實為家長地位，主持大會，第三國際代表羅易出席指導。鮑羅庭則未見出席。

時武漢方面國民黨雖繼續容共，但國共關係頗為緊張，是以大會中分為兩派：一派以陳獨秀為首，主張國共繼續合作，一派以瞿秋

白爲首，主張脫離國民黨，實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陳獨秀於四月初會與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主張國共繼續合作，茲欲通過大會，以貫徹此項主張。屬於陳派者有彭述之、譚平山、蘇兆徵等。述之似爲大會秘書長，爲獨秀之親信，其後與獨秀同走入反幹部之托派，被中共稱爲取消派。譚平山時爲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長，與國民黨一向接近。蘇兆徵出身工人，智識有限，時似爲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其他代表，多數附陳。反陳派領袖瞿秋白，自俄歸國不久，撰有「中國士的階級」一小冊子，長約二萬言，在會中散發，大意反對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即反對國民黨的領導，亦即反陳。某君獲得一份寄呈戴季陶。此爲當時一重要文件。瞿秋白爾後取得陳獨秀地位而代之，與此文件有關。（爾後瞿之遺孀楊之華捏稱：瞿文與毛澤東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合印一冊，提出大會，意在捧毛，並無其事。）中共宣傳部長蔡和森，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中委兼湖北地委張國燾、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主任惲代英及張太雷等則均反對國共繼續合作。張國燾、張太雷、蔡和森均爲反陳有力份子，但態度緩和；惲代英則甚激烈，至指此次大會爲「可恥的大會」。毛澤東亦出席，時已非湖南地委書記，地位不高，所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調農民暴動，但不如瞿、蔡等之長於理論，受大會排斥，至刺奪其表決權。

尚有羅章龍、陳潭秋亦出席，頗活躍，但未發表意見。（章龍爾後反共，在湖南大學執教，至大陸淪陷，共軍入湖南時，首先捕而殺之。潭秋則於抗戰期間新疆事變時，與毛澤東之弟澤覃同被殺。）周恩來未見出席。

汪兆銘一度被邀出席演講，徐謙陪往，譚延闓並未去。汪總總理「三大政策」，主張國共合作到底，由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共產黨應實心實意與國民黨合作。汪蒞會前，共黨將會場重新佈置，懸掛總理與列寧遺像及青天白日與第三國際（？）旗幟。新製五次大會歌，頌揚國共合作，於汪蒞會時，高唱此歌以歡迎之。汪每講一段，即由張太雷（似爲主席團之一）領導高呼一陣口號，幾形成一種國民黨而非共產黨閉會氣氛。在此國共關係緊張之際，汪之欲借重於國共合作，正與陳同。汪蒞會時，所有跨黨份子，如國民黨中委兼聯席會議常委吳玉章、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國民政府農政部長譚平山、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省政府農工廳長兼聯席會議委員董必武等，均迴避，未出席。

大會中兩派各持自己主張，攻擊對方，因而對議案不能作成總結。陳獨秀輒於主席台後座位上假寐，發出鼾聲。每次會議，僅由羅易作不負責之指導，並稱將雙方意見轉報國際，敷衍了事。

會中並未直接反蔣——其時中共反蔣，均假手於國民黨之汪兆銘、徐謙等人爲之。

大會選舉結果，陳派仍佔多數（註二），陳獨秀繼續當選爲總書記，掌握黨的領導權。

至選舉情形，據毛之史官稱：選舉了二十九個中央委員與十一個候補中央委員，但名單不詳。綜合波多野乾一及蔡和森所述（註二）其當選政治局委員爲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蘇兆徵、李立三、周恩來。並選獨秀、國燾、維漢爲常委，恩來爲秘書長，未到前，由蔡和森暫代。七月初，鮑羅庭又指定國燾、張太雷、維漢、立三、恩來爲常委，獨秀遂不視事。

另據毛家史官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大會通過了兩大議案：（一）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二）土地問題決議案。在大會中，陳獨秀對第三國際七中全會關於中國問題加以指摘，不贊成實行土地革命，而主張只對大、中地主及反革命土地予以沒收，至於全面土地改革，應留諸北伐完成、農村階級鬥爭發動以後。提出「擴大革命論」，以爲「先擴大而後深入」，即應先完成北伐而後談土地革命。何史並謂「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指摘了陳獨秀的政治路線完全錯誤，大會指出了：「如果認爲先要完成北伐，而後始執行急進的土地改革與民主政治之創造，那末，這正可以使資產階級在他所占領的沿海諸省，戴着民族主義者的假面具，而在極短時期內鞏固他們的勢力，以幫助帝國主義。」

據此，則大會駁斥了陳獨秀的「擴大革命論」，但又矛盾的通過了陳獨秀路線之「土地問題決議案」，由此可以顯示五次大如何紊亂，其所通過之議案，亦不過草草了事，並未經過一定程序。宜乎某君謂「大會對議案不能作成總結」，而毛家史官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亦謂：「大會事實上就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貳 羅易與鮑羅庭之矛盾（註三）

五次大會之所以發生紛擾，「事實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其關鍵並不在乎毛家史官所謂「陳獨秀之機會主義」與某些人之反機會主義，而在俄方所派之指導人羅易與鮑羅庭二人間之矛盾。

鮑羅庭之爲中共及武漢國民黨左派之最高指導者，已如前述。至於羅易，則在南京清黨，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發生鬥爭，中共與國民黨左派關係緊張之際，奉史達林之命，攜帶其自身曾經參與之國際七次執委會決議，以第三國際代表身份來華指導中共。其特殊地位當不在鮑羅庭之下，中共之五大，正在羅易指導下召開。

羅易（M. N. Roy）印度人，出身婆羅門，爲第三國際突出人物之一。列寧之東方民族革命政策及國聯對東方民族

革命決議，羅易均曾提供重要意見。

羅易此次來華，處理中共問題，却使自己陷於困擾之中。當時橫陳於羅易之前者有下列諸問題：

第一、與國民黨「左派」繼續合作問題；

第二、土地革命問題；

第三、北伐問題。

關於與左派合作問題，羅易與鮑羅庭均係遵從史達林指示，應與武漢國民黨繼續合作，在原則上二人並無不同。在合作中，究竟是所謂無產階級（意即中共）領導小資產階級（意即國民黨左派）？抑小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在原則上亦無不同，二人均認為將來必為無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而非小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但在目前，兩人態度則不一致。羅易對於此層作露骨之表示，却引起不滿。在五大席上，汪精衛發表演講，論國共合作，仍強調中山先生之容共政策，要求中共為國民革命而努力，此項演講，羅易稱為「出色」，「博得大會的熱烈歡迎」。而羅易答詞，指「中國革命之前程為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革命，其將來的發展將由無產階級（指中共）在國民黨內，以開朗的革命先鋒姿態出現來決定」；「中共的任務……使革命經過非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向社會主義邁進」。羅易此項演講，據羅易自稱：「經領導同志檢查後，認為是對國民黨左派無技巧的攻擊」（註四）。此項檢查意見，雖未提及鮑羅庭，但吾人有理由相信包括鮑羅庭之意見在內。

關於土地問題，成為羅、鮑二人爭執之焦點。羅易根據國際執委七次會議決議，應沒收「大地主」土地交與農民，而此種沒收，應由農民協會與農民武裝，自下而上直接解決。據此，當時發生一系列的問題：第一、何謂「大地主」？此一界說引起中共間，中共與國民黨左派間重大的爭執。其次農民直接解決，勢將（實則已經）造成農村社會上大紊亂，將不問地主之大小及是否為革命軍官之家屬土地而均遭沒收；第三，當時武漢之掌握政權及武力者究為國民黨左派而非中共，此等直接解決主張，如不得左派同意，如何能付諸實行？——勉強行之，亦勢必妨害國共合作。對此，鮑羅庭堅決反對，觀於羅易批評鮑氏「既無胆量，又無發動土地革命的願望」（註五）可以知之。鮑羅庭非不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只是在軍事行動期間不應提出，以免引起軍人及國民黨人之反感，而羅易則欲利用土地革命以裹脅農民壯大中共革

令陣容，逐漸走上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地位。

羅易對於土地問題之主張雖然提經五次大會通過，但不僅未能付諸實行，且在湖南、湖北所已有之農民運動，在中共份子指導之下從事暴動，已引起農民及革命軍人之反感。夏斗寅及許克祥之反共行動相繼發生，迫使中共讓步，轉而指摘農運「過火」。中共中央並據情陳報共產國際，其電文如下（註六）：

致共產國際電（英文回譯）（見陳獨秀的中央政治局通告，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國際七中全會指示中國共產黨沒收大地主、土豪劣紳和反動份子的土地。中國共產黨主張沒收土地的政策較以往更為迫切，土地委員會一再討論這個問題；起先計劃沒收所有的土地，後來決定僅沒收大地主的土地。

據汪精衛報告，國民黨開始討論土地問題。國民黨土地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沒收小地主以外的所有土地；這一項決議為國民黨政治會議所贊同，但由於軍方的反對，致這項決議未能頒佈。大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和小地主的軍官，對於土地革命表示反對。然而，土地沒收不在引起軍方的藉口，而是一種農民運動的過火行動；諸如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的被沒收，他們親戚的被逮捕，平民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為農民沒收與瓜分。

這些過火行動迫使出身自小地主階級與豪紳土匪的軍人們，結成反共反農民聯合戰線。尤其是家人會遭受壓害的軍人更感到痛苦。農民運動在湖南發展得特別快，百分之九十的國軍來自湖南，整個軍隊對於農民運動懷有敵意；夏斗寅的反叛和長沙事變，是這一個普遍敵對的一種表現，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均需採取讓步政策，此一政策勢必把過火行動納入法軌，並且修正沒收土地的實行。

對於為少數或是一般地主所支持的豪紳和土匪的聯合攻擊，必須制止，以便我們的力量可集中來抵抗這種反動，同時，加速鄉村自治的建設，以及加速農民武裝，作為土地沒收實施的預備步驟，此種步驟是依據已擬成的計劃，並為充分的組織力量所支持。

否則，同大多數反動軍隊發生立即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則我們將處在反對黨的地位；國民黨勢將與蔣介石聯成一氣，一同對共產黨從事鎮壓，但在最近的將來，國民黨在客觀上，這大概是不可可能的。

譚平山的含糊演說公開發表後，接踵而至的是夏斗寅的叛變，因此國民黨決定延擱土地問題的解決而先平定夏斗寅；做政府官員的

譚平山，當不公開袒護與國民政府相分歧的意見。

你們的指令是正確而且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的贊同；中國共產黨要在短期間內實現民主專政，事實上沒有此種可能，要藉着組織的力量來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在我們發現自己的地位能履行這些工作之前，與國民黨和國軍領袖們有維持友好關係的必要；我們必要設法引誘他們的左翼領袖，尋求一個共同的政綱，假如和他們發生決裂，那麼將很難，甚至不可能創造我們的軍事力量。

如果向大地主和革命份子沒收土地的政策不停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就無法禁止。為了中止軍官和左翼國民黨間的驚慌，我們當前的工作是糾正過火行動，再沒收土地，並且揭發誇張的反動宣傳，然後方能克服站在農民運動上的障礙。

引起農民運動的動力是這些失業、無地的農民，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並且要求平分財產，因此無可避免地要和土地出租人或是獨立農民發生衝突。這種情形勢必要變更，貧窮的農民亦勢必成爲此一運動的核心。

關於北伐問題，羅易與鮑羅庭亦發生歧見。鮑參加北伐而至武漢，繼續北伐成爲當時一種趨向，且其時馮玉祥在史達林支援之下再起於西北，鮑曾與之聯系，且極力提攜自以爲玉祥之親信之徐謙，以示好於玉祥。加以其時在山西之閻錫山表示服從國民政府，鮑遂以爲：武漢之唐生智如與馮、閻合力，共擊張作霖於平津，則完成北伐（東北暫不計入），將易如反掌。鮑羅庭此項如意算盤後羅易證明其錯誤，但在當時頗能自圓其說。但羅易則不以为然。羅易並非因鮑之算盤打錯，而是因其觀點不同而反對鮑氏。羅易主張先深入——沒收土地與武裝農民，而後擴大——北伐。此項主張，不但未能說服鮑氏，並未能說服中共。因土地問題不能解決，已如前述，則所謂先深入而後擴大亦成爲無理由。

中共中央對於北伐問題曾作出一矛盾的決議：既要反奉，又要反蔣；既要北上，又要東進；既要進攻，又要防守，且此一決議剛被通過，即自行取消，轉而支持國民黨之繼續北伐的決定——實際上此項決定亦未能付諸實施。

茲將中共此項決議及其取消記載轉錄於下：

關於繼續北進運動的決議（英文回譯）

——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在漢口通過——

爲了擴大並加速中國革命，對於奉軍必須予以決定性的打擊，因爲奉軍的澈底毀滅，將會成爲對帝國主義的致命打擊，所以此項工作必須達成。

與此同時，所有的革命武力必須動員，以打擊企圖分裂革命運動的○○○與資產階級。爲了能够成功地與帝國主義從事鬥爭，以及與帝國主義工具的地方軍閥主義及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從事鬥爭，國民政府必須擁有一個鞏固的基地。

在現階段情況下，一項以攻取北京、天津等地爲目標的即時軍事北進，對於革命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以北進求得地區擴張爲目的軍事行動，必須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或已局部完成革命的地區，求得一基地的鞏固，不過，對於國民政府適當的保衛仍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保衛，鞏固革命基地的目的也無法成功地保持。爲了防衛目的必須達成以下的措施：1 此地區內的國民軍，應即時擴大佔領河南省南部。2 建立與馮玉祥之密切而充分的合作關係，使他的軍隊能够漸漸地向臨海鐵路推進。3 已經從浦口後撤之第二軍與第六軍，必須北進以佔據安徽省的西北地區。這些防禦性的軍事行動，最後將導致臨海鐵路的佔領，並使之成爲保衛革命的第一線。其次，第二線將會是長江。在第二線後面可以發展革命的主力，以鞏固革命基地。

依羅易同志演說時所提的意見，在越過臨海路前進之前，鞏固基地的工作就要達成。至於認爲在南部反西南各省的革命武力，到國民政府即時攻取新領域時，不能獲得進一步的進展之說法是不正確的。

據假設，共產黨的意見，將會在國民黨前得到考慮，而國民政府將會決定贊成北進。

(註)兩天後，中共中央取消此一決議，而支持國民黨即刻向北進軍的決定(羅易)。

叁 決議案與宣言

五次大會雖陷於紊亂之中，實際上無所成就，但照例通過若干決議案與宣言。決議案之重要者有二：一爲政治情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一爲農業問題決議案。此等文件中文原本未見，而均載於羅易使華錄(Roy's Mission to China)。後一決議供見於波多野中共史中。

在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顯示中共在羅易指導之下之一種企圖，奪取國民黨的革命領導權。此種企圖，顯然違背中山先生生容共之本旨，因中山先生之意在容納中共服從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也。此時南京業已清黨，而武漢

國民黨左派尚努力親共，並欲利用中共及俄共以對抗南京，遂使羅易以爲篡奪革命領導權之時機業已成熟。

在此決議案中首先指陳無產階級領導地位將保證中國革命不走入資本主義，而走入社會主義。而無產階級之所以取得領導地位則有賴於國民黨之分化（指南京清黨）。「封建資產階級份子與帝國主義軍閥聯盟，促使無產階級與農民、小資產階級聯盟。」決議要求既要深入，又要擴大，而深入較擴大更爲重要。決議譴責向資產階級投降，而主張國共密切合作。此種合作，決議案違背俄人屢次向中山先生所提供之諾言，竟謂「共黨在國民黨內不是隸屬關係，而要有一個共同綱領」。關於土地與軍隊之具體問題，決議案主張完成土地革命，應由中共領導，中共應組織軍隊，通過土改組織農民成爲革命軍，而不應依賴「左派軍閥」。中共之欲奪取農民與武力以顛覆武漢政權，已昭然若揭。

茲將此項決議案錄後。

政治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節略——英文回譯）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中共五次大會通過）

（一）自從本黨上屆大會後，革命的發展已有快速的推進，本黨也同樣得有快速的成長。四次大會時，本黨僅有黨員九百五十人，現在已超過五萬人，而黨的政治影響力，更超出此數，本黨已成爲全國無產階級與農民公認的領導者了。過去兩年間，本黨已在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不斷的鬥爭與武裝暴動中，領導了無產階級。在僅僅四年內，在本黨的領導下，二百五十萬工人與一千萬農民的組織，已創造出來了，而本黨也已變成了羣衆的黨。

上海無產階級「五卅」慘案的鬥爭，香港的大罷工，以及漢口工人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等等，都是中國革命歷史的標誌。過去兩年，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均處在顯着的地位，但是現在已取得領導的地位了，勞動階級在中國革命裡，所處的這種地位，保證革命不會被引入一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而會直接地被領導去爲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

（二）中國革命的發展，已完全證實了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所提出之議案的預言，國民革命愈擴展，階級鬥爭也愈緊張。國民黨內的封建資產份子，正想盡辦法，要領導革命與地方反動派和外國帝國主義妥協，於是國民黨內的左派，便向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靠攏，並起而反對封建資產的妥協政策。而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一項危機也因而發展開來。結果，由於封建資產份子無法

把革命運動隸屬於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之下，所以就使黨加以分裂。他們不但放棄了國民革命的鬥爭，而且反對國民革命鬥爭，而變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上海英勇的無產階級發起兩次暴動，以幫助國民軍，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與北洋反動派的戰鬥爭中，無產階級作了最大的犧牲。雖然如此，緊跟着北伐軍克復上海之後，工人們還在上海的大街上被射殺。

於是革命便進入其第三階段，封建份子與大資產階級便反對革命，而在此革命的階段中，由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革命陣營，便成為社會的基礎，而在此革命的陣營裡，無產階級將會得到領導的地位。

(三) 革命運動的急速發展，和無產階級在其中之影響力的成長，同時，也產生了所有反革命勢力的結合，這一點，可以由帝國主義者為了直接的軍事干涉的目的，而有聯合陣線的建立，以及為了反對國民革命，而有軍閥與反動派、大資產階級等的陣營的組成顯示出來。帝國主義害怕革命民主力量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鞏固，可能造成帝國主義及其盟友最後毀滅的決定性鬥爭之序曲，所以帝國主義正尋求如何威脅國民政府，以及如何迫使其採取一項妥協政策。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正使盡所有手段，以促使由軍閥與大資產階級組成之反革命陣營的產生。在革命第三階段一開始之際，帝國主義、軍閥與大資產階級等有威脅性的聯盟，便造成最大的危機。接着而來的革命發展，將在反對這項聯盟的積極的鬥爭中進行，只有動員所有人民的力量，建立一項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才能抵禦並摧毀此一聯盟。

(四) 「五卅」慘案，在無產階級為取得領導地位的鬥爭中，是重要的一天，因為有了這項鬥爭，才有了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暫時性的成功。不過，當封建資產份子覺得，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反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可能走得太速，會造成對他們階級利益的客觀威脅時，他們就盡量將民族解放運動置於其控制之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此項為取得國民革命領導權鬥爭的首次表現，就是三月廿日（中山艦）事件。（以下對此事件之分析與檢討，約六百字，略。）

(五) 北伐的主觀動機，就是資產階級想擴張其勢力的慾望，不過，客觀地說，北伐却也是發展革命的一個途徑，因此，支持北伐的政策是正確的。（以下檢討中共所犯的錯誤為不够充分地注意到領土擴張，同時加強革命的社會基礎的必要性，約四百字，略。）

(六) 對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的過份估價，便導致低估了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當然，小資產階級永遠無法變成一項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正當大資產階級聯合封建反動派，預備妥協並取消革命之際，無產階級就應該特別注意防止小資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靠攏。上海暴動所以被擊潰的主要原因，便在於無產階級未能支持小資產階級所致。（以下攻蔣總司令及中共自我檢討約百餘字，略。）

(七) 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認為上海無產階級的二月暴動太早熟了，以致本黨無法在這樣短暫的革命狂熱中得以控制羣衆。而基於一個偽

裝的「工人代表蘇維埃」組織一個市政府的企圖，則更爲早熟。大資產階級一開始就不支持此一運動，而白色恐怖更嚇倒了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發現了自己已陷於孤立。在二月與三月兩次暴動被撲滅之間的一段時期，就應該用來建立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密切聯合，以爲建立革命民主政府的基礎，可是本黨在第一次過早的行動中，已受到失敗的打擊，還盲目地在另一極端衝，一心一意只知如何把大資產階級拉攏來參加市政府，却把小資產階級一概置之腦後。本黨另一個錯誤，便是在國民革命鬥爭普遍發展中一意孤行，來領導上海運動。

(四) 五次大會對於上海無產階級的英勇鬥爭，在歷史的意義上予以公正的評價。儘管有不少的錯誤與失敗，上海暴動，在無產階級爲取得革命領導地位的鬥爭中，仍不失爲突出的事件。在現階段，正當無產階級、農民及小資產階級變成革命的社會基礎之際，上海的無產階級仍不失爲支持革命的最重要力量，而以上海爲鬥爭基本中心之一。五次大會拒絕那種認爲任何人佔領上海後，與帝國主義妥協是不可避免的觀點（刪一句）。自從「五卅」慘案以後，上海的無產階級從未中斷過其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並且最終將推翻帝國主義的力量。

(五) 五次大會肯定地認爲，封建資產份子的脫離，並不削弱革命的力量。革命運動不是面臨衰落的時期，而是面臨加強革命鬥爭的時期。在此時期內，在爲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治力量而鬥爭中，無產階級正在變成原動力。封建資產份子，只要一天存留於民族運動中，便不能一天不阻撓革命的農業及民主綱領之實現，它限制了羣衆的革命力量。現在，所有這些妨礙革命民主勢力自由發展的障礙物已全部掃除，革命運動也因而獲得健全。

革命的區域迅速擴張時，必須同時在國民黨佔領地區內，加強革命基地。廣東省的喪失，便顯示出這種擴張而沒有相對地加強革命的危險性。在現階段下，革命的主要目標便在於爲了鞏固勝利，裏從根摧毀反動派，這項目標，可以積極的土地改革政策之實現及在鄉村革命民主力量的建立來達成。

(六) 革命的發展已增進了帝國主義者干涉的威脅，於是產生一種失敗主義的氣氛，尤其在小資產階級內更爲明顯，結果又產生一種傾向，要把革命的基地遠離帝國主義的堡壘。（著者按：此似係暗指毛澤東的「上山主義」）五次大會提醒本黨，不准這類傾向的存在。帝國主義干涉的危險確實存在。共產黨號召工人及農民羣衆堅決鬥爭，以保衛革命與抵抗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基本目標——防衛並加強南部與中部的基地——並不阻撓任何方面的擴張之必要性與可能性，不過，假藉擴張之名，而目的在放棄或削弱基地者，共產黨一定要反對到底。（著者按：此即暗示中共對於繼續北伐之興趣，不如其赤化長江以南之興趣的濃厚。）

富庶和開發的東南及中部地區，一定不可以完全給資產階級來控制。

五次大會把今後加強並鞏固革命基地的任務付諸共產黨。如果根本的土地改革及鄉村裡革命民主力量的建立要拖延到北伐結束時再做，那麼資產階級便可假借民族主義的旗幟，鞏固其在佔領區內的勢力。如此，只有加強帝國主義的地位，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太虛弱，無法成爲獨立的力量；而中國也只有進入一段在帝國主義財政資本領導下之經濟發展的時期，而帝國主義主要地便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以求得世界經濟的穩定。那麼中國只有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而變成某些型態，這就意味着革命的消滅。

爲了鞏固革命的收穫，共產黨必須喚起勞工羣衆，反對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在戰場中堅強起來的無產階級，或是在廣大的農民團體及國民黨共產黨之高度發展組織的省份內，革命的基礎便必須鞏固住。共產黨無法想像革命的基礎，比上海的無產階級，廣州的勞工階級，以及廣東、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內革命的農民，更富有可能性及可靠性。對於革命區域更進一步的擴張，以及殲滅張作霖之必要性，連最低限度的低估也不致於發生。五次大會更要求共產黨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廣西等革命已有部份成就的省份內，在最近將來，採取對反動派毫不憐憫的鬥爭，爲其主要的任務。此項任務的達成，也就是在相當範圍內的地區，社會及經濟方面有所準備，以建立革命民主的勢力。如此，便可摧毀封建資產份子取消革命的努力。一切客觀的環境（國內的和國際的）均有利於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之發展。

中共五次大會對於違背共產國際指示和逸出正常軌道，如趨向於把革命領導權投降資產階級以取消革命的任何偏謬，均加以譴責。

（四）四年以前，共產黨基於兩個條件加入國民黨：（a）維持組織上的獨立，（b）爲追求勞工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自己的政策，保有（對國民黨）批評的權利。在與國民黨的關係中，共產黨盡一切努力堅決地反抗國民黨右派限制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此項決策的結果，本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員人數，已有增加。……本黨的政治路線必須解放出來，勞工利益應對國民黨造成一種壓力……（略百餘字）

共產黨與國民黨間的關係，在革命現階段，正變得比過去還要密切。

資產階級的退出，使國民黨變形爲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等三個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陣營，而此一陣營的原動力就是無產階級。在此情況下，共產黨不但要與國民黨共負責任，而且要共享權力。共產黨必須獲得一種形勢，使得一切與革命政策、革命綱領、革命戰略有關的問題之決策方面，工人農民的利益必須顧及。對於國民黨，共產黨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反對關係，所以革命陣營必須有一個國民革命的共同綱領。

共產黨與國民黨間更密切的結合，在共產黨參加中央政府及省政府中，以及在聯席會議討論革命一切主要問題之新程序中，都已表

示過。在此形勢下，黨派的工作，已具有極端的重要性。羣衆對於各種國家機構和黨的機構的影響，將會透過共產黨而實現。不過，五次大會要提醒本黨，注意由本黨與國民黨關係之新組織形式可能引起一項取消主義的趨勢。必須牢記：革命陣營並不是一個黨。

在革命的現階段，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才是基本的任務。爲鞏固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合所必需的土地革命，要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五次大會否認一種機械的理論，說共產黨只是無產階級的黨，而國民黨是代表農民。因爲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主義，是要在一定時期裡由最革命的階級來完成，而無產階級在中國此一時期裡，是最革命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是農民爲反抗封建主義而鬥爭的領導者。

(由)革命現階段下一項重要特徵，就是無產階級取得領導地位。但是，如果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無產階級也無法履行此一重要的政治功用——領導地位的實現。因爲待遇菲薄，吃不飽，穿不暖，和遭受剝削，無產階級當然無法取得爲一項偉大革命鬥爭的前鋒所必備之政治發展的巔峯。因此，共產黨必須爲提高無產階級生活程度而極力鬥爭，因爲提高生活程度，乃是無產階級適時達成其歷史任務所要準備的第一個條件。五次大會相信，不要有任何顧慮來阻撓無產階級下列各種要求的實現：(a)每日八小時的工作制，(b)維持生活的工資，(c)保護勞工的立法，(d)安置就業及失業救濟，(e)女工童工的保護，以及(f)老年的保險及退職金。

(由)認識利用軍閥軍隊間的衝突以發展革命的目的之戰略上的重要性，五次大會同時還賦予共產黨重組軍隊的任務。

革命的發展，使軍閥的上層份子氣餒，而其不太反動的份子遂加入了革命軍。不過，革命接着而來的發展，終要威脅了左派軍閥們的利益與權力，結果，他們難免要阻撓革命或反對革命。這些不可靠的份子，不可以成爲革命的唯一武力。革命必須創造其自身的軍隊，而土地革命可以創造出真正革命的軍隊之社會基礎。農民爲了保護其既得的利益，並答謝革命的幫助，將會加入革命軍。

參加革命之左派美閥的軍隊，是服從命令和接受餉養的。甚至加入革命軍後，左派軍閥仍堅持維持其自己獨立的作戰單位。他們的士兵不令溶解於革命的行列，只遵循其傳統的封建奴隸關係，服從其本身的軍事統帥。要把這些部隊革命化，土地問題必須提出作爲政治教材。土地革命的宣傳，對於這些沒有土地或窮苦農民出身的士兵一定可以得到良好的反應，他們一定信任能够實地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政府。

(由)由於大資產階級的主動的敵對行動及反革命有力聯盟的建立，也由於帝國主義干涉與經濟封鎖的威脅，國民政府已面臨嚴重的

財政上困難，如果財政上的困難無法克服，那麼也就不可能繼續革命戰爭，組織軍隊和創造一國家機構以實現民主專政。

但是共產黨必需堅決地拒絕任何以增加勞工羣衆經濟負擔來解決財政問題的企圖的這種辦法不但不財政是解脫困難的辦法，相反地，牠會削弱國民政府的基礎。五次大會宣稱，只有土地革命才能夠真正解決財政上的困難。以土地稅的形式，征收地主所收巨額租金之一部份，納入國庫。爲解決財政危機，必須採取以下的臨時措施：(a)制定高額財產稅，(b)發行革命戰爭公債，向不勞而獲階級（即資本家及地主）硬性攤派。

（以下關於於運、婦運及革命互濟會三節，約七百字，略。）

關於「農業問題決議案」，其基本內容爲「耕者有其田」，農民武裝與農民政權，爲爾後中共處理土地問題基本藍圖。決議案稱中國土地百分之六十六握於地主手中，地租高至百分之五十，農民須納重稅。農村共有地亦握於族長手中。農民不能有儲蓄以改善其生活，淪於一種農奴地位。地主之封建剝削亦不用於發展生產、交通及商業，轉而用之於高利貸及市場投機，使勞工及小商人蒙受其害。軍閥及官僚亦向農村索取苛捐雜稅。農村人口過剩，便利帝國主義者僱傭廉價勞工製造商品，榨取中國財富，使中國更趨於殖民地位；軍閥亦得招募廉價傭兵，作爲帝國主義的傀儡。帝國主義與軍閥成爲農民兩大敵人，國民革命應領導農民推翻他們。

決議案認爲資產階級的發展有賴於農民的解放，但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則與帝國主義相結合，壓迫農民，因此，農民只能與工人及小資產階級相結合。

又謂，實行耕者有其田，將土豪劣紳及公產之土地分配給農民，才能保證國民革命之勝利。

農民運動，決議案主張應以貧農爲基礎，建立農民武裝。廣東及兩湖農運已有發展，而其他省份則否，應繼續爲免租及耕者有其田而鬥爭。

決議案最後提出農業綱領爲沒收公有地，地主出租地交與無地農民及革命士兵，實行累進稅，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權，武裝農民，反對高利貸等。

茲將此項決議案錄後。

中共五全大會農業問題決議案（日文回譯）

——包括新農業綱領——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六日中共五全大會通過——

一、一般情勢的分析

(一)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現在仍然大致上是建立在封建關係上。土地的大部分（約為百分之六六），是掌握在收取地租的地主手中。耕種土地的佃農及再佃農並無所有權。地租的比例既不一定，租佃權也不是長期的。地租平均佔收穫量百分之五十。並且，農民對於在農村中掌握政治權力的地主階級及軍閥官僚們擅自徵收的各種捐稅，仍須照數繳納。僅有大約百分之三十四的土地，是在農民手中。大資本家的土地經營，在中國除了北方若干省分（山東及東北）以外，並無其例。一部份的耕地，是屬於村有地、世襲地以及寺廟所有。這種共同所有地，事實上很久以前已經廢止。可是至今這種所謂村有地的管理組織，却為在農村中族長支配的基礎。村中長老奪取了這些土地，於是在耕種的農民也就被剝奪了土地。藉着這樣的霸佔土地，村中長老成為地主。而且至今基於村有地的傳統仍擁有族長的權利及權能。這樣，中國農村的經濟構造及行政組織，在本質上，仍是封建的，族長的。

(二)同時，原始的資本家榨取方法，深入在農村經濟生活之中。因此之故，農民遭受着前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的雙重榨取。結果是農民越來越貧窮，整個經濟組織遠遠落在時代後頭。地主收取的地租，佔了地上收穫的大部分，所以農民手中毫無剩餘。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自無可能改善生產手段以及生產方法。這就是原始的農業生產狀態的原因。它實際上乃是一種農奴制度。農民僅僅是為了消費而從事生產，其剩餘均歸了地主。資本家之榨取之上層建築，就是建立在這種封建關係之上。付給地主的地租，通常是繳納實物。（這也是封建制度的一種遺物。）以這種方法，農業生產物的剩餘，集積到封建地主的手中。這樣，他們既為地主，同時又成為商業資本家。但是，由於他們在本質上是封建的，所以阻止了他們朝着資本的方向發展。藉着前資本主義的榨取農人而集積到他們手中的東西，並非轉化為生產資本，而是幫助了土地投機及高利貸業。經濟的不發達，妨害了現代交通工具的發達。這又是使得國民經濟具有地方分散性的

原因。國土被分割為許多孤立的地方性市場，而各市場又被地主獨佔，在市場中農業生產物的總剩餘之處理，由地主一手掌握着。在這種情形下，地主藉着抬高物價，不僅可以榨取農人，也能榨取都市的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工資低廉的勞工，爲了獲得生活所需物品，被迫付出更高的價格，小商人則成爲地主階級投機的犧牲者。這種複雜的原始榨取制度，對於高利貸正是豐沃的苗床。高利貸業是唯一的信用機構，也是資本家蓄積的唯一手段。可是這種高利貸資本，並不促進工商業的發達。它只是用做土地投機。極高的地租、其他封建的捐稅、以及軍事、官僚的國家機構所做強制性徵稅，使農民事實上陷入飢餓中。在大多數的省份中，掌握最高權力的軍事、官僚機構，以各種形式榨取着農人。其最厲害的如次：

(甲) 苛刻的合法及非合法課稅。

(乙) 軍隊的任意需索(米、鞋、馬等)。

(丙) 在軍事行動期間的強制徵收。

(丁) 無償勞動。

(戊) 發行毫無價值的紙幣。

(己) 國內稅。

諸如此類的過時的半封建榨取方法，對於全國的生產具有破壞性的影響。生產物的剩餘被人掠奪，始終彷彿在飢餓線上的農民，無從改善他們自己的經濟。封建性的高地租，誘使貨幣所有者們去做土地投資，而阻止了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的發展。甚至於集積到農村商人手中的資本，也犧牲了農村產業的發展而向土地投資。

白農村的人口過剩，使封建軍閥的榨取組織得以維持下去。而工業的未發達導致農村的人口過剩。帝國主義的支配也延遲經濟進步。在這種瀕於破產的農業狀態與帝國主義之間具有有機的關連。帝國主義爲了獲得本國商品的市場，及都市工業所需的廉價原料，乃大力擴張殖民地。勞力在原料中是最重要的。像中國這樣的殖民地狀態的國家，對於都市工業而言，直接的或間接的，農村爲其背景，也是廉價勞力的泉源。於今帝國主義的支配之結果，乃是殖民地的工業不發達，而且這種不發達，竟必導致殖民地的農民化。因爲工業尚未發達，所以並不發生勞力大量自農村流入都市的情形。這一點，使本來因爲較高度生產形態的成長，而行將毀壞的衰老封建經濟，得以續延生命，並引起農村的人口過剩。農村人口的過剩，幫助了在農村中封建關係及榨取的維持。離開了土地的農民羣不斷增加，致使勞動價格降低至近於零，於是鞏固了帝國主義的基礎。這些情形的總體，就是迫使農民大眾的極度窮苦化及貧困化的原因。到處找不到

工作機會的成千成萬貧農，只好去做土匪或傭兵。由國民經濟的分散性而產生的，在中國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軍閥，是封建的反動之強烈表現，是帝國主義的傀儡。地主及土豪劣紳、高利貸、軍閥——整個這一批，都是封建的反動以及原始的資本家蓄積之生產性機器。這個機器，從農人的血管吸取血液，使國民經濟的組織支離破碎。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帝國主義施行它高度發達的資本家的榨取。農人被經濟破產所迫，不得已而受制於高利貸的爪牙，由於過苛的地租（著者按：當係指「賣青苗」之類實物高利貸，）所以農人的借款轉眼之間變成若干倍，終於不能自借款中拔足。於是農人，不得不出賣土地。如是，土地乃集積到高利貸的手中，喪失土地的人們增多。這樣就成為廉價勞動力的無盡泉源，也成為軍閥及土匪的基礎。收奪農人土地的情形，藉着另一種途徑也會發生，那就是在沿海各省的東北及蒙古的殖民地農場，由帝國主義者直接購入土地。

(四)深入於國民生活體內的土著的軍國主義，與障礙農村地方經濟發達的外國帝國主義，都是立足於農村的封建構造之基礎上。因此之故，中國大眾對這兩大敵人鬥爭的第一成功要件，乃是推翻在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以及寄生的權力。土地所有制度的根本變革，才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原則。否則，為了真正的民主主義的自由所作鬥爭不可能有所進展。為了撤除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的上層建築，必須把它的基礎××（著者按：日文原件如此，下同。）

(五)在中國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是農人。如果得不到農民大眾的積極且自覺的參加，則國民革命不可能成功。破除農業榨取的中心，國民革命陣營才能獲得農民羣衆的力量。農業革命——打破封建制——是爲了確立民主主義的先決條件。在正常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把農民從封建制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是社會進化的正常過程，在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干涉而被歪曲。在中國，資產階級並沒有發展成爲對抗封建制度的勢力。資產階級，一方面是發生自封建地主階級，至今尚與之密切結合着；另一方面是作爲帝國主義榨取的下手（買辦）而生長起來的。二者不論那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總是與榨取農民的勢力具有不可分的結合關係。所以資產階級不能站在農業革命的前頭而鬥爭。資產階級對於農業革命是站在敵對的立場，因此不僅是不能爲民主主義的自由而進行鬥爭，相反的不得不對這個自由鬥爭。蔣介石的分離就是一個例子。中國的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經濟內的帝國主義的獨佔，因爲它是農村封建關係持續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客觀上乃是反對因子。但是資產階級由於跟封建的背景之間的有機關連，不能進行農業革命。爲了自己的階級利益，不能做好對於帝國主義的決定性鬥爭之先行條件。考慮了這些事實，農民在對封建制及其支持者的鬥爭中，將由××的同盟者，都市小資產階級支持的無產階級所領導。

(六)無產階級及都市小資產階級所受資本主義的、封建的榨取之經濟影響，常因生活資料漲價及商業自由發展被限制二種方式而感覺

到，因而這兩個階級，對於向農人的封建的榨取，是立於敵對地位。根本的農業改革，也就是讓農民對於所耕種的土地的生產物，具有完全的請求權，這不僅對於農人即對於整個人民均將有利。農民大眾的生活向上，將促進商業的顯著發展。農人的剩餘生產物不再被搶走，那時農人就會自高利貸的爪牙下解放出來，而貯蓄必要的資本以改善農業方法及手段。其結果將是農業生產額的增加，改善了的農業經營，可提供勞動機會給目前正在助長軍閥陣營的無地農民（著者按：指士兵）。打破封建的高利貸獨佔，就可形成自由的市場，降低物價。最後，撤廢封建的地租，將會給予國家一大財源。

(四)廢除封建的榨取，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才是可能的。為了打倒農村中族長的政治權力，必須把土豪劣紳們從前掠取的村有地、世襲地及寺廟產的處置權予以××。為了保障根本的農業改革的進行，農人必須掌握農村中的政治權力。農村的武裝勢力的指導權，必須從土豪劣紳××而交給農人手中。成千成萬的無地農人，得到土地及生產的勞動，藉以除去構成軍閥的社會原因，那時農村將可自軍閥解放出來。高利貸，如果它的經濟原因不存在時，亦將消滅。國營農業銀行、合作社的信用授受、及類似的信用組織，將使高利貸絕滅。對高利貸的鬥爭，是農村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以上這些任務，也就是將農民大眾自封建的、族長的榨取中解放出來，才能確保國民革命的勝利。

(五)五大大會的見解如次：農業問題的根本解決，必須將土地按平等原則予以徹底的重新分配。這只有在土地國有化後才能進行。黨將指導農人去進行土地平等分配的鬥爭。這必然將伴隨黨的農村綱領的根本原則——土地國有、私人財產××，是不能抗拒的。

二 農民運動的傾向

(六)廣東、湖南、湖北及其他各省的經驗顯示出，農民運動大部份係以貧農（佃農、半佃農及自耕農）為基礎，並由他們組織成的。由於這一運動的此項基礎及性質，已然邁進到可展望農業革命的地步。在現階段，運動的主要方向是，朝着族長及封建的權力之××，以及樹立農民的××。所以在這個鬥爭中，農民武裝問題具有重要性。這種一般的傾向，在許多地方已進行到對土地問題的實踐的解決開始行動。

(七)但是在許多省份中，農民運動並未達到同一階段。軍閥彈壓基層的北方，農民協會係非法的，運動沒有充分發展。在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各省僅剛剛開始。減免地租、減低利息、減稅等，對於土豪劣紳及其夥友的鬥爭已然開始。但是那裡的農民係屬蔣介石獨裁之下。在運動發祥地的廣東，已越過了減免地租、減低利息等經濟性要求，而進入到要求武器、土地及參政的階段。不過，在過去二

年的激烈鬥爭期間，黨的情況並沒有以正確而審慎考慮過的政策去指導運動。最近開始的李濟深的反動，再一次附帶着彈壓農民，而使土豪劣紳及反動匪徒獲得反擊的勇氣。江西、湖南及湖北，是在國民政府之下。江西的農民，雖然開始了減免地租、減低利息的鬥爭，一般而言仍在加強努力組織階段中。因江西已被置於蔣之鐵的支配之下。農民爲了打倒他的勢力，曾兩度抗爭。湖北，尤其湖南的運動，曾達於發展的最高階段。湖南農民把土豪劣紳及反革命的權力××了。他們爲了××××舊制度的權力，樹立自己的××而鬥爭。在二、三地方參與了施政。然而，並不止於此。湖北及湖南的農民，已着手於土地問題的解決——自土豪劣紳及地主手中奪回土地並予分配。

(乙)運動大致上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之下。如無無產階級的指導，將不可能正確的展望未來，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自己。紅槍會的組織，雖然也是運動的一種形態，但在組織及鬥爭的方法上是中世紀的。在階級分化尚未深刻化的北方，例如河南，運動多由大地主指導，而被反動勢力所利用。但是只要它是對軍閥、專制、高稅抗爭，它就具有革命的性質。

(丙)隨着運動的進展，封建的、族長的反動勢力（反動的匪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亦拚命去彈壓它。他們××、×殺農民，以抑壓運動，與軍閥勾結而利用其武裝力量（村警及匪徒）。但在國民政府支配地區，運動是在比較自由的條件下進展着。運動向前巨步邁進，而成爲大的力量。在這種狀態之下，土豪劣紳及地主們，不能公然攻擊運動，而採取了消極的反抗，將稻米移出拒絕向農民貸款之類的卑劣手段。或者自行裝扮爲農民，組織騙人的農民協會。在蔣的支配下地區，只有此種協會可以存立。在國民政府下的地區，土豪劣紳及農村資產階級，也企圖與軍隊的封建因素勾結而襲擊農民。因而在農村中，現階段的農民的鬥爭日益趨向尖銳化。

(四)農民首先對於高的地租及利息榨取者的壓迫××抗，與土豪劣紳及其強盜幫兇的××抗爭，於是開始了他們的鬥爭。隨着鬥爭的進展，設法把××入於手中，遂發生對壓迫者的××衝突。在革命與反革命軍交戰的地方，農民歡迎此項交戰，以便利用這類機會將土豪劣紳及封建官僚的權力××。這是表示，不僅是爲土地問題的解決，而爲了強制減免地租，減低利息，農民也要行使××及政治權力。農民鬥爭，必然要經過克服族長、封建勢力之階段。在這一一切的鬥爭中，貧農成爲決定性的中心力量。農民之××的權力以他們爲基礎。對於封建權力的此項攻擊運動，在客觀上乃是解決土地問題的開端。農民尤其是它的下層，因爲土地不足，地主的榨取以及苛捐雜稅，而嘗受着塗炭之苦，爲了貫徹他們的目的，必須贏取××，以××土豪劣紳及其掌握着徵稅機構的權力機構。他們應該始於要求減免地租，繼續關於土地的鬥爭，而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然後把地主們惡以欺壓他們的榨取制度終止。

(五)運動在××的階段時，全國並非一樣的發展，通常可看出有兩個主要方向。打倒封建、族長的權力，已經開始了，土地問題的解決，也正在開始。這是在革命的新階段之主要現象。農村階級鬥爭的發展，農業××的深刻化，這不僅粉碎了在中國帝國主義傀儡，

也衝破了封建的反動及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於是把帝國主義向反革命方向組織反動力量的基礎剝奪了。換言之，××的現在方向，乃是把土豪劣紳及反動的農民匪徒的××予以××，把大地主及反革命力量的××予以××，以貧農為主力的農村中農民之××××，實際改善農民的經濟狀態，引導它至土地的分配方面。

三、國民革命的農業綱領

基於上述具體化於農民運動中的客觀情勢及主觀勢力之分析，五大大會達到了左列結論，即農業問題的解決，在革命的現階段，左列手段是必要的。

(A) 村有地、世襲地、學校附屬地、寺廟產、基督教會之所有地以及團體所有的土地，予以全部沒收，並交給耕作的農民。被××了的土地的管理，由土地委員會行之。土地委員會決定其沒收地究應以共有地而耕作抑或分配給耕作的農民。

(B) 屬於地主的佃租地予以沒收，及把它透過土地委員會交給耕作的農民。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予沒收。原先係屬國民革命軍的土地不予沒收。沒有土地的革命軍兵士，革命戰爭後將可取得耕作的土地。

(C) 被沒收的土地，除應付給國家累進地租外，將絕對不另課稅。未被沒收的土地之地租，將減低到與被沒收的土地地租相同高度。耕作着未被沒收的土地之農民，將僅支付一定的地租，並有永久租佃權，可自其他一切捐稅下解放。

(D) 宣告沒收地主及土豪劣紳的一切政治權能及權利。××立對村人民議會負責的鄉村自治制。這個人民議會置其基礎於農村的被壓迫階級。

(E) 組織國民軍以××解除農村中的反動武裝力量。並防衛鄉村自治制及××的成果。

(F) 助成國營銀行及農民的協同信用，生產及分配協會，以及灌溉。

(G) 實行農民自衛的反對高貨鬥爭。××過去的債務，制定最高利率。

五次大會宣言，為中共對外之公開號召。宣言首先敘述中國反帝、反封建王朝鬥爭史，五四運動及工農之參加反帝反軍閥運動，城市民主主義者不得依靠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由於無產階級反帝之同時又從事階級鬥爭，因而引起革命陣營之階級分化，上海工人暴動之被鎮壓及南京國民政府之成立，概指為「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陣營，而使帝國

主義獲得新希望。宣言中對國民革命運動的領袖蔣中正先生，尤極盡誣蔑抨擊之能事。宣言呼籲工人、農民與城市民主主義者結合以打倒共同敵人。

宣言提出實行耕者有其田，建立農民政權及武裝。宣言要求改善工人生活，無產階級應居革命的領導地位。宣言指陳由於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對中國武裝干涉不能達成協議。世界上被壓迫階級與人民都站在中國革命羣衆方面，而中國革命亦有助於世界革命。

茲將此項宣言錄後。

中國共產黨五次大會宣言（英文回譯）

在過去兩年中，民族解放運動獲得了迅速的進展。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由壓迫、剝削、搶劫和掠奪所獲得和強化的權力，已經動搖了。在這勝利的革命鬥爭期間，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是這一運動的決定因素。由於勞苦羣衆的支持，國民革命運動才能在廣東建立起堅固的根據地。國民革命軍打着革命的旗幟，橫掃長江流域，也是得力於工農的協助。當帝國主義藍隊的大炮對準着國民革命軍，阻止他們進入上海的時候，無產階級再度挺胸抵抗。無產階級的羣衆遊行示威，給在長江流域的帝國主義者以嚴重的打擊，幫助國民政府在武漢建立起牠的權力。在過去，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爲革命戰爭而奮鬥犧牲；今後的革命，也要依靠他們的意志而從事戰鬥，依靠他們的決心而贏得勝利。

在激烈的革命進展的現階段，其特點之一，便是民族運動的行列中，有着階級的分化，在發動對帝國主義者進行鬥爭的同時，不能放鬆對資本主義者和封建剝削制度的鬥爭。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是齊頭併進的。這就加強了民族主義行列中的矛盾，而最後導致分裂。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中國並不是新奇的東西。具體的說：它在帝國主義的統治開始時便出現了。過去的革命運動，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之役等等，這些被稱爲排外性質的運動，本質上便含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意義。

帝國主義統治中國有兩個方法：第一是用軍事力量，佐以近代化的戰爭工具。第二是賄賂統治王朝和封建官僚。第一個因素，在帝國主義者入侵中國的時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第二個因素則用以鞏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過去的起義，由於列強優勢的軍事組織和中國封建王朝及軍閥的支持，都已經失敗了。到了一九一一年，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終於獲得民主的特質，推翻了滿清王朝。同時進行

反帝鬥爭，清算封建主義和阻礙中國民主化的份子，不僅是目前革命階級的特色，也永遠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基本特點。國民革命運動的民主的、反封建的特質，目前採取較為劇烈的形式，便是國民革命運動發展的結果。

一九一一年革命雖然推翻了腐敗的滿清王朝，但是卻不能夠實現中國民主化的使命。這個原因，是革命的社會基層受到限制。只有極狹隘的社會階層——資產階級和開明的知識份子——參加革命。他們的力量不足與帝國支持的反動份子抗衡。第一共和是短命了，革命實際上是取淨了。只有在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相牽制，才阻止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羽翼下的復辟。

歐洲大戰之後，民族解放運動重新取得了活力，在反對凡爾賽和約口號之下，它獲得了更廣大的民主基礎。

五四運動，以學生為中心的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城市民主主義，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動力，可是在那時候，這種運動的社會基礎並未深入到廣大羣衆之中。勞工大眾還未被吸收加入民族解放運動。抵制洋貨運動的目標雖然是反對帝國主義，但是還未具有革命的民主特質，也未要求清算封建主義和反動勢力，這兩種東西形成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基本基礎。

抵制洋貨的範圍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過了這個限度而成為帝國的嚴重威脅的時候，它就成為販賣洋貨的本國商人的仇敵。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形成了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弱點。不過抵制洋貨運動也有它的優點，它是使動搖的知識份子受到真正革命訓練的前奏曲，使他們認識勞工大眾是革命力量的基本泉源。

隨着五四運動之後，工農運動的先鋒隊（譯者按：指中共）參加這一運動的事實，充分說明了社會關係，它把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對抗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勢力。在目前的革命時期中，需要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作軍事式的大聯合。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

城市民主主義者（小工業者、小商人、手工業者，智識份子，薪水階級）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被壓迫者。他們要求得到政治權利，也要求得到經濟發展的機會。他們參加反帝運動，以表示他們對現狀的不滿。可是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的發展，又不能不損害了他們眼前的階級利益。貿易的故障是反帝鬥爭的第一個結果，它不僅使大資產階級（買辦、銀行家、進口商）受到損失，並且也妨害了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通過他們的成員和領袖與城市民主主義者聯合的反帝鬥爭，也就發生內部矛盾，而不能走得永遠。城市民主主義者甚至不能單獨為政治權利而鬥爭，因為政治戰鬥的加強，不能不加劇經濟上的矛盾。五四運動便證明了這一點。小資產階級中最進步的份子，動搖份子，便研究鬥爭的方法以解除這種矛盾。他們終於在工人階級日益對其不滿的情緒之中，發現了革命鬥爭的指導方針。為了成功地獲得經濟的利益和民主政治的權利，他們必須與無產階級團結一致，與帝國主義及其當地的同盟者（封建主義、軍閥主義）進行

鬥爭。

阻礙小資產階級經濟進展的，不是帝國主義統治的結果。相反地，目前中國的情況，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大部份要靠國際貿易的自由和繁榮。最使小資產階級經濟利益受到打擊的，是國民經濟的封建性，和軍閥不斷的內戰。這兩個因素，反過來說，又與帝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之所以能够存在，又是帝國主義統治的結果。封建經濟阻礙了國內市場的擴張。中國政治機構的封建性，在發展自由貿易的道路上，佈下了重重障礙（重稅，特別是釐金）。軍閥所加於商業沉電的負擔，使得本來已經支離破碎的商業瀕於崩潰。封建軍閥又剝奪了小資產階級的一切政治權利。這種種因素，使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受到了莫大的打擊，工人階級和農民大眾更不消說了。

城市民主主義者抱著反帝的熱情，開始起來反抗這種情勢。這是一種反抗壓迫的鬥爭，可是他們不知道從何處下手，如何下手，來採取攻勢，對抗敵人。直接攻擊帝國主義則影響到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會在失望之中放棄了戰鬥。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只在要求廢除直接壓迫他們的因素：即阻礙擴張市場，促使貿易中斷，和摧毀小資產階級和薪水階級的因素。從另一方面看來，廢除了這些因素，也就是動搖了帝國主義的基礎。但是小資產階級是不能獨立地發現和追求拯救他們的革命的道路的。他們只有依靠無產階級的合作和指導。五四運動的重要成就，就是小資產階級客觀的（如果不是自覺的）轉向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五年上海的五卅慘案，顯示出國民革命運動已經成爲一個羣衆的運動。在這個時期以前，工人階級已經組織起來了，創造出反帝鬥爭力量的新基礎。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關稅獨佔等等已不光是空話，他們已經有羣衆運動有力的支持。上海無產階級和民主羣衆的革命行動，雖然是在鮮血中被淹沒了；但是它的撞擊的力量已經遍佈了全中國，影響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地位。與帝國主義有商業和財政關係的資產階級，迅速地取消具有政治革命性質的上海工人罷工運動；大資產階級破壞了民族統一戰綫，以服務於帝國主義。關稅會議和治外法權問題，不能被認爲帝國主義爲了感謝資產階級的出賣革命，而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倒是他們因爲工人階級和民主大眾的革命行動，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傷害。

中國羣衆革命覺醒的另一表現，便是海員罷工和香港罷工。香港罷工帶有政治色彩，它將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這種無產階級的行動，加強了廣州國民政府的社會基礎，使其成爲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中心機構。廣州國民政府由於工人階級和民主大眾的支持，放平了英國帝國主義所組織和唆使的「紙老虎」的反革命行動（譯者按：指商團事件）。資辦階級想要推翻廣州國民政府，工人階級則站起來保衛它。而且，工人階級的英勇犧牲，把廣州從來自香港的帝國主義的進攻中拯救出來，經過一年之久的封鎖，予帝國主義在香港的貿易以巨大的打擊。

這些以及其他種種值得紀念的事蹟，證明了民族解放運動社會基礎的擴張。

民族解放的巨浪甚至捲走了資產階級。但是它的動力，則是工人階級和城市民主主義者在鬥爭的過程中，創立的一個革命的集團。在這種社會基礎的型態上，國民革命運動中階級矛盾是不能完全消失的。在進行反帝鬥爭的同時，如果不進行階級鬥爭，便不能獲得革命的性質。國民革命的任務，不僅是向帝國主義進攻，同時還要清算阻礙反帝鬥爭自由發展的社會經濟關係的封建勢力。所以國民革命超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狹隘範圍。

國民革命運動社會方面的轉變，不僅震驚了帝國主義者，大資產階級也大起恐慌！——這顯示出革命的民主勢力的增長，對於自身的階級利益，也是一大威脅。它要求工人階級和民主大眾置於民族資本主義的利益之下。不過民族解放運動客觀的利益，絕不能讓資產階級主觀的願望所破壞。

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和帝國主義獨佔的利益互相矛盾的。其結果是資產階級多增加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並且在第一個時期中，指導着這種運動。不過，更進一步的是中國羣衆間的利益，也和帝國主義的利益互相對立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尋求着與帝國主義妥協。工人階級則要求廢除帝國主義的統治。除了買辦份子之外，一般資產階級都是對帝國主義抱敵視的態度的，願意看見中國解脫出來走向本國資本家的剝削制度。可是帝國主義統治力量的最後的毀滅，只有經過革命的鬥爭才能實現。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也必然會毀滅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工具封建資產階級。在進行打倒帝國主義的同時，也必須加強階級鬥爭，這個前途使資產階級感到恐懼。

由於工人階級和民主羣衆的影響，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不能停止，所以大資產階級便離開了反帝的統一戰線。中山艦事件之後，資產階級一度獲得了民族運動的領導權，企圖將它轉移到本國資本主義利益的狹路上去——這一狹路，在某種條件之下，將不可避免地與帝國主義相妥協。由×××所領導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計劃，是用軍事力量統一中國，然後與帝國主義達成協議，剝削中國羣衆。

在資產階級繼續反對軍閥主義的期間，它客觀地保存着反帝的特質。所以無產階級與它結成統一陣綫，動員農民和民主羣衆在反對北洋軍閥鬥爭中，支持南方國民革命軍。只有由於工農羣衆熱烈的支持，南方的軍隊，才如此輕易地打败了孫傳芳。民族資產階級努力追求軍事的勝利，以增加他們階級的力量。但是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不是由局部的利益所決定的；它依照國家客觀的情勢而發展。中國人民的利益是要求消滅封建主義，建立民主政府，和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給予羣衆一個機會，以發展達成這三個目標的鬥爭。爲了這個原因，所以北伐的成功，加強了，同時也削弱了資產階級的地位。

由北伐所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的組織力量，曾經干涉過×××的企圖。他想要把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置於他個人軍事獨裁統

治之下，讓民族解放運動附屬於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時資產階級已經擁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從國民革命統一戰綫中分裂出來。但是這一行動，資產階級已經成為軍閥的同盟者和帝國主義的工具，雖然他們仍然自命為民族主義者。

×××所領導的封建資產階級份子，已經轉而反對國民革命了，甚至在他們正式離開民族解放運動的行列之前，就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在江西殘殺勞工領袖，已經顯示了×××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運動的仇恨。爲了幫助國民革命軍取得上海，無產階級組織了武裝暴動，但是×××遲遲不到上海。他拒絕了上海無產階級伸給他的有力的友情之手，當孫傳芳血洗上海工人的時候，他却按兵不動。

×××到上海之後，由於帝國主義的要求，他立刻無情地鎮壓無產階級爲幫助革命軍所組織的暴動。（按：此等論調完全是歪曲的。）

×××反對工人運動的鬥爭和他對共產黨的痛恨，顯示出他自稱爲民族主義份子，完全是一個騙局。現階段的國民革命運動，其推動力完全是工人和農民羣衆。祇有工農階級的革命行動，才能確保反帝鬥爭的勝利。任何人要想反對勞工階級的革命行動，企圖摧毀工農階級的組織，則不僅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同時也是國民革命運動的敵人。從中山艦事件那時起，×××和其支持者所進行的行動，已經直接反對國民革命。這不能認爲是個人的行動，×××及其支持者是一個階級的代表，他們所代表的是大資產階級。

革命軍在長江流域的勝利前進，革命運動的巨大發展，使得帝國主義者發抖。他們的軍艦紛紛開進中國水域，當革命軍逼近上海（帝國主義的根據地）時，他們採取防衛的措施。不過帝國主義者不敢採取公開的行動，對付革命軍，他們企圖潛入革命的行列，瓦解他的士氣。帝國主義者看出資產階級是他們反對中國革命的聯盟者。帝國主義者組織有聲有色的軍事示威的時候，他們同時故意讓資產階級知道，假使他們反對革命，帝國主義者就可以考慮他們的階級利益。資產階級知道了帝國主義的政策，就願意出賣革命了。

資產階級的出賣革命，喚起了帝國主義的新希望，他們利用革命行列的分裂，決定進行軍事干涉。由於這種對付國民政府的侵略政策，帝國主義者給賣國的資產階級以精神上的支持，使其在虛偽的民族主義旗幟之下，在南京建立了中心。

階級的分化和帝國主義干涉的危險是目前局勢的兩大特點。這兩個因素是互相緊密地關連着的。如果我們不接受革命過程中階級分化的教訓，就不能成功地克服軍事干涉的危險。階級鬥爭已經強化了，反帝鬥爭是不能與階級鬥爭分離的。只要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即使他是間接的進行鬥爭，無產階級也願意和他們結成統一戰綫，與帝國主義者作戰，現在資產階級已經公開拒絕反帝鬥爭，宣佈與工人階級爲敵，反動的封建主義、軍閥主義、帝國主義都作爲他的後盾，這些力量已經結成一個反對國民革命的反革命集團，這個集團必須予以摧毀，這就是當前革命的任務。

中國的工人們和農人們！

加強你們的組織，與城市民主主義者創造一個革命的集團，建立一個無敵的國民革命政府吧！

將中國各地的反動勢力堅決的連根拔除之後，革命勢力才能邁步前進，才能摧毀反革命集團，剷除軍閥，推翻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社會基礎必須要加強。無產階級、農人、城市民主主義者都曾經為革命奮鬥犧牲，保衛他們的利益，消滅他們的敵人，才能促進革命的進展。

事實已經證明，帝國主義者必須與其中國的聯盟者結合起來，才能對中國的革命力量作戰。革命必須對他們採取攻勢，以削弱帝國主義的基礎。寶國的資產階級妄想在國民政府的領域上，將一切反動勢力團結在他們的周圍。一條反動陣線——南京、上海、廣東、江西四川——已經結成了，以便國民政府與華北隔絕而加以窒息。這一反革命勢力，自然希望得到一切反動、封建勢力的支援。國民政府為了保衛自己，抵抗反革命的陰謀，必須在自己的領域上摧毀反革命的基地。無產階級和農民大眾必須支持國民政府，以實現這一個任務。在現階段中，國民革命與土地革命是互相配合的。

屬於大地主的土地，必須沒收。民團的武裝必須解除。土豪劣紳的勢力必須摧毀。鄉村的力量，必須建立在鄉村民主基礎之上。農民的武裝力量必須組織起來，作為保衛革命之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一定會給革命運動帶來龐大的軍隊，保證革命的成功。

國民政府統治下的省份，實行土地革命的時候，必然得到其他各省的同情和支持，使軍閥的聲望大受打擊。農民將歡迎革命軍作他們的解放者。軍閥一定會被摧毀，因為它腹背受敵——革命軍在它的前方，農民的暴動則在它的後方。

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封建勢力的阻礙貿易，和軍閥們的內戰，使小資產階級受到壓迫。所以他們必須和無產階級、農民羣衆一同參加革命民主集團，進行對帝國主義、封建反動勢力和軍閥鬥爭。共產黨領導着無產階級，以保衛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農民和小地主將組成聯合陣線，消除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紳的力量，小商人必須從苛捐雜稅下解放出來。

無產階級是革命民主集團的先鋒。但如果他們不保衛自己的階級利益，就不能達成他們的任務。較高的生活水準，可以增加無產階級的作戰力量。當他們領導農民羣衆對封建勢力鬥爭，以保衛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時候，無產階級絕不可同時放鬆他們對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環境等的鬥爭。再者，鑒於事實上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領域上，享有獨佔的地位，他們擁有鐵路、重工業、銀行，所以無產階級必須要求將這些東西國有化。無產階級正保衛着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小資產階級也支持着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由無產階級、農民羣衆和小資產階級組成的革命民主集團，創造出互相支援的基礎。

自封建資產階級份子出賣革命之後，國民黨已成爲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結合而成的革命民主集團。在現階段的革命運動中，

無產階級的主要任務，包括強化國民黨，聯合民主羣衆，團結在它的旗幟之下，革命民主集團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爲了鞏固這個集團，無產階級在革命的鬥爭中，居於領導的地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和參加國民政府，但是它的這樣做，不是爲了奪取權力；它的這樣做是爲了鞏固革命陣營，保證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

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一定能够克服帝國主義不可避免的干涉和威脅，和反革命集團的陰謀。對於這三個階級，國民革命所建立的國家，一定會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對於其他階級，它將是獨裁的。不是我們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一切的敵人都必須無情的加以毀滅，這就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原則。（這也就是共產黨的「民主」——著者。）

現在中國國民革命已經進入決定性的鬥爭的更高階級，國內外的客觀情況都將對我們有利。鬥爭之所以進入這個階級，也正是客觀情況演進的結果。

資產階級的背叛，使國民革命運動的內部解除了互相矛盾和互相衝突運動的因素。這個運動純化而指向一個單一的目的。階級的分化，產生出強化革命運動社會基礎的必要。這樣就吸收更多的羣衆加入鬥爭，造成革命運動巨大的進展。

現在的國際局勢對我們有不少的便利。帝國主義者企圖組成聯合陣綫來反對中國革命，但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普遍衰微，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日益增加。在對中國軍事干涉的問題上，他們之間不能達成協議。甚至在同一帝國主義的國家內，資產階級對這個問題也不能一致。有的主張爲了保護在華的投資，必須採取侵略政策；另外的人則爲了增進貿易的進展，主張必須維持和平的狀態。這種情勢減低了目前聯合軍事力量干涉中國革命的危險。不過賣國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的鞏固，將給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以新的機會。

此外還有一個因素，使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變成十分困難。這個因素就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反對軍事干涉。想用一、兩百個海軍陸戰隊和幾隻砲艇威脅中國就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如果要干涉中國革命，就意味着長期的戰爭。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將會堅決地反對這種對殖民地的戰爭。它（帝國主義）者將會發覺他們進行干涉必需的工具（軍隊、裝備等）不容易得到供應。在中國的戰爭，將會在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內，引起嚴重而複雜的政治情勢，中國的革命得到全世界廣大的同情和支持。全世界被剝削的階級和被壓迫的人民都會和中國羣衆站在一起，共同爲解放而鬥爭。

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們！

現階級的革命，要求你們比以前更大的犧牲、勇氣、和決心。不但中國革命的成功要依靠你們，世界革命的進展也依靠你們。你們沒有灰心的理由。勝利已經接近了，你們必須作戰，爭取勝利，在資本主義、軍閥主義、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自由中國！

打倒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軍閥和資產階級的集團！

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聯盟萬歲！

中國革命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七年五月

於漢口

譯自Roy's Mission to China [六四至一七四頁]。

肆 毛澤東所扮之角色如何

關於五次大會毛澤東所扮之角色，無論毛家史官或非共方面，無不認毛澤東為陳獨秀所申斥，被排於會外，未獲當選中委；亦無不認毛為農民暴動主張者，與陳獨秀之「右傾機會主義」對立。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更為毛家史官所奉為經典。但當時代表國際出席指導之羅易，於其回憶文中，竟謂毛亦支持陳獨秀論點，反對與國民黨分離，主張制止農民暴動。此文頗為離奇，姑錄之以備參閱。

羅易·毛澤東——一個回憶

(載一九五一年夏：美國「新共和」)。

我在一九二七年夏天那熱狂的日子中首次遇到毛澤東，當時中共的高級首領中還數不到他。他從未到過莫斯科。當我以二星期的跋涉從廣州來到長沙時，他並不肯麻煩一下前來看我。長沙是號稱「穀倉」的湖南省城，彼時毛澤東正在長沙領導着有力的農民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間在漢口舉行，會中要對於與國民黨前途做出決定性的決議。當時國民黨正分成對敵的兩派，中共與以蔣委員長為首的國民黨右翼關係已告一段落。蔣氏業已開始對共產黨的猛烈攻勢。待決的問題是與所謂國民黨左派及其在武漢的政府間的關係。

國民黨會允諾實行土地改革。基於此項諾言，中共已動員農民大眾在其旗幟之下。由於到一九二六年冬整個華南已歸國民黨掌握，共黨在鄉村的活動就要求實行某些彼等業已允諾農民的土地改革政策。

可是左翼的國民黨政府藉口於國民革命尚未完成，社會革命必須等待，而拒絕任何土地改革。在右翼國民黨軍所佔領的省份中，對於農民運動已行嚴厲壓制。武漢政府也向着此種趨勢前進。中共究應繼續支持武漢政府呢，或是不惜破壞與國民黨的聯合陣線而領導土地革命呢？那就是中共五次大會前夜舉行中執委會時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的答案要以決議的形式表達出來。我身為共產國際代表，並遵守國際最低的命題，我提出該項議案，認為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必須領導土地革命。彼時中共首領是陳獨秀，在蘇俄顧問鮑羅庭支持之下，反對此項議案。他的理由認為革命在深入之前必須先予以擴大，國民革命軍必須先打到北京；他們稱，在國民黨所佔領的領域內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與國民黨保持和平。他們固執地認為，若堅持農民的要求，就意味着促進內戰，因為地主階級要反對土地改革，而國民革命軍將領都出身於此一階級。共產黨的首領多數持此種見解，那是和共產國際訓令相違悖的。

因此我就要求將此議案提交代表大會，即使大會主腦們會予以拒絕。中執委會遲疑地接受了此項主張。

毛澤東身為中委之一，並且是農民運動領袖，他對此項議案的態度異常重要，可是他並未參加此次中委會，甚至連要決定此項重要而紛爭問題的代表大會也未參加。當時毛澤東是全國農民協會主席（著者按：時毛原為「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見本章第五節，不知何時成爲主席），該會是與國民黨聯合組織的。他以此項身份致函大會代表，要求大會拒絕我以共產國際代表資格所提的議案。陳獨秀個人反對我。鮑羅庭在幕後支持着陳，他並且掌握錢袋。可是大會竟以對大多數通過我的議案。許多代表來自鄉間，他們知道農民的情緒。

共黨大會閉後不久，內戰即告爆發。在湖南那重要省份，農民開始沒收土地。國民革命軍立即支持地主們。在湘省當局要求之下，武漢政府派遣農政部長譚平山前往湖南調查農民運動。那是一件苦事。中共中委會委員們摧毀了他們的效忠。

毛澤東來到漢口，我第一次看到了他。時間已在午夜之後。我們是在中共政治局一項熱烈的討論中間。鮑羅庭自己也參加，他坐在我身旁。一個黑黝寬面孔長頭髮高高的人，靜靜地而高傲地走進來。鮑羅庭小聲說「毛澤東」，毛並未注意我，甚至對於連手握重權的鮑羅庭也不加理會。我們兩個外國人相互看着。鮑氏用低沉的語調說：「一個難對付的傢伙；典型的中國人。」

毛進來後並未就坐。他小聲和陳獨秀交談幾句即開始發言。……

他的音調相當悅耳，並不假手於手勢，那是在革命的中國一種極流行的講台姿勢。鮑羅庭和我不懂華語。但顯然毛氏言辭是講給我聽的。陳獨秀和支持他的人都顯得很高興。經過爲我們做的連續繙譯，我可以推測知道這位全國農民協會主席在支持陳獨秀的論點，即爲了維持和國民黨的聯合陣線，中共應該限制農民的反抗。毛問道：「外國人怎能懂得中國的真實情形？我來自湖南，中共中不負責任的份子正在錯誤的領導農民。我們決不應在農村中發展社會革命並削弱國民革命軍的後方。代表大會做了一次重大的錯誤。大會決議案必須繼續擱置。」（採用香港「中國評論」二十一期譯文。）

此項回憶，著者以之詢於前述友人某君，據稱，事有可能，因毛之行動一切以發展個人野心爲目標，對政策主張反視爲次要。其時獨秀仍握有黨權，毛雖遭申斥，仍不得不阿諛以逢迎之。某君並謂：五大後，中共中央派毛爲四川黨務特派員，戴季陶在川中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頗久，亦頗欲毛自投羅網，囑某君代表戴氏促成其行，毛亦頗與某君接洽，並對戴氏表示好感，且已領取旅費，終以道路阻塞爲藉口未去，而仍赴湖南，充黨的湖南特派員。

（註一）據米夫稱爲四月二十日，歷時半月之久；據黃河「中國共產黨史」稱爲四月二十七日起。此處據波多野「中國共產黨史」。

（註二）名單參閱波多野「中國共產黨史」及秦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三）（註四）（註五）（註六）採用North and Eudin: Roy's Mission to China.

第三節 青年運動

北伐期間，民衆運動，主要者爲青運、工運與農運，均隨國民革命軍之所至，盛極一時。此項運動，表面上之領導者爲國民黨，而中共份子以跨黨關係，從中活動，實居於重要地位。在民國十五年七月至十六年三月，民衆運動鬥爭對象爲帝國主義與軍閥，十六年三月至七月，在沿海光復各省之民衆運動，着重反共，而在湘、鄂、贛各省者，則着重反蔣。後者當爲中共份子所操縱。

壹 調整青年團與黨的關係

青年運動，風靡一時者爲學生運動，較之工、農運動更爲有聲有色，此爲著者所親歷，亦爲當時青年學生所週知。惟學運之記載，文獻缺如，且僅爲浮面之羣衆活動，其背後牽線者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中共徵收黨員甚爲嚴格，而徵收團員則頗浮濫，故其所表現之聲色，團員較黨員爲盛。

共產主義青年團，原爲社會主義青年團（SY），於民國十四年二月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改稱現名，已詳於第五章第三節。

青年團可視爲黨的本身之一部份，又可視爲黨所領導之羣衆組織，與工、農、學生……等團體相似。團的地位和職責，及其與黨之關係，均欠明確，所以黨團之間難免發生糾纏與矛盾。俄共黨、團之間及中共黨、團之間，均曾發生此等現象，而爲不易解決之問題。中共方面，爲此，於民國十五年三月，發出通告，將黨、團關係加以解釋，謂CY是C P的一隻手，而同時是C P領導下的青年組織。CY應聽命於C P，不能開獨立；但C P也應重視CY的組織，而不應加以忽略。如此規定，當然仍不免發生矛盾與糾纏，於是規定C P與CY各級會議時，互派代表參加，以便溝通意見與解決糾紛。凡此規定，似仍不能確定兩者關係，因其本身組織重疊，則權責自不易劃分。

茲將此項通告錄之於後。

共產黨解釋CY與C P互相關係之通告

〔蘇聯除謀文體彙編〕中國共產黨類二七至二八頁。）

CY是黨在青年羣衆中的一隻手，是黨領導下的青年組織。CY除了受黨的指導作政治運動與勞動運動外，還要作關於青年無產階級及一般被壓迫的青年羣衆中許多工作。因此，可以說CY的工作也就是C P工作中的一部份。無產階級是整個的，他是祇有一個列寧黨，所以青年無產階級羣衆，CY所領導的，也應站在C P旗幟之下，統一其行動與爭鬥。因爲青年無產階級羣衆經濟的地位，比成年更要受壓迫，青年的情感比成年更爲激進，青年的興趣比成年更爲熱烈，對於青年的工作所以需要特別的獨立組織以爲領導，並圖發展，而不是CY是C P以外的一個完全獨立的青年政黨。另一方面，CY確是C P的一個附屬組織，如工會、農民協會等。但黨指導團，

却不能離開組織，因為團在組織上有他的獨立性，去獲得廣大的青年羣衆。CY是CP在青年羣衆中一個發展的工具。CP的政策在青年羣衆中去實現，是由於CY的協行。CY在政治上的主張是完全接受於CP。這是黨和團，自有組織以來，沒有人懷疑過的。各地黨團的關係，應怎樣的密切，才是真正有利於我們的工作呢？最近幾個月來，北方區之下的各黨與團的關係都不十分好，嚴格的說起來，這都是沒有認清我們整個的黨。現在將各地黨與團間發生問題最多的與最大的錯誤寫在下面：

- 一、黨與團的各級機關會議時，不互相派代表參加。
 - 二、黨的各級機關忽略團的工作。
 - 三、團的機關不執行黨的決議。
 - 四、黨任意調用團的同志，不通知團或不注意團的意見。
 - 五、不尊重團的組織，不顧及團的上級機關意見。
 - 六、不幫助團的發展，甚至將團的同志強迫入黨充數，來搪塞上級機關之發展的規定。
 - 七、禁止團在有青年羣衆的某種機關或學校發展或成立支部。
 - 八、黨團分劃，在年齡上不執行中央之決議。
 - 九、黨團間問題，不設法在當地謀妥善之解決，而輕率重報於上級機關。
- 以上所說的這些錯誤，一方面是由於各地工作緊張，祇顧對於上級機關的規定來竭力求他實現，一方面却不能否認是忘却了團的工作是黨的工作一部份，團是黨在青年羣衆的發展工具，團是黨指導下的青年羣衆領導機關。
- 團是黨的後備軍，團是列寧主義的學校，黨是要在青年羣衆有廣大的發展，團員的數量應當比黨員的數量更多。現在怎樣呢？團的工作與數量不特趕不上環境的發展，而且趕不上黨。應當十分注意：團的衰弱或不發展，不祇是團的危機，也是黨的損失。各地黨的機關，如果用着（？）不顧團的組織與發展，或不規定督促團的工作，團的機關不接受黨的指導，行動不與黨一致，這都是不認識黨，不懂得共產主義。
- 此後各地黨與團的各級機關，速將黨與團的關係嚴厲整理好，更密切起來，不但要互相督促着將過去的錯誤改正，而且在黨的機關要時常計劃着怎樣去幫助團的發展，指導團的工作；在團的機關要盡力去實現黨的決議，於青年羣衆中，領導着青年羣衆，站在黨的指導之下，做統一的運動與爭鬥。黨的工作報告，亦須包含CY的工作。凡此種種，各地黨部須切實注意實行。

羅迪歌

李瑞祥

(著者按：當爲一九二六年)三月廿六日

貳 共產青年國際之指導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接受中共與共產青年國際之雙重領導：中共之領導較爲技術性，而國際之領導較爲政策性。而共產青年國際則接受共產國際之領導，共產國際，在事實上，又受史達林之領導，所以中共青年團之最高領導者仍爲史達林。

民國十六年三月，共產青年國際通過一項「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決議」，時間在十五年十二月共產國際七次全會所通過之「中國問題決議案」之後，所以前者是後者之翻版或註疏，無甚新義。青年共產國際之決議，首先指摘中國團之缺點爲僅注重學生運動，而忽視工、農青年運動。事實上確是如此。中國之青運，除學運外，並無充實之內容，但學運則頗爲盛極一時。

在指示中，要求中國團「鞏固國民黨左派之勢力」，以與所謂「戴季陶右派」鬥爭。但對於左派之青年運動，團應積極參加，暗中加以領導。並要求團在工、農、軍三青年羣衆運動中加以領導，作爲團的主要任務。團應公開，但必要時應遮掩其本來面目。對反對者爲主義之鬥爭，不得讓步。在指示中，對於基督教青年會之分化工作，對於兒童團組織工作，可由國民黨左派出面，作階級聯合性的組織，而仍通過反帝活動，由中共青年團予以掌握。

此項決議案如下：

共產青年國際執行委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決議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

(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黨務類九至十六頁。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原譯均作「中國共產青年聯合會」，其他尙有不合處，概經

著者略予改正。）

一、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於中國問題主張，贊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議決案。

二、自前次全體會議閉幕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與多數青年工人聯絡非常密切，對於工人方面進行甚力，較諸從前，進步實多，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殊為榮幸。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對於目前問題，決計改良會務，將其變為多數青年工人之真正團體，實屬正確行為。根本會對於該團之進行，認為尚有多數不足之點未經改善。（如支團部之進行不力，徵募農民入會之進行亦極薄弱等。）以此等缺憾事件，青年團應即竭力進行。茲分述如下：

壹 團之性質及實際

甲、中國青年勞動者，因有種種原因，不得不盡力參加中國國民革命之奮鬥，以求解放。（如罷工、反對帝國主義之運動，參加革命軍隊、農民協會等。）青年團統率羣衆，指示革命奮鬥方法，可使無產階級勢力日益增高，即中國共產黨與青年團之勢力亦因之愈形鞏固。中國勞動界之革命運動更可瀾灑全國。青年團自應從此處着手進行。

乙、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組織，從前因各方面關係，多半僅為學界之團體，故於該團應行之事件影響至大。（如經濟上之奮鬥，農民青年之投洽等。）

青年團實際上之組織，自應為一鄉村與城市青年無產階級聯合之團體。凡具有忠誠熱心革命之青年農人及智識階級之青年，均應廣行徵募入團，並宜格外注意，務使團中工人幹部方面能有實行無產階級統率之保證。

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此應鄭重聲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應在中國青年工人方面極力進行，以鞏固該團在國民革命軍戰勝之地方，如武昌、漢口等處實業區域之中心，尤宜特別注意，盡量擴充其範圍，進行一切，以發展該團之事業。本會議並以爲宜犧牲多數之精神與金錢，根據此種主張進行，非達到目的不止。

貳 團之政治任務

甲、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贊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於廣州政府及國民黨軍隊實力之評價。青年團應盡力執行該

方面共產黨所主張之事件。本全會認爲執行國民革命軍各項事件係中國青年團一種極重要之任務。

乙、青年團既與共產黨共同奮鬥，鞏固國民黨左派之勢力，謀其發展，並補助革命之進行，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之青年，自應格外注意，力謀聯絡。一面宣傳無產階級之勢力，俾可日益增長。此實中國國民衆革命運動刻不容緩之舉也。對於國民黨內青年部事件，亦應竭力參加，實行指揮一切，作各界資產階級青年革命訓練之武器。

國民黨內青年部乃國民黨左派之一種屏障。對於該部學界及中產階級主張革命之份子，應爲相當之供給，並設法組織團體，俾可盡力進行，維持工人及農民之利益。

丙、廣州方面青年團支部之設立，半係秘密組織，且應行辦理之事件，亦不用青年團名義充分公開執行，此實職務上之缺憾，遺誤殊多。其意以爲：若儘量公開進行，必使資產階級之青年心懷畏懼，裹足不前，豈知其結果仍使共產黨及青年團之勢力無所發展，不能爲社會之引導，即中國勞工革命之訓練亦將不能進行。本全會認爲該團之主張全部均爲正當軌道，惟對於廣州支部未能公開一事，萬難認爲適當。本全會以爲應行辦理之事，均應用青年團名義公開積極進行。凡在廣州政府管轄內各鄉村及城市勞動階級暗中進行者，於今尤不得不公開奮鬥。但所有該團各種秘密之設置，暗中往來聯絡，軍隊中工作者暗中之指導等，均仍須保存，並從而鞏固之。各機關內均須設置此項暗中進行人員數人，不令參加公開事件，以便於大局或有變動時，亦可暗中經營一切。

叁 團關於經濟及職工之工作

甲、中國無產階級，若欲實行提倡革命運動，必須在經濟上盡力奮鬥。凡物質上之要求，關於權利及教育等，均躋於平等地位，方可進行。此經濟上之奮鬥，實爲現在轟動全革命運動中，必不可少之根本。故中國青年工人，若將經濟上奮鬥之範圍或稍縮減，則其革命運動必無功效可言。其獨一無二之方法，惟有對於一切經濟上及政治上之各種要求，羣衆實行奮鬥，乃可使中國工人深具革命之覺悟，其分門別戶，各自爲政之遺傳，亦可不再見於今日，於是無產階級之勢力日益增高，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亦不患無人爲之首倡也。

乙、招引青年加入工會，亦爲青年團各種主要任務之一。在工會內必須設置團的支部，受黨的支部指導及團的事務所之監督，進行一切。所有青年要求事件，必須納入工會各項要求範圍之內。團應與工會共同奮鬥，俾受同等待遇，不分畛域。若工會認羣衆主張不合時宜（如各種工會自行分別立會等），則團應會同黨支部及具有階級覺悟之職工團體組織相當會社向主張不合時宜之羣衆工人，

說明其無益及錯誤之點，庶可轉移一部份工人之感想，而免除其腐舊之成見也。團對於工會內教育等事，亦有極大之關係，尤以普及教育，免除不識字等事，為效最著。因團可積極利用知識階級，如學界中人，為之補助進行故也。

丙、中國工人以青年工人及兒童為最多，國內各處莫不利用他們製造各種物器，受苦耐勞，實為中外所罕見。此種青年工人及兒童，往往因自然力之薄弱，致有罷工等舉動。團應極力設法為此項罷工實際之領導，代擬要求條件，盡力參預籌備及實行罷工等事。所有黨支部及團支部，對此種罷工團體，必須保證由工會方面予以補助，相機維持，並指導一切，倘遇工會或成年之工人等拒絕維持罷工，則團一面繼續參預實行罷工，一面同時為宣傳之組織，務使工會改變其初時之主張，仍予扶助。凡遇此項青年工人及兒童自然力薄弱之罷工，所有成年工人均應團結一致，竭力奮鬥，不得稍懈。

丁、各種行業分立門戶之階級制度，至今猶存，其小商家及小藝業之學徒，亦仍受各種不利益之待遇有加無已。此類學徒即將來之工人，關係實非淺鮮，故近來工人中亦有提倡學徒運動者，如學徒聯合會是也。團關於此項問題，原以協助黨在各行藝業工人中進行其工作為主要之任務。至使各種工藝界為各項工會之創設，團尤所必須盡力者也。

若無工會之創設，而有學徒聯合會之組織，則團應力求能為該會一切之指導，為該會創設工會之初步。若工會之組織內有工人、學徒、匠人之副手、專門匠人及各行業主等，則其間必須設立學徒部份，以便造就設立各項工會奮鬥之武器。團關於提供此項運動，於着手進行，及製定學徒各項要求事件時，尤應注意此項運動之特點，及分立行業應有之流弊。

招引學徒中勤勞份子入團，及使該學徒等受相當之訓練等事，亦宜格外注意。

肆 農人青年中之進行事務

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近來對於農人青年中之進行事件注意極為薄弱。本全會主張贊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所言：共產黨鄉村進行之問題及農民之勢力各節。取得農民革命運動之指導一事，乃中國共產黨一種主要之任務。團自應盡力格外維持並補助黨在農民中進行一切事實。所有聯絡青年農人（在鄉村或軍隊中）組織團體，及為革命之訓練等事，應為該會將來進行事件中極重要之政治任務。

乙、必須將青年農人中現已發達之政治運動納入革命之途徑，使其為農民協會所提出之要求而奮鬥。所有中國各鄉村之虐待苛政，務使一律免除。團應補助黨，使所有農民一致聯絡成為農民協會，並使其對於地主、帝國主義及軍閥為革命之奮鬥。團在農民協會內青

年部中之工作，尤為非常主要，因利用此項青年，團可以招致大多數之青年農人一致出為青年農人運動也。對於苦工青年，無地產之青年及租佃土地之青年，尤宜特別注意，必須竭力招引其入團，庶於進行尤為便利。

伍 團務工作問題

甲、青年團之發達頗著成效，但本全會以為將來之發達應較前更為迅速。對於新有之任務及全局之計劃，團員應大加擴充，招引革命工人入團亦應格外迅速為之。

團之發達應以無產階級青年為主體。去歲工人幹部之擴充，即為團極大之功效。嗣後仍應本此增加無產階級青年及推廣工人幹部之宗旨，繼續進行。但團之發展中，所有半無產階級之學生革命份子，尤以農人青年為最，亦不可不極力聯絡，多多益善也。

乙、據該團現有之一部份工人觀之，足以證明該團之缺點不可勝計。對於青年工人革命思想之退步所有解釋，殊多不合，其根本上之原因，蓋以該團工人幹部在經濟上之要求，職工之聯合及訓練之進行等事，皆未盡量發揮，故無完滿之結果。是以該團所有無產階級，均宜使其勇往直前，奮勉勤務，凡該團應為之指導事件，毅然決然均使無產階級工人自行充任，庶團務之發達當可較為敏捷。

丙、此外，團最重要之任務即為鞏固及發達該團各支部之事業，並推廣支部之設立。支部亦應為其各項羣衆運動之集中地點。如關於政治、經濟及訓練等事，若各支部均皆經營、生氣勃勃，則該團之事業自不難日形鞏固，日益發達也。

丁、青年團在可以公開行運地方，應放任農、工平民自行主張，此種辦法實為正當之行為。凡在廣州（國民）政府區域內，該團各機關之管理人員（各支部負責人員）均應改為選舉方法，由公眾推定。各機關對該團之各項報告事件，亦宜準此行之。

上海支部為團之最大組織，自亦宜在其組織內推廣農、工、平民之主權。雖處於秘密狀態之中，但可以選舉者，仍宜實行選舉，並應召集各區大會實行選舉，以重農、工平民之主權。

戊、青年團現均已將會務公開推行，其在廣州政府勢力範圍之內之團部，自應以組織多數公開團體為任務，該團範圍較大之公開事業，亦應盡量辦理。

團有時必須遮掩其本來面目，而暗中行其指導者，如學潮運動是也。但每遇與反對團體，公開為主義之奮鬥及宣傳該團之宗旨與口號時，不得因反對方面之阻力即中止。對於反對方面之理論及趨勢，尤不能熟視無睹不與之抗衡也。

陸 團之政治訓練事務

該團於政治訓練殊極薄弱，實爲造成布爾什維克之極大障礙。該團團員既已增多，頗形發達，此節實爲該團極要之任務。對於團員應爲政治原則上有系統之訓練，使大多數團員均爲政治訓練之組織。於平民集中地方，尤宜設法組織之。戴季陶主義爲資產階級之主義，係連合各界共同保護資產階級之利益者也，現在頗見發達。對於此項資產階級之主義，團自應養成有力之政治團體，與之奮鬥，此亦團之重要任務。對於中國青年雜誌，該團亦應提高其政治理論之研究，並用以說明青年運動等。

柒 團對於學生運動工作及其任務

甲、自工人加入國民運動後，學生即非中國革命之主力發動者，但主張革命之學界，將來必仍爲革命運動者知識階級之主力，故團在黨指揮下，仍應在學界中保存其領導關係。

乙、所有「一致進行」及「統一學界運動」等口號，仍應爲組織此項團體極要之口號，團即以此口號領導學界。但團不能以革命運動現在繼續發展，便認學生聯合會舊式「一致進攻」之範圍爲滿足，必須推廣宣傳之規模，發揮與帝國主義之奮鬥，藉以維持農工對於經濟、政治之各種鬥爭，一面並應在國民解放運動中，對於資產階級之主張作相當之攻擊，務使工人爲學界之先導。

丙、團對於右派在學界之各種行爲（如廣東內醒獅派及孫文主義學會等），務宜絕端爲主義之奮鬥。所有一致進攻之方法，若爲保存統一學界運動起見，僅限於遇有具體事件時，方可實行，且宜對於該團體中多數人之行爲一致之攻擊，勿論如何不得爲一部份之攻擊。吾人對於此種團體在學界中所爲之一致進攻，應視爲各級於共同政治中一致之動作，而決非一黨一派與之競爭也。遇有具體事件，吾人不能避免與反對之一派聯合時，則團可對於國民黨左派接近之團體作相當之讓步，因其口號及所要求事項與吾人較爲接近也。

但此項讓步，勿論如何，不得減輕吾人與該團等主義上之奮鬥及在學界運動中事實上之指導。

捌 青年國民黨及職業組織

本全會以爲目下另行組織青年國民黨，非爲善策。

所有青年均可直接參與國民黨內各種事件（個人或團體），鞏固左派之勢力，藉以伸張其在國民黨及國民革命運動中之權能。對於右派及中派欲於國民黨外另行設立平行之政治團體，藉以聯絡所有青年一節，應竭力起而反對，毅然決然與之奮鬥。以同種職業結合之形式而組織團體（如學生聯合會所組織之各種團體，青年農人所組織之團體等），與之對抗，殊覺妥善。同時並可共同與帝國主義奮鬥，以便各該團體互相聯合，進行一切。但不宜設置常存機關，成爲青年正式一致進攻之最高團體。因體諸以往事件，若設置最高一致進攻之團體，往往羣起競爭其領導權，而對於青年羣衆團體之事件及青年團之取得指導之競爭轉多漠視，殊爲不合。

玖 團對於基督教青年會及反基督教運動之任務

甲、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因對於中國民衆宣傳美帝國主義爲職志，其對於學界宣傳尤甚，該團應公開反對。

團應聯絡青年，使對於基督教會員表示同情，其往來該會俱樂部、學校運動場之青年工人，尤應格外設法招致，並須認定此等事件爲團一種重要任務。勿論如何，不宜將此等招致之可能及必要，視爲虛假，僅奉行故事，即爲已足。

乙、團應盡力提倡革命主義，使基督教青年會之青年均起而反對帝國主義，對反對帝國主義之青年及攻擊基督教青年會之團體，團應竭力設法助其進行；並將其大多數之青年勞工漸次招致入團，使其脫離基督教青年會之關係。遇基督教青年會中有反對該會運動時，團應力行設法爲事實上之指導。

丙、團爲實行上項任務起見，應在基督教青年會會員中，設法組織國民黨左派分部，及其他研究政治之各項團體。

丁、所有上項計劃，必須使反宗教運動成爲反帝國主義運動之時方可實行。

拾 體育運動團體之組織

青年團在青年工人中，大可發展體育運動，此體育運動，可秘密訓練成爲工人自衛之隊伍，於政治上亦有莫大關係。

團可利用羣衆團體之輔助，如工會、專科以上學生聯合會，中小學生聯合會等，設立體育運動團體，使其成爲推廣團之勢力及於中

國青年羣衆之一種關係。

本全會以爲：團今日之任務宜多設羣衆體育運動之團體。

拾壹 團在兒童運動中之任務

中國無產階級兒童運動，即以在各種營業中作工之兒童爲根本，再則傭僕、匠人、農民之子女，亦必須引入兒童運動之內。本全會認爲，中國青年團決計創設無產階級兒童獨立運動一事，實屬正當辦法（著者按：北伐至武漢時，各地推行「兒童團」，後又推動「勞動兒童團」甚力，此似爲「少年先鋒隊」之前身）。團對於國民黨內童子軍指導及組織，應設法參與其事。目下殊無提出各種運動連合問題之必要。若必欲連合行動，亦惟共同政治上之行爲，及遊行示威等事，或有連合行動必要。倘須創立國民黨式兒童聯合團體時，則無產階級兒童仍應保留其全部獨立。此項運動，應該訓練兒童對於無產階級問題之意義爲本，並隨時參加青年工人在經濟上之奮鬥，使其明瞭全部真相。全體兒童運動均應以「與工農共同革命」及「反對帝主義」爲其政治上之口號。

叁 團的四次大會

緊接中共五次大會之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於民國十六年五月十日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漢口。其有關文件未見，謹從剪報上略知其梗概，特錄於下。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四次代表大會誌盛

（本件係民國十六年武漢方面剪報，報名不詳，原件存國民黨黨史會）

五月十日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開幕典禮之日，除該團代表北方、東北、西北、豫、陝、魯、浙、兩粵、川、湘、贛、鄂各區代表及海外東京支部、旅歐支部等代表，共計出席者二百餘人，尚有參加該團大會開幕典禮之第三國際代表、少年共產國際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國民黨代表、俄、英、法、美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國民政府代表、全國總工會、勞動童子團總部及區聯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山大學，以及其他各工會、學聯、童子團、各級黨部等革命團體來賓，統計不下三千餘人。革命空氣

之緊張與濃厚、空前未有。茲分誌大會之詳細情形經過於下：

(一)會場之佈置，代表大會會場係第一小學禮堂舉行。會場內外均由武漢各區隊之童子團分布內外，維持秩序。會場內中央懸馬克思、列寧、孫中山、李卜克內西諸革命先烈遺像！並懸有革命標語：「我們的旗幟——列寧，我們的武器——列寧主義，我們的任務——世界革命」，及其他各式標語不下四十餘種。此外各工會、各學校、童子團、(國民黨)中央黨部青年部，以及其他青年革命團體所贈之革命標語、旗幟、匾額、對聯，不下三百餘幅，佈置會場週圍，備極莊嚴燦爛。

(二)閉會情形：宣佈閉會後，即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南區代表團提出推舉任弼時、蕭子璋、賀昌、徐偉、楊善南、歐夏民、關向應、吳振鵬、田波揚等九人爲主席團，經衆鼓掌通過。次即由總主席任弼時致閉會詞，略言：「同志們！本會代表大會，在目前革命勢力最緊張的時候舉行，我們的責任至爲重大。簡略言之，可列爲三：(一)集中全國青年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武裝干涉，反對世界未來的戰爭；(二)依據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五次大會的指導，爲打倒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創造非資本主義的革命前途；(三)代表青年工、農及一般被壓迫青年的利益，繼續爲改良青年生活而鬥爭。主席致詞畢，少年國際代表致詞，略謂：第四次全國大會的責任有三：(一)與全世界無產階級攜手，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二)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指導下，集中青年力量，爲世界革命及中國革命奮鬥，(三)擴大青年團的軍隊工作，使大多數兒童團集中在革命旗幟之下。再次，由英國共產黨代表演說，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青年部代表胡耐安、省黨部青年部代表鄧初民，省政府代表李漢俊，全國總工會代表、全國學生代表鄧鼎勛，全省農協代表張學武、全省婦協代表莊有毅、全省總工會代表梅宗林等先後演說。遲至下午三時半，共產黨代表恽代英、蔡和森始趕到，當即向大會致詞。首由恽代英演說，略謂：本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非常嚴重局勢之下，舉行代表大會，意義至爲重大。本共產黨本屆大會中，對政治問題之重要精神即在創造非資本主義的革命前途，建設民主獨裁的政權。同時，青年團代表大會的政治責任，自然亦在黨指導之下，爲此種革命政策而戰鬥，消滅一切反革命勢力。次蔡和森致詞，略謂：黨的第五次全國大會的精神，即在指出目前的革命潮流，並非低落。全國工人、農民須在目前加緊鬥爭，爲創造本黨的前途而奮鬥，希望大會的團員同志，一致向此目標奮鬥。再次由武漢童子團代表致詞，及總主席致答詞，最後通過閉幕長官(?)及致少年共產國際通電，唱「國際歌」及「少年先鋒歌」，並高呼各種口號，表演新劇、跳舞、各種遊藝，遲至六時始盡歡而散。

此次大會，照以上記載，似僅一天結束，而無宣言及決議案等件。其時在四月十二日南京清黨之後，及五月二十一

日「馬日事變」之前，武漢正呈一片恐慌現象，且中共五次大會已混亂不堪，則團的四大，不過奉行故事，草草收場，即有宣言及決議，亦將無新的內容，殆可想而知。

第四節 工人運動

民國十六年春季工人運動，以在北伐軍所及之地而論，上海最爲突出。上海工運之重要事件爲二月之罷工及三月之暴動，後者實爲中共份子所鼓動。四月十二日南京清黨，上海工人糾查隊武裝首被繳械，沿海各省，如江蘇、廣東、浙江、福建及安徽之工會，凡爲中共所把持者，均經取締改組，俱詳第七章第二節。

此期中共勢力所及之地爲湖北、湖南及江西三省，其工人運動之中心實在武漢。本節所述即武漢工運情況。

北伐軍於十五年八月定湖南，向被抑制之工人運動即告復活。中共份子夏曦、郭亮等，獲得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之協助，排斥純正工人組織或國民黨力量，成爲共黨獨佔之局。

壹 武漢工會概況（註一）

湖北工運，自民國十二年京漢路「二七」慘案後，即不能公開活動，所有工會，除若干穩健及接近官廳者外，均遭封閉。北伐軍於十五年九月六日收復漢口，舊有之太古碼頭工會、人力車夫工會、漢冶萍工會、輪駁工會及煙廠工會等，立即恢復，從事活動。而新組之漢口火柴工會、黃包車夫工會（與人力車夫工會成雙包案）、五金工人會、郵務工會及洋務工會等，亦加緊籌備，刻期組成。

此等工會，亦在總政治部協助之下，多數爲中共份子所把持。

九月十四日，漢口克復後僅一週，即有「工人代表會」，假漢口特別市黨部舉行「工界懇親會」。黨、政、軍各機關，如總政治部、總司令部、前敵總指揮部，均派有代表出席。工人代表四百餘人，號稱代表一百餘工人團體，即席議決三項：（一）懲辦「工賊」，（二）催促各工廠從速開工，（三）武漢工人代表會改組爲武漢總工會。內第一、第二兩項由總政治

部負責辦理，第三項由工會負責進行。

再過一週，九月二十日，武漢工人代表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屆時總政治部代表宣佈國民政府贊助工運，希望工人努力組織，爲工人謀福利等語。同時工人代表會贊成：(一)促成反英運動與國民會議，(二)鼓勵工會與黨、政聯絡，及(三)倡導經濟鬥爭。

至此，由中共迅速造成之武漢總工會，自然落入中共之手。

至十月十日，「湖北全省總工會」宣告成立，即將工人運動由武漢而擴充至湖北全省。是日爲國慶節，亦即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昌省城之日。茲錄其宣言如下。

湖北省總工會成立宣言

湖北工人運動，始於五年以前，隨滬、粵及海員鐵路工人之組織同時發展，爲期不過一年，各業工會蓬勃而起。至民國十一年十月，計全省工會約近三十，加入組織之工人在三萬以上。而且工人從事經濟的及政治的鬥爭，繼續不絕，大都獲得相當的勝利。此種運動之發展，足爲中國民族革命之先鋒與主要力量。因此，直接與壓迫中國人民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吳佩孚衝突，結果演成「二七」屠殺，死傷將近百人，各工會均被封禁，工人橫遭逮捕，及開除流離失業者甚夥。三年半以來，雖遭長期的厲害的壓迫，加以走狗工賊之破壞搗亂，而我工會仍在秘密進行中，艱難奮鬥，不稍畏屈。現北伐軍長驅抵鄂，吾人已獲得相當之自由，工會公開，恢復及新起組織工會者更形踴躍；截至月前，全省已有組織，同時加入本會之工會，在八十以上，人數約十餘萬，其突飛猛進之發展，使人驚異。基於過去的歷史及目前之需要，本總會應運而生，實非偶然。茲值革命紀念的雙十節，正本會前身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在四年前成立之日，本會恰於此時承繼其傳統而宣告正式成立。在此有歷史意義的盛大的集會之中，本會應有嚴重申述者：查兩年來工人奮鬥之歷史，證明工人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居於主要地位，並非吾人之誇語。然民族革命之偉業，非單靠工人階級之力所能成，必須與農、商、學各界通力合作，尤其是與農民之同盟聯合，非常重要，此後吾人更加強其力量，担当革命重任，同時決與農、商、學各界，結成鞏固的革命聯合戰線，以打倒吾人之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及軍閥。尤有進者，吾人贊助國民政府及革命軍之意義，是在其能保障人民之利益與自由。假如政府與軍隊不保障人民之利益與自由，則吾人殊無贊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與利益之保障，誰能爲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

贊助，初不問其旗幟與名義若何，吾今贊助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者，即本此旨。最後當爲我工人階級告者，本會成立，集中我湖北十餘萬工人之組織與力量，此後當更加奮勉，以擁護我湖北工人羣衆切身之利益與必要之自由。同時努力參加革命的政治鬥爭，造成革命的武漢，擁護革命的中心。我十餘萬有組織之工人階級，具五年來奮鬥的光榮歷史，負國民革命之偉大使命，本會當領率所屬各工會之工人羣衆，竭忠盡力，以實踐其職位，望我全體工人發揮其志氣，團結其精神，齊心努力以赴之。謹此宣言。

此項宣言強調對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之態度，謂：「假如政府與軍隊不保證人民之利益與自由，則吾人殊無贊助之道」，此絕非無的放矢，顯係反蔣之醞釀。至所謂「努力參加革命的政治鬥爭，造成革命的武漢，擁護革命的中心」，則又顯示爾後鮑羅庭堅持遷都武漢及以中共爲中心把持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聯席會議」，並從事反蔣之預謀。

民國十六年一月一日，中共份子在武漢召開「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大會」。至三日，即發生漢案，收回英租界。在本案中，有工人糾察隊進入租界，遂成爲此次大會最好宣傳資料。大會宣言如下：

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大會宣言

湖北全省總工會成立之經過與目的，以及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之職位，已詳去年十月日本會成立大會宣言。今代表三十萬工人之湖北全省總工會，又於本年一月一日，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適於此時，發生英兵任意槍殺同胞之「一·三」慘案，全體工人因而震憤；幸賴我全體民衆忠勇奮鬥之結果，自動收回英租界之壯舉，即於一月五日實現。同胞之被慘殺，與英租界之自動收回，竟同時發生，使我全省工人代表大會，亦遂增加無窮之意義。中國工人階級自有其鬥爭之歷史以來，如民國十一年之海員罷工，十二年之「二七」事變，以至十四年「五卅」運動、粵港罷工、廣東工人之參加統一廣東戰爭、北方工人之參加反奉戰爭，及此次工人之參加北伐戰爭等，或係予帝國主義以重六之打擊，或係與軍閥及反動勢力一拚生死。總之，工人階級之奮鬥，無一不是直接間接爲民衆爭自由和爲民族爭獨立。此次武漢工人奮勇參加自動收回租界之運動，更足證明工人階級勢力之壯大，與民族解放運動有極大之關係。自總工會成立以來，罷工運動澎湃一時，曾因罷工之故，頗引起少數廠主、店東之不安，更予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派以挑撥離間之機會。其實罷工之目的，均係工人要求減輕不可忍耐之痛苦，少數廠主、店東之不安，則由於輕視工人之固有觀念所致；而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派之挑撥陰謀，

欲引起社會對於工人運動之厭惡，其目的不祇破壞工人運動，尤在於分離革命勢力，使工人無由置身國民革命，而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所幸事實之真相日見顯露，罷工之發生，不但不是出於工人領袖之故意鼓動而成，更無人能強迫其停止罷工。因工人之要求，實關係工人之生存而迫不及待者。工人奮起自相組織，即有所要求，因有相同之要求，而更促進其組織。因此爲時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組織者，遂由十萬增至三十萬，更能進於自動收回租界，如是工人爲民族爭獨立之功績，遂亦大白於天下。我全國工人階級開始組織之初，即係爲同一目的而奮鬥，最近且在統一組織之下，担负工人階級的責任。據去年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之統計，全國工人之有組織者，不下一百二十萬，今則更有增加矣。從歷史上看來，工人運動的發展，沒有不是加厚革命勢力，鞏固革命勢力的。工人階級自知爲最革命之重要成分，因而難免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反動勢力之嫉視，企圖由打擊工人運動，而打擊整個革命運動。因此我們工人階級敢正告國人曰：凡打擊工人運動者，不但妨礙革命勢力之發展，且不當爲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反動勢力服務。湖北工人階級自「二七」起，即已有其奮鬥之光榮歷史；最近之迅速進行，更使工人階級對於整個革命之責任日見重要，工人階級自身亦更明瞭其責任與地位，工人階級深知，在目前對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動勢力的緊迫鬥爭中，客觀上自身痛苦之減輕，祇能達到最低限度，而工人階級欲達較多之解放，亦必須工人階級組織日見鞏固，而組織之鞏固，又須獲得充分之自由，自由尤須有保障，故須先打倒摧殘自由之敵人，而摧殘自由之敵人，即爲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亦即是全體民衆之公敵。在此打倒全體民衆公敵之奮鬥中，工人階級準備與農民、中小商人、革命軍人、知識份子等共同進行，因奮鬥而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湖北工人階級，爲全國工人階級之一部份，同隸於中華全國總工會之下；中國工人階級又爲全世界革命工人之一部份，同隸於赤色職工國際之下。湖北工人奮鬥之正當道路，祇有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指揮之下，一面與全世界革命工人站在一條戰線上，一面與全國各階級革命勢力共同奮鬥，方能達到達從根本上打倒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而獲得較多之自由與利益。至於各階級革命民衆，凡有關於民族解放、民權擴充、民衆經濟生活改善之運動，或湖北工人均認爲與自身利益有關，必挺身參與，決不落後，謹此宣言。望全國工人階級與革命民衆共鑒是幸。

此項宣言所透露「罷工運動澎湃一時……引起廠主、店東之不安」，其實際情況，甚爲嚴重。

自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武漢總工會成立之後，將武漢三鎮劃爲十個產業總工會，均冠以「武漢」二字。其組織系統及糾察隊如下：

(一)工會——各業總工會下爲分會，再下爲分部、支部。每一工廠、工場或商店，工人在十人以上者，設一支部，十

人以下者湊若干家爲一支部，每支部推委員長一人。支部過大者，其下得設組，亦以十人爲準。

(二)糾察隊——會員，不論工人或店員，凡在十六歲至三十五歲者，均編爲糾察隊。以十人爲小隊，遞上而受中隊、大隊、總隊之指揮。隊員着藍制服，由各支部自製，受軍訓，儼然爲赤色工會之武力。

截至十六年五月一日止，武漢及（附近）各縣工會組織，共有產業工會五九，分部三八，支部一、七九七，會員二〇四、七七二。職業工會六五，分部五五，支部五九三，會員一三一、八九三人。各縣市工會六二，會員一七六、七一二。總共有組織之工人號稱五十萬（五一二，七七七）人。

截至十五年十月十日湖北全省總工會成立時，武漢糾察隊已達三千人。

糾察隊執行鬥爭資方、打擊「土賊」之任務，抓人綁人，遊街示衆，氣餒高張，路人側目。

武漢在軍閥統治之下時，物價尙稱安定。北伐軍達到後，物價上漲，工資落後，於是中共份子起而鼓動罷工。罷工運動，風靡一時，至有「無工不組會，無會不罷工」之諺。由於工人本身有糾察隊之武力，而黨政軍又從而支持之，是以罷工事件，工人往往獲得勝利。但工資增加超過資方負擔能力，則停閉自所難免，而勞資雙方兩蒙其害。

爲應付工人及店員罷工，漢口總商會於十五年十二月三日召開商人大會，議決三案：

(一)工人因生活費之增高而要求加資，實出於理所當然；但提出不正當要求而罷工者，則不能予以贊成。且加資問題，勞資可以直接交涉，無受第三者干涉必要。

(二)最近糾察隊橫暴已達極點，宜從嚴禁止。

(三)湖北省政務委員會對此二事究有何辦法？若於十二月六日以前尙無善後辦法，商界得罷市以自衛。

商人此一強硬表示，迫使中共讓步，而由武漢國民政府轉知湖北黨政當局，召集各有關機關、商會、工會會商決定：組織「湖北勞資問題委員會」。凡勞資糾紛，應由雙方自行解決，不能解決時，由委員會仲裁之。此項決定竟於商會限期內完成，而免於罷市事件發生。

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之橫暴雖受一時約束，但至十六年春夏，繼續發展，卒至工商凋敝，工人失業，造成嚴重恐慌。

下列一段記載，可以窺見其若干真象：

武漢工人的慘狀

（原題「武漢農工的慘狀」之工人部份，悲天撰，載民國十六年六月五日上海「革命」第六期——國民黨黨史會藏。）

自去年九月工人糾察隊成立以來，所有武漢三鎮的扒手、地痞、流氓、大排隊、小排隊、水排隊、一切無業之遊民，都一躍而為糾察老爺，生殺予奪，任意自由。有恒產的，當然列在資本家之數，必要打倒；有恒業的，也要放下他的職業，加入工會，隨着今日開會，明日遊行。這五千糾察隊，如虎如狼，終日在市上打人殺人，平均計算，死於糾察隊大刀利斧之下的，日以百計，最近又成立三千童子軍，專做殺人生活。他們說，這流氓、地痞、盜賊、遊民為糾察隊，付予殺生子奪之權，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打倒資本家。實在說起來，真正資本家，早已捲逃了。他們所打倒的，乃是一班平民。弄到現在，工廠倒閉，商店停業，演成一種游民世界。真正工人，失業日增。有了工會，既要工人出會費，又要工人去遊行。工會日多，工作時間日少，實在受害的，還是工人本身。現在武漢各種工人，除兵工廠及鐵路工人尚有工作外，其餘各廠工人，大半失業，統計失業工人，約在十萬人以上了。他們個個叫苦連天！前幾個月尚有動輒罷工事件，這二三月間，簡直無工可做，也就無工可罷了。這是現在武漢工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慘狀。

其時陳公博在武漢任財政委員會主席，其「寒風集」甲二四八頁至二四九頁亦有如下記載：

「當時共產黨確是自無政府，武漢方面的總工會勢力非常之大，擁有類於軍隊的糾察隊，有槍械，更可以拿人，可以辦人，而且他們為要吸收羣衆，最大的武器是煽動罷工。初下武漢時，一個月中，各工會的罷工竟達三十餘次。武漢真是人民惶惶，鷄犬不寧。」

貳 一件審判工賊案

武漢之工人運動，其鬥爭之對象，不外三方面：第一、反帝國主義，尤其是反英，其突出表現為收回漢口租界；第二、反資本家，如上節所述；第三、反所謂「工賊」，則排斥工運中之異己份子，實即忠於三民主義之國民黨黨員。至

於反蔣，則係中共之整個政治任务，此不備述。

關於反「工賊」方面，偶於國民黨黨史會少數剪報中獲得一典型案件，由湖北總工會向忠發等審判國民黨工運領袖郭聘伯（一名聘帛）等八人，僅經一審，即予槍殺。原件如下：

一件「人民審判」案

湖北全省總工會，先後捕獲之工賊郭聘伯等八名。十三日午後一時，經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在漢口法院開審，其詳情如下：

(一)審判員：國民政府代表、中央黨部代表、省政府代表、全國總工會代表、省農協代表、省黨部代表、婦女協會代表、全國學生總會代表、全省學生會代表、全省總工會代表（向忠發）、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丁覺羣、宛希儼）

(二)主席委員：郝繩祖。

(三)書記官：李善政、魯昌忻。

(四)記錄：黃琴父、成桂周。

(五)受審人：郭聘伯、袁子英、張燦、徐瑞和、盧士英、劉伯助、劉秋生、張國春等。

(六)秩序：一、各委員就職，二、書記官就職，三、論告代表就職，四、恭讀遺囑，五、提被告人，六、旁聽人就位，七、書記官宣佈開始審訊。

(七)各犯供詞及代表質訊：

(1)郭聘伯 供年卅九歲，宜昌人，家有妻一子一，曾辦真報，以宣傳勞工運動為宗旨。前曾入過國民黨，在滿清時，初則入高小讀書，後轉入鐵路學校，畢業後，組織學生軍。後退伍充京漢路工人，因此感覺工人力量之大，故辦真報從事鼓吹。向忠發質問：(一)辦真報款項何來，是否親赴四川借軍閥聲勢，劫人烟土來的？辦真報是否為擁護自己利益，而利用工人力量，抑為工人謀利益，而犧牲自己利益？(二)住上海借二七慘案名義，號召慈善家捐款援助，烈士家屬會否得着分文？(三)破壞南洋煙草公司罷工，得南洋公司洋五萬。(四)去年總理紀念，你收買袁告臣等，設立機關，拆散車夫工會。三月十二過江，你又收買流氓，喊警抓人，說是共產黨。(五)工會代表會為了你不能公開，你向軍閥告密，使許伯白吳、劉伯垂被捕。你們並組織偽工會於江岸二十三號。丁覺羣質訊：(一)你在上海說，你組織右派

攻打共產黨，(一)聯席會議議決案，並未派你籌備市黨部，係派許伯吳、劉伯垂等籌備。供：當民五時曾做過兩田稅局長，在此所有的款，盡充一排報之費。我是很同情革命的，並且是提倡工人運動的，吳逆(佩孚)是軍閥，人民恨之刺骨，我焉有與之勾結之理。民黨改組時回漢口法租界，請項英、許白吳到家談話，他與伯垂被捕，在周天元後，如我告密，我怎與他們談話。那時我被法租界說我亦化，不能出租界一步，許、劉被捕後，尚與談話。如係我告密，何以請他們到我家。問：你不必強辯，你在本黨(指國民黨——著者)改組時破壞本黨，陷害同志，此罪一；總理週年紀念時，你率保衛團到會場捕人，此罪二；「二七」慘案時以募捐援助工人為名，到上海捐款，塞之腰包，此罪三；辦真報是接收軍閥的款子，此罪四；民國十三年七月在上海率領流氓搗中央黨部，邵力子同志曾被打傷，此罪五；偵探工人秘密機關到軍閥處去告發，此罪六；破壞南洋煙草公司工友罷工，此罪七。你是黨員，依黨的紀律說來，你是叛黨；依革命的觀點說來，你是反革命。

(2)張耀 供三十六歲，夏口人，先在軍隊，後由四川回漢口，做洋傘骨生意。後組織工團聯合會，在工會辦農工技術研究所，款由會出。工聯會係代表制，我亦代表一份子。煙廠罷工，來聯會請願援助，我與楊德甫，担任交涉；要求廠方賠償損失，卒失敗。以後我就因病辭職。向忠發質訊：工聯會你是副主席，你祇謀自己利益，不顧罷工工友，假冒名義，亂刻圖章，在武勝關身帶盒子炮，打殺工友是誰？供：報上說：楊德甫「二七」以前，便不在工聯會了。我並(未)當過密探。十三年十月時，組織與(?)公記渡輪公司。許伯吳、劉伯垂被捕，我已知道，我實在沒有主張這個。我未曾當過吳佩孚的密探。宛希儼質訊：你登過報，說什麼「我幫吳佩孚做了許多事情，現在解散了……」問：從前煙廠工人罷工，你勾結廠主出來破壞，廠主曾贈你金牌，以表你忠於廠主之功績。後充吳佩孚之旅長，在武勝關屠殺工人。當時施洋同志被害，即你所告密，所以你做吳佩孚之旅長，為軍閥做走狗，破壞工人罷工，屠殺工人，皆你的罪狀。

(3)張國春 供三十五歲，天津人，家有小孩六人，父母俱全，在粵漢路充當司機工人，在長沙時，組織俱樂部，後改工聯會。問：吳佩孚退長沙時，你會將火車頭六架機關拆毀，藏之鐵路局長家之地板下，以防礙黨軍之進迫。「二七」時曾組織工廠陷害工人，這些都是你的罪狀。

(4)劉伯勛 供四十七歲，湘陰人，家有一妻一女。在夏口當團長，曾往南京，後返湖北。民四後作小生意，從未入過黨。惟光緒時曾入同盟會。民七組工會，以我稱職字，舉我維持會務。後在蕭耀南處當差遣，因不發薪，即辭職。施、林之死，當時我不知道，至四月才知道。我未入黨，不知黨紀。問：你被蕭耀南僱為秘探和差遣，在軍閥處告密，陷害施洋、林祥謙等同志，這是人人知道的。你的

罪狀，就是附逆，破壞工會，陷害同志。

(5) 袁子英 供三十歲，光化縣人，在東京入過共產黨。民十一年五月來漢口，在吳、垂被捕時，尚未入共產黨，後來做「證明陳獨秀答戴季陶的一封信的狡辯」一書，這個錯誤，我自己承認，但我不想推翻本黨。問：在國民黨改組時，你與郭聘伯一同勾結軍閥，并做「證明陳獨秀答戴季陶的一封信的狡辯」一書，以共產黨員而著此書，又入孫文學會，在黨紀上為叛黨，在行動上為反革命。

(6) 徐瑞和 供五十七歲，寧波人，在洋船上做工三十餘年，未入何黨。在海員工會參入五卅罷工。不認識李敬五。在五卅當總指揮，不知道自衛團。問：你在五卅運動時，勾結奉天軍閥，破壞工人。上海總商會救濟罷工費六千元，吞沒淨盡。上海總工會開代表大會時，你充自衛團長，向警廳告密，拘捕代表十一人，得運動費千餘元。來漢又誘海員工會委員朱寶廷，欲置之死地，這些都是反革命的罪狀。

(7) 劉秋生 供三十歲，衡山人。妻跟人，子打死。前在紡織廠入過黨，在水口山作過工，未當過工會代表。水口山工會成立已久，湘趙（恒惕）在時，被資步程解散，那時在場，我先出來，冬生姪後出來，我並沒有陷害他。問：你充礦工會代表，屢與趙恒惕勾結，陷害工人領袖，破壞工會，將姪劉冬生（水口工會委員長）陷入獄中，劉少奇由滬回湘，你報告趙恒惕逮捕，幾被槍決。這些罪狀都是人人知道的。

(8) 盧士英 供三十一歲，漢陽人。家有父、妻、孩三人。曾作粵漢鐵路機器工人，當鐵路局稽查。在湖南入國民黨，辦工人學校。問：你的思想行動，都已走至反革命路上去了。你會充吳佩孚之偵探，吞沒工會公款，又登廣告聲明脫離工會，總理逝世紀念會上，多方陷害，散發傳單及演說者，都是反革命罪的真憑實據。

(9) 判決：以上八工賊一一審問判決，處以死刑，原定在十五日召集羣衆大會，後決定於十四日晨四時，執行鎗決。

(10) 罪狀：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於鎗決該工賊等，宣布罪狀如下：

為宣布罪狀事。反革命工賊郭聘伯、張麟、袁子英、劉伯勛、徐瑞和、劉秋生、張國春（未見審訊——著者）、盧士英等八名，經湖北全省總工會先後拿獲，提交本會審判。本會於四月十三日，在漢口市法院公開審理，訊據郭聘伯等八名，供認違反革命，破壞工會，背叛黨紀，謀殺革命領袖等情不諱，依照反革命罪條例，應處死刑。除判決全文另行公布，並提該反革命工賊郭聘伯等八名，驗明正身，綁赴濟生三馬路大會場執行鎗決，以昭炯戒外，為此宣布罪狀，仰各色人等一體知悉。此布！

計開：（名單八人同上，略。）

湖北省黨部

漢口特別市黨部

湖北省政府

中華全國總工會

湖北省農民協會

湖北省總工會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四日。

(卅)省工會通告：湖北全省總工會特爲此事發出通告云：

爲通告事：關於懲辦工賊事。頃據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函知，案經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湖北省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等組織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於四月十三日在漢口市法院開庭公開審訊，當經訊明罪證，依政府頒佈懲辦反革命條例，判決工賊郭聘伯、張羆、劉伯勛、袁子英、劉秋生、徐瑞和、張國春、盧士英等八名，處鎗決死刑，交武漢衛戍司令部執行，已於四月十四日早四時，由漢口市法院提出，驗明正身，綁赴濟生三馬路大會場，立予鎗決等情。查本案曾經本會代表大會議決，要求政府速即懲辦，並定於四月十五日向羣衆大會處決等情，現此案既經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審判處決，本會前代表大會定四月十五日舉行羣衆處決工賊之要求，作爲罷論。特此通告各工會，務望轉達全體工友知照。執行委員長向忠發。

此八人之身世，現已無從一一申述，其中郭聘伯、袁子英及盧士英三人，據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所載（註二），則均爲國民黨員之工人領袖，徒以反共，遂遭殺害。

郭聘伯，湖北宜昌人，畢業於湖北鐵路學堂，民國二年贛寧討袁之役，郭氏在鄂謀嚮應，事洩，被黎元洪捕押武昌督署軍法處五閱月，備受榜掠，身無完膚。出獄後往來川、湘間，積極進行倒袁工作。民十回漢，創辦真報，提倡新潮，喚起農工運動。平漢路「二七」慘案，真報被封，郭氏被吳佩孚、蕭耀南懸賞通緝，逃滬。是年古應芬、馬超俊奉孫中山先生命由粵至滬，會約聘伯詳商滬、漢間工運策進事項，並面授機宜，故郭氏爲國民黨在長江中下游策動工運之中堅人物。郭氏是年在滬又與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等共黨份子，略有往還，因彼時共黨尙無嚴密組織，亦姑與

之作學理上辯論；後調知該黨假「二七」案向蘇俄騙取巨款，並不給與路工分文，郭氏大憤，表示反對，卒逼令陳獨秀交出三萬餘元，撫卹「二七」死傷工友家族，因此黑幕揭穿，共產黨徒不滿其領袖所爲，宣告脫離黨籍者踵相接，共黨基礎，幾爲此事破裂，是爲郭氏與共黨最初之衝突。迨共黨受第三國際之命令，加入國民黨，郭氏即與馬超俊等劇烈反對。民十三年，郭氏奉國民黨漢口執行部覃振、張知本兩委員特派籌辦漢口特別市黨部，對於跨黨份子，撞擊不遺餘力，故共黨劉芬、譚平山等，百般搗亂，將郭氏所組織在漢之國民黨根基，完全推翻。民十五年，郭氏與袁子英等組辦救國旬刊（其經費係由馬超俊按月籌寄），於攻擊帝國主義暨軍閥之外，並及跨黨份子叛黨賣國之罪，於是共黨謀殺郭氏之心日切。北伐軍既收復漢口，郭氏亟擬發動地方，籌備歡迎事宜，即與袁子英等偕至第八軍政治部有所接洽，詎第八軍政治部爲共黨機關，甫入其門，即被捕，轉解總政治部收押。國民黨到漢同志，聞訊震驚，亟設法營救，卒無效果。

袁子英，湖北光化人，留日政治學生，回國後在漢口平漢路南段鐵路扶輪學校充任教員，與郭聘伯在漢同辦眞報，「二七」之難，有關者均逃往各地，袁氏獨易名，充漢口日租界郵務員，暗中仍繼續工人運動不稍懈。漢口各工會，在軍閥迭次摧殘之下，卒得保留基礎，未全墜壞者，得袁氏維護之力爲多。十三年共黨加入國民黨後，袁氏本三民主義精神，撰「陳獨秀答戴季陶的一封信的狡辯」一書，宣佈共黨種種罪惡，印刷數萬份，散佈社會；本年郭聘伯等創辦救國旬刊，袁氏每期均有極犀利文字攻擊共黨，因此遭共黨之恨。

盧士英，湖北漢陽人，初充粵漢路長沙機務段管理工牌工人，嗣調徐家棚機器廠工作。性好學，工餘讀書，手不釋卷，篤信三民主義，爲國民黨優秀黨員，擅長演講。民國十年，粵漢路組織工會，被推選爲工會重要職員之一。其時共黨邪說，已漸傳入工人羣中，盧氏則根據三民主義，駁斥階級鬥爭的謬論，謂其不適中國國情。粵漢路工在民十二年以前，無加入共產黨籍者，皆由盧氏宣傳的功效，故共黨對盧氏深爲厭惡。十五年九月，北伐軍抵漢，凡組工會者，輒須先赴總政治部受鄧演達之指導，粵漢路工人，亟圖恢復工會組織。當武昌攻城戰尚在進行之際，粵漢路工人即推盧氏及王福階，陸安生等五人，由徐家棚出發，繞道洪山，經相國寺側，冒武昌城上敵軍之掃射而至南湖，謁見鄧演達，接洽

組織工會事宜。盧氏在歸途中即告同行諸人，斷定鄧演達必係共產黨（著者按：鄧非共黨，但親共），同人應加防備。及武昌既下，粵漢路暢通，遂召開全路代表大會於漢口。是日全國總工會派許白昊出席指導，共黨已多滲透入會；王福階等到會時，竟被摒於門外，後經盧氏出為斡旋，始獲入場。代表大會選舉結果，執行委員十一人，盧士英、陸安生等純正工人當選者九人，僅兩人為共黨，其互選結果，則盧士英當選主席，陸安生為副主席，均為衆望所歸。由全國總工會劉少奇先下令調盧士英離漢赴湘，派在湖南省總工會服務，嗣又下令將陸安生原任徐家棚機器廠鑪配領班提升為監工員，調至長沙機務段工作。而派共黨葉雲卿代理粵漢路工會主席一職，而共黨控制粵漢路工會之目的乃達。

盧士英赴湘不久，北伐軍即已克復南昌，時當十一月初旬，盧氏因公由湘返漢，晉謁全國總工會劉少奇，擬請示接收江西南潯鐵路局事宜。劉少奇並不接見，立命糾察隊將盧氏扣留。

郭聘伯、袁子英、盧士英殉難後，被稱為鄂籍三烈士。民國十八年九月，國民黨中央決議，由湖北省政府公葬郭聘伯，而以袁、盧附葬。

叁 太平洋勞動大會（註二）

俄共及中共控制武漢，赤色職工運動之在武漢者，成為共產國際職工運動之一環，乃有民國十六年五月，繼中共五大之後，舉行一汎太平洋勞動大會。

此大會之召集，實決定於民國十五年澳洲雪梨之太平洋勞動大會預備會議。是年二月，澳新南威爾斯工人代表大會開會，決由澳洲工聯會召集太平洋勞動大會，邀請中國、日本、蘇聯、印度、南非、瓜哇、太平洋各島，以及南美、加拿大、美國、英國等之工會赴會，日期為同年七月一日，地點仍在雪梨。其後因路途遙遠，各國政府干涉及準備未週，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蘭、蘇聯、赤色職工國際等少數代表到會，不得已，改為預備會議，決定二項：（一）將大會之期改至十六年五月一日在廣州開會；（二）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及中國勞動大會共同籌備之。至期，國民政府已遷武漢，是以汎太平洋勞動大會亦改於武漢舉行。自五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在漢口德國球場開會七日。各國出席代表：日本

六人，朝鮮一人，法國一人，蘇聯五人，中國十五人，美國二人，英國一人，爪哇二人，號稱代表一千四百五十萬工會工人。澳洲代表爲其政府所阻，墨西哥代表至菲律賓被阻。各代表均爲共黨，受第三國際指揮。中國代表十五人中有蘇兆徵、李立三、劉少奇、劉義等。大會秘書處由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組織，並以少奇爲秘書長。

五月十八日，湖北全省總工會舉行歡迎赤色職工國際委員長羅佐夫斯基蒞漢大會，羅氏致詞稱：

「中國的工人現在都有了階級的覺悟，聯合起來向帝國主義者及軍閥進攻，這是一件極偉大極可喜的事。我們惟有聯合世界的無產階級，站在中國的勞動利益方面，盡力幫助革命；在中國的勞動階級，也應當努力於最短期間打倒一切反革命派。中國革命勢力集中在武漢，武漢的革命基礎是工人和農人，惟有農、工聯合起來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我們應當盡全力來幫助中國工、農爭得利益，以求革命的成功。大家不要以爲中國革命前途常有種種困難，要曉得這種困難都是不成問題的。在各國的無產階級，都有很強大堅固的組織，要打倒他們本國的帝國主義，以幫助中國的革命的成功。最後我們高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及一切反革命派，中國工農階級解放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萬歲。」

在歡迎會作答詞的是劉少奇，作結論的是向忠發，他們的大意是，願受各國革命領袖的經驗和教訓，在世界革命領袖指導之下團結起來，打倒一切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以促進全世界革命的成功。

二十一日起，由各國代表相繼演說，無非促進世界工、農團結及防止太平洋之戰爭。其重要決議案如下：

- 一、抗議北京搜檢俄大使館及倫敦搜檢俄商社案；
- 二、反對英、日、美等帝國主義者醞釀第二次世界大戰；
- 三、聯合世界各工會，對中國時局加以援助，並將帝國主義之勢力逐出中國之外；
- 四、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並祝其早日成功；
- 五、組織超越國境、種族之職工國際，以期統一全世界之勞動運動；
- 六、援助朝鮮、印度等被壓迫民族之獨立；

七、經濟計劃；

八、注意上海及廣東各地之反動派，對彼等慘殺工會領袖及另組新工會事，誓以全力反對；

九、打倒一切妨礙工、農組織之發展，及阻止其社會經濟要求之政治策略；

十、特設秘書廳於上海，由上海總工會代表二人，蘇俄總工會代表二人，日、英、美、法各國工會代表各一人組織之。每六月召集會議一次，發行「太平洋工人」及「太平洋勞動大會公報」為機關報。

以上諸項議決案中，除經濟計劃一項，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之英文「漢口回聲」及一九二八年英文「中國年鑑」，均有詳細紀錄外，其餘各項之內容概未能詳。茲將經濟計劃一項照譯如下：

關於太平洋沿岸各國之勞動運動及勞動狀況，既經赴會各代表報告，大會因有下列五項之判斷：

一、在所有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對於勞工階級均有一種無限制的掠奪現象；工作時間長至十六或十八小時，勞動者，一年之中，永久作奴隸的工作，並無休假；所得工資不足維持最低之生活；又無勞動立法以保護之；在大多數地方，體罰依然通行。

二、至童工、女工所受之掠奪，則更慘無人道。工資較男工尤低；所作工作却與男工無異，但每月工資甚至不及一元。工作時間亦與男工相同，復因彼等生理上的懦弱以及無依無靠的苦況，常受殘毒的責罰打罵。在中國、印度、朝鮮、印度支那及太平洋各島上，此種慘狀，依然存在，一如初期資本主義時之情形。加以國際帝國主義者之種族壓迫制度異常發達，益使此種殘忍不仁的掠奪日益加甚。

三、國家資本主義，在各殖民地中，尤為發達。乘各帝國主義者大施其掠奪政策之時；乃以愛國主義為護符而遮飾其虐待勞工之劣行。

四、彼等復見此種奴役勞工的情形彷彿可圖，遂益得寸進尺，乃至利用一部勞工階級以抵抗他部勞工階級。中產階級投資於殖民地之產業，或建築工廠店舖等，其目的不僅在得巨利，兼在降低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者之生活程度與工作程度。其所用之方法，即掠奪殖民地並半殖民地中之廉價的勞動也。

五、生活程度及工作程度之不同，有礙太平洋各種族或各國籍勞動者之聯絡。此種阻礙及困難，因民衆對於中產階級之盲從的信仰而愈益紛雜，並足促進彼等對於有色人種之偏見與仇恨。帝國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利用各種人造的偏見，以便對付被掠奪階級，使彼

等不能互相了解或聯合，而減少其團結能力。為免除此等慘狀，並取消束縛有色人種勞工之立法起見，為剝奪帝國主義者及中產階級之武器，俾使勿降低勞動者之生活程度起見，並為解放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此種中古時代之奴隸制度起見，太平洋勞動會議議決下列十項要求，俾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之勞工有所遵循，復以促成鞏固之組織，而為有計劃之奮鬥：

- 一、採八小時工作制；
 - 二、每星期內，須使工人有一次連續二十四小時之休息。
 - 三、施行工人保險，如疾病、週險、殘廢、失業等各項保險。保險之責任，由廠主與政府負擔之；
 - 四、禁止婦女作夜工。產婦須在生產時期之前後各給假八星期，工資照給；
 - 五、絕對禁止買賣兒童作為掠奪之目標，並禁止僱用十四歲以下之童工；
 - 六、同等之工作予以同等之工資；
 - 七、集會、結社、出版、罷工之自由權；
 - 八、設立勞工稽核所，其中職員由各工會中選舉之；
 - 九、取消體刑、罰金、扣資，以及工廠之產品充工資等；
 - 十、組織工會及糾察隊，反對法西斯主義及破壞罷工者。」
- 以上即太平洋勞動大會之經濟計劃，其目的在為太平洋之勞動階級建一運動之基礎。此種計劃應普遍化，使一般羣眾皆認識之，藉有掠奪者萬般之阻撓與抵制，亦必使之實現。蓋無產階級倘欲打破其敵人之勢力，勢非羣起而為有決斷、有計劃及永續的奮鬥不為功，亦即非由勞工會創議與努力不可。蓋唯有如是，始能強制敵人採用此次大會之經濟計劃也。

（錄自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出版。）

其時，蘇兆徵、李立三、劉少奇等控制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忠發控制湖北省總工會，而以武漢為大本營。此次太平洋大會殆欲藉以抬高中共之聲勢，實則爾時中共在武漢形勢危急，此會亦無能為力。

肆 第四次全國勞工大會（註四）

歷次全國勞動大會，始終操諸中共之手：第一次大會在民國十一年，第二次在十四年，第三次在十五年，均爲五月，地點均在廣州，見第五章第二、三兩節。

此次大會原定十六年五月一日舉行，但此一時期中共各種會議節目排得十分緊密；四月二十七至五月六日有中共「五大」，五月十日起有青年團「四大」，五月二十至二十六日有汎太平洋「勞大」，是以勞動「四大」被擠至六月十九日始克舉行，至二十八日閉幕。「勞大」開會期間有武漢何鍵反共宣言及河南馮玉祥驅逐鮑羅庭之馬電，中共實處於岌岌不可終日之境。

先是，四月間，中華全國總工會曾發表「召集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告工友書」及「第四次勞動大會宣言」二種，二者內容大致相同，大意如下：

(一) 全國工友自第一次大會以後數次奮鬥之結果，遺留偉大的功績於世界。

(二) 買辦，大資產階級，退出國民革命之聯合戰線，中國革命運動變爲小資產階級及農民民衆的共同運動，而轉入一新時期。

(三) 本大會討論下列事項：

甲、援助農民打倒土豪劣紳封建制，並建立鄉村民主政權；

乙、指導全國民衆與小資產階級成立工農革命同盟，以對抗反革命勢力和白色恐怖；

丙、按太平洋勞動會議之決議，確立全國無產階級之聯合，俾反抗帝國主義者之結合並防止破壞蘇維埃制之陰謀；

丁、反對大資產階級之陰謀，並提倡非資本主義之革命；

戊、促進小商人及小資產階級的自覺；

己、要求編訂勞動保護法，工場法及國立勞工保險制，參加國有產業之管理；並沒收帝國主義在華所有之大產業；

庚、確定並劃一總工會之組織系統；

辛、教育宣傳方法及工人武裝方法。

六月十八日先在漢口「血花世界」舉行預備會議，到各地代表四百餘人。此外尚有蘇聯、爪哇、朝鮮等代表數十人。

蘇兆徵主席。首由李立三起立演說云：「此次之會議，與前三次之集會不同。此次意義極爲重大即：（一）中國之勞動運動，今已劃一新時期，吾人不可不鞏固農政工階級之組織，以達成工、農革命之目的；（二）期望小資產階級與農階級鞏固團結，協力聯合，實行革命；（三）使政府担任救濟被壓迫之農、工階級，確定依勞農組織之農工政策；（四）農、工階級聯合，打倒封建制度遺物及一切革命障礙物。」繼復討論議事日程，會議事項，進行方法等。並預定十九日起正式開會，每日午前午後各開會一次。

十九日午後三時正式開幕。參加者有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赤色職工國際及各機關團體之代表共四百餘人。傍聽者三百餘人。並通過大會之通電及通令。內容與四月間之宣言，大略相同。

六月二十日出席代表三百五十六人，李立三作政治現狀之報告，重要節目如下：

（一）「五卅」後之北伐運動，香港罷工，各地工人之援助北伐，上海武裝暴動，北伐與工會發展等。（二）大資產階級背叛後之情況，革命之破壞手段，法西斯蒂主義。（三）國民革命之趨勢，小資產階級及農工革命運動，工人參加改良問題，土地問題，非資本主義經濟之建設。

六月二十一日出席者三百八十一人。赤色國際委員長拉斯布斯基報告世界革命運動，此外並有各地代表之報告及希望。其主要希望如下：（一）反對白色恐怖；（二）區別真正之友與真正之敵；（三）鞏固小資產階級之聯合戰線；（四）沒收帝國主義者手中之一切產業；（五）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六）工人參加國有產業之管理。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者三百八十人，其要點爲今後應聯合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者及大資產階級作猛烈的鬥爭，擴張勞動階級之組織與能力，激勵其奮鬥，並使之努力於政治經濟方面。最後提出臨時提案四件，其主要者爲請求國民政府勿取締農工運動（湖北代表提出）及急速派遣討伐軍。均經通過。

六月二十三日出席者三百八十人，有全國總工會過去一年間之報告，繼提出「會務決議案」，通過之。

二十四、五、六各日，各地代表報告，二十六日通過「失業工人保障案」。

六月二十七日出席代表四百二十人。由主席團之劉少奇，提出中國工會組織問題案，原案議決通過。

六月二十八日爲大會最後之一日。是日上海代表提出反對法西斯蒂之議案，經大會通過。此外尚有各地各工會之決議案報告及女工重工之決議案等。

茲將該次大會之各項決議案照錄如下：

一、會務報告決議案

(一) 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在過去一年中，對於全國工人階級政治的經濟的鬥爭，有適當之指導。如引導工人參加北伐鬥爭，反對藉口北伐犧牲工農自由鬥爭，香港罷工停止武裝封鎖，上海三次暴動，指示各地不斷的改良生活運動，以及全體一致罷工一小時作反帝國主義武力干涉中國之表示等。大會認爲第二屆執行委員會，確能認清革命環境與時機，完全站在工人階級利益上領導工人階級上前奮鬥。一切政策都是對的，大會非常滿意。(二) 全總在廣州時，曾發展廣東各縣及南洋各部之工會組織。北伐後，又加緊發展湖南、湖北、上海、河南之工會組織，及遼鄂後，又陸續發展江西、安徽各地之工會組織，組織的工人之增加，有驚人的進步。第三次勞動大會人數一百二十萬人，現在已增到二百九十萬人，大會非常滿意的。(三) 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往往因客觀需要分散各地，以致會中技術工作，不能完備。大會責成下屆執行委員會，糾正此項缺點，必須集中得力人員住會辦事，對各地應有經常之指導。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爲健全機關，盡他偉大的指導責任。(四) 各地方各產業工會，對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絕對表示擁護和信任。全國工人階級，誓立在全國總工會旗幟之下，謀得階級之完全解放。法西斯蒂與改良派之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及廣東總工會有另組全國總工會逆謀，大會責成各地一致反對；(五) 第二屆執行委員李森、何耀全、鄧培、劉國裳、繆卓民諸同志，被反革命派所殺，大會誓願爲諸烈士復仇，繼續其精神奮鬥。

二、關於工會組織問題之決議案

(一) 職工運動到今雖大有進步，但第二次及第三次大會，關於組織決議案，到現在尚可以通用的；(二) 中國的工人若是有六百萬入，那末手工業工人和店員便要佔四百萬人，所以關於手工業工會和店員工會的組織問題，要在第四次大會特別注意；(三) 各地工會的組織雖有進步，但終久還沒有建立穩固的基礎，所以此後我們應想法集中工會的組織及穩固的基礎；(四) 工人中的鬥爭和組織，

兩者相輔而行，缺一即失其功效；（五）集中工會的權力，免除組織紊亂；（六）政治環境時常變更，而工會當其變更的時期應特別注意；（七）女工、童工同樣的爲工會會員，不應有其他組織，但同時要保障童工、女工本身之利益；（八）職工運動已由經濟的鬥爭進入政治的鬥爭了，所以對於工人的武裝問題，應特別注意；（九）工會向會員徵收會費的標準，及將會費的一部分作工會基金和失業救濟金；（十）關於組織各種產業的全國總工會及強固全國總工會的必要與計劃；（十一）大會對於廣東機器工會及江西景德鎮反動武裝進攻之事，應極力宣傳以暴露反動派之真相；（十二）結論。

三、關於童工女工之決議案

（一）在中國工人中童工、女工佔大多數，所以要特別注意；（二）童工、女工的生活困苦情形；（三）工作時間之規定及年齡之限制；（四）改進衛生；（五）待遇應與成年工人一樣；（六）工資應與成年工人一樣；（七）應設立藝徒學校；（八）不能虐待；（九）女工產前產後的待遇；（十）應規定經常休息時間；（十一）應爲童工、女工設立俱樂部；（十二）童工、女工應與成年工人一樣的享受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十三）要解除童工、女工的種種痛苦。

四、關於失業問題之決議案

（甲）保障失業工人決議案：（一）凡能容十人以上之作坊、工廠、商店，停業及辭退工人須經政府之許可；（二）凡工廠、作坊、商店停歇及辭退工人，須於一月前公佈停歇及辭退之理由；（三）凡因營業在原有資本虧本三分之一者，得呈請政府幫助，繼續維持營業現狀。虧本達三分之二者，得准其縮小範圍，虧本超過二分之一以上者，經政府之許可，方准其停歇；（四）凡無故停歇者，得呈請政府沒收其生產機關。惟國有及社會日常生活必需品之生產機關，不得停歇及辭退工人；（五）凡因虧本經政府允許縮小範圍或停歇者，應發給被辭退工人之遣散費。手工業者與店員，按原工資發給三月，大生產機關給四月，未經政府允許者遣散費一律加倍；（六）政府指定醫院，爲失業工人疾病治療所，並應撥款建設失業工人宿舍及飯堂；（七）由政府設立失業工人俱樂部，職業講習所及子弟學校。

（乙）救濟失業工人決議案：（一）呈請政府設立救濟機關；（二）由政府命令各工廠、作坊、商店，按百分之幾，作失業工人之救濟金；（三）由政府在各種捐稅內，增加百分之幾，作失業工人救濟金；（四）由各團體募捐交救濟機關，救濟失業工人；（五）各工

會應由每月月費項內，抽出百分之三，作救濟失業工人之救濟金。

(丙) 安插失業工人決議案：(一) 由政府協同工會，設立失業工人職業介紹所；

(二) 凡工廠、作坊、商店擴張營業增加工人者，應請職業介紹所介紹，不得自由僱請；

(三) 由政府籌款興辦實業安插失業工人。

錄自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出版。

中共中央有一信致四次勞大，於分析當時赤色份子處境狼狽後，提出「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口號，以期拉緊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左派」，而免本身完全陷於覆滅地位。原信如下：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信

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代表親愛的同志們：

自「二七」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和本黨攜手奮鬥，已經四年多了。這四年當中，中國工人階級和本黨同志為革命奮鬥而為帝國主義、軍閥及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所屠殺者，遍於全中國南北各省，積屍可以成山，尤其是最近封建、資產階級的代表新軍閥○○○及其黨徒白崇禧、李濟深、夏斗寅、許克祥等在南方之屠殺，舊軍閥張作霖、張宗昌在北方之屠殺，更為殘酷。本黨李大劍等同志們在北京之死難，汪壽華等同志們在上海之死難，鄧培、李森、劉爾崧等同志們在廣州之死難，楊昭植等同志們在湖南之死難，其慘烈當為中國工人階級及本黨永遠不忘之事。

中國革命愈向前進展，帝國主義愈驚恐發狂地教唆其走狗向中國革命的工人階級及本黨橫施屠殺。帝國主義愈驚恐發狂，教唆其走狗之範圍愈擴大，不獨舊軍閥受其教唆，即曾經投機混入革命之新軍閥及一切游疑中立分子，亦受其教唆，轉過頭來，戴着革命的假面具，向工人階級及本黨毫無顧忌的摧殘。

工友同志們！現在和革命勢力不相容的，不只是帝國主義及其老走狗張作霖，也不只是……，凡是被革命高潮所嚇退而接受帝國主義教唆的人，都會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走到反革命那邊去。所以中國革命成功的担保，即中國民族脫離帝國主義之壓迫剝削而解放的担保，乃是工人階級及本黨同志的血。

現當革命的高潮中，反革命的惡潮亦日益增漲，造成中國革命運動之一大危機。革命的工人階級正在此危機中召集第四次全國勞動

大會，這是有非常嚴重意義的。

工友同志們！我們在第四次大會時的力量，固然比前幾次大會時的力量增加了，但是敵人的力量也同時增加了；因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不但是老軍閥，現在又加上了大資產階級及大地主的代表新軍閥。我們今後向他們作戰的力量，不但要集中工人階級自己的勢力，而且要領導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結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向共同的敵人作戰；因為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同樣是受帝國主義，新舊軍閥及大資產階級之壓迫者，這三個階級都是中國革命的勢力。所以此次大會之中心口號應該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工友同志們！今後革命的鬥爭將愈加艱難困苦，我們須愈加努力。本黨慶祝大會之成功，同時預祝大會後全國工友們和本黨攜着手奮鬥到底，以獲得我們的最後勝利。

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萬歲！

全中國工人階級團結萬歲！

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萬歲！

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原載「糧報週報」第二百零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出版。）

（註一）本項採自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三編五七六至五七八頁，五九七至六〇〇頁，六一六至六一九頁。

（註二）見馬「史」第三編五七八至五八〇，六〇一至六〇二頁。

（註三）取材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工人運動」五四〇至五四四頁，（馬「史」第三編六八三至六八五頁。

（註四）取材同上（五四五至五五二頁。

第五節 農民運動

中共之參加農民運動，亦假國民黨之名義以行，發軔於廣東，並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及十五年五月先後召開第一、第二次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均見第五章第四節。

在北伐期間，自民國十五年七月出師起，至十六年七月武漢分共止之一年間，中共農民運動之最高指針為十五年十二月及十六年五月，共產國際之兩次「中國問題決議案」，均特別着重農運，而農運則着重建立農民政權，實行農民武裝及解決土地問題，如第八章第三節所述。但十六年四、五月中共五次大會所通過之「農業問題決議案」，則不贊成根本解決土地問題，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是以中共對土地問題意見，頗為紛歧。

在實際行動方面，長江各省農民運動，隨北伐軍之進展而展開。但在閩、浙、蘇等省，光復稍遲，而清黨較早，中共之農運尚鮮基礎；廣東方面，雖有三年歷史，亦因清黨而受限制，是以農運比較發達而問題嚴重者則為湘、鄂、贛等省，尤以湘省為最。本節即於此三省作概括的敘述。其他各省，如豫、陝、魯等，雖亦有農運，但基礎薄弱，不備載。本節所述，因缺乏非共方面材料，主要的不得不取材於中共，當不無誇大、歪曲之處。

壹 湖南農民運動（註）

湖南省農民運動始於民國十四年冬季，由國民黨省黨部領導。是年，毛澤東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學員三百餘人，而湖南即佔三十六人。該所學員，多數參加軍中政治工作，而湖南籍者提前於冬季結業，以國民黨省黨部農運特派員名義派在湖南境內沿鐵路線工作，僅成立二三個鄉農民協會。十五年七月，北伐軍進入湖南，農民紛起響應。如七月泗汾之役，北伐軍得農民協助，兩處強渡鐵江，敵嚴陣以待，農民擾其後，北伐軍猛衝泗汾橋，敵軍一團潰滅。八月平江之役，北伐軍進攻敵人，農民助攻白石嶺及青水嶺，陣亡十三人，擊退敵軍。其他如歡迎北伐軍，走報敵情，參加輸送隊活動，亦有足述者。然此為農民自覺的革命行動，未必與中共之農運有關，因此等農民既乏槍械，亦無組織。然自是農運迅速展開，至十一月止，據報：全省成立農民協會、籌備會或通訊者凡五十餘縣，有區農協四六一處，鄉農協六、八六七處，會員一、三六七、〇〇〇餘人。

十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日，召開湖南省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出席農民代表一七〇人，代表五十二縣農民會員一百三十萬。全省工人代表大會亦同時召開，代表一七五人，代表工會五二處，會員三十二萬餘人。兩個大會有時開聯席會議。農民代表大會共議決三十三個議案，包括農民利益與農村革命工作等問題，其最多者為東佃問題、團防問題、土豪劣紳問題與農民武裝問題等。大會支持農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經濟鬥爭。議決減租、減押或廢押、禁止高利貸、取消國防捐、組織農民武裝等提案，並建議成立全國農民協會。並肆無忌憚的通過「加入赤色農民國際決議案」。

其大會宣言之口號有「農民國際萬歲！」及「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於此必須指出者：長沙之克復為八月二十日，而各地農民協會之組織，如由各村、各鄉、各區以至各縣，如上所述之五十餘縣，其成立均在北伐軍達到之後，乃竟以三個月時間，完成各縣各級之協會組織，選出代表及出席大會，事實上決不可能，其為中共之粗製濫造，盜名欺世，不問可知。

另有可異者，大會舉行幾達一個月之久，顯係中共份子等待毛澤東之演出。毛於十二月中旬始自廣州來到長沙，大會發出通告，表示歡迎，並於二十日舉行歡迎會，毛於二十日及二十八日均到會演講，作為壓軸戲。

在歡迎會中，毛謂：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無論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或者是要發展工商業，都必須依靠農民問題的解決。

在閉幕會上，毛謂：當時有人稱農民運動為「惰農運動」是對農民的誣蔑；其所稱「帝國主義沒有打倒以前，我們內部不要鬧事」為反動理論；並謂現在湖南雖然由國民政府所統治，實際為國民政府與趙恆惕所共同統治，因為土豪劣紳還有很大力量。

自是，毛澤東即指導湖南農運，至民國十六年四月向中共五次大會提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時湖南人民均指農民運動「糟得很」，而毛硬謂「好得很」。報告中描述農民協會之權力稱：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之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

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逆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利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却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民國十六年一月四日，湖南省及境內各地設立「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各地法庭一般由農會、工會委員長、黨部常委和縣長負責組織，成爲中共在湖南實行屠殺及恐怖政策之機構。

截至民國十六年四月，湖南農民協會會員號稱五百一十八萬，成立縣農協者三十五；籌備處者十六。

中共製造之省農民代表大會，大會「代表」一呼而至者一百七十五人，其爲地痞、流氓及中共份子所充數，不問可知，真正勤苦農民必不知大會爲何物，是以湘人稱農民運動爲「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由於中共農運之囂張，迫使有產者逃至城內、漢口或上海，致財政收入銳減，是以社會方面及政府方面均表不滿，而各地衝突事件，農民與農民歐鬥，農會與農會對立，不斷發生。國民黨反共黨員如省黨部農民部長劉嶽峙（民國三十九年湖南淪陷後被中共捕殺），省、市黨部重要人員王鳳階等，組織左社，提出農運計劃，主張農物增產，農業改良，以停止農村糾紛，防止共黨活動，但卒被中共份子會同國民黨「左派」派公安局搜查其住宅，並開除其黨籍。自是中共所領導之農運氣燄日張，在其打倒土豪劣紳口號之下，稍有財產者無不受其迫害，即前方作戰之革命軍人家屬亦所難免，卒引起「馬日事變」，中共之農運氣燄頓被撲滅。（馬日事變詳下章。）

貳 湖北農民運動（註二）

湖北省農民運動，由於光復較遲，及缺少農運幹部，其爲害不如湖南之甚。

民國十五年九月，北伐軍克復漢口，六日，在漢設立國民黨省黨部，農民運動費每月八千四百元，各縣黨部相繼成立，農民運動費佔經費三分之一。在省黨部設有農民部，指揮農民運動。十六年三月，召開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關於此次大會，有兩種矛盾的記載：一種記載是田中忠夫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之「中國農業經濟資料」，轉載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三九五頁，據稱：大會「於三月初旬舉行，其重要決議案凡三十件；」另一種記載為藏國民黨黨史會四月八日剪報，似較八年以後田中記載為正確，本書採用後者。

湖北省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於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八日在武漢舉行，代表共一百七十人，包括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僱農以及學生、小學教師、手工業者、小商人、自由職業者，代表全省有組織農民號稱八十一萬人。大會所討論之問題凡一百餘件，通過重要決議案三十五件。

三月二十日還開了一個追悼陽新、天門、沔陽、鍾祥死難「農工領袖」的大會。

此等被殺「領袖」，據稱均為「土豪劣紳」勾結「土匪」之所為，「農民」之被殺者，沔陽四十餘人，天門二十餘人，鍾祥十餘人，其他監利、京山、廣濟、麻城、蒲圻、武昌……十餘縣，無不有搗毀農協，捕殺農會職員及特派員情事發生。但，據稱，「土豪劣紳」被「農民」捉來及打倒的也不少。

其時正在武漢國民黨三中全會之後，及南京清黨之前，是以反蔣迎汪之叫號亦甚囂塵上。

農民協會打倒土豪劣紳口號到處轟動。農民先以清賬之名做打倒土豪劣紳題目，將欲打倒者以麻繩綁縛，戴上「土豪劣紳」帽子，在村中遊行，在黃岡，使戴上地主收租的斗，有時課以罰金，後來且有沒收財產，監禁、槍斃等處分。第一次大會後，各地代表返鄉，行動更趨激烈。

三月二日，在湖北，頒佈「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據該條例第一條，所謂土豪劣紳，是憑藉政治、經濟、門閥身份及一切封建勢力或其他特殊勢力（如勾結團防軍匪），在地方上有下列行爲的人：

- (一) 反抗革命，或阻撓革命，或作反革命的宣傳者；
- (二) 反抗或阻撓國民黨所領導的民衆運動者；

(三) 勾結兵匪而蹂躪地方黨部或黨部人員者；

(四) 通匪而坐地分贓者；

(五) 藉端壓迫平民而致死傷或損害者；

(六) 包攬農村政權，侵蝕公款，劣跡昭著者；

(七) 欺凌孤弱，強迫婚姻，或唆嫁孀婦，聚眾擄擄者；

(八) 挑撥民刑訴訟從中包攬騙訴者；

(九) 破壞或阻撓地方公益者；

(十) 侵蝕公款或假借名義斂財肥己者。

犯上列的罪的，由湖北省土豪劣紳審判委員會審判（第八條），農民無直接的審判權。如此的土豪劣紳，於終身剝奪其公權（第六條）之外，根據罪底輕重，照下面處罰：

第一項 財產沒收

第二項 同

第三項 同

第四項 同

第五項 財產沒收

第六項 同

第七項 財產一部或全部沒收

第八項 同

第九項 同

第十項 同

死刑或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

一等有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一	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四等	千元以下
二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二等	二千元以下
三	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二等	六千元以下
四	三千元以上	無期徒刑	財產沒收
		死刑	罰款

此一條例之可怕，不僅在其處刑之嚴重，程序之草率，而尤在中共份子藉條例之名以厲行農村恐怖政策。當時中共農運口號，就著者所親歷，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甚至非豪、非紳，凡為中共份子所不滿者，無不可指為土豪劣紳而摧毀之。農民雖規定不能直接從事審判，然檢舉、逮捕之權屬於農會，審判之權屬於中共及國民黨「左派」，則被檢舉者之決難倖免，勢所必然。湖北農村人民之生命財產，絕無保障。

湖北農民運動所造成之恐怖，上海方面有如下之記載：

武漢農民的慘狀

（原題「武漢農工的慘狀」之農民部份，悲天憫，載民國十六年六月五日上海「革命」第六期——國民黨黨史會藏。）

武漢治下的懲治劣紳土豪條例頒佈了，各縣農民協會成立了，主持懲治劣紳土豪的，是各縣黨部，執行懲治劣紳土豪的，是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份子，大半是地方上不肯耕種，游手好閑的地痞、賭棍、江湖會、哥老會等。他們平時都是好喫懶做，興風作浪的社會之蠹，好容易得到了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即可依附革命之名，又可達其魚肉鄉民之野心，威權無上，四出拿人。各農民協會，每日必有工作報告，倘若一日沒有拿人、打人、殺人，便易被人加上不革命的頭銜。於是各處農民協會，四面騷擾，八方搜刮，今日拿張紳，明日打李豪，所拿所打的真是劣紳土豪，倒也罷了，無如真正劣紳土豪，有錢有勢，早已遠走高飛，他們所懲治的，竟是那不能走不能飛的平民，良善的自耕自食的小農家。他們連農具牛馬算起來約有五百元財產以上的小農人，均在打倒之列。這樣一來，武漢黃安德的下五府，各縣各鄉各村各莊，鬧得雞犬不寧，一班小農村的人民，去秋不能耕地，今春也不敢下苗，男女大小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湘

鄂一帶，已成了恐怖世界，道路行人，面有憂色，見了人都是仰天而嘆！今年二月，武昌府所屬的大冶、興國兩縣，因為農民協會到處抄毀各家的祖宗牌，激動了公憤，農民聚集數千人，不約而同的圍攻協會，黨部得了報告，就派兵前往征服，一排槍，二排槍，拍拍的打了千數百個平民。他們報告說，這一類的平民叫做封建式的土匪，非消滅淨盡不可。將來各縣，最少數非毀殺却二百人以上，不足以消滅舊式家庭的流毒。他們稱這槍彈叫做消毒器。這是武漢各屬的農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慘狀。

截至十六年六月，關於各級農民協會數目、會員人數、中共黨員人數以及農民槍枝數，據十一月「中共湖北省委關於湖北農民暴動經過的報告」如下：

縣農協數 縣農協二二，縣農協籌備處三二。

區農協數 三八〇（已知的）。

鄉農協數 三，八五二（已知的）。

會員總數 二，八四二，二三九。

黨員方面，全省一萬四千餘人，散佈各縣者七、八千人，每縣多者百餘人，少者數人，均在半公開半政權之下。武裝方面，各縣農民之快槍，多者二、三百枝，少者二三十枝、全省約二千枝。

其時，湖南之馬日事變及夏斗寅之進攻武昌（均詳下章），均予中共以甚大打擊。國民黨左派及中共份子均承認「農民運動過火」而通令加以約束。湖北省農協因而發出一項緊急通告，指示六點：注意「農村中聯合戰線」，團結小地主、中農、手工業者、婦女，制止兒童團之索捐罰款；「嚴禁沒收革命軍人及非土豪劣紳之財產，如已沒收，應立即發還」。

中共此一退却，為將來再起之準備，所以指示中對於繼續打倒土豪劣紳應進行不懈，而於集中武器工作尤不放鬆。茲將此項通告錄後。

湖北省農協緊急通告

(民國十六年六月四日武漢方面剪報，原件藏黨史會，未註明報名。)

湖北省農民協會爲遵照黨(著者按：指國民黨)與政府命令，并循序發展農運，以適應環境及時代，特由執行委員會決定工作辦法六項，通告所屬各級農協，應切實遵照執行云：

各縣農民協會籌備處，并各級農民協會均鑒：本省農民運動，自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開幕之後，發展甚爲迅速，農村封建勢力，亦日趨於崩潰，土豪劣紳爲維持其垂死之生命，已採取最後之手段，作大規模的反攻；如封鎖金融，以釀成農村經濟上絕大之恐慌，以圖分離農村革命勢力；如勾結土匪及反動軍隊，大肆屠殺，以謀根本消滅我們的勢力；同時有少數縣份，在很大的發展當中，也不免有些幼稚的行動，給敵人以口實，使社會一般人對本會猜疑。最近夏逆斗實的叛變，完全是代表土豪劣紳向我們反攻，可說我們全部受一重大的損失，幾乎根本搖動。至於鄂南各縣負責任的同志和會員，現在還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各縣土豪劣紳乘機煽動，打我們，捉我們，殺我們的，日有所聞。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爲挽救這種危局，除在軍事上盡力掃平反動勢力外，曾下了幾道命令，制止民衆不合乎手續的行動。本會爲應付目前農運的難關，爲執行黨和政府命令，決定各項辦法如下：深望各級協會切實執行，是爲至要！

(一)關於宣傳的——可完全遵照本會宣傳部第十號通告所指示宣傳要點立刻動員，特別注意的是夏斗實的叛變，黨和政府的命令。

(二)關於組織的——要特別嚴密起來，肅清會內反動份子，同時要注意農村中的聯合戰線，莫使革命的小地主、商人、手工業者離開革命戰線，莫使農民陷於孤立。整頓各級委員會，並要使上下級發生密切的關係，使能指揮自如，行動一致，會的紀律要能切實執行。農村婦女要盡量吸收收入會，嚴防與農民協會發生衝突。農村童子團的組織須隸屬於農民協會之下，嚴禁其單獨行動；關於募捐罰款的事實。

(三)關於執行黨和政府的命令——要充分的遵照執行，不得視爲具文。不過要注意的是宣傳工作(見宣傳部的通告)，免得羣衆因誤會而消沉，免得土豪劣紳的勢焰更形高漲。

(四)農民政治部——在農運很發達的時候，農民極須建設農村自治政府的運動(其條例政府不日公布)。此實鞏固革命戰線、保障革命勝利、繼續革命工作的要圖。其次的縣份，也要作宣傳和準備的工作，特別是注意的就要預防反動勢力之侵入。至於政治軍事(打倒土豪劣紳)，則應遵照黨和政府的命令繼續進行不懈，因爲不這樣，就脫不上政治建設了。如果對於縣長及其他政府機關人員(如稅局、公安局……)不滿意時，應向黨部或省政府呈報，嚴察自由拘捕各種行動。

(五)關於經濟的——已經沒收之動產應一律集中於縣農協，再請由黨和政府撥作有利於農民的事業(如合作社、農民學校、農民武裝

……)沒收的土地聽候政府解決，嚴禁沒收革命軍人及非土豪劣紳之財產，如已沒收，應立即退還。合作社的組織，應積極着手進行，以救濟貧困之農民。

(內關於武裝的，盡可能的集中注意政治和軍事上的訓練，幹部及團士分子之良莠，并須注意搜集散在鄉間舊的武裝，添置新的武裝(如購買新式槍枝或舊式的戈矛等)。

上述各點必須切實的迅速的執行，并隨時將工作情形報告本會，以憑考核而資討論。又，此次夏斗寅叛變在各縣的影響(農民方面、反動方面、其他各方面)，亦望詳細報告前來爲要。

湖北省農協會。六月一日。

據「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三九五頁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農民部在武昌設立農民運動講習所，收容湖南、江西籍學生各一百五十名，湖北籍者二百名，期限爲三月九日起四個月。此所開辦情形，爾後發生何種作用，均無從稽考。

叁 江西農民運動(註三)

江西省農民運動，起於民國十四年四月，永修縣成立農民協會，有會員一千二百人。至十五年十月，據省農民部報告，在永修、都昌、吉安、九江、萬安、弋陽、星子、南康、吉水、德安、新建等各縣，均有協會組織，全省會員逾六千人。北伐軍進攻江西時，省農民部派特派員三十餘人至二十縣工作，更促進農民運動之發展。

國民革命軍克復南昌之後，省農民協會籌備會即於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設於南昌，並設贛東辦事處於臨川，贛西辦事處於吉安，贛南辦事處於贛州，就近指揮各縣農運宣傳與組織工作。據稱：三個月間(著者按：當爲十五年十二月至十六年二月)，會員從五萬增加到三十餘萬(註四)，協會組織從六縣擴充到五十四縣。

其時各省農民協會組織，中共僅追求及虛報數量，而不問其健全與否，以江西論，省農民協會第一次大會即承認有下列缺點：

(一)籌備處底內部組織不完全，對於各地協會只有少的指導與糾正，沒有全體的指導與全部的計劃。其中，宣傳工作不充分，出版物很少。

(二)各縣農民協會，或縣農民協會籌備處在組織協會之前，宣傳不足，因而入會者少，並且不了解協會的性質，對於協會增加懷疑的人。

(三)各縣概偏重於數量底發展，而忘却了性質的訓練。

(四)太依賴政治，而輕視會員自身底勢力。

(五)各縣協會概缺乏調查工作，因而沒有行動底標準；省協會也因沒有各地底調查報告，不能決定適當的策略及提出適當的口號。

(六)各級協會概不從事經常工作，因而氣息奄奄。

(七)各級協會概不注意非常工作，會員與協會底關係很不密切。

(八)因為沒有由各縣協會向省協會的詳細的經常報告，因而省協會沒有指導的方法，兩者的關係很不密切。

(九)各協會概無紀律，因而團體不能健全並不能發展，組織不嚴密，力量微薄。

(十)不經歷鬥爭，力量微薄。

(十一)繳納會費的成績不良，會員離開了協會。

(十二)不注意於農村婦女底入會。

(十三)協會中，有土豪劣紳在操縱。

江西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於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舉行於南昌，代表一四一人，代表四十五縣，正式成立省農民協會。大會通過決議案二十五件，包括要求參加懲辦土豪劣紳之審判；組織農民自衛軍；促成省民、縣民及鄉民會議，以奠定國民會議基礎；減租、廢押、減息等決議案。

江西農運較湖北稍早，其發展則較緩，農運在農村中所造成之恐怖似亦較小。

肆 全國農民大會未能召集

中共份子在武漢會企圖召開一全國農民代表大會，成立全國農民協會，毛家史官並稱：「全國農民協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成立，毛澤東同志任主席」（註五），實則就著者所知，證以當時在武漢活動之友人某君所知，此大會並未召集成功，所謂「全國農民協會」亦係臨時的，而非正式的；其決定成立時間為三月三十日，臨時執行委員就職時間為四月九日，而非五月；毛澤東起初亦僅為臨時執行委員十三人之一，兼組織部長，而非主席。

從執委十三人名單中，雖亦列有國民黨要人，然其重心顯然在毛澤東、譚平山及彭湃等身上。

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於四月九日發出就職通電，旋發出於七月一日召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通告，指示選舉辦法。其時，武漢所能指揮之省份僅湘、鄂、贛三省、其他各省均在反共勢力之下，農運或被抑制，或根本未成立，則各省代表顯然為中共所指派，而缺乏真正代表性。其所預定於七月一日開會，其時武漢形勢已面臨危險，事實上，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左派」即實行分共，大會終遭流產。在整個中共農運史中，除曇花一現之全國臨時執行委員外，即不復有全國性組織矣（在中共竊據大陸後，農民協會組織至縣、市而止，無省及省以上組織。）

茲將上述就職通電及指示選舉通告有關消息錄後。

全國農民協會要訊

（按：本件係民十六武漢方面剪報，未註報名及日期，原件存黨史會。）

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自粵、湘、贛、鄂省農協代表及河南武裝農民自衛軍代表，於三月三十日，在武昌開聯席會議，推舉鄧演達等十三人為臨時執行委員。茲聞該委員等已於四月九日正式通電就職。並聞近日通告各省區，決定七月一日召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及宣言援助「四三」慘案，願為政府後盾，茲特別錄出，以示讀者：

（一）臨時執行委員就職通電：（上略）公鑒：全國農民運動之發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勢，現在成立省農民協會者，已有五省；成立省農協籌備處者，已有十餘省；全國有組織之農民，已在一千萬以上，急須有一全國之中心組織，以統一全國農民之戰線。三月三十日，粵、湘、贛、鄂等省農民協會代表，及河南武裝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舉行聯席會議，推舉鄧演達、毛澤東、譚延闓、譚平山、徐謙、

孫科、唐生智、張發奎、彭湃、易禮容、陸沉、蕭人鶴、方志敏等十三人爲臨時執行委員，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就職視事。並推定鄧演達爲宣傳部長、毛澤東爲組織部長、彭湃爲秘書長。吾國農民之痛苦，皆爲國際帝國主義之侵略，與國內封建階級之壓迫，而農民之解放，即國民革命之成功，故國民革命勢力之進展，農民亦隨之組織起來。同人深信此爲不易之道，誓立於革命的地位，領導全國農民努力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與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封建階級作最後之鬥爭。謹此電聞，諸希教正，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啓。

(丙)召集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通告：各省農民協會，各省農民協會籌備處均鑒：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定於七月一日在武漢開會。關於選舉標準，代表名額及資格，代表選舉手續，及其他有關係之各項，茲詳爲規定，望各省協、各籌備處切實遵照辦理，並將辦理情形，先期報告本會。此次全大會關係農民之政治的經濟的鬥爭甚大，各省辦理選舉，必須切實與通告內容相合，特別是代表資格與選舉手續等項，否則認爲違法，望加注意爲要。(一)會期：大會訂於七月一日開會，各代表均須於開會前一日報到。(二)代表選舉標準：一、以縣爲直接選派代表區，二、縣農協會員，滿一萬人者，得選派代表一人，不滿一萬人之縣，不派代表，一萬人以上之縣，得加派代表。該縣代表人數，由該省省農協，按照該省各縣會員數目，比例酌定。四、每省代表縣數，不能超過本會之總數。

以上二、三、四項，適用於農民運動特別發展之省，如湘、粵、鄂等省。其農民協會會員，不滿一萬人之縣份，佔多數之省，除會員滿一萬人或一萬人以上之縣，其選派代表標準，仍照前列二、三、四項規定外，應於該省代表總數中，以一相當部份分配於不滿一萬人之縣。

正式省農民協會，至少須選派代表一人，至多不得超過五人。省農民協會籌備處，須選派代表一人。(丙)各省代表分配；大會代表總數，定爲六百八十人，按照各省農民運動發展狀況，分配名額如左：

120	80	80	50	50	30	35	20	15	15	20	20	20	20	15	5	5	60	680
-----	----	----	----	----	----	----	----	----	----	----	----	----	----	----	---	---	----	-----

湘粵鄂贛豫陝蘇川晉直魯皖浙閩桂熱察綏陝計

軍總

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爲召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製發「宣傳綱要」一份。從此項綱要可以窺見當時農運之一般情況及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所持之見解。

在大綱中，雖未將反蔣置於主要地位，而公然提出蔣總司令之名，並主張工、農、兵之聯合，士兵且可選出代表六十人參加未來之大會，可知此項大綱完全是中共主張，而農民運動亦即為中共篡奪政權之工具。茲將此項宣傳綱要照錄於下。

全國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傳綱要

（按：此係民十六武漢方面剪報，未註明報名及日期，但在四月剪報卷中，原件存黨史會。）

(一) 農民與國民革命

一、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勢力，建設民主政治的國家。

誰能打倒帝國主義呢？工人和農民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和領導者。工人已在城市中領導這個運動起來了，要把這個運動擴大到鄉村中去，這個責任就在農民身上。

誰能剷除封建勢力呢？只有農民。辛亥革命以來，上層的封建勢力雖已動搖了，但是鄉村中的封建勢力——封建政治的基礎，還是與革命以前一樣，完全沒有變動，所以民主政治始終建設不起來，這也就是辛亥革命流產的一個大原因。鄉村中封建勢力是直接壓迫在農民身上，所有唯有農民最勇敢的剷除鄉村中的封建勢力。鄉村中封建勢力是普遍於各地，無論何種的軍事力量，上層的政治力量，都不能把他剷除；只有各地的農民普遍的起來，封建勢力才有剷除的可能。

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參加的政治才是民主的政治，農民不起來，民主政治是沒有保障的。這是站在國民革命的觀點上來說，國民革命的成功，必待農民的起來。

二、資本主義已將世界造成兩個對敵的營壘：一方是國際帝國主義反革命的勢力，一方是被壓迫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勢力。國際帝國主義苟延殘喘的方法，只有向地大物博、生產落後的中國進攻，所以反抗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同時即是世界革命的目的。

中國的農民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主力，他不但擔負了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同時擔負了世界革命的使命。

三、農民本身痛苦的來源是：

甲、由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來的：帝國主義者，以中國為市場，消納其生產品，使中國手工業破產，農村經濟破壞。帝國主義者，吸收中國原料，使中國地主更加重的向農民剝削。帝國主義者向中國投資，使農民每年負擔了極大的利息。

乙、由軍閥政治而來的：農民負擔了極大的捐稅，直接的如田賦、田賦附加、竹木捐等。間接的如厘金、鹽稅、鹽稅附加等，延長了兵禍、匪禍，更使農民生活不能安定。

丙、由封建地主階級而來的：重租、高利、苛例剝削農民；在政治上壓迫農民。

從這些原因看來，農民唯有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剷除封建勢力。這是從農民本身利益來說，農民得到了解放，才是國民革命的成功。

(二)目前的政局與農民運動

一、革命勢力迅速的發展，已快統一中國了。打倒北方的軍閥勢力，必待北方的農民起來與革命的軍事力量聯合，農民亦必直接參加革命的爭鬥，才能解放我們的農民自己。

二、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北方的軍閥，已在引誘〇〇〇所勾結的右傾份子趨向於反革命，只有需要革命的廣大農民羣衆推進此革命，才能免除這個危險。

三、革命軍事的力量，只能顧到前敵，革命的後防，只有革命的農民起來肅清一切反動勢力，才能穩固革命的基礎，保障革命的勝利。

(三)現在農民協會的工作

一、組織：現在有省農民協會的，已有粵、湘、豫、贛、陝等省，其餘各省都有省農民協會籌備處，或已有農民的組織，及農民的鬥爭。全國農民協會亦已成立。全國有組織的農民，已在一千萬以上。

二、政治鬥爭：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各省的農民，已在許多地方將鄉村中封建勢力完全推翻，土豪劣紳完全剷除；湖南大多數鄉村已建設了農民領導的民主政治，縣政問題已皆由民衆團體會議解決。北方各處農民正在與軍閥戰鬥。

三、經濟鬥爭：減租、減息、減押、廢除苛例、減稅的鬥爭，已在各地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普遍的起來，好些已經得到勝利了。

四、武裝：許多地方的農民協會會員，每人皆有一種武器，廣東農民有快槍四萬支以上，湖南有許多地方農民已奪得了地主階級的槍支。湖北、江西、河南、湖南農民協會，均已在設法籌備武裝，使農民普遍武裝起來。

五、建設工作：許多地方的農民協會已開辦了農民學校、合作社、農民借貸所，修築道路、整理水利、種樹、禁煙、禁賭、清匪，禁止纏足，進行農村婦女解放運動等。

六、農民要求：農民起來的地方都有下列各種要求：

- 甲、無地的農民要取得土地；
- 乙、政府改選民選的委員制；
- 丙、剷除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農民武裝起來；
- 戊、廢除一切苛捐雜稅；
- 己、反抗重租、高息、苛例等等剝削。
- 庚、創農民銀行、合作社、農民學校等；
- 辛、整理水利、修築道路。

(四) 封建地主階級破壞農民協會

農民起來同時驚覺了封建地主階級，他們知道是他們末日快到了，所以他們最後的「回光反照」，起來猛力破壞農民協會。

一、造謠：說農民協會要公妻、要抽丁、是土匪、是流氓。

二、屠殺：逮捕、監禁、拷打。封建地主階級在農民開始組織的時候，就使用自己的武裝組織，或勾結軍閥、土匪、向農民進攻。

二、混入農民協會，欺騙農民。

四、造成不革命的和平的農民運動理論，以消滅農民革命。

他們這些破壞農民協會的行動，我們只有更努力的和他們奮鬥。我們須知：對敵人的寬恕，就是對自己的殘忍，事實告訴我們：努力剷除封建勢力的地方，封建地主階級才無法破壞我們；對封建勢力讓步的地方，封建地主階級對我們進攻更利害。

(五)全國農民協會和全國代表大會

一、三月三十日，粵、湘、鄂、贛的省農民協會代表和河南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開聯席會議，議決成立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推舉鄧演達、毛澤東、譚延闓、譚平山、徐謙、孫科、唐生智、張發奎、彭湃、易禮容、陸沉、方志敏、蕭人鶴十三同志為臨時執行委員，組織臨時執行委員會，行使正式執行委員會職權。

二、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議決了七月一日召集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漢開會，代表總數六百八十人。

三、代表的責任是在提出農友們的要求，根據這些要求決定我們的政策。六百八十個代表中，革命軍的兵士可派六十個代表。我們須知兵士的出身都是農民，兵士從戰場上歸來也仍是農民，我們原來就是一家。現在尤其是要農友們兵士們共同起來担负這個革命的工作。代表大會中有兵士的代表，就是要我們兵士們，農友們，互相了解我們的責任和地位。

四、全國農民協會的責任是：

甲、領導全國農民完成國民革命；

乙、促進全國農民迅速的發展，應付目前革命的需要；

丙、擴大統一各地農民協會的工作；

丁、掃除一切破壞農民協會壓迫農民的特殊階級；

戊、代表農民利益，指揮各地農民協會為農民的本身利益奮鬥。

五、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要討論的重要問題是：

甲、怎樣剷除一切破壞壓迫農民的特殊階級；

乙、怎樣建設農民的政權；

丙、怎樣解決土地問題；

丁、怎樣廢除重租、高利、苛例、苛捐、苛稅，及一切對農民之剝削；

戊、工農兵聯合問題。

六、選舉代表大會代表我們應注意的幾點：

一、選舉代表時，我們一定要到會，不要放棄選舉權。

二、我們要選舉忠實於我們的農友或農民所信用的人充代表，因為有許多破壞我們的人，他們一定要取得代表權來搗亂。

三、在選舉代表時，要把我們一切的意思，我們一切的要求，提出討論，決定我們大家所同意的提案交代表帶到大會提出。

我們的口號：全國農友們團結起來！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剷除一切封建勢力！打倒土豪劣紳大地主！沒收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缺乏土地的農民耕種！取消一切苛捐雜稅重租高利及苛例；解除地主階級一切武裝！全體農民武裝起來，農民解放萬歲！全國農民協會萬歲！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萬歲！農民國際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註一) 取材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二五七至三九二頁。

(註二) 同上書三八五至四〇〇頁。

(註三) 同上書四一〇至四二二頁。

(註四) 取材「北伐軍佔領後的江西農民運動」一文，但在同一文件中稱：至一九二七年五月，會員人數僅為八二、六一七，中共數字之不可靠如此！

(註五) 同註三，二七六頁。

第十章 武漢分共

第一節 赤色恐怖之回憶

自民國十六年三月起至七月止，武漢完全陷入赤色恐怖之境。關於赤色恐怖情況之描寫及造成此種恐怖原因之分析，由於目前台灣已無法覓得當時報紙及有關評論，致無從敘述。著者其時正在武漢，徒以年事尚輕，知識有限，既不熟悉其裡情，亦不善於觀察，只能略就記憶所及，參以訪問及零星記載，敷陳於此，以略補此種缺陷。

著者原在上海復旦中學肄業，十五年冬，先母病革，未至學期終結而返鄂，至武漢時，已光復矣。回鄉待疾，至十二月三十日，先母去世。依習在家「守七」四十九日後再至武漢，約在十六年二月底，上海春季開學，已趕不及，乃留於武漢。適國民黨湖北省黨務幹部學校招生，往報考，獲取。學生二百餘人，均來自湖北各縣，校址近黃鶴樓，即宮門口原省立二中校址。時湖北公私立學校均被合併為大規模的，學生異動甚大，而各方均鼓勵青年參加革命工作，於是男女青年之考入軍校及黨校者甚衆。在武漢，女子從軍，此其開端。謝冰瑩女士，現在台北師大任教，當時即入軍校，在其時中央日報副刊（孫伏園主編）發表「女兵日記」，風動一時。黨校行軍事管理，着制服，免費。兩校學生在街頭行動時，頗使市民另眼相看。

著者入校後僅數日，一次，晚點名，軍事教官於全部點竣後，複點十餘名二次，審其無誤，囑其稍留，著者在內，餘均散去。留者被帶至校長會客室（時校長為錢介磐，當時亦不知其屬於何黨，不在室中）。俄頃，一教官持二疊簡單表格自內室出，逐一問曰：「你是CP，還是CY？」有答為CP者，即交一種表令填，有答為CY者，則交另一種表令填。至著者，答以「我不是CP，也不是CY」，該教官色變，立即轉入內室，似有數人商談，俄，另一人出，問著者之姓名，籍貫等，均照實作答，俄又一人出，再問，又再答，此時忽有一同學厲色叱問：「你既不是CP、CY，為甚麼跑進來？」著者答：「我是點名叫進來的，並不是自己跑進來的。」其時該「又一人」即制止該同學發問，旋亦入

內室，約十分鐘，著者在外室，十日所視，頗不自安，最後，被召入內室，一文職人員（似為政治指導員及黨代表之類）向著者客氣的解釋，因報告者弄錯，致有此事。著者當即表示：現在國共兩黨合作，共同從事革命工作，今日之事，何足介意。指導員略加「訓話」，希望著者作一國民黨左派云云，即獲退出。著者自是始知其內幕一斑，即頗具戒心，惟在校期間，亦未遭明顯歧視。

黨校中，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並重。軍事編制系統已不能完全記憶，學生二百餘人，似編為大隊——區隊——分隊，其後又加一總隊長，患肺病，似係給以名義，藉資休養者。區隊以上隊長時有異動。其間，有一黃埔軍校學生來任區隊長。不數日，早起忽停止上操，再越一二日，區隊長易人，同學中傳稱：區隊長為國民黨，分隊長為共產黨，後者不服從指揮，迫使前者不得不離職。

黨校課程有三民主義，而學生等較熱心於學習共產主義，當時所用課本為布哈林之「共產主義ABC」，其時布氏正與史達林一致，打擊托洛斯基，布氏尚未遭整肅，故其書通行一時。此外為如何作工運、農運、婦運等等，大抵只是工作技術訓練，不必多求知識。

授課者有董必武、鄧初民（國民黨湖北省黨部青年部長）、高語罕、郭樹勛等。

大約在五、六月間，武漢經濟甚為紊亂，物資缺乏，幣值日跌，著者以之間董，董答：因為帝國主義封鎖武漢，以致於此。董並謂：目前各地實行檢查行李，如漢陽門進出行李均須檢查，亦因有帝國主義及反動份子存在之故。當時共產黨一切困難均歸咎於帝國主義及反動份子，而不能說明其故，並不能使問者釋疑。

在上課時，不止聽到一次論及中國革命是「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至今始知其出於十五年十二月國際七中全會「中國問題決議案」。（見第八章第三節。）

不止一次，政治指導員在總理紀念週席上講話，其所講者，即星期一中央日報之「我們和世界」時事彙論中的文章。中央日報為一中型報紙，日出五張（星期日減少二張），該報由顧孟餘主持，顧時任中央宣傳部長。撰述社論者有陳啓修、郭沫若等，陳、郭其時皆非共產黨。

入校以前，即有反蔣、迎汪空氣，並有「打倒昏庸老朽的張靜江」口號，當時亦不知張爲何如人。在黨校中，治政指導員指蔣先生是一個英雄，而不是一個革命者。反蔣空氣之漸趨濃厚似在徐謙反駁蔣先生指徐謙才是黨的獨裁者一文之後。（蔣先生有「駁斥武漢聯席會議之演詞」，見第六章第三節。）自三月起，各處高唱反蔣歌，套用當時流行之「蘇武牧羊」譜，甚易上口，但歌句有不通者，如「去年三月日，揭破假面具」，當係指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又有「整理黨務案，膽敢叛總理，一到江西省，黨部又搗毀」等語，凡此事實，著者及一般高唱者實一無所知，中共亦並不加以解釋。

國民革命軍初到武漢時，通行「打倒列強，除軍閥」之歌，其後即盛行「國際歌」，「少年先鋒隊」歌，及反蔣歌。在反蔣聲中，青年們常被編隊出發演講，黨校當然不能例外，每至茶館酒肆，聽衆見宣傳員到後，毫無表情，間或予以諷刺，不待曲終，而人已散矣。

當時有若干口號，著者頗覺新奇，而不甚瞭解，如「反對法西斯蒂」，「反對狄克推多」等；另外，則「擁護總理三大政策——聯俄、聯共、農工」，及「以赤色恐怖答復白色恐怖」，亦使人印象甚深。關於三大政策口號，轟動一時，無人知其出於何經何典。汪兆銘似亦贊成三大政策，猶記漢口有一標語台，高約二丈，懸白布黑字鉅大標語，上書「汪主席說：總理的農工政策，不是爲農工而革命，而是農工自己起來革命！」（大意如此。）實則翻遍中山全書及國民黨文件，亦無「三大政策」之說，完全爲鮑羅庭及中共所捏造。

在某次羣衆大會台上，有「以赤色恐怖答復白色恐怖」鉅幅標語，並附一血色圖，視之令人毛骨聳然。當時頗使著者獲得一種印象，武漢之鬼哭神號的氣象，實令人恐怖，而會上所宣傳之「反動份子」之「白色恐怖」，似更可怕。在此次大會上，台上人演說稱：土豪劣紳殺了多少農民，農民則殺了多少土豪劣紳，農民之被殺者遠較土豪劣紳之被殺者爲多，台上人因問道：「爲甚麼只准土豪劣紳殺農民，而不准農民殺土豪劣紳？」

汪兆銘至武漢時，著者曾參加迎汪大會，又有一次大會，汪亦出席講話，着重反蔣，汪提及武漢被下游封鎖，醫藥缺乏，至傷兵消毒無藥，而不得不用鹽水替代，其意欲藉以激怒軍人。是次演講之結語稱：「打倒張作霖，克復北京！」

打倒○○○，克復南京！」

關於南京清黨事，著者當時亦一無所知。

當初入黨校，口試時，被問及：「假使將來討伐張作霖，需要你參加作戰時，你是否願意去？」答：「願意」。實則入黨校者無人願意作戰——願意作戰者可入軍官學校，而不會入黨校。迨五月中旬，夏斗寅出兵進攻武漢，迫近紙坊，黨校亦陷入恐慌之中。某日，學生被集合於操場，由指導員報告，希望同學參加軍隊，與夏斗寅作戰。並稱：當你們入校時，你們都願意為打倒張作霖而作戰，於今需要你們參加軍隊打夏斗寅，其意義正與打張作霖相同。但仍聲明，參加與否，各憑志願，並不強迫。並令願參加者出隊，另集合一旁。當有數人應聲而出，其中一人，即以前某次晚點名，與著者同被喚至校長室，而向著者厲聲叱問之某同學。（現在想來，此即「黨團份子帶頭作用」。）接着，被一再鼓動，出隊者漸多，而終至絕大多數均出隊參加，著者亦與焉。旋被編隊離校至他處（忘其地），但亦未積極訓練。不久，事平，返校。後悉，夏軍被葉挺擊退，軍校學生亦被率作戰，有死傷者。

兩週以後之馬日事變，始終未對黨校公開，但自是之後，即有「農民運動過火」之論調。

自夏斗寅事件發生後，黨校實際上陷於停頓，一分隊長每日便衣外出，禁止衛兵向之敬禮，早出晚歸，亦不知其任務為何。

黨校提前結束，鄧初民來校講話，謂學生將分發各縣工作，將來可能有二「偽」省黨部出現，我們準備上山打游擊。其時，大約為七月，不久，武漢即實行分共。

武漢當局於四月十七日下「現金集中令」，即將各銀行現金四百萬元予以封存，不予兌現，以免現金逃亡，致中國、交通銀行之紙幣價格日跌，最低時，每五、六元始值銀元一枚。當時武漢更發行一種「國庫券」，其價格更低。銅元在市面絕跡，輔幣缺乏，購物不能找零，物資、糧食奇缺，商店多數關閉，市場一片蕭條。當局又曾發行一種公債，強迫派銷，值價幾等於零，債務人輒賤價購之以還債，債權人不敢拒絕，且夕之間，可致破產。（此項公債，武漢政權崩潰後，政府似曾還本付息。）

工人糾察隊之迫害資本家情形，如戴高帽遊街之惡作劇等，只得之耳聞，未獲親見。惟見糾察隊橫行一時，警察不能執行職務，武漢碼頭工人素極橫蠻，至是益肆行無忌，武昌漢陽門一帶只得由工人糾察出而維持秩序，着藍制服，臂纏布有「工人糾察隊」字樣，遇工人如黃包車夫等之不守秩序者，輒以警棍擊之。

至此，武漢之赤色恐怖，人人知其不能持久。

第二節 兩湖軍人之發難及其影響

自民國十五年四月南京實行清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革命之重心在南京，為全國人民希望所寄托。鄂、湘、贛雖尚在武漢政權控制之下，但赤色恐怖使人人自危，軍人尤為憤慨，於是兩湖軍人首先發難，江西響應，使武漢政權陷於狼狽周章之境。

壹 夏斗寅進攻武漢

駐守宜昌之鄂軍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得四川第二十軍軍長楊森之支持，班師東下，進襲武漢。

民國十六年五月六日，夏斗寅自宜昌出發；十三日，發出進攻武漢通電，首述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將士用命，民衆擁護，不數月而底定長江流域，繼稱共黨竊據要津，荼毒民衆，電文中於歷數鄂省共黨董用威（必武）、詹大悲等為禍湖北之後，因應將士、父老之要求，而「班師東下，撲滅諸獠。」電文如下：（註一）

夏斗寅之通電

（銜略）概自北伐軍興，不數月而武漢底定，長江流域漸次肅清，成功之速，罕有其儔，推其故雖在我將士之一致效命，亦是我民衆之擁護維殷，故得以合作之精神，收事半功倍之功效。而民衆之所以如此擁護之者，蓋久受軍閥淫威之摧殘，帝國經濟之壓迫，而希冀我

北伐軍爲之謀解放、求平等。而我北伐軍之昭示於民衆者，亦是曰爲民衆謀解放，爲國際求平等而已。不料軍事日益發展，而共產黨徒乘機竊發，盤踞要津，藉口總理容共，而喧賓奪主，以暴民政治擾亂我兩湖。斗寅等以耳目所及，僅就我鄂人所受之痛苦言之：我鄂久處軍閥鐵蹄之下，民衆憔悴於虐政者已非一日，望治之殷，百倍於他省。當局者苟措置有方，因勢利導，飢而飽之，渴而飲之，收效之速，將如響斯應。而共產黨徒董用威、徐謙、鄧演達、董大悲、張國恩、李漢俊輩，一般宵小之徒，把持政柄，操縱時機，以法律賦予威權，爲私人報恩報怨之具，不悉官吏爲何物，政治爲何事，謬托邪說，貪贖敗常，舉凡軍閥所不敢爲之箝制輿論，而悍然爲之，軍閥所不忍行之苛稅細捐，而毅然行之，繼奸偷橫行市場以害商，教流痞擾亂閭閻以病民，誅鋤非種，強姦民意，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文其奸號於人曰：「提高黨權，一切權力屬於黨。」所謂提高黨權者，不過提高若輩宵小之權，所謂權力屬於黨者，亦是以前所有權力屬之若輩宵小之手。路人側目，敢怒而不敢言，故數月間，商歎於市，農怨於野，百業蕭條，游民日衆，四境騷動，皇皇然如不可終日。本謀解放，反加之以痛苦，本求平等，反益之以不平，此誠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變，而爲我北伐軍始願所不及也。夫一省大器也，省政大事也，秉省政以平治一省，談何容易！非有幹濟之才，不足以應變，非有遠到之識，不可以因時，而若輩二三宵小，才不及中人，識不踰臧獲，一登舞台，醜態百出，以國家爲試驗之場，以民衆爲玩弄之具，天地之大，山川之高遠，皆冥然罔覺，言念及此，良用痛心！斗寅等寄跡隣封，十有餘稔，每撫劍而咨嗟，望故鄉而出涕，去歲隨軍北伐，江漢波平，私心慶幸。以爲所以慰初衷者在此，所以慰父老昆季之望者亦在此。但軍人干政，素厭其非，豈至此時，胡忍躬蹈！故當時急率所部，以赴疆場，對於政治絕無譏評。其期若輩者不爲不殷，待若輩者不爲不厚。而若輩倒行逆施，竟至此極，不獨影響我北伐大計，而我將士我父老昆季之環泣於斗寅等之左右者，亦幾戶限爲穿，如再因循，勢必至水益深而火益熱，而北伐終不竣功，軍閥終難消滅。斗寅等處此，忍無可忍，只有率我將士，爲民請命，班師東下，撲殺諸獠，去此害馬，重建新政，繼續北伐，以竣初功。不然，豈惟無以謝我父老昆季，亦無以對我北伐將士也。抑尤有進者，革命因時勢而勃興，政治亦必因時而制宜，期於平淡易行，不可縱言高論。三民主義爲先總理心血之結晶，亦舉世所公認爲救時之良劑，此後設施自應以此爲鵠，此爲鋤奸之餘，尤願與國人努力遵行者也。倚馬陳詞，諸希公鑒！國民革命軍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將領萬耀煌等率全體官兵同叩。元（十三）印。

夏斗寅軍於十八日即攻抵武昌附近之紙坊，武漢震動，謠言紛起，紙幣停滯，發生米荒，民衆紛紛搬家，甚至軍官以及機關人員亦遷入漢口租界躲避。武漢革命軍，除共黨葉挺等外，均呈不穩之勢。據當時湖北一密秘組織向南京中央

所提報告稱：（註二）

「武漢軍隊，除葉挺一師及獨立師外，餘皆反赤。何健本與夏師商定內外夾攻，後因何部赴豫攻奉，夏師支援。十五軍（按：劉佐龍部），八軍（按：李品仙部）本欲響應，迨楊森軍到仙桃鎮，又以楊與于學忠、張聯陞等軍困難與合作，決先驅楊，後討赤」。

夏軍孤軍進攻，爲葉挺所指揮之二十四師及獨立師所擊退，穿過赤區，進入皖西。夏軍討赤雖未成功，然予兩湖反共軍民以甚大鼓勵。

貳 馬日事變

至五月二十一日，而有長沙「馬日事變」。

時夏軍正集結在武長路之咸寧，切斷武漢到長沙交通，事變前，長沙謠言紛起，據逃出的一名共黨份子向武漢當局報告：「（五月）十七日，湖南方面謠言大起，有謂武漢已爲夏斗寅襲取者；有謂武漢已爲夏斗寅包圍者，政府、黨部、工會、農會都被打倒者；有謂湖南不日將被包圍者。謠言繁興，莫衷一是。十九、二十兩日，謠言仍未稍殺。二十一日，至（晚）十一時許，忽有軍隊擁擠，當街架設機關槍，俄而槍聲大作，喊殺連天，直至天明，方始休息。」

關於馬日事變之起因及經過，據當時當事人許克祥之自述，節錄如下：（註三）

馬日事變（節錄）

許克祥

大概是民國十五年冬季，現在當權的匪酋毛澤東，到了湖南，觀察農民運動。走遍了十多個縣，對農民協會作了一番煽動。他利用了四業不居的流氓地痞，作爲破壞舊社會秩序的工具。他大聲疾呼的說：「流氓地痞是革命的急先鋒！」，如是把湖南各縣的農村，真是鬧得烏煙瘴氣。打土豪，吃排飯。說起來令人好笑，在每一個鄉村，找到一兩個有錢的，認爲是「土豪」（當時不叫地主），糾合、威脅羣衆，把他捆綁，戴着高帽子，上面寫着「土豪×××」遊行示衆，邊走邊打，還強迫被遊行者自罵自喊。認爲重大的，遊行後即予處死。然後擁到其家，殺豬宰牲，名爲「吃排飯」。農民協會爲鄉縣的權威機構，可以受理司法訴訟。各縣政府和司法機關，也奈何他們不得。動輒發動許多人包圍衙門。毛澤東得意洋洋，稱爲是「農民革命」成功了。在他的「農業考察報告」裡說：「有人說農民運

動極了，我說是好極了」。

每縣都有總工會，有商民協會，有女界聯合會，有勞動童子團等項組織。其性質雖各不相同，糟的程度却差不多。總工會是專對廠家的，商民協會是對店主的。無理要求，稍一不遂，也就是捆綁遊街，罰款。女界聯合會以推翻男人壓迫為口號。實際上是打破盞恥。有的婦女當衆脫下褲子落在肩上，似表示前進。勞動童子團則專找穿着好的人的麻煩，暗中帶着剪子，或雙手弄得骯髒，穿長衣的則剪去一截，穿白衣的則弄得烏黑，使被害的人啼笑皆非。

到民國十六年春間，變更本加厲了，所謂「農民協會」都組織了「農民自衛軍」，「總工會」也組織了「工人糾察隊」。這些是共匪準備用武力奪取政權的表示。當時的民話說：「巴巴頭，萬萬歲，鴛鴦婆，要槍斃，男女學生一頭睡，養出兒子叫糾察隊。」長沙市為湖南省會，弄得商店關門，民不聊生。當時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只掛上一個空銜，本人在湖北，湖南省政由其參謀長張翼鵬代行。唐本人投機取巧，與共產匪徒勾搭，互相利用。湖南省的匪黨首要人物如郭亮、夏曦、易禮容、謝覺哉、譚影竹、凌炳、熊亨漢等，把持省政，為所欲為。如在左民、財、建、教四廳以外，已決定成立「土地廳」，並派李榮楨為「廳長」，大有提前以非常手段解決土地問題的企圖。各縣被害的多逃到長沙、漢口等較大城市。有些縣如耒陽、湘鄉、衡山受害最慘。到處殺人、放火，若干軍官家屬，亦遭慘劫，軍隊具有同仇敵愾的心理。

當時湖南的情況，實屬萬分惡劣。現在台灣的若干湖南人，猶具有沉痛的記憶……。

我和當時駐在長沙的袍澤，決心反共是必然的。可是選擇在馬日這一天，那就是偶然的了。我當時擔任第三十三團團長，長沙的防務由我負責，雖是駐在岳陽、湘陰還有兩個團的友軍，實力還是相當薄弱。匪黨所能指揮的糾察隊，自衛軍大約有三千人左右，絕大部份沒有槍枝，都是用木棍、梭標做武器。我對這班烏合之衆，沒有看左眼裡。

事情真是那末湊巧，我在心裡暗暗估計實力的時候，得到一個非常真實的情報，就是匪黨決定在長沙定期舉事，因為牠們要先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以對抗國民黨中央。所用的方法是首先在長沙「大暴動」，剷除國民黨員，造成清一色的「赤色政權」，然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湖南各縣同時「暴動」。時間大致是決定五月二十五日。（著者按：應為三十一日，見下文。）

這樣一個非常機密的情報，非常偶然的得到。記得是五月二十日，我太太從外面跑回來，已經是深夜了，她告訴我從一個朋友家裡——她的朋友就是當時匪黨湖南負責之一的王基永的太太——得到了這個消息。她很發愁，憂慮長沙無辜的老百姓，真的會遭此大劫了。她是一個真誠的佛教徒。

我聽得這個消息，考慮了一個半夜，深深知道「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的古訓，我爲着防務的責任，爲着挽救長沙市民的責任，爲着救黨的責任，因而不計任何禍福，決定「先下手爲強」了。二十一日作了些部署，對幾個親信營長授了些機宜，就在那天深夜十一時左右，把長沙省總工會，省農會和匪黨盤踞的機關、學校，來一個大清除，計共二十多處，分別把首要份子拘捕。一直到天亮，將「赤色恐怖」籠罩的長沙，給我吹散了……。

馬日事變，在長沙所有之中共機關悉被摧毀，中共份子幾悉被逮捕或處決，農民運動領袖之一郭亮不久亦被補處死。湖南各縣政府機關、軍隊及民衆，平日無不痛恨共黨，一聞長沙事變，亦羣起而摧毀中共機關及黨徒，湖南共黨勢力，剷於一旦。青年學生之附和中共而被殺者亦不少。

湖南農民運動飛揚一時，中共與第三國際常引以自豪。民國十六年二月毛澤東在其「湖南農運考察報告」中，謂湖南有組織農民二百萬，能指揮羣衆一千萬。凌炳在四月向武漢國民黨中央報告，說湖南有組織農民五百萬，代表農民二千萬。林祖涵五月二日報告：有組織農民六百萬，但轉瞬之間，煙消雲散。據孫科七月十五日分共時在武漢中央報告：

「他們口裡嚷着湖南有兩百萬的農民起來了。起是起來了，但一下子就被軍隊壓下去了，而且打破了聯合戰線，鬧出很大的亂子。不但沒有新的政治經濟的組織，連原有的舊組織也被破壞無餘。農民起來不到兩三個月，湖南全省的稅收就弄得乾乾淨淨，不但資產階級不能立足，就是稍爲有幾畝田，有一碗飯吃的人也站不住。這種革命，除了C P同志之外，是多數人所反對的。所以湖南上次的事變發生，大家都舉手加額，喊許克祥爲許青天，視許克祥爲救主，可以見民心之嚮背了。再，他們閉口閉口就是幾百萬幾千萬的農民起來了，其實全是假的」。

馬日事變雖由許克祥發動，而實得到一般軍人之支持，三十五軍軍長何鍵事後會稱當時已予同意。中共亦斷不敢提出討伐或懲辦克祥之要求，且農民協會之橫行無忌，觸犯衆怒，中共亦無法辯護，乃將一切責任推之於哥老會身上，要求唐生智回湘處理。當時鮑羅庭認爲：「現在國民黨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什麼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我們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蔡和森）

機會主義史。」結果由毛澤東出面與「左派」協議一項解決辦法。據汪精衛六月十三日在武漢政委會報告：

「剛才在軍事委員會同程潛、唐生智、譚延闓、毛澤東諸同志的討論，來綜合報告一下：這次的事變，毛澤東同志說得很詳細，農民協會確有擾害軍人家屬的舉動。但自五月二十一日那天晚上，則是軍隊向農民進攻，農民協會爲自衛而抵抗，並不是農民協會搶軍隊的槍械。至於農民協會爲什麼要擾害軍人的家屬呢？從前不曾調查清楚。據毛澤東同志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有哥老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只曉得作殺人放火的勾當。……討論的結果，是對於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決，免得引起糾紛。唐生智同志並願意親自到長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實行改組農民協會及農政部所提出之鄉村自治條例等計劃。毛澤東同志也承認不用武力的辦法是對的。」

馬日事變後一年，共方有一文追述當日情況，雖多曲筆，然亦道出若干真相，最重要者爲中共計劃於五月三十一日攻取長沙，轉錄於下：

馬日事變的回憶

直 荀

現在略述馬日事變前後湖南的情形。

一九二七年春季的湖南，的確是一個革命的湖南。當時不獨農民紛紛的起來，有組織、有農協會員冊可查的計五百十八萬，能影響的人數在千萬以上；即不脫行會性質，最難組織的手工業工人，也一律組織起來了。城市中的工會，鄉村中的農民協會，簡直是當時第二政府，政府的命令非經過工、農兩會，簡直無法執行。他們的工作就是向豪紳資產階級及一切封建勢力宣戰。省縣之特別法庭乃大形忙碌，然而殺人並不多，五月之久經省特別法庭判決執行死刑者還不到二十人。其餘多半是判徒刑或罰金。而民衆自己動手懲辦的爲數更少，不過湘潭之晏容秋等二三人而已。而在當時一班封建餘孽，豪紳領袖，却沒有損壞他們毫末，最大原因就是他們多半是所謂革命軍人的家屬，服從當時所謂革命紀律，沒有去動。

這種反對建勢力豪紳資產階級的工作，撼動了代表封建勢力豪紳資產階級的軍人。熊震，當他衛戍長沙的時候，表示很左，及開到辰州，聽說他的岳父被農民捉了避鄉，勃然大怒，而開始極端的反工農運動。譚延闓聽說農民要他的女婿（長沙大資產階級朱雨田嫡孫）

捐款，也連電託人說情。而何鍵、葉琪更是自始至終的反對工農運動，開到常德時即開始屠殺農民。其他土匪編成的國民革命軍，如依縣之羅定、寶慶之王錫勳，更無論矣。當時最足撼動一班豪紳，使之震懾的，就是在長沙省城槍決全國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葉德輝（著者按：葉德輝爲湖南名士，不滿意於中共之農民協會。當某次農民協會開會時，葉送一對聯云：「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鷄犬豕，都是畜生。」此事，湖南人類能言之。）當葉被槍決後，一班土豪劣紳大爲震動，紛紛投入軍隊，而袁家普、曹典球一班人都投到反動最力的何鍵部下充參議長和秘書長了。同時他們開始向軍士反宣傳：說怎樣的兵士六個月不回家，老婆要離婚另嫁；兵士寄回家的餉銀全被農協會沒收了；鄉中的田全被瓜分了，兵士退伍後將沒有田耕呵。據鄧演達說，他們竟刻了許多省農民協會的圖章，將兵士寄回家的餉銀，全部沒收，而將圖章蓋在上面，說道是被農協會沒收了。總之，他們用盡了卑劣惡濁、陰險狠毒的手段，以造成這反動的局面。而民衆方面，對於本身利益的要求，急轉直下，日益迫切，農民則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工人則要求增加工資。在城市他們只認得工會是爲他們謀利益的機關；在鄉村就只有農協。國民黨在羣衆當中始終沒有發生影響，湖南農民自看到國民黨三個字起就認定它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有錢的入國民，無錢的入農民」，這是他們對於國民黨深切的認識。

而我們自己呢？當時實處在一種矛盾的狀態中。既要與一切封建勢力土豪劣紳資產階級宣戰，而在另一方面又要與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合作，又要與封建餘孽、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大小新軍閥，講親善，謀妥協。對農工的要求，則制止工農自己動手來解決，而要他們等待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命令。這豈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樣的無期嗎？

而客觀的環境，一天一天的險惡，蔣介石、李濟深相繼在上海，廣州屠殺工農了。夏斗寅叛變了，何鍵反工農的空氣一天一天的高了。忽然接了一個報告，說臨湘縣農民協會委員長李中和被前次爲民衆拘捕而爲劉嶽峙所保釋的團防局長龔仙俠所殺，凌遲處死，剖心剖腹，備極殘酷。五月二十日晚益陽農民協會委員長廖貫一來省報告，則何鍵之下已於前一日將益陽縣工會、農協佔據，農民自衛軍及工人糾察隊均被繳械。空氣更緊張，更險惡，許逆克祥於五月二十一日夜十時許正式圍攻省總工會和省農民協會及該兩會之一切附屬機關。

事變之前，我們知道事變之將到，原有一個反攻的計劃。但是當時的共產黨雖則組織尚好，但只是一個太平時代的黨，沒有鬥爭的經驗，不能應付這個鬥爭的環境，而只是一個反攻，不是知道事變將至，取積極進攻的計劃。因此事變臨頭，手忙足亂，一切計劃全歸失敗。僅有長沙附近數縣有一個於五月三十一日進攻長沙的計劃，同時屯駐了萬餘工農義勇隊於湘潭附近三十里的姜畬地方，但因沒有適當的指揮人才，結果是被敵人各個的擊破。而約定進攻長沙的各處工農義勇隊，因爲在省方的負責人不知道武漢方面的實際情況，又

聽說國民黨中央派人來湖南調查和解釋誤會，以爲不可舉動，破了面子，將來難於收拾，中途改變方針，叫他們停止出發。當時因發信太遲，瀏陽的部隊已經出發，因此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瀏陽工農軍單獨進撲長沙的壯舉，雖則失敗，然而這次英勇的鬥爭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這次起義事件失敗的總原因可說是中了機會主義的毒。當時曾用省農協臨時辦事處的名義，發了一個告全省農民書，主張沒收地主的土地，主張鎮壓土豪劣紳。雖有這個紙上的空言，然而不能堅決的執行，一則專注意於攻城等軍事行動，而沒有注意到這種根本的工作，一則雖主張普遍的沒收土地分給農民（上面沒有提出沒收一百畝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等口號），然而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使農民無從下手；雖則主張鎮壓土豪劣紳，但是當時的農民還沒有受過馬日事變後的大清鄉大屠殺，以爲這種舉動未免太過火了，不忍動手；雖則發展了廣大的民衆，各縣都有好幾萬人集中，一切糧食都是由各地徵發得來的，即未集中的，也在本地担任戒嚴的工作，然而沒有好的組織，好的指揮，尤其是沒有武裝起義的經驗，結果是失敗。

失敗後第一個犧牲者就是我們英勇的戰士湘潭縣工會的委員長楊昭植同志。楊同志的死，是在豪紳資產階級殘酷的野蠻的死法中死去的，同時被犧牲者是在湘潭任農運工作的柳季剛同志及一位女同志。

湘潭起義雖然失敗，然而各縣仍繼續起義。而當時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尙抱一種幻想，致不願公然採取起義政策。郭亮同志以千餘言的長信，請求在鄉間組織游擊隊，實行打倒土豪劣紳和沒收土地，但被阻止。

（原載「布爾什維克」第二十期，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叁 江西「歡送共產黨」

馬日事變發生後，迅即引起江西方面軍人之共鳴。由於軍人家屬受農民協會之迫害，離心離德，迫使江西主席兼第三軍軍長朱培德，於五月二十七日查封共黨在南昌之「三民日報」，二十九日，遣送政工人員一百四十二名出境，南昌市並出現「歡送共產黨」標語，六月五日，停止江西農工活動，婉勸共黨份子方志敏等二十二入離贛。此事起因，據陳其瑗六月十三日向武漢國民黨中央報告：

「關於朱培德同志遣散政治工作及省市黨部並農工團體各人員出境的行動……遠因就是第三軍開到下游之後，據政治工作人員報告：

第九師師長曾萬鍾有受蔣介石運動的嫌疑，朱同志就將會萬鍾換了，另補楊池生爲第九師師長，朱同志因此覺得軍隊中起了分化，心裡很是不安；同時，軍隊中的武裝同志和政治工作人員也就起了彼此不相容的隔膜。至於近因，則是受了長沙事變的影響。到了六月四日，朱同志就開出一張二十二個人的名單，派蕭炳章、姜濟寰兩同志去對他們講：要他們暫時離開江西。第二天早晨，其瑛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去見朱同志，問他爲什麼要這樣作？朱同志說他現在所處的地位很苦，軍隊中沒有統一的意志，如何能作戰？往往有軍隊中的武裝同志問他：究竟是爲國民黨作戰？還是爲共產黨作戰？他也不能答覆。那幾天要向贛南開兵，很有不少的軍官告假。因爲賴世璜有電說他的家被抄，士兵們也說他們的餉寄回湖南爲農民協會所扣。所以弄得軍心渙散，士無鬥志。朱同志說，他曾對部下說過只反對激烈份子，不反對本黨政策……仍然是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如再要過份的舉動，他自己可以走開，讓他們幹……朱同志自己說，在前十天他簡直想掛冠而去，現在軍心稍安，他心中也較寧靜。……朱同志爲人很忠實，這次的事件，是他苦心孤詣在爲大局着想。不然，江西會鬧得像長沙一樣，希望中央對於他能够原諒。」

肆 武漢當局之周章

第一 鮑羅庭之五項退却策略

中共與所領導之工運，鬧得無法無天，使工商倒閉，貿易停頓，受其害者，除武漢人民外，武漢政權亦首當其衝，其所面臨者爲政權無法行使，社會秩序不能維持，物資供應異常缺乏，財政收入亦告枯竭。縱有俄援，亦無濟於事。其在外商方面，由於工人不斷罷工，並提出難以接受之要求，只得出於停業之一途，結果亦徒然造成交通停頓，供應缺乏及失業。俄共與中共作法自斃，不得已，乃由鮑羅庭提出「退却」路線於先，汪兆銘發出糾正命令於後，以期能挽救危局。

鮑羅庭於四月二十日在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上提出「外交退却報告」。(註四)

鮑羅庭所提五項辦法：

(一)政府與工會人員合組一委員會，其目的在執行工人中之革命紀律，同時由工會組織裁判所，審判並處罰違犯革命紀律的工人。

(二)由政府與外國銀行、商店協商，使他們在湘、鄂、贛、皖南、豫南，西至於萬縣等處都可以公開的貿易。並由政府與工會代表組織委員會，執行政府與外國銀行、商店所定之協商。此委員有調用糾察隊與武裝勢力之權。

(三)除得第二項所規定之委員會同意外，外國銀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罷工。

(四)政府應盡可能的力量，迅速規定銅元及一切必需品之最高價格。

(五)立刻設立失業局與失業者飯堂。

除這五條之外，還提議財政部要撥三萬元之銅元與總工會，使一般工友可以按鈔票停兌以前之兌價換取銅元，惟每人一次所換數目應有一個限制。

是項提案，由當時任會議主席顧孟餘報告後，並由鮑羅庭加以說明，稱之為「戰略的退却」。此項說明可以視為四月至七月武漢政權對外及對工人策略之總方針，雖未能挽救武漢政權之危機，但中共政策確自爾時起有所轉變。

鮑羅庭稱：「自從漢口中外交通斷絕以來，失業工人的數目逐日增加，建築工人失業的有四萬，磚瓦製造的有兩萬，因為來往船隻一天比一天少，碼頭工人失業的也很多。據外交部接外國商人報告，說他們運貨來時常被規掠，都是失業工人所作的事。工人失業者既是這樣多，銅元的價格又飛漲不已，所以工人的生活實是困苦萬分。」

鮑羅庭並提及以三萬銅元救濟工人，與上海接洽匯兌以便利商人。所提報告，雖不離對於反帝政策之退却，而其中心為限制工會，挽救經濟危機。

鮑羅庭之退却策略，就著者當時所親歷其境，並未收到豫期效果，工人氣餒似未降低，經濟狀況反愈演愈壞。而僅二十餘日，即有夏斗寅之變。

第二 武漢中央之六道右傾命令

以汪兆銘為首之武漢政權，一面要與中共「合作」，一面要予羣起反共之軍民以撫慰，於是遵循鮑羅庭之退却策略，以右傾姿態作應付之計。

夏斗寅發出班師通電之日，兆銘發表演講，於指陳現金集中政策之收穫及流弊後，指斥各地羣衆在「取消苛捐雜稅」

口號之下，嚴逐收稅官吏，妨害財政收入；工人、店員與東家鬥爭，商人紛紛歇業，亦影響財政非常重大；並謂外商亦不應抵制，尤強調工人不可隨便要求管理工廠，以免蹈俄國十月革命之覆轍。

夏斗寅起兵後，武漢「中央黨部」連日下三道命令（註五）。第一道，嚴令各級黨部及政府，行動不得越出中央決議以外，以保民衆正當利益；第二道，嚴令各級黨部制止農民不得侵犯他人身體、財產、職業、信仰之自由；第三道，嚴令各級政府保護工商業者。此三道命令原文如下：

(一)本黨領導全國民衆致力國民革命，一切方策皆由中央根據總理所定三民主義及方略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按照時勢，製成議案，經詳細之討論，鄭重之決議，然後頒布執行。各級黨部對於中央決議案必須盡力宣傳，使民衆明瞭，各級政府機關對於中央決議案，尤須切實奉行，無稍參差，然後本黨一切方略，始能施行無礙，然後本黨始能領導全國民衆，致力國民革命，而底於成功。根據最近各方面所得報告，有足使中央深切注意者：各級黨部暨各級政府機關，對於中央決議案，未能充分努力使之一一實現無憾，各種民衆運動往往於中央決議案有所出入，甚者躐等，尤甚者或至背馳。如此則本黨領導全國民衆之作用，未能活潑，而國民革命之進行，未能整齊其步伐，以同趨於一定之目的。中央爲矯正此種現象計，已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親赴各地指導各級黨部暨各級政府機關，切實執行中央決議。凡民衆獲得之正當利益，必加以保障，而越軌之行動，亦必加以制裁。必使民衆真能明瞭革命之目的，真能因革命而獲得利益，解除痛苦，然後中央之責任始盡。爲此訓令各級黨部及各級政府機關，一致努力，是爲至要！此令。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二)本黨所提倡之農民運動，在使農民脫離多年之壓迫，而改良其生活。土豪劣紳特剝削農民，壓迫農民以爲生，妨礙農民之解放，故爲本黨所棄絕。但剝削農民與壓迫農民必須行跡顯著，證據確鑿者，始得交由法定機關依法懲辦。至鄉里公正及富裕之戶不反對國民革命者，皆在國民政府保護之列。本黨黨員應切實指導民衆，不得濫施攻擊，侵犯他人身體、財產、職業、信仰之自由。其有藉端擾亂，破壞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損於革命之利益，即無異反革命，應由各地黨部隨時制裁，是爲至要！此令。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三)農民、工人、工商業者爲中國國民革命主要之成分，亦爲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之親擊同盟者。工商業者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內受軍閥之壓迫，苟非參加國民革命，與工農、共同奮鬥，則必淪爲破產而底於滅亡；反之，農民、工人對於工商業者加以嫉視，迫害，則必足以自殺，而陷革命於必敗之地。中國國民革命既以農民、工人及工商業者爲革命之主要成份，其所採取之政策，不獨使工商業者與農、工同時獲得痛苦之解放，生命財產之安全，並期望此同盟戰線日益鞏固，促我國國民革命之成功，使中國全民族獲得最後之自由平等。

所以中國國民革命之能否成功，要視工商業者之能否擁護國民革命爲斷；工商業者之能否擁護國民革命，又視農、工羣衆是否明瞭工商業者爲其親摯之同盟者爲斷。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來，底定武漢，略平東南，農、工運動，已有相當之發展組織。但長江流域之農、工團體，以突飛進展之故，幼稚之病潛然不自覺而發生，忽視國民革命整個之前途，更忽視共同作戰之工商業者之同盟，如農、工團體每昧於社會經濟之觀察，常對僱主提高度之要求，甚或以武裝糾察，封閉廠店，強迫僱主行不可能之條件，遂使工商業者，以爲本身出於政府保護之外，財產身體皆失自由，不獨以國民革命非爲人民謀利益，反以國民革命爲害人民之安全，於是脫離國民革命之戰線，對於其革命同盟之農、工亦深惡痛絕。此種不幸之結果，不但使農、工孤立，入於自殺之途，更使國民革命之基礎，日益搖動，或因而失敗。本黨領導國民革命，不能坐視革命之功效垂成，不能使農、工立於孤軍自鬥之地位，而不予以深切之指導，更不能膜視革命同盟之工商業者之利益，而不予以充分之保護。務使農、工與工商業者同盟戰線永不分離，更使農、工與工商業者在革命期間獲得一致之利益。茲爲實行此種政策，特令國民政府執行以下之決議：（一）制定勞務法，由勞工部及各省政府組織勞務仲裁機關，解決工人、廠主間及店員、店主間之各種衝突。（二）制定勞動法，對於工廠、商店分別規定工作時間，並按當地生活情形，規定工資之數目，及工人之養老金暨各種勞動保險。（三）制止工人及店員之過度要求，並禁止其干涉廠、店中之管理。另由總工會與商民協會組織特種委員會，審查工人、店員之要求條件，並加以相當制限。（四）工會或糾察隊對於店主或廠主有恐嚇、罰款及擅自逮捕，或用其他壓迫方式者，一律嚴禁。勞、資兩方有痛苦者，須陳訴於仲裁機關解決之。（五）外人在華經營工商業者，應由外交當局根據上列四項之原則辦理。右之決議，爲本黨鞏固國民革命同盟戰線之政策，凡屬本黨黨員應明瞭本黨之主張，並以不遲疑之態度，執行上項之決議。如有違反及不努力執行者，各級黨部應加最嚴厲之制裁。各級黨部不能領導民衆服從上項之決議，中央必予以相當之懲戒。凡我同志，務各體念中國國民革命之前途，努力奉行之！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著者按：此項命令發布時間在馬日事變後二日，其決定當在事前。）

馬日事變前後，武漢當局極力讓步，而首以求得唐生智之好感爲亟，乃復由「國民政府」連下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保護庵觀寺院（時唐生智提倡佛化），第二道命令，禁擅行逮捕及沒收財產，第三道命令，保護軍人田產，此三道命令原文如下：

（一）爲令飭事。信仰自由，法律所許，佛化流行中國已久，且東方被壓迫民族崇信佛化者，實佔多數，國民政府於天主基督教堂，尙

加保護，對於佛化院，豈容歧視！近聞各處，有假借佛寺院之事，著各該機關從嚴制止，並加意保護，合行令仰湖北省、市政府、武漢衛戍事宜武漢公安局，即便遵照。此令。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己) 凡逮捕人民，必須依以下手續：(一) 司法機關依法執行；(二) 管理武昌漢口衛戍事宜之武漢公安局，奉上級機關命令執行，及依其職務而執行；(三) 當場拿獲之現行犯。凡逮捕後必須交由政府之法定機關審訊，如有違背此規定者，政府必予以嚴厲之處分！此令。又凡不依「處分逆產條例」而擅行沒收人民財產者，政府當予以嚴厲之制裁，其為團體行動者，解散其團體，並對於負責之個人加以處罰。此令。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庚) 國民革命軍人，為國民革命從事奮鬥，其犧牲勞苦，實異尋常，中央現正設法改良士兵生活，並擬俟革命戰爭終了後，為一般出身窮苦之軍人編生計，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俾瞻養無缺。適來迭據報告，各處農民協會，往往有幼稚過當之舉動，或對於軍人家屬，加以擾害，或對於軍人財產土地，加以剝奪，此等舉動，施之良民，已屬忍心害理，為國法所不容，施之軍人，則更無異騷擾後方，搖動軍心，實可痛恨！著各省政府，分飭所屬各機關，一律嚴厲禁止此等舉動。凡軍人家屬之已被擾害者，務須安集撫慰；其財產土地已被沒收者，務須清查發還。以後無論何項團體，如有此等舉動，應即將該團體解散並拘捕負責人員，依法懲治，各處當局，如有知情不舉及挾同隱蔽情事，一經查覺，定必嚴懲不貸，其各慎之！此令。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註一) 「革命文獻」十六輯，總二八三至二八四頁。

(註二) 「新時代」二卷九期蔣永敬文。本節資料未註明來源者，均採自此文。

(註三) 「今日大陸」一四六期，民五十，國慶日出版。

(註四) 是次會議速記，原件藏黨史會。

(註五) 取材「國聞週報」四卷二十二期「武漢褪色記」，民十六、六、十二。

第三節 從鄭州會議到徐州會議

壹 馮玉祥之重振

寧漢分裂時，馮玉祥重振於西北，儼然處於舉足輕重之地位。

先是，民國十三年八月，二次奉直戰爭（參閱第四章第三節）後，馮玉祥與張作霖之勢力相接觸。玉祥欲取得天津之出海口，得俄使加拉罕之助，勾結奉系軍人郭松齡，教以倒戈故智，班師出關，攻作霖，爲日軍所阻，松齡敗死，而玉祥乘機取得天津。

吳佩孚怨玉祥之倒戈，張作霖怨玉祥之教其部屬倒戈，乃合以謀玉祥。十五年一月，兩軍聯合攻玉祥，玉祥軍退守南口，奉、直軍力攻數月，下之。時北伐軍已入湘，攻鄂，佩孚星夜揮軍南下，至汀泗橋，與北伐軍劇戰，敗績。玉祥退出南口，其軍駐張家口及甘肅等地，勢窮力蹙，乃再求援於俄。

十五年五月，玉祥至莫斯科，徐謙隨行，毛以亨以李大釗之介入馮幕，亦隨往。俄人諷玉祥等加入俄共，以亨阻之，玉祥亦自稱「決不作兒童帝」，但使人說史達林，願將來爲俄人驅日人出東北，史達林大悅，授以輕、重機槍二千餘挺，步槍二十萬枝，子彈二億發，大砲二百門，及鋼甲車、坦克車等，運至庫倫交玉祥，玉祥勢力大振。（註一）

玉祥歸國，九月十七日，五原誓師，以所部西北軍爲「國民軍」，集體加入國民黨，響應北伐。十六年一月，率所部自甘肅、綏遠進攻陝西，乃出潼關，攻河南，俘直魯軍二萬，四月克洛陽，五月克鄭州及開封。時武漢方面唐生智軍亦攻入河南，與馮軍會師。

同時，蔣總司令亦克徐州。隴海線無敵蹤。

馮玉祥於六月十日，與武漢方面之汪兆銘、譚延闓、唐生智、張發奎、徐謙、鮑羅庭及共黨于樹德等舉行鄭州會議。山西閻錫山亦有代表參加。汪、鮑等欲聯馮以反蔣，遂任玉祥爲豫陝甘三省政治分會主席及河南省政府主席。（註二）

鄭州會議後，武漢方面自以爲玉祥已入彀，即將入豫軍東調，高唱「東征」，而玉祥則唱「共同北伐」以給武漢，而派毛以亨至徐州洽開徐州會議。

貳 徐州會議

十九日，玉祥率衛隊五千，赴徐，會見蔣總司令於十八日自南京同來之胡漢民、蔡元培、李烈鈞、吳敬恆、李煜瀛、黃郛、何成濬、方本仁、陳立夫、及在徐州之李宗仁、白崇禧，尚有賀耀組；與玉祥同來者有李鳴鐘及毛以亨。

會議兩日結果，於二十一日公開發出馬電兩通：前一電由蔣、馮二人署名「誓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盡掃帝國主義之工具」，此所謂「工具」，當暗示中共在內；第二電由玉祥一人署名致武漢之汪兆銘、譚延闓，於指陳武漢方面之恐怖，「不良份子」之「殺人越貨」後，明確要求送鮑羅庭歸國，此則無異武漢政權之摧命符矣。

兩通電原文如下（註三）

徐州會議兩通電文

通電（一）：上海各報館轉全國同胞鑒：我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當辛亥之歲，遂覆滿清，創造中華民國，實為四百兆民族解放之基本。乃滿清之遺毒未除，帝制變形之軍閥遂起，自袁以來，外與帝國主義為緣，內則肆其荼毒，使我民罹火熱水深，十餘年於茲，民衆感其痛苦，亦即覺悟而奮興。我國民革命軍，爰繼續總理之遺志，應民衆之要求，誓師北伐。中正、玉祥偕吾同胞轉戰萬里，前此猶激一時之軍閥，已次第崩摧，惟帝國主義之工具，一日未盡除，即吾同志、同胞之責任一日不能去。茲當會師魯、豫，更益進行之際，謹掬誠悃為海內外告。中正、玉祥與數十萬將士為三民主義信徒，謹偕全國革命軍誓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凡有誘惑，在所不顧，凡有艱險，在所不避，凡有犧牲，在所不憚，必期盡掃帝國主義之工具，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而後已。武力為民衆之武力，成功即民衆之成功，惟我同胞同志實共鑒之。蔣中正、馮玉祥叩，馬（六月二十一日）發於徐州。

通電（二）：漢口汪精衛、譚組安諸兄公鑒：前在鄭州與諸兄分途晤談，綜合意見，以近日武漢情形，店員脅迫店主，職工脅迫店主，佃戶脅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紳」之標語，壓迫出征軍人之家庭，前方苦戰奮鬥之將士，不足以保護其在鄉之父兄，彼等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佈全國恐怖之毒。他如別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捲入地方黨部，擅行威權，殺人越貨，高級黨部屢加制止，竟敢充耳不聞，以致社會根本搖動，四民無一安寧。補救之方，鮑顧問已經解職，亟宜設法使鮑歸國，在武漢之國民政府委員，除顯出洋暫資休息者外，餘均可合而為一等語。玉祥遜聆之下，以為必須如此一致主張，方足以紓黨國前途之禍。抵徐後已盡情與各方諸同志，一一披陳，

而寧方同志聞之無不悲喜交集，一致歡迎。現在雙方處境之苦，業已完全了解，值此風雨飄搖之際，千鈞一髮之秋，既異地而同心，應通力而合作。敢請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宋（慶齡）、何（香凝）諸同志速決大計，早日實行。所有雙方對於個人有何意見，悉請完全化除。俾國民革命於最短期內得竣全功，救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完吾黨三民主義之業。國家安危，在此一決。況值革命勢力根基未固之候，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諸同志苟一念及先總理在天之靈，武裝同志歷來作戰，死者未埋，殘者傷者未愈，以及北方民衆，日呻吟宛轉於軍閥鐵蹄之下，必須集合吾黨全力，一致對外，庶我黨國不致淪胥以亡。孟瀟（唐生智）同志努力革命，祈即調集所部於鄭州，以與玉祥所部將士協力北伐，先定幽燕，實爲至幸。迫切陳詞，罔知顧忌，亟盼明教，不勝跂跂！弟馮玉祥叩馬印。

叁 何鍵之反共宣言

馬電兩通，顯然予武漢方面之反共者以更大鼓勵，原與馬日事變有關之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乃於同月二十九日發表一宣言，明白指出：所有湖南之一切暴行，不可諉爲工、農運動之幼稚，而「純係共產黨中暴徒之策略」；又指出布爾什維克之階級鬥爭，爲總理所不取；彼等「充作國民黨」，企圖造成「將來之大暴動」，因而要求中央與唐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此實爲半年以來武漢方面最激烈、最明確之反共文件。著者當時在武漢並不知有此一文件，自係爲中共與「左派」所嚴密封鎖。（馮玉祥馬電，當時亦被封鎖。）

何鍵宣言原文如下：

何鍵對官兵發表反共宣言（六月二十九日）

（民國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國聞週報」四卷二十九期。）

爲什麼要革命呢？曰，爲痛苦民衆求出路也。民衆因何而痛苦呢？曰，帝國主義之侵略，軍閥之橫暴，貪官污吏之搜括，土豪劣紳之剝削，皆所以陷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致民於不自由不平等地位者，不速爲之剷除，則痛苦之民，永無出路，此先總理之所以致力於國民革命也。今革命進展，由東南接於西北，帝國主義在華之勢力已動搖矣。軍閥如吳（佩孚）、如孫（傳芳）、如奉張（作霖）、如魯張（宗昌）已一敗再敗，氣息奄奄矣。各地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打倒亦已不少矣。而何以民衆之痛苦絲毫未減，且反加甚者，

豈革命之道路，理論上說得過，事實上行不通歟？曰，非也。吾將詳語其故。革命以喚起民衆為主，民衆中農、工佔大多數，故農運、工運，亦極重要。但民衆兩字，容易被人假借，農、工智識淺短，容易被人利用。就南湖的事實觀察，中央黨部、中央政府，對於農、工利益，算是極力提高，革命軍人對於農、工政策，也是極力擁護，乃兩湖地方，民衆團體時常發現越軌行動，而湖南各縣，鬧得更甚極糟，指有飯吃、有衣穿的人爲土豪，指有學問、有道德的人爲劣紳，私擅逮捕，任意殘殺，勒款罰錢，敲骨打髓，小民因之破家傾產，服毒懸樑者，不知凡幾；又或勒燒祖宗主位，並毀其祠堂，搗毀寺廟佛像，並沒收其財產；中央本無廢止祀孔命令，總理亦無反對孔教宣言，竟將孔廟毀去，焚其牌位；關岳本千古精忠，人人欽敬，乃至殺其神像。不問農工如何緊急，強迫到會，逆者處罰；以會場爲刑場，以殺人爲兒戲，不報告姓名，不宣布罪狀，迫令民衆舉手，不舉手者即爲反革命。婦女運動，有不要親夫、翁、姑的標語；學生運動，有仇父仇母的口號；佃戶壓迫田東，店員壓迫店主，農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營業，士不讀書，提倡獸化，毀棄人倫。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來大亂，未有如此。至於截奪軍米，阻礙招兵，打毀稅收機關，殺害軍人家屬，禁止穀米出境，鬧成米荒，保護墳宅的樹木，強令砍伐，豬不能喂，犬不能畜，猶其餘事。從前咸以爲是農、工運動幼稚，工作過火，發生錯誤，係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階段；迄今考察，乃知不然，純係共產黨中暴徒之策略，並非幼稚過火之錯誤，不過藉此名詞，以掩其陰謀耳。現張代表政治報告，搜出議決案，凡年滿二十五歲未入彼黨者，一律殺屠，違背人道，至於此極！陽奉三民主義，暗行屠殺略奪之實，此所以民衆痛苦日益加甚，幾疑革命道路莫能通達也。或謂共產主義，理論不錯，雖一時不易通行，將來當可實現；又謂湖南之事，實是幼稚發生的錯誤，目爲陰謀，未免深文周納，故入人罪。此種皮相之論，足使一般人疑團莫釋，不可不略道所以。總理有言：「馬克思認定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的原因，這是倒果爲因。因爲他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勢，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總理斯言，誠爲特見。理論如果不錯，行之事實，一定順利；他的因果既顛倒，理論即非正當，事實自不能通。所以馬克思的黨徒互相攻訐，分成數派：（一）正統派，篤信議會主義，謀與資本家妥協；（二）修正派，主張改良的或進化的主義；（三）工團派，主張革命的階級鬥爭；（四）基爾特社會主義，即組合社會主義；（五）佈爾什維黨，即勞工專政。五派之中，以工團派之階級鬥爭爲最過激。歐美各國以其太殘酷，迄未舉行。今湖南所試驗者即工團派之階級鬥爭也。如提倡實淫，破壞孔教，打倒智識份子，推翻商人制度，扶植流氓地痞，打破家庭觀念，無一不是階級鬥爭書中所主張者。明是彼之陰謀，而反代譏爲幼稚錯誤，又烏乎可！我前在漢，激於良心，略揭彼輩之隱，彼輩即大起恐慌。長沙馬日事變，彼輩陰謀，於焉大露。我總司令唐公洞燭其奸，銑日通電，可以概見，此次回到湖南，定可大加整頓。我中央黨部、中央政府，亦有訓令糾正，前途極可樂觀，本勿庸吾人過慮了。惟探查彼輩陰謀，進行較

前尤烈。變相充作國民黨，混入軍隊中，冀圖將來之大暴動，此而不去，禍將不堪。用是繼述上情，昭告於我官佐士兵夫暨各界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共起急圖，並呈請我中央政府，我唐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庶民衆痛苦可望滅除，三民主義可以實現，國民革命可告成功。我們應呼以下口號：(一)擁護總理的三民主義；(二)擁護中國國民黨；(三)擁護國民政府；(四)擁護真正農工利益；(五)農工商學兵大聯合；(六)剷除屠殺良民的暴徒；(七)剷除蕩棄人倫、發展獸化的暴徒；(八)剷除欺騙農工的暴徒；(九)剷除擾亂後方的暴徒；(十)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註一) 參閱毛以亭「俄蒙回憶錄」。

(註二) 鄭州會議原始記載文件闕如，此係根據賈顯光「蔣總統傳」(一)一〇二頁，蔣永敬文，「俄蒙回憶錄」，二四四頁及徐州會議後馮之通電

(二)(見下文)，但賈謂係六月十四在漢口開會，誤。

(註三) 載「國聞週報」四卷二十四期，頁十六、六、二十六。

第四節 容共史劇收場

壹 左派與中共處境之狼狽

由於五月至六月各地發生反共事件：夏斗寅之班師，許克祥之馬日事變，朱培德之歡送共產黨，馮玉祥之請送走鮑羅庭及何鍵之主張剷除共產黨暴徒，武漢之國民黨左派與中共之聯合戰線，已陷入天怒人怨，衆叛親離之境，如不立予應付，隨時有發生政變，遭受毀滅之可能。左派與中共當局，當自知之。左派處此，只有兩個選擇：一，爲中共殉葬，二，分共。中共處此，亦只有兩個選擇：一，向反共勢力投降，二，脫離聯合戰線，自求出路。

論理，左派應立即採取分共步驟。當時武漢中委，如譚延闓、孫科、宋子文等，根本反共，陳公博、顧孟餘、何香凝等，亦並不贊成中共，其親共者不過徐謙、鄧演達、陳友仁、宋慶齡等少數人而已。所以國民黨中央如提出分共，必可立即通過。但猶疑顧慮者實爲汪兆銘。兆銘自十五年中山艦事件後，對蔣總司令成見太深；本年四月初至上海時，不

顧上海方面中央同志苦口挽留，貿然與陳獨秀發表「合作宣言」潛行赴漢；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兆銘居然以武漢「國民政府」名義免蔣先生總司令職（以唐生智代），下令通緝，並懸賞二十五萬兩以逮捕，十萬兩以刺殺蔣先生（註一）。在兆銘主席下之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蔣先生及南京各中央同志之黨籍。事體做得如此決絕，使兆銘一時無法轉圜。

中共方面，論理，也只有脫離聯合戰線之一途，但爲史達林所羈絆而不能自決。史達林爲爭取俄國領導權正與托洛斯基作生死鬥爭，對於中國問題，尤其是南京清黨後，托洛斯基主張中共脫離國民黨，實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建立蘇維埃，而史達林堅決反對，主張中共應留於國民黨內，從事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以走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直至本年五月國際八中全會「中國問題決案」，史氏主張獲得通過，成爲指導中共之最高原則。事不旋踵，武漢形勢劇變，史氏雖欲改弦易轍，而無以自圓其說。

因此，國共分家，遲遲不決。

貳 史達林之下策

夏斗寅進攻武昌及馬日事變後，武漢之「聯合戰線」已瀕於崩潰。面對此一情勢，史達林竟想出一條改造國民黨的下策，於六月一日電令鮑羅庭執行，內容如下：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然而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

二、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的「過火」行動。

三、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軍隊。

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老委員。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黨員做領袖，組織革命法庭，裁判反動的軍官。（註二）

此一命令之所以爲「下策」，因其無法執行。馬日事變以後，兩湖，尤其湖南之農運已土崩瓦解，如何由下級沒收

土地？又如何武裝二萬共產黨員與五萬工、農？武器從何而來？當時從唐生智、何鍵，許克祥以至朱培德，均屬「不可靠將領」與「反動軍官」，誰能予以消滅及裁判？國民黨中委係由代表大會選出，如何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老委員？武漢國民黨左派究非共產國際支部，其中央人事進退豈共產國際一紙命令所能解決？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奉到此一令人啼笑皆非之命令後，既無法執行，又不敢奏駁，只得電覆稱：接受國際訓令，並遵照訓令方針進行，惟聲明不能即時一一實現。當時列席政治局會議之史達林特別代表樊克，在無可奈何情況下，同意的說，「只好如此。」（註三）

羅易見此項改造國民黨訓令中共不能執行，乃以之請教於汪兆銘，雖遭受鮑羅庭及中共中央之反對而不之顧。兆銘處此生死關頭，依然並未立即發作。

紛至沓來之馮玉祥之驅鮑馬電及何鍵之反共宣言，迫使史達林放棄其改造國民黨之下策，而提出另一下策：令第三國際指示中共，發一宣言，退出武漢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此一下策無補於當時中共之命運——只有促其死亡。其命令如下：（註四）

第三國際關於中國政局的決議（日文重譯）

一九二七年七月

鑒於（一）中國政局及社會狀態的急劇變化，（二）將領們大舉走向反革命陣營，反動軍閥更加強結合，及（三）中國共產黨中央決策上的許多錯誤，第三國際中共特喚起中國共產黨及參加第三國際的各國共產黨對下列各點加以注意：

（一）處於變轉如走馬燈般的中國革命，應正視革命的推移及四周的形勢，以冷靜的判斷，作機動的鬥爭。

（二）四月十二日蔣介石政變以來，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轉向了敵方，革命遭遇了局部的失敗。

（三）對於資產階級的背離及將領們的叛變，應該以徹底農村革命及改編軍隊為對付手段。

（四）形成目前危局的主要原因，是在於隨着工、農運動的發展，激成了階級利害的衝突。軍官們竟至公然敵視農民。在長沙軍官們殺

數農民，而國民黨中央及武漢政府均未加制止。馮玉祥也在徐州會議與蔣介石結合，對武漢政府要求投降。現在武漢的唐生智也踏着蔣的舊轍而轉移到反革命方面。中國革命是在如此情形中。

(四)第三國際依照列寧的遺教，對於中國共產黨曾予勸告，即資產階級外與帝國主義，內與軍閥繼續戰鬥期間，應該和它提攜，但是武漢（政府）已成了革命的敵人，與資產階級提攜的方策，在中國已經沒有適用的餘地了。

(五)今後中國共產黨應與武漢政府分手。國民黨的首領們不聽從第三國際的忠告，沒有援助農村革命，反而承認了唐生智軍隊解除農村武裝。武漢雖至今仍聲言討伐南京，然而在今天，武漢與南京的戰爭，自打破社會階級現狀的觀點看，並不具有任何意義。

(六)中國共產黨中央，最近演出了許多失敗。中國共產黨應該從第三國際的指令，成爲農村革命的指導者，對於武漢政府及國民黨中央之半途而廢的猶疑態度加以攻擊，對於將領的可能叛變予以警告，激勵勞動者，推動國民黨，引導它走向真正的革命之途。然而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執委及政府委員，不但沒有實行此項指令，反而甚至阻止農村革命的進展。該黨的某一領袖（著者按：指陳獨秀）說：「革命應先擴大，後深入，」「應先拿下北京，其次才是農村革命」，這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口號。當各個共產黨員奔走於工、農及都市貧民之間，爲大衆運動而努力時，黨中央反而趨向於抑制大衆的方針，政府委員甚至終於承諾了解除勞動者的武裝。武漢政府巨頭既已完全轉移爲反革命行爲，而譚平山居然不脫離政府，而請求准假，真是丟臉。第三國際曾幾次對中國共產黨指揮者以秘密指令加以激烈的責難，而中共中央執委拒絕了第三國際的指令。事既至此，第三國際中央不得不勸導中國共產黨反抗該黨中央的機會主義。

(七)第三國際爲了要立即改正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失策，認爲左列事項的執行是必要的：

A 黨員應立即示威性的脫退武漢政府。

B 脫退之際發表政治宣言，說明脫退的動機乃因武漢政府對農村革命及勞工運動採取敵對態度，對於該政府加諸工、農的壓迫，應要求嚴厲的制裁。

C 不可退出國民黨。雖在排斥共產派運動中，亦應留在黨內以便接近黨員，藉期做到對國民黨中委的行動作出抗議的決議，並打垮該黨現在中央，而引導下期全國代表大會走向此一方針。

D 以一切手段在勞動民衆之間發起運動，結合其組織，鞏固職工組合，使他們敢於積極行動，並應指導當面的戰鬥。

E 展開農村革命，以工、農及都市貧民的革命團結，去繼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運動。因此，應設法有系統的把工、農武裝起來。

F 爲避免壓迫及處罰，應設黨內秘密機關。

G 爲改正中共中央執委會主義的錯誤，使黨中央在政治上能够健全，應講求必要的措施。第三國際中央執委認爲，不論是中國共產黨全體，或該黨中央，都應認清政治問題的嚴重性。我們鼓勵全體黨員都以第三國際決議爲基礎而結合起來，對黨中央的機會主義傾向作戰。我們讚賞中國青年共產黨員的態度之正當，及多數黨員的勇敢奮戰，同時也相信，黨員們尚有足夠的力量以改善黨中央，並糾正破壞第三國際之國際紀律的領袖。工、農團體領袖及在內亂期間鍛鍊的黨員，在黨的中央佔有勢力是必要的。如此，他們與黨全體大眾將可合力排除現在黨中央的機會主義。

史達林竟將自己的機會主義推得一乾二淨，而完全將在武漢失敗之責諉之於中共中央，暗射陳獨秀，明斥譚平山，並且命令中共黨員清算其中央及其領袖之機會主義，眞所謂「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矣！

此項命令，較易執行，中共立即遵照發表宣言，除勉強湊出必須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之理由外，極口攻訐蔣總司令甚至武漢方面之左派。此一宣言不僅脫離國民政府（譚平山辭去農政部長，蘇兆徵辭去工人部長），實際上亦不啻一篇與左派絕交書。宣言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七月十三日）

（民十六、七、卅一、國聞週報四卷二十九期）

全國的工人、農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革命之危殆存亡的時候，對於你們發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釋明白國民政府在反動陰謀之下的政局，以及本黨爲保持民衆之革命勝利而奮鬥的政策。

一年以前，國民黨的政權還不過在廣東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廣東省內還有許多區域，和中國其他各地一樣，都在反動軍閥的掌握之中——這些反動軍閥，繼續不斷的自相攻戰，極其殘酷的壓迫平民，將我們中國零星分割而出賣於外國帝國主義，維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這種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幾萬萬民衆永久的處於奴隸地位，永久的窮困饑餓。然而從國民黨改組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指導之下，造成了廣東的革命基礎，從廣東向北發展，得着全國各地革命平民的響應，居然將許多鉅大的軍閥逐一

的打倒——這些大軍閥的武裝力量其實比國民革命軍要利害得多呢。吳佩孚的勢力被殲滅於兩湖，孫傳芳的五省聯軍也被打敗，最近張作霖又在河南敗績。中國大部分，已經脫離舊時軍閥的統治，民衆應當可以自由的組織起來，以求自己及中國之最後解放，革命運動的力量，已經有偉大的表演，甚至於列強帝國主義也不得不向羣衆的猛進讓步，例如英國在漢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還中國，並且始終不敢公開的實行其久已準備的武裝干涉，這種革命勝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軍閥、帝國主義不能不對於革命民衆的進攻而退却呢？

革命勝利的原由，當然不在某某總司令、某某軍長的善戰，亦不在某某領導的善於外交，而在於革命得着中國人民之極大多數的贊助，尤其是農工羣衆的努力，並且有各種被壓迫階級因反抗一切剝削而團結的堅固的革命聯盟。中國革命之偉大領袖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根據革命的三民主義而明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之進行，當在三大政策領導之下的時候，國民革命日見其鞏固發展，而成爲革命敵人所震駭失措的偉大力量。中國受帝國主義、國內軍閥的壓迫已經幾十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獨立的道路，眼見得可以得着經濟發展的前途，所以中國的農民，本是幾千年受豪紳地主的壓迫，中國的工人，本是牢囚徒牛馬似的條件之下工作，中國的貧苦市民，手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異常的貧困日趨於破產——他們這些極大多數的中國平民，在這一時期之中都奮起鬥爭，力求自己的解放，民衆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進，捶碎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制度之鎖鍊，而鍛鍊解放中國的武器，以力爭極大多數人民之民權，以解除中國之束縛，以消滅中國經濟發展之障礙。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勝利，中國勞動民衆固然警覺起來努力於自己的組織和鬥爭，而別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敵，也就覺察得到自己的危險，尋找種種方法來阻遏革命進展的潮流。他們的手段和方法有許多種：外國帝國主義者派遣軍艦軍隊到中國，驅使他們的爪牙北方軍閥作戰，並且挑撥離間國民革命軍的長官，以前軍閥是公開的反對國民黨的，後來看見不能够反對革命的偉大旗幟，於是假意歸順革命，戴上國民黨的假面具，想在國民黨內部來從事破壞革命；至於豪紳地主，貪官污吏，買辦階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盡方法壓迫工農運動，或者公開的用武力來摧殘，或是秘密的用挑撥離間造謠誣告的手段來破壞；資產階級呢，他以前和羣衆運動同路的，隨後看見羣衆運動的發展而嚇退了，於是甯可跑到革命的敵人方面去，只要能夠鎮壓工農運動——可見中國資產階級寧可心甘情願的替帝國主義者當奴才，婢膝奴顏的求他們諒解，却不肯犧牲一個大錢來改善工農的生活。

再則國民革命軍中本來有許多長官，冒着國民黨的招牌而自己擴充武力，搜括金錢，到後來，他們看見民衆的勝利將近實現，各種各式的軍閥制度都要完全滅亡，——就公開的背叛革命，同着資產階級共同積聚力量，以攫取國民革命的指導權，壓迫工農，而與人民的仇敵妥協。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〇〇〇在廣州的叛變，便是這種陰謀的第一步，然而沒有完全成功，這是因為北伐的勝利解放了中部中國，民衆運動積極的自動的發展，表現偉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擊軍事獨裁的暴力。（著者按：此說不通。三月二十事變時，尙未北伐。）然而〇〇〇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間，便公開的叛離國民政府，奪取東南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殺工農，而把持國民黨於自己掌握之中。

這就是對於國民革命的第一次嚴重的打擊。

當時國民黨的領袖對於〇〇〇的叛變，對於這種階級分化的現象，持甚麼樣的態度呢？那是國民黨指導機關的革命性還沒有用盡，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級也還有些前進的勇氣，今年三月間，武漢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就足以表示國民黨的指導機關，還能够依據於有組織的農工羣衆，以抵抗反動，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完全贊助武漢的國民黨中央，使他易於團結大多數人民而與封建資產階級及反動潮流相奮鬥，並且中國共產黨決定自己的黨員應加入國民政府，以分負武漢國民黨在此艱巨時期的重任。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許多議決案，形成我們聯盟的政綱，這些決議是鞏固黨權，推翻軍事獨裁，鎮壓一切反革命，實行鄉村自治，召集省民會議，以實現國家政權之民主化，爲贊助工農經濟狀況之改善而設立農政部、勞工部，以便製定改良社會的法則，而實行之，堅決的贊助工農羣衆運動，以及其他。

所以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足以悉顯國民黨的指導機關決心抵抗反動進攻，而且願意廣大的發展工、農運動以保障國民革命之向前進展。

國民黨既然有這種決心，共產黨自然更加要與國民黨鞏固的聯合，而爲雙方共同的任務奮鬥。共產黨派遣自己的黨員加入國民政府，同時當然認定國民黨的指導機關將要很誠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體會議所規定的責任，當能和本黨黨員之參加政府者共同努力於革鬥爭的進展。

然而最近幾月的政局，使中國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國民黨的指導機關及國民政府，並不實行那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的決議及責任，國民黨中央自己將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國人民原來是相信國民黨的中央及其許多領袖是革命的。

正因爲人民相信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那國民政府領域之內反抗封建餘孽，列強侵略的工農運動，乃有如此迅速和廣大的規模，兩湖農民有幾百萬都奮起鬥爭，反抗封建階級的統治，反對豪紳地主貪官污吏及軍閥，要求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標語之實現，要求平民政權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來推翻殘酷的牛馬似的勞動條

件。如果國民黨中央真能依據民衆運動，那麼「千餘萬有組織的農民，二百八十多萬有組織的工人，必定要成爲國民革命之極鞏固的基礎，那時，中國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擊，而不能復活。然而國民黨的指導機關，不願意如此，國民黨中央與垂死的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的關係，却比他與中國新興的革命力量的關係更加密切些，因此，國民黨的許多領袖消極動搖猶豫得不堪言狀，其結果，領導權又落在反動軍人之手。

今年四月間，國民黨中央已經拒絕公布土地委員會關於土地制度改良的決議草案，當然更不說實行了，而勞動法的制定與公佈更遇到許多阻礙。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照理應當注意中國平民之被壓迫階級，工人、農民、手工工人的呼聲，但是他却不是如此，他專聽豪紳地主出身的反動軍官——這些反動的軍官是時時反對農民運動的。今年四五月間，正是應當實行社會改良以掃除城鄉封建關係的根株，而與反動派以致命的打擊的時候，正是應當武裝工、農以抵抗反革命的時候——在這種時候，國民黨領袖及國民政府反而發出許多訓令宣言，專以限制工農運動，更使動搖猶豫的份子轉移於反動派方面去。並一任反動派能自由的準備進攻革命，反動軍官利用這些猶豫搖動的政策，而公開的反攻民衆運動，反動的惡浪陸續繼起，○○○走狗的楊森進攻鄂西，于學忠、張聯陞等叛變於湖北西北，夏斗寅進窺武昌，許克祥實行改變於湖南，以及最近馮玉祥表明反對工農羣衆運動及共產黨，工農的血流遍中原，民衆組織備受摧殘，反動潮流日益洶湧，革命的勝利全被消滅。

現中早已到了國民黨中央應當選擇正道的最後時機，究竟是同着革命前進，還是同着反動後退？直到最近，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仍舊是不肯決然的同着革命前進，仍舊繼續限制羣衆運動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動不受任何懲罰，對於湖南的反革命政變，沒有任何的處置，國民政府反而默認這些政變而加以愛護，與以合法的根據，使反動派得以完全摧殘工農運動。湖北夏斗寅的反動勢力並未殲滅，其實很有充足的軍力足以辦到。而湖北各縣的反動派，却摧滅了許多的農民協會，國民政府不但絕無肅清反動的辦法，反而事實上幫助反動派的進攻——因爲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組工農團體，這些工農團體的罪狀，就是努力犧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這種情形是國民黨中央多數領袖公開的贊助反革命軍官，一般都是動搖妥協的政策，其結果，使反革命在武漢首都，也築下鞏固的基礎，近日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和政策。

本黨的觀察，認爲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多數領袖的這種政策實足以使國民革命陷於漸滅，這種政策使武漢同化於南京，變成新式軍閥的結合和紛爭，可使宰割中國的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及其他軍閥的舊統治，仍舊變而爲瓜分中國的○○○馮玉祥、許克祥等新式軍閥、僞國民黨之統治。中國仍將繼續受着殘酷的剝削，革命將受普遍的摧殘，民衆將受無限痛苦，封建的無政府狀態將要高蹶凱

旋，帝國主義的統治更加可以穩定。中國共產黨永久爲農、工、兵、學、小資產階級廣大的民衆利益而奮鬥，決不能對於國民黨中央現時這種政策負責。中國共產黨反對這種政策，因爲對於他，民衆利益是至高無上的。幾千共產黨員，在革命軍進攻武昌、南昌的時候，在攻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的時候，在廣東的田間，上海、廣州的街市反抗〇〇〇右派叛徒的時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動軍官的時候——戰死的戰死，被殘殺的被殘殺，凡此一切已足證明共產黨永久與工農民衆共同奮鬥，不顧任何鉅大的犧牲——就在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拋棄勞動民衆的時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一切工人、農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論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都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始終與你們共同奮鬥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導民衆經過革命的一切艱苦時期，去達到最後的勝利，國民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必將努力奮鬥，反抗反動軍官、封建豪紳的資產階級完全攫取國民革命運動的陰謀，反抗他們屠殺工、農，剝削民衆的政策，他們這種陰謀和暴行是使革命破產，實在就是和帝國主義妥協——因爲拋棄土地革命，就是拋棄消滅封建制度的革命運動，而封建制度不消滅，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決不能推翻的。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絕不妥協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力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權，實行關稅自主，解放中國。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反對軍閥的鬥爭，力爭國家的統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權主義的政治。

中國共產黨將要反對一切封建餘孽，力求革命之完全勝利，以求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將要更加努力，以實現並鞏固中國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及蘇聯之真正聯盟。

中國共產黨更將繼續增進工人利益的鬥爭：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的嚴格確定，改良勞動條件，救濟失業工人，保護女工、童工，力爭工人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裝自衛。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解放農民之鬥爭：地主的田地無代價的交與耕種的農民，保護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權，不沒收的田地當實行極大限度的減租，廢除苛捐、雜稅、陋規、苛約，改良雇農之待遇，增加其工資，解除豪紳地主、貪官污吏之武裝，推翻其政權，力爭農民武裝自衛之權，建立鄉村自治，限制高利盤剝，設立農民合作社，要求國家以充分的經濟補助農業，並實行撥款借貸於農民。

中國共產黨亦將爲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廢除一切直接間接的苛捐雜稅，制定統一的穩定的貨幣，反對新舊軍閥阻礙商業交通，保護本國工商業以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反對買辦高利盤剝者之剝削小資產階級。

中國共產黨更將爲兵士的利益而鬥爭：要求兵餉按時發結，反對剋扣兵餉，要求改良士兵的待遇及生活條件，反對新舊軍閥犧牲兵

士的生命而從事於爭權奪利的私戰，主張兵士退伍後應由國家發給土地或與以工作，使得從事於和平的生產事業，對於歸入革命營壘的所謂土匪游民亦應當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國共產黨都要和國民黨黨員、羣衆一切真正革命份子，共同去實行——因此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如果國民黨的指導機關及國民政府真能實行這種革命政策——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制度及反動派的陰謀，那麼，中國共產黨必以全力贊助這種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國共產黨永久認爲革命的利益，民衆的利益高於一切——較之保存某種政治聯盟領袖高出十倍。中國共產黨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軍人以及猶豫騎牆的政治家，冒充國民黨假借孫中山先生的旗號，以自文飾。中國共產黨決意與一切革命份子合作，只要他們能够誠實的堅決的根據三民主義、三大政策而奮鬥——民族解放、民權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義。聯俄、聯共、贊助工農三大政策，是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之遺訓，所以中國共產黨，必定嚴厲的揭發一切假借孫中山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

國民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之光榮的旗幟，永久是在革命的民衆工、農、兵、學、小資產階級廣大的羣衆方面，決非反動的妥協的偽國民黨所能盜竊的。中國幾萬萬的民衆始終要認得真正革命的國民黨的旗幟，始終知道中國共產黨永久站在國民革命的最前線，民衆的力量始終要戰勝一切反動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

叁 武漢國民黨宣布分共

至此，汪兆銘無復迴旋之餘地，乃於七月十五日在武漢中央通過分共案，翌日，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名義發表報告，宣告分共。其所提出之理由，不僅指摘六月初第三國際命令本身之不合，尤着重羅易之被驅逐。其報告原文如下：

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武漢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七月十六日報告）

（民十六、七、卅一、國聞週報四卷二十九期）

本黨自容納共產黨黨員加入本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以來，雖然黨員中有些不肖份子，自馮自由以至○○○等，藉反共產之名，行反革命之實，然而一般黨員，皆能服從總理指導，與共產黨員努力合作，即使有時遇着困難，亦惟想出種種方法，以排除障礙。今年三月，

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尤為本黨對共產黨之誠意的表現。自有此決議以後，本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便邀集共產黨諸負責同志，開聯席會議，或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開會時間，往往延至四、五小時，對於國內外一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以為如此辦法，必能使其政策得更大的效果。

不幸六月初，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員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議決案，這議決案的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殆。這一位負責同志的姓名此時不能宣布（著者按：係羅易）。所聲明的，這一位負責同志，不是以秘密形式而是以開誠形式，來與本黨商確，惟共產黨方面，立即將這一位負責同志驅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洩漏秘密。共產黨既然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豈不是一種具文，此不能不令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大為失望的。

今將這議決案的內容宣布於左：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沒收土地。」

這種主張，對與不對，姑且勿論，但這決不是本黨的主張。民生主義裡說明「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但是同時說明「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總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說「耕者有其田」的意義，再三叮嚀，要求這種主張的實現，必需農民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決。如今他們却主張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豈不是與本黨的主張大相違背！倘使共產黨方面，在聯席會議上，提出這種主張，與本黨商確，甚至爭論，甚至決裂，尚不失為相見以誠，光明正大，然共產黨方面，絕不提出這種主張。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後，共產黨方面也承認農工運動的幼稚與錯誤，也承認應加以制裁，却不道湖南農民運動所以如此幼稚與錯誤，完全是因為不受本黨上級機關的指導弄出來的。而這却是共產黨方面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如今却又以本黨裁制農民運動之幼稚與錯誤為藉口，而說本黨不要民衆了。

(二)「在中央委員會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了。」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知道中央執行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執行委員如果有罪，可以取消，從前的楊希閔，近來的○○○，便可為例。然而除全國代表大會外，更沒有人能增加新的中央執行委員，如今却要將新的來代替舊的，這豈不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豈不是根本的破壞中國國民黨？

(三)「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這種主張，更是荒謬，其破壞本黨之陰謀，可謂盡情暴露。

(四)「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據「革命文獻」)；「從兩湖五萬工農份子中挑選二萬共產黨員組織新軍隊」，證以本件及陳獨秀告同志書，此處有誤。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建設共產軍。本黨自實行總理容共政策以來，在武漢同志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每每對武裝同志演說，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無可分析，這是本黨負責同志所諄諄而道的。如今他們却偏要分出誰是共產黨員，誰是非共產黨員，要武裝共產黨員二萬人，來消滅非共產黨員的軍隊，所謂工、農分子其名則美，既經挑選，其必為共產分子，不言而喻。這種主張如果實行，則國民革命軍與共產黨的戰爭，必不可免。這真所謂大亂之道。

(四)「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處罰反動的軍官」。

這種主張，不值一笑，在共產黨看來，知名的國民黨員，不過是共產黨的劍子手。

政治委員會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來，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既不願輕率的破壞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為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完全發達之保障。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正當審慎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這是共產黨員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國民政府是本黨執行命令之最高機關，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乃偏說退出國民政府以後，仍在國民黨，於理論上實為矛盾。且國民革命及各級政府機關，都屬於國民政府的統系，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

本黨既發現了共產黨方面危害本黨生命的議決案，又發見了共產黨方面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謂破壞無餘，然本黨仍體念總理遺教，對於共產黨力求容忍，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七月十五日通過決議三條(註五)，試將中央決議案原文，和共產黨七月十三宣言，兩相比較，誰是極意保持革命聯合戰線，誰是任意凌辱過他人，藉端攻擊，讀者必能一覽無遺的。(著者按：此件與「革命文獻」十六輯五七至六〇頁所載，內容相同，而文字略異，「文獻」所載者為文言，而此為白話。)

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日發一訓令，保護共產黨之身體自由，原文如下：

保護共產黨人身體令(七月十六日)

(民十六、七、卅一、國聞週報四卷廿九期)

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云：中國國民黨之使命，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之目的，在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總理之容納共產份子加入本黨，原以其能服膺三民主義，努力國民革命，本黨對於共產份子，受黨內之紀律，亦與本黨黨員無異，一切黨員之工作，應受本黨之指導，若其違反決議，或執行不力者，應受本黨之裁制，凡屬有組織有訓練之革命黨，罔不盡同。自本黨北伐以來，中央黨部一時集中力量於軍事問題，對於黨的專政，未能加以深切注意，遂使過去工作，弊病百出。為檢閱已往之工作，糾正以前之錯誤，深覺非（？）厲行黨的專政，提高黨的權威，俾中國國民革命，得以早日完成，三民主義之國家，得以早日實現。此種提案，完全根據於革命利益，執行紀律。並非防害共產同志之個人身體自由，凡我同志，務須體念此意。為此訓令各級黨部、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轉飭各屬，有對共產份子壓迫，妨害其個人之身體自由，或指誣他人為共產份子，意圖傾陷者，務即依法嚴辦。此令。

又令云：農工政策，為本黨總理確定之政策；亦為中國建設國家資本以至於民生主義之唯一途徑。自同盟會以至今日，中間組織雖迭改組，對於民生主義始終不渝，亦即對於農、工政策，始終擁護。且本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無日不希圖農、工、商業者為深切的同盟，對於較困苦之農、工階級，尤注意於其利益，使不至落後於工商業者，俾得對於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之運動為一致之奮鬥。是則農、工政策，在本黨之歷史，有其長遠之時期，在本黨之主義，有其確實之基礎，並非因容納共產黨份子，而始有農、工政策之主張，亦並不因制限共產份子，而停止農、工政策之活動。誠恐少數黨員誤解中央黨部制限共產黨份子之提案，連帶懷疑農、工，用特愷切訓令各級黨部，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轉飭所屬，對於農工團體須極力保護，對於農工利益須加以維持，以期鞏固農、工、商、學、兵之大聯合，得於最短時期，完成國民革命。若違背黨意，少加摧殘，本黨唯有執行革命紀律，決不寬貸。凡我同志，其共勉之！

為答復中共對時局宣言，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告中國共產黨書如下：

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告中國共產黨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本月十三日發現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時局宣言，十九日再發現中國共產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國勞苦青年羣衆書，對於本黨肆行抨擊，妄加詆訛。

本黨容共經過，已由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公布。我們一方面很痛心共產黨同志不能體念本黨總理容共之深心，一

方面更痛心共產黨加入本黨的同志不願接受本黨決議，而至破壞全部革命的工作，我們本着總理的遺訓、本黨的政策，深信在革命時期經由國民黨來統一指揮權。因為兩黨或兩個以上的黨來指導革命，結果必致革命的政策不一致，革命的力量不集中，必至革命失敗而後止。這個統一革命領導權的理論，不獨我們肯定，就是共產黨負責的同志們口頭上也承認。無如革命軍到了長江以後，共產黨的同志居然發揮兩黨建國論，在莫斯科同志中更昌言中國國民黨是由共產黨領導，是則不但共產黨間接受分裂本黨的領導權，並且直接要奪取中國國民黨革命的領導權了。

我們要知道中國有中國的需要，中國有中國的歷史，中國國民黨是孫先生手創的黨，有三十餘年的歷史和經驗，決不是像爪哇以共產黨製造的國民黨。中國國民黨要本着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來完成國民革命，決不能以無條理暴動的方法來沒收一切。

當湖南事件未發生以前，爲着土地問題，本黨仍繼續開會討論，求一解決的方法，當時共產同志也有許多參加。當時共同討論只爲政治上的沒收，而共產同志居然在湖南自行召集所謂兩黨聯席會議，自布一種經濟沒收的辦法。共產黨同志既然不能接受本黨的決議和紀律，是共產黨自絕於本黨，表現不願與本黨合作。

不但如此，我們發現許多共產黨關於農民運動的決議案，指導本黨的共產份子，一切重要問題只要報告共產黨的農民部，不必報告本黨的農民部。在共同革命的時期而有此種隱秘的行動，更表現共產黨不願與本黨合作。

至莫斯科決議希圖消滅本黨以後，共產黨更積極向本黨攻擊。我們明知共產黨的方法不能適應於中國，共產黨的同志決計不受本的指導，我們爲中國整個革命前途計，爲全國的貧苦人民的利益計，對於共產同志不能不加以制裁。然而猶復承認共產黨爲革命的友黨，不惜迭次訓令保護其身體自由，以表示本黨依然承認共產黨在革命上立於友黨之地位。

現在迭次發現共產黨對於本黨攻擊的文件，捏造事實，備肆誣蔑。我們很誠懇的願接受別黨的批評，但決不能忍受別黨的污蔑。如果共產黨尚承認中國有國民黨之必要，及尚承認共產黨還須努力於革命，則共產黨應即自慊，放棄其近日對於本黨敵視的態度；否則本黨爲革命利益計，不能不執行相當的紀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民國十六年七月發。錄自黨史會庫藏史料。）

自是之後，武漢形勢急轉直下：十七日，何鍵以軍力控制漢陽、漢口。十八日，宋慶齡發表宣言，指分共違背總理主張，聲明脫離新黨綱之範圍及執行之事務，鄧演達等亦有類似宣言。（旋與章伯鈞等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又稱第三黨。）於是鮑羅庭及俄顧問被送到馮玉祥防區經蒙古返俄，慶齡、演達、陳友仁及徐謙等亦先後去俄。

二十一日，武漢黨、政機構均改組。

二十三日，武漢分共作進一步之行動，由國民黨中共發表政治委員會決議案：(一)凡列名本黨之共產黨員，在本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有職務者，應自即日起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二)在國民革命時期以內，共產黨不得有妨礙國民革命之活動，並不得以本黨名義作共產黨之工作；(三)本黨黨員未經本黨中央許可，不得加入他黨，違者以叛黨論。

武漢中央既命令保護共產黨人身體自由，而中共奉國際之命，只說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是以中共份子潛伏於各機關團體而不聲明脫離共產黨者大有其人。歷時僅半月，至八月一日，而有南昌暴動，於是武漢方面大捕共產黨，汪兆銘且提出「殺盡中國共產黨！」口號（著者記憶。）據友人某君言：國民黨中委朱霽青獲得共產黨名冊一份，即與陳公博率同軍警，按圖索驥，親至各處拿捕懲處。

自民國十二年八月起至十六年七月止，歷時四年之國民黨容共政策至是告終。

武漢政權，因汪兆銘二十四日電告馮玉祥，可依三月間武漢議決遷都南京，而告瓦解。

附錄

汪兆銘演講「武漢分共經過」，（南京）國民政府通緝共產黨首要令及蔡和森撰「機會主義史」，均係清共之重要文件，附錄於此，以備參考。

一 武漢分共之經過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講——

汪 兆 銘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會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為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的經過」。

武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的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兄弟願意把純粹的事實從頭敘述，有時或參加兄弟個人的批評。但這不過是兄弟個人的意見。希望報告事實後得到各位的批評，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至於事實有關係於兄弟工作的經過，也應該說一說，因這並非一人的關係，兄弟也是担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關個人，實關於本黨。報告後對於兄弟作一種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說武漢分共的經過，先把容共的由來說一說。我們要知道「容共政策」四個字，是起於什麼時候。兄弟記得在四月中來到武漢，即看到湖街把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並黏貼出，有時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比擁護三民主義還要多些，這個情形是很不對的，因為政策與主義是有分別的。不論是政策或是主義，都是依着時代與環境而定的，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下需要什麼政策，什麼主義，故主義與政策總脫不了時代環境的關係。可是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間就不同了，政策係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性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自秘密革命運動起以至軍政、訓政，完全依三民主義而實行的，到憲政時期更是如此。至於政策是主義的產物，由主義按着時間與環境而定出一種適用的政策，故主義不與政策相提並論的。

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說到政策，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在現在看來，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要的。那時候中國的大軍閥就是曹錕、吳佩孚，還有軍政大權，害國殃民的也就是曹錕、吳佩孚。總理所以把聯段政策、聯張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來，係為打倒曹錕，打倒吳佩孚。這個政策是一時的，是不錯的。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人。所以曹、吳打倒後，便要變更政策，即是打倒曹、吳佩孚之後，如有繼起的軍閥，也應該打倒。那時曹、吳打倒後，張作霖實行與帝國主義勾結，段祺瑞大開善後會議，故不能再和他們聯合，即曹、吳打倒，而段、張繼起，故應以打倒曹、吳的精神，打倒段、張。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對段祺瑞忠告的電，後來更明明白白的發表宣言來反對他，這實在是總理聯段、聯張的精神；因為段、張已為軍閥，與曹、吳相同，故即放棄聯段、聯張的政策，政策與主義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聯俄與容共政策，為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

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個是聯俄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

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可算是聯俄的起點。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在廣州造反，總理以孤軍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後亡命到上海。正當曹錕、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南方又有陳逆作亂，總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處的環境是最為險惡的。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革命。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便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民黨。兄弟此次在上海見着張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說容共政策，他也要負一點責任，因為第一個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李大劍就是他介紹入黨的。當時李大劍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為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在大會內否決了不許黨員跨黨的提案，自此以後，係本黨已確定容共政策的時候。

當時雖有持異議的，但經大會決定，故即一致行動。然而當時大家都認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問題。有些以為容共政策是因時代，因環境而定的，故亦必隨時代隨環境不同而變化。國民黨內固然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共產黨內也討論這個問題。在蘇俄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派別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為三派：一派人稱他為最右的，他們的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還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托）洛斯基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張革命無間，從開始革命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為止，他主張絕對不妥協；連在俄國，他對於農民也是不主張妥協的。他有許多演說，對勞農政府表示不滿，反對很力。他說現在的蘇俄是假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這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他對於俄國現狀尚且如此不滿，對於中國更不用說了。他以前批評總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民國十四年三月間總理去世後，在俄國追悼大會中，杜洛斯基有一篇演說，他並非駁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說中國應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等到這種主義完成後，再做無產階級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張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他以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好比前清國民黨員加入滿清政府去做官一樣容易腐化。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地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國民黨。俄國現在得權力的就是這一派。

他們這種主張在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說得明明白白的。這篇文章已翻譯成爲中文，用真筆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諒必有見過的。文中說：我們加入國民黨後，得國民黨的掩護，已取得廣大的工農民衆；但我們的加入國民黨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所以共產黨應該保存原有的組織到相當時機，並且不能不要有這個組織的。大意如此，如要知道詳細，請參考原譯。如此看來，俄國已明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政策，看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如何而不同的。他們共產黨每年大會裡都接受各種報告而加以辯論，研究時時變更政策的。自我們容共後，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他們已變了好幾次政策了。總而言之，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實爲一個大問題。怎麼解答呢？那也是應該以時代環境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等到何時才改變呢？這是無人能先知道的，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爲一個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說，國共兩黨爲國民革命而合作時，可以打一個譬喻，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侯，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樣呢？如果是兩隻船，同在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一隻船，則到上海後，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衝突。

不錯，國共兩黨都要國民革命，然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隻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兩隻船的譬喻。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其勢非衝突不可。即使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

有許多同志早就說要分共，但黨中大多數都不主張，這全在對於時代環境的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麼要容共，我們試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那時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向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西江連肇慶也給敵人佔去，南部在鄧本股手裡，我們只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尙有時時可以造反的劉（震寰）、楊（希閔），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包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兩團，我就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部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即時分共，但都受了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劉、楊已有廣州陰謀叛亂了。六月十二日才把劉、楊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者已在沙基殺死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

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佔去，把當日克復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張膽的殺死了廖仲凱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裝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搖，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為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為自私，因為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因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對於他方面的事，不免輕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都被罩著，只顧往前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時，已曾說過。

民國十四年冬季，統一廣東，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謂經過一個段落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決定聯蔣削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是一道奮鬥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分開，所以決定聯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將來蔣同志必然明瞭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內同志通消息，因為知道蔣同志終必明瞭，為避免一切離開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如果大家說兄弟不應該辭職，不應該去國，致黨的裂痕益深，這是兄弟甘願受大家的責備的。兄弟離開廣州以後，往法國讀書。學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樣的。當七八月的時候，看見法報中國革命軍的勝利，以為可以安心讀書；雖則有時看見報上說某同志戰死了，覺得很難過。九十月的時候，病得很厲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後，漸漸好了，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蔣同志又來一個電報說，你如再不回來，我也走了。那時心裡才十分難過，不能再讀書，精神與書本子已不能聯在一起了。後來再按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來了。

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四月一號，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見面了。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贊成：一是趕走鮑羅庭；一是分共。從四月一號到五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兩件事，很堅決的以為必要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為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為共產黨把持。兄弟說過，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以在南京開會。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服從；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粉碎糜爛，這是兄弟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漢向中央提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

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同志等所提議之事件。蔣同志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為不得不行，遂於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介石同志，一是寫給張靜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志，說明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佈過，只見見李石曾同志所編「革命」會發表覆兄弟的一封信，而於信末說明，原函未經本人同意，不便發表，只能列舉出幾點來，並且說「汪精衛先生的主張，與吳稚暉先生不同；汪注重於黨的組織和紀律，而吳則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贊成吳的主張的。」這封信，現時已沒有發表的必要。就從這封信看來，可見當時兄弟等主張，確有分歧及其分歧的所在了。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漢，聞得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決定遷往南京，極為欣慰；以為分裂之禍，庶幾可免。不料十二日以後，便接得南京上海實行分共的消息，並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電報去反對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證實，十七日而武漢中央黨部也決定免蔣同志的職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為蔣同志等是不對的。因為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阻止的話，定要往武漢去，不但對武漢同志失望，對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如何而馬上就在南京幹起來。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都不出蔣同志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麼違心之論。

於此有一句附帶聲明。四月四日兄弟會同陳獨秀發表過一篇闢謠宣言。這篇宣言是有來歷的。當四月一、二、三日，吳、蔡、李諸同志會對兄弟說「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引起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聽得十分驚訝，曾將這些話質問陳獨秀。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兄弟以之轉告吳、蔡、李諸同志，吳同志說：「這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陳獨秀，陳獨秀遂親筆作書，並親筆作此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如今親筆書函還在兄弟這裡，這一段事，本無關正文，因有人誤會謂這篇宣言乃是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治國的，故不能不附帶說明幾句。

如今再說自從四月十五日寧漢分裂之後，一般忠實同志從黨的組織和紀律着想的，都服從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對蔣同志等，然而並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進行，所以十七日免蔣同志職，十九日依然誓師北伐。關於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範圍，如今當說說武漢分共的經過了。

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級是制裁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如今逐一說來。

當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間的廣東，也不像十五年間的廣東了。其時武漢已成爲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其理論與方法已完全是共產黨的，而不是國民黨了。一般忠實同志痛心之極，然而主張立時分共是作不到的，因爲四月十九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第四方面的主力部隊如張發奎軍長所統帥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帥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分子雜在裡頭。吳先生曾責備兄弟，爲什麼說和共產黨死在一塊，生在一塊。其實這是容共的事實，十四年間東征時候和十五年間北伐時候，死屍堆裡可以證明。即如此次北伐，蔣先雲等確是共產黨人，確是和國民黨忠實的武裝同志死在一塊的。當第四方面軍在前方和張作霖作戰的時候，如果後方同志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線爲之搖動，無異給張作霖以一個絕好的機會了。所以當時一般忠實同志雖明知已到了國共兩黨爭生生死存亡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便是國民黨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上去，已是無可並存的。然而爲前方武裝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問題，而祇提出制裁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黨部決議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民衆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便是此意。可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惡感，從此日深，而鬥爭亦從此開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長沙發生反共風潮，當時蘇俄代表鮑羅庭等及中國共產黨徒，都要求中央黨部對於長沙事件加以嚴重之處置。及至六月一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會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鮑羅庭有給你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點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爲要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兄弟如今將這決議案原文送給主席，以備各位同志的參考。那決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改革，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這實爲湖南事變的原因，爲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去，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劍子手，來自己殺自己。

這決議案的內容，大概如此。拿剛纔的譬喻來說，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要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

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支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恰好這個時候，第四方面軍已在河南打破張作霖的軍隊，收復黃河以南。兄弟等便於六月六日前赴鄭州，商量第四方面軍班師回武漢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漢，第四方面軍也陸續班師回來。在那時候，兄弟忽然聽得羅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後來纔知道羅易因為將那決議案交給兄弟，大受鮑羅庭的責備。羅易的意思，以為國民黨左派必當與共產派同其生存，否則必為右派所消滅，故應該將這決議案給左派知道。鮑羅庭的意思，則以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不同，他仍然是為國民黨的，見了這決議案，必然和共產黨決裂，責羅易的輕率誤事。中國共產黨多數是幫助鮑羅庭的，遂將羅易驅逐回去。兄弟等知道這個消息，當然更加緊張。於是從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非共產黨的武裝同志，將那決議案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範，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鮑羅庭聞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執行委員會遂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在一個月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來討論決定分共的問題。在未開會以前，制裁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可是，同時又發布命令，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由此可見中央雖然因為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無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纔宣布以上的決議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見共產黨七月十三日的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惟共產黨員仍須加入國民黨，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七月十九日的傳單，宣傳大意相同，對於國民黨厚誣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其初還不明白，何以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後，仍要留在國民黨裡呢？後來看見莫斯科的電報，纔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裡，為的是好從中取事，以破壞國民黨。而其所以退出國民政府，為的是可以明目張膽做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電報裡頭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裡建立非法的戰鬥機關，其用意至為明顯。兄弟如今將這兩種宣言和一個電報也都交給主席，留與各位參考。中央黨部看破了共產黨這種陰謀，所以一面訓令國民政府，允准共產黨人一律退出；一面訓令軍事委員會，通飭國民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撤去。因為國民革命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人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沒理由仍然仍留在國民革命軍裡頭，要利用用軍隊的地位，以為破壞國民政府的利器，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地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只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圖一逞。南昌之變，江西備受荼毒，其流毒且及於廣東，國民黨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進於嚴厲的驅共了。

以上是武漢分共經過之大略。

武漢分共的經過是很艱苦的，尤其五六月間最為危險。在河南的軍隊和多一倍的張作霖軍隊打仗，而楊森軍隊又到了新隄，如在廣

東來說，好比敵人已到了黃埔，夏斗寅軍隊到了土地塘，即好比敵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來進攻，四面都受敵人的包圍。共產黨乃乘人之危。德國有一種報紙，譯登蘇俄中央的會議錄，其中有一段是杜洛斯基質問史達林何故仍要助武漢國民黨。史達林答道，因為武漢國民黨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可見共產黨在當時的勢焰了。分共的時候，武漢同志發表許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題為「夾攻中之奮鬥」，說我們雖是孤軍，但不要怕，我們要在四面夾攻中奮鬥，以三民主義總理給我們的精神去奮鬥，有三民主義總理的精神擺在我們面前，鼓舞我們奮鬥的。我們分共，是與張作霖的討赤、帝國主義的反赤不同，我們是為國民黨而分共，為三民主義而分共的。分共之後不是有背黃不接的現象？不錯，是有的。譬如一個人腹內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術；剖腹之後，至少要臥床二三星期才能起來。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去才可以生。國民黨到了六五月間，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內有病，不能不開割一樣。開割後的暫時虛弱，是必然的現象，是須培補元氣，便能回復健康。所不幸的國民黨於割腹之後，健康未復，便發一場大熱，這個熱症，就是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然而這個熱症，是可以精神來治好的。廣東在四月間已實行分共，武漢則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後，同是害着南京特別委員會這個熱症。我們如今須要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纔能不辜負當時的分共。試想，如果說不要黨紀，如何能以黨治國，如何能以黨治軍。其結果必致變為以軍治黨。如此，這一個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個，互相爭殺，了無窮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現在割後之熱症，不能不以全付精神去治好他。今天報告完後，希望大家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最短期以內，治好這割後的熱症，即是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大家在黨的主義下、黨的紀律下，黨的組織下實行三民主義。我們既能用開割的手段來肅清共產黨，必然能用肅清共產黨的精神，來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能够把共產黨肅清，誠然是一部份的必要工作。但須知道消極的肅清工作是不够的，還要做積極的肅清工作；鞏固發達國民黨，便是肅清共產黨的根本方法。我們要在三民主義之下，在黨的紀律下，在黨的組織下，把忠實努力的同志團結起來，担負這些工作，担負救黨救中國的責任。要能够肅清共產黨以後，把國民黨破壞的能力、建設的能力同時發揮出來，才能算為忠實努力的同志。將來應該如何做，現在不及詳說，只看我們的努力做到什麼田地。我們要把精神力量聚集在黨裡，對黨努力工作。各位對於兄弟關於黨的工作，若加以嚴厲的批評，是兄弟是最希望的。（原註：「此稿係汪精衛先生詳細修改過的，特此附誌。」錄自黨史會庫藏史料）

二 國民政府通緝共產黨首要令

（著者按：所附名單，掛漏錯誤甚多。名旁有線者為著者所加，非共黨。）

國民政府秘字第一號令開：共產黨竊據武漢，破壞國民革命之進行，數月以來，肆行殘暴，叛黨叛國，罪惡貫盈。最近實施賣國之外交，犧牲國權，以取悅於帝國主義者；又復爪牙四布，荼毒民衆，使湘、鄂兩省演成大恐怖，我先民固有之美德，數千年所恃以立國者，亦皆敗毀無餘。綜其所爲，禍有甚於洪水猛獸；瞻念前途，不寒而慄。政府奉行先總理之遺教，誓竭全力，期三民主義之實現。惟欲建設獨立、平等之國家，必先撲滅一切反革命之勢力。共產黨圖謀傾覆本黨，逆跡昭著，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並致訓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於最短期間亟清叛亂。查此次謀逆，實以鮑羅庭、陳獨秀、徐謙、鄧演達、吳玉章、林祖涵等爲罪魁，以及各地共產黨首要、次要危險分子，均應從嚴拿辦，着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各軍長官、各省政府通令所屬一體嚴緝，務獲歸案重辦。至該黨忠實同志，遵守三民主義始終不貳之信徒，在革命地域大都與賊相持，奮鬥不懈，應着悉心保護；其餘（被）壓迫而心跡可諒者，政府必分別辦理，決不絕其自新之路。此令。附通緝共產黨名單一紙。

鮑羅庭、陳獨秀、譚平山、林祖涵、徐謙、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譚代英、彭澤民、毛澤東、許甦魂、陳其瓊、夏曦、鄧演達、韓麟符、董用威、鄧穎超、詹大悲、羅亦農、柳亞子、高語罕、江浩、鄧懋修、謝晉、劉芬、鄧中夏、許白昊、林育南、李漢俊、羅章龍、李碩勛、李國瑄、李國珍、王基永、易禮容、戴曉雲、郭亮、譚影竹、熊亨瀚、李榮植、李立三、劉少奇、凌炳、羅馭雄、范鴻勛、范鴻勛、張國燾、趙幹、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王景雲、李伯雲、汪壽華、侯紹姿、沈雁冰、瞿秋白、施存統、張太雷、林彪、何洛、張曙時、高爾柏、高爾松、王守謙、林劍臣、朱義權、劉端周、金澤宏、史鵬展、劉榮簡、丁曉光、蘇兆徵、郭壽華、周恩來、彭湃、羅綺園、馮菊坡、彭漢垣、阮嘯仙、譚植棠、楊章甫、江董琴、胡公冕、宣中華、楊賢江、潘楓涂、門啓衷、丁濟美、楊之華、于澤宏、熊雄、潘谷公、徐璩、蕭楚女、漆樹芬、高統勛、章伯鈞、光明甫、楊眉山、王貫三、汪志清、徐白民、苗胤、唐公憲、胡淺因、宋敬卿、黃日葵、趙世炎、劉清揚、夏秀峰、何孟雄、于國禎、江少懷、郭沫若、韓實華、查人偉、于方舟、陳啓修、查猛濟、宋雲彤、鄭惻莖、黃俠生、劉爾崧、李花白、陸沈、許廣武、華鈿、王松壽、邱學訓、宓維琮、匡東林、炎英、梁子光、梁治文、陳東、孫炳文、王平、顧順章、章郁菴、王根英、徐偉、王承緯、戴卓民、朱英如、王亞章、龍大道、錢介盤、耿丹、李春濤、鮑慧僧、黎樹廷、宛希鵬、彭澤順、楊石魂、張餘生、陳良、孔偉虎、林錚、趙濟猛、張德鐘、李俠公、嚴紹彭、王若飛、謝強生、周逸群、振逸九、張秋人、劉一清、孫靖華、周邦彩、金家濟、林平海、孫道濟、莊勤秋、戴國鵬、蘇昌如

何葆楨、陳國詠、王競天、楊蘭公、劉伯承、李筵乘、陳達三、季外方、季達外、陳志益、張國恩、劉季良、鄧希禹。（民國十六年八月日發。）

（錄自黨史會庫藏剪報，並參考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下）六三五頁修正。）

三 機會主義史

蔡和森

著者按：①本件前後有缺頁，②本件為蔡和森被派至華北工作時所撰，③本件顯示羅易（本件作魯易）與鮑羅庭兩人意見相左；鮑較保守而實際，陳獨秀傾向鮑，羅秋白亦然，④蔡與毛同鄉、同學，與毛一氣，主張兩湖暴動，較接近羅——然此為事後敘述，難免被指為機會主義，當時是否堅決，仍有問題，⑤毛不得意，住武昌，事原在五大中被獨秀申斥，⑥此件在史料上最大缺憾為關於「八七會議」之地點、出席者，負責人及開會情形未予透露。

A 機會主義下的中央政治局

五次大會開幕約兩星期，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在湖北叛變，同時許克祥在長沙叛變消息亦非正式的傳來。和森與立三提議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部武力立即佔領粵漢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變，則直由粵漢路取湖南為根據地，再進攻湖北與廣東；同時發動一切工農羣衆起來作殊死戰，乘機擴大工農糾察隊武裝，並開赴前敵助戰；同時提議積極準備武力對付，以暴動對付暴動。當時魯易與秋白同志以為現在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左派關係的問題，只有與左派關係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現在急務便在建立此中心。

當時實際情形是這樣：夏斗寅叛變一起，進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里（抵紙坊），所謂左派首領皆嚇得面無人色，魂飛天外；民間亦大起恐怖，紛紛逃亡，即工人糾察隊亦有逃亡者。同時譚延闓、唐生智互相放出相反的宣傳：唐謂此次兩湖事變是由譚延闓勾結他的部下何鍵起來的，譚謂此次事變是唐主使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計，可見C P一面在湖南糊塗，一面又相信唐生智之不智：。當時和森根據各方面所得材料（此時和森暫代秘書長），證明以上兩種宣傳都是故意蒙混耳目的，譚之參加此次陰謀固不待說，夏、許、何是唐的部下，兩湖是唐的地盤，那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可是魯易當此緊張之時不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問題置在鎮壓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謂與左派的關係，這是與老鮑全然相同的。（按：老鮑即鮑羅庭）

和森、立三的提議採用了一半，便是葉挺及中央軍校的武力都開去迎擊夏斗寅，工人糾察隊要求國民政府從漢陽兵工廠發二千支槍，並幾千元月費，在精衛等在口頭上答應了。中心問題既然還是「左派」問題，於是對於夏斗寅的叛變只當作是一件臨時的事變去應付。中央政治局的全副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於所謂左派關係問題。這便是我們在兩湖失敗的致命傷，兩湖始終是由於放任夏斗寅、許克祥的暴動在肘腋之下長期發展失敗的！假使中央政治局一開始便集中全力於剿滅反革命，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鞏固兩湖根據地，我們決不致遭受後來那樣不榮譽不爭鬥之可恥可羞的大失敗。假使當時認為中心問題，是以全力撲滅夏、許及唐、譚一切反革命的陰謀，結果也許可使所謂「左派」自動搖而穩定，由離心而向心的，也只有這樣才能改良與左派的關係。因為所謂左派完全是隨勢轉移的；夏斗寅、許克祥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發展，他們一定要趨向於反革命；我們工農能以自己力量剿滅一切反革命，他們也許中斷反革命的傾向。

當然以上所說，都屬事後追論；當時和森、立三並未真知著見到如上所說之深切。不過假使當時魯易能因和森、立三那種本能的偶然的提議，把中央政治局的火線集中於發動自己的勢力去撲滅一切反革命和陰謀，兩湖是決不會失敗的那樣迅速和可恥。

在夏斗寅叛變時的緊急會議上，除了決定一些葉挺出軍及發動民衆勢力，擴充糾察隊等辦法之外，又推魯易起草一個關於夏斗寅叛變的宣言，在此宣言中，現在可指出兩點錯誤：(1)承認農民運動的過火，但不是中國C、P做出來的，乃是農民自己做出來的，便是說中國C、P不負此過火的責任；(2)承認C、P不僅保護工農利益，並要保護中等階級工商業者之利益，號召這些中等階級工商業者不要受夏斗寅的鼓惑欺騙。從這兩點看來，可見魯易也喪失了頭腦和原則！

不久湖南許克祥的馬日事變證實（但中央特派員李維漢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終無報告來），老鮑異常焦急，急欲與平山及國民黨中央所決定的查辦代表團（老鮑、平山、彭澤湘、陳公博及唐生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的過火。此事是老鮑決定的，魯易是反對的。結果老鮑借此查辦團行至岳州，許克祥來一逮捕與就地槍決之電，六人皆逃回武漢！老鮑這種主張當然是很錯誤的：(1)查辦農運過火是原則上的錯誤；(2)不想用勢力去對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去查辦反革命，根本是笑話；(3)「單刀赴會」的故事演不成，結果更喪失了所謂國民政府及老鮑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張目。魯易反對是對的；可是魯易也只知道消極的反對，並提不出積極的辦法。

在有一場政治局會議上，魯易與老鮑各自發表長篇的演說。老鮑的大意是：(1)現在國民黨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甚麼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我們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

(2)我們現在必須向左派讓步，繼續取得與他們合作是中心的問題，假若現在我們與他們決裂便是中國革命完全的失敗，我們將甚麼也沒有；(3)繼續與國民黨合作便是指與他的現在的中央合作。國民黨的中央現在還是好的，離開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這不是決裂便是政變。現在黨內有此危險的傾向，應攻擊此傾向（暗指魯易）；(4)農民運動只要能做到減租、減息、鄉村自治等，便是我們的勝利，便是土地革命；(5)C、P中央及一切工會應發表宣言，號召羣衆擁護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的一切取締民衆運動過火和錯誤的法令。

魯易的大意是：(1)現在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已經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軍閥的代表。我們應號召左派羣衆起來推翻他們；(2)推翻國民黨現在的中央，並不是根本決裂與政變；(3)我們現在應一直到工農民主獨制（未多說理由）；(4)C、P中央應發宣言反對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佈的一切反動的法令，在這些法令中不僅反工農運動，並且保護封建制度。

魯易之後，和森發表的大意是：「我們聽了老鮑和魯易的演說之後，發見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和政治路線。在老鮑的演說中，有些動聽的辦法是可寶貴的，但試拿以與國際決議案相比較則完全與其原則相違背：如國際決議教我們實行土地革命，而老鮑則教我們只要做到減租、減息便是頂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過通歸於工農運動過火，而認現在代表土劣、地主、軍閥的國民黨中央一點不好的傾向也沒有，反教我們去擁護他們咒罵民衆運動，取消民衆運動的法令；這樣，還有甚麼原則？至於魯易同志所說的一些原則都是很對的，很可寶貴的，只可惜沒有說出辦法，每次開會都像上課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們一些原則，這是不夠的。代表土劣的國民黨中央已經不是左派，我們應當推翻他在原則上是對的；但我們對左派羣衆的工作還是一點沒有準備。現在要一聲呼喊與國民黨中央決裂，事實上不是政變也要發生政變的。至於魯易忽然提出工農民主獨裁制，也與國際決議不相合，是否國際有所改變應請說明，我看來，老鮑是有辦法而無原則，魯易是有原則而無辦法……」。

秋白同志接着說道：「和森同志的批評是很可笑的。」在他看來，彷彿魯易與老鮑之間，一個懂得「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原則，一個不懂得「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原則似的。其實老鮑與魯易在根本原則上並無不同，只是對於國民政府內資產階級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所不同，在魯易及莫斯科的同志們以為中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業已成功，國民政府內已經完全沒有資產階級的成分，所以認土地革命可以盡量實行。老鮑則認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還未成功，因國民政府內還保留許多資產階級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徹底實行。我（秋白自謂）也覺五次大會決議關於這一點沒有指明，太把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說完成了一點，彷彿此聯盟完全成功了，沒有資產階級成份了，這是一個缺點。

在有一場政治局會議，獨秀同志在報告中說道：「我昨日與老鮑談話，老鮑指出湖南農運不是我們的領導，而是地痞與哥老會的領導。這樣怎得不糟！」這個新發明在不接近羣衆的中央政治局看來，真是動聽。由此農運的「地痞論」成爲中央政治局的國是；每一個農民運動的通告除了抄寫一些國民黨咒罵農運訓令之外，一定在組織方面要禁止地痞做農協會員，一切農協委員皆應由在業農民、未離開土地的農民來担任。這個也成爲天經地義了！

湖南馬日（五月廿一）事變，不是許克祥的功勞；乃是湖南省委負責人及中央特派員指揮自潰的結果。從五月十八日以來，省委即知道許克祥將響應夏斗寅，中央特派員及省委負責人，先日分析政治，謂將是唐生智整個的叛變，武漢一定已沒有了，以爲沒有辦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邊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鄭州已下，武漢無恙，則又分析政治，以爲許克祥不會暴動了；最後知道許克祥確實暴動，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發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兩個月再說！」後來五人臨時委員會決定號召長沙附近各縣卅萬農民於五月卅日進攻長沙，李維漢同志見此命令大發雷霆，斥爲小孩子的把戲。他的理論是：「即使我們能取得長沙，唐生智便要與武漢政府翻臉，是我們有了長沙而沒有了武漢。現在武漢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請求國民政府用法律手續來解決！」

鄭州下，搖動不穩的、逆跡顯著的假左派首領他們都赴鄭州開會。此時中央政治局開了三次重要的會議。一次是討論鄭州下後的北伐問題：此時馮玉祥反共態度已較明，獨秀同志已悟前此北伐政策之錯誤；他現在所憂慮的是馮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號召武漢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決C、P之日，所以此時獨秀同志及老鮑都認「東征」是推一出路。在此次討論中，獨秀、立三、秋白是主張東征的；魯易、平山則仍主張南伐取廣東；和森則主張解決兩湖問題。當時和森這樣說：「現在我有個奇怪不同的意見：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征是唐生智的事，都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要再爲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一無所得！這便是說現在我們必須堅決的自覺的來幹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自己的地盤和武力。這便是指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湖問題應首先解決。許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長的發展，我們所在地的湖北，自夏斗寅叛變後，已有四十三縣的農民和農協處在土劣軍閥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農民已達三千以上。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話！」當時和森提出所擬之湖南、湖北的決議案（已在常委通過）要求政治局討論追認。關於湖南決議案的大要是：(1)堅決的號召廣大的農民羣衆以自己的勢力來解決許克祥，向長沙取圍攻封鎖之勢；(2)絕對的不要相信和倚賴國民政府合法的解決，他是故意縱容許克祥的，即使有所謂合法解決之日，他不過是用法律手段來代替許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的來取消農民運動；(3)自動的沒收土地，農民勢力到那處即將那處的敵人殺盡，土地沒收，並建立鄉村政權，實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共爭鬥中，應發展農軍至五萬以上；(5)在最短期間應發展國民黨羣衆至卅

萬以上（著者按：即替國民黨徵收新黨員，供中共驅使，中共視國民黨為「羣衆」），準備推翻現在代表土劣的國民黨中央。關於湖北是：(1)積極號召全省農民羣衆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軍閥猛烈反攻；(2)積極利用省政權（當時在我們之手）、縣政權，擴大省防軍及農工武力，盡量肅清各縣一切敵人；(3)盡量擴大武漢三鎮工人糾察隊及同志的武裝；(4)自動沒收土地；(5)迅速準備廣大羣衆勢力推翻國民黨土劣的中央機關，並改組之。此日恰好國際來了一個電報，責斥中央對於土地革命的態度不堅決，責斥平山就噏演說之迴避土地革命，警告中央改變態度，否則將在國際機關報上公開批評，同時指令迅速反攻並解決許克祥，農民自動沒收土地，否則中國革命將一敗塗地。魯易看完兩湖議決案之後，表示完全同意，認為與國際來電相合。翌日魯易提議要求國民政府討伐朱培德，同時我們派五十名軍事同志赴江西，準備暴動推翻朱培德，和森根據此意用常委名義發一準備暴動推翻朱培德的訓令於江西省委。後來平山表示反對。

此時中央政治局有點「進攻」的新空氣。同時湖北省委根據上述之湖北決議精神開了一全省代表會。在湖北各地做國民黨工作的同志，經過中央常委的指示，開始宣傳反對反動的國民黨中央。同時派去大批軍事同志赴湘發展農民暴動，推翻許克祥。這些軍事同志去時，中央常委出席說明是要準備對付整個的唐生智的反動之到來。於是中央與國際代表之間，組織一湖南特別委員會，專為指揮湖南暴動。後來此會開會數次，外國同志將暴動計劃改了又改，同時所決定之款項遲延不發，而我們已派去大批軍事同志前去，須要計劃與款項異常之急；最後外國同志聽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報告，認為我們自己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暴動為不可能，對於前次所決定之款項全翻臉。於是軍部周恩來同志與魯易大鬧一場，取消此委員會。

鄭州下後，中央政治局另一場會議，獨秀同志作了一個樂觀的政治報告，大意是：張發奎軍隊已自動的撤回武漢，唐生智軍隊亦繼續撤回武漢，是共同北伐的計劃已被打破，共同解決C、P的危機業已延緩。魯易接着指明現在情形並不允許樂觀：反革命繼續在湖南發展，繼續屠殺農工和我們的同志（其時長沙C、P省委整個被殺），馮玉祥在河南反動，朱培德在江西反動，驅逐一切C、P分子和政治工作人員出境；他指明現在我們只有向敵人進攻才有出路。當時和森贊成這個進攻論：「我們中央政治局，從今日起，必須具一種明確的意識：再也不要說甚麼讓步，什麼取締農工農過火道類的話了，今後我們的任務再也不要退讓而只是進攻。我們應首先向反動的國民黨中央下總攻擊，我們要向農工農動員起來攻擊他，我們要在機關報上動員攻擊他，同時我們準備一進攻的政綱，待汪精衛等由鄭州回來與他們正式公開談判，揭破他們的假面具」。當時任弼時同志提議發宣言，於是宣言政綱皆推魯易起草。同時魯易提出兩個「驚人」的建議：(1)武漢全體工人總罷工，反抗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漢陽兵工廠工人應特別罷工，表示不解決許克祥不再造槍砲殺自己的人；(2)發一反對朱培德、馮玉祥、許克祥的宣傳大綱，並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職及討伐朱培德的口號，此兩提議雖經多數長久之猶疑與爭辯，

卒得勉強通過。

可是通過此案的消息傳出去之後，真是聞所未聞的駭人聽聞！老鮑聞之，氣得要死；彭述之聞之，到處宣傳中央與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討伐朱培德的口號呵！」譚平山聞之，臭罵魯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國情形……於是羣相告語，若大禍之將至：「這不是與國民政府決裂麼？我們有甚麼準備，能這樣開玩笑！」「兵工廠罷工來一個屠殺怎樣辦？」「國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馮玉祥……一律表示反對，我們有何力量抵得他們一個打擊？」「荒唐！」「幼稚！」「發狂！」……如此等等，儼然大禍將至一般。爲甚麼這樣驚慌，這樣駭怪呢？因爲退讓已成習慣，對於國民黨和新軍閥已養成一種馴順的心理，現在忽然有違反此心理與習慣的決定，所以莫不大驚大怪起來。這是證明機會主義入人之深，已使一切上層同志沒有階級的仇恨情緒與感覺；天天坐視許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馮玉祥在河南屠殺、放逐、壓迫我們的同志及工農羣衆，這處無抵抗，那處也無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層負責指導責任的同志的階級感覺與仇恨都麻木了。反之，對於久相往來的大人物、大領袖之馴順恭謹的感覺却異常靈敏，所以此等下層羣衆所感覺奇怪的正是「C、P何以此時不反抗許、朱、馮等的屠殺壓迫，及國民政府的縱容？」而上層同志所感覺奇怪的完全相反，乃是「爲甚麼此時我們可反抗國民政府，及汪、譚、朱、馮……等？」

於是下一場會，要求取消原案（由多數的反對）。此時和森雖還一度堅持，然魯易自己表示：「現在既然一些職工運動的重要同志都不贊成罷工反抗國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納大家的意見修改原案。」秋白亦說：「我們進攻是應有準備的，全無準備而冒然進攻是無益的」。於是立三提議改反抗的示威罷工爲歡迎北伐軍凱旋的罷工。同時關於朱培德的口號，亦大加修改。

由以上的記錄看來，從夏斗寅、許克祥叛變之時起，我們便應以「進攻」、「暴動」、「政變」爲中心問題；因爲從這個時候起，地主、土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及國民黨左派已公開的向我們進攻，向我們暴動，向我們政變。只有以進攻對付進攻，以暴動對付暴動，以政變對付政變才能制勝一切敵人。在夏斗寅叛變之時，魯易還認左派關係爲我們中心問題，這是與老鮑同樣錯誤。後來否認此左派而主張推翻其中央，這是魯易的進步；可惜他不能貫徹此主張，公然不諱的承認有「決裂」和「政變」之必要，老鮑反用決裂和政變來反唇相譏，魯易輒不敢自申其說。鄭州下後，魯易指明時局之嚴重，第一次明白的提出「進攻」的標語，這是非常之對的！假使魯易能堅持，不因一時之反對而自縮，結果一定可在中央政治局樹立一種進攻的指導去替代那退讓的指導。可是魯易自己不能堅持，一經反對便自行讓步。從此中央政治局遂永遠不能超出退讓政策的厄運；「進攻」的空氣剛一抬頭即爲西北學說（著者按：指鮑之主張）的無形勢力所打落。

當魯易提出罷工原案時，有一句話說得很對。他說：「現在有一種社會民主黨的理論，企圖反對進攻，便是說我們沒有準備不能進攻。」這這句話是指老鮑的。其實湖南五百萬農民的組織，雖受打擊，並未冷却火氣，兩湖工農勢力縱不雄大，也不致一個反抗的罷工都不能做。在此情況之下，還以無準備為藉口去阻止進攻的方針之提出，當然是一種西北學說的機會主義。

當鄭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機並不減於我們。因為他的主要部隊都開赴河南，湖南異常空虛，留駐湖南之兵，連湘南、湘西計算，不及四團；而我們湖南農軍的槍枝早已超過三千以上，葉挺軍隊藉迎擊夏斗寅已扼粵漢路而留駐湘鄂交境，同時湖南有二十縣以上（最著者有長沙、瀏陽、湘潭、湘鄉、寧鄉、益陽、茶陵、攸縣、湘陰、衡陽、衡山、郴縣、祁陽、耒陽、安化、安源、萍鄉、醴陵、汝城……）的廣大農民羣衆，不願省委之潰走及中央特派員取消暴動之命令，他們英勇的堅決的自發自動的暴動起來，唐生智是完全可以推倒的。並且在我們的政變勝利之下即可用民衆的勢力來改組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而成功我們領導之下的真正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制。這個可能在當時確是有的。唐生智很懂得這種可能的危險，所以他在當時極力向我們卑詞下禮，常常從前方直接打電報於我們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實，常常在前方故意公開講演擁護三大政策，反對許克祥，否認湖南農民運動過火，總括一句，他的言論，比汪精衛、譚延闓任何一個都左得多。他爲甚麼要這樣表示呢？便是他怕我們在兩湖起暴動，又知道我們有取得兩湖之可能，乃故意卑詞下禮來緩和我們，使我們相信他不是夏、許叛變之主謀，使我們相信他有自己的回湖南解決許克祥之誠心。果然不錯，我們就中了他這種鬼計！

第二期北伐有一點好處，便是將唐生智在兩湖的主力軍調出三分之二於河南。假若我們有先見之明，乘此時機準備兩湖暴動，用自己的勢力來鞏固兩湖根據地，來實行土地革命，來改組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勝利一定是我們的。老鮑根本無鞏固革命根據地和實行土地革命之志願，不必責備他；魯易徒有此志願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發後之形勢，消極方面只知反對北伐，積極方面只知要取廣東，老鮑無異拋棄兩湖想西北，魯易無異拋棄兩湖想廣東！廣東與西北雖不同，其忽視兩湖是一樣。

當夏許變叛時，我們曾說：「這是唐生智的三月廿」。話雖如此說，可是全不知利用「三月廿事變」的經驗與教訓來對付唐生智。三廿事變的經驗是甚麼？○○○原先本擬與我們完全決裂，後來檢查他自己的勢力完全使他失望，因爲三月廿以後，黃埔軍官學校學生整個左傾，反對○○○，不服從蔣之命令或調遣；同時其他各軍如譚延闓、程潛之湘軍，朱培德之滇軍，在三月廿都是反蔣的。所以三月廿事變是我們的危機，同時也是○○○的危機；蔣於此危機之下只有高唱北伐，找他自己的出路。三月廿事變的教訓是甚麼？是一味退讓而不知反攻。假使三月廿以後，我們能發動憤不可遏的工農勢力及左派軍事勢力來對付蔣，蔣是無可如何的。現在拿上面所述的情

形來對照唐生智的三月廿，情形是很相像的，性質與程度却更嚴重了；因為此時兩湖發展的工農勢力比較廣東三月廿時要大十倍以上，同時湖南五百萬有組織的農民已實行用自己的勢力在那裡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權。因此所有一切國民革命旗幟下面的新軍閥都傾向反革命，這些都是性質上程度上更嚴重的地方。因此唐生智經營他自己的三月廿（實際是五月十八）到四月十二（實際是七月十五），與〇〇〇便有不同：〇〇〇積極經營北伐，唐生智對於第二期北伐的態度是不積極的，他開始很不願意調出他的主要兵力於河南，他知道這個時候對於兩湖的地盤太危險，〇〇〇知道兩湖、江西拿不住，故拚命經營東南做他的根據地，唐生智則始終知道要鞏固兩湖做他的根據地，後來之高唱東征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用。在理我們應當怎樣去制勝唐生智的三月廿到四月十二呢？我們只有百倍的利用三廿事變的教訓，乘唐生智兵出河南之後，在兩湖舉行我們自己的三月廿和四月十二。縱不然，在夏、許叛變之後，我們以暴動對付暴動，以自己的勢力鞏固兩湖，做我們土地革命的根據地，這樣做去未有不勝利的。夏斗寅叛變時中央政治局有此萌芽之提議，已屬遲了一點，鄭州下前的兩湖決議案更遲了一點，鄭州下後魯易提議已屬太遲。然即此一些偶然的萌芽的遲緩的類似「進攻」之微波，在西北學說的大海中是起不了甚麼影響和作用的！（著者按：此僅一廂情願的說法，證以兩月後兩湖暴動的失敗可以知之。）

B 政治局的後一階段

政治局的後一期，完全表現是一種指導破產的階段：老鮑於武漢軍撤回之後，又極力拉攏唐生智經營東征，以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東南之時還不致與我們決裂，他再三申言「我們箱內還有草」（指蘇聯對武漢政府之借款），他（指唐）還要吃我的草，還不至跑掉。」由此引起政治局對於撤回武漢的唐生智之最後的幻想；以為夏、許之變，唐不是主謀，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機分誠意解除許克祥亦未可知。

「進攻」的微波被打消之後，魯易亦喪失了方針，仍然復回到所謂左派中心問題，想極力拉攏汪精衛來挽回一般的危局。由此引起政治局對於汪精衛最後之幻想；以為汪精衛還是左派唯一的首領，唐生智既還需要國民黨遺塊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衛一些主張，所以拉住汪精衛還是一切政治問題的中心。於是「東征」與「汪精衛」遂成爲後一階段的送命湯！過去所通過的兩湖決議案實行了麼？一點也沒有實行，現在的兩湖似乎更不關重要了，橫豎唐生智「還要想吃草」，一時不會和我們翻臉，他既回來，兩湖即聽他去處理。而且汪精衛還是左派唯一的首領，汪、唐近來關係很好，兩湖問題就可聽他兩個去處理。

過去所擬左派羣衆工作實行了麼？剛開始團結湘鄂贛及江浙閩左派分子做反汪、反譚、反馮、唐及朱培德之宣傳，譚延闓等知道了

(因為毛澤東同志等公開宣傳)，大罵C、P有推翻國民黨陰謀，此消息經獨秀聞之，大發雷霆，以為這一手來不得。其實此反國民黨中央之宣傳是經過中央常委秘書團指示的。

過去一度擬議之發動羣衆去攻擊國民黨中央的反動，這工作做到了甚麼程度呢？說來也可笑，便是在「歡迎鐵軍凱旋」的停工之下，湖北總工會違反修改罷工案的精神，發了一些反抗國民黨政府縱容許克祥的宣言，和打倒許克祥及朱培德的標語。這些激烈一點的表示是總工會負責同志劉少奇等經過中央秘書團的同意做出來的。可是這又做錯了，得罪了汪精衛！汪精衛見着總工會的宣言，知道這一日實際是罷工反抗他們的；他一見老鮑和獨秀流淚切齒的說：「吳稚暉曾警告我，「你日後上共產黨的當時，記得吳某的話，」我是一個文弱書生，其實他們（即指總工會）何必連絡武人來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開擴大會議時，獨秀的政治報告中猶指此次罷工的「激烈」表示，是閉罪國民黨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鮑尤其深惡痛恨這一日的罷工表示。

前此一度擬議提出「進攻的政綱」與國民黨公開談判的事怎樣進行呢？說來更可笑，不僅沒有進攻的政綱，即魯易所擬之最低限度的政綱，也難通過。老鮑堅決的主張在此政綱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裝工農及工人糾察隊；(3)此政綱專為適於東征之用，應特別提出一些有利於「工商業者」資產階級的條文；(4)把過去一切取締店員，取締工人，取締農民，取締童子團及取締一切民衆運動的條文都綜合上去。

此時不提土地革命的理論是：「現在夏斗寅、許克祥、朱培德、馮玉祥一齊叛變，左派與我們的關係千鈞一髮，還同他談甚麼土地革命，談更無益。現在只有東征才能跳出此危機。故一切較高的政綱都待打到南京後再說。」從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現在東征是唯一出路；從前主張打到北京後再實行土地革命，現在主張打到南京後再提其他問題。前後照應，一氣相承，這是西北學說的精神！

此時的實際情況是：(1)國民黨中央公開的袒護許克祥與朱培德；說許是代表全社會反對農運過火的，說朱驅逐C、P及左派的辦法完全是對的；(2)馮玉祥仿行朱培德辦法，驅逐C、P、及政治工作人員出境；(3)朱、馮之舉皆先得汪、譚、孫科、徐謙、顧孟餘等之主使與同意；(4)汪精衛等對各處被逐來鄂之左派分子表示，C、P、問題待七月十五之中央會議正式解決；(5)汪精衛、孫科極力勾結唐生智經營東南，欲完全取消三大政策，和一切民衆運動以博東南資產階級之同情；(6)唐生智部下將領以何鑑為領袖，公開宣言不分共不能東征，不願意為C、P、東征；國民政府陸許克祥為師長，馬日政變之湘省政府主席張翼鵬為參謀長，中央軍委直接發電拉攏夏斗寅；唐生智回武漢後，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完全成為唐生智的機關，汪精衛是他的「新歡」小老婆。

在此情況之下，我們只有兩條出路：或準備暴動，提出一進攻的政綱與所謂左派公開談判，談判不遂，即公開宣佈左派叛逆革命的

罪惡，將其政府與中央推翻而改組之。或者完全投降，贊成修改或拋棄三大政策，停止工農運動也可以，分共也可以，只要你在南京未打下以前，不驅逐或屠殺C、P。在此條件之下，還可作合作東征，還可給草與國民政府及唐生智吃。

前一出路，在魯易初提出進攻及罷工示威之時有此傾向，但不到三日即被打消。在此情況之下，自然只有由鮑羅庭同志領導我們走後一條路。所以此時顯然不需要一個進攻的政綱，只需要一個投降的政綱，即不提土地革命，不提工農武裝；而只加重取締工農運動之過火，把武漢政府一切赤色的標幟皆塗黑，由此去博得東南「工商業者」之同情，我們暫時受此委屈與他們合作東征，待東征成功渡過現在的難關，然後再與他們談別的事情。老鮑的意見完全是這樣的。所以此時他所亟亟經營的只是想拉住汪精衛、唐生智來吃他的草，交換條件只是要他們答應在東征時期暫不實行分共，此案暫時保留到打倒○○○○後再說；希望他們在各將領間去疏通疏通。可是唐生智直接問接的答覆是怎樣呢？「對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後再討論。無奈這些糾紛武夫不聽我的話，只聽何鈺的話。所以最好還是C、P、顧全大局，自動的解決這個難題！C、P、須知現在也非常危險，我也拿不住我們部下！」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是要C、P、自動的退出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免得武人動手，因為「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這個意思開始還是暗示，後來汪精衛、唐生智公開的明說，汪精衛把譚平山請去，要他與蘇兆徵同志立即上辭呈退出國民政府；唐生智則提出優待的辦法，送譚部長，蘇部長出洋考察。老鮑對於後一辦法表示可以採納！

於是最後的買賣是很明白的：老鮑與C、P、所要的是在東征時期還不要實行分共；汪精衛與唐生智所要的是東征時間還要吃草，還要請蘇俄的借款快些匯來。「請你保留分共案到南京取下後再談呵！」「請你電備蘇聯借款迅速全數匯來呵！」這是最後的交易。

老奸巨滑的左派政客與新軍閥還要討些便宜，是很顯明的。在我們「東征時間不要實行分共」的語氣中，也可看出「實行」是不願意的，但「議決」分共或許是可接受的；橫豎這是個實際問題，他們的議決不過是句空話，他們那有勢力來管理黨部和民衆團體，在東征時間，他們尤其無此力量，而且他們互相間的衝突還多呢；即使他們現在決議分共，待到南京情形變換，難道不能再作道理？這種空氣，從老鮑起，在政治局中是可感覺的。假使後來國際訓令不來，也許引領我們這樣去投降，即一切草料給他們吃，讓他們議決分共，待打倒南京後情形變易再作道理。

魯易在他所擬的最低限度的國民革命政綱中仍然提出土地革命、工農武裝、懲罰反革命及討伐廣東。這些都是他與老鮑不同的。至於對左派關係及綜合過去所決定之限制工農店員要求等具體條件，都沒有不同的意見。魯易自從上次受一打擊後，再也不提進攻和準備決裂了。他此時的精神，似乎趨向於經常的合法的政治路線：(1)想極力拉住汪精衛為左派中心；(2)想擴大左派武力，以鄧演達，張發奎

爲中心；(3)想在白紙黑字上維持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的原則；(4)湖南反革命問題要求國民政府懲辦；(5)對於東征未表示反對，但仍提出南取廣東，事後追論魯易始終不失爲一個奮生；原則是在紙上維持着，實際問題一個也未見到，此時的實際問題是「決裂」，是「暴動」，是以羣衆的勢力沒收土地，武裝工農，是以羣衆的勢力推翻假左派而建立羣衆真正的左派和政府；維持原則的政綱之作用不過在用以公開談判，揭破假左派首領汪精衛等之假面目和藉以與之做正式決裂的口實與號召罷了。此等政綱只有是堅決的準備與汪精衛等決裂才有作用。魯易既始終要拉住汪爲中心，又始終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綱，這是老鮑始終有力制勝魯易之點。魯易的主張始終是矛盾的，老鮑却是始終一貫的，因爲他的主張始終是順從汪等的心理與需要的。始終要拉住汪，是老鮑與魯易相同的；但魯易始終願做汪的頭，老鮑始終願做汪等的尾。結果魯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老鮑是「既替順隨，又會揣摩」。

現在再敘述些別的事情：

魯易所擬擴大左派武力的計劃實行了麼？沒有實行。此計劃原本不始於魯易，在前一期的常務會秘書廳即有此決定，但未實行。鄧演達隨從第二期北伐出發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之權落於譚延闓、程潛、孫科之手，他們大大縮減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之經費，並擬遣散教導團或歸併於各軍，這完全是向鄧演達進攻的。我們曾幾度計議打破此陰謀，故在鄭州將下時即派國壽同志前去河南，與鄧商議此事，並謀左派之新團結。然鄧演達自討論土地問題時受譚、唐、程、孫等大衆之排斥，不得不離開武漢，隨軍出發，故他異常消極，且受托羅斯基派俄顧問的影響，傾向於第三黨之說，即取消C、P，與國民黨左派合併組織第三黨。其實也是空話，他只是消極悲觀。現在魯易是想擴大張發奎的勢力，此事老鮑堅決反對，因此C、P、中央軍部負責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數亦堅決的反對，以爲這個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馬上就要和我們翻臉，何健馬上即會暴動政變。但是魯易終不死心，應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衛。

現在再說工農武裝。自上海失敗之後，「紙老虎」的工人糾察隊說迅速發展，雖然五次大會決定軍事工作的新方針是破壞一切舊軍隊和武裝工農，然此新方針從未在五次大會後的中央軍部執行。在五次大會時有改稱「國民黨工農義勇軍」，五次大會後，則以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改編入正式軍隊之論極佔優勢。夏斗寅叛變時，湖北全省總工會糾察隊有逃走怯懦之現象，遂愈益確定了這種「改編入正式軍隊」的方針，此方針亦成爲政治局中的國是，雖然沒有正式決議；如此寫明，然精神和工作上完全是朝着這個方向走。這種軍事工作的新方針，在現在看來顯然是機會主義的另一方面，並且是違反五次大會決議的。夏斗寅之變，我本決定乘機擴大工人糾察隊，向國民黨中央要求發槍及月費，汪精衛等也曾口頭應允發槍二千支及月費若干；但後來他們又故意推延不發，我們也不去積極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諒：「也難怪他們，武器不是好玩的，現在工農在他們看來如此過火，他們自然怕工農拿着槍便要轉來打他們

自己呵！」兩湖議決案通過之後，湖北省委對於擴大工農武裝及省防軍之事實曾有一度計議，但不久「進攻」空氣消沈，這種計議亦隨之消沈。

情形是向嚴重方向迅速發展。「進攻」的微波打落之後，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亂不振，大家都沈悶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對於每一問題都是動搖的、猶疑的。此時可舉和森來做例：和森深感於帝國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兩讓政策沒有出路，又見全國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漢；有一夜與獨秀、立三縱談這種感想，因主張提高反帝運動，直至不惜掀起武裝干涉，在抵抗武裝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當時獨秀、立三皆以此主張為然，翌日在常委即決定發一提高反帝運動的通告，並特別寄一信與上海，內中參加此獨秀和立三的意见。在此通告及信的說明中，顯然表示一種沒有出路的冒險主義、拚命主義的精神，及藉民族爭鬥來遮掩階級鬥爭之理論上的根本錯誤。（這次常委會有獨秀、立三、國澤和森等四人參加。）此通告及信發出之後，和森自己感覺不正確，因於翌日及第三日連續召集二次擴大的常委會，請政治局全體來參加此問題之討論及決定，但二次都只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獨秀說反帝運動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何必再三討論；和森說此通告及信與對帝國主義的讓步政策根本相反，而且其中的說明我不敢自信是正確的，必須提出於政治局正式討論。是日下午，秋白來常委，和森對秋白說：此信及通告請你仔細看一下，若不是完全對，便是完全不對的。如若不對，便是一種蒲蘭克主義呵（蒲蘭克是法國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家，蒲蘭克主義在馬克斯、列寧主義看來便是一種另一形式的機會主義）！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此問題時，魯易指明提高反帝運動是對的，但其說明在理論上完全錯誤，並且指明不惜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之冒險政策亦是錯誤的。當時和森自己提議國澤另起一通告說明前一通告及到上海信之錯誤，這是當時混亂的表演之一例。

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既然如此混亂，鮑羅庭主義之一貫的領導愈益促進了混亂動搖和猶疑，有一日老鮑出席於政治局會議，發表他關於中國C、P、之目前任務的主張，大意是說：「中國C、P、目前的任務不要以為只有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工作，例如現在中國有這樣廣大的失業羣衆，假若能把這些失業羣衆組織起來也便是一件頂革命的工作。又如小資產階級看不見他們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國主義的○○的經濟封鎖，我們能領導工農向他們讓步，工農讓步之後，他們的痛苦，依然如故，彼時他們便能覺悟到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國主義及經濟封鎖來的。我們能使小資產階級不怨恨工農也便是一件頂革命的工作。總之現在中國C、P、應從各方面多做些有效的事情，令人看着佩服……」。這些教訓只有使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亂和動搖。這些教訓在現在看來完全是一種迴避土地革命的改良主義。

老鮑在另一政治局會議發表他對於土地革命的意见：他公然說明「土地革命不即是沒收土地」。照他的解釋，土地革命的意義和內容是：(1)減租減息；(2)鄉村自治；(3)保護佃農；(4)武裝自衛；(5)辦農運講習所，從新養成不幼稚，不過火的農運人材。當時獨秀說：「

老鮑這種辦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國際土地革命的意義。」秋白說：「這不是修改國際土地革命意義，按照中國目前的狀況確實只能如此做。」（著者按：可見秋白只知道聽從俄人，自己沒有主張。）照老鮑的意思看來，武漢國民政府已算是頂土地革命的了，因為上列五項事情幾乎皆已辦到，而且在未出發北伐前的廣東國民政府即已辦到了。老鮑一直到底灌輸這種改良主義於政治局，怎得不使我們迷離失所，此時大約國際有電報來調魯易回去，魯易已不管事了。老鮑每次都能出席於政治局的會議。

魯易亦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便是中了「汪毒」。他還想拉住這個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衛）來做左派的「中心」，來擴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國際來電和盤托出告知汪精衛！國際來電的要點：(1)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2)武裝C、P、五萬人；(3)推翻反動的國民黨中央；(4)組織革命法庭，懲辦一切反革命。這個電報怎能告知這個逆跡昭著的叛徒！汪精衛知道這個電報之後，謝謝魯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將領大大的鼓動起來，說第三國際及C、P，即要解決國民黨及其一切軍隊，實行共產革命。在這個嚴重的錯誤之下，中央政治局全體反對魯易，大約老鮑也有電致國際，所以國際調他回去。

假左派叛逆的計畫是早已確定了的，所猶豫的只是用甚麼口實來「分共」，公然拋棄三大政策麼？這個太便。為民衆運動的過火麼？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這對於虛偽的叛徒確是一個難題，使他們不得不猶豫。汪精衛會擬行一苦肉計，於七月十五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之前赴九江，名為與朱培德會商東征，實際讓何健發難開刀，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壞三大政策之惡名。現在好了，謝謝魯易先生，為他們解決這個難題，使他們於苦肉計外尋得一更好東西，便是所謂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消滅國民黨的陰謀。

現在嚴重的情形到了最後一階段：(1)馮玉祥來電驅鮑，分共；(2)何健露布討共檄文，並發討共通電於全國；(3)葉琪、周瀾（唐部下）名為回湘查辦許克祥，實際舉辦十路清鄉，積極向農民進攻；(4)唐生智回鄉之日公開反共，將馬日事變責任完全推於C、P、身上，公開槍決我們二同志；(5)何健等公開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農會糾察隊、童子團及婦女團體；(6)何健之卅五軍移駐漢口，其勢洶洶，企圖開刀，這是六月底的情形。

有一日下午（大約是六月廿七）和森從武昌的病假中（五次大會後決定獨秀、國澤、維漢三人組織常委，恩來為秘書長，未到前由和森暫代。後因維漢留湘，不知下落，恩來改任軍部書記，國澤因事與獨秀口角後消極不管事，後又赴河南。因此始終不能成立確定的秘書廳及常委，而獨秀又多外面往來之事，立三忙於全總及勞工部；平山忙於農民部；後補秋白為常委又因病常不能到；而且五次大會後，好幾位重要首領牢騷滿腹，替使性氣，秘書廳工作是最難做的，和森新從外國回來，事情又不熟習，且終日常駐不能他走，故工作異常不同。因此大家皆露骨表示不願和森再在秘書廳及常委。大約是六月廿四日經政治局正式決定鄧中夏同志為秘書長，在鄧因勞動大會未

到前由國燾同志以常委資格兼代秘書長工作。和森因病，於翌日告假到毛澤東同志家——在武昌——休息幾日。回到中央秘書廳之住屋。是夜我們中央軍部來一緊急報告，說何健有今夜舉事之說，各機關皆須戒備。翌晨獨秀召集在西門子鮑宅開緊急會議，立三、兆徵因勞動大會缺席，秋白亦未到。恩來、太雷（鄂省委書記）皆報告何健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時解散總工會，糾察隊將數廿五軍槍械之贖言與馬日事變同一把戲；平山報告鄧演達已出走，臨行希望C、P注意漢口馬日事變之來到，據他（鄧）所知，何健一定閉刀無疑云。同時太雷提出糾察隊、童子團問題今日一定要解決；恩來報告中央軍部與省委軍部業已決定於今日下午將總工會糾察隊調過武昌入張發奎軍，並已與張交涉好，但為避免耳目計。過河時不着糾察隊衣服，也不攜槍。和森說：「這實際是解散糾察隊了，何不率性公開宣布，以消滅何健暴動之藉口？」大家遂決定公開宣布解散糾察隊，實際編入張軍，同時國燾提議中央機關立即移於武昌，他說「事到如今，我們與國民黨人還有甚麼接頭之餘地（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們反難為情；我們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現在不如集中我們勢力於武昌，整軍經武，準備後事；漢口在何健暴動的威脅之下，唐部重兵皆集於此，武昌却是張發奎、賀龍、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左派軍力所在地。」平山、和森皆贊成此提議。前三日和森在毛澤東家知道唐生智回湘後之公開反動（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農民到毛家來），曾寫一信致中央常委說：唐回湘後，反動態度既已如此明白，我們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直無異魚游釜底！「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當討論此問題時，獨秀表示猶疑，說過河往返，與國民黨接頭太不方便。討論結果，決定中央機關立移武昌，同時省委機關亦移武昌。當即指定和森立即往武昌佈置機關，獨秀、國燾料理常委及秘書廳事務；恩來、太雷料理處理糾察隊及童子團等事。和森當即過江佈置機關去了。

不意省委及總工會處理糾察隊之事，手忙腳亂，未向負責同志說明，以致一時大形混亂，糾察軍及辦事人棄槍棄職，逃走一空。同時中央秘書廳未發遷移通知，並未將是日決議告知未列席之中央委員及活動份子，以致大家也莫名其妙。

和森在武昌佈置機關妥當後，翌日黃昏獨秀、國燾過來，不久秋白亦偕一它背毛子來。是夜開會於武昌之新機關：(1)國燾提議整軍經武，注意軍事工作；(2)C、P、中央來一決議，批評黨的中央迴避土地革命，獨秀大發雷霆，碎之於地；(3)秋白有甚長之書面提議，大約係說明湖南農民問題所促進之階級分化的革命危機，主張土地革命暫以減輕減息，鄉村自治，保護佃農等為條件，待有武力再實行沒收土地，中心問題，仍在貫徹對國民黨左派讓步政策；(4)它背毛子出一答覆國際之電稿，內有「凡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中央之指導權」之語句。

國燾之提議未注意討論，獨秀看完秋白書面提議，深以為然，決定請秋白本此提議起草一正式決議案，於七月一日召集一活動分子

會，或中央擴大會。（著者按：可見瞿、陳一氣，其後瞿清算陳，完全是遵照史達林的命令。）

翌日仍回漢口開會於鮑宅，是日才知道這兩日中因解散糾察隊和中央秘書廳未迅速發遷移通告問題，同志間精神大形混亂，有幾位同志激烈反對中央移於武昌，理由是：「我們是領導左派的，左派首領尚在漢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進行，而我們反離開他們藏到武昌去，成甚麼話……」獨秀也以爲必須仍回漢口，才便與汪等接頭，於是又決定中央機關仍回漢口，同時正式決定七月一日開中央擴大會議。

翌日又開會於鮑宅，老鮑出席做了一個很長的演說。大意是(1)現在國際方面有一種空氣，認我們中國黨有改良主義，其實此改良主義並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魯易十倍以上的革命；(2)中國現狀在客觀上是很有利於我們的，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未有取得領導權之可能，例如〇〇〇一直到现在並未真正取得羣衆的領導權，他不過是微倖成功，機械的用砲火把我們的勢力打落下去，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真正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3)史大林（俄黨首領）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史大林他所接受於李諾維夫（國際第七次擴大會前的委員長，反對派首領）的遺產太壞了。以李諾維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大約指魏斯尼克——本書作吳庭康——著者）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史大林的政策難於實行。老鮑做這演說時很精神的。

獨秀接着說：「以前李諾維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史大林教我們二十四點鐘內實行土地革命！」它背毛子與少年國際代表則提出一反對老鮑演說的決議，指明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方針前後是一致的。從前李諾維夫的政策是經過俄國C、P中央批准的，不是李諾維夫個人決定的。老鮑巧得很，反指他們是幫助李諾維夫說話，是幫助反對派。

老鮑上面這個演說全是文飾自己的改良主義、機會主義的；也是他的起身砲，留下一個中國反對派的理論基礎：國際方針前後是兩截的，中國革命的失敗，國際負了責任。也就是說中國黨沒有改良主義、機會主義，國際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義、機會主義。老鮑不說布哈林領導的第三國際「不懂中國情形」，不說史大林領導的俄國黨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過歸移於李諾維夫，實際便是把中國機會主義的責任歸於第三國際，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維護史大林的立場說話。

「我們主觀力量沒成熟」這句話在西北學說的字典上來解釋工農運動過火，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農，一言包括，便是我們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太不成熟。若從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字典來解釋，便是我們指導機關社會民主黨化，迷信民族資產階級，迴避土地革命，以致不能取得領導權：一言包括，便是三月廿以來的機會主義太熟了。

最後的破產到了：七月一日武昌的中央擴大會是五次大會後機會主義的總結。但不是秋白同志和獨秀同志個人的責任；秋白主持的決議和說明中，不過是兩月以來（五次大會後）動搖、猶疑、迴避土地革命，向所謂左派讓步政策之總結罷了。

C 五人政治局至八七會議

不知道是七月初幾（和森於七月二日大發舊病，三日由國壽通知說常委決定和森送入醫院養病，愈後即去九江有事），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壽、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顧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鮑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換兩湖工作同志，以為大反動到來，一切過去知名之人皆不應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發、項德隆（英——著者）等同志決定去俄，毛澤東等則決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許多活動分子認為是「散夥政策」。同時常委決定，中央機關立遷九江而轉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憤懣。

大約國際責斥機會主義，謂回老鮑及改組中央之訓令已來了許久，老鮑秘不發表，中央移武昌時，它背毛子所攜致國際電稿內有「……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之語，我們莫名其妙。此後老鮑之提議改組五人政治局，及獨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係敷衍國際的；又恐獨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參崴為陪襯。這種用心，至八七會議時才有人說出，原先我們莫名其妙。（著者按：中共黨人直狗漢耳！）

此處老鮑又犯了最後的嚴重的政治錯誤：(1)假若老鮑早將國際訓令發表，何致七月一日武昌中央擴大會猶在那裡貫徹那迴避土地革命向所謂左派讓步的破產政策；(2)假使老鮑在中央擴大會時將國際訓令發表，我們能於七月一日決定一與假左派決裂的方針；彼時唐生智、汪精衛與我們決裂的陰謀尚未成熟，勢力還未完全集中，我們在豫鄂交界的張兆豐同志（屬方振武）之一師二旅勁軍還未被解決；張發奎（此時與唐甚衝突）、賀龍、葉挺及軍事政治學校之軍力皆集中武昌，工農民衆冤憤憤，正是積久待發；假若此時決定與假左派決裂，便是決定我們在兩湖以至江西之暴動，何致待至八月一號才在南昌發作呢？(3)老鮑臨行猶給一種「逃跑主義」，「散夥主義」於五人政治局，以為「大反動臨頭了，中國的一九〇五到了」，以致使此臨時政治局開始即全無鬥志，懷疑國際訓令。所以老鮑不發表國際來電，敷衍國際之罪小，而延誤我們的新方針之接受和新政策之執行其罪大！及至七月十三日的前幾日，老鮑才提出國際來電以C P中央名義發表一批評式的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國際來電是要我們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還有「希望」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然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響是很偉大的：當時王荷波同志說：「我們工人看了此宣言，雖然未揚眉，相覓吐了一口氣——晦氣」。

七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開會，我們的平山同志等不敢出席，我們的臨時政治局也未準備任何羣衆示威的表示。只有何健的軍隊上街示威，並至國民黨中央會議處欲捕我們吳玉章同志等。

此時臨時中央機關又由漢口復移於武昌。和森在漢口出醫院後（大約是十六日以後）曾寫七次信於中央常委，提議之事有：(1)提議中央開一正式全體會議決定新方針；(2)提議武漢三鎮舉行一大示威運動，反抗「分共經過」之國民黨宣言；(3)提議重新號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號召以此爲中心，揭破國民黨減租之假面具（國民黨中央於十七日發表一減租命令）；(4)認我們現在的失敗不是一九〇五，認唐、汪政權並未穩定，工農勢力並未冷火氣，因此主張中央仍應留兩湖奮鬥，反對遷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義，(5)反對類似「散夥政策」，並自請仍留兩湖工作，不願去海參崴辦黨校；(6)主張在張發奎軍中準備獨立動作，並公開作反汪派之鼓動。此時國際代表已到漢口，且態度異常嚴厲，主張立即懲罰獨秀、平山、維漢，又罵國燾等不贊成土地革命，不配當中央指導人，又向國燾、太雷、維漢（常委）聲明：「如果你們反對開中央改組會，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開會，」同時果派去一個毛子直接赴湖南宣布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和立即改組中央。因此常委及一部分上層同志對於和森大起誤會，以爲和森是「投國際的機」，「想組織左派」，「國際訓令來後稱好漢」，「擺脫過去共同參加的錯誤說漂亮話」，「每日一封信唱高調」……其實上面那些情形是八七會之前幾日太雷同志報告出來（在常委），和森才知道的。

事後追論：當時常委諸同志見到黨的上層的危機（上而國際實罰，下而同志非難），而未見到革命挫敗時羣衆異常惶恐和恐慌的大危機。此危機只有斬釘截鐵宣布與執行國際新方針才得挽回。此時常委是站在一種倫理觀念上去護黨，而不是站在政治觀點上去護黨，常委只知道接受國際訓令處罰中央及首領對於黨有危機，而不知不接受國際訓令，不宜布新方針，於黨及革命的危機更爲重大。此時上層首領的利益與黨及革命的利益是難兩全的：和森違背指導團體的共同，獨自急進的主張承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改組中央，接受國際訓令，這在通常的道德和倫理上講是可鄙的；常委顧全指導團體的共同，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不願接受國際新方針，這在非階級的道德和倫理上講是可欽佩的，然若在我们的政治上講，則是非黑白的位臚又是不同的。五次大會前，有人咒罵秋白是國際決議到後稱好漢，自然現在這種咒罵又移到了和森。然而事實不是如此的：第一、因爲和森「每日一信唱高調」都是向中央常委唱的，而未向下層羣衆鼓動或宣傳過；第二、和森個人的思想，因爲在武昌毛澤東家獲與由湘逃來之同志及農民談話（他們甚不滿意於中央及湖南指導人，說不是許克祥殺他們，仍是某某殺他們……）。因而思想上起了變化，又因病在醫院，有時間想這些問題；第三、和森與國際代表之關係是在八七會議及翌日之新中央會議見過二次；第四、和森於八七之前請求派赴湖南參加秋收暴動工作，並得常委之許可，絕無仍留中央

稱好漢之企圖；第五、和森始終不主張着指導人多留於改組之中央，其理由在八七之前的常委會及八七會議中皆正式發表過，因為如此，才能使黨內外羣衆耳目一新，因為如此，對於新方針之執行才有充分保障。八七會議，和森之所以反對國際代表提出之名單（是與常委決定的），是因為除加一蘇兆徵同志及羅亦農同志外，一切皆是舊人，即王荷波、向忠發、顧順章等工人同志，初皆未列，許久以來代表湖南農民革命之激烈傾向的毛澤東、彭公達同志（彭是馬日事變後提議號召卅萬農民進攻長沙的）亦未在列，而如和森反在名單內有地位；第六、和森主張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澤東應加入，太雷應出外工作而不應留秘書廳，維漢可留中央組織部或秘書廳工作而不必兼常委名義，這些都是斟酌當時實際情形而主張的；第七、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係，絕對不是甚麼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後，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八七會議時又主張他在中央；第八、和森請求回湘工作，絕不是企圖與澤東等組織甚麼左派，只因兩湖暴動和森是提議之一人，又被時湖南工作實須要加入。八七之明夜，和森正欲與公達上船回湘，而新中央來一命令停止和森前去，翌日開會正式決定來北方工作，和森於討論決定之後，即遵照決定北來，一直到現在沒有甚麼左派的宣傳和組織，便是明證；第九、在八七前後反對那種盛行的「黨在組織方面無出路」的悲觀空氣，是正確的，並不是和森想造左派故如此之樂觀。

八七緊急會議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縱然在嚴重情形之下，不能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組中央，發展討論，縱然中央及全黨的組織問題，還無很滿意的解決，然無論如何總是公然的正式的承認了自己機會主義的錯誤（不是國際不懂中國情形政策過左，以致中國革命失敗；也不是我們有錯誤，國際也有錯誤），公然的正式的接受了國際的新方針。由此會議救出中國共產黨於機會主義的破壞之中，挽回了全國工農羣衆惶恐恐慌的大危機，樹立了工農革命蘇維埃政權的新大旗。

自然八七會議不過開始承認與改正機會主義的錯誤，並不是這一次便完全肅清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的遺毒在黨內還是很深的。然僅僅是這一開始承認與改正便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八七會議未鄭重討論南昌暴動問題是一缺點。會議之末，和森曾提議討論此問題，以為未宣布沒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農民暴動，未完全解除敵人的武裝而即出走為失策。然當日已沒有時間容許討論此問題。第二日新中央開會，和森又提議前敵主要負責同志有懷疑新政策之弱點，應注意指導人問題，於是日亦不允許討論此問題。

南昌暴動之失敗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為前敵主要負責人之主觀沒有根本改變，平山同志不必論，國燾同志自從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來，開始表現他政治上弱點，尤其懷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羣衆勢力而對於張發奎發生幻想。國燾同志在五次大會前素來的傾

向大體都是很好的，在五次大會後的七人政治局中，除開始月餘消極一點外，也還沒有嚴重的錯誤，即有也是旅進旅退的，國燾同志嚴重的錯誤，是開始主持常委之時，所以他赴南昌去時對於暴動是沒有決心的。

雖有廣東、兩湖之失敗，然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八七以後之偉大的效果。北方有些同志說：「假若新方針運來一月，我們都散了。」這不僅北方爲然，全國莫不如此，尤其在兩湖、上海及廣東。我們仗着新方針，不僅挽回了工農羣衆的恐慌和悲觀，而且興奮了廣大範圍內幾百幾千萬的羣衆，繼續不斷的發展工農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蘇維埃政權走。

國際訓令初到時，黨的上層之間發生一種悲觀的空氣，以爲國際訓令這樣一來，一切舊指導機關和指導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爲黨在組織方面沒有出路。亦農同志甚至說：「即使在政治方面有出路，組織方面是無出路的。」又以爲黨沒有家長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爲有這些顧慮，以致對於接受新方針非常猶疑，非常害怕。現在八七以後的事實可以答覆這種顧慮和悲觀。

八七以後，只有反革命資產階級的政黨四分五裂，不成東西。我們的黨適得其反，我們在新方針之下不僅重新團結了黨員羣衆，而且領導廣大的工農羣衆到新的革命高潮上來，這是值得我們自誇的。

D 問題與結論（約五千字略）

（錄自黨史會膠捲）

（註一）「蔣總統傳」①九九頁。

（註二）根據「陳獨秀告同志書」，較武漢中央所發表者多一條，內容亦詳。又，據中共所印行之「史達林論中國」文件內容大致相同。

（註三）「陳獨秀告同志書」。

（註四）波多野乾一「中國共產黨史」一卷二〇一至二〇四頁。

（註五）此決議案一時未能搜獲，據汪兆銘報告「武漢分共之經過」，其內容爲：①召開四中全會，討論分共問題；②分共前，制裁共黨言論行動，③保護共黨身體自由。

第十一章 瞿秋白之盲動主義

瞿秋白之盲動主義，是中共蛻變之過程——從上海時期蛻變至江西時期。

中共自被移植到中國，其所以能生存與活動，有賴於寄生在其母體之內——國民黨之容共。無奈此一幼蟲正嚙其母體以自肥，遂被其母體排出，而處於蛻變狀態。蛻變之於幼蟲為一種災難，如不能自謀生存，必將死亡，而自謀生存，則有賴於努力掙扎及移植者之細心照料。盲動主義即中共之努力掙扎及史達林細心照料之產品。

所謂盲動主義，起於民國十六年八月武漢分共之後，終於十七年七月中共六次大會「立三路線」之前，為期約一年。十六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於武漢，被稱為「八七會議」。在會議中，陳獨秀被指為機會主義，從黨的家長地位倒台，而以瞿秋白為政治局常委，居於領導地位。秋白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從事各地暴動，遭受失敗，又被國際指為盲動主義，至六次大會時被留於莫斯科。繼起者為「立三路線」。瞿秋白所領導之各地暴動，其最著者為南昌八一暴動，兩湖秋收暴動及廣州暴動。凡此暴動，無不慘敗，足以說明此一幼蟲在蛻變過程中試圖自謀生存所遭遇之災難。

移植者史達林對於此種災難亦應負其責。

史達林持「國共合作」主張以與托洛斯基之「實行蘇維埃專政」主張鬥爭，不幸招致嚴重打擊——武漢分共；最後仍企圖只脫離國民政府而不脫離國民黨，亦由於武漢政府被國民黨左派改組，致戀棧於農政部長之譚平山，戀棧於工部部長之蘇兆徵這兩個共黨份子無以自存，而被迫退去，其他插足於各級政府部門之共產份子亦紛紛被清查踢出。處此進退維谷之境，史達林不得不一面繼續與托派鬥爭，一面設法挽救中國共產革命之失敗。

關於史達林繼續與托派鬥爭，在八月九日，史達林於俄共中、監聯席會議席上，承認反對派之指摘：中共有「社會民主主義、孟什維克的錯誤」，但仍強辯說：「托洛斯基底驕傲使我吃驚，你們瞧，現在他似乎不能容忍西方或東方共產黨的極小錯誤。在中國，有一個年輕的黨，它算起來不過存在了兩年（？），在那裡出現了孟什維克的錯誤，你們

瞧，這竟使托洛斯基吃驚了！」（註一）

中共之錯誤，本為史達林指導之錯誤，而史達林悄然推在「年輕」中共身上，以為清算陳獨秀地步，並藉以推卸自己之責任。

在此次俄共中央席上，史達林仍反對托派所主張的在中國建立蘇維埃。

直至九月二十七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中央席上，尚罵托洛斯基和季維諾夫為「胡鬧」，為「躊躇不決，一場糊塗，完全沒有路線」，但此時中共已奉史達林之命，在南昌、在兩湖、在廣東各省暴動或準備暴動，史達林不得不實際接受托派的主張，謂，「現在，在運動進展之下，蘇維埃就可以成爲而且確實會成爲工人和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基本力量了。可是誰來領導蘇維埃呢？當然是共產黨人。」（註二）

（史達林此一轉變，決定了爾後十年中共在江西各地製造「蘇維埃」叛亂之局。）

關於挽救中國共產革命之失敗，史達林於武漢分共後，撤回原任第三國際代表羅易，另派其親信羅明納茲（*Bole Lominadze*）與紐曼（*Heing Newmann*）二人來華，授以使命：（一）將中共失敗之一切責任推之於陳獨秀、譚平山等身上，指爲「右傾機會主義」，而加以清算；（二）策動暴動，以求造成一新的形勢，掩飾其過去指導之錯誤。爲執行其前一使命，令中共召開八七會議，爲執行其後一使命，令中共發動各省暴動。

第一節 八七會議

壹 清算陳獨秀之機會主義

中共於八月七日召開中央全會於九江（註三），稱爲「八七會議」。由於中央委員多人參加八一暴動，故出席者不多。據蔡和森「機會主義史」及「國燾回憶」，出席者有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時、張太雷、李維漢、彭公達等，其可能

出席者有蘇兆徵、向忠發、項英、陸沈等，毛澤東似未出席。其當選常務委員即政治局者，據前引蔡、張資料及向忠發供詞，爲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徵、羅亦農、張太雷、李維漢、向忠發七人。但國燾尙將項英、盧福坦列入。蔡和森又謂「王荷波、向忠發、顧順章等工人同志初皆未列」，毛澤東、彭公達亦未列入。張國燾則謂張國燾、李立三、蔡和森、周恩來均取消其政治局委員。（但周不久又補入。）又當選候補政治局委者有張國燾（暴動失敗後被開除）、彭公達、毛澤東等（註四）（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被開除。）瞿秋白取代陳獨秀爲總書記。陳獨秀、譚平山被指爲「機會主義」，獨秀被開除中委，平山被開除黨籍。

會議發表「告全黨黨員書」，國燾謂係羅明納茲起草而由瞿秋白譯出通過者。會議明確指出陳獨秀、譚平山之「右傾機會主義」，不能堅決執行國際決議，每臨到工人或農民要求暴動關頭，採取可恥的退讓政策，而唯國民黨之馬首是瞻。（會議對於明顯的國際指導之錯誤不敢絲毫觸及，反而斷章取義，曲予辯護。）此項清算見之於「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文長二萬五千字，此爲中共歷史上關鍵性文件，轉錄如下：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一、緒言

同志們！

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現在致書於全體同志的時候，正是很困難危險的時期。今年四月間南京政府在上海發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武漢政府繼續發展而完成。三個月以前，武漢政府曾經宣佈，南京政府的執政是革命叛徒，現在呢？他自己冒國民黨之名，甚至於冒「左派」國民黨之名，來摧殘工農運動，農民協會被解散被禁止，幾百幾千的工農運動的指導同志被殘殺，農民運動區域，無不受清鄉所蹂躪；工人亦是到處受摧殘，武裝被解除，工會日益受着壓迫或佔領，指導者亦被殘殺，工會機關到處遇見派來的走狗。壓迫得尤其嚴重的，便是我們的黨。一切勢力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稱共產黨爲人民之公敵。汪精衛等叛背了國民黨的主義及傳統而與共產黨破裂。驅逐軍中共產黨員，我們的黨不得不秘密起來；因爲反動派要想完全消滅我們。反革命暫時的得着了勝利，正拿着武裝來對付勞動階級。

我們要知道，如果羣衆運動不能夠起來堅決的反抗，最近期間白色恐怖決不會減弱，只有越發厲害。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尊重」

工農，沒有絲毫的幻想！這所謂國民政府是什麼？他從革命的政權機關變成了資產階級之反動的執行機關。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如汪精衛之類，見着革命發展便嚇慌了，寧可背叛國民黨的主義，完全走進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對於資產階級的反動派，現在還有些用處；因為革命運動的力量沒有完全鎮壓下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利用國民黨的這些叛徒，好暫時冒充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招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大多數其實已經背叛了，出賣了革命的國民黨之光榮的旗幟。

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汪精衛、孫科等人多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既已走到反動方面去，自然不是國民黨的代表和領袖；所以一切工人農民都應當知道，最近期間的白色恐怖，要在汪精衛叛徒的旗幟之下能實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只有廣大的勞動羣衆積極起來反抗，實行革命的鬥爭，才能奪去篡竊國民黨旗幟以實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撲滅反革命。

現在的形勢是反革命派屠殺工農羣衆，壓迫羣衆運動，搗亂工農團體，所以中央委員會首先要告訴你們的，便是你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黨從羣衆運動裡發展成了偉大的力量，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他的作用是絕對的偉大的，現在我們黨的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問題的歷次決議，都脫黨的政策及黨的指導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過去中國革命的進程，大半與本黨政策有關係的。將來革命的命運在形勢變更之後，更加要靠我們黨的政策正確，要看我們黨對於形勢變更之後的職務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決議指出我們黨的指揮做了極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全黨積極的批評這些錯誤而糾正他們。這些錯誤并不是指各個的偶然的錯誤而說的，而是說黨的指導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拋棄這一機會主義的方針，糾正過去的錯誤，那就不能正確的規定將來的的工作，自然更不能進行革命的鬥爭，以適應當前的艱巨職任。要糾正錯誤的方針，必須指明是怎樣錯誤的，應當要使每個黨員都得到過去的教訓；我們黨如果不糾正指導機關的錯誤，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進。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怕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并糾正錯誤，不吝，不隱瞞，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深信本黨的生命與力量決不致於怕披露和批評我們的疏忽和缺點，甚至於披露之於我們階級仇敵之前也無所怕。等共產黨的敵人幸災樂禍好了！讓他們去亂叫共產黨崩壞好了！這種攻擊，是嚇不了我們的，我們勝過敵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够在自己錯誤經驗裡學習出來，毫無畏懼披露自己的錯誤，并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我們黨有這種偉大的力量，不但因為我們黨的階級性使然，而且因為有羣衆的奮鬥，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羣衆之奮鬥做保證——這些羣衆是我們黨的基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上說：「中國共產黨英勇的奮鬥，中國共產黨廣大的黨員羣衆，艱苦犧牲的在社會下層工、農、城市貧民之中，實行真正的革命奮鬥」。我們黨的指導機關却有機會主義的錯誤，經常的動搖和猶豫，在緊急關頭總是沒有堅決行動的決心。指導機關的非共產主義的不革命理論，以及不革命的行為，不但絕對的與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相矛盾，並且和我們黨員羣衆工作相反。

譬如說：上海、廣東、湖南，本黨普通黨員羣衆都有過偉大的奮鬥，屢次光榮的總同盟罷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動——最後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勝利，這些都是光榮的歷史，不但在中國史上有無上的光榮，而且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上也是如此。這一頁光榮的歷史，是上海共產黨——無產階級所寫的。

上海無產階級在共產黨指導之下所表現出來的勇敢性，革命性，階級意識的堅決和政治意識的高度，甚至歐洲各國無產階級所不能超過的——那些國裡的工人革命運動，差不多都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呢。中國共產黨可以以上海的共產黨羣衆自豪了；廣東的共產黨員，領導了鐵路工人的暴動以反抗李濟深，領導農民運動的武裝暴動能够在各地方繼續抗爭至兩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堅決犧牲的革命黨人，奮鬥到最後一滴一點的可能，這些共產黨員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勢中工人階級的先鋒的榜樣。湖南同志領導農民運動的鬥爭，亦是這樣光榮的中國歷史裡的一頁，農民協會的實際的政權，是共產黨員領導，而農民羣衆所創造的；自動沒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於鄉村農民，解除豪紳團防的武動，創立武裝的農民軍，徹厲的鎮壓封建的反動分子，極偉大的農民運動的規模，而且會和國民黨下層羣衆結合革命的聯盟——而不是機會主義的聯盟——最後組織農民暴動，以反抗長沙的反動政權（這次暴動如果不是中央黨部機關在緊急關頭採取可恥的退讓政策，無疑的是勝利的。）——這都是湖南共產黨員努力的成績，這是解決土地問題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產黨員羣衆，亦是如此，黨員羣衆的行動真正是英勇激底的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要忍受很大的犧牲，但是我們黨的羣衆沒有怕犧牲的。中國革命之中，他們的奮鬥，使得我們的黨取得偉大的光榮和信用，黨的羣衆是我們力量之源泉，有他們的幫助，黨的指導機關之錯誤，無論如何大，都是容易糾正的。固然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沒有堅決實行的能力，這對於中國民衆的革命鬥爭，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大有損失；然而本黨有上海、廣東、湖南的經驗，決不會因指導機關之錯誤而陷於敗亡。本黨一定有這個力量，保證今後有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指導。

二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於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了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裡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正確些說：是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黨的指導每當解決這些革命之根本問題的時候，時常在理論上實踐上違背共產國際的根本原則及列寧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估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陷於最庸俗的機會主義。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而有生長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趨勢。中國革命尚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他反對帝國主義之壓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會經濟政治的遺毒。現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階級要求解除開所未聞的壓迫制度，與奴隸制度之爭鬥；這種奴隸制度，正是帝國主義依據中國封建關係以建立其統治之基礎。

如果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相對立，那末，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簡直不是布爾塞維克的。共產國際向來反對這一般的觀點，認為是最壞的一種機會主義。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反對以國民革命的職任與階級鬥爭的職任相對立的觀點，這一類的觀點在西歐各國的極左派與社會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實這是拋棄中國民權革命中無產階級之領導權，拋棄領導權而爭所謂「勞工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是機會主義之一種，實際上便使無產階級變成「民主營壘」的尾巴。」中國革命中各種社會階級的作用是什麼樣的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遺毒，是外國資本無限制剝削中國民衆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維持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所以非常之明顯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封建制度的破壞，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而要破壞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愈堅決愈劇烈，農民羣衆加入鬥爭的愈多，殲滅地主豪紳的統治愈厲害——則國民運動的規模愈廣大，國民運動的勝利愈鞏固。

從另一方面觀察，外國資本在經濟上勾結一部分城市資產階級（買辦），這一部分資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保存而擴大。

至於所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呢？那末，他們是受外國資本的競爭而又受其排擠的一部分中國資本。因此，他們被逼而不得不對於帝國主義實行經濟鬥爭。

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曾經參加中國的革命，甚至有一時期曾經做這一運動的領袖，然而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及農民羣衆運動，提出革命的階級的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又大大的發展，這些情形，使民族資產階級離開國民革命的戰線而走入反革命的

疊疊。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政策上的變節，以南京政府在上海的屠殺而著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今年四月間飽受革命運動偉大的規模之恐嚇，就要去和帝國主義妥協，他如今和買辦階級封建階級的大地主相像，將要成爲外國資本對於中國統治之支柱。正因爲這種情形，更使無產階級的鬥爭——力爭自己真正的階級要求的鬥爭，變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須的條件。

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使他與帝國主義接觸而引起最堅決的衝突，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足於掘斷帝國主義力量之根源。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聞所未聞，這種情形，保證了外國資本在中國取得了最高的利潤。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壓迫所依據的支柱。中國工人階級則因客觀狀況的關係，是力爭中國民族解放最堅決最徹底最不妥協的階級，此種情形，使中國無產階級應得民族解放運動中之領導權。可是中國無產階級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國民族的使命，只有隨着力爭自己的階級要求的鬥爭的發展，而日益實現這個使命。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決議案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承認中國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經「完了」，彷彿在上海屠殺之後，已經開始了別一種工農的階級革命——這是不對的。中國革命現時的危機及各種社會階級力量離合現勢，表明并且證明，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內），尤其是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完成，必須實現於反對已成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之鬥爭之中；澈底的民權解放鬥爭，不但不會和工農羣衆的鬥爭開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衝突，而且能直接發展廣大的下層民衆的羣衆運動。

誰要民衆解放革命得到勝利，誰要中國完全脫離外國的壓迫，他便應當促進、擴大并激勵工人反對資產階級，農民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他便應當贊助社會鬥爭，使之進於全體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於小資產階級，則除去少數的反動的成分，與買辦階級、封建階級相勾結的成分，其餘一般手工業者、商人、學生、店員及城市貧民，亦因自己客觀狀況的關係都利於革命的階級運動之勝利。然而小資產階級必然是動搖、猶豫、徘徊於互相鬥爭的階級及革命反革命之間。這種猶豫與動搖，往往對於革命鬥爭的出路，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但是小資產階級動搖猶豫的態度，大部分由於革命階級運動的力量決定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鬥爭愈堅決愈劇烈，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愈深入，則小資產階級愈能轉向左傾，愈能站到革命的戰線上來；反之，如革命的階級及共產黨自己也表現動搖，不徹底，不堅定，則小資產階級愈加傾向資產階級的營壘，反革命的營壘。無資階級的先鋒隊，除自己的堅定與果決外，沒有更真實的領導小資產階級的方法。

列寧屢次的說過：「誰要幫助動搖猶豫的人，必先自己開始便應當不搖動不猶豫」。我們應當記着，社會之中既然發生了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小資產階級便無論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獨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資產階級同道，或者和無產階級同道，無產階級應當明瞭小資產階級之搖動是不可避免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自己應當有堅決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決目前的問題。

凡此一切都是對於中國革命中各種動力的估量，足以決定共產黨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們黨的指導，在理論上，尤其是在實際上，剛剛對於中國革命中各階級的力量估量，有一個相反的觀點，這就預定黨的指導之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維克派似的，將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對立，彷彿認爲階級鬥爭的開展，足以破壞國民革命，而要想叫全黨及工人階級、農民都自己來限制階級的要求，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不用革命的鬥爭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所發給上海的信，對於上海鬥爭的指令說：「中國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國主義……現在幾乎忽略反帝工作」，彷彿專注意於進攻封建制度，而得到不好的結果。中央罵共產黨員走得遠遠了，更叫本黨所領導的革命的農民往後退。這一指令裡又說：「一方面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沉下去，別方面工農運動發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資產階級看來是如此。單調的去武裝工農沒收土地，高叫非資本主義前途等口號，使小資產階級懷疑共產黨快要革國民黨的命，要進行階級革命而不是國民革命」。這樣中央那時認爲階級鬥爭是一事，國民革命又是一事。這一信裡又說：「小資產階級看不見沒收土地是國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爲只有共產黨要沒收土地，實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農的力量，因此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提出這種問題，不能不要求限制工農運動，甚至於與共產黨破裂。在這種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呢？如果這樣，那就是取消我們的力量，拋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投降南京政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沒收土地，武裝工農呢？這個蠢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滅革命的根據地。如果我們不能用相當的方法過渡這種難關，那就是資產階級勝利。我們不應當拋棄沒收土地，武裝工農的政策呢？這當然不好。譬如就湖南反許的問題，我們已經決定領導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武裝起來，這是獨立的政策。但這潮政策太危險了，假使我們完全獨立的幹起來，那末，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將要破裂。固然這是光榮的失敗，但是破裂對於我們是不利的，我們應當找新的道路。經過新的道路來渡過現在受遇的危機與困難，使革命深入廣出，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指令的結論是：中央叫上海的黨部「不要看着國民革命運動是工人問題」，而要對各階級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說去宣傳上海資產階級。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不革命的、非共產主義的方針，足見中央指導機關對於革命的根本問題，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質問題的見解都是錯誤的。

中央在這問題的機會主義是共產主義者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反映，整個兒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這種方針，完全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決議不符，完全與黨員羣衆、工人階級及革命的農民之鬥爭不符。

誰要替這個機會主義者辯論，或者主張繼續這種機會主義，他便永久和共產主義離別了。

三 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就是無產階級最先進、最革命、階級覺悟最高的一部分。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永久從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出發，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既然以工人階級利益為最重要的前提，同時，再要提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時期中客觀上可以解釋的要求，在這一革命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的時期中，都是如此。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羣衆而指導他們的鬥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及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隸狀況。

這種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權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羣衆的獨立鬥爭。共產黨應當發展擴大并激勵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應當領導工人每次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共產國際屢次命令中國共產黨，要我們盡力量增進工人階級羣衆的物質生活，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工人的社會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壓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認識自己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利；同時共產國際指示必須迅速勇敢堅決的實行武裝工人和農民，尤其是其中最覺悟最有組織的份子。這一政策國際是認為萬分必要的，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和各地工業區工人羣衆自己鬥爭是相符合的，和本黨黨員羣衆的行動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黨指導機關却是走的別條路，他只在阻止緩和階級鬥爭和工人的革命行動，中央不去開展推動罷工運動，却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主權屬於政府。在各階級聯盟的政府之下，其先一時期，這一政府而且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這在客觀上是有種種的利益，實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實在大大的阻礙工人運動；那時國民黨中央有不得政府同意，不能有企業中之罷工之決議，又有要工會不為工人要求而鬥爭，須要守勞動紀律的決議，我們中央並沒有反對。中央政府以為限制些工人運動，可以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盟，沒有懂得我們不堅決的擁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只有使資產階級更加右傾。中央想盡方法限制工人的經濟鬥爭，不使他們為自己階級直接的利益而鬥爭，其實這種要求不能實現，便永世也脫不到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央當時規定這種策略，實是因爲對於小資產階級聯盟的觀察是錯誤的，對於國民革命之利益的觀念也是錯誤的。（著者按：這種「錯誤」是史達林指示的。）

自然爆發而發展的工人運動，自下而上建立了強大的工會，完全在共產黨員影響之下，并且發生了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及廣大的勞動童子團等等。工人階級自己覺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來反抗資本家，而資本家早已反革命，對於生產則怠工，故意造成工業的危機，金

融的紊亂。只要工會逮捕幾個廠主、店東，一般資產階級便大叫其「過火」，如是不僅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跟着亂叫，而且這時本黨中央也跟着這樣承認，於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堅決說「過火」怎樣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說給工人聽，說不應占領工廠，即使工廠主的故意閉廠，也不應當；說不可以封店，即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可以；又說決不該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顯然是反革命黨，也是不該。

潮流似的工人階級向着真正工人農民擁護進行，中央却盡力阻止工人運動走上這條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沒有設法武裝工人，他反一遇見資產階級方面的不滿意，立刻便自動的解除武裝，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為保存與小資產階級聯盟起見，中央便下令解散勞動童子團。

國民黨中央下令叫工人嚴守革命紀律，還要工會去執行，違法者交政府管理，工會只准處罰工人。我們中央對於這個命令，一句話也沒有提出抗議，湖北省總工會接受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認。中央對於工人階級表現的獨立性，每次都說是「過火」或「幼稚」，沒有注意自己所說的話，實在是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的話。

黨的指導機關的錯誤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經濟鬥爭上是如此，而且關於工人的政治行動，也是如此；武漢工人奪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歷史意義的，但是這不但是經過黨的指導機關而實行的，并且中央事後還說這是不對的。最近中央曾傾向於自動取消上海的秘密工會，而使他們加入南京政府的黃色工會。對於羣衆的懼怕，不信任羣衆的方量——在黨內問題裡也是如此。黨的指導機關裡估大數是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要求之後，方才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許多工會之中指導者的黨員也不是工人，而是學生，智識份子。當要辦黨校的時候，中央非常堅決的要使工人份子減少些，說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識不發達，不覺悟；然而事實上，譬如上海的工人，其政治意識比黨的指導機關高的多；我們黨和這種非無產階級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機會主義，必須斷絕關係，永不沾染。

四 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共產國際特別說明這一問題不止一次了，這許多時候，共產國際曾經給我們中國黨明顯清楚的指示，指示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亦就是繼續以前的指示。這一決議說：「要引導羣衆來鬥爭，只有在農村中依據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據工人階級需要之滿足及其政治權利的保障；堅決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沒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貧農所欠重利盤剝者的債務，禁止苛約，堅決的要求減稅，而使富人多負稅捐的責

任，這些要求應當實行之於全國，首先是武漢政府領域之內。這些要求應當可以引起羣衆反對地主及舊叛革命的資產階級，并反抗北方軍閥。」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之內容，現時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幾千百萬農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則應當做這一運動的領袖，而領導這一運動，并且共產黨應當在政府中實行一種政策，使政府自己贊助土地革命之發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將現在的政府，變成工農運動的組織上政治上的中心，變成工農獨裁的機關。

然而黨的指導機關的工作，恰好和這種革命方針絕對相反。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極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反對豪紳地主，然而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違背他的指示指令而做出來的。總之，只有自下而上的運動，各地農民運動只有下級黨部及黨員羣衆領導着，中央只是時時阻滯革命的農民運動，甚至於拉他向後轉。黨的指導機關，一直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農民土地問題的意義；第五次大會之前，黨的指導機關，對於土地問題，只有絕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漢口開的中央特別會議，提都沒有提到本黨對於土地問題的態度，雖然這一會議是北伐勝利後決定黨的任務的重要會議。各省歷次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時，本黨亦沒有規定自己對於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及一九一七年一月江西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方才提出這一問題。

在第五次大會時，土地問題議決案雖然通過了，但是黨的領袖陳獨秀、譚平山同志，却說現在只要擴大而暫時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沒收土地還要等一等。

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開了三個禮拜，以譚平山爲領袖的共產黨員改變了自己的主張，兩次都是看着國民黨代表是否接受而改變的，最後擬出了一個草案，只在原則上定出解決土地問題，而不求立即解決，當到國民黨中央決定不公佈這一議決案，共產黨黨員之中，沒有一個人抗議的。

共產黨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擴大會議甚至決定，凡田租超過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減租——這個時候是湖南農民協會開始積極的鬥爭，甚至於已經實行分配土地的時候了，我黨指導機關口頭上承認某種錯誤，然而始終繼續阻滯土地革命的方針到底。我們黨實際上跟着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領袖，盡力在那裡反對農民運動中的「過火」。

黨的指導機關的方針，客觀上反對土地革命的方針，六月一日中央宣傳部通告說：「我們應當記着，我們黨對於農民的政策是堅決的實行制止反對小地主、革命軍人、小資產階級的過火行動」。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說：「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來解決土地問題，

已經引起了無數的過火行為，這種情形，必須糾正」。甚至於有一種論調，說武漢境內的過火行動是南京政府奸細所做的——這簡直是跟着武漢將軍們說話，因為他們也說這些過火行動是南京政府的奸細做的，共產黨的指導者也居然這樣替壓迫農民運動的人辯護。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說：「反動政府及土豪劣紳利用少數農民，侵犯軍人家屬的事，專門從事挑撥離間，他們為左傾之宣傳，然後再從而壓迫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負責指導者之一曾經說：「自由逮捕，使小資產階級發顫不安，他們覺得彷彿國民政府做了共產黨的俘虜了，他們這種感想必使之消滅」。(著者按：全國農協負責入實際上是毛澤東。)

如此說來，偉大的湖南農民暴動，不但驚嚇了資產階級的地主軍閥，甚至於驚嚇了共產黨的指揮者；那時正是各地共產黨羣衆力爭這個運動的發展，勇敢的犧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貴，然而中央受着國民黨領袖恐嚇猶豫的影響，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對於農民政權問題，也是非常之機會主義的，不去考察農民羣衆革命鬥爭的經驗而引出相當的結論來，却想只靠着死板組織鄉村自治的系統表——說不合實際生活，又有害於革命，其實自然的潮流已經將革命的政權交付於農民協會，發動了沒收大地主土地及減租的運動，解除了民團豪紳的武裝，懲治鄉村中的反革命派。

黨的中央不去贊助并發展這一革命政權的方式，反而同意國民黨中央提出死板的組織農村自治。這鄉村自治的意義是怎樣呢？只要看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是怎樣的就可以知道了。這一訓令上說：「建立鄉村自治以鞏固農民之勝利，而消滅鄉村中之無政府狀態。」

黨的中央堅決反對均分財產，自由罰款及逮捕土豪，正月二十五日中央便說：「貧農的幼稚行為，使小資產階級離開我們……」中央雖不致公開的反對沒收土地，然而實行上却是取消這一口號。正月二十五日的決議上說：「關於土地問題，我們固不能放棄第五次大會所議決的政綱，但我們須知道中國土地問題尚須經過一相當的宣傳時期，并且必須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如果將這一決議和中央沒有提出沒收土地的口號；并將堅決反對分地之事實併在一塊兒看，那末，中央反對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針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一種策略對於湖南政變中，本黨的行動有異常之惡劣的影響。長沙事變之後，因湖南共產黨員的建議徵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如果農民的武裝進攻不受黨的指導機關之懦弱的猶豫的阻滯，那末，一個長沙城被十萬農軍所包圍，並不是不容易打下來的。最後的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湖南黨部的指導者下了一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說武裝進攻長沙可以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應當等一等中央的訓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說應當等一等進攻，先團結些力量，等國民政府來解決，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却。只有兩大隊偶然沒有接到命令，居然衝城攻打反革命派，經過堅決的奮鬥，方始

因爲衆寡不敵而退却。這一總敗退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後來弄到幾日全省的大反動。中央在農民暴動的關頭，表現這樣沒有鬥爭的決心，簡直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中央何以決定停止暴動呢？只有看看二十六日的議決案：「現在本黨的職任既不是推翻他們（仇敵），也不是我們完全投降，還有中間的路；要找這中間的路，現在不宜於直接和他們武裝衝突，我們的職任是等候時機，深厚自己的力量以準備不可免之進攻」。中央表現如此可恥的無決心，實際上不是幫助農民運動等候時機，乃是幫助反革命的長沙叛徒等候時機。長沙事變時，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步，只要看當時決定贊助唐生智專電的主張。中央總說唐生智的好話，引起許多幻想，彷彿長沙事變，是違反唐生智的志願似的，中央雖然有時在口頭上提出對於長沙摧殘工農團體的抗議，并要求懲辦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實際上的動搖猶豫，完全幫忙了湖南事變的反革命派鞏固政權。

這種敗亡的失策，應當給我們以嚴重的教訓，中央於農民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竟如此之深遠，甚至於弄到所有緊急關頭與指示，都帶着有叛背羣衆運動的性質。

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的代表譚平山的行爲，亦是如此之可恥，農政部堅決的拒絕贊助土地改革，想使農民運動就範，走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農政部五月裡出了一個佈告說：「必須糾正農民幼稚行爲，尤其不能不懲辦其出軌範圍而侵害無數農民之份子；至於與反革命奮鬥，懲辦土豪劣紳，則須以合法的手續進行，遵照黨及政府之訓令規章，即須交付正式官廳，不能自由行動」！這一佈告及一切農政部的行爲，最足以表現本黨當時對於土地問題之反革命的妥協的方針。如果全黨都照着這種方針的精神去行動，那末，我們的黨既不是共產主義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黨員羣衆下級黨部的實際工作，完全和中央這種方針相反，所以雖然上面竭力在那裡阻滯這些工作，我們黨始終能保證對於農民羣衆有正確的指導。

五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指導政策，亦是遭了同樣的妥協主義，錯誤的鐵練的束縛。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此問題的理論與實際，決不與共產國際之指示及黨下層機關之活動相似。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應持的態度，在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議決案上有特別詳細的規定，但在此決議中的那些指令，已早在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前給過中國共產黨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之觀點，曾經向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有過完善的通知，但我們中央在實際上的動作，恰與國際的方針相違背，這是證明黨的指導如何深遠的在那裡執行自己的妥協路線。（著此者：中共之參加國民黨是服從國民黨，如今硬要領導國民黨，如何行得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有下面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的先鋒，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與最左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要有區別。

「共產黨在任何環境中，不能與其他任何政治組織相混同，他應有獨立的力量；他是一國之內的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最徹底最革命的階級組織。因此，共產黨對於宣傳自己的觀點，在自己旗幟之下動員羣衆的工作，決不能自己束縛起來；他不應當放棄批評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之民權派的動搖不定的權利，只有這種批評，才能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左傾，并鞏固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之領導權。

「現在的局面中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在國民黨之內取得領導權，而打算達到無產階級在中國之內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由勇敢的堅決的發展羣衆運動的任務，中國共產黨應當勇敢的堅決的去變國民黨為真正包含城市與農村勞動民衆的羣衆組織。

「共產國際指示中央對國民黨當前任務，須要有適合他們的組織形式；必須要與羣衆接近的路線上去，儘可能的趕快改組，使廣大工、農、手工業者對國民黨的隊伍中來；工、農、兵士與手工業者的組織，實行團體的加入（工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農協會、手工業者的蓄儲組織、士兵的組織、農軍、紅槍會——除去反革命成分——工人糾察隊等）；國民黨地方與中央機關應完全實行選舉制等等。

「只有此等堅決的去發展國民黨，使他們成爲真正廣大的、真正選舉的、真正羣衆的、真正德讓克拉西的組織，才能創造發展中國民權革命之鞏固與勝利的前途。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對抗國民黨右派一部分動搖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廣東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的反對那些背叛的軍官。共產黨應即時的暴露與南京政府或帝國主義妥協的種種動搖政策，并且定出適當的宣傳煽動及組織的具體辦法。

「中國共產黨應保持與發展自己黨的組織，增加對於國民黨的工作的影響，他要担負起此等任務，則必須完全認識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組織之努力與鞏固，并吸收工人黨員參加黨的指導，提高黨在廣大工農羣衆中的影響，并發展黨在羣衆中的威權」。（著者按：國民黨豈能由中共自由擺佈？這一指示是不通的。）

在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所有的活動，簡直與國際決議案上所明白白指出來的路線相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對於那些革命的主要問題，如工人問題，土地革命問題，對小資產階級關係問題，及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等問題，所依據的立場，實際上既與國民黨小資產階級領袖一樣，則他當然不能保障共產黨自己獨立的政治面貌之任務。中國共產黨的中央亦與國民黨的指導犯了同

樣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以致於不是共產黨指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假使說共產黨還沒有完全失掉自己獨立的無產階級的面貌，則是因他的下層組織與黨的羣衆的功勞。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方面可算儘可能的做到了與國民黨「右派」指導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數省份中的共產黨員，他們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國民黨中達到領導的影響，而中央却反對這些組織。在中央五月通過的關於國民黨聯席會議的議決案（國民黨工作大綱）上說：「共產黨員在聯席會議討論各種主要的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但是這些具體的建議不應根據我們黨的最大要求，而應注意到民族革命發展的利益與團結國民黨的左派」，從這個中央決議中，可以得到的結論是：一、「共產黨的大要求」與民衆運動的利益是不一樣的，這是兩不相容，互相衝突的兩方面；二、共產黨的「具體建議」不應當建築在黨的「最大要求」，就是說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上不適用共產黨的政綱、策略與一般的政治路線；三、民族革命運動與國民黨「左派」只有在共產黨放棄自己「最大要求」的條件下才能發展。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運動的正確策略之失敗，恐莫此爲甚罷！

再此決議上又說：「在國民黨報館服務的黨員，不當使此等報紙變爲共產黨的報紙，而照國民黨決議的精神去工作」。這豈不是放棄共產黨獨立政策與政治路線之表示？豈不是完全服從國民黨之指導？！

共產黨的這種「服從作用」，他的領袖還正式承認，還以爲這是很正確很適合革命利益的呢！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團作用（如聯席會議之上）實際上已經被黨的指導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國共中央聯席會議上；汪精衛說：只有國民黨中央有認可與公佈通過的決議之權，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的回答，竟同意於這種辦法。共產黨領袖也有這樣說的：「一方面自然共產黨員不應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但在別一方面則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獨立，因爲我們現在還須與國民黨聯合。有了這種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數主義策略基礎的妥協辦法，還要裝出莊嚴的樣子說，這是實際的「共產主義的策略」。共產黨領袖簡直沒有想過政治上的獨立，那麼，對於國民黨的動搖，不澈底的騎驢政策，實際上當然不會有什麼批評，共產國際所要求的澈底激烈的公開的批評，當然更不用說了。關於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中央在黨整個公開的時期中，都沒有打算出版一份黨的日報（雖然國際之多次催的），中央關心的不是這些事，而是怎樣使共產黨員不在國民黨報上發表共產黨的文章！中國共產黨中央不看見國民黨羣衆，永遠沒有打算過與他們接近，而只看見領袖。

對於領袖作用的估計過分，而估計羣衆作用太低的流弊，可以從黨對於許多主要問題的估量看得出來。黨總是想着應當看某某領袖對此的態度如何，應當使其中立；但不是說工人農民羣衆對此的態度如何。譬如爲要使李濟深在廣東中立，所以把改選國民黨省黨部的口號取消；爲要使汪精衛中立，所以把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四月）對於土地問題的建議取消；爲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

不提出免他的職的口號；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由「左派」的領袖之願欲來確定，而在派領袖之願欲，就是武漢軍閥的要求。因為「左派」要求共產黨人到東聯（）去工作，而中央要停開第五次大會，或如中央一向贊成北伐，但當左派決定東征，則中央也馬上通過這樣的議決；雖然中央以前很堅決的反對國際代表不主張向北去的建議。在其他許多重要問題，都是如此。

這個空前的妥協的機會主義路線，是繫於一個總的理論。最近幾月來中央行動的總出發點（特別自夏斗寅叛變起）就是所謂現時必須退讓的理論。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者確信，並且還要使全黨及我黨所指導的羣衆確信下列的理論：共產黨及跟他革命的工人與農民已經走得「太遠」了，現在必須退讓以挽救與國民黨的聯合；當土地革命剛剛開始發展，當工農的羣衆運動剛走入大道，並且羣衆自己想到武裝自衛的組織正須要共產黨的積極參加，使革命發展并鞏固與國民黨羣衆之實際聯合，築下堅固的革命基礎的時期，而共產黨的指導者却說「要退步，要退步」，以為這樣就可以營救自己在國民黨的狀況，創造了整個退讓的理論。但可惜這不僅是一個理論，而且還要步步實現於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絕土地革命，爲着所謂「過火」，贊成成批的解散工農的組織，以同樣的口號去解散勞動童子團。在湖南問題的胆怯政策與最後所幹的自動解除武裝的警察隊，所有這些都是最近幾月內中央所指導的整個的退讓投降的政策一部分。

這條退讓投降的道路，集大成於六月三十號中央擴大會議所通過的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的議決案，現在指幾條出來看看：

四、中國國民黨既然是反帝國主義之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所聯盟的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

五、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雖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是以國民黨員資格參加，不是以共產黨分子黨員資格參加，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而不是兩黨公開執行形式，這件事多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分子，爲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六、工、農等民衆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衆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府公開之法令，但國民黨員亦應該依據黨的議決案及政府之法令，保護工、農羣衆之組織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國民黨主義，須武裝農民，但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警察隊，祇因避免政局之糾紛，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

八、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等。

九、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省總工會派員組織，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經濟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

權、管理權，更不能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應嚴行禁止。

這不僅是機會主義與妥協了，這簡直客觀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僅完全放棄共產黨的獨立，並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羣衆運動之存在！把所有的羣衆運動完全交給國民黨資產階級的領袖去監督，並且是自動的交出來；還要說是「照例」。——這不是客觀上對於羣衆運動出賣，對於革命變節是什麼呢？

共產黨領袖所認識的國民黨聯合的方法是這樣的！這些認識是毫無半點共產主義政策的意味。列寧認爲共產黨的黨員可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聯合、協商，但是在保持共產黨的宣傳、煽動，與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必要條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寧說，沒有這種條件，自然不能與之聯合，否則便是變叛。客觀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的政策是對共產主義的變節。列寧對於與小資產階級聯合時常說：「要注意『友軍』如同注意敵人一樣」。中國共產黨中央則認爲應當把中國革命的命運分給工、農運動很明顯的敵人。

黨應當在過去指導的錯誤中學習。黨應當明瞭他的力量，與他的將來，建築在工、農羣衆的身上，在他們的力量與他們的組織上面。黨應當明白以後還是要與國民黨聯合，但是要與國民黨的左派聯合；與他們的下層羣衆，與他們勞動羣衆的黨員，與他們的下層的組織聯合。那種與武漢國民黨中央領袖聯合的路已經走不通了，誰能公開的反對國民黨中央是國民革命的叛徒？這些叛徒之中，誰配稱國民黨的左派？最後與我們聯盟的左派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執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們黨依據於武裝工農組織的實現力量如何，並且要我們黨的政策停止動搖，而引羣衆去督促其領袖，方能決定。所謂左派聯盟，實是與革命小資產階級聯盟，我們黨應當首先注目於下層羣衆，如智識份子、手工工人、店員等，贊助他們的政治經濟要求，而時時記着一切和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的聯絡，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與小資產階級的聯盟。

(六) 共產黨員之參加國民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政策之不正確與違背共產主義，在其參加政府委員的同志的行動上，與黨對參加國民政府的整個方針中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此問題的立場，亦與其他許多主要革命問題一樣的，和國際的方針及初步的共產主義政策都發生衝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共產黨員參加武漢政府的決議是這樣說的：「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爲共產黨，應當很堅決的在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機關中工作，同時要批評自己同盟之不堅決，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評，並且要保證政府政策之

正確。」

共產國際執委特別叫中國共產黨注意：現時革命政府與民衆之密切的聯繫是十二分的必要。只有在這種密切聯繫的基礎上，才能經過國民黨而實行這一政策，只有建築在羣衆上的方針，才能夠漸漸的鞏固革命政府的政權，及其爲革命之組織中心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鞏固武漢政府的這種影響。不能實現這種任務，不能發展羣衆運動，沒有土地革命及堅決改善工人階級的要求，沒有使國民黨變爲真正的勞動羣衆的廣大組織，沒有繼續的鞏固工會及發展共產黨，武漢政府沒有與羣衆發生密切關係，那就不能使中國革命得到勝利的實現。

共產國際中央認爲只有這種政策才能證實共產黨員之參加政府之必要。若無此條件而參加，就帶有上層的勾結，與政客的結交性質，而他們必須爲實際的生活與偉大的階級鬥爭進展所損棄，更更時常使政府工作與羣衆工作相聯繫，實是中國共產黨必要的任務。

這就是共產國際對於參加政府問題向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與共產黨員的部長做了些什麼？看事實：

共產黨員在得到委令後兩月，才開始組織自己的部務。農政部長譚平山（共產黨員）就曠典禮時的演說，除批評他是可恥的外，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默無言，他却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民的情況」反對「過火」的話。譚平山就戰後馬上就發表對農民的訓令，禁止農民反對豪紳的「妄動」，違則反「嚴罰」。

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的官僚機關並沒有什麼區別。在此數月內他們沒有公佈一個減輕工、農痛苦狀況的法律，沒有一個改變城市與鄉村中剝削的法律及改良經濟關係的法案（勞動法案，減租等，農村自治法等）。有些並沒有預備向政府提出。這些部長的共產黨員的工作，照國際的議決案是聚集自己的力量來與羣衆聯繫來維持羣衆運動，但實際上則成了最爛腐的資產階級官僚統治，只是在羣衆面前消去共產黨的面貌。我們沒有一個革命的建議，對於武漢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種種錯誤，也沒有一點批評。特別是農政部長的政策，除了說他是反對農民的政策，孟塞維克的政策，簡直沒有別的適合名稱。土地問題應是農政部頂主要的問題。譚平山同志上任第一件事實，就要打算「鎮壓」湖南農民運動；中央對此是贊成的，並且還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領袖，實行恢復「秩序」的任務；這一次出征已經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長沙已發生反革命的叛變，這次叛變很敏捷的很澈底的實現了譚平山同志所領導的出征之任務。

當譚平山同志結束他那不光榮的總（部）長之地位時，還是藉口長期請假的退出。當反革命漸漸在武漢境域內鞏固，當國民黨正在醞釀不要共產黨參加政府的趨向，以便可以完全的自由壓迫工農運動，而與反革命軍官妥協時，譚平山同志却很願去迎合反動軍官與多情的國民黨領袖之希望。他的勝利的辦法，是藉口於理想的病症，來實現他的部長假。並且他的請假，是事先與汪精衛商量，然後再與中

央討論的；但中央不僅不反對這種行動，反而完全同意這種計劃。因為七月三號中央會議上通過的十一條中有說：「避免糾紛」，同意於臨時退出，這是所謂「革命」的政策。

譚平山既因病而請了長假還不够，還要說：「因政局困難不能納農運於正軌」；共產黨部長在最負責任的時期中，由戰場上脫逃還不够，而且重新要向農民進攻一次。每個（人）都應當問一問，從這幾句話裡得到什麼的結論？即：一、農民運動走上不正的道路；二、只有武力能糾正他，因為共產黨員的部長有了共產黨與羣衆組織的完全威權，尚還不能「納入正軌」呢！這是直接承認許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動作是對的，這簡直是直接號召反革命們的代表進攻革命。共產黨員的部長在政府內做了這些頑意，還不是共產黨的最大的恥辱嗎？但是中央對於譚平山的聲明，不僅沒有處罰，並且沒有發表一句話。本來中央亦無從反對起，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產國際主張中國共產黨參加武漢政府，是爲的要更左的去推動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爲的要消滅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經過堅決的實際的革命鬥爭去得到廣大羣衆的贊助，變武漢政府爲工農民權獨裁。中央對此問題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變共產黨參加政府爲資產階級改良的部長主義。這與（俄國）多數派主張共產黨員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見解相差不知有多遠。當一九〇五年俄國亦是同樣的民權革命的任務，亦有無產階級政黨參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列寧對此，在其「兩個策略」的小冊子中說：

「我們還應當爲臨時革命政府，指出一個合於目前歷史客觀條件，且合於社會民主派目前責任之行動與無產階級之德讓克拉克西的政綱。這個政綱，就是本黨的全部的最低限度的政綱，是在現有的社會的經濟之關係的基礎上，最近儘可實行的政治經濟改造的政綱，亦即本黨最近將來全能見諸實行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這是一方面根據社會經濟關係的必要；別方面就是爲今後鬥爭起見，爲實現社會主義……………」。

「可是有人反對說：臨時政府既爲臨時的，便不能執行尚未得到全體人民同意的積極的政綱；這種反駁，反只是反動派的一種詭辯法。所謂不執行什麼積極的政綱，就是說要忍耐這種專制下的農奴制度，能够忍耐這種制度的，只有背叛革命事業的叛徒政府，而不是爲民衆暴動機關的政府……無產階級爲要實行自下而上的來威逼政府，就應該武裝起來……武裝威逼的目的——是爲「保持鞏固，并發展革命的勝利」。從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上看來，這些勝利，應爲本黨全部最低限度黨綱之實現……」。

「臨時革命政府是爲革命趕快得到勝利且即時壓迫反革命的鬥爭機關，而決不是求實現一般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之機關……」。

「且這種勝利定將成爲一種專政，就是他必須要依靠武力，依靠武裝的羣衆和暴動，而不是依靠什麼別的機關——用「合法的」，

「和平的」方法而造成的機關。因為要實現為無產階級及農民一些急不容緩的要求，必定引起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專制政府之殘酷的反抗；只有用專政來對付……沒有專政便不能壓倒此種反抗與打破反革命之企圖……。」

武漢政府現在亦變為專政的機關，但不是工、農的專政，而是地主、資本家的專政，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者之機會主義的政策，即是客觀上幫助這種專政的實現的！

(七) 武裝問題與軍隊之關係

中國共產黨對於武漢政府軍隊及武裝工農的問題之觀點，也是完全錯誤的。這些錯誤足以證明我們黨對於革命之中這種非常主要的問題，亦有在原則上極不正確之問題。

人人都知道武漢政府之中極大多數（除少數共產黨員領導的部隊及黨所號召進攻的工農）都是雇傭軍隊，和中國其他軍隊的軍隊是一樣的。人人都知道這些軍隊的將領大多數是地主、資產階級出身的，能暫時與革命相伴，都是望借此升官發財。對付這種軍隊的方針，自然應當是「完全注意兵士羣衆而不是注重那些反動的將領，要在兵士及下級士官中實行廣大的工作，但軍閥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性」。

然而黨的指導機關的觀念及行動恰恰與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將領辦外交，只注重種種方式的軍事結合，實際上在兵士之中沒有任何作用，並且也並沒有絲毫嘗試。雖然軍事問題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會沒有時期去討論。而中央軍委討論了四月的軍隊中工作的問題，仍舊是沒有決定。

可是和將領談話辦外交却有許多的時間，對於唐生智、朱培德等類的反動派，中央那時的政策都是非常機會主義的。湖南政變反共後大規模的屠殺工農，都是唐生智部下幹的，唐生智當然是與謀的。他到後來正式與以合法的承認。然而中央所決定湘、贛事件宣傳大綱之上說：「湖南政變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贊成湖南民權運動，并表示好意於被壓迫的農民」（八月十四日）。那時湖南的情形已是很明顯的了。

湖南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共產黨員聽見了這種宣傳，豈不要冷笑？然而中央還不限於此種口頭上的話，甚至於組織總示威反抗長沙的事件的時候，同時還在歡迎北伐凱旋的北伐將領，這樣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實，居然在武漢實現——難怪汪精衛說共產黨勾結軍人。

關於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驅逐共產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出江西，我們自然要反對這樣策略和他們的主謀，然而中央始則等待猶豫，繼則決定開始總的反對江西之變動；不提朱培德的姓名，彷彿是說，朱培德總算爲人好些，如果他也離開我們，反動更要厲害，這樣說來，朱培德還不是江西反革命領袖，而是我們的保鏢的，所以應當對他要包涵些，黨的指導機關會議主義，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這種對於軍隊的態度，也就使中共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着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中央軍委對此完全沒有工作，沒有提及一般共產黨員的軍事訓練——這實是我黨第一等重要責任，沒有提及有系統的集聚那零碎散亂的工、農武裝隊，使後者一有組織的堅固力量時，便做發展革命的真實的擁護者；沒有想盡方法去得武器以武裝工農。中央那時認爲武裝工農難以實現的，甚至於以爲是有害於與國民黨軍隊領袖聯合的，經過如此之久的時候，中央忽然「積極」起來，不過恰好是相反的積極，決定叫漢口工人糾察隊，「爲避免挑撥離間的衝突起見」，自動的解除武裝，這不是公開的取消主義是什麼？

(八) 黨的問題與對國際問題

中央所以陷於機會主義如此之深而能絕不受警戒的去執行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黨內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羣衆的監督，不向羣衆報告，不提出黨的政策交一般黨員討論。黨裡面完全是宗法社會的制度，一切問題只有黨的上層領袖決定，而「首領」的意見不但應當認爲是必須服從的，而且總以爲是無置議的可能，無論如何都是對的。這種執行之下，黨的民權主義完全變成空話。甚至於黨有極大的公開作用的地方，所謂黨的民權主義完全是形式上的，沒有黨內生活，沒有黨內的輿論，沒有對於指導者的監督，沒有黨員羣衆對於指導者的督促；在這種黨內情形之下，自然中央只有用命令方法去實行自己的指令，所以他自已也不求真正實行黨內的民權主義。

黨對於共產國際的關係也是完全不合組織的，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上無一次遇見這種情形，在如此危機嚴重的時候，居然堅決的拒絕對共產國際指導機關的命令和決議，這已經不單是簡單的破壞紀律問題，而是直接對於中國的及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罪惡。要知道中國革命不但是全國的意識，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國革命的命運，大部分足以決定世界革命的命運呢。中國共產黨不但執行極不正確的政策，使革命陷於失敗的政策，自動的取消革命而投降；並且很堅決的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服從國際的指導。不但如此，還要故意破壞國際的責任與紀律，甚至認爲可以不把國際決議通知全黨，使黨員得以研究而說出自己的意見。

因此，共產國際最近不得不公開的批評我們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以及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

(九) 結論

共產國際嚴厲的批評我們的中央客觀上出賣革命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我們承認這一批評完全是應該的，並且承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政策是對的。我們認為共產國際最近的指示給我們以發現這種過去指導錯誤之可能，救了我們的黨，是非常之好的。我們是很堅決的承認過去中央指導有機會主義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須根據這種過去的教訓根本改變方針。在這一封信裡，我們已經在正確的共產主義的觀點上，分析過去的錯誤，我們是堅決的站在列寧主義及共產國際的理論上來分析的，應當要使全黨及每一個黨員，極注意研究這些問題。應當使全黨黨員詳細的討論過去黨的政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及這封信便是討論的根據。黨員不能接受過去的教訓，他不能向前進行，不能正確的指導中國革命。

討論之中應當求得相當的結論。應當不但批評過去黨的指導，而除去指導機關中的機會主義的成分，而且必須將全黨工作都依照共產主義的革命的審查過，審查事實上轉移羣衆工作的方向；應當在事實上證明中國共產黨真正是中國勞動階級的先鋒，能够做他們的領袖，而引導他們取得勝利。

必須與工會、農會建立密切關係，指導他們，使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這方面去，應當與青年團建立密切的關係，更加多的幫助他的工作。青年團以及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證明自己最近期間在政治上的堅決性，比黨內中央還高些，青年團中央這次完全贊成無產階級的政策，而要黨的中央委員實行，但是黨的中央指導者真是覺得這是有害於那種機會主義政策的，所以想閉住青年團的口，否認青年團有提出政治問題決議案之權，但是這並沒有成功——青年團始終站在共產國際政策之上。黨應當承認青年團的工作有政治的地位，應當知道同他有密切的關係，最後雖然政治的壓迫非常之嚴重。也必須實際實行黨的民主主義，使黨的政策直到黨羣衆之中討論，在下級黨部建立各級黨部集體的工作，以促成集體的指導。並且必須盡量設法保持黨的組織，勿使爲反動派所破壞。要建立壁壘森嚴的秘密組織，但是同時要是能鬥爭的密密的黨的機關。

在嚴重的環境之下，不是革命危機的時候，我們要整頓設備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們深信我們的黨必定有很充足的力量，以堅決的革命性改進這個變革的關鍵。我們必須召集全體黨員，積極的來幫助黨的這件事，我們深信同志們奮鬥的堅決性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實必能使我們戰勝一切困難，而堅決的使黨走上正確的道路，我們的黨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

貳 政治任務與策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見紅色文獻)

八七會議更通過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此項決議案仍然承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應組織暴動「於國民黨左派旗幟之下」，要「用團體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羣衆聯合的黨」，並「不提出組織蘇維埃」；但在另一方面，主張工農獨裁，以與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及一切資產階級鬥爭，主張從事工運、農運、兵運，「在有可能的地方立刻從事暴動」。

茲將此項決議案摘要錄下：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摘要）（註五）

一、現時中國革命在轉變中，「即各種階級力量劇烈的變更其結合的形勢」。四月十二日及七月十五日的清共，資產階級「已走入反革命的營壘。」現在是兩個完全獨立，互相仇視而不可調和的營壘相抗衡：一是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營壘，一是工農革命營壘。完成中國的民族解放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任務，已完全放在工農運動身上，只有工農民權獨裁，才能履行這一任務，而與國際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以及一切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亦在其中）直接鬥爭。

以前中共指導羣衆運動的方向完全是錯誤的，今後的正確的策略「要從無產階級利益出發，而努力解決革命鬥爭中每一階段中可以解決的一切任務。」

二、中國革命現階段「這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反封建、反帝。其客觀內容是：中國自外國資本壓迫下解放（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外國人所佔有的生產資料、交通機關收歸國有等）；二、建立國外市場；三、肅清封建遺毒（取消地主私有土地，土地國有，）摧毀現有國家機關，代以革命新政府；四、改良工人的經濟、法律、政治地位。「這些任務，只有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制才能够實行」。他們實行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會「直接生長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要超過資產階級制度的範圍」。這要靠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及「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這一轉變將是「一個無間斷的過程。」

三、現在客觀形勢：「資產階級、軍閥的勝利是不鞏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漲，不但在最近期內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共

產黨的任務，「就要在有可能的地方，立刻組織暴動，推翻資產階級軍閥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農民的政權。」

四、黨的現在總方針是：「準備並組織農民在各省之武裝暴動，趁秋收時期而實行抗租抗稅」，各省暴動時間視各情形而定。「暴動是一種藝術」，要精細的準備，既經決定，便不可中途拋棄，一定要暴動到底。「我們要徵調最大限度力量到新舊軍閥的軍隊中去工作，組織並發展我們的支部」。民衆工農暴動勝利後，必需沒收反革命的一切財產，「採用嚴厲的鎮壓政策——實行革命的獨裁」。

五、暴動之方式，中共應組織暴動「於國民黨左派旗幟之下」。因爲「國民黨是各種革命階級的政治聯盟之特殊的形式，是中國歷史上所累積生長出來的；(一)國民黨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二)可以吸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份子。

中國共產黨不但應加入秘密的國民黨黨部，而且應保證自己的指導作用。避免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保障本黨政治獨立，保持批評小資產階級搖動之自由。」

要使國民黨民權主義化。在國民黨旗幟暴動勝利時，要用團體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羣衆聯合的黨。

六、政權：本黨現時不提出組織蘇維埃口號。在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只限於宣傳蘇維埃之意義。

爲指導暴動，各地應建立「革命委員會」，可讓國民黨左派加入，而變成「臨時的革命政府之性質」。「全省範圍之內，應當稱爲某省臨時革命政府」，鄉村中暴動成功後，革命委員會應當組織農民協會，而將政權交給他。農民協會秘密存在的地方，於暴動時，使其指導者加入革命委員會。

城市革命委員會暴動勝利後，即組織新政權，設「平民代表會議」，由工人、手工業工人或店員、學生、小商人、士兵等團體選舉代表組織之。平民會議選舉革命執行委員會，將政權交給他。全省政權亦然。

本黨的口號是：鄉村「政權歸於農民協會」，城市「革命的民選政權萬歲」。

七、軍隊：創造新的革命軍隊，不要僱傭性質，而由志願的徵調進於義務的徵兵，建立工農革命軍。實行黨代表制，加強黨的士兵支部，要有可靠軍官。目前應改組僱傭軍，武裝農工。

八、對帝國主義策略，增強反帝宣傳，領導經濟鬥爭，但避免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奪回租界，沒收外國工業等）。不要接受帝國主義的挑戰。

叁 關於農民運動

中共之農民運動，本欲藉以壯大自己陣容，乘機一舉顛覆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在湘、鄂、粵、贛四省，頗具基礎，而尤以「湖南兩百萬有組織的農民起來了」自豪，但馬日事變，一夕之間，湖南農運，煙銷雲散，其他各省，更銷聲匿跡。於今八七會議在國際代表指導之下要發動暴動，自不得不收拾餘燼，以圖再舉。

八七會議既要鬥爭陳獨秀與譚平山的「右傾機會主義」，清算其對農民不能堅決領導，則其所通過之「農民鬥爭議決案」，不得不走向更激烈、更盲動之一途。於是主觀的認定農運有「新的提高的可能」，「新的革命爆發比前次的規模和力量更要超越」，而積極從事「秋收暴動」。其所提出之土地政綱為「沒收大、中地主土地」。較之五月間五次全國大會所通過之「沒收大地主土地」，更為「進步」。

此次議決案之特點，除上述暴動與沒收大、中地主土地口號外，尚有「鄉村政權屬於農民協會」，作為奪取基層政權之手段。至所提出「耕者有其田」一直到「土地國有」及「重新分配土地」，則僅為「整個時期」之政綱，而並未準備立即付諸行動。

此項議決案節要如下：

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節要）（註六）

農民的革命運動在國民政府的境域內有了廣大的發展（主要的在湖南），現在却遇見暫時的失敗。地主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成份，依據軍隊的武力與國民政府的機關聯合着進攻，給農民運動以很大的打擊。（著者按：指馬日事變。）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應當認為是共產黨方面對於農民的羣衆暴動沒有堅決的革命指導，這是由於黨的指導對於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帶有機會主義的猶豫及搖動政策。共產黨對於農民運動指導的搖動不定（由地方機關直至黨的中央）是反映小資產階級之動搖，客觀上弄到破壞農民暴動。

雖農民革命運動有暫時的失敗與紊亂，但在最近期間不僅客觀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這種重新高漲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組織之搗毀，農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隨之而經濟壓迫之增加等等，都只加緊農村中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必然準備着新的革命爆發，比前次的規模和力 更要超越。

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系統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

鍵。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盡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在最近的期間，農民暴動的口號應當是：

一、鄉村政權屬於農民協會。

二、肅清土豪鄉紳與一切反革命份子，沒收他們的財產。

三、沒收重利盤剝者財產，用以改良農村中貧民的生活。

四、沒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這些土地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

五、沒收一切所謂公產的祠堂廟宇等土地，分給無地的農民。

六、對於小田主則減租，租金率由農民協會規定之。

七、由農民協會取消重利剝盤者的債務，苛刻的租約與苛約。

八、解除民團團防等類的武裝與其他地主的軍隊，而武裝農民。

九、改良雇農生活及其勞動條件（工資待遇等等）。

十、對於鄉村一般失業平民，革命政權當儘可能的籌措基金救之，並與以工作（如協作社等類辦法）。

十一、對於一切新舊軍閥政府的稅捐實行抗納，並實行抗租。

國民政府所下的減租二五的命令，很明顯的是現在國民黨領袖之一種欺騙手段，因之，我們黨對於國民政府之決議，應揭破他的陰謀虛偽，因為這種減租不能實現，所以必須提出實行完全抗租的口號，以答覆國民黨中央和政府這一騙人的決議案和命令。對於武漢國民政府，現在已和對於新舊軍閥的政府一樣，本黨必須引導農民反對他。對於每次摧殘農民都要號召羣衆起來反對，尤其要經常的反對一切豪紳軍閥御用的假農民協會。

最近開始暴動的口號之中，本黨不提出沒收小田主土地的口號，是爲着要使城鄉間廣大的小私有財產之份子中立，但是，並不是說當農民運動不免要起而反對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時候，共產黨可以認爲這種事情是過火的，是反革命的。共產黨應當力求農民運動之中能有最大的組織性，但是共產黨決不可以爲小資產階級咒罵「無政府行爲」所嚇退——不論自然爆發的農民運動走的如何遠，都應當如此。因爲本黨之農民革命問題上的行動政綱，在這一整個的時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這一極通俗的口號，足以引起農民革命運動，一

直發展到土地國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則農民運動的主要力量是貧農，他們應當是農民協會的中心，農民暴動之中應當以貧農爲主力，聯合一般失業的貧民會黨勢力！應當明顯的定出收取富豪財產以救濟貧民之政策，

肆 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註七）

八七會議所發動之暴動，至九月中旬，兩湖秋收暴動已告夭折（見第三節），至九月底，南昌暴動亦告失敗（見第二節），而廣州暴動（見第四節）尚未發動，中共於失望之餘，乃於十一月九、十兩日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於上海（註八）。會後發出通告，於承認各地暴動失敗後，謂「此次大會主要精神是繼續完成八七會議掃除機會主義的任務，澈底重造我們的黨，並加確定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鬥爭的路線。」

通告中提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性質的革命」口號——此實爲托洛斯基之口號，而被史達林轉移至於中國。擴大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擇其要者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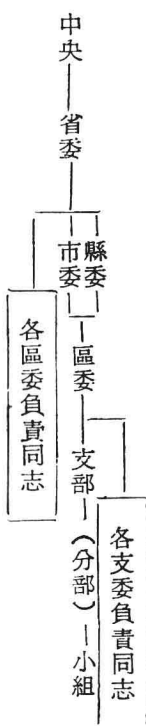
一、中國現狀及黨的任務議決案：

先是，八七會議已通過一項政治任務與策略決議案，但由於各地暴動失敗，不得不重加檢討。此次議決案決定放棄「革命在最短期間必定完全勝利」之希望，而認爲「是好幾年的事」，復認爲「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謂『無間斷的革命』」。議決案主張加強羣衆組織，發動農民作游擊式戰爭，引導工人經濟鬥爭，爲政治鬥爭作準備。決議案仍主張農民暴動，但應與工人暴動聯絡，受工人領導。較八七會議更「前進一步」，接受史達林的指示，正式提出「蘇維埃」口號，於暴動勝利時建立蘇維埃政權。此項決定，爲是年底廣州暴動及海、陸豐暴動建立蘇維埃偽政權所依據，亦爲爾後中共在江西等省建立蘇維埃偽政權所依據。此外尚有反帝、反軍閥、反機會主義遺毒等。

二、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

在八七會議中，已通過一項「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註九），決定：（一）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選舉臨時政治局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七人組織之；（二）黨的秘密化，「造成堅固的能奮鬥的秘密機關，自上至下，都應如此」。嚴申黨的紀律；（三）重新審查黨員成分，提拔工人同志，肅清機會主義份子；（四）最大限度的集權；（五）調整黨的組織系統，省委以下，挑選「負責同志」，直接與市委或縣委聯絡，以收指揮之效。八七會議指摘陳獨秀不民主，現在則更尤而效之了。

附表如下：



至此次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通過之「組織問題議決案」（註十），對於黨的組織，更有新的規定。議決案首先承認黨的「瓦解」狀態，謂：

黨不能成爲鐵一般的無產階級戰鬥的黨，而只是小資產階級浪漫的集團，反動勢力追壓一來，黨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極的消極，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漢反動至今，（黨員）由五萬而降至兩萬，不及兩萬黨員中，積極份子至多不過五分之一，而且多半是在那裡無計劃的無組織的執行個人的英勇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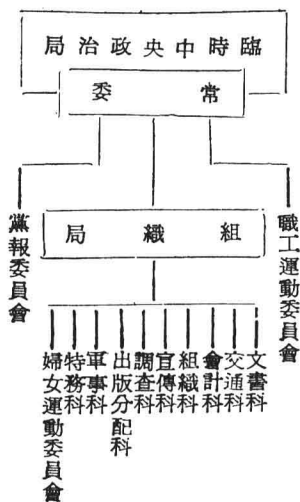
針對上列缺點，通告要求改正各級黨部組織法，提選多數工農份子，洗刷不健全份子，發展工、農、兵羣衆中黨的支部，嚴密紀律，練習武裝暴動等項。

對各級黨部組織作如下規定：

一、中央、省委、縣委、市委以至大區委，廢止設部制度，集權於常委（小區集權於區委）。組織、宣傳改爲科，爲純粹技術機關，其他部分如軍事等，於必要時設科。科之主任無需執委兼任。大的省委或縣委可以成立組織會議（常委代表、CY代表、工委主任及其他，指定參加人），討論組織工作計劃，工委必須組織（非工人區域的區委不須組織），工委必須爲常委之一，農委取消，因現階段農

民鬥爭根本是政治的，策略的，無單獨設農委必要。有勞動婦女羣衆地方，可以設婦運委員會，有工農正式軍隊的省份可以設軍事委員會，此外可酌設「破壞反革命軍隊委員會」。

中央之組織現時如下表：



二、常委以下，各級執行委員會和常務委員人數及其成份應如下規定：

(一) 省委：大省——執委十一人至十七人，工人、貧農分子須佔半數。常委五人至七人，至少須有工人、貧農二或三人。

小省——執委七至十一人，至少須有工人、貧農三分之一。常委三至五人，至少須有一工人或貧農。

(二) 縣委：大縣——執委七至十一人，須有工人、貧農佔半數，常委五人，至少須有一貧農，工人區須有一工人。

小縣——執委五至七人，至少須有工人、貧農二人，常委三人。

(三) 市委：執委九至十三人，工人須過半數。常委五人，至少須有工人二人。

(四) 區委：大區——執委七至十一人，城市須有工人過半數，鄉村須有貧農過半數。常委五人，城市至少須有工人三人，鄉村至少須有貧農三人。

小區——執委三至五人，城市須有工人過半數，鄉村須有貧農過半數。

(五) 有支分部或有小組之支部，設幹事會，由三人至五人組織之。工農支部的書記及幹事會，盡可能由工人、貧農分子充當。

三、中央、省委、縣委、市委必須經常有一人巡視下級黨部，直至支部、小組的工作。

四、黨的基本單位爲支部，支部下可分支部或小組，支部之下可設分小組。每一工廠成立一支部，工廠中之各部各間則爲支部，支部超過十人以上則分成小組。街道支部有零星分子六人以上時得分小組。一街道中有同業或同商店、同作坊之同志三人以上時，得分組支部，黨的組織系統仍受街道支部管理。惟一街道中有大公司或大商店，其中同志滿三人以上時，須獨立成支部。各街道之同業支部爲職工運動便利起見，得以其名單同時報告於該業總工會之黨團。黨團幹事會得黨部之許可，於必要時得召集同業支部書記聯席會議，討論工會本身問題。農村支部，在南方各省，以鄉農協範圍爲支部單位，北方各省以村爲單位。

五、省委所在地之城市黨部，必須由省委兼（即分成若干區直轄於省委）。非大都會（如南京、北京、廣州）及大工業區（如天津、上海）不能設市委。省委、縣委之下可以有特支、特區、特委之組織是臨時性的，如爲某地工農聯合暴動而組織的指揮機關，其權力當然可以指揮當地整個黨的工作。

六、黨對羣衆組織，只能經過黨團去指導，不可妨礙其獨立性。工會會縱在秘密時期，亦必須組織黨團。並吸收非黨員工農積極分子參加指導機關。上級黨團不許直接指揮下級黨團。全國各路各級鐵路工會黨團，須受當地相當黨部指揮，不能由上級工會黨團直接指揮下級工會黨團，致有形成「鐵路黨」的危險。

七、各級黨部必須定期開會……

八、嚴格徵收月費……

九、過去黨與團的關係異常之壞，必須切實執行互派代表出席，黨對團須盡其指導與幫助之責任。

三、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之決議（註十二）

此次擴大會議決將此草案提出擬於一九二八年三月（著者按：實際延至七月）召開之六次大會，而事先徵求各黨員之意見。此爲中共脫離國民黨後較爲完整、激進之「土地法」。原文對中國土地問題有八千字之分析與說明，認爲中國土地制度必須加以改變。要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下，實際將土地控制於「蘇維埃」手中。草案之辦法部份如下：

土地問題黨綱草案（辦法部份）

-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無代價的沒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組織成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
- 二、一切沒收的土地之實際使用權歸之於農民。租田制度與押田制度完全廢除，耕者有其田。
- 三、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是鄉村中的革命政權機關，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舊時佃農中的富裕者不能變成富農，並使革命軍隊的戰士及無地的農民能分到土地耕種。同時，共產黨要努力實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 四、寺院、教會的土地、皇族旗地、公產等類的土地，一概歸農民代表會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 五、嗣產、旗產的土地一律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共產黨要贊助農民去根本消滅這一種陳腐惡化的土地制度。
-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並且要努力設法，使實行墾殖政策時，得有土地分給無地的農民以及工農軍的兵士。
- 七、一切豪紳反革命派的財產完全沒收。
- 八、農民代表會議要措籌基金，保證無產而喪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廢者）的生活。
- 九、一切森林、礦產完全歸蘇維埃國家所有。蘇維埃國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當設法保護森林，種植森林，並開採礦產。
- 十、整頓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農民代表會議執行。井泉溪沼等完全歸農民使用。農民經過農民代表會議而行使這種權利。共產黨並認改良水利，擴大灌溉源流，採用新式技術機器電力等，為自己的重要職任之一。共產黨組織並贊助農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運動。
- 十一、共產黨要努力設法實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導河、填築淤地、築造牧場等等；並實行預防飢荒的設備。
- 十二、一切苛約重債一概取消。共產黨要組織低息的農業借貸，設立農業銀行及農業之借貸合作社。
- 十三、共產黨組織並贊助農民之合作社運動；銷售農產品及農民之家庭手藝產品，販賣農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藝的原料等。共產黨要發展工業而使農民得着廉價的現代新式的農具，禁止販售肥料的私人壟斷——販賣肥料歸農民的合作社辦理。共產黨還要實行鄉村中築路修道的建設事業。
- 十四、軍閥政府的一切賦稅，完全廢除，釐金廢除，包捐包稅的制度廢除。革命政權重定單一的統一稅制，稅收的一部份應當用作

鄉村的公費。一年只在收穫後收一次稅。確定統一的貨幣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頒佈保護僱農苦力的法律。政府當以發展工業而開辦公共事業的種種工程，修築道路，獎勵農村手藝，以保障苦力失業者的工作。

(註一)「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九五至一九六頁。

(註二)「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二二二頁。

(註三)有謂舉行於九江，未知孰是。以當時情況測之，在武漢租界之可能性較大。李昂之「紅色舞台」謂在漢口日租界，且有頗仔細之描寫，但該書之可靠性頗堪懷疑，未便採用。

(註四)此項名單頗有出入，蔡只說明提出經過，似非定案，至所有參加暴動之重要份子竟無一人當選政治局委。

(註五)「中央通信」第二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原文約七千餘字。

(註六)「中央通信」第二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註七)所載各項決議，載「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四期，未註年月日。

(註八)中共中央自武漢遷至上海似在九月底，十月初。(1)據八月二十三日「中央通信」第二期稱：「中央所在地，最近數月仍在武漢」。(2)據九月三十日「中央通信」第三期，九月中旬兩湖秋收暴動時，中央與湖南幾每日有聯系：十六日，「馬同志」向中央尚有報告，十九日，中央尚有致湖南省委函，可確定中央尚在武漢。(3)據十月三十日「中央通信」第七期載張國燾自香港所寄出之關於南昌暴動失敗之報告，有「(弟)欲日內回滬，面受處罰」語，則中共中央已遷滬矣。(4)另據陳樂橋「匪蘇關係之史的分析」三九頁稱：「當賀、葉還沒有佔領汕頭的時候，羅秋白已經從上海(原註：中共自武漢分共後遷至上海)打電報給廣東……」按佔汕頭在九月二十七日，則中央遷至上海在是日以前，但未註明資料來源。又據「中共透視」一〇五頁肥兩湖暴動失敗後，羅秋白「夜半，以鉅款為保險費，運動日本商船星夜出發，沿江東下」，其事當在九月十九日中央致湖南信之後不久。

(註九)「中央通信」第二期，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三日。

(註十)「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四期所載「中央通告(第十七號)」。

(註十一)「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節 南昌暴動（註一）

壹 暴動之經過

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爲中共史上的一件大事，爾後中共即以「八一」爲其「建軍節」。

中共中央「在宣布與國民黨的武漢政府破裂後，立刻決定民衆武裝暴動之政策，規定湘、鄂、粵、贛四省秋收暴動計劃。而葉挺（及賀龍——著者）軍隊的南昌暴動，便是這一民衆暴動」（註二）。是中共暴動政策之決定，實在八七會議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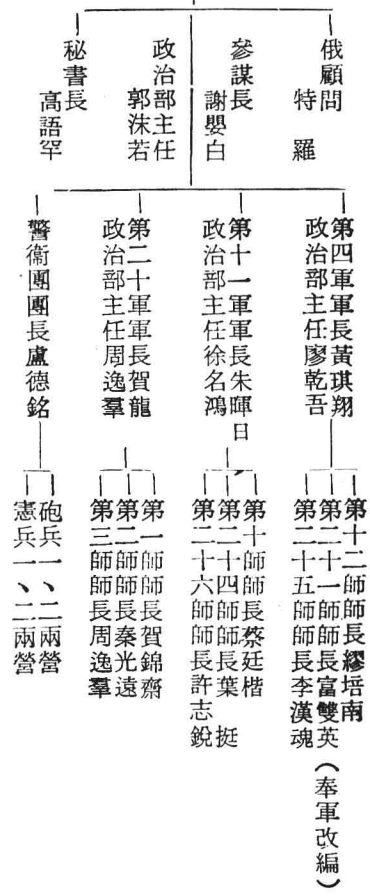
早在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分共以前，七月初旬，國共關係已甚緊張，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常委兼中央獨立師（即軍校學生組成）黨代表惲代英及二十四師師長葉挺，此兩共黨份子即圖謀異動，因汪兆銘與陳獨秀尙謀妥協，不果。迨武漢分共時，軍校學生已被解除武裝，是以未獲參加南昌暴動。

武漢分共後，寧、漢仍處於對立狀態，武漢方面仍高唱「東征」，將兵力紛向長江下游移動，張發奎部即移駐江西。適廣東省主席李濟深派陳可鈺至贛，勸發奎勿東下，可返粵，而俄顧問加倫亦勸其返粵，陰謀利用張掩護所部共黨份子返粵，然後將張解決，而由共黨控制其軍隊，佔踞廣東地盤。發奎遂改變計劃，決率部南下。但譚平山與賀龍等見事有可爲，迫不及待，而當時在贛中共黨徒又從而附和之，於是南昌暴動事作。

時張發奎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轄三個軍及各直屬部隊，兵力在八萬以上。所部有中共份子潛伏，爲此次南昌暴動及十二月廣州暴動之種子。

張部編制如下表：

第二方面軍
總指揮張發奎



(註) 編制：每師三團，每團三營，每營三連，每連三排。

發奎所轄三軍中，賀龍雖尚未加入共黨，且其封建意識濃厚，被部下奉為神明，但該軍全為中共份子所掌握，政治部主任周逸羣為一重要共黨份子，對賀有甚大之影響，共黨遂利用賀以資號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更為共黨主力。其他各師之共黨份子：在蔡廷楷之第十師(龔楚：「我與紅軍」作第十一師)有三十團團長范蓋，十九團團長彭銘，尚有四個營長；在許志銳之第二十六師有七十七團團長許繼慎，尚有三個營長，六個連長；在第四軍繆培南之十二師有三十四團團長趙某，三十五團團長梁秉樞，尚有營、連長；在李漢魂之二十五師有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尚有六個營長與若干連、排長；在警衛團有團長盧德銘及砲兵第二營長，憲兵第一營長；所有政工人員幾均為共黨。

發奎地位如此重要，中共亟欲拉攏之，但發奎擁護汪兆銘，有令「在第二方面軍之高級軍官中C P份子如葉挺等須退出軍隊或脫離C P」之表示，共黨遂不自安。(註三)

七月二十九日，汪兆銘、張發奎、唐生智、孫科，召集黃琪翔、朱培德、金漢鼎(朱培德所部第九軍軍長)等在廬

山舉行會議，討論加緊分共，決定(一)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軍隊自南昌撤回九江；(二)封閉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館，並逮捕其負責人；(三)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通緝廖乾吾、高語罕等四人。撤軍令尚未達到南昌，賀、葉等聞訊，即為先發制人之計。

其時，在南昌城內尚有朱培德第三軍之兩個團，與程潛之第六軍之第五十三團，而第三、第六、第九軍散佈於南昌周圍，對南昌有包圍形勢，中共遂計劃首先予在南昌城內各團以打擊。

七月十九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先後由武漢至九江，商在南昌暴動事。平山因事先曾徵得賀、葉意見，主張幹，因賀時已風聞汪兆銘等廬山會議將對彼等不利。在廬山避暑之瞿秋白亦主張之。廿一日，彼等與惲代英、彭湃等舉行九江會議，決定在政治上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為集中黨、政、軍權之最高機關，以反對寧、漢政府及中央黨部，而繼承國民黨正統（因第三國際命令不脫離國民黨），沒收大地主土地，實行勞動保護法為暴動目的，並發表宣言。廿二日，周恩來趕到，傳達武漢之中共中央意見：「以形勢既已如此，對在滬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遂積極準備，並由鄧中夏將詳細計劃回漢報告，其餘諸人均於二十七日齊集南昌，遵照中共中央命令成立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作為中央在軍中之黨團組織。本擬二十八日晚舉行暴動，不及，改為三十日。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會議，國際代表及少年國際代表加倫、范克等，尚徘徊於擁護（發奎）回粵與在南昌一幹的二者之間，而國際來電亦有「如毫無勝利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將在張發奎軍中同志退出，派往農民中工作」之指示。會議中出席常委如瞿秋白、張太雷、羅邁、張國燾等惟國際代表馬首是瞻，默未發言，遂派張國燾往南昌傳達指示。七月三十日，國燾抵南昌，在賀龍軍部召開前委會，報告國際電令，並根據加倫與張發奎洽談回粵情況，而加以結語：「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張的同意，否則不可動。」此項報告，引起一致反對，僉以「暴動斷不能遷延，更不可停止，張發奎已受汪包圍，決不會同意我們的計劃，在客觀上應當是我黨站在領導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發奎。」賀龍因欲取張發奎而代之，亦不願對發奎遷就，只因國燾代表中央，不能以多數議決，當日無結果。（失敗後，張太雷罵國燾為「假傳聖旨」，中共中央竟予國燾以撤職處分！）三十一日晨繼續會議，又歷數小時，國燾乃表示服從多數，始決定於是晚二時舉行暴

動。事爲賀部第一團趙營附（溧人，與朱培德同鄉）所洩，培德亦值知其情，中共遂改變計劃，提早兩小時舉行。

此次暴動，中共中央先後派恩來、國燾傳達命令，自相矛盾，而譚平山則堅決主張，成爲領導者。

七月三十一日夜十二時半，南昌市內發現槍聲，賀龍、葉挺實行軍事叛變，朱德亦從第九軍率部兩連參加，至八月一日拂曉，三、六、九軍之在南昌者被繳械。叛變者爲張發奎所部之賀龍之二十軍三個師，葉挺之二十四師，蔡廷楷之第十師，李漢魂之二十五師之七十三、七十四兩個團，共五個師，兩個團（以後陸續投入者有警衛團及十二師之一部，因共黨關係而解散者有二十六師之七十七團，至二十一師則離張投奉），故實際上張發奎部隊之損失較朱德及程潛部隊爲大。

一日上午，中共要員跨名國民黨中委之譚平山、惲代英、吳玉章、林祖涵、韓麟符、許甦魂等，仍以國民黨名義在江西省政府召集中委、省市委，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計有江蘇、順直、福建、哈爾濱、湖南、山西、甘肅、四川、新疆、東北、安徽、上海、綏遠、浙江、廣東、湖北、江西各省市及歐洲、日本、暹羅、古巴等海外代表計三十四人，大多數爲共產黨員或準共份子，少數爲親共之左派份子，以惲代英爲黨團書記，從中操縱。

在聯席會議中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中央革命委員會」，推定人選如下：

委員三十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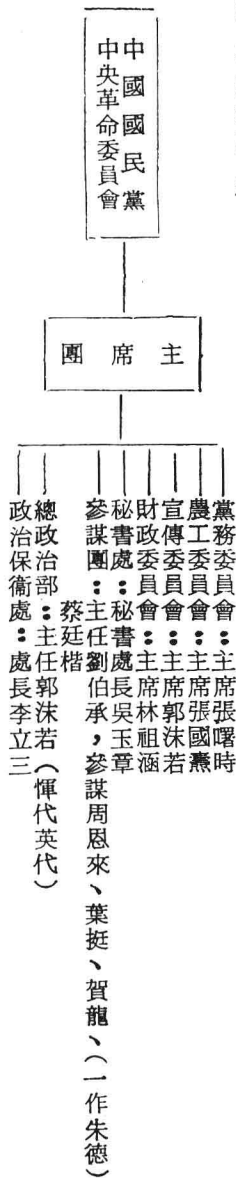
鄧演達	張發奎	譚平山	陳友仁	吳玉章	彭澤民	林祖涵	賀龍	郭沫若	蘇兆徵	江浩	黃琪翔
惲代英	朱暉日	葉挺	周恩來	張國燾	彭湃	張曙時	李立三	徐特立	向忠發	夏曦	方維夏
高語罕	韓麟符	姜濟寰	宋慶齡	何香凝	于右任	經亨頤					

主席團主席七人

宋慶齡 鄧演達 譚平山 張發奎 賀龍 郭沫若 惲代英

實際上，上列主席與委員多不在南昌，亦未預謀。其中國民黨員八人如鄧、張（發奎）、宋、何、于、經、黃、朱等僅被列名而實未參加。

主席團下設各部門，負責人幾全為中共份子，其中「參謀團」主持軍事，尤為重要，由劉伯承、周恩來等掌握。革命委員會系統如下表：



此外，在革命委員會下，還轄有「江西省政府」，主席為姜濟寰。

軍隊方面，仍沿用第二方面軍名義，推張發奎為總指揮，黃琪翔為前敵總指揮，二人均不來，乃推賀龍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其軍隊番號及將領姓名如下：

- 第二十軍 軍長賀 龍
- 第一師 師長賀錦齋
- 第二師 師長秦光遠
- 第三師 師長周逸羣（暴動時派兼）
- 第十一軍 軍長葉 挺
- 第十師 師長蔡廷楷
- 第廿四師 師長顧 某
- 第廿五師 師長周士第
- 第九軍 軍長朱 德

- 黨代表廖乾吾
- 黨代表方維夏
- 黨代表陳 恭
- 黨代表徐特立
- 黨代表聶榮臻
- 黨代表不 詳
- 黨代表陳 某
- 黨代表李碩勳
- 黨代表不詳（本軍僅兩個連）

(賀龍、葉挺、朱德、徐特立、聶榮臻、郭沫若、惲代英小傳見本節後。)

中共對南京及武漢政府同表反對，但漢、寧、贛、南、昌之上下游，且九江尚在武漢政府之手，南昌三面受敵，勢難久踞，於是於一日下午七時在賀龍軍部開參謀團會議，決定進犯廣東取為根據地，然後向全國發展。但行軍路線却發生爭執：一派主張由樟樹鎮、吉安、贛州、轉韶關，沿粵漢路取廣州；另一派則主張由臨川、瑞金、經鄒鄔直取東江（惠州），以為此線既可避免國軍截擊，又可與東江農運有基礎之農民暴動會合。後者贊成者衆，俄顧問紀功亦主張之，路線遂決。

八月四日，葉挺部出發，五日，賀龍以總指揮名義帥三軍向臨川推進，兵力二萬一千人。賀部砲兵營因拉伏出發較遲，致潰兵劫去部份砲彈，營長失蹤。沿途全無農民運動，民衆聞風逃散，而軍中所攜子彈甚多，每兵帶二百五十發至三百發，機槍大砲均係自扛，山路崎嶇，日行六十里，贛省里長，實不下八十里。在南昌掠獲紙幣七十萬元，在民間不能通用，只得以前規現洋十萬元支付，但食物飲料不易購得，有終日難得一粥者，渴則飲田中生水，致士兵病者甚衆，醫藥不足，無法救治，沿途倒斃者不絕。軍隊政治工作不敷，士兵不解暴動意義，軍心搖動，紛紛棄械逃亡。軍紀不佳，賀龍部二十軍尤甚。將抵進賢時，第十師蔡廷楷部突將共黨在該師之主力三十團解決，團長范蓋被擊斃，全師脫走福建。遺棄子彈將近半數，步槍三千枝，迫擊砲全失，大砲機槍失者亦不少，逃亡及病死士兵近四千，二十軍與十一軍參謀與焉。軍行三日，始抵臨川，未作戰，而實力已損三分之一以上。在臨川休息三日，稍從事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黨的組織與軍的整理工作。

自臨川至瑞金，行軍略緩，日行約五十里，天氣亦較涼，士困略減，但沿途農民逃避，輒終日不見一人，如宜黃縣城人口近二萬，軍至時，全城僅留六十歲左右男女四十八人。沿途落伍病兵，輒遭殺戮，過石城後，始較安。在廣昌出發，即分兩路；十一軍為右縱隊，二十軍為左縱隊，約定八月十八日會師壬田市，入瑞金。適國軍錢大鈞部之五十、六十兩團在壬田市佈防堵截，十八日上午，賀龍親率一、二兩師及第三師教導團一、二兩總隊攻擊前進，下午，雙方接觸，錢部堅強抵抗，至翌晨，始退向會昌。比葉挺軍趕至時，戰事已結束。十九日，抵瑞金。搜獲國軍文件，始知前路駐防

國軍有錢大鈞及黃紹竑所部共十八個團，在會昌方面配備優勢兵力，遂改變原定取鄴鄔計劃，而先攻破會昌國軍，然後折回瑞金，再取道汀、杭入潮、汕，以免國軍抄襲後路。於是葉部即日向洛川推進，以第二十四、二十五兩師爲主力，進攻會昌，另由周逸羣率教導團、第六團及第五團爲伴攻部隊。二十四日拂曉，向守軍六千人進攻，至下午四時入城，繳械千餘，俘九百餘，掠獲輜重不少。會昌國軍退鄴鄔，洛川駐軍尚不知情，又有二千人開至會昌，亦被擊潰。殘部萬人，僅收集二千餘人。黃紹竑部則損失輕微。二十七日，葉、周兩部均折回瑞金。在瑞金共停留旬日。賀、葉叛軍，自南昌至此，所餘戰鬥兵僅共八千人。

由瑞金至長汀後，關於取東江計劃，又有兩派意見：一派主以主力由三河埧經松口，取梅縣，再經興寧，五華取惠陽，而以小兵力，至多兩團趨潮、汕，蓋以潮、汕空虛，可以襲取，且以經潮、汕取惠陽，過於迂緩之故。另一派主張，僅留一部份兵力於三河埧，監視梅縣國軍，而以主力取潮、汕，再經揭陽出興寧、五華取惠陽，蓋恐駐軍堅守梅縣，潮、汕又輕襲不得，便難取得外間接濟，且行軍過久，軍官亟欲休息，而潮、汕易於攻取，故後派之議得以通過。自上杭、東江、大埔、三河埧以至潮、汕，沿途只在高陂與國軍有小接觸。朱德率第九軍及二十五師之兵力約二千餘人，扼三河埧，監視松口國軍，大隊開赴留隍，至十九日，先頭部隊已達潮、汕，國軍王俊部已自潮汕退出。叛軍總指揮部及十一軍之二十四師，二十軍之第一師駐揭陽，第二、第三兩師駐潮安，爲鯨角之勢。

共黨爲自己之誇大宣傳所誤，以爲廣東農運成績甚佳，而汕頭因省港罷工時經過長期鬥爭，工運亦必甚發達，是以於艱苦行軍時，向士兵宣傳：「只要到了廣東，各縣的農民一定馬上暴動起來，伏子糧食等當然都不成問題。」詎一入粵境，農民對該軍情形反不如福建。在大埔雖有「工農討逆軍」組織，且準備暴動已歷三月，但叛軍已到，仍不敢動。三河埧在軍事上極關重要，竟無農會組織。松口爲「工農討逆軍」第八團團部所在地，僅有農軍七十人。汕頭工運表現亦甚脆弱，叛軍到後，預備取消原有警察，另組工人義勇隊五百人，而經過三天號召，僅得七十人而已。

當賀、葉叛軍入粵後，國軍在戰略上已達成誘敵深入之目的，即予以包圍。在正面者有陳濟棠、徐景唐、薛岳、王俊諸部，共約一萬五千人；另黃紹竑部，乘叛軍入粵之際，從容調渡東江，乃攻襲潮安。賀龍總指揮部在揭陽，於九月

二十七日接獲湯坑諜報，知國軍已集中湯坑，將進攻揭陽，其攻襲潮安部隊亦將於二十八日開動。叛軍乃於二十八日晨令駐揭陽之十一軍二十四師及二十軍之第一師，掃數調向湯坑方面，並飛調第二師陳恭部自潮安開來，而令周逸羣之第三師死守潮安。除留守三河及潮安部隊外，開往湯坑者實僅五千餘人，僅及國軍三份之一。賀、葉軍行至距湯坑三十里處，與國軍王俊先頭部隊接觸，小勝，在湯坑約二十里駐營警戒。二十九日拂曉再戰，上午十時，陳恭部四、五兩團開到，會師與國軍激戰，衝鋒十餘次，無進展。叛軍知國軍兵多械精，欲出奇制勝，於是令二十四師之七一、七二兩團上刺刀夜襲，衝國軍陣地，同時一、二兩師在高山以密烈砲火作掩護，不料國軍有備，嚴陣堵擊，叛軍損失鉅大。此役激戰一晝夜，國軍死傷四千，但實力仍強，叛軍死傷二千餘，損失一半。二十四師下級幹部傷亡殆盡，二十軍亦死團長二人，而彈藥已罄，不堪再戰，賀龍遂下令由第一師担任掩護，二十九日由揭陽退却，擬至潮安，再退饒平，以與二十五師聯絡。

潮安方面，周逸羣明知無險可守，但仍勉強支持待援。三十日上午九時，國軍先頭部隊與周之教導團第三總隊接觸，旋即展開激戰。周命第一總隊增援，第二總隊扼守鐵路，一團電調第六團。至下午三時，國軍攻擊更猛。周部子彈已罄，機槍、大砲均失效用，三時半，師部被圍，教導團潰散。周僅率馬弁數十人於五時許突圍出城，中途與第六團第四連潰兵會合，沿鐵路退却。比賀龍率殘部至潮安時，潮安已失矣。

兩處均敗，賀龍乃改變計劃，向海、陸豐方面前進，企圖進取惠陽，以與張發奎、黃琪翔接近。張、黃於叛軍抵潮汕時，即自贛南入粵，但叛軍此時已潰不成軍，所謀不果。

潮、汕以東農民運動本較為活躍，在叛軍未到前，農軍已將海、陸豐佔領。叛軍到時，潮陽、揭陽農軍即佔縣城。普寧農軍圍縣城，得葉部一營之助，踞之。浮陽農軍與民團激戰，得叛軍助，繳民團械。至叛軍敗創，農軍亦瓦解。

九月三十日，叛軍狼狽退出潮、汕，走海、陸豐。混亂擁擠，行軍迂緩，至十月三日，在烏石，與先二日達到之革命委員會會合，正召集緊急會議，而烏石前方陣地發現國軍。賀龍令二十四師之三個團分前、左、右佔領陣地，掩護總指揮部通過，部署未定，而國軍槍聲大作。叛軍驚潰，無法制止，賀部退至陸豐附近，向粵軍投誠繳械，龍亦被俘，粵

高級將領念舊誼，釋之，遂與葉挺及革命委員會諸首要均各自逃生，由港轉滬。時中共中央已由漢遷滬矣。

周逸羣自潮安潰敗後，殘部僅有長槍二十二枝，半無子彈，駁壳十四枝，因汕頭已被國軍佔領，不能與叛軍聯絡，流而爲匪，但不爲民團所容，乃將槍枝棄置河中，獨自化裝至汕，於十月五日乘輪赴滬。

留三河之第九軍及二十五師二千餘人，曾與國軍頑抗，終以傷亡過重，殘餘人槍一千餘，由朱德率領，退向贛南，不久，投駐韶關國軍范石生部，改爲教導團，旋再叛，與毛澤東會於井崗山，成爲爾後紅軍種子。

至此，南昌暴動，以失敗結束。

貳 政策的紛擾

此次南昌暴動，其發動，堅持及領導者實爲八七會議與陳獨秀同被斥爲「右傾機會主義者」之譚平山。平山此時已不理於衆口，乃欲建奇功以自見。其他附和諸人，誠如張國燾所言：「雖主發動，實則無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謂之左派投機主義」，「政治工作人員章伯鈞之流，都是藉軍隊掩護出海逃心理」，因之，「毫無爭奪政權之準備」。在此情形之下，暴動自無政策可言。且行軍之際，始則奔走、逃逸、渴飢、疾病、死亡，繼則戰鬥，敗潰，亦無暇言及政策。但此歷時兩月之暴動中，政策問題，造成中共集團中許多紛擾。

第一爲政權形式問題：最矛盾而滑稽之問題莫過於以國民黨名義對國民黨暴動。由於史達林指示中共不退出國民黨，故七月十三日中共宣言尙有「國民黨的革命領袖中山先生之光榮旗幟，永久是在革命民衆……方面」之語。國際新代表到後，尙告張國燾，「國民黨的旗幟還是要用的」。暴動前夕，「中共中央實際贊助國民黨左派聯盟在滬活動。」決定在原則上組織以C P佔大多數的與國民黨聯合政權」，以「繼承國民黨正統」。但行抵瑞金時，閱報，始知寧、漢正謀合作，其反共，反南昌暴動同樣積極，而使中共黨徒陷於狼狽不堪之境。到汀州後，尙沿用國民政府名義，「以免帝國主義過份干涉」，而擁「右傾機會主義者」譚平山爲委員長。此一暴動集團之「右傾機會主義」較之其所指斥之「右傾機會主義者」尤有過之。

第二爲土地政綱問題：其時國際對中共之指摘爲對於土地革命主張不堅。六月間，羅易即主張向國民黨提出沒收土地口號，中共中央不願同意，備受斥責；後國際來電，要農民自行沒收大、中地主土地，否則僅沒收大地主土地亦可，迨新代表來時，中共中央即擬一決議案：沒收大地主土地，秋季進行減租抗租運動，呈請核閱，得其同意。七月十八日中共發表一目前行動政綱，沒收大地主土地之主張於是成立。南昌暴動期間土地政策，即本於此。

但是何謂「大地主？」引起不斷爭執。暴動前夕，在九江會議時，曾提出「沒收大地主土地」口號，會中正反兩派同數未決。南昌暴動後，農工委員會提出一「農民解放條例」，有「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一條，通過。實則中國田產之繼承，由於衆子均分，兩百畝以上大地主絕少，而爲「農民運動領導者」所不知，及抵廣東，問一農民，農民答曰：「如此，便是耕者無其田！」領導者大驚，乃暫改爲「沒收土地」。

至上杭時，再加討論，初改爲「沒收土地」，「耕者有其田」，繼而又照廣州省委送來辦法，改爲「沒收五十畝以上大地主的土地。」

實則凡此一切討論與決定，均屬紙上空談，叛軍所至，農民、地主逃避一空，沒收土地，何從談起！

第三爲搜括問題：南昌暴動後，革命委員會成立，即討論財政政策問題。僉主改變舊的財政政策，將負擔自工、農身上轉移至富有階級。抵臨川後，由於紙幣不能通用，軍餉日形嚴重，急需現金，於是財政政策再行討論，而新、舊政策之爭再起，新政策方面多數，通過，但因贛東一帶全無農運，孰爲地主豪紳，茫無所知，搜括沒收，無從下手，於是又回至舊政策，譚平山且得一原則：「只要有錢，不問政策」。至汀州採用此策，三日內搜括二萬元，多爲貧苦羣衆所負擔，乃再轉採新政策，捉土豪，實行沒收與罰款，僅二日，又搜括得四萬元。此次得手，本擬繼續實施，但至潮、汕之後，又行放棄，因一則恐帝國主義干涉，二則恐商業停頓，使「反動派」得以擴大宣傳，而又轉爲舊政策矣。

第四爲殺人問題：李立三任政治保衛處處長，本擬大肆屠殺，以鎮壓「反動」。開始在贛東一帶，因無農民運動，不知孰爲地主土劣，無法進行。雖在贛前、贛昌、平山市、瑞金、會昌殺三十餘人，在汀州殺四人，汕頭殺十二人，李立三仍慨嘆其「原定政策竟未能實現！」其原因，據稱：(一)「反動份子」聞風先遁；(二)有些「同志」不懂爲何殺人，不知

合作，有些地方無農協組織，更無法拘捕；(三)有的同志將乘亂搶劫者錯當反動份子槍決；(四)到汕頭，工人送來幾十名「反動派」，但由於夜間不敢鳴槍，又無刀子，竟不能執行。

凡此諸端，均說明此股叛軍初脫離正常建制，舊習未除，天良尚在，中共暴行，不能於旦夕之間見諸實施。此在國際及中共中央視之，無往而非「右傾機會主義遺毒。」

叁 中共中央之檢討

南昌暴動至九月底已完全失敗，參加者於十月間紛紛逃至上海向其中央報告，使其得明真象，中共中央乃作出檢討，指出其政治上之錯誤為未能實行土地革命，發動羣衆，未能大肆屠殺，大量掠奪，致失其暴動之義意；軍事方面之錯誤為未走吉、贛大道，直取廣州，未首先解決蔡廷楷，會昌之役以後未直下鄱陽，取梅縣以趨惠州，而反走汀、杭，趨潮、汕，自趨絕路，因而斥之為「軍事投機」，斥為「右傾機會主義之遺毒」！實則所有政治主張，完全係第三國際與中共中央之主張，而當時中共諸首要大多數集中於暴動集團中，執行其國際與中央之政策，且軍行所至，並無農運，雖欲執行土地革命，發動羣衆及掠奪、屠殺任務，亦不可能，何得誣其咎於參加暴動諸人？至軍事方面，暴動所採取之路線誠然失敗，然如採取吉、贛大道，則與張發奎所部稍後南下之路線相同，而首先遭受發奎之尾追；縱抵粵境，又將遭粵軍之堵擊，前後受敵，叛軍又有何必勝把握？總之，南昌暴動，正與爾後之兩湖暴動與廣州暴動同，註定其失敗之命運，中共之檢討，不過應景文章而已。

茲將此項檢討文件錄後。

中央通告（第十三號）（爲賀葉失敗事件）（註四）

一 南昌暴動與南征的意義

南昌暴動的八一革命，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極大的意義；從國民黨改組以來，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始終是擴大些在所謂「青天白日」之下的軍事勢力，全然不肯發動民衆，使民衆自己起來取得政權，取得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礎——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恰恰相反，當農民羣衆自己起來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時候，工人、貧民自己起來（建立）民衆的革命民權獨裁的時候，這些國民黨旗幟下的「革命軍官」立刻便攻擊農民、工人，大施屠殺。○○○四月中由的上海屠殺，廣東屠殺……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馬夜政變及清鄉，以及馮玉祥在陝、豫的屠殺政策，也是如此。就此證明國民黨的一切新軍閥都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而反對工農，壓迫工農的。所以中央在宣佈與國民黨的武漢政府破裂之後，立刻決定民衆武裝暴動的新政策，規定湘、鄂、粵、贛的四省秋收暴動的計劃。而葉挺軍隊的南昌暴動，便是這一民衆暴動，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權之總政策中的一個計劃。

葉賀南昌暴動，在一般的民衆武裝時期之中，佔有何種重大的地位，這是非常明顯的。民衆自己的發動，以及真正革命軍隊的暴動，以推翻新舊軍閥政權，建立民衆中農政權爲目的，以實行土地革命爲目的——這歷史的事實，是中國革命空前的事件。所以現在葉、賀雖然是失敗，而南昌暴動在湘、鄂、粵各省工農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之中，始終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不但如此，我黨以前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其錯誤的主要點，便是無產階級政黨拋棄獨立的政治行動，側重對小資產階級領袖妥協讓步。只有決定四省民衆武裝暴動，以及率領葉、賀軍隊暴動反抗武漢反動政府之政策，是算黨拋棄機會主義，而走上布爾塞維克道路的新紀元。

因此，在南昌暴動之中，有傾向於猶豫搖動，如等張發奎態度之表現等等，顯然是機會主義的遺毒。南昌暴動之後，只抱着軍事投機之心理，而不信任羣衆，不認識發動羣衆，創造羣衆的工農政權之傾向，甚至於暴動之後，仍舊拋棄土地革命之旗幟，那就更是機會主義的遺毒。葉、賀軍事上的失敗，不是我黨真正的失敗，只是南昌暴動中之指導不能完全脫離機會主義的遺毒所使南昌暴動減少其歷史上應有之意義——這才是我黨政治上的失敗。

二 葉、賀南征的經過及其失敗

南昌暴動後，葉、賀軍隊從南昌經過撫州、瑞金、會昌，遇見錢大鈞的及一部份黃紹竑的軍隊，與他們大戰，結果，南昌暴動軍隊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勝仗。會昌之後，葉、賀便未照預定計劃直下鄂鄖到梅縣，竟改變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帶，再經大埔一直往潮、汕去。但是等到葉、賀軍隊到潮、汕，敵人方面陳濟棠、王俊、黃紹竑已從四面合圍來攻擊。

葉、賀軍隊雖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鋒即到汕頭，汕頭工農軍也起來暴動，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動軍隊所逼，不得不拋棄汕頭，而竭力到湯坑去禦戰。這最後一次戰鬥，敵人方面有一萬五千，我軍只有五千，巷戰一晝夜，而我軍竟完全解體。現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師一千餘兵，因到汕頭時尚留駐三河壩，不久即被敵軍隔斷，現在退回閩邊（著者按：據魏楚禎：係退至贛南）。湯坑之戰敗後，葉挺只餘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潰散。尚有賀龍二十軍之第一、二師二三千人奔往海、陸豐，這部份的軍官政治意識本甚模糊，離開大隊之後，更是絕無目標的情形，竟要求李濟深收編。

三 葉、賀暴動失敗後之政策

南昌暴動軍的失敗，誠然是中國革命中的一個失敗——工農武裝暴動的開始時期，革命方面所有的這一些正式編制訓練過的軍隊，不但不能征取廣東，發展土地革命，而竟潰散了一大部份，這誠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是武（漢政）府反動後，中國革命進到一個更新的時期——工農民衆暴動的時期，葉、賀軍隊的革命戰爭，不過是全國民衆暴動中的一個強大的副力。這新時期中，我們的主要政策是組織民衆暴動，贊助民衆暴動，葉賀的南征，不過是這總政策之中的部分問題。我黨這個新的武裝暴動政策，完全是合於革命發展到新階段時客觀上所要求的。只要看九月初到現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陽、咸寧、蒲圻、公安、石首、松滋、江陵等縣，農民甚至於徒手的暴動起來，組織工農革命軍，佔領縣城，革命民衆自己選出縣政府，鄉村之中實行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沒收地主，殺戮豪紳……湖南安源的工軍和農軍暴動，進攻醴陵；株州的農軍以一支槍奪取株州；平江、瀏陽的農軍同時暴動，佔領縣城；長沙四郊的農民也起來暴動；廣州則自四月十四日李濟深反動後，四處暴動起來。但要看到這種情形，便知道客觀上革命的發展，的確已經到了一般工農暴動的時期；我黨的責任，便是組織和準備以及贊助指導這民衆武裝暴動，在各地率領民衆起來推翻新舊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在這種總暴動之下，葉、賀軍隊自然有很重大的意義，但是，革命的基礎力量始終並不是葉賀的部隊，而是工農羣衆。現在葉、賀軍隊固然失敗了，工農民衆的力量還却正開展，對於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之認識，正在與新舊軍閥國民黨的劇烈的鬥爭之中，日益廣泛而深入於工農羣衆——不但在兩湖、廣東如此，現在江、浙、北方豫、陝……差不多各省都有如此的現象。這種情形之下，難道葉賀軍隊一敗，革命便了結了嗎？當然不是的。葉、賀的失敗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葉、賀的軍隊可以給敵人打散，工農民衆的力量並沒有打散。我黨準備組織發展工農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仍舊應當積極的進行。

因此，現在廣東雖然已經沒有立刻以大軍攻取廣州，奪得省政權的可能，但是廣東各地的農會暴動仍舊在發動。葉、賀所剩餘的勢

力應走「到農民中去」，幫助當地農民摧毀豪紳的政權，建立農民羣衆的政權，引起農民羣衆自動的起來沒收土地……；武裝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葉、賀所餘軍隊自身要改組變成工農革命軍。

四 葉、賀南征中我們主觀的錯誤

葉、賀軍隊的南征何以竟至失敗呢？固然，客觀上敵人的軍力比我軍強大，全中國的報紙、交通整個兒的權力都在敵人手中。然而失敗的原因之中屬於我們主觀上錯誤的亦是很大。

一、前敵委員會政綱的錯誤——主持葉、賀南征的我黨指揮機關，前敵委員會決定政綱之中，關於土地問題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張。這是非常之大的錯誤。這證明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這種政綱可以使葉、賀暴動根本上喪失其意義。廣東一個農民聽見這一主張便說道：「這叫做耕者無其田！」這句批評是再正確也沒有。

二、政策上的錯誤——葉、賀南征軍所到的地方，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所採取的策略，並不是猛力摧毀他們的組織和政權，都大半偏於猶豫妥協的策略。並未猛力殲滅土豪劣紳，並未完全解除他們的武裝，摧毀他們的金融機關，摧毀他們的交通聯絡。不敢堅決的實行沒收徵發的政策，却用軍閥籌餉的老辦法，和他們和平磋商。對於豪紳是如此，然而一到汕頭，對於乘機稍稍搶掠的貧民，却立刻槍斃了三個人，「爲的是維持秩序」——那還是維持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秩序！廣東有一個工人說：「這是蔣介石第三的軍隊」。這就是說了這次來的軍隊還非工農貧民的軍隊，並沒有大大殺滅豪紳資產階級的權力與勢力（葉、賀軍隊之中「不擾民」的口號幾乎高於一切。）

三、政權認識上錯誤——「耕者無其田」的「蔣介石第三的軍隊」到廣東做甚麼呢？要創造甚麼樣的政權呢？當然，帶着這種政綱和策略的軍隊，對於政權不會有明瞭的認識。沒有預備去建立工、農、貧民政權，沒有深切覺着自己應當代表工農貧民去行使權力。却只要「繼承國民黨正統」。沒有信仰羣衆的力量——羣衆的革命獨裁的力量。沒有在羣衆之中創造真正自己的軍隊和政權的力量，而是想像着自己是一種軍隊的力量，類似於孫中山的大元帥府，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的力量。因此，一、可以亂發委任狀，聯絡雜色軍隊，土匪首領；二、可以派人與張發奎談判，弄些縱橫捭闔之術……

四、宣傳工作上的錯誤——葉、賀軍隊行軍的時候，士兵之中並沒有做充分的宣傳及政治工作，所過的地方民衆之中也沒有宣傳。同時，敵人的宣傳却非常之利害。軍隊行過撫州之南，差不多幾天不見一個人，這是因爲朱培德等反宣傳的恐嚇當地居民的緣故。我軍却没有先行派遣宣傳，說明「八一革命」南昌暴動及南征的意義。

五、軍事上的錯誤——軍事上的錯誤更是很多，不能詳細敘述，簡單些說：南昌暴動沒有採取直下贛州、吉安，一則可以打散朱培德、錢大鈞、隔絕張發奎，使他們不能與李濟深、黃紹竑聯成一片，而如現在之從容布置，圍攻我們；二則這條是大路，沿途農民運動有些基礎，可以隨處摧毀豪紳政權，引起農民羣衆建立農民的政權，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逐步交農民防守。南征的路線是取得撫州、會昌、鄱陽等閩、贛邊境荒僻之地，農民簡直尚未起來的地方，這已經是一個失着。然而這還可以說，僅僅是一種可能，最明顯的是：一開始便有與張發奎妥協之等待猶豫的傾向；對於不穩的部隊，如蔡廷楷得以詐術損壞我軍很多很好的部隊。再則，現在瑞金、會昌打了勝仗之後，又不追踪南下，直到梅縣，匯合當地已經奮起的農軍，發動當地農民暴動，擊散黃紹竑等的敵軍，直取興寧、五華，佔領全東江區域，却又折回走上杭、汀州，與敵人避道而行，使敵人得以騰出十多天的工夫從容佈置。

總之，前敵的指導，在政治上及策略上並未能真正代表農工，既沒有明顯的土地革命及工農貧民政權的政綱，又沒有堅決摧毀豪紳政權的策略——「農說是耕者無其田」，「蔣介石第三的軍隊」。這種機會主義的指導之下的軍隊，如何能責備農民羣衆不起來援助。農民對於這種軍隊自然是不會出力贊助。事實是葉、賀軍隊根本不去發動農民羣衆——前敵指導，只知道軍隊是主力，「革命委員會」是政權，根本上不信任羣衆的力量，不去發動農民創立真正的民衆政權，因此將富有歷史和偉大的意義之「八一革命」，變成僅僅是投機的行動。這是一切錯誤的總錯誤。總之，此次失敗，並非農民未贊助軍隊而失敗，而是軍隊未發動農工羣衆，甚至反而阻滯民衆革命鬥爭而失敗的。（例如晉寧農民羣衆數萬圍城，攻豪劣的巢穴，軍隊去幫助，打進了城，反而不准農民進城，不准農民大殺土豪劣紳，說是維持秩序。）

六、南方局指導廣東農民的錯誤——南方局指導廣東農民的政綱戰術上的錯誤，中央早有信去指正（見中央通訊第六期）。葉、賀軍隊與廣東農民接觸之後，尤其見得出：（一）政綱和口號上拘泥規定五十畝以下不沒收，另提減租至百分之三十的口號；（二）戰術上農軍只取側面攻擊——僅僅作幫助葉、賀，牽制敵人之計，而沒有號召農民羣衆自己起來奪取政權和土地，因而沒有猛力搏擊的戰術；（三）根本上沒有發動農民羣衆。所謂暴動，大半是，或者完全靠已經組織好的農軍勢力行動——或為純粹的軍事行動，而不是農民羣衆的暴動；（四）地域上海南及高、雷雖起，而無關大局，西江方面簡直只接洽有槍的零星部隊（農軍或土匪），沒有到羣衆中去號召，因此，這些地方始終沒有暴動，黃紹竑部隊遂得安然渡渡；（五）既沒有把廣東農民運動做主力，又根本沒發動羣衆，所以使羣衆之中發生等待葉、賀的心理。自然，一般農工自己沒有深切知道要自己起來奪取政權——這是政治宣傳之大錯誤，就是我各地黨部也沒有詳細考察反動勢力，作種種奪取政權的準備——這是技術工作上的缺點。

五 葉、賀失敗所得的教訓

前敵委員會及南方局的政治上的錯誤，雖然最後改正了些——例如土地問題、政權問題等等，但是已經太遲了，那時軍事上已經近於失敗了。葉、賀南征中我們所得的教訓是非常之大的：

一、政權問題——今後革命的任務，應當明顯的確定是要創工農貧民的革命獨裁的政權——蘇維埃的政權。國民黨已經死滅，他的旗幟最多不過是「蔣介石第三」的旗幟。必須是工農貧民士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必須是羣衆選舉的剝奪及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選舉權的政權。

二、土地問題——今後應當切實明瞭「農民羣衆下層自動手沒收土地」之意義。土地問題決非某一政權（自蔣介石第一到蔣介石第三的一切政權）所能出一佈告法令，限制幾畝以上不准沒收的，農民暴動即是實現「耕者有其田」、「分配田地」；農民自動手的幹，我黨應當竭全力以贊助，並且要領導他們去幹。耕者有其田及分配土地普遍羣衆鬥爭，客觀上是土地國有的實行，因為只有羣衆如此行動起來，才能創造出工農民衆的國家，只有工農民衆的國家，才能實行土地國有——宣布耕者有其田是全國人民的，宣布一切人不得買賣土地。

（三）勞動問題——黨在武裝暴動創立工農貧民政權的總政策之下，自然要有最澈底的：一、「八小時工作制……等」的工人問題政綱；二、工農政權要沒收中外大企業及銀行，要實行國有銀行、大工業及一切交通事業；對小企業、手工工場等厲行澈底的勞動法，對於不遵勞動法的店東、廠主嚴厲的處置，一直到沒收。

（四）策略問題——對於買辦豪紳資產階級，必須嚴厲的實行殲滅政策，不能稍有猶豫搖動的態度，並須勇敢的摧毀他們一切權力機關，武裝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種種反革命工具。對於小資產階級不可以存着怕他們反動而遷就他們的心理。我們猛烈的摧毀現在有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秩序，小資產階級是要動搖甚至反動的。但是工農政權的確立，實際上也還解放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他們客觀上只有贊助工農是他們的出路。

（五）軍事問題——辛亥革命直到現在，都只有「將變」——馮玉祥、郭松齡、唐生智、周鳳岐等等的倒戈，「民軍」、「游擊隊」等之土匪首領的受編。現在我黨的軍事行動，必須是「兵變」——兵士羣衆、土匪羣衆在我們政治口號之下移轉他們的武器來反抗長官，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權。總之，既名爲民衆武裝暴動，那就必須是民衆的。工農羣衆奮起搶奪敵人的武裝，士兵、土匪羣衆舉起武器來幹——打倒一切「上等入」的權力。如此之軍事行動，才是民衆的武裝暴動，這種暴動才能產生真正的工農革命軍。這種主力的創造和

發動之中，才能偶爾利用「雜色軍隊」和「土匪首領」「中立」；否則便是國民黨（「上等人」的黨）老方法——純粹利用軍官及土匪首領，結果，是無窮的造成豪紳資產階級的武裝勢力而已，他們始終是要殺工農的。

（內黨的問題——在這總的武裝暴動工農革命政策之下，黨的作用高於一切，必須有黨的指導。政策上，如這次委任雜色軍隊，及與張發奎接洽等，都是前敵各個人的任意行動。政治指導集中於黨是非常之重要；再則工農革命中，必須有黨代表的制度；三則各地黨部，必須深深建築於羣衆的基礎上，在日常鬥爭中，一步不放鬆的宣傳奪取政權的必要；四則各地黨部必須詳密的探乘（？）敵人武力上，財政上……的情形。總之，先要在政治上、技術上真真實實的做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好準備。

葉、賀失敗之中，如上述之許多錯誤，顯然（是）機會主義的遺毒。我黨必須深切的認明：下極大的決心，重造我們的黨——在思想、組織上澈底肅清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造成真正羣衆的、革命的、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黨，然後才能担負起現時所負的重大使命。

十月十四日

實則南昌暴動，如爲正確，則領導之功應歸之於譚平山；如爲錯誤，則指導之責應歸之於史達林及中共中央，方爲公允；今開除譚平山，處分各執行政策之黨員（均見下節），而中央不知引咎，更不敢對國際代表及其上司史達林作絲毫抗議與訴苦，中共中央之通告，對於其黨員尙有何教育價值可言？徒顯示其無條件的臣服於史達林而已。

追中共竊踞大陸，建立偽政權之後，以「八一」爲其建軍紀念日，始歪曲史實，對於南昌暴動，刻意誇張，並歸功於朱德與周恩來，而譚平山之領導則全被抹煞矣。

（註一）本節係綜合下列資料撰成，未便逐一註明：

- ①「中央通信」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所載張國燾、李立三、張太雷、周逸群等報告。
- ②「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載張國燾致擴大會議函。
- ③「革命文獻」九輯總一三二二三至一三二二六頁所載陳裕新「對於南昌共產黨暴動情形報告」。
- ④「中共南昌暴動紀要」手稿，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中央調查統計局編。
- ⑤「中共透視」第十七章。

⑥ 陳公博「寒風集」中「我與共產黨」甲二五九至二六〇頁。

⑦ 龔楚「我與紅軍」中「南昌暴動到潮汕失敗。」

(註二) 「中央通告」(十三號)。

(註三) 引號中文字均係引自「中央通信」，不再一一記出。

(註四) 「中央通信」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

*

*

*

*

賀龍(一八九五——)，字雲卿，湖南桑植人。本湘西土匪，民七，受湖南當局收編，任團長，旋充湘西鎮守使。北伐軍入湘，受編第九軍第一師師長。十六年，改編任獨立第二師師長，旋編為二十一軍軍長，調至南昌，與葉挺參加「八一」暴動，失敗後，走上海。十七年，潛返湘西游擊，十九年，任紅二軍團長。二十年，竄擾於洞庭、洪澤湖間，敗返湘西。二十二年與蕭克紅六軍合編為第二方面軍，任總指揮。二十四年，經滇、黔、西康，與徐向前合，二十五年竄陝北。抗戰時，任八路軍一二〇師師長，入晉西北，二十七年，入冀中，授呂正操。二十九年返晉、綏，任偽軍區司令員。三十四年「七大」當選中委至今。亂亂期間，進犯歸綏、包頭、補東等地。三十八年，任偽第一野戰軍司令員，犯西寧、張掖等地。偽政權成立，被選偽人民政府委員及軍委會委員。四十三年六月，任偽軍委會副主席，四十四年受「元帥」銜。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偽副總理，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偽國務院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賀龍粗獷無文，在共黨中政治力量不大，自偽政權成立後，即從事體育運動工作。文革中被開停職。

葉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字希夷，廣東惠陽人。保定軍校六期生。民十一，任中山先生衛隊團營長，十三年赴俄學軍事，十四年歸國。北伐時，任四軍獨立團長，隸共黨，中共盛誇其戰功。十六年，任二十四師師長，參加「八一」暴動。失敗後，一度出國。抗戰時，二十六年，受政府命任新四軍軍長。三十年新四軍事 中，被俘。三十四年勝利後，政協會議期間，被釋，四月八日，乘飛機赴延安，失事，死。

朱德(一八八六——)，字玉階，四川儀隴人，雲南講武堂畢業。為同盟會會員，參加辛亥起義。護法之役，在瀘州敗張敬堯，以功，升旅長。十一年，戒鴉片，入共黨，赴德，習陸軍，在巴黎，識周恩來等。十四年至俄，習軍事。十五年春返國，入北伐軍朱培德部，任軍官教導團團長，旋兼南昌公安局長。參加「八一」暴動，任偽軍委會委員兼第九軍軍長。至三河壩，以殘部千餘投第十六軍范石生部，改編為教導團，任團長，化名王楷。十七年初叛逃，煽動湖南暴動，敗，襲擊農民，竄井崗山，與毛澤東合，編成紅四軍，任軍長。十八年十一月被俘，詭稱伙夫，得脫。十九年六月，所部擴為第一方面軍，任總指揮。二十年，任中共候補中委及偽全國蘇維埃軍委會主席，二十三年，兼紅軍總司令。五次圍剿後，西竄至陝北。抗戰時，任八路軍總指揮，旋改十八集團軍總司令。三十四年黨七大當選中委。日本投降後，發逆令，「接收」失陷城地。三十八年偽政權成立，被選為偽人民政府副主席，軍委會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四十三年，任偽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四十八年，任偽人大常委委員長。為人庸碌而忠於其黨，得取容而躋高位，幾與周恩來比肩。至民六一，任中共政治局委，三屆人大委員長。

徐特立（一八九六——）湖南長沙人。前清秀才。入同盟會。長沙師範畢業，即在校任教，為毛澤東之師。九年，以勸工儉學赴法里昂讀書。游德、比，入工廠工作。十二年加入國民黨，十六年入共黨，參加南昌暴動。十七年，赴俄入東大特班受訓。十九年入江西蘇區，翌年，任偽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兼列寧師範學校校長。二十三年隨軍竄陝北，任延安師範學校校長等職。三十四年當選中委。三十八年任偽政權人民政府委員，偽政務院文教委員。從事文字改革工作。為人迂闊，有書卷氣，為共黨五老之一。後任三屆人大常委，五十七年死於北平。

孫澤霖（一八九九——）四川江津人，重慶中學畢業，民九，以勸工儉學赴法，旋入巴黎 Y，至比利時、德國工讀，並參加德共工作。十三年入俄東方大學，又入紅軍學院，十四年歸國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十五年隨周恩來參加北伐，十六年參加上海、南昌及廣州暴動，失敗後，匿港、滬。二十年入江西，任偽總政治部副主任。竄陝北後，二十六年，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副師長，赴河北。二十八年，據山西五台，製造晉冀察邊區。三十四年當選中委至今。抗戰勝利後，據張家口，明年退出，仍活動於晉冀察邊。三十七年犯平津，三十八年任偽華北軍區司令員、平津衛戍司令員及北平偽市長等職。偽政權成立後，當選偽政府委員、副參謀總長。四十四年受任「元帥」。四十五年任偽國務院副總理至今，兼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共之原子研究工作，當為其所主持。五十七年八月，文革中被整肅。

郭沫若 四川樂山人，日本帝大醫科畢業。民十五參加北伐，在總政治部工作。清共後，赴日，抗戰軍興，返國，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偽政權成立後，任偽政協委員及副主席，偽政府委員及政務院副總理，偽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職。為人頗有文才，文、史著作亦富，以無黨無派姿態阿附中共（現已入黨），被利用為文化界領袖。至民六一，任中共中委，中國科學院院長。

馮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江蘇武進人。在湖北由蕭必武介紹入共黨。五四運動時，從事武漢商人罷市活動。旋在長江一帶從事教育工作。十一年在上海任 C Y 宣傳部長，編「中國青年」。北伐前後，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及武漢分校黨代表，參加南昌及廣州暴動。十七年參加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二十年春被捕，處死。為中共之擅長演說煽動者。

第三節 兩湖暴動

在三大暴動——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及廣州暴動——中，以兩湖秋收暴動最為洩氣。

所謂兩湖秋收暴動之範圍，根據中共「中央通信」有關文件顯示，在中共初期之計劃，在湖北者，包括鄂北暴動，武漢工人暴動，鄂南之與湘境毗連地區之暴動，及京漢鐵路南段工人暴動；其在湖南者，包括湘中長沙及平、瀏一帶之暴動，湘北毗鄰鄂南地區之暴動及湘南以衡陽為中心之暴動。但各處均未能發動；雖在湘中一度騷動，而長沙竟安然無

事。

兩湖暴動，中共中央期望最殷，籌劃最密，指導最力。湖南爲中共農運最得意之省，有組織之農民號稱二百萬，原期其一經號召，即雲聚響應。武漢分共之後，中共所計劃之四省秋收暴動，特寄其厚望於湖南。但南昌暴動已起，而湖南尚無聲息。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特派以農運起家，以提出「湖南農業考查報告」自豪及曾任「全國農民協會主席」之毛澤東爲特派員，主持其事，以爲中共王牌，自應有所表現。乃毛澤東竟遲遲不敢發動。中共中央復制定完整計劃，派一「馬克夫同志」（或係俄人）前往督導。似此，則所有「機會主義之餘毒」業已清算，「軍事投機」之心理亦已掃除，然而仍不能不遭遇「可恥的失敗」（「馬同志」語），殆非國際及中共中央始料所及。

壹 中共中央之計劃

中共中央約於八月間即通過一「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指責暴動開始已經太遲，而嚴令必須於九月十日開始。指示暴動應以農民爲主力，以軍隊、土匪爲副力；以打倒唐生智之兩湖政權爲目標；沒收大、中地主之土地，實即沒收一切土地，並實現耕者有其田。所有暴動之區域、手段及口號，均詳加規定。此項計劃全文如下：

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註一）

- 一、目前兩湖的社會、政治、經濟情形，純是一個暴動的局面。本黨當前唯一重要責任，就是堅決的實行土地革命，領導兩湖的工人羣衆，實行暴動，推翻武漢政府與唐生智的政權，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權，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繼續進展。
- 二、兩湖的暴動尚未開始，在時間上已經是失敗，這是猶豫不決與不相信農民的羣衆力量的結果，如此便要喪失革命。
- 三、土地革命必須依靠真正的農民的羣衆力量，軍隊與土匪不過是農民革命的一種副力，坐待軍隊、土匪的行動，或許純全依靠軍隊的行動，而忽略農民之本身之組織與行動，這也是機會主義的一種形式的表現。這樣領導暴動，暴動無疑義的要歸於失敗。這不是暴動，這是一種軍事的冒險，或者軍事投機。
- 四、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九月十號，因爲兩湖的環境不同，兩湖應各有其中心區域，應各創成一種獨立的暴動局面以發動暴

動，但總的政治目標口號與行動須一致。

五、湖南暴動可分為三大區……（著者按：原文有此省略符號，下同），如此全省範圍的暴動，應普遍的以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的名義為號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員會於暴動成功之後，組織湖南省臨時革命政府。

六、南（湖？）北暴動應劃成下列各區……

七、暴動組織在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湖北分會之下，軍事方面，鄉村用農民革命軍，城市用工人革命軍名義，簡稱農軍、工軍，合稱農工革命軍。某農民暴動區域軍事的指導，用某區農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工農軍的數量，在暴動成功之後，須無限制的擴充成為正式的革命軍隊，同時仍保存地方軍隊性質的工軍與農軍，執行各境當地警衛，以之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礎。在暴動尚未發動之前，應將工人糾察隊改稱工人革命軍，農民自衛軍即應改稱農民革命軍。

八、對於土匪的政策，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時成為一部份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改編。

對於反唐的雜色軍隊（許克祥除外），如能對於暴動取中立態度，則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發展暴動，並須設法與其士兵接近，宣傳他們，暴動成功後，對於此種部隊，酌量予以解散或改編。但這決不是說要犧牲我們的根本主張以換取他們的中立。在暴動中，對於有反暴動傾向的雜色軍隊和土匪，雖然他們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決他們。

九、暴動為實行澈底的土地改革，即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實的結果是全部），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與沒收其財產，實行鄉村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城市民選革命政府，消滅一切非農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裝。

十、暴動之前須極端注意士兵中的宣傳，鼓勵他們起來殺戮反革命的軍官；一有可能，便應組織革命士兵委員會，這種組織應是廣泛的羣衆的。暴動之中要吸引士兵參加。這種革命士兵的組織可以做改編新革命軍的成分。

十一、暴動的口號：暴動打倒武漢政府，暴動殺盡土豪劣紳、反革命的地主及一切反動派，暴動為死難民衆復仇，暴動沒收地主的土地，暴動實行耕者有其田，暴動抗租、抗稅，暴動恢復一切革命民衆團體，暴動實行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暴動實行民選革命政府，暴動打倒叛國叛黨的汪精衛，暴動打倒殘殺兩湖人民的新軍閥唐生智，暴動組織革命軍，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民革命，平民和士兵的革命聯合萬歲，農民革命勝利萬歲，革命委員會萬歲。

十二、各區的暴動在未發動之先，在離城較遠一點的鄉村，即應殺戮土豪劣紳、反動的大地主，提高農民革命的熱情，舉行各區農

民羣衆大會，多作羣衆的政治宣傳（按照上列的口號，加上實際的事實）。如發傳單、講演、鬻報、告示等。在暴動方開始，首先即須徵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鄉區的中心城市，屠殺政府的官吏，宣佈革命委員會政權，然後才能發展普遍的暴動。

十三、暴動方開始即須掘斷鐵路，破壞水陸交通，佔領、破壞郵政機關，割斷所有的電線，造成敵人的絕端恐慌的狀態，然後才可便於暴動的發展。但因交通機關的破壞，同時影響於我們自己的聯絡，各暴動區域應當想出特別傳遞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遲延等待某區的暴動。即令暴動發生後各方關係斷絕，亦應按照預定的未成功與已成功的地點，猛烈的進攻，絕不可猶豫，猶豫便是破壞暴動的勝利。

十四、暴動勝利的地方，應無情的肅清鎮壓反革命。對於買辦及反動的資本家，如果他們經濟怠工或封閉工廠，則工會應當佔領工廠，以之交給革命政府管理。至於反革命的豪紳，則應堅決的沒收其財產，但必須注意應用正式革命政權機關實行這種沒收，嚴禁私人的搶掠侵吞。

十五、長沙、武漢，兩湖省委，應有一特別的暴動計劃。

十六、各區的暴動內部的指揮，爲各區的特別委員會，直接歸省委指揮。

（著者按：本件未註明時間，但八月二十三日中央致湖南函即曾提及此計劃，可知其約在八月中旬或上旬。）

貳 毛澤東之逃亡與「馬同志」之怒罵（註二）

毛澤東於被派到長沙去組織秋收暴動後，即計劃實行下列五點：（一）湖南省黨部完全脫離國民黨，（二）組織工農革命武裝部隊；（三）沒收大、中、小地主之財產，（四）湖南建立共產黨勢力，脫離國民黨關係，及（五）組織蘇維埃。

此項主張，湖南省委於八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函中提出，由「馬同志」傳遞，並由其面報湖南準備情形。二十三日，中央覆函作如下指示：

一、長沙附近各縣農民暴動的準備薄弱，而靠外面軍事力量奪取長沙，是軍事冒險。

二、專注意長沙，忽略各地秋暴，如放棄湖南計劃，沒有積極組織長、潭、瀏、醴、鄉、寧等處暴動。事實上，○○兩團軍力已不

爲我用。

三、應以湘南爲一發動點，長沙爲一發動點。湘中撲取長沙、湘南與湘中聯合，奪取唐、許武裝，然後攻長沙，兩地須同時發動。

四、湖南暴動應與鄂南聯系。湘西從事準備。

五、使用「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名義，以資號召。

六、（口號及破壞、宣傳等，大致與「兩湖暴動計劃」同。）

七、「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工農的民主政權……到了第三階段才是國民黨消滅，蘇維埃實現的時候，你們自以爲已進到第三階段，可以拋去國民黨的旗幟，實現蘇維埃的政權，這是不對的……國際的電令也是如此。（著者按：至九月十九日，政治局始正式決議放棄「國民黨左派」名義，主張成立蘇維埃。）

八、我們的口號是「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更不要提出「沒收自耕農土地」的口號……其結果仍是沒收一切土地。

八月三十日湖南致其中央函，有所剖白：

一、長沙暴動是秋收暴動的起點，主力是工農，某某兩團不是重要成份，不是軍事冒險。

二、湘中、湘南各地暴動亦並未忽略，湘中亦有暴動計劃；但只能從湘中做起來，以免力量分散，長沙動了，各地也隨之發動。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致湖南函，仍加指正：

湘中計劃中央未見，某同志來亦只說派出百幾十人。岳陽方面同志對暴動計劃一點也不知道。你們至今沒有派一個人到湘南。

在此一段筆墨官司之後，湖南暴動於九月八日起發動，至十二日止，即佔據平江、瀏陽、萍鄉、醴陵及株州。其所依賴之主力，仍非「廣大之農民羣衆」，而是少數槍桿子，毛澤東致被噉爲「槍桿子運動」。毛澤東之槍桿子主要來源有三，構成其「工農第一軍第一師」：其中第一旅由安源工人組成，第二旅由平江、瀏陽、醴陵及其他兩縣農民組成，第三旅由原武漢警衛隊之一部組成。其槍枝數，據稱於暴動開始五天，增加一倍以上；萍鄉有七〇〇——一二一〇——一三〇〇；安源有五〇〇——一二一〇——二一〇〇；持有刀矛梭鏢之農民成千加入。

「馬同志」認爲十三、十四兩日爲長沙發動之最好時機，但十五日晚，湖南省委忽決定延期，「馬同志」於盛怒之

餘，向中共中央報告，破口大罵，節錄如下：

湘東的實情如何？

一、安源的隊伍聞西面與南面有敵軍集中，他們不惟不去打擊其一方面以充實自己武裝，再去打擊其另一方面，反而不戰而退，放棄醴陵，放棄進攻株州，省委竟同意此胆怯行爲。

二、在平江方面，因被邱部抄襲後營，被奪去槍十支，損失六十個農民，我們便稱一營被完全打敗，簡直是笑話，於是我軍分向銅鼓、通城退却，說是損失槍一百支。在這區裡，據彭○○（著者按：當係彭公遠，湘省委書記）說有槍一千三百枝，而邱某只有一百枝；瀏陽縣委第二天來信說，隔兩天瀏陽又奪回。但省委並無停止退却與重佔平、瀏的命令，省委自己恐慌了。

三、長沙的「失敗」更爲滑稽。長沙縣的暴動佔據了東西兩部，把團防與師作許（譯音）的隊伍解除了武裝。照彭十五日說，農民奪有三百支槍。但在一村上，一農民走火打死了一同伴，喧擾起來，以致沒有把十支槍的團防解決！省委遽以爲農民不能解決團防。我痛快的罵了他們一頓。

這種丟臉的不勇敢的指導，恐難免使湘東暴動精神渙散。最壞的是省委先渙散。十五日，彭○○還向我說：預定的十六日準可暴動，但隔了幾點鐘一切都成泡影！敵人的力量忽然長兩三倍，而我們的力量忽然沒有了。他們在騙我，我一句也不相信。

說到工人的情緒，則說我們不能進攻，因爲工人都要炸彈，而我們沒有。原來領袖們怕羣衆鬥爭弄翻了他們的被子。現在我的意見：

(一) 停止退却，退却必失敗消滅，必須進攻，地點可以是長沙。

(二) 對長沙遲遲不動，是給湘東及鄂南暴動的打擊。

(三) 長沙雖有很多國軍，但暴動仍有希望。（以下說明有希望的理由，約五百字，略。）

我們這些意見完全是白說，彭是袖手旁觀。他兒嬉暴動，在緊急的時機則胆怯。我迫促他，他回答：「我同意，把你的意見向省委說。」但他同時向翻譯咬耳朵：「他什麼都不懂，書呆子，智識份子，客觀條件不好，辦不到，他不知道。」

書記（按：即彭○○）並沒有到省委去。他回來說：「今晚戒嚴，無論如何不讓過去。」但從前天起就戒嚴的，前晚和今早都可以過去的。這種玩弄手腕中國式的極頂的市儈勾當！

我認爲必須：(一)派一負責中央同志指導此地工作；(二)中央嚴格決議指出省委的決議是背叛的，臨陣逃脫的；(三)派來中委實行改組省委。

我寫的很厲害，但你們不要以爲我喪氣了。事情還未大糟。我們現在停止他們湘東的退却，促成他們堅決動作。

一九二七、九、十六。

中共中央根據「馬同志」之報告再致函湖南，促其繼續暴動，原函如下：

致湖南省委函

湖南省委：

據馬○○同志報告：省委於十五日晚，忽然議決停止十六日晨長沙暴動的計劃，同時省委對於株、醴、平、瀏農軍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態度。這樣，事實上等於取消整個的湖南暴動，並且給鄂南暴動以打擊。中央認爲長沙暴動雖已不幸的失去很好的機會，但客觀上湖南暴動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時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平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茲特派任○○(弼時？——著者)同志來湘，全權代表中央，指揮省委執行原定暴動計劃，不許絲毫遊移。對於十五日晚取消十六日長沙暴動計劃的決定，中央認爲臨陣逃脫，由任同志查明經過情形，報告中央處理，特此通知。

中央，九月十五日

實則當時長沙情況並不如「馬同志」所想像之易於動手。湘省主席爲魯滌平。長沙駐軍有何鍵之三十五軍兩個師，陳嘉佑之十四軍兩個師，足以鎮壓中共之任何暴動。

至於長沙東之株、醴、平、瀏等地暴動及國軍剿辦情況，據一湘人告著者：當地有手持梭鏢等土製武器之農民數千暴動，省方派某師長前往剿辦。其師長由株州至醴陵，見共軍已星散，乃電告其長沙之家人，謂將於某日返省，此電爲潛伏於電報局之共諜所悉，以告共黨，共軍游擊隊乃毀鐵路，師長被阻，不得歸，再至醴陵，求游擊隊不得，乃捕附近農民數十人，槍殺若干，報省了事。

此時毛澤東已臨陣逃脫，向南移動，中共中央雖有指示，已無及矣。毛澤東暴動無成，且一度被俘，幾至喪命，據其告史諾稱：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在安源礦工和農民保衛隊之間奔走的時候，我被幾個與國民黨通聲氣的民團捕獲了……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那是一定要槍決的。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想賄賂押送人員釋放我，士兵答應了，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准，所以我決定逃脫，直到離民團總部不過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脫離的機會。在這裡，我把繩子扭斷，逃到田野裡去躲着。

我走到一個高地地方，在一個池子上面，四週有長得很高的草，在那裡，我直等到落日。士兵和一些農民搜尋我，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兩次幾乎碰着我了，可是始終沒有發覺我……黃昏了，他們不再尋找了。我馬上出發，爬山越嶺，整夜的跑着，沒有鞋，脚上起了泡。在路上，我碰到一個農民，他待我很好，允我借宿，後來又領我到鄰縣……最後到了農民保衛軍。

新軍成立後，我担任黨前敵委員會主席，武漢衛戍司令俞希濤担任第一軍總司令。不久，他棄職加入了國民黨。

這支小小的軍隊，一面領導農民暴動，一面向南移動，穿過湖南，必須衝破成千上萬國軍的防線，打了多次的仗，敗了多次，紀律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在士兵和官長之中，有許多的動搖份子，許多的逃兵。俞氏逃走之後，軍隊達到寧國，便又改編了一次。陳瀨被任命為留守部隊——約有一旅之衆，可是後來他也叛變了。不過在第一隊裡有多數人，如羅榮桓、楊樂生等。當這支軍隊上井崗山時，人數只剩一千名左右。（著者按：此數仍屬誇大，參閱第十四章第二節。）

（另據「中國紅軍發展史」一十三頁：「毛未參加攻長沙，因半途被瀏陽民團俘獲，拘廿餘日，未發覺，賄守衛得脫。」）

叁 紀律處分

南昌、兩湖暴動相繼失敗後，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於十一月九至十兩日開會，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對各指導機關及各負責人員，予以紀律處分，如下：（註三）

一、譚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會後當任國民政府農民（政）部長一直到南昌暴動前後的行動與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今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C P，而另組織第三黨，並向智識份子同志中作反對中央另組第三黨之宣傳，同時忽視黨的決議，不得中央許可，私向汪精衛代表陳春圃談話，更大罵本黨中央及農運，最後中央政局決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其個人行動。在九江，因為他和賀龍談話之投

機和賀可反張(發奎——著考)，便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動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幹的反黨空氣。至南昌仍繼續其第三黨的宣傳。在同志中，在國民黨員中，其後在革命委員會中，更多先做而後通知，或逕不通知前委的舉動。其於屠殺豪紳和沒收等政策，亦時妨礙其行動。這些表示都是違背本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

二、張國燾同志受中央常委委託赴南昌指導暴動，但國燾同志到九江、南昌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南昌事變以後的主張聯絡張發奎，並反對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綱，這些違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前往前敵指導使命之結果，反給前敵同志以更壞更右的影響。前委亦因之更加搖動。國燾同志應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

三、這次前委指導做出極大的錯誤，前委全體同志應予警告。

四、徐光英同志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五、南方局廣東省委指導農民暴動的錯誤，在於不了解土地問題策略的口號，不發動羣衆而只有軍事行動，應全體予以警告。

六、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爲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爲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七、鄂北特別委員會，違反中央命令，應予以全體警告。陸沅爲特委書記，其主張更多軍事投機心理，根本不做農民運動工作，應予開除中央委員資格。(下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註一)「中央通信」第四期，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註二)此項資料來源：① Snow：「毛澤東自傳」及②「中央通信」第五、六期，一九二七年九月。

(註三)「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四節 廣州暴動

廣州暴動是中共所計劃之四省秋收暴動中最短命、最殘酷及最後之一次暴動。

暴動起於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於十三日，爲時僅三天。較之南昌暴動歷時兩月與兩湖暴動爲時五日均短。

但中共鑒於南昌暴動之殺人、放火太不澈底，並鑒於兩湖暴動之過於怯懦可恥，是以廣州暴動一著手，即從事大燒大殺，將廣州繁榮之都市化為灰燼，將廣州良善之市民化為厲鬼，作為共產黨徒之貢品，以報答史達林指導中國革命之豐功偉績。

此次暴動特點之一為中共設立一短命之「蘇維埃」政權。此後全江西時期在各盤踞地區中共均設立此等偽政權。查「蘇維埃」(Soviet)一詞意即「會議」，原為俄共政權之最高權力機關。其名稱與制度均非中國的，尤其譯音為中文，殊屬不倫不類。而中共黨人竟生吞活剝予以接受，即此一端已可證明中共完全係俄國之附庸組織，為俄國在華之代理人。

壹 張發奎在廣州之軍事行動 (註一)

當武漢分共之後，張發奎以共黨保護人自命，且自信所屬共黨份子決不敢叛己。武漢高唱東征之際，發奎率師至九江，忽請回粵。其態度之所以變化，已見上節。八一變起，發奎自九江乘專車前往鎮壓，行至半途，為叛兵架機槍所阻，乃下車，高呼：「我是張總指揮！」而叛兵噪稱：「我們不知道誰是總指揮，只知道有黨的命令。」發奎回車，心灰意冷，至九江，將餘部交黃琪翔，已則乘船經滬去港。

琪翔率軍南下，並未追擊叛軍，而沿江、贛大道返廣州。至原在廣州之粵、桂軍則多調往東江討伐竄至該地之賀、葉叛軍。

其時寧漢醞釀合作，汪兆銘等仍集矢於蔣中正先生，蔣先生乃於八月十三日宣佈下野。

號稱滬(西山會議派)寧、漢三方面合作之「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設立於南京。汪兆銘等視為非法，聲言反對，相率去粵。謀在粵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旋經各方往返磋商，決在滬開豫備會議。

詎至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陳公博等，於汪兆銘甫與李濟深自粵赴滬商談寧漢合作之後，在廣州發動軍事行動，奪取廣州政權，並將各部向邊境推進，與友軍作戰。此事頗出於一般人之意料之外，據當時身歷其境之黃紹竑談話，經過如下：(註二)

黃紹竑談張發奎事變

我十五日午到廣州，聞知汪（兆銘）、李（濟深、粵省主席）兩主席已束裝待發（赴滬），乃至葵園稟陳一切，並送登南強小輪而回。十時聞汪、李兩主席因兵艦不能行，回來，復至葵園補陳一切，直至二時送登火車後，始行回寓。十六日九時爲軍委會會期，到會後，以人數不足流會，即回寓所。夜十一時半，忽得報，謂十二時將有異動，請避去，同時見二區署及派出所皆停汽車數輛，並有汽車時常在寓所附近緩緩巡行，心知有異，乃假裝潛出，避入友人家。四時尚無事，自謂神經過敏，乃命從人回家安慰家人，並囑衛兵，萬一有事，即行繳械，不可抗拒，因恐驚人民而亂地方。我亦擬於天明後，自行回寓。從人去未久，而各處槍聲繼續而起，乃確知有變，乃再僑裝離友人家，經西關渡江南岸，復折入西關，但見軍警森嚴，槍聲斷續，終不知因何原故，乃行經西堤永漢路一觀究竟，見五光十色的標語，四言一句的布告，及三五成羣的宣傳員，都是說「實現汪主席的救黨主張」，「速開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打倒破壞救黨運動的黃紹竑」，「打倒霸佔廣東的黃紹竑」，「打倒迫害汪主席、威脅李主席的黃紹竑」，「打倒勒索商民一千萬的黃紹竑」，「打倒威逼友軍的黃紹竑」，「反對非黨的軍事行動」，「實行在粵開執監全體會議」。我便思疑此次的大風潮完全是爲我個人而發的了。如果這種罪名都是真的，我個人實是罪該萬死，七軍辦事處及我的私宅衛兵被圍繳切掠也是應該的。但當時的槍聲不止此兩處，於是心中疑惑，乃行至文德路，李任潮（濟深）先生的公館，也被繳械搶掠，東堤的新四軍部、十一師部、十三師部也被繳械搶掠，士敏土廠的臨時軍事委員會也被繳械槍掠，聞說黃埔軍事政治學校、石井兵工廠、兵工試驗廠、工兵團、工程教導隊、虎門要塞守備隊及其他友軍駐省機關部隊，都被繳械，於是我便明白了，這一回的大風潮，不過借我作一個題目，發揮其他的意義罷了。

此一事件發生，直接的引起廣東國軍之互相衝突，間接的造成共黨之廣州暴動。

貳 暴動經過

中共所發動之廣州暴動，廣州東山俄國領事館實爲策動中心，連夜會議，原定十二月十五日開始，其槍枝數目，四鄉農民暴動地點，均爲軍委會廣州分會所悉。

自七日起，其機關即不斷被破獲，遂被迫提前於十一日發動。其時張發奎任軍分會委員，黃琪翔任四軍總指揮。琪翔信任共黨，較之發奎尤甚，以爲凡與共黨接近者都是好人，對其軍中共黨份子葉劍英、張逸雲等均深信不疑。且廣州空虛，四軍李漢魂師防衛惠州與石龍，許志銳師坐鎮西江與肇慶，薛岳新編第一師在南路江門，繆培南之師在西江，留廣州者僅有燕塘之教導團。該團爲軍校武漢分校學生所編成，受惲代英蠱惑甚深，原已繳械，至是發還，四軍參謀長爲共黨葉劍英，兼教導團長，此外則爲四軍警衛團。兩團均爲中共所控制。

十一日晨二時，葉劍英與惲代英至教導團，集合學生，由代英演講煽動，並立即拘連、排長及學生十餘人於一室，指爲反動，發機槍射殺之，以爲殺雞嚇猴之計。同時警衛團亦被控制，工人糾查隊與四郊農軍亦入市。蘇兆徵爲總指揮（未到），羅綺園爲農民指揮，黃俠生爲工人指揮，先攻繳莫雄軍械，繼進攻市內各機關，據之，公安局亦被攻下，局長朱暉日走河南。全市總罷工。叛軍所至，肆行殺人放火，中央銀行首被焚燒，復澆煤油，以助火勢，南園、高第街、水母灣均着火，火光衝天，濃煙匝地，市房被燬者萬餘棟。殺人，不問其爲「正動」或「反動」，屍體羣積，血流成渠，人民被殺者在一萬五千人以上。

暴動之始，立即張貼其所預定之布告，其所公布「廣東蘇維埃政府」人員名單如下：

蘇維埃政府主席

蘇兆徵（未到前由張太雷代）

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蘇兆徵（未到前由張太雷代）

人民海陸軍委員

張太雷

人民外交委員

黃平

人民內務委員

黃平

人民經濟委員

何來

人民職工委員

周文雍

人民司法委員

陳郁

人民土地委員

彭 湃

秘書長

惲代英

農業委員會委員長

彭 湃

紅軍總司令

葉 挺

紅軍副總司令

葉劍英

參謀總長

徐光英

肅反委員會主席

楊 殷

紅軍日報總主筆

惲代英

羣衆運動委員會主席

穆 清

暴動不久，教導團學生及警衛團官兵頗有逃亡者。暴軍攻四軍軍部及豫章會館與文德路之兩個師部後方辦事處，均不逞。工、農之附和者實爲鳥合之衆，不能作戰。

四軍總指揮部設長堤廣西會館，暴動起時，張發奎與黃琪翔均不在軍中。至上午七時，發奎，琪翔與公博等始齊集河南李福林第五軍軍部，與福林會晤，共商對策，但五軍亦無軍可調，只能自守河南。乃分電肇慶許志銳，江門鄧龍光（團長）回師平亂。海軍未變，發奎等乃登「寶壁」，率同「江大」與叛軍作戰，沿河掃射，堤岸叛軍退至內街，僞蘇維埃代理主席張太雷被擊斃。

十二日，江門與肇慶援師各一團達到，會同第五軍之一團，反攻廣州，國民黨所指導之機器工會會員數千，協同行動，十三日，克廣州，暴徒全被撲滅，殘部二、三百人竄東江，共黨首要，在國軍達到之前，已化裝逃香港。

在暴動中，俄國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Abram Isakovich Hassis）直接參加工作，據當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哈斯頓

（Jy Calvin Hudson）記述稱：

「所謂『白軍』很快的進了城，蘇俄副領事哈西斯竟在共黨總部門首被他們捉住，領事館的車子上還插着紅旗。領事館中人員立刻被捕了，其中五人——有兩個是農民組織工作者——立刻被槍決了」（註三）

叁 劫後廣州

廣州暴動後，一日人，大坂每日新聞記者德富，於十四日自香港乘船至廣州訪問，撰為「廣州視察記」一文，讀之令人傷心慘目，轉錄於下：（註四）

廣州視察記

（日本大坂每日新聞記者德富）

我因為要考察廣州共產黨慘殺暴動的真相，十三日午後十一時在香港上了佛山號船，這時船上靜悄悄的沒有多少乘客，可是香港康瑤大街的橋前却圍聚着不少專要探聽家鄉消息的廣州人。不多時開了船。到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在船上可以望得見廣州了。船漸漸的逼近廣州，四面一看，到處還冒着火燄，這是整燒了三天三晚的餘燼，看看那熊熊的火燄，可以使人想像到放火、殺人、掠奪，一切不論什麼的罪惡都發現過了。看看那一縷縷的煙，我那心裡不知不覺跳動起來。

船快開進河南的海關分卡時，瞧見那邊飄揚着信號的旗幟，船長吩咐今天船可靠岸，大家才放心。廣州市已經沒事了，在長堤大新公司前上岸去，大街上那些商店，家家都關着門，靜悄悄的只有紅十字會中人來來往往的忙着。這一帶還在戒嚴之中，有許多反共黨的兵們，頭上纏着白布，全身武裝，在一兩里路中，每隔上幾步就有一個崗位。交通也斷絕了。我這時便尋到了一個兵，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告訴我，在這一帶還有不少的共產黨躲藏着。他們正在戒備搜索之中。

我順着長堤往西走，快要轉灣到太平街時，看見幾個臉上成了土色子的工人寂靜的在地上橫臥着。那種可怕的景象，由不得我倒退了幾步。有一個屍體，大概是共產黨的兵，頸項上繫着紅帶子，前額和右面半邊的臉都不知道那裡去了。成羣的蒼蠅，在那血肉模糊的屍體上吮着血膏，我簡直看得害怕了，直向太平街跑去。

警衛隊不斷地在街上巡邏着，每人手裡都握着手槍，手指扣在扳機上，裝出立刻可以開槍的樣子。此外有三十多個人一隊，手臂上纏着「維持治安工人調查隊」的布條，向惠愛路而去。

我望西走到素稱熱鬧之市區的十二甫、十七甫、十八甫直到西花園。這一帶，兩邊的大商店，平日間的繁華，一點都沒有剩留，完全變成了廢墟了。商店沒有一家不遭搶的，煌煌的金字招牌打得粉碎，櫥窗玻璃一切的傢俱都毀壞了，家家門口幾乎都貼着「本店於本月十一日遭劫，被搶一空」的紙條。再過去就是共產軍受李福林軍猛攻，最後撐持，終於全滅的地方，高高的牆都傾頽了，不論路上河裡，到處都是死屍。

我走到長堤廣州衛生局附近，看見有二十多個工人被兵們用繩索縛在一處，他們都低着頭坐在地下，不時用那憤恨的眼光偷偷看着來往的行人，默默不語。忽然中間有一個短短的頭髮，黑黑的臉膛的工人跳了起來，向一個過路的人喊着「噲，噲！」他很想懇求那看守的兵士允許他去拉住那個人，這也許是受了暴動團嫌疑而被捕的工人，遇見了熟人返於求救吧。

再往前走，到日本博愛病院附近一帶，已經成了一片灰燼，只剩病院還有兩間屋子沒有燒掉，孤立在瓦礫堆中。中央銀行的錢是搶走了，房子是燒燬了，有幾個只在那裡看守着行址。我又從小路穿到大街上，除財政廳前面還留着幾間屋子，此外，一直到惠愛路，燒得乾乾淨淨，顯露出慘淡的光景。

在燒剩了的磚牆之下，羣衆擠得像人山人海一樣都在那裡喊着「殺土匪！殺共產黨！」我容易從人叢中擠進去，原來在燒殘的灰燼上坐着五個被綁的人，他們背後有三個兵拿着手槍站着，一個好像是官長的人說：「被你們這班共產黨鬧成這樣了！殺！殺！殺！」這也許就是宣佈死刑，接着就聽得那可怕連珠似的手槍聲音。從長堤到財政廳，實在是慘劇的中心點。馬路上到處都僵臥着慘遭殺害的尸體，死人的血水流到路溝裡，看見了叫人悚然。有一處好像是剛把屍體搬開，路上紅黑色的血有一丈多長，滿地狼藉着的腦髓和零落的五臟。附近拋滿了石塊、木刀和竹槍，這是兩方面混亂激戰中所遺留着的。到處的殘煙，夾着從屍體中發出的難聞的氣息，中人欲嘔，簡直一刻都不能忍受。

從前被共產黨所佔據的公安局和各警察署都剩了空房子，所有的東西都被搶了。門口有守衛的兵站着。各馬路上都貼着張發奎、黃琪翔、李濟深、朱暉日的會銜布告，大意說：因為廣州兵少，致共產黨暴動，很對廣州人不起。現在共產黨殲滅，希望工商各安生業。此外各處貼滿了「民衆一致起來打倒共產黨，撲滅共產黨」的標語。大街上有幾處飄着白紙上畫的反共產宣傳的圖畫。

最後走到公園旁邊的廣場上，聽見有七八個夫役，押着三大貨車的死屍向觀音山而去。左邊的樹叢裡，橫着十幾個鮮血淋漓的屍體，這是剛槍斃不久的。

許多不知名的鳥兒在樹梢飛來飛去，垂暮的陽光也快湮沒了，遠遠的可以聽得羣衆的呼喊，以及斷斷續續槍斃人的槍聲，是多麼慘

澹淒涼的景象！我來在巡街隊中間回到沙面時，已經下午五點鐘了。

肆、中共中央與國際之喝采

此一殘暴而短命之暴動，決非中國人民所願接受，但由於是史達林所教導，所以中共中央及第三國際同聲喝采。中共在其「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四萬五千字長文中，稱之為「全中國及全亞洲第一次的偉大嘗試！」茲擇要摘錄於下：（註五）

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摘錄）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議決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建立蘇維埃，經過三天，失敗。

一、廣州暴動前之中國一般狀況——南京及武漢清共是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寧漢合作是「一齣滑稽戲」。南昌暴動及秋收暴動之機會主義。

二、廣東省內情形——汪精衛、張發奎到粵後於十一月十七日奪取廣東政權，自稱「護黨運動」，同時「壓迫工農及共產黨」。張發奎與李濟深「兩派軍閥混戰」，致財政恐慌，物價高漲。共產黨雖受「迫害」，「可是羣衆對共產黨的信仰却大大增加。」

三、廣州暴動前階級力量之團結——張發奎等廣東派與李濟深等廣西派都是代表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勾結，但廣東派親日，廣西派親美，是以兩派發生對立。共產黨領導下工人於清黨後從事反抗，至十一月與十二月初「羣衆的憤激達到了極點」，紛紛罷工、怠工，「先進的工人武裝起來。」農人方面，四月間清共時有暴動，秋收有暴動，這次是第三次了。「一切鄉村之中，一切區域之中，以至東江許多縣城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海豐十一月七日開蘇維埃大會，到工農代表三萬人，賓客一萬人，選舉蘇維埃政府，管理東江各縣。十一月中旬，暴動區域已經擴大有五十萬居民的區域」。組織工農革命軍，由各村選出志願兵組成。派人向廣州工人請求贊助，以二萬元送廣州工人作購買武器之用。兵士方面，廣東省委及廣東工人代表會於十月間發表宣言，號召兵士反抗「軍閥」，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起來兵變，站到革命的工農方面來」。在張發奎所召開的慶祝大會上，「一羣革命工人，高舉紅旗，寫着

「打倒國民黨」、「蘇維埃廣州萬歲」等標語」。駐廣州教導團等兵士，十二月初，在許多秘密會議上，許多人贊成共產黨的政策——暴動。小資產階級的「先進份子」也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來。

四、廣州暴動的決定和日期——張發奎、黃琪翔政變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廣東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決定於十二月十一日暴動，是正確的。

五、廣州暴動的準備和口號（此節幾全爲原文）。

暴動經過下列六種準備：

(一) 確定暴動之總政綱，

(二) 暴動之軍事準備，

(三) 廣州蘇維埃之組織，

(四) 經過赤色工會動員工人羣衆，

(五) 兵士工作，

(六) 農民的準備與聯絡。

十一月二十六日，廣東省委公開號召羣衆暴動，並提出下列口號：

立刻釋放一切政治犯，工農武裝起來，勞動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一切工會會所歸還工人。殺盡一切工賊、走狗和改組委員會，立刻恢復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資，工人監督生產，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暴動民衆住，沒收大資本家的財產救濟貧民，一切土地歸農民，殺盡豪紳地主，改良兵士生活，增加兵餉到二十元現洋，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反抗軍閥，兵士委員會監督軍費的開支，打倒國民黨，打倒張發奎、黃琪翔、李濟深、黃紹竑，槍斃一切白色恐怖的劊子手，工農兵聯合萬歲，工農兵代表會政府萬歲，打倒帝國主義，中國民衆和蘇聯聯合萬歲，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共產黨又聯結這些要求，舉出最主要的口號：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種，打倒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切政權歸工農兵。

對於軍事的準備，廣東省委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作下列的決定，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做總指揮機關，組織參謀部做暴動時軍事技術指導機關，軍事準備情形：定出明確的暴動戰術計劃，全體黨員動員，組織二千工人赤衛隊，又組織敢死隊兩連（省港罷工工人一連，海員及手車工人一連），準備運輸工人、汽車等，以及一切蘇維埃法令。

兵士工作，在廣州駐軍中發生影響，但與市外兵士無聯系。市內駐軍中都有共黨。市內教導團完全在共黨影響之下，在暴動中有很大作用。這（第）十二營的軍隊中極大多數是軍校學生，除少數高級軍官外，均贊成蘇維埃革命，廣州警備團的多數兵士，砲兵營一部份，有些黃埔學生及其他，也贊成廣州蘇維埃口號。暴動前一星期，二百士兵會議，一致決議誓死為暴動奮鬥。

省委、市委與農民關係也很密切。秘密組織農民訓練班，與海、陸豐黨部及蘇維埃經常聯絡，給以指令，並努力發展廣州市郊的農民，一直到廣九路沿線、東莞、保安等處。宣傳土地革命。

廣東省委拒絕與張發奎談判。

出版日報「工農小報」，週報「紅旗」及傳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暴動前一天印佈蘇維埃政府的命令、傳單、日報等七百餘份。

六、十二月十一日的發動（此節幾全為原文。）

暴動開始，恰為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定的時刻：十二月十一日午前三時三十分。中共中委、廣州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長張太雷在營中組織兵士。黨及蘇維埃及工人及赤衛隊都派代表出席教導團兵士全體大會，他們演說之後，羣衆宣佈國民政府的政府已被推翻，承認廣州蘇維埃政府，槍斃十五個反動軍官，豎起鐮刀斧頭的紅旗，定了「暴動」兩字的軍中口號，兵士羣衆便遵軍委命令開動，去攻佔市內要隘，殺警察及解除反動軍隊的武裝，同時，工人赤衛隊死隊用手槍、炸彈進攻公安局及保安隊。運輸工會已將一切運輸用具及全部加拿大公司的公共汽車幾百部搬運車及普通汽車開出戰場，以便革命軍的動移。因此，在一點鐘之內將公安局攻下。工人增加武裝之後，立即獨立佔領保安隊，並攻取其他機關。數小時後，市內重要地點，除長堤外，都被佔領。反抗被鎮壓。郵政、電報、無線電、兵營、公安局一切分署，政府機關，國民黨省黨部全被攻佔。二千政治犯立即釋放，多為共黨、赤色工會會員、左派黃埔生，其中多數武裝起來加入紅軍。教導團的一營，突襲解除兩團反動軍，取得張發奎砲兵三分之二，一千槍，很多子彈。市郊農民佔粵漢車站及兵工廠廠庫，廣三鐵路車站也被佔。十一日中午，除長堤及還在頑抗的反革命巢穴之外，全廣州已在蘇維埃之手。

七、蘇維埃政權的成立

這是全中國以及全亞洲第一次的偉大嘗試。

取得政權之後，立刻發生許多重要任務：（一）組織蘇維埃政權，（二）擁護蘇維埃政權，（三）實行蘇維埃政策，（四）向反革命進攻，（五）打通與海、陸豐聯絡的道路，蘇維埃存在不滿三天中，這些任務只實行了很小部份。最後兩種任務，絲毫沒有實行。

平民行政委員會，有許多工人及農運領袖，主席是省港罷工領袖，中共中央政治委員蘇兆徵（著者按：蘇尚在武漢）發布宣言命

令，宣布蘇維埃政權成立，組織革命軍隊，以及消滅反革命勢力辦法。軍隊採供給制，從士官到最高長官都沒有支餉。工人開始學習軍事，設立肅清反動委員會，從事殲滅及逮捕。圍攻中央銀行而佔領之。長堤方面頑抗不降，「決定無情的焚燬這些房屋。」

拋棄青天白日等徽章，換上紅領帶，撕掉青天白日旗，換上鐮刀斧頭紅旗，張貼工農革命標語。命令禁止國民黨存在，解除國民黨在廣州的黨部，沒收其財產，通緝其領袖，不論左派右派，一律逮捕，就地正法。

青年團及無產階級婦女亦積極參加暴動。

八、蘇維埃政府的政策

對工人階級——公佈命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對手工、小企業工人也規定工作時間，恢復並擴大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資。

對農民——宣布土地國有，歸農民耕種，殺盡一切地主豪紳，毀滅田契、租約、債務，毀滅田界，各村區成立蘇維埃，批准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委員名單，以彭湃為廣州蘇維埃政府之農業委員長。

對一般勞動民衆、小資產階級城市貧民——公布沒收資產階級房屋給貧民居住，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救濟貧民，對貧民取消捐稅、債務、一切房租，房屋市有，沒收當舖，質物發還。

對兵士——國有土地給士兵及貧民耕種，部隊中組織兵士委員會；組織工農革命軍。

宣布中華全國總工會系統下的工會為唯一工會組織，解散反動工會，其會員應加入赤色工會，白色工會指導者和委員通緝就地正法。

九、廣州蘇維埃政權失敗的原因

客觀原因：

(一)反動軍隊的數量很多，他們立刻調動三師人，從北、西、南三面進攻廣州。開始由海軍軍艦砲擊，河南的軍隊得以渡河，調動民團加入攻戰。

(二)赤衛軍多為工農，無軍事經驗，多是暴動後才練習放槍，只能使用一部份機槍，有二十五尊砲，只能用四、五尊。巷戰時不知架設障礙物。

(三)各派軍閥聯合起來反攻。

(四)帝國主義幫助白軍：日本水兵在長堤登岸，致赤軍費了一天功夫，未用之於向別方面白軍進攻。英艦救出許多豪紳資產階級。英

艦Moreton及美艦 Sacramento 也派陸戰隊登岸。中國反革命軍艦依其掩護，運送白軍，轟擊廣州。英商船載運白軍。

主觀原因：

(一) 以太多時間進攻長堤，沒有很快進攻河南、黃埔及石龍，以便與農民暴動區相聯絡（由石龍可聯海陸豐）。佔領東山太遲，國民黨領袖沒有捉到。

(二) 白色軍隊堅決反對赤色廣州，這是共產黨破壞反革命軍隊的工作做得不夠。

(三) 反動派勝利之後居然能調動一千個武裝機器工會會員來屠殺工人，本黨工作沒有充分的去宣傳吸引他們。

(四) 有幾千農民參加暴動，但沒有發動幾十萬市郊農民暴動。農村中沒有黨支部。

(五) 攻中央銀行時火燒倉庫，幾百萬銀元不得運出。

(六) 退却時無計劃，沒有退到農民暴動區去。

十、共產黨的策略——「這次勝利的暴動的基礎，是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歷來政策之正確。」中共過去的機會主義也沒有。十一、奪取一省政權的問題——「中國及其他亞洲專制主義之下，不能建築真正鞏固的政權，這使資產階級統一中國的企圖通成妄想，則中國革命階級便儘有可能於全國工農革命勝利之前，在幾個較大區域之內，博得工農暴動的勝利，建設蘇維埃政權，保障其勝利，進而擴大鬥爭，使此政權擴展到其他區域，以及整個中國。共產黨能夠而且必須在相當具備條件之下，在有二千萬或四千萬人口的省份之中，領導民衆，奪取一省或幾省，建立蘇維埃政權，使革命擴充於全中國。」

十二、廣州暴動之政治結果及其歷史意義

(一) 「城市中的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出現於中國及整個殖民地的亞洲」。「列寧預言在殖民地國家內進行蘇維埃革命的任務已經第一次見諸實行了。」

(二) 「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表現自己真正的革命的領導者」，「第一次博得勝利。」

(三) 「無產階級與農民結爲親密的革命聯盟」。「農民成爲工人暴動有力的響應者。」廣州蘇維埃「告訴全省每一個農民：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得到土地。」

(四) 廣州兵士「在蘇維埃旗幟之下，走向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五) 中共在暴動中「一般被壓迫民衆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及無產階級領導民族革命的主力軍。」

內資產階級「自就衰頹」，「是反對工人階級革命的死敵。」

十三、廣州暴動之國際意義

「廣州蘇維埃政權之奮鬥目標自始至終成爲國際階級鬥爭之一幕。廣州暴動之勝利預示國際無產階級之革命勝利……指導暴動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支部之一。工農兵羣衆之奪取政權，不獨反對國內的剝削階級，並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強盜們。蘇維埃政權的政綱主要一點便是「與蘇聯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英國報紙說，蘇聯駐華領事館館員曾經指揮暴動，發槍械給暴動羣衆，這是天外奇談……國民黨把廣州蘇聯領事館館員及其家屬盡行槍決……中國民衆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十四、中國革命之前途

「最近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總括的估計和觀察，在廣州暴動之後仍舊是正確的。」

「廣州暴動的主要意義……在於工農革命的高潮與成熟已經明顯固定。」

「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破裂之後，開始一個一切革命勢力改組而變更其結合形勢的過程。共產國際估定這一時期是革命進於新的更高階段之過渡時期。八一暴動，各省秋收暴動，中共指導機關之改組，都是這一過渡時期之繼續。廣州暴動便結束了這一過程，革命已過渡於比資產階級國民革命更高的形勢，這就是過渡於蘇維埃革命，是將來進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梯。蘇維埃革命已經開始了，繼續發展，加以領導，應當是現在政治前途之中心任務。」

「中國總形勢仍舊是直接革命形勢。階級鬥爭的劇烈非常之利害。暴動問題，在相當條件之下及有最小限度的準備，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都已經是目前工農革命的實際問題。」

「一切暴動都應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進行。」

十五、中國共產黨的最近任務

中共於努力執行八七會議及十一月會議的決議時，注意下列主要任務：

(一)廣州暴動之政治意義及經驗應在黨部及羣衆中廣大宣傳。

(二)「鐵一般的鞏固組織。舉行「廣州暴動徵求期」——六個月內增加三萬新黨員，其中要有百分之六十二工人，百分之三十農民。」

(三)努力建立赤色工會。黨部與工會分開。吸引黨外工人負擔工會指導工作。從同盟罷工而進入暴動局面。反對白色工會。

(四) 在廣州、上海、武漢白色恐怖中，共產黨要繼續實行秘密組織。

(四) 廣州暴動失敗後，海、陸、陸豐蘇維埃政權仍在繼續鬥爭，其經驗應充分運用到農民暴動中去。組織共產黨農村支部。在主要省份中養成黨的農運幹部，吸引黨外農民領袖。

(四) 在反動軍隊中進行兵運，宣傳「土地歸農民和士兵」，反對軍閥，吸引下級士官。

(四) 吸引城市小資產階級到革命運動中來。中共應提出抗捐抗稅，不還債，不付房租，沒收當舖，銀行國有，取銷釐金，抵制帝國主義貨物……

(四) 反對軍閥戰爭，變軍閥戰爭為民衆反軍閥戰爭。

(四) 民族問題仍有嚴重的意義，我黨必須發動羣衆反對帝國主義。

(四) 加緊與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聯盟；嚴辦殺死蘇聯國家代表的兇手。

廣州暴動爲史達林及布哈林所直接指導。其後第三國際召開第六次世界大會時，史達林爲顯示其對中國政策之正確以保持其地位，對於此次以中國爲犧牲品而遭受迅速失敗之暴動，稱之爲「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此語即爲中共份子所經常引用。史達林在國際六次大會作如下之評語：

「大會認爲廣州暴動認作盲動之企圖是絕對錯誤。廣州暴動雖是中國革命過去時期中中國無產階級之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雖然指導方面有很大的錯誤，但是仍舊是革命之新的蘇維埃階段之旗幟。」

又謂：「廣州暴動已經深入勞動羣衆意識中，這是中國工人之偉大的英勇的模範。將來廣泛的工農羣衆暴動，組織在列寧主義的澈底的堅決的策略之下，得著國際無產階級之贊助時，必定成爲中國勝利之十月革命。」（註六）

伍、廣州之暴動與海陸豐暴動（註七）

中國之有農民運動，發源於廣東之海、陸豐，發動之者爲彭湃，於民國十二年即開始組織，歷十三、十四年，得國民黨支持，其勢力擴及全省。（參閱第五章、第四節、貳。）南昌暴動時，彭湃在賀、葉軍中。潮、汕失敗後，叛軍一部竄

入海、陸豐，彭湃亦返抵其地。中共中央亦於此時命令海、陸豐發動暴動。彭湃乃於十月二十五日發佈兩縣暴動命令，三十日暴動開始，十一月一日，農軍即佔領海豐城，陸豐、碣石及捷勝等處亦相繼被佔。共黨乃於七日開蘇維埃大會，正式組織「蘇維埃政府」——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組織各鄉工農革命軍，組織僞革命法庭，實行分配土地，焚燒一切契約，並頒佈殺人條例，如下：

- 一、凡地主向農民收租者，槍決；
- 二、凡勾結地主私還租穀者，槍決；
- 三、私藏土地契約者，應交本政府，否則槍決；
- 四、取消一切債務，如有債主向工農討債者，槍決；
- 五、爲地主作工役，向工農勒索者，槍決；
- 六、竊藏地主契約者，槍決；
- 七、如已向農民勒索租穀，應一律即刻繳出，否則槍決。

此項條例，被農民稱之爲「七殺令」。數月中，殺戮地主一，八八二人。（鍾貽謀：「海陸豐農民運動」，中共廣東人民出版社。）據非共方面估計，當在萬人以上。

廣州暴動頗受海、陸豐暴動之影響，亦頗得海、陸豐精神的物質的支援，海、陸豐曾獻二萬元作爲廣州暴動購買槍械之用。是以廣州暴動如不被鎮壓，勢將與海、陸豐暴動連成一氣。

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其殘部由葉庸率領，奔海、陸豐，編爲「紅軍第四師」，自任師長，賀培珍任黨代表，海、陸豐共黨氣勢爲之一壯。其後李濟深回主省政，全力進剿，執葉庸斬之，海、陸豐之共黨勢力遂被撲滅。

✱

✱

✱

✱

廣州暴動失敗後。瞿秋白之盲動主義實際已告結束。其他尚有順直暴動，江、浙暴動……均無足觀。瞿秋白之暴動政策失敗後，共產黨徒雖有斥之爲「盲動主動」，但至翌年（民十七）七月六次大會時尚未予以清算，其罪名之確定實在立三路線之後（詳下章第一節）。八年之後，秋白自己尚有辯白，稱：（註八）

當時我認爲有若干地區時機已成熟，爲輔助軍事發展計，主張在湖南與潮汕兩地區暴動，一路由湖南、湖北、安慶發展至南京，另一路由潮汕沿海經浙江發展至南京。但我的政策發表後，下級人員誤解意旨，各處均紛紛暴動，遂被目爲「盲動主義」矣。」

秋白之此項辯白，對於其爲「盲動主義」，並無若何改變。

(註一) 陳公博「我與共產黨」甲二五九至二六〇頁。

(註二) 「國聞週報」四卷四十九期，民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三) 「莫斯科與中共」一一九頁。

(註四) 「國聞週報」四卷五十期，民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五) 原件爲國民黨所轉印，藏書處。原文約四萬五千字。

(註六) 轉引「中共透視」一一〇至一一一頁。

(註七) 「中共透視」一〇六至一〇七頁。

(註八) 「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羅於是年四月初在福建武平被捕，六月八日在長汀槍決，國聞週報記者於六月四日曾往訪問，有此段談話。彼另撰「多餘的話」一小冊，當時各報均刊載。



蘇兆徵（一八八五—一九二八），廣東香山人，海員。民十四年加入共產黨，十五年當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長，領導香港海員罷工及省港罷工。十六年任武漢國民政府工入部長，分共後，意志消沈。廣州暴動，中共因其爲工人出身，利用其名，實則彼仍留武漢，未與其事。十七年在俄國割盲腸，一個月後歸國，病死於上海。

張太雷（——一九二七年）一名樸木。「一九一八年成立的最早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中國少共八個創立人之一」（著者按：此係根據中共之「新名詞辭典」壬八頁，此兩組組織情況待考。）歷任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漢口市委書記，參加八七會議，旋即任廣東省委書記。南昌暴動失敗後，攻擊張國燾機會主義甚力。擅俄文。最早出席國際會議，迭任馬林、鮑羅庭翻譯，爲中共中最親俄份子。製造廣州暴動，被擊斃。

上海時期中共大事記（民八至民十六）

民國八年

三月 列寧設第三國際，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莫斯科。

五月四日 北京發生五四運動，此次運動並非共產主義者所領導。在上年十月，北京大學教授王光祈、李大劍等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五四」之後，始設「社會主義研究會」，後改爲「馬克斯主義研究會。」
（李大劍選集第七頁稱：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劍發起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七月廿五日 蘇俄外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聲稱廢除帝俄時代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

民國九年

四月 列寧設「遠東共和國」於伊爾庫茨克。

六月 第三國際派吳廷康（維金斯基）來華，與李大劍會見於北京，旋與陳獨秀會見於上海。陳原任北大文科學長，「五四」後，因散發傳單被捕，釋出後，走上海。

七月 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開於莫斯科。印尼代表爲馬林，印度代表爲路伊。此二人均爲爾後中共的指導者。

八月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份子頗複雜。

九月 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成立，自是北京、武漢、廣州、長沙及巴黎成立臨時支部。

二十七日 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赴粵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十月十六日 加拉罕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較第一次宣言多所保留。

瞿秋白以北京晨報記者名義赴俄。

十一月七日 「共產黨」月刊出版。

民國十年

三月一日 外蒙在俄共導演之下，設立「蒙古人民革命黨」（蒙共）。

六月廿三日 第三國際開第三次大會，中共代表爲張太雷。

七月十一日 「蒙古人民政府」成立。自是外蒙附俄，脫離祖國。

下 旬 中共第一次全國大會開會於上海，陳獨秀當選爲委員長（書記）。獨秀在粵，由周佛海代理。（中共

規定「七一」爲建黨日，與事實不符。）

八 月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於上海，張國燾負責主持。並創辦「勞動周刊」。

九 月 陳獨秀自粵返滬，執行書記職務，旋在滬被捕，不久被釋。

十 月 勞動組合先後於廣州設南方支部，北京設北方支部，武漢設長江支部，自是各地發生罷工。

十 一 月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組，淘汰非俄式共產主義者。

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與孫中山先生會見於桂林，要求聯共，被拒。先是馬林會見吳佩孚及陳炯明。

民國十一年

一月十三日 香港海員罷工，至三月五日復工。

廿二日 遠東民族大會舉行於莫斯科，藉以抵制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三十餘人，多爲中共所物色，國民黨亦有代表出席。中共有張國燾，國民黨有張秋人。

二月二十八日 中東路問題，經北政府與蘇俄、赤塔兩政府代表屢次交涉，協定大綱四項：（一）中東鐵路歸中國政府管理，由中國政府設管理機關管理；（二）俄人所有該路股份，由中國政府酌定時價於五年內收回之；（三）該路未完全收回前，蘇俄、赤塔兩政府得派員參與該路路政；（四）中東鐵路所負各國政府及外商之債務，

由中國政府完全負擔，並由中國、蘇俄、赤塔三政府共同組織清算局整理之。

二 月 瞿秋白因張太雷介紹入黨。

三 月 上海反基督教同盟成立。（中共外圍團體。）

五 月 一 日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開會於廣州。

五 月 日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

六 月 十 五 日 中共中央發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指斥封建軍閥混戰，批評當時各派（如聯省，好人政府等），主

張與國民黨聯合。

十 六 日 陳炯明在廣州叛變，炮擊總統府，中山先生走永豐艦。

七 月 中共開二全大會於上海（依據民二十七年解放社出版的「紅色文獻」所載大會宣言，記明爲五月。）

中共中央發表第二次對時局主張，值曹、吳驅逐黎元洪，繼續主張「民主的聯合戰線」，提出「國民會議」。（宣言未註明日期。）

八 月 中共中委召開杭州會議，馬林出席指導，命中共加入國民黨。

十 二 日 海、陸豐農民協會成立。

越飛到北京。

中共機關報「嚮導」創刊於上海，陳獨秀主持。

十 四 日 中山先生廣州蒙難後，至是抵滬。（中山先生抵滬後，馬林再請國共合作，拒之，請容共，許之。張

繼引李大劍來見，准其加入國民黨。嗣是中共黨員幾全體加入。）

廿 五 日 越飛派代表至滬謁中山先生。

本月，蘇俄代表越飛通告北京政府外交部，遠東共和國已與蘇俄合併，彼仍繼任蘇俄代表。

十一至十二月 共產國際四大在莫斯科召開，陳獨秀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報告加入國民黨。

民國十二年

本年 上海大學已成立於上海慶雲路慶雲里，後擴充至西摩路，鄧中夏任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侯紹裘任附中主任，教師有蔡和森、張太雷、惲代英，蕭楚女等，學生有楊之華、張琴秋、康生等。

一月十二日 第三國際決議，命中國共產黨留於國民黨內，仍保持自身組織。

廿六日 中山先生與越飛在上海會見，發表孫越宣言。

廿八日 廖仲愷與越飛會於日本之熱海。

二月七日 京漢鐵路大罷工（二七事件），為吳佩孚所鎮壓，自是第三國際與吳絕緣。

六月 中共三三大會開會於廣州，發表宣言，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勢力，應立於領導地位。

七月 中共中央發表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分析曹吳逐黎及各軍閥之帝國主義背景，並反對擁黎、擁段、國會南遷及製憲、團結西南聯省自治及借助列強，提出打倒列強及軍閥口號，主張由國民黨召開國民會議。（本文未註明日期。）

中共另一刊物「前鋒」創刊於廣州。

八月十六日 蔣中正赴俄，九月二日抵莫斯科，十一月二十九日啓程歸國。

本月，鮑羅庭到廣州。

九月二日 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到任。

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雜誌「中國青年」創刊。

十月廿五日 中山先生派鄧澤如、廖仲凱、譚平山等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籌劃改組事宜。

十一月十六日 蘇俄代表加拉罕照會曹錕外交部，願放棄俄國應得之庚子賠款，用作國立八校經費及基金。

廿五日 蘇俄代表加拉罕發表更正一九一九年宣言公文，聲明當時並未允將中東路交還中國。

廿九日 中國國民黨鄧澤如等呈中山先生，彈劾共產黨，指斥陳獨秀陰謀。

民國十三年

一月二十日 中山先生主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揭幕，到各省及海外代表一百六十五人，其中有中共份子。中山先生講述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並於歡宴代表席上講演「主義勝過武力」。

卅一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二月六日閉幕。）

二月 中國鐵路總工會成立。

廿四日 蘇俄與外蒙訂立「赤（赤塔）庫（庫倫）條約。」

五月十日 中共中央發表第三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指摘軍閥混戰，曹錕賄選，帝國主義的背景，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及全國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口號。

三十日 「中俄協定」經顧維鈞，加拉罕正式簽字，中俄國交恢復。

六月一日 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黃季陸、孫科，向中央黨部呈請裁制共產黨活動。

十六日 曹錕公布「中俄協定」及各項附件。

十八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根據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之種種決議案，提出彈劾。

廿一日 外蒙通告蘇俄政府，決行共和，脫離中國。

廿八日 共產黨排戴傳賢去粵。

七月卅一日 蘇俄第一任駐華大使加拉罕向曹錕遞國書。

十月五日 俄大使加拉罕移居前俄使館，舉行升旗禮，各地蘇俄領事館亦同日升旗。

七日 俄艦運械抵達黃埔，即時起卸。

十二日 蘇俄軍艦抵廣州，軍校開歡迎俄艦員兵大會。

十一月八日 庫倫開全蒙會議，傾向蘇俄。

十一日 蘇俄訪問革命政府軍艦由廣州啓旋返國。
十三日 中山先生北上。

中共中央發表第四次對時局的主張，分析曹錕倒台，段祺瑞執政的帝國主義背景，仍主召開國民會議，反對各省「軍民長官會議」，並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改善內政等。（本文未註明日期。）
十二月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等，通電否認中山先生主張共產。
卅一日 中山先生抵北京。

民國十四年

- 一月 國民黨海內外衛黨同志會成立於北京，主張反共。
- 廿二日 中共四全大會開會於上海，發表宣言，號召反帝、反軍閥、開國民會議。
- 二月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三全大會，改團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 三月八日 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成立，此為西山會議派之前身，由馮自由等發起。
- 三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逝世於北京。
- 四月十六日 熊克武部賀龍投降趙恆惕，助趙攻熊，趙委賀為澧州鎮守使。
- 五月 戴傳賢著「孫文主義哲學的基礎」。
- 一 日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開會，中華總工會成立。
- 三十日 上海發生五卅慘案。
- 六月 港九大罷工。
- 四 日 瞿秋白在上海辦「熱血日報」，共出二十四期，被租界當局查封。
- 五 日 中共中央發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衆」——為上海「五卅」慘案事件。

十五日 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議決重要各案：(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二)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三)建國軍及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四)整理軍政、財政。

廿三日 廣州發生沙基慘案。

七月一日 國民政府成立於廣東。汪兆銘任主席。

十日 中共中央發表「告五卅運動中為民族自由奮鬥的民衆」，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國民會議及工人罷工、農民武裝之自由等。

十二日 中共中央發表第五次對時局主張，其突出之點為反對國民黨右派。

八月二十日 廖仲愷被刺於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

十月廿三日 國民黨反共者在中山先生靈前舉行西山會議發表反共宣言。

民國十五年

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東，反對西山派。

西山派開二全大會於上海。

廿二日 國民黨第二屆一中全會推蔣中正、汪兆銘、譚延闓、譚平山、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九人為常務委員。

三月 長沙等十二縣農民協會成立。

十八日 北京發生三、一八事件。

二十日 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中正於黎明前，下令宣布廣州戒嚴，即捕獲艦長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多人，又圍繳罷工委員會械，及派兵監視各俄顧問寓所，並繳其衛隊械，旋中山艦亦告奪回，乃往造幣廠北校場，訓誠第二師將士。(汪兆銘旋出國。)

廿二日 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令俄顧問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師各黨代表撤回，對不軌軍官查辦。

俄使館參議某謁見蔣中正，詢二十日事件，爲對人？抑對俄？蔣告以對人。某言祇得此語，心已大安，當令季山嘉、羅茄覺夫離粵回國。

四月 第一次全國農民大會開會。

十四日 國民政府解俄員依文諾夫斯基及阿力近等十餘人聘約，遣其歸國。

五月 第三次全國勞運大會開會。

十七日 國民黨二屆中央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限制共黨活動。

七月 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就總司令職。

廿七日 誓師北伐。

八月 十二日 克長沙。

廿四日 蔣總司令因共黨嚮導報載陳獨秀反對國民黨北伐論文，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共黨提出質問。

九月 農民運動決議案。

十七日 克漢口（十月十日克武昌）

廿七日 國民政府及國民黨決遷武漢。

十月 製定農業綱領。

發表聯席會議宣言。

招商局海員罷工

十一月底 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不主張中共脫離國民黨，但應反對其右派與戴季

陶思想；形成其左派，與之合作而批評其搖動，並要求擴大無產階級基礎。

十二月 十四日 克九江。

七日 克南昌。

十三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議決，在政府未遷來以前，組織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出席者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孫宗慶齡、陳友仁、王法勤、鮑羅庭等。推徐謙主席、秘書長葉楚傖。）

民國十六年

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命令以武漢爲首都。

三日 武漢羣衆與漢口英租界英軍衝突，是爲「一、三」事件，四日英軍撤退，租界事實上收回。

六日 長沙左傾份子組織「審理土豪劣紳特別法庭」。

七日 中央政治會議在南昌集會，決議：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遷移問題，留待三月間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本案事實上未執行。）

二月 國民政府遷移武漢。

全國總工會遷至漢口。

十九日 上海工人在總工會命令下罷工，歷時四天。

廿八日 全國總工會命令各工會，於本日十時起至十一時止總罷工一小時，表示反對英兵來華。

武漢一小時罷工中，發現有攻擊蔣總司令，及打倒張靜江傳單，時徐謙、鄧演達等受共產份子利用，徐更倡言提高黨權，以阻礙蔣總司令之軍事進行。

本月 中共份子陳獨秀、彭述之、李立三、瞿秋白、羅亦農、趙世炎、楊之華、侯紹裘等均在上海，煽動罷工。旋將周恩來、陳延年從廣州調來，周負軍事責任，陳負江浙區黨委責任。

三月 第三國際派羅易，青年國際派羅卓夫斯基來華。

十日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揭幕，到委員三十三人，譚延闓主席，徐謙等反對蔣總司令之一派人物，極爲活動，關於抑制蔣總司令之「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均完全通過。武漢衛戍司令兼第十一軍長陳銘樞被排去職，以唐生智繼任衛戍司令，第四軍副軍長張發奎兼任第十一軍軍長。

十一日 通過農民問題決議案。

十二日 上海鐵路工人罷工風潮擴大，滬寧鐵路在真茹附近，被革命軍便衣隊拆毀，客車因此出軌，直魯軍之軍事運輸大受影響。

十七日 三中全會議決：「統一財政、統一外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案後，即行閉幕。（此次全會受共黨份子操縱，若干決議，均與十四年五月「整黨務案」相違背。中共份子發動反蔣。

廿一日 克上海。上海工人暴動，歷時三日，中共企圖組織上海市政府，被國民革命軍鎮壓。

廿四日 克南京，革命軍中共黨份子發動殺害外人行動，釀成南京事件。

本月 在上海之中共中央主要份子紛紛赴武漢，瞿秋白亦前往。

四月 汪兆銘自海外歸國，抵上海。

湖南成立審理土豪劣紳特別法院。

二日 羅易（ROY）與譚平山自俄抵武漢。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舉行全體大會，吳稚暉檢舉共產黨員謀叛證據，決將首要各人，請各地軍事當局分別看押監視。

五日 汪兆銘與共產黨陳獨秀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

六日 汪赴漢口。（陳獨秀約在此時前往。）

上海擁護蔣總司令，及歡迎汪兆銘之聲浪甚高，各界籌備迎汪大會，但汪已秘密赴漢口。

北京武裝警察隊，會同奉軍憲兵，得使團允許，入使館界，包圍俄大使館，搜查附屬之遠東銀行，及中東鐵路辦事處，拘獲中俄共產黨人李大劍等六十餘人，檢出關係蘇俄赤化中國之重要文件無數。當搜查時，曾進入使館武官室，該處俄兵即放火圖銷毀證據，但毀去證據不多，即被救息。

十二日 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

共黨在武昌開羣衆迎汪大會。汪出席講話。

十五日 李濟琛在廣東清黨。

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由滬赴南京，因武漢方面委員未到，改開預備會，決定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

十六日 汪兆銘在漢口通電，指摘各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在南京之行動。

十七日 武漢政府通緝蔣中正。

武漢當局發布「集中現金條例」，查封各銀行所存現洋約四百萬元，禁止其使用及出口，規定納稅、流通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之鈔票爲限，惟均不准兌現。

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由蔡元培授印，胡漢民受印。發布中央政治會議奠都南京宣言，揭發驅逐共產份子，實行三民主義，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諸端。各團體舉行慶祝國民政府遷都，與恢復國民黨黨權大會，蔣中正、吳稚暉、胡漢民均蒞會發表演說。會中通過取締跨黨分子，從事清黨，審查武漢非法議決案，請汪兆銘、譚延闓來京行使職權等議案。

廿七日 中共召開五全大會，至五月六日閉幕。採半公開式，情況紊亂。

廿八日 北京審判俄使館所捕黨人之特別法庭，認李大劍、路友于等二十人爲共產黨，由審判長何豐林判定死罪，執行絞刑。（查友于非共黨。）

五月十日 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開會。

十三日 夏斗寅自宜昌起兵反共。

十九日 長沙總工會與軍界發生衝突，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住宅被糾察隊搜索，並將何父拘捕，何從河南前線致電省政府，責總工會搗亂後方。

二十日至廿六日 汎太平洋勞動大會在武漢舉行。

廿一日 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長沙共黨幾被一網打盡。

二十至二十四日 武漢黨政當局連下命令六道，糾正工農過火行動。

卅日 第三國際第八次執委會通過中國問題決議，否認托洛斯基革命失敗說，仍主張留在國民黨內，佔據黨

政戰略地位，組織工農，實行土地革命，改善工人生活，武裝工農，整編軍隊，反蔣。

六月一日 第三國際電鮑羅庭，改組武漢之黨政軍。第三國際代表羅易持以告汪兆銘。

十日 汪兆銘、譚延闓、唐生智等，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

十九至二十八日 第四次勞動大會在武漢舉行。

廿日 蔣中正、馮玉祥等舉行徐州會議，共同發出馬電，馮復以馬電致汪、譚，請驅鮑羅庭。

廿三日 汪兆銘發表國民黨國民革命領導權宣言。

廿九日 武漢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表反共宣言。

七月九日 汪兆銘、譚延闓等主張分共。

第三國際通過關於中國政局的決議，令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

十二日 鄧演達發表宣言，反對清共。（後加入第三黨。）

十三日 中共中央發表對時局宣言，詆毀武漢國民黨，但聲稱退出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

十五日 武漢國民黨中央正式宣布分共。

十六日 武漢國民政府發表保護共黨人身自由令。

廿七日 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告中共書。」

卅一日 賀龍、葉挺、朱德等佔領南昌。

八月一日 南昌暴動，中共革命委員會成立（南昌八一、暴動）。

四日 賀龍、葉挺退出南昌，向撫州竄去，張發奎軍另路開廣東。

五日 武漢政府下令拿辦共產黨員。

七日 武漢衛戍司令部大捕共產黨，並槍決多人，總工會委員長向忠發潛逃。

九日 中共召開「八七會議」，發表告黨員書，嚴厲指摘其中央的「機會主義」，指為取消派，要求確遵國際指導，黨團合作，重視工農，自是陳獨秀倒台，瞿秋白「盲動主義」開始。

九日 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議決取締共產黨辦法，除將列名南昌革命委員會之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

惲代英、高語罕開除黨籍通緝外，其列名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候補執監委員者一律免職，並開除黨

籍。又定清黨辦法四條，令登記及登報聲明，否則以反革命論。

十三日 蔣中正下野，在上海發表宣言，述其反共之經過，主張寧、漢實行合作，併力北伐，澈底清黨之三

願望。並謂雖自効歸去，仍以黨員資格努力黨務。

廿一日 賀龍、葉挺之共產黨軍由江西竄福建汀州。

廿三日 上海中共中央令江蘇省委打倒黃色工會，上海各工會罷工。

廿八日 宋慶齡與陳友仁抵海參威，即赴莫斯科。

九月 中共採用蘇維埃名稱。

三日 李濟深防止賀龍、葉挺入粵，及東江農軍之蠢動，令黃紹竑防北江，陳濟棠防東江，在贛邊錢大鈞之

粵軍已截阻賀龍、葉挺所部，加以懲創。

八日至十五日 毛澤東在湖南發動秋收暴動，進攻長沙，失敗，被俘，旋逃出。

十一日 賀龍、葉挺率叛軍抵福建汀州，揭「中國國民革命軍閩南救黨軍事委員會」旗幟，共產黨人譚平山等偕行，沿途徵捐，並令農民不交租，粵、閩兩省政府派兵合剿。

廿三日 賀龍、葉挺之叛軍攻入潮安，附近農軍千餘人入據汕頭市。

廿五日 賀龍、葉挺、高語罕、譚平山、鄧演達、周恩來等抵汕頭宣言實行聯俄、聯共、擁護農工三大政策，即將各機關及國民黨領導之農工會悉封閉。

三十日 黃紹竑軍擊敗賀龍、葉挺叛軍於汕頭，繳械千餘，賀、葉向西南潰退，謀與海陸豐農軍聯合。

本月未 托洛斯基被撤除第三國際執委。

十月三日 粵軍入汕頭。八一暴動至是完全失敗。

本月 毛澤東竄至江西井崗山。

十一月三日 宜興共產黨暴動，爲水警及商團所擊潰，縣城收復。

七日 海豐開蘇維埃大會，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任主席。

九、十日 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開除譚平山黨籍，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及湘省委資格。其他參加八一暴動及兩湖暴動者，亦受輕重處分。

十七日 張發奎在率師由江西至廣州，發動兵變，反對李濟深（按：張擁汪，爲汪奪取地盤。）

十八日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議案，指示暴動及「土地問題黨綱草案」。

二十日 廣東海陸豐共產黨徒開始慘殺當地人民。

十二月一日 上海電車罷工。

十日 國民黨全體會議預備會開第四次會議。汪兆銘突提出請蔣中正繼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議案，當即通過，汪表示個人可引退，即決定全體正式會議於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由蔣中正負責籌備，上海預備會議遂告一結束。

十一日 廣州暴動，成立蘇維埃。

十三日 張發奎克復廣州。

十五日 國民政府與俄絕交。

十六日 國民政府下令，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何香凝等於張發奎叛變時，或列席會議，或公然袒護、輿論譁然、嫌疑難釋，特派鄧澤如、古應芬查辦呈復，查辦期間，汪等居住所在，應責地方軍警注意監視。

十七日 汪兆銘由上海乘輪出洋。